

〔意〕 乔治·阿门多拉著

意大利共产党 历史

1921—1943年

人民出版社

意大利共产党历史

(1921—1943年)

〔意〕 乔治·阿门多拉 著

黄文捷 等译

人 民 出 版 社

033800

译者说明

本书是意大利共产党已故的一位重要领导人乔治·阿门多拉(1907—1980年)的遗著,记录了西方过去最大的共产党自1921年建立至1943年9月8日参加反对纳粹德国侵略和肃清意大利法西斯残余势力的全国起义这段长达20余年的历史。按照作者原意,本书是作为意大利共产党史上卷披露于世的,但可惜作者的去世使他未能如愿以偿,完成这部史书的续篇。作者生前在党内历任要职,特别是在意大利共产党处于非法状态从事地下工作时期,曾参加党的国内外领导中心工作,这就使他得以通过个人亲身经历,为本书读者提供丰富而翔实的珍贵史料,展示出意大利共产党为意大利人民的自由和解放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一幅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为便于读者了解意共的情况,本书还提供了举凡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详尽背景材料,其中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的经济政治状况、意大利法西斯上台的经过、希特勒德国的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等。本书曾被誉为研究意大利共产党史的不可缺少的重要著作。

作者乔治·阿门多拉出身名门望族,其父乔瓦尼生前是老自由党领导人之一,著名的反法西斯人士,当过政府部长。阿门多拉从1926年在那不勒斯大学攻读法学博士时期就开始从事反法西斯活动。1929年加入意大利共产党。1931年赴法,曾作为党代表参加同年在德国科隆举行的意大利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30年代期间,曾被捕并解往特别法庭受审;大赦时曾改判流放5年,其

2016 67

中 2 年因鼓动流放者举行反法西斯抗议示威又遭监禁。1936 年被派往突尼斯办《反法西斯劳工报》；1937 年冬又往法国领导出版党的地下刊物并领导党的小组。欧战爆发后，被法当局驱逐出境。1943 年初，阿门多拉代表意大利共产党，同社会党、正义与自由组织签订反法西斯公约；同年 4 月返意参加党的罗马中心领导工作。1943 年 9 月 8 日全国起义后，参加民族解放委员会，并在军事委员会中任意大利共产党代表。1944 年 5 月被德军逮捕，因未被识破而获释。1945 年 4 月 25 日，参加都灵起义的领导工作。同年 6 月，任帕里政府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连任此职到 1946 年 7 月德加斯佩里首届内阁。自意大利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1945 年底）起任中央委员和领导机构成员。1946 年当选立宪议会议员；1948 年起连续当选众议员，先后参加众议院财政国库、预算规划、国家参与等委员会工作，并作过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副主席、意大利共产党众议院议会党团指导委员会委员。1976 年任欧洲议会议员。阿门多拉还担任过意大利共产党下属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席。1980 年 6 月，阿门多拉因病逝世。

1991 年 2 月意大利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经多数人投票赞成，决定改名为“左翼民主党”。

本书附有人名索引（中意文对照），供读者检索参阅。

序

本书的写成不是依靠在档案室里进行的独特研究，而是通过 XI
使用现有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广泛资料。意大利共产党史已经成为人们越来越注意的对象了，介绍意大利共产党变迁当中的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的书籍不胜其多，党员的回忆录以及论述党的地方性和专题性问题的著作也大量增加，这些都使我们能够，甚至要求我们做一番系统整理，以求根据现已搜集到的资料，批判地分析，设法划出这样一个过程的主线，这条主线贯穿 50 年，它使意大利工人运动的一个人数很少的小集团得以成为国家生活中一支具有决定作用的主要力量。

当然，按照上述准则写书，只能取得一个为时不长的结果，它必定要为后人的评断所纠正。保存在葛兰西学院的意大利共产党档案，是向学者们开放的，但是，可以肯定，这些档案一定会由共产党战士的一些文件、通信、回忆录所作出的新的贡献来丰富。所有这些资料都必定会被人们保存、整理和研究。现在，其他一些反法西斯政党的档案几乎还不存在，特别是党员和领导人的通信，依然四处散佚或为人私藏，其原因是出于被曲解的对本党利益的考虑或出于家族保密的需要。只消想一想彼特罗·南尼的书信的历史价值就够了，我希望他的这些书信能重新收齐并整理。还有意大利国家的档案，特别是警察局的档案，对这些档案也应当进行有步骤的探索，这些档案肯定会使人对地下斗争的一些令人痛苦的事件感到既悲痛又惊讶。因此，我一向反对有人对伦佐·德费利切

XII 提出这样的指责：他们说德费利切“恶语中伤加里波第”，而德费利切不过是利用他所掌握的一些资料，开始研究加里波第罢了。他的作品肯定是有益的，尽管我并不能总是赞成他利用他在探索中所取得的成果的那种作法。

另一个特别重要的来源是共产国际档案，实际上，这些档案还未为人所利用。意大利的共产党^①的国际活动和它在国际上所受到的牵制，肯定是写共产党历史的一个主要根据。因此，有关意大利共产党人在西班牙所进行的活动，特别是陶里亚蒂所进行活动的资料，是重要的，这些资料一直保存在西班牙共产党的档案室里。法国共产党的档案内容想必是宝贵的。遗憾的是，其他各国共产党的档案室并未向学者们开放，它们也没有把对本党历史的了解作为自身革新的一个永久性的根据。如果对共产党人在其本国历史中所占有的地位不作批判性的了解，如果对它们所取得的胜利和所遭受的失败不作出评价，如果对这种胜负交替的状况之所以产生的理由不进行讨论，那就不能理解应当以新的方法对待的新任务，以便对本国进行民主和社会主义变革。

共产党史是意大利史的组成部分。意大利共产党人行动的主要依据，始终是国家，是对意大利社会的变革，是其他政治力量的行动，是其他反法西斯政党的历史，特别是主要政敌即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就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反法西斯各党的历史和法西斯主义的历史，都粗具规模，因此，迫切需要使意大利历史研究工作以越来越大的注意力来对待这些问题。实际上，目前正是这样做的，而且最近还取得积极的成绩。

当然，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意大利支部，曾经受到国际共产

^① “意大利的共产党”系意大利共产党建党初期的原名，即“Partito comunista d'Italia”。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起改名为“Partito comunista italiano”。——译者

主义运动生活的很大牵制,而且主要的是受苏联共产党的牵制。意大利共产党的变迁正是在国内和国际这两极当中发生的,意大利共产党生活经历的历史再现必须考虑在党所不得不奉行的共产国际指示和来自国内的呼吁二者之间存在的那种联系。

我意识到我所掌握的情况不足,然而我也相信,现已搜集到的材料可以为作出初步综合分析提供基础。其他一些学者们将有责任进一步作出必要的探讨,以便纠正今天对意大利共产党的历史所做的介绍,并且可以作出不同的判断。况且,每一部历史研究著作,总是要做不断的订正,这要么是由于通过在档案部门进行独特的研究而搜集到新的资料,从而要按照补充的工作方针来编写(统计数字、社会学分析、结构调整、心理分析),要么则是由于情况发生变化,历史学家们采取了不同的编写方针。

XIII

我曾力求不采用加脚注注明参考书目或注明材料来源再或确切引证文章、讲话、文件原文的办法,以便不致使本书的叙述有繁琐之嫌,也不致打断本书的一气呵成。有时,我甚至还有意地对一些文章或决议的某些段落作些发挥。书末的参考书目^①是说明我使用的材料所依据的书籍。这些书目并不完全,但能说明我看过或查阅了哪些书籍,这些资料的排列是按照主观的标准来进行的。我还引述了确实使用过的一些版本或更容易地信手取得的版本。

《意大利共产党史》第一部写到1943年9月8日为止。第二部将从那个时期写到陶里亚蒂逝世。^②陶里亚蒂逝世这个日子是具有划时期意义的,这不仅是由于这个人的逝世对于共产党所代表的那种意义所在:他从葛兰西被捕那天算起,大约连续不断地领导意大利共产党达38年之久;而且这也是由于他在国际上所承担的任务,他不得不把作为书记或党的活动的负责人的职务让别人来

① 书末参考书目中译本略去。——译者

② 由于作者逝世,意大利共产党史第二部未能问世。——译者

承担。1964年^①还有作为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转折点的意义，这种意义由于其他一些事件的发生而明确起来了：在教皇约翰二十三世逝世后，发生了肯尼迪被刺事件，美国开始侵略越南，赫鲁晓夫被排除出苏联领导层。从国内来说，1964年是中左政府时期的开始，但也是垄断资本扩张时期的结束。

1940—1943年，我在共产党领导集团中曾担任越来越重要的职务，这个领导集团在战争的苦难中是历尽艰辛重建起来的。因此，我不得不叙述我参加党的活动的情况，特别是1939—1943年的情况。对于这个时期的回忆，我已经在《米兰通信》一书中作了阐述。在本书中，我力求摆脱对当时事件作自传体的叙述方式，而是不仅考虑客观情况，而且也根据其他一些像我一样曾有过那段艰难经历的共产党人的回忆，尽管这些回忆往往是相互矛盾的。不过，我不知道我是否已经做到完全摆脱自传体写法，因此，我认为，
XIV 我应当提醒读者谨防这种危险，而这种危险是始终存在的，它会对史料作出某种歪曲。

我想既感动地又感激地提到恩内斯托·拉焦尼埃里^②，他曾经鼓励我完成这项工作，而由于我本人修养不够，又在这些年忙于紧张的政治活动而无法完全从事历史研究，这项工作对我来说是特别艰巨的。我要感谢保罗·斯普里亚诺^③，他曾经亲切地关怀我们的工作，并给予批评；他还向我提出过不少建议，对于这些建议我并不总是考虑的，这也是由于我想在我们之间保持某种争论，而这种争论对我来说总是十分激励人心的。本书主要依据的那本书就是他的《意大利共产党史》。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标准并不能

① 1964年系指陶里亚蒂在雅尔塔逝世的年代。——译者

② 恩内斯托·拉焦尼埃里，意大利共产党已故中央委员，历史学家。——译者

③ 保罗·斯普里亚诺，意大利共产党已故中央委员，历史学家，著有《意大利共产党史》五卷本。——译者

减少我对他的感激之情。他曾经勇敢地研究党史打下了基础，我在推荐他的党史第一卷（早在10年前就出版了）时就曾直截了当地承认他的党史是一部“非官方的党史”。当时这个说法曾被误解为对他的党史的批评和保留，今天则表现为对他的赞美，是承认并确认那些曾受过葛兰西和陶里亚蒂教育过的意大利共产党人居然不能拥有本党的官方历史。陶里亚蒂在他的《意大利共产党领导集团的形成》一书中曾在这方面指出一条很好的道路，它使党员们了解到他们党在建党初期的境遇是多么艰难。

10年来已经有了很大进展；当时某些同志对于某些学者打算不是从歌功颂德的角度来叙述党史曾感到不安，今天，即使这种不安情绪依然在少数人身上存在，却不再敢明目张胆地表现出来了。党内现在逐渐明了批判地探求真理的革命意义，逐渐明了宣传式或外交式叙述党史会带来怎样的危害。然而，至今还有一些共产党人并不欣赏对党史进行自我批评式的探讨，因为他们认为，“家丑不可外扬”，不应当为敌人宣传提供口实。必须战胜敌人卑鄙地试图在宣传上利用我们的研究成果来反对我们这一点所带来的麻烦。如果他们硬不去写他们自己的历史，以便我们有可能更清楚地看出我们力量产生的原因，同时也看出我们所取得的成就的局限性，那就听其自便吧。 XV

今天，共产党人中间存在着对本党历史作出不同判断的情况，存在着矛盾甚至论争，这更清楚地表明意大利共产党的世俗性和民主性，表明它所执行的以民主方式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政策所依据的条件。

我非常感谢法比奥·佩莱格里尼、罗贝托·贾诺蒂和魏尔玛·迪奥达蒂等同志，感谢他们以很大的耐性和亲切的关怀给予我的宝贵帮助，使我得以完成本书的撰述。

乔治·阿门多拉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共产党的成立	1
一、法西斯的进攻	1
二、里窝那的两个代表大会	4
三、分裂的准备	8
四、共产国际的干涉	13
五、对意大利形势的看法	16
第二章 战后危机	21
一、主张参战论	21
二、战争后果	27
三、战后的政治危机	31
四、工人的失败	38
五、意大利的共产党的诞生	42
第三章 法西斯上台	46
一、法西斯的进攻在继续	46
二、不了解法西斯主义的性质	48
三、乔利蒂的破产和自由民主党多数派的危机	51
四、意大利的共产党和意大利社会党合并问题	56
五、共产党的宗派主义	61
六、自由党的投降	65
七、工人运动的分裂	68
八、进军罗马	72

九、墨索里尼政府	76
第四章 马泰奥蒂谋杀案	81
一、共产党新领导集团的组成	81
二、马泰奥蒂被谋杀	85
三、阿文汀派的失败	92
四、法西斯政权的巩固	96
五、反法西斯论战	100
六、共产党的行动	103
七、里昂代表大会	106
第五章 法西斯政权的建立	110
一、国家的改革	110
二、里拉的升值	113
三、共产党1926年8月的中央委员会	116
四、波洛尼亚谋杀事件和葛兰西被捕	119
第六章 地下活动	126
一、非法状态中的共产党人	126
二、旧反法西斯主义运动的瓦解	128
三、留在意大利	133
四、非法活动的初步总结	138
五、巴塞尔会议	140
六、特别法庭	146
第七章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149
一、苏联共产党内的斗争	149
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意义	152
三、对塔斯卡的斗争	157
四、共产国际对意大利的共产党的批评	160
五、“转折”的原由	164
第八章 大危机	169
一、危机的爆发	169

二、欧洲的衰败·····	172
三、意大利的经济危机·····	177
四、危机的政治后果·····	179
五、意大利的共产党的“转折”·····	185
六、葛兰西和特拉齐尼的批评·····	188
七、实现“转折”的困难·····	194
八、第四次代表大会·····	199
九、“转折”的总结·····	204
第九章 希特勒上台 ·····	215
一、世界经济危机的后果·····	215
二、意大利工业复兴公司的诞生·····	219
三、法西斯上台的十年·····	221
四、魏玛共和国的危机·····	224
五、民主的失败·····	227
六、失败的原因·····	230
七、国际工人运动对希特勒胜利的反应·····	232
八、国际联合的转折·····	237
九、意大利的共产党的联合转折·····	240
第十章 征服埃塞俄比亚 ·····	244
一、法西斯的对外政策·····	244
二、决定的理由·····	246
三、战争准备·····	250
四、战争·····	252
五、帝国宣告成立·····	257
六、反法西斯运动的弱点·····	261
七、战时共产党的状况·····	263
八、“和解”政策·····	267
九、对“和解”政策的批评·····	273
十、“和解”政策的未来发展·····	275

第十一章 新反对派	279
一、经济困难	279
二、政治失望	281
三、工厂中的再兴	282
四、利托里奥分子文化协会	285
五、文化革新	289
六、干涉西班牙	299
七、“斯塔拉切主义”	302
八、企图建立法西斯文化	307
第十二章 人民阵线的经验	309
一、法国短促的夏天	309
二、保卫西班牙共和国	314
三、国际纵队	320
四、人民阵线的前景	324
第十三章 黑暗的一年	330
一、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的暴动	330
二、加里波第纵队失利	333
三、安东尼奥·葛兰西之死	335
四、罗塞利兄弟被害	340
第十四章 斯大林的镇压	344
一、移民中的共产党人	344
二、斯大林的镇压	352
三、斯大林镇压的原因和后果	359
四、斯大林在意大利共产党内的压力	364
五、中央委员会的解散	372
六、贝尔蒂的调查	376
第十五章 痛苦的前夜	389
一、德奥合并	389
二、西班牙共和国的结束	392

三、慕尼黑会议·····	395
四、钢铁条约·····	399
五、外交准备·····	405
六、德苏条约·····	408
七、意大利不参战·····	413
八、战争开始时的意大利的共产党·····	418
第十六章 世界大战 ·····	430
一、法国的失败·····	430
二、意大利不参战的结束·····	436
三、意大利的经济状况·····	440
四、意大利的反对派·····	447
五、等待主义的起因·····	463
第十七章 战争的民主性 ·····	469
一、党的恢复·····	469
二、意大利最初的失败·····	482
三、巴多利奥的政治危机·····	486
四、苏联参战·····	490
第十八章 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团结 ·····	499
一、1941年6月22日以后·····	499
二、图卢兹委员会·····	505
三、国内中心·····	514
四、战争的转折·····	517
五、斯大林格勒·····	522
第十九章 崩溃 ·····	527
一、动荡中的国内战线·····	527
二、反法西斯政党的重建·····	533
三、1942年共产党的力量·····	540
四、共产党的后备力量·····	546
五、政权的垂死挣扎·····	555

六、3月罢工	559
七、3月罢工的政治后果	564
第二十章 7月25日	570
一、里昂协议	570
二、前夕	573
三、君主制国家的政变	580
四、7月26日的人民示威	585
五、反对派委员会的成立	587
六、巴多利奥政府的行动	593
第二十一章 9月8日	599
一、全国反对派委员会的活动	599
二、工会专员的任命	604
三、释放政治犯	608
四、反法西斯政党	611
五、共产党的跃进	621
六、领导机构的成立	627
七、停战	631
八、抵抗运动的开始	638
人名索引	643

第一章 共产党的成立

3

一、法西斯的进攻

1921年1月15日，意大利社会党在里窝那举行第十七次代表大会。

这是一个严重的时刻，反动派的进攻已经全面展开了。在乔利蒂政府^①的庇护下，法西斯肆无忌惮地发动了进攻；乔利蒂政府认为，可以利用法西斯进攻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乔利蒂打算依靠法西斯的暴力讹诈来推动社会党的改良派改变迟疑不决的态度，向他提供在议会中的支持，他需要这种支持，以求在人民面前重新树立他当时已经摇摇欲坠的权威。整个自由君主制国家机器，包括军队、省长、警察和司法当局，在意大利资产阶级各个阶层的广泛和有效的同谋之下，都在煽动、支持、从物质上扶植并资助法西斯进攻。

通过1920年11月的波洛尼亚事件，政治斗争的新阶段开始了。1920年11月21日，社会党政府在波洛尼亚市宣布就职，正当市长纽迪在阿库尔西奥宫^②阳台上露面时，法西斯分子在广场上开了火。社会党人也拿起武器进行自卫。死10人，伤41人。被害人当中，有战争致残、受过表彰的少数派市议员焦尔达尼律师。法西斯分子是这一挑衅行动的罪魁祸首，他们却以这位爱国者的被害作为丑闻来进行鼓动。报刊也对这一激动舆论的投机行为大事夸张。

① 乔瓦尼·乔利蒂(1842—1928)，意大利著名国务活动家，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曾多次组阁。——译者

② 阿库尔西奥宫为波洛尼亚市府所在地。——译者

11月23日，波洛尼亚市政府被解散。一个月后，即12月20日，同样的挑衅活动在菲拉拉又发生了。

法西斯分子施展同样的策略进行暴力活动，在这种暴力活动之前，警察力量已经进行了镇压；法西斯暴力也得到了警察力量的支持，得到了反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广泛动员的庇护，并得到了旧的地主阶层和新的农民阶层以及小资产阶级广大阶层的支持；法西斯暴力活动的范围迅速地蔓延开来，从一省到另一省，在波河流域，甚至触及那些工人运动的建设性能力表现得更为强大的地区。

4 在1921年和1922年间，法西斯势力一直发动猛烈的进攻，只有短暂的间歇，因为在政治上必须进行扩大和巩固，并且墨索里尼也利用这种间歇来一方面同地主冲击队中最急不可待的人们，另一方面则同大工业和保守派资产阶级中更慎重一些的集团以及同自由民主派议会多数的政治力量建立困难的关系。

这样，从1890—1920年整整30年当中意大利劳动者作出无数牺牲建立起来的大厦，就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被残暴地摧毁了。市工会被焚，市政府被洗劫，市议会被人以暴力强迫解散，党员遭到棍棒殴打、被人用蓖麻油奚落或被残酷地杀害。大城市当时还没有遭到这种袭击，社会党的地位似乎还是稳固的。但是，方针已经改变了。对无产阶级专政即将实现所抱有的天真希望，变为痛苦的幻想破灭了。此时，主要体现为改变战时经济的经济危机，引起了大批解雇。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动摇了国家的陈旧结构。

乔利蒂在1920年10—11月地方选举中为了扩大自由民主派的政治基础并削弱各群众性政党（特别是社会党，但也有人民党）的政治基础而倡议成立“民族集团”，这使法西斯主义得以在政治上和议会中发挥作用，有利于更快地打破旧的政治平衡，为资产阶级统治的新的组织形式即法西斯专政的实现开辟了道路。

参加社会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许多人曾经是一些惊心动魄

的事件的主角，许多人已经受到法西斯暴力的打击。许多人来自 5
一些省份，在这些省份当中，无产阶级曾进行防御，对付法西斯的
袭击和国家政权持续的暴力镇压，但这种防御是分散进行的，虽然
有一些可歌可泣的个人英雄业绩和团结互助的表现，却在政治上
和组织上缺少一个全盘计划。给予那种反社会党的最严重暴力事
件的唯一反击形式就是举行抗议性总罢工，而这种示威活动的反
复举行却使群众感到厌倦，使劳动者日益感到自己是无能为力的，
最后则是使社会主义运动更加陷于孤立。

地主冲击队是法西斯主义的急先锋，它在艾米利亚大区，在伦
巴底大区南部发动了进攻，并且直指托斯坎纳大区。

但是，里窝那代表大会并没有对这一严重局势产生警惕，也没
有深入分析。在意大利社会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稿中，
“法西斯主义”一词只不过出现了十来次。改良派分子认为，暴力
浪潮无非是一种暂时现象，是战争的后遗症，在一定程度上是对
1919年和1920年红色过火行为的一种反动。确实，屠拉梯就曾指出
有产生这种反动的危险；他认为，这种反动是1898年的重演，是军
队和国家机器的干涉。因此，必须帮助乔利蒂恢复秩序。屠拉梯
没有看出，当时正是乔利蒂推动和掩护法西斯冲击队的，因为乔利
蒂指望能利用并控制法西斯冲击队。

对最高纲领派分子来说，法西斯暴力则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社
会的挣扎，是这个制度发生危机的表现，而且这个危机必将继
续下去，变得日益严重，成为长期性危机。不论如何，反动派的
加紧活动要求社会党保持团结，而在社会党内，改良派分子是可
以用来保卫自由的。共产主义派分子的立场，实际上也没有什
么不同；他们认为，暴力的频繁发生是资本主义社会分崩离析的
一种表现，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必然而又并非异常的结果（暴力时
时刻刻都是有的嘛！），是必定要通过冲突、失败、胜利而最终成为尖

锐的对抗斗争反复交替、成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这样一个过程的体现。但是,只有在革命党时刻准备好进行活动,利用有利形势、客观上臻至成熟的形势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才能取得政权。因此,6 不应当过高估计反动派暴力的意义,这也是因为不致给改良派分子提供口实。

所有的人,包括改良派分子、最高纲领派分子和共产主义派分子,都没有看出这一现象的独特性,没有看出这是国家政权的镇压性暴力同一部分武装起来的集团的侵略性暴力相结合的结果,没有看出反动派有能力通过新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在人民阶层中找到自己的群众基础。只有葛兰西察觉到,当时的局势有可能变为有产阶级和统治阶层的暴虐反动,但是,葛兰西的立场只不过是个人的立场,它并没有变为整个运动的战略观点和政治路线。葛兰西和屠拉梯不同,他认为,革命的胜利才是击退反动派进攻的唯一手段。

事实是,当时意大利并不存在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条件。在共产主义派分子当中占优势的论点是社会民主党的主张:资产阶级在激烈的阶级冲突中利用法西斯暴力来阻止无产阶级革命,在这之后,它将求助于社会民主党,以便按照德国经验,把社会民主党吸收到资产阶级国家的领导中来。

二、里窝那的两个代表大会

因此,在里窝那展开的讨论并没有停留在最近的那些事件上(国家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法西斯暴行),这些事件不过是具有另一种意义的一种过程的临时性和暂时性的现象罢了;讨论相反的是又一次涉及有关总方针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在1920年全年当中曾在不同的国内外局势下是意大利社会党内部发生激烈政治

斗争的起因。当时的讨论是混乱的，人们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参加这场讨论，其间还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这场讨论的主题仍然是代表大会前展开的那场激烈论战，而论战正是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7、8月间）之后进行的。那时，意大利代表团里的最高纲领多数派的团结已经破裂了，塞拉蒂已经拒绝了为参加共产国际而提出的各项条件，亦即列宁提出的21条。塞拉蒂抗拒的有两条：即第7条，要求立即将改良派分子开除出党；第18条，⁷要求抛弃“意大利社会党”这个旧名称，而接受“共产国际支部——意大利的共产党”这个新称号。塞拉蒂不甘心开除改良派分子，因为这些人战时并未参加政府，并未支持战争行动，像法德两国卖国贼所做的那样。塞拉蒂之所以不愿接受改变名称，因为他不打算放弃他认为是光荣的思想道德遗产。

在1920年整个下半年，曾就上述问题展开了讨论。如今，虽然已经时过境迁，但是面临着紧迫的新的事态发展，必须得出结论。因此，在代表大会上，各种立场的交锋，更多的倒不是寻求统一的对策，而是用来庄严地重申已经作出的抉择的理由，而所作抉择的严重性是有目共睹的。塞拉蒂和最高纲领派分子决定同改良派分子一道置身于共产国际之外，置身于代表十月革命的组织之外，而十月革命是一个伟大的事件，它曾激发意大利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以致1919年在波洛尼亚举行的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曾一致决定参加这个新的世界性组织。相反地，共产主义派则准备好离开老党，成为共产国际意大利支部。共产主义派的决心，他们发动进攻的勇敢精神，他们采取一刀两断的做法的意志，他们对共产国际的支持，这些都未能完全超过大家对事件的重要性和严重性的认识。

社会党未能阻挡共产主义派采取分裂行动。战后，社会党人数激增。1914年为6万人（为计算方便起见，用整数），1920年则增至21万人。工会会员人数也有增加：从1914年20万人增至1919年

110万人，1920年则为210万人。

8 党员人数的迅速增加使意大利社会党在领导上的困难变得更为严重。这种困难不仅仅是由于最高纲领派和改良派在政治上的分裂以及在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处于主要地位的激烈争论所致，而且也是由于这个党的性质本身所致，因为意大利社会党不过是一个有着许多决策中心的联合会罢了。《前进报》的领导^①、议会党团的领导、总工会和合作社联盟的领导都遵循不同的路线，而党的领导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是黔驴技穷的。改良派因为在历次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从而在事实上被排除出执行委员会和党报的领导机构，但他们却控制着议会党团，领导《社会评论》杂志（这份杂志仍然是社会党最有权威的刊物），也领导工会和合作社。地方主义和市政主义的现象也很严重，市镇和市工会的各项决定是不受任何约束的。形形色色的党员成份反映着当时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变得杂乱无章的全国现实，与此同时，旧有的矛盾也变得更加严重了。北部和南部的运动的不同进展就说明了这种情况。50%的党员和选票集中在北部，40%集中在中部，南部和岛屿则不到10%。

党员迅速剧增加大了种种矛盾的严重性。共产主义派的发起人往往是重要的总支部的老领导人，这一派在地理上的分布同党的总的情况相符合，因而在1920年10万余新党员当中，他们就吸收了很多支持者。这些新党员受到十月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希望的激励，大部分都没有受到感情上的阻挠而靠拢共产国际，靠拢意大利那个以列宁革命教导为依据的派别。

在这种情况下，最后的调解尝试也归于失败了，因为当时不仅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发生极为尖锐的冲突，而且在人事上也发生了

① 《前进报》系意大利社会党的机关报。——译者

极为尖锐的冲突。1月20日，开始进行表决。波尔迪加和特拉齐尼提出的共产主义派动议得到了5.8万票。塞拉蒂和巴拉托诺提出的最高纲领派动议得到了10万票，是绝对多数。改良派集中一起，由巴尔代西和马佐尼联合提出一个名单，只得到1.5万票。1月21日晨，共产主义派急忙从表决结果中作出事先已预料到的结论：在哥尔多尼剧院，众所公认的新党领袖阿马德奥·波尔迪加呼吁那些投票支持共产主义派动议的代表们离开会场，到圣马可剧院去，以便决定成立新党。

共产国际意大利支部——意大利的共产党就这样诞生了。在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所经历的分歧、分裂、重新统一这样一个长期的历史当中，1921年1月21日这段历史占有特殊的地位，只有1892年那段历史可以与之相比：当时，在热那亚，意大利社会党人曾同无政府主义者分道扬镳，成立了工人阶级政党，使一个争取劳动阶级解放的有组织的运动得以产生。⁹

经过50多年，意大利共产党在里窝那的建立看来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举动，它必定不仅对意大利工人运动，而且也对整个意大利社会产生深远影响。意大利社会今天不仅在经济方面和社会结构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文化方面和风俗习惯方面都已经发生变化，这也是由于共产党的实际存在所造成的结果。除了当时那些倡导成立共产党的人所提出的有关这一抉择的临时性的和部分地说是错误的理由之外，看来，在那些参与这一混乱而猛烈的冲突的当事人当中，也存在着这种认识，即：他们认识到，这不是什么根据策略考虑而实行的暂时性分裂，而是一种不可扭转的抉择，这一抉择即使在他们据以作出这一抉择的直接理由已不存在的情况下，也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分裂的准备

其实，成立新党的决定早在社会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开幕前就已经在1920年11月28—29日举行的伊莫拉会议上作出了。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结束后，意大利社会党旧的最高纲领派领导的分裂已变得更加严重。塞拉蒂和共产国际的公开论战也变得日益激烈。塞拉蒂针对共产国际给他寄来的一封信，以“一个主张团结的共产主义者”署名，写了一封信进行答辩。论战的加剧并未使塞拉蒂在群众面前陷于孤立。相反地，他却感到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他的主张，即加入共产国际，但是要以符合意大利当前形势为条件。他骄傲地宣称，因为有了他，意大利才“前进”了。在论战中，他强调国家情况不同等原因。在9月29日会议上，意大利社会党领导发生分裂。特拉齐尼等6名成员主张完全接受在莫斯科提出的21条，塞拉蒂等5名成员则主张维护党的团结和自主。少数派成立了“团结共产主义者”派。10月15日，共产主义派在米兰举行会议。波尔迪加放弃了取消议会斗争的偏颇主张，参加了共同纲领的制定工作。该派任命了一个指导委员会（邦巴齐、波尔迪加、福尔蒂基亚里、葛兰西、米夏诺、波拉诺、雷波西、特拉齐尼），决定11月28—29日召开伊莫拉筹备会议。

在伊莫拉，所有后来参加成立共产党的力量都出席了会议。占主要地位的是以波尔迪加为领导的取消派；该派在会议期间，是作为独立的派系而活动的，尽管遭到人们的抗议；它公然声称要使会议作出符合它的愿望的结论。参加取消派的总支部或取消派人数虽少、但力量很大的总支部，为数很多，这就说明波尔迪加为成立共产党已经奠定了怎样的全国性的基础。波尔迪加原属意大利社会党左派，他在意大利社会党左派佛罗伦萨会议（1917年11月）上

曾提出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的目标。然而，在提出这一目标的同时，他并未相应地制定一个使人能达到这一目标的革命战略和策略。波尔迪加本人也患有最高纲领主义的通病，即等待主义，其根源是实证主义决定论。波尔迪加一心只想恢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以经院哲学的态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同时却否定列宁思想的独特性和十月革命伟大胜利经验的普遍价值，这并不是偶然的。在波尔迪加看来，加速历史发展进程是不可能的。早在1917年2月社会党罗马会议上，他就要求党“参加可能发生的群众暴动”从而采取纯粹革命的策略。因此，必须等待“抓住机会”，而不是采取主动来为机会的到来作准备。政治“主动”的意义对波尔迪加和对塞拉蒂一样都是格格不入的；对他们两人来说，为投身于客观事物发展进程以便影响这个进程，使之走向政治目标而作出的任何努力，都应当看作是唯意志论和浪漫主义的主观主义证明。这正是葛兰西所谴责的鼓吹无产阶级无所作为、而不是激励他们采取革命主动的理论。

波尔迪加参加伊莫拉会议时已经有了一个在全国普遍建立了组织的派系，实际上是一个集权的、直属的派系，那不勒斯的《苏维埃》报就是该派的机关报。该派所有最高领导人都同波尔迪加一起参加了伊莫拉会议。米兰的最高组织派左翼小组（有雷波西和福尔蒂基亚里）也曾立即支持波尔迪加的立场。这个左翼小组保证同改良派影响最大的米兰各工厂建立一定联系。这样，在都灵，帕罗迪、博埃罗和拉贝扎纳也都支持波尔迪加了。

来自都灵的是特拉齐尼和葛兰西率领的一个代表团，他们代表社会党都灵总支部的多数派，该派是在一次塞拉蒂同他在都灵的一些批评者（特拉齐尼、葛兰西、帕罗迪）直接交锋的会议上形成的，由各个反对塞拉蒂、主张参加共产国际的小组联合组成。那次通过的决议表明都灵党组织所具有的独特的丰富经验，都灵

党组织中占优势的是“新秩序”派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领导。都灵党组织主要是建立在1920年大规模斗争中工厂委员会所开展的行动的基础上的，这些大规模斗争包括被称为“分秒必争”的4月罢工和9月占领工厂。

厂内委员会变为实行自管的由群众直接组织起来的机构，表明了促进革命进程发展的一条新道路。争取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斗争开始了，在取得政权之前，在生产场所，在工厂，建立了新的无产阶级政权的基层机构。“新秩序”派接受了列宁主义独特经验提供的教训，在葛兰西、塔斯卡、特拉齐尼、陶里亚蒂等创始人所组成的独特核心的周围，团结着一批从事思想探讨和政治斗争的工人战士。因此，“新秩序”派的经验突出表现在明显的意见不同和强烈的内部辩证关系上，这种辩证关系甚至发展成为论战和政治冲突。在1920年间，有两个文件记录了这一经验：一个是5月8日发表的文件，它说明争取党的革新的一个纲领；另一个是11月26日都灵总支部通过的文件，其中提出在社会党代表大会上争取多数的目标。

12 然而，“新秩序”派没有一个全国性基础。《新秩序》杂志在地理上的分布是耐人寻味的。在400个订户中，有300个在皮埃蒙特大区，31个在伦巴底大区，17个在利古里亚大区，12个在艾米利亚大区，而拉齐奥大区则有7个，坎帕尼亚、西西里和撒丁3个大区各有2个，等等。即使一份《新秩序》杂志一旦寄到，例如在巴勒莫，有时就会就此组成一个文化生活和政治利益的中心，这也还不能意味着成立什么有组织的派系。

争取多数就是那些左派最高纲领主义者所组成的集团公开追求的目标，这些集团响应了安塞尔莫·马拉比尼和安东尼奥·格拉齐亚代伊同其他人一起发出的号召。马拉比尼和格拉齐亚代伊本人代表着社会主义运动在伊莫拉市得到继续发展。在这个地方，

他们参加了安德烈亚·科斯塔的最初几次斗争。这些人同塞拉蒂有争论，是决心接受共产国际的条件的，但是，他们认为，可以把社会党的多数人吸引到新党中来。建议改变党的名称刺激了他们的爱党之心，于是他们提议把新党命名为“意大利共产主义社会党”。他们不想丧失旧日的同志，因为他们了解并且赞赏这些同志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同群众的联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团体，它在工会运动中，在市镇的领导层中，在合作社运动中有强大的地位。它虽然在政治上遭到挫败，但将会是新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安塞尔莫·马拉比尼和安东尼奥·格拉齐亚代伊一起的，还有埃吉迪奥·杰纳里、乔瓦尼·杰尔马内托、伊利奥·巴龙蒂尼、埃尼奥·纽迪、切萨雷·马西尼、翁贝托·菲奥雷。

在伊莫拉会议上，左派最高纲领主义者并未能表现出这种多种多样的立场和内容如此丰富的主张；在那次会议上，波尔迪加领导的派系使自己的方针占了上风。其所以如此，并不仅仅是由于取消派的组织程度或由于波尔迪加的强大的个人地位（当时，波尔迪加个人对大家有很大的影响），也不仅仅是由于有共产国际的一个代表团列席；共产国际代表团当时作出很大努力来克服矛盾，因此，实际上对波尔迪加所持主张有利。其实，波尔迪加以再彻底不过的方式不仅说明分裂的理由，而且还说明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分裂方式，即要果断地一刀两断，以便能保护新党不受老社会党所犯有的种种弊害的传染。格拉齐亚代伊和马拉比尼试图使人们接受他们的主张而没有成功；他们的主张是：要在代表大会上取得多数，就必须同至少一部分依然同塞拉蒂站在一起的最高纲领派分子保持联系，因为这些人虽然支持塞拉蒂，但对于始终置身 13 于共产国际之外的作法也感到困惑。而波尔迪加所不想干的正是这个。必须把所有桥梁都一概砍断，不留任何后路。

波尔迪加对争取社会党的多数并不关心。他知道不可能把这

个多数争取到他的立场上去，而且他也承认这一点。他知道塞拉蒂不会让步，而这也正是他所指望的。他之所以反对最高纲领派，并不是因为这些最高纲领派分子拒绝开除改良派分子，而是因为最高纲领主义在他看来就是一种伪装的机会主义形式，因此，是比改良主义本身更危险的东西。共产党的成立应是不要塞拉蒂和反对塞拉蒂。“谁不同我们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即使只有少数人加入共产党，那也没有关系。要少而精。当时流行的一种论据（葛兰西也同意这种论据）就是：布尔什维克共产党 3 万党员就足以把革命引向胜利。重要的是：革命派必须退出老党，因为老党已经被看成是一个绝对不能获得新生的大杂烩；重要的是：新党要保证服从国际纪律，要保证成为世界共产党的一个支部。

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得到都灵同志支持的波尔迪加代表了当时党员当中的主要情绪，这些党员把十月革命看成光辉榜样，希望能摆脱阻挠革命力量充分表达其意愿的重重束缚。这种革命力量在老党内虽然存在，却遭到压抑。正是对社会党内存在的那种虎头蛇尾、杂乱无章、混浊不清的状况的厌恶情绪，推动人们走向建立一个有组织的、经受锻炼的、首尾一贯的、有纪律的新党。党的纪律性看来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品质和保障：一个革命党就是要

有铁的纪律。

因此，意大利的共产党必然和法国与德国发生的情况不同，要从左的方面诞生。在法国，在 1920 年 9 月图尔代表大会上（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结束后不久举行的），多数派决定参加共产国际，把社会党变为共产党。在德国，在 1920 年 14 11 月海尔代表大会上，独立的社会党决定同德国共产党合并成为新党，名为德国统一共产党。但是，在这两个党内，已形成的多数派早已呈现了裂痕，而很快这些裂痕就变成新的分裂。这些例子启发意大利共产主义者应走一条不同的道路。不应以让步换取对

共产党的支持,应当使新党摆脱妥协的陋习。因此,塞拉蒂既然出于爱党之心而反对一刀两断的作法,甚至反对把改良派开除出党,他就变成了头号敌人,变成了必须铲除的障碍。

正是这种分裂逻辑,这种坚毅的解放意志,而不仅仅是专横的性格和用棍子在主席台桌子上乱打一气,使波尔迪加得以让自己的主张占了上风。甚至连都灵的代表也放弃了他们独特的、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有很大发展前途的立场。这时,问题已不再是争取社会党的多数以便改造社会党、革新社会党了,而是要脱离社会党以便建立一个新党。葛兰西支持这一主张是果断的。他抛弃了“革新党”的论点,而在其发言中提出必须成立一个新党。

四、共产国际的干涉

共产国际的行为看来并不是始终一贯的,由于在中央有季诺维也夫施加的影响,在意大利则有种种代表施加的影响,因此,它的行动有很大的起落。列宁曾看出波尔迪加所持某些立场的左派“幼稚病”,并且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同它进行了公开斗争。列宁当时认为同他自己的观点接近的立场,是葛兰西为争取“社会党的革新”而起草的文件中阐述的立场;这份文件得到都灵总支部的同意,并于1920年5月8日发表在《新秩序》杂志上。但是,意大利代表团中的各个成员,从塞拉蒂到格拉齐亚代伊和波尔迪加,却激烈反对列宁的这一指示,尽管他们所持理由各有不同。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结束之后,特别是由于从占领工厂中吸取了教训,列宁也通过他的信件加强了同塞拉蒂的论战。最后,强硬路线占了上风,但是它错误地预计:塞拉蒂将会最终倒台,15 共产主义派无论如何将会取得代表大会的多数。不仅如此,里窝那代表大会的结局本身也并未被看成是一个过程的结束,而却被

看成是这个过程的一个过渡阶段：这个过程就是，经过必要的分离和势不可免的对立，终究必然要导致重新统一。

这种设想显然低估了上述斗争最终在劳动群众的倾向当中产生的政治和心理影响。此外，这种设想也显然对采取行动所必需的时间缺乏了解：这些行动如要在政治上成为有用的行动，就必须速战速决。这样，在共产国际领导（其内部也并非没有分歧和对立）和意大利的共产党领导二者之间就开始有了一种复杂而模棱两可的关系。双方在应当同塞拉蒂和社会党多数派建立什么样的关系问题上有不同看法，当时共产国际认为，这种关系应当是坚决论战的关系，但又始终应达到能争取社会党接受21条这一目的。意大利的共产党领导当时也确实寻求共产国际的支持，而且也得到了这一支持，但是其目的是要走自己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并不想把里窝那代表大会的结果看成是过渡性结果，尤其是它感到需要使新党具有自主的性质，要成为一支从今以后要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同老社会党一刀两断的新的政治力量。

共产党人同社会党人论战的基础，非常明显，就是对世界和意大利形势的看法；当时共产党人认为，世界和意大利形势客观上是革命的形势。这也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看法，是共产国际同欧洲社会民主党展开激烈论战的首要原因。共产国际认为，必须从速行事，不要再浪费时间，其理由就是：欧洲革命危机正在所谓“加速”。不应当让资产阶级有喘息的时间，有摆脱危机的时间，正是战争给资产阶级带来了危机。让资产阶级获得时间，那就意味着使它得以从防御转为反攻和发动猛烈的反革命攻击。

在苏联取得进攻波兰的胜利而使人感到欢欣鼓舞的气氛之下，人们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有了这样的绝对信心：世界革命将不会再停步不前了。在所有欧洲国家中，意大利被看成是
16 最临近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所缺少的是一个有能力把革命引向

胜利的革命党。因此，必须从速行事。塞拉蒂反对成立这样的党，因此，他就成为革命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第二次代表大会刚一结束，占领工厂似乎就带来了证明这一论点的正确性的证据。占领工厂本来应当证明意大利无产阶级的战斗力，但是，由于这个运动是局限在工会活动范围之内的，其结果却证明：这个运动缺乏一个革命党。由于改良派分子所设置的障碍，由于总工会的领导所持的阶级合作立场，由于最高纲领派领导不坚决，人们认为，错过了一个革命的大好机会。根据列宁的严正判断，正是因为缺乏一个革命党，才不仅使运动未能得到最普遍的政治发展，而且甚至使它不能提出和达到一些过渡性目标，而这些过渡性目标本来能为无产阶级斗争提供新的更先进的条件。在占领工厂中错过机会，这正是1920年到1921年秋冬同社会党进行的论战的主要问题。在这场论战中，人们压抑在胸中的全部怒火，人们所忍受的种种屈辱，遭到法西斯暴力的严重打击和挫败的先锋战士们所受到的种种痛苦，这时就都充分发泄到对意大利社会党的最高纲领派领导和总工会的改良派领导的指责里去了。

确实，除了要进行论战之外，看来主张建立新党的人并不认为，占领工厂当真是什么错过良机。我们可以从意大利代表团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行动中找到有关意大利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当时采取的真正方针的证明。共产主义派的成员，虽然认为当时那几个星期是革命的，却延长他们在俄国的逗留，并用来游山玩水；他们只是在9月中才返回意大利。波尔迪加本人就是从1920年6月离开意大利的，他到欧洲去转了一大圈，还同其他极端主义集团接触，他只是到9月20日才回到意大利。因此，在波尔迪加看来，取得政权的目标实际上也并不是临近了。列宁在1917年的行动则大不相同，当时他利用了一切手段，包括乘坐著名的德

国装甲车厢,尽快返回俄国,领导革命运动。

17

五、对意大利形势的看法

实际上,不论是取消派还是最高纲领派,都缺乏对时机这个因素,对事态在时间上的发展,对必须在一个政治上有利的时机采取某些行动和倡议以避免据以行动的条件发生变化,作任何具体的估计。“革命形势”本身被看成是一个从时间上无法确定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不同的情况可能交替出现,反革命力量重整旗鼓的不同阶段也可能交替出现,但毕竟总是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土崩瓦解的总过程中发生这种情况。因此,机会总会有的,总会不断出现。至关重要的是群众的意向和革命党的准备工作。因此,首先是组织工作,然后才是行动,当事态发展(这种发展被看成是客观上必然产生的)提供有利时机时,就可以采取行动。

不论是波尔迪加还是塞拉蒂,内心深处都抱有一种信念:时间对革命有利,革命者不应当创造历史,而是应当解释历史。但是,时间对等待主义者是不利的,因为这些等待主义者一味等待革命自行到来,他们认为,只须使党作好准备,到有利时机采取行动就行了。又是只有葛兰西才意识到流逝的时间的政治价值,意识到未被抓紧的时机的政治价值。因此,要么是革命取得胜利,要么是残暴的反动派占居上风,这种二者必居其一的著名抉择本身就已经成为无产阶级将遭惨重失败这样一个前景,这也是因为所提的抉择之一即革命看来是无法实现的,而且缺乏更低一些的目标,而根据这种更低一些的目标,原是可以把工人阶级的多数团结起来的。于是,成立一个革命党,看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了,哪怕是作出最坏的假设也罢,其目的倒不是把革命引向胜利,因为已经不再把革命看成是迫在眉睫的事,而是要把革命力量的主要

核心从堕落中解救出来。必须使革命力量认识到，他们并不需要为失败负责，因为他们是为将来，为新的时机作准备的，在资本主义总危机日益加剧的前景之下，这种新的时机总是不会缺少的。

塞拉蒂和社会党领导被指责为不懂得利用革命时机，不愿意¹⁸及时同改良派决裂，他们被指责为犹豫不定，糊里糊涂；这种指责在社会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前后进行的全部激烈论战中一直是有力地提了出来。其实，在共产党的词汇当中，并不缺少用来批评最高纲领派的其他字眼，例如批评他们在群众当中夸大并保持革命幻想，煽动大家希望能把俄国做过的事照搬到意大利来，而同时却不做任何准备，从而听任群众去受幻想破灭和反动派暴力打击之苦。

不论主张成立意大利的共产党的人抱有何种个人信念，那种认为意大利存在革命形势、而这个革命形势由于缺少一个革命党而未能被利用，因此必须尽快成立这样一个革命党的论点，毕竟成为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共产主义派的主要论据。这个论点由共产国际参加社会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卡巴克契耶夫重申，而由于卡巴克契耶夫所起的作用，这个论点也就享有了威望。这个论点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主要论点。但是，从1920年7—8月到1921年1月只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却发生了多少新事件啊！夏季还可以认为是正确的观点——欧洲革命危机在加速——这时看来已经被形势当中发生的种种变化所驳倒了。

国际形势已经大大改观。苏联停止在波兰的进攻和红军的撤退，已经标志了一个时期的告终。欧洲无产阶级没有响应十月革命发出的号召。列宁很快从事件中汲取了必要的教训。苏联经济陷于严重危机，饥荒严重地折磨着苏联各族人民，列宁不得已准备实行新经济政策这一转变。必须看到革命进程在欧洲陷于停顿。相反，反动派反攻的前景却变得日益咄咄逼人了。在这种条件下，

既然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已经成立，就必须实现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统一行动。

这就是统一战线策略；这个策略是1921年提出来、为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由于各国共产党的成立在工人运动内部所造成的分裂以及这一事件发生之后人们一直抱有极为强烈的感情冲动和反感情绪，这个策略是很难付诸实施的。于是，通过
19 一些惨痛的经验，看到工厂中，甚至家庭中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势不两立的敌对情绪，人们后来就感到，如果一定要由广大工人群众和人民群众改变战略和策略，以求使这种战略和策略从简单的指示变为真正卓有成效的、能达到一定目标的力量，那就需要有时间，需要对时间作出估计，需要有说服人们的本领。掀起广泛而深刻的人民运动所需要的时间，根据形势可长可短，但不论如何总是要和改变方针所需要的时间有所不同。

列宁所提出的大胆路线，即“为团结而分裂”，正是从分裂所造成的后果中遇到贯彻这一路线的障碍，这些后果还无法消除他们据以采取破坏老社会党团结的运动的理由，因为这些理由仍然是激烈争执的对象。实际上，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分裂必然要长期持续下去。只有在14年后，随着纳粹主义在德国上台而在欧洲出现了新的局势，才有可能实现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统一行动。但是，除了短期得以恢复团结之外，欧洲工人阶级的分裂则始终是构成欧洲工人阶级的弱点的一个经常性条件，这个条件严重地限制了欧洲工人阶级发挥领导作用的可能性，严重地限制了它在和平和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欧洲团结的可能性。西欧资本主义各国（英、法、德、意以及曾作为社会主义运动诞生和发展的根据地的各个国家）的工人阶级正是在那些年代丧失了领导作用，因为它既没有同十月革命一起采取行动，又破坏了自身团结，而西欧工人阶级在此以前是一直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发挥

这种领导作用的。

在意大利，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和里窝那代表大会召开之间这段时间里，形势也迅速地发生了变化。把莫斯科提出的理由全盘接过来而不加改变，并且像共产国际代表卡巴克契耶夫那样，仍然坚持认为，意大利革命条件已经成熟，那就等于拒绝研究意大利当地发生的变化和这些变化的性质。

当时，占领工厂得到了痛苦的结局，报复、谩骂、论战、失望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经济情况随失业人数的增加而变得更加严重。人们开始限制工人阶级的行动，这就势必压制政治斗争的发展。 20 工业就业人口在 1911 年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口的 26.9%，到了 1921 年，继战争时期一度增加之后，下降到 24.3%。1920 年到 1921 年之间，就业人口就减少了 15%。只有在 1936 年才达到 1911 年百分比的水平，然后到了 1951 年，工人才增长到占有劳动能力人口的 32.5%。

1920 年 10—11 月地方选举中，社会党人的竞选力量得到证实，他们在 2000 个市镇获胜。但是，选举结果仍然表明，社会党的发展当中也存在某种停顿，因为社会党的发展只局限在传统的地理范围，而在南部，社会党只不过获得 10% 多一点的选票，“赤色岛屿”仍然是罕见的例外。大城市当中，社会党只得到了米兰和波洛尼亚，而且在波洛尼亚，几周过后，由于阿库尔西奥宫事件，竟由一个督察来坐镇^①。地方选举的一个新的政治事件就是“民族集团”的成立，这是一个阵线，一个“法西斯”集团，它聚集了除人民党外，资产阶级的所有政治团体，从民主党人到自由党人，再到民族主义党人，在某些情况下，则扩大到法西斯党人，所有这些党派都团结在一个坚决反对社会党的保守阵营当中。在“民族集团”的

^① 按意大利地方政府惯例，如市政府无法组成，就由中央委派督察来接管市政工作。——译者

竞选攻势后面，表现出资产阶级要重新采取政治主动的倾向。“民族集团”的竞选委员会成为各个不同政治派别和资产阶级各个不同经济势力与社会势力二者之间的联系点。正是在这些力量的政治庇护和财政支援的条件下，法西斯的讨伐行动才获得迅速发展。各省当局经常发动志愿人员组成破坏公用事业罢工的小分队，而不久，就从这种动员转为对工会组织和合作社组织以及社会党领导的各个市镇发动突袭的直接行动了。

反动派的反攻是如此迅速，特别是工人运动是如此无力采取适当的行动（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武装的行动）来对付这一反攻，这些都表明：那种使人认为意大利是欧洲最临近无产阶级革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是多么似是而非。从事态发展的迅速程度来看，这种论点之所以提出，主要是出自社会党内部展开的政治斗争的需要，这种论据只能用来证明老社会党无力承担革命任务，因而必须迅速成立一个革命党。

除了不惜一切利用这种论点来进行论战之外，这种认为意大利形势具有革命特征的看法还以意大利无产阶级的强大战斗力和它的社会主义倾向以及想干俄国那样的事的意愿作为依据。这种革命热情是真实的，它从声势浩大的斗争运动中也表现出来。但是，毕竟还应当验证一下这种革命热情有多少切实的可靠性，应当深入探讨这种热情的性质，研究这种热情的局限性，也就是说，应当判断意大利无产阶级的组织程度和政治社会联盟关系。为了使对意大利形势的判断有一个牢靠的基础，还应当估量一下意大利资本主义负隅顽抗和东山再起的能力，应当估量一下决心同无产阶级革命为敌的保守势力究竟有多么雄厚的力量，因意大利参战而发生的政治社会危机究竟属于什么性质。

第二章 战后危机

22

一、主张参战论

意大利经受了战争的严重考验，它旧日的根基受到动摇。旧的社会政治结构、阶级关系、传统的政治方针都受到巨大的震动。

19世纪最后10年试图实行专制统治失败之后，在乔利蒂周围形成的旧的民主自由派政治领导，从本世纪初就曾保证国家能得到初步的经济进步，保证人民运动即社会主义运动和天主教运动能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生活，它们可以起不同的作用，甚至往往是反对派的作用，因为这些运动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当中一直是不屑理睬国家的作用，甚至对此采取敌视态度的。但是，新的困难形势以及新的阶级关系所提出的种种问题揭穿了乔利蒂领导在思想和文化上的骗人把戏。右翼和左翼都形成了日益广泛和激烈的反对乔利蒂的反对派，右翼方面有萨尔韦米尼^①，左翼方面有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甚至还有民族主义者以及以《呼声》为中心的文化运动。乔利蒂的多数派早已受到侵略利比亚的行动所造成的危机的打击，并且由于采用了普遍选举制而动摇了它的旧日支持者所形成的基础；这时，又因为意大利听从王室的意旨被拖进战争里去，同时也因为各色人等组成的主张参战的少数派采取了混淆视听的行动，从而违背乔利蒂多数派的中立方针，违反大多数人民的深刻感情，这个多数派也就陷于无地自容的境地。旧的自由民主

^① 加埃塔诺·萨尔韦米尼(1873—1957)，社会党人，反法西斯人士，历史学家，反对乔利蒂政府。——译者

23 派政治领导暴露了它无力保证采取坚定而始终如一的军事外交行动,无力使国家准备好作出不断的努力,而这种努力要持久地进行下去,远远超出最初不切实际地所作的短期预计。

国家是在政治上分裂,经济上、军事上和外交上毫无准备的状况下卷入战争的。军事行动由最高司令部领导,它完全置战士们的性命于不顾,把他们送到证明是徒劳无益的血腥进攻当中去任人宰割,它根本不去考虑士兵和军官作为人的种种需要(战壕中轮流值勤、衣食住以及请假)。卡多尔纳^①将军行使一种独裁权力,要求别人盲目执行纪律,而且惯于用诉诸枪毙和屠杀的办法来保持纪律。然而,意大利毕竟还是经受住了考验,甚至在最后一年,在卡波雷托一战^②之后,举国上下大多数也还是自觉地参与了最后一击。这样,意大利自统一以来第一次,在战争中获得胜利。这一事件的全部深刻意义应当加以估计。但是,工人运动各个派别并不理解这个事件,并不理解11月4日的胜利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已成为国家演变的一个重要阶段。意大利人民所作的巨大牺牲以及战士们在战场上所表现的英雄业绩,都要求人们对已经取得的胜利的重要意义作出充分估计,要把这一胜利看成是必然的政治军事变化的前提。恰恰相反,工人运动由于反对战争,却不肯对战争的胜利告终所代表的这一全国性事件作出独立的判断,它听任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右翼势力为所欲为,这股右翼势力把胜利奉为神话,作为反对社会党人和反对左翼主张参战论者的斗争武器;社会党人被指控为背叛祖国,左翼主张参战论者则由于他们“放弃”了对费乌梅^③和达尔马齐亚^④的占领而被指控为“支解”胜

① 路易吉·卡多尔纳(1850—1928),意大利著名将领。——译者

② 卡波雷托,意大利北部一城市。第一次大战时期,意军于1917年10月在此被突破防线,损失惨重。——译者

③ 费乌梅,处于意南两国边境。原属匈牙利。1918年被意大利占领,但美、南、法

利的罪魁祸首。所有那些反对过民族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所使用的伪装爱国的堂皇辞令的人都被定名为“国贼”。

战后加深了随 1915 年 5 月参战而开始的政治危机。一直保持对外交和武装力量的直接控制权的王室，在 1915 年 5 月的日子²⁴（民族主义者的宣传称之为“光辉的日子”）里成为组织议会外行动的中心，这个议会外行动的目的是要迫使反对参战的议会多数派（它一直认为乔利蒂是多数派的最高代表）接受意大利同法英两国一起按照伦敦条约规定的条件参加战争。伦敦条约保证在战争胜利结束的情况下，不仅把特兰托和的里雅斯特，甚至还有包括南蒂罗尔的特仑蒂诺（称为上阿蒂杰诺）和人数很多的奥地利和斯拉夫少数民族聚集地区伊斯特里亚划归意大利，而且还把达尔马齐亚也划归意大利。但是，条约却没有保证把费乌梅市归属意大利。伦敦条约是依照旧日秘密外交的准则制定的；通过这一条约，就给战争确定了扩大领土和保障军事安全的目标，同时却既不考虑民族原则和自决原则，也不考虑奥匈帝国的灭亡和新的民族国家的成立所提出的种种政治问题，而意大利本来是应当同这些新成立的民族国家建立和平共处的新关系的。

在这一时刻，在这种条件之下，乔利蒂开始采取的反对意大利参战的行动就无法有很大的发展了。当乔利蒂过迟地了解到，国王已经许下了诺言，而如果不兑现这一诺言，就不得不逊位时，他也就不得不停止了上述活动。而与此同时，以前的议会多数派在抵制参战方面也遇到了来自上层（即国王和萨兰德拉—松尼诺政

等国都反对该地归属意大利。后达依丘发动“隆基进军”，占领该地。1920年11月，意南两国签订拉巴洛条约，规定该地为自由港，达依丘被迫撤出。1924年起划归意大利管辖。——译者

④ 达尔马齐亚，意大利东北部地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度为奥匈帝国占领。——译者

府)①和下层的与日俱增的强大压力;这个议会多数派因为自己领袖的退却而陷于张皇失措的境地。这种来自上下层的压力是通过喧闹起哄的广场示威式的行动对议会多数派施加的,在罗马和其他大城市表现得尤为强烈。鼓吹参战的宣传运动得到了一部分大报以及加布里埃莱·达依丘②的充满民族主义气味、冠冕堂皇的言论的支持,这正是后来在1921—1922年法西斯宣传运动采用的那种格式和方法:从道义上置对手于死地;使用恶毒谩骂的手段;进行杀人不见血的凌辱;对文明容忍、以理服人的态度不屑一顾;鼓吹恣意妄为。

意大利当时最大的政治力量,即自由民主党(它始终拥护乔利蒂,有300张议员名片引人注目地留在他的住所)、社会党(尽管《前进报》
25 社长墨索里尼改变态度,但社会党仍然肯定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反对战争的立场)、天主教党(它追随教皇贝内代托十五世,日益公开地主张参与政治),都反对参战。这些力量显然构成国家的多数派。但是,由于王室和越来越对意大利参战感兴趣的经济力量(大钢铁工业和冶金机械工业)利用了接受长期反民主、特别是反社会主义思想准备成果的小资产阶级群众运动,由于右派(民族主义者)和极左派(无政府工团主义)沆瀣一气,意大利终于还是参战了。于是,那些像萨尔韦米尼那样的一直为扩大民主而斗争的人,就断定知识界少数派的作用和权利在于把他们的看法强加到多数人民的感情之上。正是在这种宣传运动当中,提出了后来法西斯所进行的反议会和反民主的诽谤勾当的前提。

强大的民族主义潮流冲击了所有政治派别,并且造成深刻的

① 安东尼奥·萨兰德拉(1853—1931),意大利右翼政界人士,反对乔利蒂,曾出任总理;西德尼·松尼诺(1847—1924),同萨兰德拉关系密切,作过萨兰德拉政府的外交部长,两人一起参加签订伦敦条约的谈判。——译者

② 加布里埃莱·达依丘(1863—1938),旧译“邓南遮”。意大利著名文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信仰尼采超人哲学。——译者

分裂、个人的危机、令人焦虑的迟疑不决，这些情况引起的后果在战后都表现出来了。这时还有一种民主派的主张参战论，其理由各有不同：有人认为，战争就是一种使民族团结获得至高无上的证明的努力；有人则沿袭共和民主派恢复失地的传统，指望通过战争完成统一大业，使特仑托和的里雅斯特（以及费乌梅和其他地方，甚至还有达尔马齐亚）重新归并意大利；有人还认为，保卫法国以对付德国宿敌的战争是民主性质的战争；有人更鼓吹革命战争的神话，把革命战争看成彻底复兴的条件，甚至认为，战争是救国救民的必不可少的，以便使行将衰亡的文明重新获得活力。

在这种混乱不堪的人力动员当中，除了个人的真诚态度（例如，西皮奥·斯拉塔佩尔、切萨雷·巴蒂斯蒂所采取的自愿行动，甚至是战死沙场或殉道行为）之外，并不缺少种种不同的动机，并不缺少个人跃跃欲试、冒险，乃至出于私利考虑等表现。真正起作用的是经济关系和财政干预，甚至包括外来的经济关系和财政干预。在这方面，某些自称为左派的，甚至革命派的主张参战论者同右派的主张参战者之间当时存在的联系，就早已是很明显的了。右派的参战论者认为，参战是使意大利在国际舞台上占据新的强国地位的时机，同时，在国内也可以通过战争要求实行纪律措施来阻挠社会主义运动的进展。在1915年的危机当中，所有形形色色主张参战的派别都认为，王室是它们的大本营。国王赞成采取反议会的决策，这也便是1922年10月反议会行动的前奏。²⁶

这两大主张参战的派别的区别，由于它们为把意大利拖进战争而进行的共同斗争，暂时算是消除了，但是，后来随着战争的进展，在有关如何进行战争的问题上，亦即是赞成还是反对卡多尔纳独断专行，特别是在有关战争的目标问题上，亦即是要极力维护伦敦条约呢（这是松尼诺和右派参战论者所主张的），还是要实行同不同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结盟的政策（这是一部分左

派参战论者所主张的),上述区别却又显露出来了。在这些主张参战的不同派别的内部也混乱地展开了斗争,有的是在这个或那个有争议的问题上突然发生立场的变化,有的则是相互变更了原有立场。由于相互指控十分激烈,这些错综复杂的事件就留下了遗害无穷的伏笔,战后政治斗争的发展以及那些赞成或反对法西斯的党派联合都受到上述情况的严重影响。

在战争进行过程中,最初反对参战的那些行动并未变为可以削弱意大利所作的战争努力的一种抵制行为。乔利蒂分子积极参加了几届民族联合政府,特别是在卡波雷托战役之后,甚至同奥兰多^①和尼蒂^②一道采取了在指导战争方面负有首要责任的立场。社会党人始终主要是忠实于“既不参加也不破坏”的提法。改良派分子实行的是某种阶级合作主义,特别是在领导市镇工作方面,他们通过“动员委员会”的活动来为这种阶级合作主义辩解,说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必须维护居民的最迫切的需要。只是在卡波雷托战役之后,这种实际上的阶级合作主义才在某些情况下变为思想上的支持,当时改良派分子在他们的议席上就宣称:“我们的祖国是在格拉帕峰上^③”。

27 然而,意大利社会党参加齐米瓦尔德和肯塔尔两次国际会议,并未把社会党的国际主义,亦即把它为在战火中捍卫恢复国际主义团结的基础而作出的努力变为一种革命的败北主义的行动,变为争取把战争变为革命的一场斗争。在社会党举行的会议当中,特别是罗马会议(1917年2月)和佛罗伦萨左派会议(1917年11

① 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奥兰多(1860—1952),意大利法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曾出任总理。——译者

② 弗朗切斯科—萨韦里奥·尼蒂(1868—1953),意大利著名政治家,有右倾的民主思想。意大利法西斯上台前曾组阁。——译者

③ 格拉帕峰,位于意大利北部威尼托大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因意军在此胜利地抵抗奥军进袭而享盛名。——译者

月),最先进的立场还是波尔迪加所持的立场,但他又把一切行动都推迟到战争结束以后。由于没有以败北主义制止战争,左派就认为,战后的纲领应当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经受严酷战争考验的无产阶级将会响应号召,用革命从好战的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但是,把任何革命行动的实施都推迟到战后,就意味着不去利用战争期间出现的种种条件。1917年8月都灵事件因而就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卡波雷托战役的溃退,不仅没有像卡多尔纳为了推卸他的军事责任而希望指出的那样,成为一种革命行动,却表明人民开始更加广泛、更加自觉地参与战争努力了。实际上,波尔迪加的革命左派正当战争行将结束时把一切行动推迟到战后,这就表明:它根本没有估量在一场仍在进行中的、带来牺牲与死亡的战争和一场以胜利而告终的战争二者之间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对于造成革命形势来说,本来是可能存在的。面对国内事件,不可知论又一次变为最高纲领派的所有派别——从塞拉蒂到波尔迪加——所共有的等待主义。

二、战争后果

意大利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它有资格在凡尔赛和会上同美、法、英三国一起,坐到四大国桌面上来。但是,为了取得这个成果,意大利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流出了多少鲜血啊! 500万意大利人被动员,死60万人,伤残100万人,被俘60万人。开小差的、逃避兵役的以及故意致残或致伤的人数达到88万。

在41个月的战争期间,意大利的经济制度发生了深刻变化。 28
国民收入一年仅合200亿金里拉,而战争开支就达650亿。大约200亿是依靠借外债,但是,还有450亿要以国民收入偿还,而其中350亿则是靠内债偿还的。货币流通量从1914年6月30日的20亿增至

1918年12月31日的120亿。由于意大利必须增加煤、铁、石油、谷物、棉花等的进口,同时无形出口(侨汇和旅游收入)又有减少,这就使国际收支赤字越来越大。在整个战争期间,经同盟国商定的对贸易的控制,使意大利得以制止里拉贬值,因此,到1918年年底,里拉还保持在原有金里拉价值的81%。但是,1919年3月,由于废除了对贸易的控制,里拉又急转直下,到1920年7月,仅保持战前原有价值的28.4%。战争结束开始了货币危机的时期,进口产品不再受战争协定保护,价格猛涨,货币流通量、通货膨胀与日俱增,与之相应的是战争工业处于转产的艰难阶段,工厂迅速地、毁灭性地相继倒闭,失业人口越来越多。

战争期间,意大利工业曾有过加速发展的时期,国家要求它供应数量不断增长的钢铁、武器、弹药、飞机、船舶、汽车、轮船、纺织品、食品。国家成为再好不过的顾客。由于不得不应付意料之外的、混乱地日益增长的军事行动的需要,国家不再注意产品的价格,也不再注意产品的质量。意大利工业家是惯于同国家打交道的,并且也是在国家的无微不至的关照下发展起来的。在短短几年(1914—1919)中,工业生产对国民收入的比重就从17.64%增至24.35%。工业投资增至75000亿战前金里拉左右,也就是说,在四年战争期间的投资比战前10年中的投资还多。意大利工业是依靠战争物资供应和战争高额利润养肥了的。

意大利工业早在本世纪头十年就已经进入起飞阶段,这时就
29 迅速地扩大了它的生产基础。意大利工业是由穷凶极恶、掠夺成性的年轻资本家领导的,他们直接插手政治事务。正是在这些年代,意大利工业形成了它的基本结构,这些结构实际上始终保持原状,一直保持到1929—1931年危机,到意大利动产公司和工业复兴公司的成立。也正是在这些年代,后来控制经济政治权力的主要杠杆的人物初露了头角,如沃尔皮·迪·米苏拉塔、阿涅利、皮雷

利、托埃普利兹、瓜利诺、奇尼、奥利韦蒂、孔蒂、多内加尼、马里诺蒂、佩罗内、克雷斯皮，等等。投资的巨大增长要求有新的资本，这就使工业和银行之间建立了更加密切的关系，从而推动工业集团加紧进行斗争，以便取得对信贷来源的越来越大的控制权。商业银行和伊尔瓦公司之间的联系，安萨尔多钢铁公司和贴现银行之间的联系，意大利信贷银行和菲西特公司及皮雷利公司之间的联系，变得日益紧密和复杂，并为1921年爆发的危机奠定了前提。大工业在意大利政治生活中的比重变得日益强大；它参与意大利政治生活也更加直接，更加公开，不再为碍手碍脚的调解方式所掩盖。总之，意大利在战争结束后有了一个更加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集团的内部关系，工业家和农业地主之间的关系，通过二者互相渗透的错综复杂过程，已经转向有利于前者。

工业的发展一时使工人阶级获得巨大的增长。这时，工人阶级还是一个年轻的阶级，大部分人来自农民，他们同自己的出身地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也受到多种多样、相互矛盾的影响。有100万工人是战争附属工厂的工人，这些工厂是由工业调动机关控制的。这些工人在服完兵役之后就受到严格纪律的约束，工资水平很低。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实际工资已减少；物价不断上涨和低工资水平使1918年的实际工资大致相当于1913年实际工资的40%。粮食供应杂乱无章、黑市价格不断上涨、工资收入入不敷出，这些都使工人的怒火日益高涨，他们往往把怨气发泄到黑市的组织者（商人）和供应者（农民）身上；这就为战后工人同中等阶层的冲突造成了前提。

在日益上涨的物价刺激下，农业生产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相当于战前的80%左右），尽管肥料缺乏，牲口充公，特别是缺少劳 30 力。为干农活而请假以及免服兵役的机会很少，往往是迟迟才批准下来，并且还不合农时。农田管理的重担于是就经常落在妇女

和老人身上。人们由此也看出，对待工人和农民是不同的，这也构成另一个分裂工农的因素。的确，迫使农民付出的痛苦和流血的代价是巨大的。农民成为步兵主力，这些步兵被军事指挥当局毫不可惜地投掷到前线战斗的烈火中去。

战后的历史是在战壕中准备好的，在战壕里，几百年的宿怨都消失了。在战壕里，出身资产阶级队伍的年轻军官们发现了过去从未见过的世界，即劳动人民的世界，农民的世界。年轻军官和士兵之间建立了同舟共济的新的人与人关系。战争的进展情况，对指挥当局违反理智的决定的批评，对草菅战士生命和轻视人们辛苦劳动的做法的反抗，伊松佐河上多次正面突击造成的重大伤亡，物资和人力的匮乏，背井离乡，请假获得批准的机会的少而又少，所有这些都使许多曾参加过鼓吹参战的宣传运动、愿意打仗甚至自愿从军的军官们不得不从人的角度和政治角度，对战争的含义和战争所要追求的目的作一番新的探讨。战士们的家信提供了广泛的证明，它揭示了人们的真诚的爱国情绪往往使写信的人不得不就战争起因和在一场残酷屠杀之后要为子孙后代确保和平的需要给自己提出问题。这些家信揭示了一种日益高涨的反抗情绪，这种情绪是针对依靠人民的痛苦和屠杀大批战士而大发横财的、穷奢极欲的“鲨鱼”们令人厌恶的景象，针对逃避上前线的人、无情的专横跋扈者以及可耻的任用亲信者而产生的。

然而，在战争的狂飚中可能形成的新的人民集团，却不能成为新的革命的历史集团，因为它的矛头是指向工人阶级的。不论在这场悲惨的经历过程中产生怎样的新的感情，有关参战与否的论战过去曾经、后来也继续在分裂反对参战的无产阶级，分裂不愿背
31 弃为战争需要作出牺牲这种理由的小资产阶级。由于农民对“逃避上前线”的工人，对据说是挣有高工资的工人（而别人则死在战壕里）抱有恶感，上述鸿沟也就越来越加深了。时时刻刻不断出现

南部小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运动抱有的怨恨情绪，而社会主义运动主要是集中在北部和中部，对南部需要解放一点又是充耳不闻的。这样，在战争过程中，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三者之间的分裂日益加深，正是这种分裂在战后使工人运动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意大利社会党各个派别——改良派、最高纲领派和取消派——都共同采取等待主义态度，它们都共同低估南部问题，这就使它们无法采取任何行动来消除上述分裂，无法在工人运动和农民之间，在工人和战争幸存者之间重新建立组合的基础。任何试想同大批战争幸存者建立政治联系的行动，都被持续不断的反对参战的论战所破坏了，这场论战在战后仍在变本加厉地进行着。葛兰西当时由于他最初对参战采取的态度而不得不受到不公正的猜疑，这种猜疑是由他在党内的政敌肆意煽动起来的，在里窝那代表大会上更是气焰嚣张地表现出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行动能力受到这一宣传运动的严重限制。另一方面，富有战斗精神的人民运动，虽然在开始时曾抱有最良好的民主意图（萨尔韦米尼），却由于没有自觉地取得同工人阶级的联系，终于还是被极为广泛的民族主义运动所吞并，因此，到头来还是并入了追随激烈地反对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势力的“民族集团”中去，尽管经过一番犹豫和危机。

三、战后的政治危机

战争的结束标志着一场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的开始。战后，国家已经变得精疲力竭了。对战士们作了许多并未兑现的诺言，特别是在卡波雷托战役之后。300万士兵复员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社会、经济问题。既然战争工业危机提出了转产的迫切问题，又怎

32 样保证给战争生还者找工作呢？一个艰巨的时期开始了：在这个时期，里拉贬值造成的货币危机，同大工业集团冲击银行以寻求资助转变战争生产所必需的资金这一情况所造成的信贷危机，同进口食品价格上涨造成的价格危机三者交织在一起。国内必须保持政治价格（例如面包就得保持这种价格），而与此同时，进口价格却在飞涨，这就使国家不得不每日都产生赤字，长此下去，这种情况是无法维持的。

在这种新的情况下，向后倒退，即倒退到1914年以前那种旧的政治关系，那是不可能的。况且，早在战前，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就已经提出了革新的需要。在旧领导阶级人士当中，仍然是乔利蒂看来察觉到需要执行一条新的政治路线；1919年10月12日，他在德罗内洛^①的演说中就阐述了一项对国家实行谨慎的民主变革的纲领。尼蒂当时已经被卷入政权机器里了，他只认可新的比例制选举法，并且通过战后第一次政治选举，保证省督察当局会进行不像过去那样无耻的干涉。

尼蒂的文化修养是足以应付战争结束以来在意大利和世界上提出的种种新问题的。然而，他却表现出并不明白，在一个像意大利这样经受了如此严峻考验的国家中，必须开辟进步的政治前景，必须寻求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来解决战争结束提出的种种严重问题。不能要求像意大利人民这样久经考验的一个国家的人民“多生产，少消费”而同时又不指出作出这种新的牺牲的思想原因何在。但是，尼蒂毕竟是一个旧的乔利蒂政治领导中的一员，他无力超越把政权看成寡头政治这样一种局限，无力同人民群众建立民主关系，他对人民群众只不过抱有痛苦的不信任心情而已。尼蒂遭到右翼的痛恨，因为他拒绝继续推行奥兰多和松尼诺的民族

① 德罗内洛，意大利库内奥省一市镇。——译者

主义政策(他曾拒绝参加赴格鲁吉亚的反布尔什维克的军事远征,并且谴责达依丘占领费乌梅);但是,劳动群众也从左翼方面反对他,因为他曾派遣王室卫队、由他建立的警察部队向劳动群众发动进攻(实际上,他之所以成立这个部队,也是为了给没有工作的南部战争生还者提供临时性工作)。于是,尼蒂就处于孤立无援的 33 地位,他得不到他所参加的以乔利蒂为首的旧的多数派的支持,这个多数派还要求乔利蒂东山再起。这样,旧的政治领导内部就发生了个人之争:奥兰多和尼蒂之争,尼蒂和乔利蒂之争;这个旧的政治领导无法理解正在发展的政治危机的新内容。

由于主要的工业集团之间的激烈斗争造成的后果,旧的自由党领导集团的内部分裂也变得更加严重了;这些工业集团迫切需要找到新的财政手段来对付战后危机和改变他们的生产活动。1921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的迅速高涨,与此同时还有证券交易所中某些股票的暴跌,所有这些都使这场冲突的条件变得更加触目惊心了,这场冲突的目的就是要控制银行所掌握的财源和求得国家支持。

银行业从1910年起就扩大了它们的活动领域,直接地致力于支持和控制某些工业集团。贴现银行是同安萨尔多钢铁公司有联系的,商业银行则同伊尔瓦公司有联系,意大利信贷银行同菲亚特和皮雷利有联系,罗马银行同布雷达军火公司有联系。在战争过程中,依靠军事订货,在每个集团周围都形成了广泛的工业中心,这些中心需要越来越多的资金。战后的需要加重了银行的负担。安萨尔多集团就曾企图“向银行突袭”,其目的在于夺取对商业银行的控制权,但没有成功;这件事说明这些集团是多么迫切需要资金。这种筹措资金不断升级的做法失败,表明安萨尔多公司和贴现银行有垮台的危险。面对着这些问题,尼蒂曾采取支持这些行将垮台的集团的态度,因此,也就是支持安萨尔多公司,因为他相

信国家需要推行一种政府对工业进行干预的政策，以求支持和指导经济发展。为了使各工厂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利用公共资本，尼蒂成立了工业价值辅助联合会。这个联合会后来交给了尼蒂的亲密合作者阿尔贝托·贝内杜切管理，从而成为这样一种政策的开端：这一政策在1931年危机期间导致了意大利动产公司乃至工业复兴公司的成立，其目的仍然是要使银行从过度的危险的停滞状态中解放出来。

尼蒂对国家直接干预工业政策的必要性有符合时代潮流的观念，于是他就给予佩罗内兄弟和安萨尔多公司支持，这使他同最拥护民族主义扩张政策的钢铁、造船集团接近起来。佩罗内兄弟曾支持过民族主义者反对萨尔韦米尼和民主派主张参战者的宣传运动，曾由于尼蒂拒绝派遣远征军赴格鲁吉亚而批评过他，还曾赞扬过费乌梅行动。这样，尼蒂就在政治上遭到他以自己的经济政策力图加以支持的那些工业集团的攻击。

乔利蒂相反却是反对国家直接干预的政策，这一政策支持某些工厂，却又不能通过税收政策（证券记名）来重新分配财富。他得到阿涅利、皮雷利等集团的支持，这些集团更多地是着眼于自筹资金和直接收集大量储蓄，而且更关心的是推行以出口实现扩张的政策。

乔利蒂由于也试图打击战争利润，没有在1920年9月对占领工厂进行军事干涉，因而在恢复秩序后不久也丧失了民族主义者的支持；民族主义者同尼蒂集团串通一气，促成了乔利蒂的倒台。贴现银行的倒闭使局势急转直下。受到银行破产打击的储蓄者的满腔怨恨，助长了不满和恐惧情绪，并使国家进一步丧失信誉。

这就造成了旧的自由党领导集团的危机，然而，这一危机并不像人们往往所说的那样，是什么自由国家的危机，因为国家结构、官僚结构、司法结构和军事结构都保证了一种法西斯上台所无法

破坏的延续性。国王就是这种延续性的代表，而且在战后，国王的作用也增长了。事实上，任何一个有实力的政治力量都没有提出过体制问题。

曾经有过召开立宪议会的建议，这一建议是1917年5月的一次会议上，由意大利社会党的领导和议会党团以及总工会的领导提出来的。但是，早在1918年9月意大利社会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这个召开立宪议会的建议就石沉大海了。相反，70%选票却聚集在坚决革命派提出的动议周围，这一动议在无产专政这一目标上把整个最高纲领派也联合起来了。利用立宪议会来反对无产专政的改良派，根本不想为争取无产专政而斗争，因为他们所想的是同乔利蒂进行可能的合作，这种合作在当时的体制范围内实行起来要更为容易得多。实际上，谁也不愿为真正改变国家领导和革新国家的立宪制度而斗争。屠拉梯就明确地说，35不必夺取政权，以便不致解脱那些愿意打仗的阶级、权贵对战争必然造成的可怕后果所负的共同责任。最高纲领派说，在资本主义范围之内，不必作任何尝试，因为资产阶级注定要完蛋，应当听任它在自己的错误重压下自行垮台。实际上，并不像有人经常说的，战争结束后，所有党派都赞成召开立宪议会。实际情况恰好相反。赞成召开立宪议会的只有左翼主张参战的各派（比索拉蒂^①）、战士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还有墨索里尼（他则是玩弄他那随机应变的策略花招）；而有组织的政治力量：自由民主党人、人民党人和改良派却都是反对进行任何主张共和的宣传鼓动。最高纲领派和后来成立共产党的那些团体，是反对提出成立共和的目标的，因为必须集中力量为争取无产专政而斗争。况且，主张共和的宣传鼓动工作也由于君主制的威信经过战争反而有所提高，变得困

^① 莱奥尼达·比索拉蒂(1857—1920)，意大利政治家，社会党改良派。1916—1918年曾任不管部长、战争退役部长等职。——译者

难了。“士兵式的国王”这一课题在整个战后时期变得风靡一时，这时，君主制显得日益成为秩序和延续性的保障。

政治危机混乱地发展着，它有多种多样的特点，这些特点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工人阶级在十月革命胜利激起的伟大希望的鼓舞下，有了强烈的革命倾向，但是这种倾向还局限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和社会范围之内。民族主义倾向开始是同工人阶级的革命倾向站在一起的，但很快就公开地站在工人阶级的革命倾向的对立面，因为民族主义倾向打算从意大利所经受的严峻战争考验中以及从意大利所获得的战争胜利中得到最大限度的成果。但是，胜利成果同最狂热的主战派的希望并不相符。

主战派分裂为民族主义者和“放弃领土分子”，这就在意大利资产阶级力量中间，按照日后1922年所遵循的路线，造成了首次巨大裂痕。比索拉蒂和一部分民主派主张参战者，曾在战争时期³⁶支持过受奥匈帝国压迫的各民族的运动。1918年的罗马会议是不顾松尼诺的反对而筹备的，它得到奥兰多并不坚决的支持。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受哈布斯堡帝国压迫的各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团。在这个罗马会议上，民主派主张参战者采用了新形式的政治外交手腕，同捷克人和斯拉夫人以及南斯拉夫人达成了一项协议，在协议中承认在旧的奥匈帝国解体之后出现的新兴国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这就需要不致由于提出扩大领土的要求而加剧亚得里亚海的争端，需要承认威尔逊所支持的自决原则。但是，民族主义者却由于意大利地处亚得里亚海两岸，认为可以把这一地势作为促成意大利在巴尔干的中欧获得政治经济扩张的基地，因而他们要求从民族主义角度出发，全面解决亚得里亚海问题。但是，正是在这一方面，表现出民族主义阵营本身的内部矛盾。

伦敦条约承认达尔马齐亚，而不是费乌梅属于意大利。民族主义者不愿放弃达尔马齐亚，同时也不愿承认这个地区可以实行自

决原则，因此，他们要求的正是伦敦条约所规定的这一点。松尼诺一直坚持的立场是：要全部伦敦条约，而不是任何别的条约，而与此同时，诸如达依丘和民族主义者这样一些“极端分子”，所要的则是伦敦条约加费乌梅，因为费乌梅归属意大利这一点在伦敦条约中并未规定。他们要求对费乌梅实行民主民族的自决原则，这正是他们拒绝在达尔马齐亚实行的原则。奥兰多起初表现得像是接受同新兴的民族国家达成协议这条路线，并且表示赞成1918年罗马会议的召开情况和签署条约。但是，他后来终于还是同松尼诺站在一起，从而导致比索拉蒂辞职（1918年12月28日）。

参加凡尔赛会议的意大利代表团为亚得里亚海问题而感到难堪，它没有能够使自己保持大国集团的水平，尽管从形式上说，意大利属于大国集团；意大利没有在任何有关建立欧洲和平的问题上出力，而不解决建立欧洲和平问题，就会给第二次世界大战创造前提。

奥兰多由于在费乌梅问题上没有得到满足，1919年4月24日就离开了会议，他的这一引人注目的举动在意大利掀起了一股民族主义热潮。但是，后来他不得不又回到巴黎，接受在他不在场时 37 所作的决定。在凡尔赛条约签订前夕，奥兰多由于他在巴黎和会上所坚持的路线陷于破产，被迫辞职。组成新政府的任务落在尼蒂身上，而他早在1918年12月就已经退出政府了。几天之后，尼蒂组成了他的政府；6月28日，由他委任他的外交部长蒂托尼签署凡尔赛条约，因为他对凡尔赛所准备的和约是持严厉批评的态度的。费乌梅未获准归属意大利。

这就导致了亚得里亚海危机，这个危机最后有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发展：军事远征隆基、达依丘向费乌梅进军、占领费乌梅市和建立一个以哗众取宠、堂而皇之的社会内容为外衣的民族主义独裁政权。从费乌梅行动当中已经可以看到后来构成从罗马进军

(早从 1919 年就开始谈及这个进军了) 到劳资合作的法西斯主义的各种主要因素。费乌梅行动起初在全国曾得到广泛的拥护, 不仅右派拥护, 左派也拥护, 因此, 尼蒂无法针对暴乱分子加强国家的权威。

四、工人的失败

1919 年和 1920 年并不像有人不时概括地说的那样, 是什么“赤色”的两年, 在这两年中, 革命运动高涨, 直到发展为占领工厂, 而随后, 则又有了“黑色”的两年(1921—1922年), 这两年的结果是导致了进军罗马。其实, 早从 1919 年初起, 意大利就同时有了两个逐渐发生对立的过程: 一个是革命运动, 这是一个混乱的、没有领导、缺乏始终如一的目标的运动; 一个是民族主义运动, 这个运动起初也是摇摆不定的, 它寻求适当的机会使自己得到确立。

1919 年和 1920 年的大事表明: 这两个具有相互对立的精神的群众运动在交替地发展着。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的起哄声是为了不让“放弃领土分子”比索拉蒂说明他辞职的原因, 这一起哄事件表
38 明前主战派阵营中已经发生的分裂的极端严重性。此后不久, 民族主义运动就对社会党人发动了第一次沉重的打击: 4 月 15 日, 一小撮打手和军官突袭了《前进报》, 并把它付之一炬。4 月底到 5 月 24 日这段时间里, 广场示威此伏彼起, 其目的都是抗议盟国拒绝接受意大利在凡尔赛提出的要求。因此, 在 1918 年冬和 1919 年春, 民族主义运动首先发难。

社会主义运动已经选定 7 月 20—21 日举行政治总罢工, 这次总罢工应当是国际性的, 为的是表示西方无产阶级对苏维埃俄国的声援。但是, 7 月间, 突然迅雷不及掩耳地展开了一场自发的反对生活费用昂贵的人民运动, 这个运动席卷了全国。这个运动因

为没有社会党的领导，是紊乱无章的，在这个运动当中，法西斯主义迅速地打了进来，它一方面用哗众取宠的手法驱使人们走向极端，另一方面则以保卫秩序为名，反对社会党。这一运动的结果是加深了工人和小商人之间的分裂。对1920年和1921年国际性总罢工的性质有过各种各样的解释，群众把它看成是起义式的罢工，资产阶级一些阶层则视之为洪水猛兽。但是，这次罢工由于在欧洲是孤立无援的，因而没有下文，在一部分群众当中首次引起了灰心丧气。

在夏季期间，争取签订合同的声势浩大的工会运动（这些合同是冶金工人、对分农和雇农要求签订的合同）使运动有了更强的纪律性，并使运动得以达到一些重要的权利要求目标。但是，各行业的斗争进行得很分散，同意大利南部和岛屿当时正在开展的农民占领土地运动的联系也不密切。农民要求政府信守曾向士兵许下的诺言，而尼蒂政府却仅仅以把荒芜土地分给以前的战士这个维索基法令来回答农民，这是不符合农民的期望的。9月间，凡尔赛条约的签订和费乌梅的被占领进一步推动了民族主义运动。

1919年在一片混乱当中结束。12月2日和3日，发生了人民群众抗议袭击莫迪利亚尼^①和其他社会党众议员的强烈示威。当时，这些社会党众议员高喊着“共和万岁，社会主义万岁”，从蒙特齐托里奥宫^②大厅里走出来，这时国王还没有到场，正是新一届议会开始的时候。公共力量坐视民族主义者、一批批战争生还者、军官和 39 学生对社会党议员发动袭击，而不加干预。人民示威最后只是徒劳地表示了愤慨，因为社会党众议员的举动并没有成为由此而来的争取共和的鼓动工作的一部分。这样，战后的头一年就在杂乱的运动当中浪费了人民中先锋分子的精力，而同时，把工人阶级同

① 朱赛佩·莫迪利亚尼(1873—1947)，意大利政治家。——译者

② 蒙特齐托里奥宫系意大利众议院所在地。——译者

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各阶层分开的鸿沟却越来越大了。

1920年，阶级矛盾在工会大规模的冲突中表现得更为清楚。在这些冲突中，蓬勃高涨的权利要求斗争遭到了工业家越来越有组织的、坚决的抗拒。4月的都灵罢工、夏季的雇农罢工、9月的占领工厂都是这样一种行动的突出事件：这种行动局限于工会方面，并未能使革命要求找到具体的政治出路，结果，这一革命要求就只成为一些杂乱无章的示威活动。

由于乔利蒂所希望的那种干预在恰当的时候采取了，而1920年12月的费乌梅冒险行动也终于结束了，于是，民族主义运动也丧失了存在的理由。民族主义运动的一小部分自认为是被有产阶级的利己主义所出卖，他们转向了左翼，寻求同工人运动取得联系，尽管为时已晚；但是，民族主义运动的大部分则从反对社会党的行动中找到发泄他们怒气的条件，他们把社会党人指控为使意大利不能维护其胜利的卖国贼。为了报“肢解胜利”之仇，这个由战争生还者、学生、前军官、失业小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运动，把“民族集团”和地主及工业家的支持看成是靠山，以暴力来表现这一运动反对工人、反对社会党的永久天职，而这一运动诉诸暴力是有保证不会遭到惩处的。

1921年的意大利还因为它有史以来的落后状况而成为对群情激愤的先锋分子实现他们那种混乱的革命要求的绊脚石。工人阶级当时在数量上还人数不多，产业工人仅占25%，农业工人则占56%。6岁以上的人口仅有30%被正式看成是文盲，但大部分人都是接近或大致属于文盲的。实际上，能正确读写的人口比例不超过50%。直到战争爆发，我国每年得有10万男女移居国外，年40岁在20岁和60岁之间，就是说，都是些朝气蓬勃的人力，他们是在意大利成长起来的，而由于意大利的发展，他们又被断送了。

1921年的意大利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农民的国家，它固步

自封在旧的令人窒息的社会关系和传统习俗当中。任何一种民族学的研究都无法把一个建立在无知、野蛮剥削、贫困和饥饿的基础之上的世界变为农民的文明世界。每年每人的肉消费量在1921年为20公斤。今天则是65公斤。农村劳动者通过一系列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得不生活在绝对屈从别人的条件之下,这种屈从状态只不过为一些短暂而又稀少的反抗时机所打破。1911—1921年这个时期,小土地所有者的人数增加了,从占总人口的21%增至35.6%。但是,新的小土地所有者为债务所累,不得不分期支付互助金,因而也不得不应付农产品价格的下跌和工业总价格的上涨,1926年里拉贬值引起的危机又严重地打击了他们。1920年,雇农运动还不懂得实行同小土地所有者结盟的政策,曾试图打击所有自耕农和土地所有者,不论他们是大小。政界的拉拢收买的组织,使农村劳动者处于被动奴役状态,号召这些农村劳动者通过普遍选举来表达他们的意愿,而他们又不掌握必要手段(文化、工会组织、独立政党)来提出自己独立、自觉的见解。

每天的生活都是按照旧的屈从习惯所规定的必然准则来度过的,这些准则是专横跋扈的地主和同“地主老爷”有联系的教会的落后行为所保持下来的。从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争取解放的新思想很不容易地渗透到意大利外省这一封闭式的禁地中去。意大利被称为拥有成百上千的城市,它也自吹拥有古老的城市文明。但是,在新的疆界之内,大约4000万人口中,只有11个城市拥有10万以上人口,只有3个城市的人口在50万以上(那不勒斯、米兰和罗马)。那不勒斯人口最多,约达70万。人口在10万以上的城市的居民总数达400万,约占总人口10%。

从这种封闭式的世界当中,从这种旧的宗法家族强迫性的清规戒律当中,从不仅要屈从于父亲和丈夫的不容争辩的意志、而且还要忍受封建习俗的重压的妇女所处的奴役状态当中,只有数量

极少的解放因素艰难地产生出来，这些解放因素为人民运动的缓慢发展开辟了道路。战争震撼了旧的落后平衡，却没有把这种落后平衡打破。深刻危机发生了，但革新力量却没有可能从积极的方面结束这场危机，促使国家获得普遍进步。

在造成工人运动分裂的激烈论战当中，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人们竟没有提到国家的实际状况，在了解现实方面也没有作出多少努力。从这种对意大利社会的现实缺乏研究当中，可以看出旧的社会主义运动在文化上的脆弱。在文化上，也是资产阶级占据优势，资产阶级从克罗切的唯心主义、天主教的帮会主义、民族主义者的非理性主义中找到了实行自己的领导权的工具。

工人阶级由于最高纲领派无结果的鼓动工作而处于更加孤立的境地；工农之间的分裂、工人和战争生还者之间的分裂、南北两部的分裂，这些都为工人运动的失败创造了条件。尽管说什么存在着革命形势，事态发展却证明：战后，意大利资产阶级经济上更强大，它有很大的帝国主义扩张的胃口，并且不容怀疑地有能力从政治上东山再起，有能力重整旗鼓，进行反攻。

五、意大利的共产党的诞生

在意大利的共产党成立时，上述暗淡的前景在党员的心目中并不清楚，尽管党员有着令人触目惊心的经历。当时，意大利的共产党提出的正式建党理由是：存在着革命形势，这就要求有一个革命党，因而也就需要对塞拉蒂的机会主义毫不犹豫地斗争；但在这一正式理由的背后（虽然从论战来说，这一理由还保持着很大的有效性），实际上却存在着另一个理由，而这一理由，对于通过粗略的挑选而选拔出一批革命党员一点来说，也同样有效的。共产党人当时认为，存在着未被利用的革命形势，其原因就是意大利

没有一个革命党。既然资本主义发生了总危机，其他的革命形势就必然会臻至成熟。因此，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有组织的革命力量，这一力量昨天还是没有的，但明天，则应当负起它的职责。在俄国，就是继1905年之后来了1917年。意大利也可能发生同样的情况，⁴²无产阶级继失败之后可能获得胜利。但是，必须为胜利作好准备。对意大利无产阶级的失败要负责的是意大利社会党，因为这个党有种种弊端：出尔反尔；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有纪律的组织；有崇尚空谈的最高纲领派和鼠目寸光的改良派；文化落后；同共产国际没有联系。

参加里窝那代表大会的共产党代表并不抱幻想。他们知道自己会遇到严峻的、铁与火的时期。但是，他们并不感到自己是战败者，而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遭到失败的是意大利社会党。因此，对他们来说，失败已经是过去的事，摆在他们面前的是艰苦的斗争时期和必胜的把握。他们大概有10万人，其中5.8万人是支持里窝那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共产主义派动议的，4.2万人是支持1921年1月28日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召开的佛罗伦萨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共产主义派动议的，这时，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绝大多数已决定改组为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即使可以把支持这两次代表大会动议的人数砍掉一半，也仍有5万战士分属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盟员乃至同情者，这些人都是通过极为严峻的考验选拔出来的。由于组织上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后来几年，上述人数大减。但是，在斗争的发展中，我们还能拥有这个最初的基本力量。

这是一支顽强的、有战斗力和有智慧的先锋队。这些党员都心甘情愿为革命事业贡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一支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永不枯竭的队伍，正如人们在初读列宁著作之后就开始自称为“职业革命家”那样。他们还自豪地对自己说，这是一场“持久的战役”。他们都很年轻，最老的也不到30岁。因此，长期斗争

的前景并不使他们感到害怕。他们对于错过机会（他们就是这么认为的）感到无比愤慨；他们对工人阶级的振兴能力满怀信心；他们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苏维埃俄国的作用坚信不疑。从赤色东方射来一股伟大的光芒，照亮了他们的心。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了，它以事实表明应当怎样为保卫革命而战斗。但是，必须同过去一刀两断，同社会党断绝一切联系，建立一个新的组织。因此，共产国际提出的团结口号被人以将信将疑的态度接受了，因为经验证明：各种对立倾向形式上的团结是促使整个运动陷于
43 瘫痪的一个原因。因此，在共产党员的意向当中存在着强烈的宗派主义和极端主义因素，这也就说明，在党成立后的最初阶段，波尔迪加的影响何以更充分地代表共产党员的情绪。

证明这一选择正确的是这一选择所引起的种种事实，而不是导致这一选择的原因。经过人们在党成立后的年代中经受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动荡之后，这一批作为党的奠基人的共产党员培养出从事地下工作的战士、被特别法庭判刑的同志、支援西班牙的志愿军、抵抗运动的加里波第游击队员、共和国的创始人、意大利共和国内的群众运动组织者。他们保证党能延续存在 50 余年，即使政治风云变化也能总是自觉地得到加强，这是一种政治领导、组织行动，特别是人员方面的连续性。至今在中央委员会中还有一些参加过党的建立或经历过上述早期活动的人：特拉齐尼、隆哥、卡米拉·拉维拉、科隆比、罗阿西奥、维达利。1921 年的共产主义战士绝大部分都表现出有能力从经历中汲取教训，有能力从最初的公式主义和宗派主义立场转变为对意大利实际及其矛盾和实行革命变革的可能性有更为成熟的看法。如果说波尔迪加所提出的都是脱离意大利实际的理由，葛兰西和陶里亚蒂则是提倡集体研究意大利实际，以便使认识成为行动的基础的。这样，从认识意大利历史创造的种种条件出发，他们就懂得如何提出通过民族道路向

社会主义前进的独特主张。

共产党的历史就是这些在 1921 年建立起党的人的历史，就是这第一批共产主义战士和以后同他们团结在一起继续作出共同努力的一批批战士的历史，就是介绍这些共产主义战士的政治工作、思想动荡、他们所犯的错误以及对这些错误作出的自我批评的历史。在这一历史中，他们时而提出一些工作主张，时而又放弃一些工作主张；诚然，他们有矛盾，也有斗争，但特别重要的是，他们能解决这些矛盾，也就是说，他们能真正立足于国内而展开行动。因此，在共产党历史中，不能仅仅说明理由，而是特别要说明事实，介绍它同群众建立的联系。意大利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为了改变国家 44 生活进程、教育意大利人民、培养他们的个性、塑造能够成为自身解放的主要力量的意大利人而展开行动的历史。因此，共产党历史就是意大利历史的组成部分。

第三章 法西斯上台

一、法西斯的进攻在继续

意大利的共产党成立不久就不得不应付极其严峻的考验。

1921年2月，法西斯进攻的新阶段开始了。这一进攻是断断续续地进行的。每一次新的浪潮之后，总是有一段为缓和抵抗、分化敌人、散布幻想、扩大运动的政治基础、克服内部矛盾所必需的间歇。2月间，进攻波及托斯坎纳大区，打击佛罗伦萨的心脏地带，这场战斗持续了好几天，有20人死亡，150人受伤，1500人被捕。3月1日，铁路工人工会书记、佛罗伦萨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斯帕尔塔科·拉瓦尼瓦在他的办公室里遭到暗杀。

当时，袭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工人中心，袭击是从农村冲向城市来的。这不仅是由地主资助和领导的农村中的冲击队干的勾当，地主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经过长期艰苦的工会斗争于1920年夏季争取到的农业契约归于无效。由于农业契约不能付诸实施，土地联合会组织据以建立的整个基础就迅速地崩溃了（这个组织是依靠正式规定占领土地而建立的）。这一崩溃的结果是：土地联合会会员在几个月之内就从1920年90万人下降到1921年30万人。在农村冲击队活动的同时，由工业家集团资助和领导的城市冲击队也活动起来了。这时，正是工业资本主义驳倒了某些浅薄的理论（这种理论居然情愿把法西斯主义仅仅看成是意大利资产阶级中最落后阶级的表现，亦即外省农业资产阶级），因为工业资本主义也在打破迟疑不决的状态，走上了直接使用暴力、对工人进行镇

压的道路。

1920年末,世界经济危机一度制止了通货膨胀过程,从而引起 46
国际市场价格下跌。里拉贬值的速度放慢了,但是,通货收缩的勒紧裤带做法使仍处于改变军事生产阶段的意大利工业感到措手不及。这一来,正式登记的失业人数在1921年间从10万人增至60万人。在这种情况下,1921年第一季度罢工人数就从45万人减至15万人,损失的劳动时间从620万小时减至165万小时。工业家们力图把困难转嫁给工人阶级,因此,他们利用这一发生变化的形势来沉重地打击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报复性的大批解雇。

都灵原是无产阶级进行过最先进的斗争并通过1920年4月和9月占领工厂表现了自己的组织能力的城市,这时也遭到最残暴的打击。4月28日夜,市工会遭到为公共力量所庇护的一批批人数不多的冲击队分子的袭击和烧毁。与此同时,成千上万工人被解雇。首先赶出工厂的就是那些在斗争中表现出色的工人,就是罢工和占领工厂的组织者和领导人。声援性的罢工迅速地被关厂的做法所破坏。这一次,乔利蒂不再袖手旁观了,他指使军队占领了工厂。罢工以工人的惨败而告终。葛兰西在1921年5月8日《新秩序报》上就曾赞扬工人的英勇精神,而工人作为“有血有肉的人”,在这忍受屈辱的情况下,却不得不重新开始工作。这表明工人所受到的打击是多么严重。

面对着这一法西斯进攻的新阶段,正如1920年末所发生的情况那样,也正如后来在1921年和1922年此起彼伏的多次新的浪潮中一再出现的情况那样,工人运动显露出它无力对付敌人进攻。工人运动还没有组织起来进行武装冲突。过去在都灵,曾通过组织“赤卫队”作过为数不多的组织起来进行武装斗争的尝试,但这并没有为工人运动提供符合斗争需要的工具。况且,警察局、宪兵队和王室卫队也在没收武器和逮捕左翼战士。策略准备也缺乏。因

此，行动主动权一直操在法西斯突击队手中，它们表现出巨大的机
47 动性。它们集中在事先选好的地点，尽管从遥远的基地出发，却拥
有军队或工业家提供的机动车辆，因此，它们能迅速地完成惩罚性
的远征，完成之后又迅速离去。劳动者在他们的工作地点和住所遭
到突然袭击之后，只能进行绝望的防御，尽管往往是英勇不屈的防
御。只有若干市镇、若干市区，如帕尔玛市的奥尔特雷托仑特镇或
罗马的圣洛仑佐市区，曾组织起来进行防御，部署警戒，因而法西
斯主义只是在1922年或以后才打进去。面对着法西斯进攻而在组
织上和策略上毫无准备，这种情况正是政治路线发生危机的表现，
它表明缺乏一个反法西斯斗争的总计划。

二、不了解法西斯主义的性质

为了有效地反对法西斯主义，必须开始了解它究竟是什么东
西，必须作出正确的判断。但是，这是新的现象，它打破了传统的
公式，因此，使大家都毫无准备。法西斯分子本身也表现出他们对
自己的作用并没有清楚的认识。在激烈的论战、严重的分裂、种种
动机的较量当中，所有法西斯团体在一个问题上是一致的，即
对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怀有刻骨仇恨。法西斯主义表现为这
样一个运动：它随着不同的地区而具有不同的特征。于是，人们开
始讨论法西斯主义的性质，讨论农村法西斯主义和城市法西斯主
义的区别，讨论为进行民族社会革命而寄希望于达依丘的前参战
战士和为涉足议会政治把戏而寄希望于墨索里尼的小资产阶级力
量二者之间的矛盾了，这一讨论后来延长了好多年。这是一个按
照最残酷无情的反人民的反动派路线而行事的运动，它得到工业
家和地主的资助，但同时也拥有群众基础。那么，它的性质究竟是
什么呢？工人运动早在从实际上被解除武装、被剥夺用来对付国

家镇压的少得可怜的防御手段之前，就已经从政治上解除了武装。

改良派分子建议要谨慎行事。马泰奥蒂^①在众议院谴责法西斯分子在波列西内的暴行时曾呼吁国家进行干预，以对付冲击队的非法行为，指出国家应当使人遵守法律。但是，乔利蒂这时听任法西斯冲击队的暴行和国家机关展开的反工人的行动之间狼狈为奸，改良派分子也无法向乔利蒂提供他所寻求的议会支持，以此作为交换条件；乔利蒂之所以寻求议会支持，是因为他想压倒人民党的敌对态度。乔利蒂这时正打算利用法西斯暴力来取得议会支持，这就必然会加速意大利社会党的危机，使改良派分子从最高纲领派分子的坚决立场中摆脱出来。而且马泰奥蒂在国家不为保卫劳动人民权利而进行干预的情况下，也不可能以无产阶级的抵抗相威胁，因为他是首先处心积虑地排斥无产阶级抵抗的。实际上，改良派分子当时就说，不应同意采取挑衅行为。暴力浪潮必将过去，这是战争带来的一个后果。必将如此，应当有耐心。不应同意进行战斗。尤其是因为马泰奥蒂这个久经考验的勇敢的人，于1921年12月2日在众议院的讲话中，甚至承认曾敦促同志们忍受一切，不反抗暴力，鼓吹懦弱，因为懦弱也可能成为英雄主义。三年后，他以牺牲性命为他给社会党劳动者提出有关“懦弱”的建议而英勇地付出了代价，而当时，本来还有可能组织人们进行抵抗和反攻。

最高纲领派分子消极地接受了暴力的泛滥，他们认为，这是国家瓦解的迹象；法西斯分子拼命加速国家危机，归根到底，是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创造有利条件。因此，必须等待这一过程完成，必须团结一致地进行抵抗，坚毅不屈。时间对社会主义有利。这种信念为顽强抵抗法西斯专政作好准备，但是无助于阻止法西斯主义上台。

^① 贾科莫·马泰奥蒂(1885—1924)，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议员、著名反法西斯人士，1924年被法西斯暗杀。——译者

共产党人实际上得出的结论也并没有什么不同，尽管理由相反。党显然打算不去过分重视法西斯暴行。共产党人之所以这样做，是根据一些原则性理由，因为矛头指向工人的暴力并不是什么特殊事情，它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永久性特点；共产党人之所以这样做，也是出于对适宜与否的考虑，是为了不为法西斯主义作过分的、不适宜的宣传，不使群众更加灰心丧气。在这种态度当中，也表现出他们有这样的意愿：即拒绝采取某种哭哭啼啼的牺牲者的态度，就像改良派分子在抗议中所表现的那样，同时还要反对抱有幻想：以为作为法西斯暴力的帮凶的资产阶级国家竟会保证尊重工人的自由。但特别是他们曾公开表示这样的意图：不应当改变总路线，因为这条总路线证明里窝那的分裂是正确的，社会党是主要敌人。

法西斯暴力是资产阶级镇压性暴力的表现。法西斯暴力可能有助于无产阶级斗争，因为它揭穿资产阶级的任何民主外衣，消除对于民主性质的种种误解，赤裸裸地暴露真正的阶级对立，揭露社会民主党的消极被动。共产党人否认法西斯运动有任何特性和自主，因为他们把它看成是按照明确而安排就绪的计划采取行动的资产阶级随意加以操纵的工具，这样，他们就认为，法西斯分子的横行霸道就是要在社会党人同乔利蒂资产阶级勾结方面为形成反革命大联合而开辟道路的手段。法西斯主义和社会党被说成是同一个阶级敌人的两个方面：人们甚至说什么法西斯主义对社会党有利。这是“社会民主党的方案”，根据这一方案，意大利也应当开展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已实现的同一种过程，这一过程将会导致包括从民主党人到人民党人、从法西斯分子到社会党人的反革命联合。社会党人甚至还负有镇压工人这一特殊任务，正如在德国发生的情况那样，因为社会党人比任何其他联盟成员都更了解工人运动的弱点。

这样，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就使工人阶级无法进行积极防御以对付法西斯暴力，因为首先在政治上，即还不是在组织上和军事上，就已经解除了工人运动的武装，因为他们不承认法西斯主义及其独特性表明它是一个新的、与众不同的敌人，并且没有把它孤立起来。但是，人们毕竟已经开始研究法西斯主义的特点了。萨尔瓦托雷利的《国家法西斯主义》一书就说明，许多方面已经识别出法西斯主义运动的独特性，它的小资产阶级基础，它的内部矛盾。但这只是学术研究，还没有变为政治立场。在能最终认识到法西斯主义的独特性之前，意大利和国际上还不得不经受其他严峻教训并为此付出高昂代价，只有这样才知道：法西斯主义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群众运动，它是自主地逐步形成的，有自己的社会、政治、文化根源，它是在混乱地寻找、摸索确立自己地位的道路，它在一定程度上，在特定条件下，面对着因旧的施政手段和方法日益不起作用而爆发的政治危机，为大资产阶级提供一种新的干涉方式和统治方式。

意大利劳动者是欧洲首先经受这一教训的。他们一方面很晚才懂得他们亲身经历的究竟是什么事情，才了解新的阶级敌人的本性，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无力把这一经验传递到国际上去。法西斯主义、如何判断它和反对它，这一点后来一直是两次大战中间使工人运动陷于分裂的种种论战的中心问题。但是在1921年，不过是刚刚开始。

三、乔利蒂的破产和自由民主党 多数派的危机

当时，墨索里尼竭力避免的是，不让资本主义阶层在法西斯主义对他们有用时把它仅仅变为可以利用的镇压工具，而在它变得过分碍手碍脚时，则又把它抛在一边。墨索里尼想要利用当时的

形势，使法西斯主义能展开自己的政治活动，为自己的利益掌握国家领导权。1921年初，这一目标还是很模糊的，应当走什么道路也是举棋不定的，但是，墨索里尼当时的野心已经是大得没有限度了。为了确立自己个人的领导，他力图把国内的冲击队行动同参加议会把戏的做法结合起来，以便插手旧的自由民主党多数派所遭受的政治危机。

1921年5月15日的政治选举为他提供了首次机会，使他得以在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政治营垒中取得新的独特的作用。

乔利蒂解散了众议院，他以为把1919年大选结果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改变的时候到了。这是一个严重的决定，从宪法上看是否正确也是可疑的，特别是在政治上是冒失的，因为这一决定给法西斯主义上台开辟了合法途径。但是，乔利蒂作出这样的决定有许多原因。他可以在1921年初为他的政绩作出积极的总结。确实，半年之内，意大利形势看来有了变化。乔利蒂在解决亚得里亚海问题上提出了令人满意的办法。尼蒂本来是对凡尔赛条约和法国对德国的严厉苛求采取批评态度的，而乔利蒂和斯福尔扎^①却纠正了他的立场，使意大利向法英两国立场靠拢，从而换取了两国的支持，以求同南斯拉夫达成妥协。

1920年11月12日，意大利同南斯拉夫签订了拉帕洛条约，条约承认费乌梅独立，除查拉一地外，达尔马齐亚让给南斯拉夫；条约还为意大利资本有利地打入巴尔干地区提供了前提。工业家们本来就是支持费乌梅分裂出去的，只要它成为旨在加强保守派对国家的更强有力的领导的直接行动的基地，这时也就退了下去。达依丘这时已经陷于孤立，甚至被墨索里尼出卖，并且受到“民族集团”政策的吸引，因而也无法抗拒。卡维利亚将军^②于1920年12

^① 卡洛·斯福尔扎(1872—1952)，意大利自由党领导人、外交家，曾多次出任外交部长。——译者

月24日,在休假一年之后,轻而易举地在费乌梅建立了国家权威。

乔利蒂政府成功地废除了面包的政治价格,并在国际价格下跌的帮助下,又着手国家财政的整顿,而这些都是尼蒂没有做到的。国际经济危机在意大利还没有显露出它的全部严重性。

占领工厂的结束(1920年9月)和占领费乌梅的结束(1920年12月)标志了国家权威的恢复。1920年11月4日,在国王和各军团旗帜面前,第一次在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纪念碑前举行庆祝胜利的典礼,这个纪念碑正是被冠冕堂皇地称为“祖国祭坛”的地方。把无名战士的遗体运到罗马的灵车大队,沿途受到庄严肃穆的爱国游行队伍的迎接。

地方选举的考验早已表明,“民族集团”有可能取得选举胜利。因此,乔利蒂企图用削弱社会党和人民党力量的办法来重新取得比已有的更为稳妥的议会基础。此外,在自由民主党多数派内部,乔利蒂打算用削弱尼蒂力量的办法(尼蒂现在已是他的政敌)来扩大他个人的基础。在5月15日举行的政治选举中,乔利蒂又一次采用了国家机构进行有利于官方候选人的严重干涉的老办法。

法西斯分子参加“民族集团”;他们在地方选举时还是小心翼翼、不敢声张的,这时则变成肆无忌惮,吵吵嚷嚷了。在时间很短的竞选运动过程中,乔利蒂的老办法同法西斯分子赤裸裸的恫吓暴力手法交织在一起,以便阻挠社会党的宣传工作自由开展。⁵²

乔利蒂仍然未能达到他所追求的目标。社会党人在上届议会中有162席,这次仍然获得123席;加上共产党的15席,极左翼共获得了138席。这样,意大利工人运动表现出它在选举方面也是有抵抗力的。尽管工人阶级受到打击,遭到挫折;尽管工会运动处于低潮,法西斯暴力日益猖獗;尽管许多市镇中受到迫害的党员们

② 恩里科·卡维利亚(1862—1945),意大利将领,1920年任国防部长,曾率军解除达依丘对费乌梅的占领。——译者

开始被迫移居国外，但工人阶级却仍然表现出他们工作的成熟性，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威力，以及他们恢复实力的巨大能力。与此同时，人民党的议席从100个增至108个。旧的立宪多数派在数量上略有增加，但这个数量增长在更大程度上却被其内部矛盾的加剧所抵销了。由于在选举中采用的方法，乔利蒂分子和尼蒂分子之间的对立变得更加尖锐，因而整个多数派都向右转移。不仅萨兰德拉成为强大的保守派议员团之首，而且进入众议院的还有35名法西斯议员和10名民族主义议员。墨索里尼原来在1919年曾因为提出一份单由法西斯分子组成的候选名单而遭到惨败，只获得5000票，这时则作为“民族集团”候选名单在米兰和波洛尼亚的首席当选者进入了众议院。

然而，大选并没有使乔利蒂得到他所希望的稳定多数。乔利蒂遭到人民党和尼蒂派民主党人的反对，并且没有得到仍然被意大利社会党最高纲领派所束缚的屠拉梯改良派分子的支持，1921年6月，他决定引退，从而开始了一个政府不稳定和软弱无能的混乱时期。经济崩溃更加重了政治上的死水一潭。这时，使用投机性的权宜办法看来是无法阻止伊尔瓦公司和安萨尔多公司以及巨大的钢铁中心、冶金中心、造船中心的垮台了，这些公司和中心都不得不缩减。安萨尔多公司的垮台引起了贴现银行的倒闭。整个银行系统都受到沉重的压力，最后只是依靠国家干预和意大利银行的干预才得救。

53 博诺米政府和法克塔政府^①日益受到右翼议员和国内法西斯分子的行动所左右，终于创造了使法西斯分子得以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进军罗马和上台执政的条件。在1921年6月乔利蒂政府倒台引起的危机、1922年2月博诺米政府倒台引起的危机、1922年

^① 伊万诺埃·博诺米(1873—1951)，意大利政治家，曾为社会党改良派，1921年6月至1922年2月曾任总理；路易吉·法克塔(1861—1930)，意大利政治家，1922年10月“罗马进军”时任总理。——译者

7月法克塔首届内阁倒台引起的危机当中，所有要组成能保证政府稳定和恢复法制的主张都迅速地落空了。在乔利蒂因人民党人的否决和尼蒂分子的反对而被排除之后，组成一个由尼蒂主持的，包括社会党人、人民党人、民主党人的反法西斯政府已经是不可能了，这不仅是因为社会党人不乐意这样做，而且也特别是因为王室反对，因为人们明显地并且也不无根据地害怕：国家机构、军队和司法部门不会同意这一政府领导。不论如何，在议会中，民主党人和人民党人即使处于当时形势之下，也仍然坚决反对哪怕仅仅是改良派社会党人（即屠拉梯分子）参加政府。试图通过奥兰多和德尼科拉组成包括屠拉梯和墨索里尼的民族和解政府的做法也始终未获实现。这一方面是由于改良派分子一贯拒绝这样干，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所有立宪党团都越来越抗拒这样干。墨索里尼多次施展向社会党人伸手的阴谋，特别是向总工会伸手，甚至于1921年8月，迫使法西斯分子在议长德尼科拉主持下同社会党人签署“和解公约”，他这样做并非没有引起激烈争执。但是，人们却居心险恶地肆无忌惮利用这种和解倡议来仅仅达到自己的目的，不仅是一党目的，而且特别是个人目的。

1921年7月的萨尔查纳事件^①表明：法西斯暴行正在激起强烈反应，因为当时宪兵采取了坚定态度，人民战斗力普遍高涨，从而击退了一次法西斯分子的进击，并使之遭到严重损失。国家机构若采取另一种态度，本来会使法西斯主义丧失那种曾使它得以任意胡为而又不必冒过大风险的有保证地不受惩处的条件。博诺米政府为了恢复法律权威和阻止法西斯分子的非法活动，最初曾发出某些胆怯的指示，但这些指示并未得到重视。博诺米政府有 54 过多的态度（如使法西斯冲击队获得使用军队武器和装备的种种便利条件）向国家工作人员说明不应采取同法西斯的行动相对立

^① 萨尔查纳系利古里亚大区拉斯佩齐亚省一城市。——译者

的立场，相反却应纵容法西斯的行动。况且，政府还立足于团结，对地方政治力量（自由民主党人乃至人民党人）担任的省督察一概施加压力，以维护法西斯的行动。墨索里尼这时打算缓和并逐步开展法西斯的行动，同时也想在资产阶级舆论面前表示：他起初是鼓吹使用法西斯暴力的，但现在他作为独一无二的领袖人物，能保证运动不致超出一定限度，对法西斯暴力的过火行为表示遗憾了。这样，和解协议只能是短命的，当墨索里尼在法西斯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把运动变为政党、他自己也成为众所公认的领袖时，这一和解协议就遭到公开背弃。

博诺米政府和法克塔政府是过渡性政府，它们日益为右翼议员和法西斯分子动员的力量所左右，这时，法西斯分子动员的力量已经公开指向某些国家机关。1922年夏，自由民主派所有最高领导人即乔利蒂、尼蒂和萨兰德拉都公开竞相同墨索里尼达成协议，而墨索里尼也同所有人谈判，向所有人许愿，只要他还未能在进军罗马所造成的条件之下强行建立他的领导地位。

四、意大利的共产党和意大利 社会党合并问题

对于政府和议会情况的复杂而又混乱的发展，意大利的共产党看来并不关心。在共产党的一些报纸上（都灵的由葛兰西领导的《新秩序报》、的里雅斯特的《劳动者报》以及后来罗马的《共产主义者报》），倒是发表了一些关于形势发展的见解清醒的评论。就所作的分析来说，葛兰西和陶里亚蒂的文章和通讯写得很出色，他们已经对法西斯主义和穷凶极恶的运动以及法西斯分子内部的矛盾给以特别的注意了。但是，占优势的一直是社会民主党的主张，这一主张由于和解公约已经签订和当时正在试图组织一个“包括屠

拉梯和墨索里尼”的民族团结政府，看来得到支持。这一主张的实现，说到底，看来并非不会使共产党人感到高兴，因为归根到底，一旦实现这一主张，就会为党的论点提供证明，就会提供可以 55 用来同社会党论战的论据，就会提供法制保障。

主要敌人仍然是意大利社会党。政治选举似乎为意大利的共产党提供了击败意大利社会党的机会。短暂而紧张的竞选运动也是以此为目的的。必须使工人们的投票证实里窝那的分裂是正确的，表明工人们意识到意大利社会党对于以其行动阻挠无产阶级革命的进展所应负的责任。党的宣传明白无误地号召选民踏着意大利社会党的“尸体”走过去。而对于社会党选民来说，投票则应当意味着重申民主法制，以反对冲击队的非法活动和资产阶级的狼狈为奸。社会党选民表示他们忠于老党。意大利社会党获得了 1631635 张选票（1919 年则为 1916364 张选票）。意大利的共产党仅得到 291952 张选票，未能在选民当中获得里窝那代表大会筹备期间在社会党总支部当中曾获得的选票百分比。如果说，共产主义派的动议在大会代表中获得约 40% 选票的话，那么，在政治选举中，共产党候选名单却只得到社会党候选名单所获得的选票的不到 20%。

同社会党进行的激烈论战和在政治选举中获得的令人沮丧的成绩，加剧了意大利的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同共产国际领导之间在应同意大利社会党建立怎样的关系问题上的矛盾。1921年6月22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不得不注意到国际形势已发生变化。面对着革命处于低潮，革命进程迟延和缓慢，反动派在许多国家甚嚣尘上，俄国被迫采取“新经济政策”，从而退居到国家资本主义的立场上去。一年以前，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还被看成是迫在眉睫，这时却显得越来越遥远了。必须正视现实，采取必要的对策。俄国经历了严重考验之后，不得不停下步来，以便

恢复实力，走上一个被资本主义孤立和包围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道路。在资本主义各国中，共产党应当给自己提出的目标是争取工人阶级多数。西欧的革命道路表明必然和俄国所走过的道路不同。争取工人阶级多数要求执行一项同社会党力量统一行动的政策。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尽管意大利的共产党代表团提出抗议，意大利社会党第三国际派的代表还是出席了大会（他们是马菲、拉扎里、里博尔迪），社会党第三国际派是想把意大利社会党参加共产国际的问题作为有待解决的问题保留下来。1921年10月10日至15日在米兰举行的意大利社会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也有一个代表团参加了大会。坚决的最高纲领派路线仍然占了上风，它获得47628张票，而改良派则得19916张票，中间派得8080张票，第三国际派得3765张票。意大利的共产党对于共产国际代表出席社会党代表大会提出抗议。于是，共产国际同意大利的共产党之间公开爆发了矛盾：前者想要重新争取意大利社会党的多数派，后者则打算消灭整个意大利社会党。但是，面对着法西斯主义这个紧迫而严重的问题，最高纲领派实际上是采取了和共产党人一样的立场：必须等待法西斯主义把阶级斗争引到极端。到那时，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到来，意大利社会党在保持本身完整无缺、不作妥协让步的条件下，应当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好准备。

1922年1月1日，共产国际向国际无产阶级发出了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号召，其目的是对付国际反动派，维护和平，保卫工资和争取就业，争取实行政治经济改革的最低纲领。意大利的共产党拒绝这条路线，不仅因为它反对这条路线的内容，而且也因为这条路线使它必须重新同社会党人接触并保持这种接触，而它恰恰相反是要同社会党人一刀两断的。意大利的共产党拒绝把意大利社会党看成盟友，恰恰相反，它向群众指出，意大利社会党是革

命的主要绊脚石。

意大利的共产党不仅对意大利社会党，而且也对老社会党的传统和精神进行严厉的批评。因此，它反对作出策略上的改变，因为这种改变会使群众忘记它建成共产党的理由。它同共产国际的分歧原因正在这里，它批评共产国际，因为共产国际看来并不了解意大利的共产党在成立刚刚一年之际有什么需要，并不了解它要发挥自己的作用的理由。因此，意大利的共产党采取了这条团结路线，只不过是在形式上遵守纪律，它对这条路线的解释是狭隘的，它把统一战线的实施只限于工会行动，并且反对任何要同其他政党结成政治联盟的尝试。⁵⁷

同共产国际的论战之所以加剧，也是因为要服从组织纪律。共产国际硬要意大利共产党人服从纪律，实施第三次代表大会确定的路线。但是，由于意大利的共产党执行委员会抗拒这样做，共产国际就从党内被称为右派的一派（即塔斯卡、格拉齐亚代伊）中寻求支持，并超出正式渠道，同这一派保持特殊关系。这一来，共产国际就破坏了意大利的共产党的团结和纪律。此外，共产国际还违背意大利的共产党的意见，同意大利社会党保持关系。共产国际的这种行动以及被派到意大利的共产国际代表采用的随随便便的方法，加剧了执行委员会的抗拒，而在执行委员会中，波尔迪加由于他的禀性和他对党的看法，与其说是在领导，不如说在指挥，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虽然也开始批判地重新审查已采取的立场，但也拒绝共产国际代表从组织上进行干涉。

然而，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波尔迪加的威望还是完整无缺的。除了右派之外，大家——从特拉齐尼到葛兰西，从斯科奇马罗到陶里亚蒂——都同他站在一起。这种支持并不仅仅出于策略上适宜这一理由，即为了不致冒加强右派（即塔斯卡、贝尔蒂、格拉齐亚代伊）的风险，右派当时已在积极评价社会党的传统，因而谋

求同意意大利社会党多数派取得联系；看来，这种支持也还由于对当时所遵循的政治路线的正确性有明确的信念。葛兰西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坚持同社会党激烈论战的理由，拒绝政治统一战线的口号和“工人政府”的口号，拒绝同其他工人力量统一行动直到组成联合政府的政策，这并非偶然的。他公开声明自己可以对同社会党激烈论战负责。在反动派向工人进行猛扑的时刻，必须让群众相信：失败的罪责不在他们，以便他们不致丧失对自己的信心。葛兰西当时已经承认失败的严重性，他向前看，并认为必须把全部责任推到社会党头子身上。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人们坚持认为，党不能同别的党混淆起来。在提纲中，用学院式的烦琐语言作了这样的明确规定：必须捍
58 卫党，使它不发生任何可能的蜕化，要保持党的完整性。政治路线照旧是要同社会民主党作坚持不渝的斗争，在这方面不容有任何含糊。人们重申了《社会民主党方案》，根据这一方案，资产阶级将最终会在进行最后冲突之前利用社会民主党，把它作为镇压革命运动的工具。因此，人们排除了反动政变得逞的可能性。

罗马提纲遭到共产国际的批评，共产国际敦促意大利的共产党不要破坏共同的纪律，应当实行统一战线政策，把争取多数派作为主要任务。会上，是由保加利亚的科拉罗夫提出共产国际的批评的，他敦促意大利共产党人在反对法西斯主义这场政治斗争中建立政治统一战线。

共产国际的立场只是为团结在格拉齐亚代伊提出的动议周围的少数派所接受，少数派动议得到4151票，而多数派则得到31089票。因此，意大利的共产党多数派是同共产国际对立的，而共产国际则依靠少数派。这一对立的后果在种种动荡的事态发展中可以使人强烈地感到，这些事态发展使领导集团日益削弱，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下次代表大会。就当时来说，旧的多数派还是保持得很牢

固的,而且执行委员会也得到了确认(执行委员有波尔迪加、格列科、特拉齐尼、雷波西、福尔蒂基亚里)。葛兰西作为意大利的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被派往莫斯科。正是这一决定为葛兰西打开了获得知识和经验的新天地,从而表明这一决定对新的领导集团的形成是有决定性意义的。

五、共产党的宗派主义

意大利的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政治结论确实令人立即感到其消极结果,因为这种政治结论阻挠群众寻求反法西斯斗争的共同基础的倾向。

对被称为“人民敢死队”的那个运动采取的态度就是一个反面例子。达依丘在费乌梅冒险行动的结束使那个战士运动的一部分人变得可以为人利用了,这一部分人过去曾抱要革新改造旧的社会秩序的模糊意图。墨索里尼对达依丘的背叛、法西斯主义同乔利蒂资产阶级的代表和保守势力的代表一起参加民族竞选集团、农村冲击队的作用,所有这些不易为战争生还者运动一部分人所接受,也不易为一定数量的、最初曾相信1919年纲领的法西斯分子所接受。在震撼战争生还者这一民族主义运动的那场危机当中,在达依丘分子同法西斯分子的对抗当中,也有一些集团转到反法西斯立场上来,并且谋求同工人运动中最有战斗力的集团取得联系。人民敢死队拒绝起资产阶级所要求的反动派宪兵作用,他们希望成为革命战斗传统的始终不渝的继承人。面对着法西斯主义对工人施展暴力,人民敢死队随时准备同法西斯主义较量,并在武装斗争的场地上同它作斗争。这个运动无论就其根源还是发起人而言,确实都是混乱的。赛贡达里上尉的面目,尽管经过多次调查研究,从许多方面来说,仍然是不清楚的。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运动

最初曾得到尼蒂派的《国家报》大力支持，这家报纸是同乔利蒂进行论战的，它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由尼蒂主持的、得到中左派即从社会党到人民党组成的多数派支持的反法西斯政府。

这个运动符合人们广泛感到的需要，即需要不仅以罢工，而且以武器来对付法西斯暴力。1921年夏，随5月15日大选得手之后掀起的法西斯浪潮，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应。7月6日，在罗马植物园，人民敢死队举行了首次集会，有2000多个受过军事训练的人参加，其中有无政府主义者、共和党人、社会党人、共产党人。

运动很快在国内扩展开来。由共产党人在一些地方组织的无产阶级保卫队试图打进运动，同具有其他倾向的、准备不惜采取一切手段进行斗争的青年集团取得联系。但是，工人阶级的几个政党急不可待地破坏了这个运动。一方面，意大利社会党自称同这一行动无干，而就在这时，其议会党团却同法西斯分子在蒙特齐托里奥宫签订了和解公约，这正是墨索里尼所希望的，尽管这项公约也针对艾米利亚大区冲击队的抗拒。另一方面，意大利的共产党在8月7日，表示对共产党人参加人民敢死队运动要严厉禁止。葛兰西对于工人运动同战士运动之间建立联系的问题一直是有认识的，他在《新秩序报》上曾刊登过塞贡达里的谈话并采取了并不敌视这个运动的立场，但这些都无济于事。波尔迪加和党的执行委员会严密地看守着，不让共产党人同其他人混在一起，相反，却让共产党人为本身利益同无产阶级保卫队一起组织武装斗争。由于得不到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政治支持，人民敢死队运动以它成立时的同样速度自行解散了。但是，关于意大利的共产党所采取的这一态度是否适宜的讨论却延续了很久。意大利的共产党遭到了共产国际的公开批评，它的态度在地下时期所进行的长期讨论中一直是一个典型的宗派主义例子。

归根到底，意大利的共产党对劳工联盟采取的态度所造成的

后果看来是更为严重的。劳工联盟是在意大利铁路工会倡议下于1922年2月20日，因而也就是在意大利的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成立的一个统一机构。铁路工会有革命传统，但它是一个自主的工会，没有参加总工会，在这个工会里，一直有久已脱离总工会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在2月20日那次会议上，铁路工会、总工会、意大利工会同盟（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组成）、意大利劳工同盟（共和党工会工作者组成）的代表以及码头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向所有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发出号召，号召它们联合起来，“以无产阶级力量的联盟来反对反动派的联合力量”。

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斗争倾向是从下层产生的，正如人民敢死队运动时期已经发生的情况一样，这些倾向的积极发起人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在最近几年已摆脱知识分子核心（因为这些核心通过主战派立场已转到达依丘和法西斯主义一边），并且不再受政党左右。统一过程扩大到天主教劳工运动。在克雷莫纳地区，社会主义同盟和受人民党议员圭多·米廖利影响的白色同盟签署了一项公约（这项公约被教会当局所否认），为的是实现工会谅解，并“为阻止法西斯进攻而进行必要的竞选合作和采取必要的政治行动”。

劳工联盟呼吁各政党——社会党、共产党、共和党和无政府主义同盟——实现必要的谅解，并支持劳工联盟所要开展的活动。意大利的共产党一贯持有赞成在工会方面建立统一战线，但反对在政治上建立统一战线的主张，因而它拒绝正式参加联盟。正因如此，它也反对任何要把联盟的活动从工会方面扩大到政治方面的尝试。共产党人既然把他们的支持仅限于工会方面，就集中力量批判这一事实：即改良派通过他们在总工会的代表实际上掌握了这个新组织的领导权。意大利的共产党在总工会内的一派曾在1921年11月总工会维罗纳全国代表会议上获得415712票，而社会

党多数派则获得1466000票，于是，意大利的共产党就要求自己的
一派参加劳工联盟应占有同它在总工会参加劳工联盟领导机构的
代表团内所拥有的力量相适应的地位。意大利的共产党认为，劳
工联盟的全国委员会必须从直接由群众选举出来的一系列地方委
员会中寻求组织基础，它认为需要准备政治总罢工，但是，它又不
愿意参加劳工联盟发起的政治性会议。

在这种情况下，劳工联盟在这最后的严重关头，就仍然成为使
意大利工人运动四分五裂的各党派争权夺利的场所。改良派打算
把联盟变为他们推行自己的政策的工具，而且这一工具作为一个
新的劳工党的萌芽，应随时准备同一个保卫宪法自由的政府进行
合作，但就当时来说，成立这种政府是缺乏前提的。对最高纲领派来
说，劳工联盟应当成为同意大利的共产党达成政治协议的工具，这
是共产国际所要求的，但又是意大利的共产党的领导，特别是波尔
迪加所坚决反对的。对共产党人来说，这正是继续同改良派和最高
纲领派论战的机会，以便向共产国际表明：党是执行统一战线政策
的，它不拒绝在工会方面执行这一政策，而是要避免把这一政策扩
大到政治方面。意大利的共产党的全部行动是谨慎的、有保留的，
它的全部行动似乎都出自阻止同意大利社会党一部分人合并的必
要性。

正因如此，劳工联盟由于受到各政党的这种相互对立的压力，
在不同时刻、不同地方就采取了自相矛盾的立场。在当时几个月
62 的论战当中，关于准备举行一次政治总罢工的问题占居了主要地
位。1922年7月3—4日总工会全国代表大会上，共产党人使塞
拉蒂提出的为建立一条无产阶级统一战线而达成谅解的呼吁落空
了，他们仅仅坚持认为，必须准备政治总罢工。但是，共产党人（代
表253000票）、最高纲领派（代表247000票）和第三国际派（代表
34000票）三者之间的分裂，使总工会的领导权落入改良派之手，而

三派如果联合起来，本来可以在总工会内部形成左翼多数派；改良派单独就获得537000票，他们当时反对宣布反法西斯总罢工。

六、自由党的投降

法西斯主义在夏季发动了进攻。行动中心又一次是波河流域。在波洛尼亚，省督察莫里发布了一项法令，禁止劳动力转移，因此，也就禁止工贼集团从艾米利亚大区的其他省份流入波洛尼亚；法西斯分子占领波洛尼亚达五天之久，为的是迫使取消省督察的法令，并把省督察莫里调往别处。扑向波洛尼亚的尤其是来自菲拉拉地区的行动队，包括人民党在内的所有资产阶级政党都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政府调离莫里督察并取消他颁布的命令。法克塔在向议会介绍他的主张时曾口头宣布保卫法律的政策，但这项政策从资产阶级阵营中却找不到政治基础，也找不到可以使用的工具。法克塔政府最终还是作了让步。这是国家政权的投降，它是在所有政治力量（从自由民主派到人民党）同谋共犯的条件下完成的。波洛尼亚省督察的调离只不过是实行来自政府有关部门的指示，这一调离表明政府的软弱无能，它比任何指示都更有指引各省督察和国家机构如何行事的作用，因为各省督察和国家机构这时都明白了绝不应当阻碍法西斯分子的行动。法西斯分子由于得到不受惩处的庇护，就变本加厉地展开行动，他们从艾米利亚大区扩展到马尔凯和伦巴底两大区。在克雷莫纳，法西斯行动队在宪兵的护卫下，捣毁了人民党议员米廖利和社会党议员加里博蒂的住所。

这件事使议会群情激愤。7月11日，社会党人、共产党人、人民党人和民主团体一致对法克塔政府投了不信任票，因为这个政府在使人遵守法律方面无能为力。但是，这一反对票并不能变为反法西斯多数，因为人民党人拒绝被人拉进反法西斯联盟中去，因

63

为社会党人一直处于四分五裂，同时也因为法西斯分子公开施展阴谋，他们也投票反对法克塔，但是，他们的目的是要从右的方向解决危机。墨索里尼威胁道，如果从危机中产生一个反法西斯政府，法西斯主义就会以起义来对付它。

危机陷于日益混乱的情况之下。意大利无产阶级作了最后的巨大斗争努力。7月18日，在冶金工人罢工的同时，皮埃蒙特大区举行了总罢工，19日，伦巴底大区也举行了总罢工。这两次总罢工一致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的大无畏觉悟。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始终只是工人战斗精神的最后表现罢了。由于改良派反对把这一运动转变为全国总罢工，这一运动未能扩大。而法西斯分子的进攻则是针对工人群众战斗力的最后表现的。法西斯分子决心消灭无产阶级的顽强抵抗和取消恢复统一的任何可能性。

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内战，它血染了意大利的各个广场。凡是对应当采取什么立场还在犹豫不决、在右翼和左翼之间摇摆不定的人，都被打翻在地。G·A·博尔杰塞^①小说中的人物——鲁贝——就是这场使国家陷于分裂的危机的可悲代表，这个人出于恐惧，同时也为了不惜以丧失自由为代价而最后获得秩序和安宁，竟把中等阶层推向右翼。

在这种暴力日益猖獗的气氛之下，要想迅速解决危机，那是徒劳的。人民党人继续否决乔利蒂。而乔利蒂也反对社会党人和人民党人相互联合，反对针对法西斯非法行径而成立护法政府。恰恰相反，他认为必须把法西斯分子包括到广泛集中的民族政府中去，他打算最后在秋季卷土重来时组织这个政府。这位自由党老国务活动家表现出他根本不明白目前局势已经脱离他的控制，要想依靠他老一套的拖延战术来取胜，那是枉费心机。人们多次作了成立一个包括屠拉梯到墨索里尼的和解政府的尝试（奥兰多、博诺

^① 朱赛佩·安东尼奥·博尔杰塞(1882—1952)，意大利著名作家。——译者

米、德尼科拉)，但是都没有成功。

这时，屠拉梯决定采取一个重大步骤，7月29日，他破天荒第一次登上魁里纳尔宫^①的台阶，建议国王成立一个可以得到改良派支持的集中政府。社会党议会党团多数派决定支持一个能保证恢复法制、保卫自由的政府。但是，社会党议会党团此举遭到意大利社会党全国委员会的批评，这个委员会依然坚持它那不妥协的立场。不论如何，屠拉梯的献策还是落空了。

正在这时，屠拉梯本人竟然采取了一个冒失的举动，让劳工联盟倡议宣布一次被他称为“合法”的政治总罢工，因为这一总罢工应当表达工人阶级要使人尊重法律尊严、反对法西斯暴力的意愿。这样，这个由共产党人宣布的政治总罢工，尽管好几个月来曾遭到改良派执意拒绝（说它是什么冒险，而当时还是有条件使这一总罢工获得积极成就的），这时却过迟地、在一片混乱当中宣布举行了，这正是发生在法西斯主义已经在前几周对无产阶级的组织进行严重打击之后。

这次罢工是由一个秘密的行动委员会以地下方式宣布将于8月1日举行的，后来，在举行前夕，被新闻记者向外透露，这个既无准备又无信心的罢工，在这种条件下，只能取得局部胜利。相反，这一总罢工却给法西斯分子提供了总动员的机会，他们公然宣称，这一总动员的目的是要破坏罢工和取代国家权威，于是法西斯分子又一次向共产党和社会党以及工会运动和合作社运动的所在地发动进攻。8月3日，在米兰这个还由社会党人领导的最后一个重镇，马里诺宫^②被法西斯分子占领了，他们把当时正在米兰的达依丘召来，叫他发表了一个演说，这一演说虽然暧昧不明、模棱两可，却被说成是拥护法西斯主义。在热那亚，前几周改良派曾一意

① 魁里纳尔宫系意大利总统府。——译者

② 马里诺宫系米兰市政府所在地。——译者

孤行地阻挠反法西斯群众运动扩大,而这时,改良派报纸《劳动报》也遭到捣毁,整个海员工人组织遭到袭击。在意大利全国,并非没有无产阶级进行英勇而绝望的抵抗的城市的,最顽强的抵抗是帕尔玛市的奥尔特雷托仑特镇,法西斯分子未能打进去。但是,在米兰、热那亚、帕尔玛,权力就在那几天都归到军事当局手中去了。

总罢工最后成为意大利工人运动的一场名副其实的灾难,那个曾经敦促这次总罢工的人即屠拉梯,居然把它称为意大利无产阶级的“卡波雷托”。这次总罢工为法西斯主义上台开辟了道路,促使王室和工业家同法西斯主义串通一气,推动墨索里尼采取最后步骤以实行他的政变,即使到最后一刻,他还继续同乔利蒂、尼蒂、萨兰德拉以及法克塔本人谈判。这时,在宣布总罢工之后,国王已经不再拖延,重新任命法克塔以一个几乎和前届政府没有两样的政府在议会中出现。

又过了几周,这场危机终于以右翼掌权而告终。在普遍厌倦、日益沮丧的气氛之下,法西斯分子最后玩弄的阴谋轻而易举地得逞了。国家已经过久地经受一场深刻危机的折磨。如果法西斯主义上台能作为一个条件,使人们摆脱危机,实现某种正常化,停止非法行为和暴力的话,那么,就应当不再阻碍成立一个有法西斯分子参加的政府(当时,几个前自由民主党总理乔利蒂、尼蒂、萨兰德拉和法克塔就是这样幻想的),或者干脆成立一个由墨索里尼领导的政府。资产阶级中越来越多的阶层肯定都倾向于上述后一种办法。意大利社会全部旧的落后的基础,旧的领导阶级的反动禀性,都一致地趋向于加速采取依靠法西斯主义来解决危机的办法。

七、工人运动的分裂

劳动者失败了,但并没有低头;这时他们采取观望态度,仿佛

如何解决危机同他们并无关系，这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内部在旧领导阶级同新的法西斯领导两者之间的较量罢了。尽管当时情况严重，8月1日罢工的失败带来了惨重的挫折，但这些都没有促使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对它们的所作所为作出批判性的审查。恰恰相反，在阶级敌人的压力下，瓦解过程却进一步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了。

10月1日，意大利社会党在罗马举行第十九次代表大会，这时，它只有72000人（其中6万人有代表参加大会），会上，最高纲领派和改良派终于发生决裂，因为要在政策上取得某种成效已经为时过晚。议会党团中改良主义多数派在7月危机中采取的态度，为塞拉蒂开除改良派分子提供了理由，而1921年1月，塞拉蒂在里窝那是坚决地反对这样干的。这时，双方没有什么痛苦地就此分手了。两派票数差距很小：最高纲领派是32000票，改良派是29000票。意大利社会党的旧旗帜仍由被称为“坚持不渝”的最高纲领派领导所掌握，最高纲领派领导坚持它的阶级立场，抵制反动派的逆流，而后来，如塞拉蒂所说的，这股逆流还是得逞了。这样，改良派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同其他左翼力量合作，以拯救自由体制，甚而参与反法西斯防御政府的成立。但是，这些愿意同改良派合作的左翼力量究竟在哪里呢？已经为时过晚。这时已经开始了同法西斯分子合作的竞赛。10月4日，成立了工人阶级的第三个政党，称为团结社会党，有屠拉梯、特雷维斯、莫迪利亚尼、贾科摩·马泰奥蒂则作为书记。意大利社会党重新作出加入共产国际的决定，并决定派出一个由塞拉蒂和马菲率领的代表团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在法西斯主义上台前最后几周中，使意大利社会党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忙碌工作的大事就是准备参加定于11月5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共产党领导想要阻止莫斯科决定意大利的共产党同意大利社会党合并，因为这时后者已经完成开

除改良派分子这一条件。因此，虽然陶里亚蒂在参加社会党代表大会时对大会决议作了谨慎的评价，但波尔迪加仍然急于断言：会上的分裂没有任何左的内容，塞拉蒂依然如故。实际上，整个工人运动都对法西斯危险作了低估。共产党人强调法西斯主义和民主派沆瀣一气的问题和法西斯主义打入乔利蒂政治传统的问题。而社会党人也有同样的想法，他们预计法西斯主义和旧的领导阶级
67 必将达成妥协，而不会发生任何政变。这样，意大利的共产党和意大利社会党的两位书记即波尔迪加和塞拉蒂就在10月下半月率领两个人数众多的代表团赴莫斯科，似乎是要去着重表示这两个无产阶级的党都对如何解决危机漠不关心，因为他们一致认为，这场危机同工人阶级无关。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是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召开的。反动派在欧洲得势使人不得不发展统一战线路线，直至成立工农政府。这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历史上必不可少的过渡形式。按照共产国际的看法，工农政府可以成为达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起点。即使工农政府究竟可能成为什么东西还不清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所采取的立场也表明：共产国际承认，如果要实行同社会党人结成统一战线的政策，就不能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目标。

西欧和中欧的无产阶级革命虽然停顿下来，苏联国内形势却得到了巩固，在新经济政策推动下，经济得到了恢复，外交上的孤立处境也结束了，1922年2月，苏联还参加了日内瓦会议，4月又同德国签订了拉巴洛条约。这样，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同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要在实行团结政策的同时寻求从政治上争取人民多数的必要性两者之间的区别就更加突出了，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早就指出了这一点。但是，统一战线政策变得难以实行，不仅是由于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当时存在的关

系所致，而且也是由于共产国际的组织结构日益集中所致，在共产国际中，苏联代表团所占比重变得越来越具有决定性。

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在听过季诺维也夫的政治报告之后分裂了：波尔迪加和代表团多数成员都尖锐地批评这一报告，而少数成员（格拉齐亚代伊和塔斯卡）则维护这一报告。但是，当时更为迫不及待的问题是意大利社会党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合并的问题，这是共产国际所希望的，它甚至订出实行这一决定的具体日程。新党应当起名为“意大利统一共产党”。从1923年1月1日起，两党的日报就应当合而为一，由杰纳里和塞拉蒂共同领导这份《前进报》即将来的统一共产党的报纸。在1923年一年之内应当举行两党合并代表大会。任命了一个筹备合并的两党委员会，由葛兰西、特拉齐尼和塔斯卡代表意大利的共产党以及塞拉蒂、马菲和托内蒂代表意大利社会党组成。 68

波尔迪加当时要求召开意大利的共产党特别代表大会，以决定同意意大利社会党合并是否适宜的问题，他的立场最初曾得到代表团多数人的支持。代表团多数人都不赞成合并，而仅同意最高纲领派分子以个人名义加入意大利的共产党，因为他们认为，意大利社会党这时已经没有任何代表性了。但是，当时存在着这样的危险，即：仅有右翼少数派支持合并的主张，因而他们会得到共产国际的委任来实现合并，由于这个原故，在意大利的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就发生了新的事件：多数派又分裂了，亦即一方是波尔迪加，另一方则是葛兰西和斯科奇马罗；波尔迪加认为，旧的领导现已过时，因而必须辞职，葛兰西和斯科奇马罗则不愿听任党内右派为所欲为，他们认为，必须直接控制合并的实行。但是，葛兰西和斯科奇马罗并不因此而放弃他们反对合并的意图，他们向社会党人提出了越来越苛刻的条件。当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两党代表团返回意大利时，塞拉蒂和波尔迪加都被捕了。这时，他们才发现，

在他们逗留莫斯科时已经成立了墨索里尼政府，这个政府并非如他们曾认为的那样是任何内阁危机的结束，而是一个新政权的开始。

塞拉蒂在莫斯科长时间逗留，使反对合并的人有了自由活动的余地，他们成立了一个保卫社会党委员会，为阻止《前进报》转入共产党人之手而斗争。令人精疲力竭地长时间拖延有关合并的谈判，共产党人提出的日益苛刻的条件，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关系的日益恶化，有关意大利社会党所负责任的激烈论战的继续，所有这些事实上都帮助了以南尼和韦拉为首的反对合并的人，使他们得以利用年深日久的、一贯强烈的爱党心理来阻止合并。塞拉蒂于1923年3月1日被捕，这使保卫社会党委员会得以无所顾忌地筹备代表大会。1923年4月在米兰召开的社会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反对合并的一派以5600票对4000票击败了赞成合并的一派。这次代表大会是在社会党组织严重溃散的情况下举行的，当时社会党削减到只有1万人。合并再也不会实行了，1921年的决裂再也无法补救。只是经过其他一些费力的争执之后才于1924年实现了“小小的合并”，把塞拉蒂和第三国际派吸收到共产党中来。但是，这一行动这时已经没有什么大的政治意义，即使意大利的共产党因此增加了一些精明强干的、联系群众的党员。这一行动无助于减少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之间决裂的严重性，在激烈论战的过程中，这一决裂反倒进一步扩大了。

八、进军罗马

10月下旬，形势急转直下。法克塔政府实际上已辞职，这时表现出既无权威又无进行干预的可能。乔利蒂、尼蒂、萨兰德拉以及法克塔本人，都在同墨索里尼谈判，他们各自都认为能控制这场交

易，可以依靠自己的主动争取使法西斯分子参加民族集中政府。墨索里尼当时直到最后还举棋不定，作了各种打算。他听到法克塔准备于11月4日在罗马举行前战士的大规模集会，并且会上还将由加布里埃莱·达依丘发表演说的消息，这使他打消了最后的犹豫，促使他采取了行动，以便不让别人捷足先登。

10月27日，在法西斯分子举行了那不勒斯集会之后，宣布了法西斯分子全国总动员。在几乎所有意大利中北部省份，省督察当局和军事指挥部不仅都没有阻碍法西斯分子的动员，并且还允许冲击队毫无困难地占领了省督察所在地、市府、各党和工会组织的办事处。法西斯分子的各个纵队从各省份出发，向罗马集合。省督察当局和军事当局在各个地方都同法西斯头子们就法西斯纵队经过当地的方法商量妥当；尽管它们给法西斯分子提供了帮助，但10月28日夜里，法西斯分子涌入罗马显得还是比预计的要更加困难。铁路交通已经中断。28日早些时候，部长会议决定发布戒严令，这一法令一开始执行就已表明：如果军队和国家机构方向坚定，它们本来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制止任何暴动。然而，它们却根本70
不想抵制墨索里尼的讹诈。国王拒绝签署宣布戒严的法令，而最初，他原是催促发布这一法令的。高级官员、军界上层、大工业家都为墨索里尼施加压力。墨索里尼本来对进军罗马能否成功根本没有信心（他把进军罗马看成真正的起义行动），这时也得以充分施展权术，如愿以偿地从政治上和心理上施加压力。安全措施立即停止了，甚至向处境困难的法西斯纵队提供粮食和后勤援助。28日白天，作了最后一次组成有法西斯分子参加的萨兰德拉政府的尝试，但是由于米兰资产阶级有权威的代表人物出面干预（其中有《晚邮报》社长路易吉·阿尔贝蒂尼），这一尝试失败了。这些米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推波助澜，促使国王不作任何拖延，立即任命墨索里尼组成新政府。

国王由于拒绝签署宣布戒严令，已经没有任何选择的可能。墨索里尼在29日晚搭乘赴罗马的卧铺车厢之前，等待正式邀请。30日，他身着黑衫，到魁里纳尔宫报到，当天，他没有征询各党意见就迅速地成立了广泛集中的政府，在这个政府中，除法西斯分子和海陆军首领塔翁·迪雷韦尔和迪亚斯之外，还有旧多数派的各党派人物，从民主社会党人到人民党人。谁也没有拒绝墨索里尼关于参加新政府的邀请。如果说，这一合作之所以没有尼蒂分子和总工会的改良派分子的话，那是因为保守派和工业家联合会的右翼反对把政府扩大到左翼。

31日，法西斯分子乘专列从意大利全国各地来到罗马举行示威。所谓“进军罗马”最后就成为在罗马各条街道上的游行队伍。在夺取政权时未能加以运用的法西斯暴力，这时就又一次卑鄙地用来对付人民运动。人民之家、各党办事处和人民协会组织的所在地、各报报馆（其中有尼蒂的《国家报》、《共和之声报》和《共产主义者报》；在《共产主义者报》报社，陶里亚蒂险些丧命）都遭到侵袭和洗劫，法西斯分子只是在圣洛仑佐、特里翁法莱、特拉斯泰维雷和泰斯塔齐奥这些人民住宅区遭到了抵抗，而在圣洛仑佐区，死7人，伤17人。

71 尽管发生这些事情，危机的结局并未引起特殊反应。各个方面都以不同理由力图缩小事件的严重性。任何一个党派都不想正视：它们已被击败，如今已不是从一个政府转为另一个政府的问题，而是政权体制发生了变化。

旧的多数派的那些政治团体当中，滋长着这样的幻想：以为法西斯主义一旦掌权，就会像人们说的自行“正常化”和“奉行宪法”，就会阻止，然后消除法西斯冲击队的暴力和非法行为现象。连唯一没有陷于参加政府而不能自拔的民主界人士（尼蒂和阿门多拉^①）或是对用法西斯解决危机的办法持公开批评态度的人，如分

别作过驻巴黎和伦敦的大使的斯福尔扎和弗拉萨蒂（他们二人已由于政治原因公开声明辞职），也都采取了规规矩矩的谨慎态度，说什么他们并不想给新政府制造障碍，甚至还祝愿新政府取得圆满成功，这就很说明问题了。这种态度里隐含着保留，也就是说，有这样一种看法：这种正常化试验不会成功；他们之所以表达这种看法，目的在于使人懂得，一旦试验失败，责任不应当落在那些不能参加新政府的人们身上。况且，旧的领导阶级的行为准则也不允许这一试验成功。但是，问题在于：这已不是像以前那样的政府了，对待以前那样的政府，是应当保持那种形式上正确的一贯态度的；目前的政府却是一个反宪法的政府，而当时奉行立宪的旧多数派没有一个党派明确地指出这个不同点。改良派队伍中，特别是在工会领导人当中，也存在进退维谷的现象；工会领导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受到墨索里尼说法的诱惑，墨索里尼曾说，有可能承认总工会负起积极的职能，只要总工会宣布自己在10月社会党最后一次分裂之后独立于各党派。12月2日，墨索里尼接见了总工会书记巴尔代西。

甚至在坚决反对派人士如共产党人和社会党内最高纲领派当中，也没有能够看出当时形势的独特性，并且还一味地再三指出，这不是什么政变，而是政治妥协；其实，只有从形式上看才是这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举行罢工的建议，本来就没有很大说服力，而且带有明显的论战意图，这时，这个建设也遭到总工会拒绝。南尼在10月29日《前进报》的一篇社论中就写道，此事同工人运动无72关。因此，领导阶级的命运就这样注定了。本来是可以少一点误会的。这样，南尼所代表的立场，不仅是塞拉蒂和波尔迪加的立场，而且也是世俗左翼相当大一部分人的立场。甚至像加埃塔诺·萨

① 乔瓦尼·阿门多拉(1882—1926)，作者之父，政治家，参加过尼蒂、法克塔内阁，著名反法西斯人士。——译者

尔韦米尼面对着法西斯主义上台，最初也采取了更多的是满意而不是中立的态度，因为他相信，墨索里尼会成为一把结实的“扫帚”，把随风使舵者和改良主义者一扫而光。

共产党人和最高纲领派都说过，这是资产阶级内部的问题，同工人阶级无关，因而工人阶级不应当介入；其实，这种说法最后转化为一种消极被动、听天由命的态度，只是在无产阶级英勇抵抗的某些启示下才有所改变。他们没有觉察到，资产阶级国家是组成民主制度，尊重结社、集会、新闻、罢工、普遍选举等权利，还是组成专制政体，消除一切民主自由，这对工人阶级来说并不是什么不相干的事，不仅就工人阶级眼前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来说是如此，而且就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前景来说也同样如此，何况在意大利这样一个国家，民主自由是工人运动在60年当中以严酷的斗争和巨大的牺牲为代价夺取过来的。

九、墨索里尼政府

新政府的所作所为比任何学术论文都更能迅速地驱散“正常化论者”的幻想，证明民主政府同法西斯政府两者之间的差别。

11月16日，墨索里尼立即开始动手了，他在向议会作的就职演说中说道，他可以把“这个死气沉沉的灰色的议会大厅变成一个军营”，他还可以“关闭议会”。因此，议会只是在法西斯主义恩准之下才能活下来的。整个旧的政治统治阶级都默不作声地、毫无反应地承受了法西斯主义给议会体制横加的凌辱。当时，只有从社会党人的议席上发出叫喊：“议会万岁”。共产党议员拉贝扎纳的讲话中反映出共产党立场所依据的原因，并且强调指出：法西斯主义是意大利资产阶级政治传统的接班人和继承人。难道仅仅是接班人吗？人们没有看出，在法西斯政府上台当中有一些新的东西。

都灵事件打破了“正常化论者”的幻想，表明法西斯分子继续使用过去不受任何惩处而对国家体制和公民所运用的暴力。12月18日，工人俱乐部和包括《新秩序报》在内的各家报馆被捣毁和焚烧。工人战士除了遭到棍棒毒打和大批清洗之外，还被法西斯分子从家中抓出来，残暴地施以非刑，并遭到野蛮的杀害（死22人，重伤24人）。事实证明，法西斯主义打算保持自己的军事组织的作用。法西斯主义成立了大议会，还决定组织志愿民兵，以保障国家安全，这一民兵组织是直属墨索里尼管辖的。这个军队甚至没有向国王作传统的宣誓。由于正式成立了纳入国家军队范围之内的党的民兵组织，国家机构公开法西斯化的过程就开始了。但是，这一措施却被“正常化论者”看成是在法西斯运动合法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步。

在经济政策上，法西斯主义赤裸裸地暴露了它的阶级性质。1921年的危机被克服之后，世界经济开始了急剧发展的周期，而这个周期最后带来了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意大利资本主义在克服了前几年的经济困难和政治困难之后，企图迅速地重新赢得失去的时间，它要求政府为它提供完成这一任务的便利条件，即一方面迫使工人阶级遵守纪律，另一方面使它摆脱战时以来不断增加的控制和捐税。墨索里尼连忙满足了工业家们的要求，因为这些工业家们曾资助他上台执政。

议会早已通过的土地改革法案被撤销了。通过法令，也废除了证券记名；取消了冻结房租；废除了对战争超额利润的赋税；减少了遗产税；废除了家庭方面的继承税，其他方面的继承税则也有减少。国有电话业出让给私人资本。取消了保险业的垄断。与此同时，则采用了打击劳动者的新的直接税，如工资动产税和主要打击农民、佃农及对分农的农业收入税；间接税也大大提高。

尽管起初对总工会作了种种献媚讨好的事，法西斯工会和雇 74

主组织之间达成的协议却仍然日益严重地限制工会组织和工会活动的自由。为了进行政治报复并以“工作效率不高”的提法为名，撤销了3.6万名铁路工人的职务，这对所有企业家来说，不啻是一个指示。即使法律规定8小时工作的原则，由于工会谈判力量被削弱，实际上也还是违犯了这项法律。取消了五一节，而代之以所谓罗马圣诞节即“4·21”节。在这种情况下，工资在几个月之内就减少了10%，而零售价格却上涨了10%。事实上，实际工资下降到1913年达到的水平，而且在法西斯统治的整个时期，工资一直处于这一低水平。减轻税收和压缩工资使红利大大增长。国家财政的改善使私人企业获得越来越多的贷款。在通货膨胀的气氛下，积累过程加速了，投资速度也增强了。意大利资本主义从它的政治抉择中迅速地取得了大量成果。因此，意大利资本主义充满信心，紧紧聚集在政府周围，而这个政府也不再隐瞒自己要变为专制政权的意愿了。

墨索里尼缩短了这一变化的时间。经过短短的一段关系困难的时期之后，他把民族主义者都吸收到国家法西斯党内，随后他又拼命从旧的自由民主派政治人员当中选拔和提升干部，同时狠狠地打击他认为是死不悔改的反对派，解除反抗最坚决的人的职务，使最胆小怕事的人处于中立，收容那些心甘情愿为他效命的人，而这种人也是不乏其人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还准备了一项多数制选举法，这项法律可以使人以最低限度的选票百分比获得可靠的多数。

在研究这项新的选举法之前，墨索里尼想取消同人民党的合作，他以人民党都灵代表大会情况为借口，说什么会上选举了斯图尔佐^①为党书记，而斯图尔佐的报告是重申党的自主性的，尽管报

^① 路易吉·斯图尔佐(1871—1959)，意大利人民党(天主教民主党的前身)的奠基人。——译者

告也重申人民党参加墨索里尼政府是有益的。法西斯主义这时已经把宝押在分裂人民党和同梵蒂冈上层直接合作之上，梵蒂冈上层表现出对人民党的存在和斯图尔佐采取的政治立场越来越感到困窘。尽管人民党议会党团匆忙以最广泛的方式解释人民党代表大会赞同继续参加政府是对政府政策的支持，墨索里尼却还是要求人民党的几个政府部长辞职，这几个部长就这样被赶出了政府。但是，事情并未到此为止。他推动所谓“民族派”的天主教徒成立了一个分裂派组织，因而于1923年7月1日，在梵蒂冈上层的支持下，终于迫使斯图尔佐辞去人民党书记的职务。在这种情况下，强迫议会通过一项把2/3议席给予至少获得25%选票的竞选名单的法律（同时让反对派竞选名单有可能以比例制办法分得其余1/3议席），那是不难的，而议会这时已经被蒙特齐托里奥宫周围经常挑衅性地进行的冲击队动员以及法西斯分子扬言要在必要时发动“第二次浪潮”的这种威胁吓坏了。讨论的情况表明，议会拒绝这次法案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只有代表工人和人民的左翼政党（共产党人、社会党人、改良派分子和共和党人）始终不渝地投票反对选举改革法案，这项法案是由以乔利蒂为首的一个委员会提出的。但是，人民党人乃至民主派人士（博诺米、阿门多拉）却在一些关键时刻（例如在转到逐条讨论法案时），在他们投票反对通过这项法律之前，采取了弃权态度。

法西斯主义在获得了新选举法的通过之后，就以老一套的冲击队做法加强它的恐吓性压力，其目的也在于控制和压制有一些法西斯分子所表现的不同政见，这些法西斯分子对同保守集团中的一些旧的代表人物签订协议表示不满。于是，一向用来对付工人战士的那种暴力，这时就掉转头来，不仅打击上述持不同政见者，而且还打击天主教、民主派、自由派的代表人物。1923年8月23日，在巴尔博^①命令下，菲拉拉省阿尔詹塔市大主教唐·乔瓦

尼·明佐尼被人用棍棒活活打死。11月29日，尼蒂在罗马的住所被侵袭和捣毁。12月26日，在罗马市中心，乔瓦尼·阿门多拉遭到暴力袭击。这时已经是筹备竞选运动的时候了。

1月25日，议会解散，竞选集会订在1924年4月6日举行。

① 伊塔洛·巴尔博(1896—1940)，法西斯党徒，在墨索里尼政府中作过航空部长。——译者

第四章 马泰奥蒂谋杀案

76

一、共产党新领导集团的组成

严重的政治和组织危机使共产党在1923年受到打击之后，政治选举为它提供了重新采取行动的可能性。1923年2月3日，波尔迪加被捕，约合24万里拉的一大笔英镑也被抄走，这是共产国际给意大利支部的经费。一个星期之内，包括几乎所有中央委员、72名省委书记及41名省青年联盟书记在内的数百名共产党员被捕。在波尔迪加之后，格列科和年轻的领导人贝尔蒂、隆哥也相继被捕。由于与共产国际发生冲突而已经辞职不干的旧的领导机构现在也实际上被摧垮了。

领导工作的担子暂时落到了特拉齐尼的肩上，他召集陶里亚蒂、斯科奇马罗、卡米拉·拉维拉、塔斯卡和格拉齐亚代伊组成了执行委员会。葛兰西因受逮捕令的通缉，从1922年夏季起便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陶里亚蒂在长期患病，但也是在长期的批判性思考之后，4月下半月才承担起执行委员的职务。但时隔不久，也是因为特拉齐尼已前往莫斯科，他便成为执行委员会和党的机关的实际领导人。这样，出于组织方面的需要，他修改了党的领导机构的政治方针。如果说多数被捕的共产党员很快就释放了的话，那些主要领导人却仍关在监狱之中。对他们的起诉书当时就已起草完毕，但起诉到10月份才进行，并以开释被告而结束。在那关键的几个星期内，波尔迪加和格列科正身陷囹圄，而这一事 77 实在党内政治斗争的发展过程中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面对法西斯迫害带来的打击，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持组织的生存。党员数量从1921年的42790人下降到1922年的24622人，1923年并进一步降到8698人。在1924年最初几个月，由于大量同志被捕，数千名同志被迫移居国外，积极活动、与基层组织保持联系的共产党员只剩下5000来人。为了确保党的组织系统的存在，必须建立秘密联络网。为此，全国划分为若干个地区，由与中央保持联系的跨大区干部负责领导。同志们组成了一个小组，被派到他们在当地还不大出名的那些省份去工作。一部分党员被挑选出来，时刻准备转入地下活动，放弃自己业已熟悉的职业，甚至往往要舍弃自己的家庭，以便全心全意地从事党的工作。为了完成这些新的困难任务，党拥有一批勇敢无畏的积极分子，他们已决心赴汤蹈火，像布尔什维克那样成为职业革命家。

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反动派的打击，另一方面是出于为实现自己政治目标而作出的组织上的选择，共产党努力把合法的斗争方式与新的地下活动结合起来，在半合法的条件下展开活动。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这样，它就以当时意大利政治生活中前所未闻的工人战士的新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尽管低估了法西斯主义出现的实际意义，没有估计到意大利一场新的革命危机将在资本主义总危机中迅速成熟的前景，党的这条路线本身却推动党员骨干分子去建立共产国际意大利支部这样一个具有“铁的”纪律和统一思想的组织，这个组织时刻准备利用一切机会展开活动；与老社会党截然不同，它全力寻求的是革命行动的新前景。正是在此基础上，工人阶级中最富有战斗精神的积极分子靠拢到党的周围，他们把党看成是最自觉地保证同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的力量。共产党因受法西斯迫害而遭到最严重打击的事实，正说明它是新政权

78 最坚决的死对头。尽管党内公式主义的官方论点固执地认为，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是现实的任务，但事实上占上风的还是根

据当时直接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理由，即指出必须进行坚持不懈的反法西斯斗争。

共产党内反对波尔迪加的政治斗争恰恰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的。波尔迪加在监狱中表示坚决拒绝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他仍然认为，如果只有右翼少数派接受共产国际的路线，那就让它领导党，直到召开一次特别代表大会为止。但是，原有多数派的一部分人却不愿在这一点上跟着波尔迪加走，他们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不让党的领导权落入右翼少数派之手。共产国际就此进行了干预，在对“意大利问题”进行了一次长时期讨论之后，任命了一个新的混合执行委员会，包括三名多数派成员（福尔蒂基亚里、斯科奇马罗、陶里亚蒂）和两名少数派成员（塔斯卡和沃塔）。这是一种从上面进行的干预，这种选择领导人的干预不仅具有政治方面的意义，而且具有组织方面的意义。

共产国际采取的这种方式也引起了正在脱离波尔迪加政治立场的同志们的批评和不安。波尔迪加和格列科要求旧的多数派成员不要参加执行委员会。但只有福尔蒂基亚里一人跟着他们的方针走。这样，旧的多数派就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拒绝执行共产国际的决定，因为他们坚信共产国际实行了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因此认为在没有明确要求召开一次特别代表大会的情况下，他们绝不能承担领导责任；而另一部分人，出于纪律方面的考虑，尽管在政治上没有被说服，还是同意在党的领导机构中工作。波尔迪加出狱后写了一封“公开信”，以便向党员们说明旧的领导机构与共产国际之间发生冲突的原因，并在政治上为代表大会作准备。这样一来冲突就加剧了。当时一直受到通缉、被迫住在维也纳的葛兰西立即表示反对波尔迪加的这种行为，并且成功地说服了像陶里亚蒂这样一些同志，这些同志原来尽管在政治上批评波尔迪加信件的内容，但最初还是准备在这封信上签字的。

在反工人的暴力猖獗横行、企业主在厂内骄横跋扈、警察施行镇压(致使党的总书记身陷铁窗)、政治混乱、旧的多数派陷于分裂、与共产国际又发生冲突的这一严峻时刻,安东尼奥·葛兰西显示出了他的政治和组织才能。他懂得,波尔迪加与党内旧的多数派中不打算跟他一起同共产国际决裂的那些同志之间的分歧,不仅仅局限于策略和纪律方面。主要的问题是政治方针问题。面对表面上接受共产国际的方针、实际上却倾向于否认建立意大利共产党的必要性的少数派,葛兰西准备对他坚信不移的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进行政治和思想上的阐述,这种阐述不仅仅限于对意大利社会党的责任的合理批评,而且也是建立在与当时意大利具体历史条件相符合的革命战略基础之上的。

葛兰西开始的理论阐述工作马上就使意大利共产党的斗争转移到一个新的领域,即采取行动在工人和农民之间组成一个能够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以工人阶级领导权为主导的联盟。葛兰西建议,新创办的政治日报应定名为《团结报》,根据同共产国际达成的协议,塞拉蒂和第三国际派的人也将为其撰稿。葛兰西的这一建议,不仅表示在纪律上接受共产国际提出的路线,而且也意味着他深深懂得采取统一行动的新的必要性,这是工人阶级所处条件提出的新要求。

为了实现工人阶级的团结,必须从工厂开始,建立工厂的统一组织,战胜厂内委员会,发展既是工会性质的又是政治性的统一运动。此外,葛兰西还提出了出版一份新的半月刊杂志的计划,以便深入研究意大利工人阶级最紧迫、最重大的问题,促进党员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并使工人阶级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作用。葛兰西认为,党能够发挥其革命作用,是因为共产党人能够深入分析意大利革命的问题并不断研究国家的现实情况,而不是因为共产党人

80 与工人运动相脱离。因此,共产党不能为了人为地保持自己的纯

、洁而孤立、游离于群众运动之外，相反应当成为一种辩证统一进程的象征，在这种进程中，把群众运动的自发性和中央的自觉领导结合起来。

葛兰西1923年在党内发起的这一思想建设和思想澄清工作以及新的领导集团的形成，由于工人运动和反法西斯运动的重新兴起而获得了有利的条件。

二、马泰奥蒂被谋杀

1924年初，面对法西斯的为所欲为，和雇主们的倒行逆施，人民日益不堪忍受的现象与日俱增。政治选举为展开反法西斯的合法行动提供了工具。但是实际上，三个工人党在大选时都受着深刻危机的折磨。意大利共产党陷于危机是因为波尔迪加和多数省委书记拒绝遵循共产国际所指出的团结路线和葛兰西提出的革新方针。社会党是因为南尼和拉扎里为了阻止同意大利的共产党的合并在进行着反对塞拉蒂和利考西的斗争。团结社会党是因为许多领导人，特别是工会领导人如达拉戈纳和里戈拉，拒绝执行该党书记贾科莫·马泰奥蒂一贯坚持的反法西斯方针。

就连人民党也因梵蒂冈怂恿的教会法西斯分子进行的分裂活动而四分五裂，梵蒂冈迫使该党书记路易吉·斯图尔佐辞去职务、流亡国外。民主自由阵营一片混乱，那几位前总理自行其是，谁也不愿挺身而出，站在一场反对法西斯、争取自由的严肃斗争的前列。

在这种形势下，宣布选举在一开始就引起了普遍的混乱，而且在所有政党内都有人主张拒绝参加这次已被到处横行的法西斯暴行所玷污的选举。

当其他政党还在讨论在这种条件下参加选举是否合适，团结

81 社会党人则不顾马泰奥蒂的意见倾向于采取弃权立场时，意大利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却于1924年1月决定参加选举，并建议社会党与意大利的共产党一同提出“无产阶级团结”的统一候选名单，展开共同行动，而选举斗争也只应当是这种行动的一个开始。这时，共产党内对旧的极端主义立场（取消主义、拒绝与社会党人组成统一阵线）的政治斗争已超出党内范围，变为一种政治行动。现在，改良派分子倒更喜欢取消派的立场，这一事实使旧的取消主义观点失去了价值。社会党人对意大利的共产党的建议作出否定的回答是预料之中的，甚至意大利的共产党方面也恰恰希望社会党予以拒绝，以便为共产党人和第三国际派分子组成“无产阶级团结”候选名单赢得更多的选票，而正是在这一时机，第三国际派分子彻底切断了他们与社会党的联系，加入到意大利的共产党行列中去。

大选是在暴力横行、高压及舞弊的气氛下进行的。最高纲领派的一名候选人安东尼奥·皮齐尼尼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遭到杀害，其他几名改良派领导人，如冈萨莱斯、卡内帕、博齐等，也因遭到袭击而受伤。实际上，所有反对派候选人的竞选活动都受到阻止。因此，国家法西斯分子的名单自然获得了胜利。有63%的选民投了票。联合竞选名单获得了4305936票，辅助名单获得了347552票。法西斯及其盟友共得票4653488票，即占投票者总数7165502的64.9%。墨索里尼通过编排候选名单获得了政治上的重大胜利，因为他把过去的自由党领导阶层的大部分，包括萨兰德拉、奥兰多（二者都是使意大利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取得胜利的总理）和德尼科拉（他在波尔迪加提出进行辩论的要求之后的最后时刻退了回去）吸收到联合候选名单之内。在这一名单中，有工业联合会主席贝尼和季诺·奥利韦蒂，有蒙特卡迪尼公司董事长多内加尼，艾迪生公司董事长莫塔和斯尼亚公司董事长马里诺蒂。在汇集到墨索里尼周围的、由全国各种势力组成的这一集团中，法西斯

主义占有优势，在“联合名单”的356个当选者中法西斯议员有227个。这个“联合名单”在南部地区获得了压倒一切的结果，但在北部的某些选区，反对派名单获得选票的总数却超过了政府的“联合名单”。意大利的共产党取得了重要的胜利：它是反对派中唯一使议席从15席增加到19席的党，选票为268191张，比1921年稍有减少。至于两个社会党，改良派获得了415148张选票，有24人当选，超过了最高纲领派，后者得票341528张，22人当选。在竞选当中，工人阶级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抵抗能力和对自己理想的忠实。

82

人民党也获得了重要的成就，获选票627649张，38人当选为议员，这表明它是反对党中最有力量的。民主反对派（阿门多拉）名单所获成绩也是显著的，它成功地在那不勒斯和南部其他选区（阿布鲁佐、卡拉布里亚、撒丁）使其8名候选人当选为议员。

墨索里尼当然可以依靠法律规定的多数，即议席的2/3。但尽管他捞到不少选票，并与旧的领导阶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取得了一致，这次大选对法西斯说来却仍旧是一个政治失败，因为它有助于表明，虽然在暴力威胁下各反对党不可能展开竞选活动，而且不同的反对党内部又存在着激烈的冲突，但它们仍保持住了广泛的群众。反对党在新议会的最初几次会议上有力地揭露了法西斯分子在竞选中实施的阴谋诡计和暴力行为，揭露了选举中无法保证秘密投票的事实。但反对派议员在法西斯议员卑鄙无耻的高声喊叫中几乎无法开口讲话，那些法西斯分子不时打断、谩骂反法西斯的发言人，甚至走上前去进行威胁。众议院议长、前民族主义者阿尔弗雷多·罗科对此却听之任之。墨尼里尼也从政府席上打断他的对手们的讲话。

反对党的举动在国内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赞扬，并且鼓励了抵抗法西斯主义的运动。在对法西斯主义进行最激烈、最勇敢的谴责的人当中，团结社会党书记贾科莫·马泰奥蒂是最为突出的。6

月10日,马泰奥蒂在离开自己的住所前往蒙特齐托里奥宫时遭到了绑架。有几个公民亲眼看到他被绑架并指出了那辆汽车的牌号。那是《意大利邮报》的一辆汽车。当天晚上轻而易举地就追查出了绑架的凶手,即叫作“契卡”^①的特别小分队的成员,他们是按内政部的直接命令行事的。群情激愤,谴责的矛头直接指向政府和墨索里尼。6月12日在众议院会议结束时,共和党人基耶萨在政府拒绝提供有关消息的情况下高喊道:“政府首脑是干什么的?他一声不吭,就是帮凶。”

谋杀马泰奥蒂使剧烈的政治危机爆发了。反对派离开了议会大厅,退到了马上按历史的说法被称为阿文汀^②的那个地方。以葛兰西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参加了阿文汀反对派的第一次会议并提出了一条明确的行动路线:宣布政治总罢工,口号是,“不要杀人犯政府,解除白色卫队的武装,建立工农政府。”但在这一建议被拒绝后,他们退出了反对派委员会。秋季他们又提出了一项建议:把这一分裂行动变为一个唯一代表人民主权的真正的“对立议会”。

反对派中的其他政党,包括社会党在内,拒绝了共产党的建议。社会党人的建议也同样没有得到响应。南尼在10分钟罢工的前夕,在6月26日《前进报》的一篇文章中明确阐明了这些建议,即:政府辞职,解散民兵,解散议会,举行新的选举。之所以提出这些要求,是因为在南尼看来,反对派并不“像墨索里尼轻蔑地声称的那样是一个绝对的少数”,而“实际上是一个人民的绝大多数”。共产党人希望马上或者在6月27日举行总罢工,但是社会党人和总工会却只打算在6月27日组织10分钟示威性的停工。

其实,罢工的口号以及总工会提出的意义更小的停工口号只

① 契卡(CEKA)系从俄文“特别委员会”借用而来,即秘密警察机关。——译者

② 阿文汀为罗马郊区七个山丘之一,古罗马时期平民抗议当时的寡头政治,曾多次退居该地进行暴动。——译者

得到了极少数工人的响应。大工厂的工人没有参加这一行动。尽管结果如此，共产党人还是利用社会党人拒绝接受共产党总罢工建议的行动，对社会党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指责他们和同资产阶级政党一个鼻孔出气的改良派分子站在一起。11月，共产党人为了重申自己的反法西斯立场，把自己的责任与阿文汀派的责任区别开来，又重新回到了议会大厅。与此同时，他们提出了组织“工农委员会”的建议，认为这种委员会是组织群众统一阵线、使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政党面前确立自己的自主地位的工具。

这样，党的路线就通过一系列政治行动而明确起来。它倾向于建立一条工人反对派阵线，这一阵线要有别于应称之为立宪反对派而不是泛泛的民主反对派那样的反对派。实际上，团结曾是围绕恢复宪法这一目标，而不是围绕为消除导致自由国家向法西斯主义投降的种种起因而实行民主革新这一目标实现的。共产党人指责立宪反对派不敢号召人民进行群众斗争，生怕这样会吓坏 84 国王和最强有力的资本家集团，因为立宪反对派正是要促使他们来消灭法西斯主义的。实际上，立宪反对派之所以求助于国王，恰恰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在当时条件下确实有可能发动一场能够给法西斯主义以决定性一击的群众运动。因此，有关“道德问题”的立场，在阿文汀派最有远见的成员身上，也完全浸透着对短期内推翻法西斯政府的可能性感到十分悲观的一种情绪，而且他们采取上述立场倒不如说是为组成一个能够长期坚持下去的反对派奠定基础。无论如何，阿文汀派没有发出进行群众斗争的号召。而且，这种态度固然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他们的主要考虑，即不要重提 1919 年的“乱子”来惊吓资本家集团和中等阶层，但事实上当时也确实没有充分的理由来希望人们接受进行群众斗争的号召。

其实，就连共产党人也认为，进行群众干预的时机尚未成熟。葛兰西在向 8 月 13—14 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提出的报告（发表于

1924年8月21日第27期的《工人国家》中就曾指出：阿文汀反对派与留在议会中的自由党反对派将会在国王的保护下重新联合起来，这种联合的方式虽然还没有确定，但是会在斗争过程中决定的。

这种形势被说成是“民主的”形势，但对于立即举行无产阶级革命说来还是不成熟的，因为葛兰西指出，广大劳动群众还是“无组织的、分散的一盘散沙”。“无论危机可能会有何等迅速的进展，我们能够预料的只能是工人阶级政治地位的改善，而不是夺取政权斗争的胜利”。因此，党的主要任务就在于争取劳动阶级的大多数。

与过去那种“社会民主党方案”不同，共产党人认为，法西斯主义为了解决它的危机，将组成一个保守政府，用以镇压工人运动任何可能的复兴。但这种估计也被证明是错误的。它说明共产党人长期以来低估了法西斯主义，低估了法西斯主义在其周围、在其领导下建立一个统治阶层集团的能力。但是，共产党领导机构提出的这条路线，⁸⁵有利于在党内澄清党的政策：建议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组成竞选联盟；与其他反对党一起参加会议；建议成立对立议会；发展统一阵线策略。尽管这条路线具有明显的特殊用心，即“揭露社会党人的真面目”，力图降低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但它却有助于打破原来那种孤立状态，推动共产党的组织去寻求其他社会主义团体并敦促建立新的统一关系。领导机构遵循的这条路线孤立了波尔迪加的立场，同时拒绝了右翼少数派的建议；右翼少数派想使党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同阿文汀反对派的联系，而这将使党承担风险，使它也不得不为阿文汀派等待观望政策承担责任，使它失去其自主性，而这种自主性是在意大利工人运动中夺得领导权的条件。

正是在这种被称为“中间派”的立场上，党的多数逐渐集中起

来。如果说在1924年5月的科莫会议上葛兰西提出的政治计划还遭到大多数省委书记的批评的话，那么谋杀马泰奥蒂事件后几个月内的深刻的政治经验，已使多年来一直只埋头从事艰苦的组织工作的党取得了政治上的迅速进步，使它认识到自己的作用。在这种经验中，形成了一支由葛兰西教育出来的新的领导核心，他们不是消极地等待事件的自由发展，而是采取积极的行动，扩大与群众的联系。葛兰西提出的路线要求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即把反对极端宗派主义的斗争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这种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后来一直是意大利共产党政策中长期坚持的一点，其中既有必要的变化，又有程度不同的交织。

最初，在1924年下半年，组成阿文汀联盟的各反对党赢得了广泛的拥护，这种拥护不仅来自与改良主义有着传统联系的基层工人和信仰天主教的农民群众，而且尤其扩大到南部的小资产阶级。但是，等待观望的策略使越来越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感到失望、气愤，他们不无道理地担心法西斯主义会得到卷土重来的机会。这种担心是有根据的。但是应当采取什么办法呢？聚集在反法法西斯战斗组织“自由意大利”周围的那些最活跃的小组制定的直接行动计划，看来是虚无飘渺的空想，缺乏切实可行性。虽然已看到工会恢复活动的最初迹象，但组织劳动群众在工作场所开展运动的时机仍未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反法西斯联盟的计划就是压国王进行干预。在报纸上公布证明墨索里尼对杀害马泰奥蒂和其他暴力事件负有责任的文件，本来应当促使在马泰奥蒂惨遭谋杀之后进入法西斯政府的自由党部长们宣布辞职的，而他们的辞职本来也会向国王提供机会，敦促墨索里尼本人辞去他的职务，以便为组成一个恢复宪法的政府打开通路。但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是一个恢复宪法的乔利蒂政府呢，还是一个由阿文汀派领导人阿门多拉、德加斯佩里和屠拉梯等领导的政府呢？在应采取

何种解决办法方面的摇摆不定为墨索里尼玩弄手腕提供了可乘之机。

12月底，公布了像切萨雷·罗西的备忘录这样的证明墨索里尼负有责任的文件。正像所预料的那样，自由党的部长卡萨蒂辞去了自己的职务。这本来可以成为国王进行干预的机会，但是国王没有下手，虽然他事先作出过一些许诺。墨索里尼在这一最困难的时刻，重新保证使局势正常化，他根据国王的任命把内政部交给了费代尔佐尼，并同意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效忠国王。而与此同时，他催促法西斯行动队重新积极活动起来，并且让法里纳奇咄咄逼人地大谈所谓“第二次浪潮”。在那几天里，有增无已的暴力、破坏和袭击行动把国家投入到血泊之中。这样，墨索里尼玩弄手段，把自己与法西斯主义区别开来，把恢复正常秩序的许诺与行动队暴力行动结合起来，从而再一次竭力表明自己是维持秩序的唯一保证。1月3日，在国王的支持下，他重新采取了行动。

三、阿文汀派的失败

1925年1月3日，墨索里尼在众议院发表讲话，对阿文汀派发起了进攻。他对发生的事情承担一切责任，并向反对派提出挑战，
87 让他们直接地到大厅里来指责他，与此同时，他还为行动队暴力行动的新阶段打开了畅通无阻的道路。

阿文汀派以越来越强硬的态度，针对法西斯主义提出墨索里尼在马泰奥蒂谋杀案和行动队员进行的罪恶行动中犯有同谋罪的道德问题。但是，动员人民的能力与进行这种控诉的有力程度是不相符的。实际上，号召人民采取行动，例如共产党人1924年6月提出的举行政治总罢工的建议（在提出这一建议时，共产党人也并未对成功的可能抱多大信心），主要是一些旨在改变反法西斯阵营内

部力量对比，而不是想切实促进发自基层的群众运动的政治行动，实际上，在政治组织、工会组织处于混乱、瓦解的具体情况之下，看来也根本就没有促成一场群众运动的可能。在1922年遭受严重失败的两年之后，在工人运动组织软弱、总工会只剩下几万人的状况下，暗杀马泰奥蒂所引起的群情激愤并不意味着群众运动新的高涨阶段的到来。首先否认存在群众运动的具体可能性的是参加阿文汀派的社会党领导人。但是，共产党人在其文件中也没有对当时形势作出不同的估价，尽管他们抽象地指出了一场新的革命危机迅速成熟的可能性。按照共产党人的分析，这场危机是会到来的。但没有指出采取行动的时机和可能性，没有提到任何具体的时间。他们断言，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在意大利也不能不促成一种新的革命形势的形成。

但是这一时机尚未到来。

此外，这一次又像1920年占领工厂之前和1922年法西斯主义进军罗马之前一样，共产党领导机构的大多数成员当时都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后来他们只是缩短了逗留（莫斯科）的期限。葛兰西当时还在意大利，他本来也应到莫斯科去，但由于马泰奥蒂危机，他决定不再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葛兰西在科莫会议上同波尔迪加曾发生争论：波尔迪加声称，无须操之过急，而葛兰西则认为，“恰恰相反，必须马上行动”，因为在当前形势下，“不立即行动就要遭到失败”。这次又是葛兰西意识到时间因素的重要性，看到历史和历史提出的期限在飞快前进，这些期限不容许有拖延或迟缓。

留在阿文汀派中的一些反对派人士和团体曾表态拒绝了某些轻率而浅薄的看法，如当时一种流行的看法就认为，对基吉官^①发

^① 基吉官是意大利总理府所在地。——译者

动一次进击或在罗马和米兰的大街上举行一次示威游行就足以使法西斯政权垮台，而实际上，这一政权的基础比人们推测的要更为牢固。当时有人断言（至今仍有人继续这样断言），在绑架马泰奥蒂后的那几天，存在着一种权力真空的局势，因此，只要几个有胆量的人敢于采取行动，就能推翻墨索里尼政府。墨索里尼后来发表讲话，大谈反对派头目的无能和胆怯，这就使上述论点更有份量了。其实，“权力真空”的论点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诚然，法西斯民兵当时已经解体，但国家机构还存在。除了意大利资本主义决定性势力的支持外，国王还可以倚靠军队和宪兵。

实际上，法西斯政权不仅符合最富有的阶层的广泛利益，而且与大部分中等阶层的意向和情感也是相吻合的。就是在谋杀马泰奥蒂的罪行之后，在反法西斯运动得到加强的形势面前，也仍有一些对法西斯主义表示支持的新的表现，例如路易吉·皮兰代洛^①的表现就是十分意味深长的。

这说明，法西斯主义在谋杀马泰奥蒂案件引起的危机时刻过去之后所以能够东山再起，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有各种各样的动机。这里有意大利资本主义统治集团的支持，他们希望不要因为政治冒险而打乱其大力进行的不断扩张；有梵蒂冈希望不要扰乱圣年的活动和准备解决“罗马问题”的愿望；还有可能是决定性的一点，即中等阶层和广大劳动人民希望维持现有秩序的愿望，他们虽然仍旧对法西斯主义进行批评，但并不相信有迅速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再者，阿文汀派又指出什么前景了呢？是走回头路，重新建立给法西斯主义开辟了道路的自由民主党联合政权吗？是成立一个曾引起旧势力抵抗的自由民主党、社会党和人民党联合政府吗？是成立一个交付给历届“前”总理们的过渡政府，由这

^① 路易吉·皮兰代洛(1867—1936)，意大利著名小说家和戏剧家。1934年获诺贝尔奖金。——译者

个政府来负责组织新的选举吗？这都是些不着边际、模糊不清的前景，因而未能引起广泛深入的民主讨论。

在反对派各派力量中，人们对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基础和对组成该集团的那些社会力量的广泛性普遍估计不足。组成该集团的社会力量虽然批评那些它们认为是“过火”的东西，但它们既不想回到法西斯主义以前的那种旧的混乱状态中去，更不想过渡到作为唯一有效的典型正在苏联建设的那个社会主义。

尽管有人抱有肤浅的乐观主义态度，幻想墨索里尼暴病一场、揭露一件丑闻，或是发生财政崩溃就能导致法西斯主义的垮台，但是在最严肃的反法西斯团体中则开始形成一种信念，即斗争是长期的、困难的，为了把国家从法西斯统治下解放出来，必须进行充分的政治和精神准备。当时一些最清醒的领导人已开始估计到，法西斯政权由于在社会上得到支持，由于从事反法西斯斗争的力量难于组成一个新的社会集团，因而该政权确实拥有实际力量；而且这些领导人已开始以敏锐的直觉指出，推进国家的革新需要斗争20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他们指出了随时准备在必要时牺牲自己生命的必要性。

阿文汀派分裂的继续现在已具有一种坚决为反对法西斯政权而努力斗争的道义意义，因为它已不再是出于错误的一时冲动了。面对着甚至在联盟队伍中也日益增多的厌倦和迷惘表现，固执地拒不返回议会大厅就意味着拒绝投降，意味着不打开可能会促使部分反对派议员重新接近，甚至重新加入政府多数派，从而导致反对派以及各反法西斯政党发生分裂的那条途径。自由党反对派（乔利蒂、奥兰多和萨兰德拉）力促分裂派议员返回议会，以便使形势在宪法规定的合法范围内恢复原状。然而，参加联盟的各党，由于阿门多拉、屠拉梯和德加斯佩里彼此间保持的协议，拒绝了这一要求，因为它们不想开脱墨索里尼应负的罪责，而且它们清楚地知 90

道，法西斯多数派是不会允许分裂派返回议会的，如果他们返回议会不是为了郑重其事地表示有悔改之意的话。在策略上遭到失败之后，阿文汀派的首领们不打算放弃他们强硬态度在道义上具有的意义，因为采取这种态度的目的就是要使法西斯政权与民族意识之间形成一条无法填平的鸿沟。

围绕着反对派返回议会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极为激烈的论战，但是在法西斯主义 1925 年 1 月 3 日获得胜利、法西斯党徒重新动用野蛮的暴力对反对派进行新的打击的形势下，这已变为只有招架之功的防卫了。果断地接受当时的失败，抱有为以后在变化了的政治形势下实现解放奠定基础的愿望，这些都不是十分容易被理解的理由，对于那些没有清醒地、严肃地认识到国内实际力量对比和紧紧地聚集在法西斯政权周围的那些阶层所组成的集团的人说来，尤其如此。

反法西斯队伍中对阿文汀派的消极态度所进行的批评变得越来越广泛了。阿文汀派的失败在 1925 年头几个月已经显而易见，它使参加该联盟的团结社会党（改良派）和社会党（最高纲领派）也遭受挫折。而意大利的共产党，由于及时地分清了自己所负的责任，则至少是部分地挽救了自己。从那时起，意大利的共产党的立场——原来在最初几个月常常受到批评，因为它破坏了反法西斯团结——就变得越来越有力量了，对参加阿文汀派的各党的消极态度感到灰心失望的那些最有战斗性的分子也开始转向意大利的共产党。

四、法西斯政权的巩固

马泰奥蒂危机平息了；墨索里尼在 1925 年 1 月 3 日之后马上竭力利用这一成功巩固他的政权。辞职的自由党部长被法西斯分

子取而代之，从而形成了清一色政府。议会立即就选举法的改革进行了投票，在只有自由党党团（乔利蒂、奥兰多、萨兰德拉）表示原则反对的情况下，恢复了单一候选人提名制。这种做法是一个在必要时可以用来解散议会的工具。但是，议会仅在2月14日一次会上就通过了整整2000项法律草案，使之变为正式法律。这表⁹¹明议会完全理解自己的实际作用，即以宪法延续性的外衣掩盖了法西斯主义对国家进行的改革。

1925年1月31日，墨索里尼发布总理令，任命由乔瓦尼·詹蒂莱^①领导的国家改革委员会。国家改革的工作以后又持续了数年，直至在掌玺大臣罗科的领导下对各项法典实行了改革。然而，1925年通过的第一批法律已说明了改革的基本方针：保持君主制国家的陈旧体制；加强政府的权力，宣扬权威的原则；压制任何自由；建立一种新的行会式关系，以便迫使劳动群众服从口头上说是保护民族利益、而实际上完全是为资本主义统治集团效劳的国家机器。

为时不久，就公布了提高墨索里尼作用和权威的关于政府首脑特别权力的法律，关于扩大省督察权力的法律，以及在不足5000居民的市（镇）中以政府任命的市（镇）长和市（镇）参议会代替选举产生的市（镇）行政机关的法律（这项法律很快就推广到了所有市镇）。对民主自由的压制通过秘密结社法的制定而得以实现，这项法律目的在于打击共济会，实际上却使结社自由化为乌有，迫使任何组织把各自会员名单通知警察当局。而与此相关联的另一项法律则规定，那些不完全确保赞同政府总的政治方针的国家官员应一律予以罢免。新闻法使反对派记者无法进行活动。关于出国者的法律规定，凡经警察当局不容置辩地认定在国外从事“反民族”活动的意大利人，将取消其国籍，没收其财产。

^① 乔瓦尼·詹蒂莱（1875—1944），意大利资产阶级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译者

92 这些措施为建成专制国家奠定了基础，这个国家的建立后来
到 1926 年底通过“非常法”才最后完成。但是，当局对所公布的这
些法律却马上作了引伸解释。实际上，国家政权的这种镇压行动
总是伴之以法西斯各级党组织不断进行的迫害活动，而且往往以
这种活动为先导。这些组织有步骤地运用行动队的老一套手法，
如恐吓、暴力、用棍棒殴打、驱逐乃至谋杀来对付反对派人士。法
西斯分子说，那些宁死不屈的反对派人士对他们说来实际上是一
种挑衅，因此，就应当用武力来对待这些人。

1925 年 2 月 12 日，法里纳奇被任命为国家法西斯党的总书记。
墨索里尼以这一选择承认了行动队——它宣布要掀起“第二次浪
潮”并以暴力对反对派的道德攻势作出了反应——在危机阶段发
挥的作用，同时通过专门的法律提前准备好了最完善合法的镇压
工具，对反对派残余核心保持着不断的恐吓和压力。这样，1925 年
7 月，乔瓦尼·阿门多拉就成了一次新的更加严重的袭击的目标，
他被打得遍体鳞伤，旋即丧失性命。10 月，在一个法西斯分子大打
出手的可怕夜晚，前社会党众议员皮拉蒂和律师加埃塔诺·孔索
洛在佛罗伦萨也被杀害。

警察、司法机关与行动队的暴力活动彼此呼应，前者成百上千
地随意逮捕工人骨干并把他们投入监狱，后者则把所有法西斯罪
犯统统非法释放，而与此同时却对卷入战后冲突的共产党人、无政
府主义者和社会党人判以极重的刑罚。因此，在新闻法实现其目
标之前，反对派报纸就由于接二连三的查抄和邮递推销困难而受
到打击，与此同时，路易吉·阿尔贝蒂尼和阿尔弗雷多·弗拉萨蒂
对《晚邮报》和《新闻报》的管理权和领导权也被人以种种阴谋手段
予以剥夺，报纸易主，其政治方针也随之改变。报纸所有权的改变
使许多记者纷纷对原任社长表示支持，路易吉·萨尔瓦托雷利——
新反法西斯主义最有代表性的呼声之一是他发出的——提供的例

于就说明了这一点。至于马泰奥蒂谋杀案的责任，转眼间已被抹得一干二净。在参议院进行的审讯中德博诺将军得到赦免，这一案件的具体执行者杜米尼、维奥拉和波韦罗莫在基亚提市^①的审判闹剧中由于得到法里纳奇庇护，仅被判刑5年，而实际上这5年也被免除了，因为1925年在庆祝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登基25年之际宣布的大赦法规定有4年的赦免期。 93

当时，在阿文汀派的合法反对党领导人（阿门多拉、德加斯佩里、迪切萨罗）向国王发出了一份呼吁书，要求他努力捍卫宪法。然而，国王并未进行干预，而是坐视国家的改变。当然，当时不是国王打乱意大利资产阶级统治势力逐渐聚集于法西斯主义周围的进程的。甚至当时法西斯党的“赞助者”和“正常化论者”所处的那个时期也已经结束了，这些人曾把墨索里尼和法西斯党加以区别，并期待法西斯主义宪法化。因为这时，“宪法化”业已实现，但不是通过对法西斯党的改造，而是通过国家的法西斯化。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资产阶级围绕政权组成了一个集团。工业家和地主、军人阶层和上层官僚、司法机关和学校以及各教会上层（教会也变得越来越明目张胆）都在吹捧国家权威的重新恢复，吹捧权威原则和“等级秩序”（墨索里尼的杂志恰恰以此命名并不是偶然的）的重新确立，实际上，这加强了工厂主、地主、总督和将军们在工厂、农村、公共行政机构和军队中的权威，加强了高级法官和校长们的权威。早在规定必须事先领取法西斯党证方能出任国家公职之前，就有人开始竞相钻入法西斯党内，他们或是由于胆小怕事，或是出于卑鄙无耻的目的，这说明在旧的统治阶级内，那种“有奶便是娘”的著名俗语所表达的只顾自己“特殊利益”的原则是多么根深蒂固。

^① 基亚提市系意大利中部阿布鲁佐大区的同名省首府。——译者

五、反法西斯论战

对于这次失败，各反对党和团体作出了不同的反应。在一片争吵和冲突当中，阿文汀派在形式上一直维持到1925年7月。它的最后一次行动就是就参议院赦免德博诺发表了一项批评声明，再次申明了针对政权提出道德问题的理由。1925年6月，人民党第94五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重申了它坚决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立场。11月人民党在形式上也脱离了阿文汀派。但是，1926年1月16日借纪念玛格丽塔王太后之机而进行返回议会的尝试却在墨索里尼的要求面前碰了壁，他硬要每一个分裂出去、现在希望“被容忍”返回议会的议员公开而明确地宣布投降，承认根本不存在什么“道德问题”。次日，只有人民党三个议员屈从，接受了法西斯的这一凌辱要求。其他人则被梵蒂冈所抛弃，因为这时，梵蒂冈已在准备就“和解”的条件问题同法西斯主义进行谈判了；他们还受到明目张胆地参加法西斯政权的法西斯教权分子的四面夹击，于是只得准备长期等待下去。他们既没有耸人听闻地屈膝投降，也没有投身到秘密抵抗运动的战场上去（极个别的除外），而是在和解协定的阴影下度过了法西斯政权当政的那些年月，并且在思想准备和培训天主教组织中有素养的干部当中形成了一支政治后备军，这支政治后备军后来在1943年的危机关头，在军事失败和法西斯垮台向意大利资产阶级提出的问题面前，曾显示出自己的力量。

1925年9月，最高纲领派的社会党人脱离了阿文汀派，随后共和党人也在10月间退出。11月，在改良派社会党议员扎尼博尼一手策划的、但由警察当局直接控制的行刺事件^①发生后，团结社会

^① 指1925年11月托尼博尼本人亲自预谋枪杀墨索里尼一案。后托尼博尼被发觉，判刑30年，但只服刑18年。——译者

党宣告解散。旧的反法西斯主义继1922年失败之后又遭到阿文汀派的最后失败,从而迅速瓦解,并对所有各党的原有政治格局产生影响,在此情况下,须要寻求一种向前看的、为未来作准备的政治纲领和组织方针。早在1925年1月起,由卡洛和内洛·罗塞利兄弟以及埃内斯托·罗西在加埃塔诺·萨尔韦米尼主持下创办的地下报纸《不屈》就已指出,必须通过地下活动来打破法西斯的合法性,以便不惜以任何代价保持反法西斯运动的自主。在这种意义上,《不屈》的行动与共产党人以更坚定的决心和更多样的手段为利用所剩无几的各种合法可能性来建立一个能够在任何形势下都可以发挥作用的地下组织而进行的努力是一致的。

1925年4月,发生了一件在意大利文化方面具有深远影响的⁹⁵事件:一些知识分子发表一项声明,对3月21日由法西斯哲学家乔瓦尼·詹蒂莱草拟、有数百人签名的一项宣言作出了回答。这项宣言谴责自由民主国家,并把祖国、法西斯、宗教和纪律混为一谈。反法西斯知识分子的声明是贝内代托·克罗切起草的,40名有崇高威望的文化界人士在上面签了字。他们除了个别人之外,都勇敢地坚持了自己所采取的立场,而且后来都投身到抵抗运动中来,尤其是投身到了行动党的行列。

在全国联盟代表大会(1925年6月)上,乔瓦尼·阿门多拉说明了在像意大利这样一个政治往往会变成为搭上胜利者的战车而进行交易的工具的国家里采取强硬立场的理由和意义。除了策略考虑外,对法西斯政权采取强硬立场就意味着与阻碍我国民主发展的那种旧的随风使舵的方式彻底决裂。阿门多拉指出,意大利必须作为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出现,并告诫说,这是一项需要以坚强的决心、坚韧的精神和顽强的耐性来完成的长期事业,为此必须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全国联盟代表大会团结了克罗切声明的许多签名者以及像古列尔莫·费雷罗、卡洛·斯福尔扎、梅乌乔·鲁

伊尼这样一些人。伊万诺埃·博诺米等人也参加了会议，但博诺米的出席受到皮耶罗·戈贝蒂的批评，指责他在出任政府首脑时（1921—1922年）为法西斯打开了通道。此外，出席会议的还有像乌戈·拉马尔法^①这样经过近几年严峻考验、从政治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年轻反法西斯主义者。当时乔瓦尼·阿门多拉曾表示要与菲利波·屠拉梯一起努力研究改良派社会党与“新民主”党的政治关系以及可能的共同纲领主张，他的这种努力本来是很有可能实现的。但是，阿门多拉在蒙特卡蒂尼的法西斯分子的袭击中受伤，并于1926年4月6日在戛纳去世，这就使这一运动在一开始就受到挫折；后来又由于意识形态和策略上的分歧，这一运动终于分裂为行动党和自由党。

左翼方面，在事实的逼迫下，最高纲领派、改良派和共和党人在研究失败原因和准备社会主义的斗争和革新纲领当中，开始了批判性的修正工作。社会党青年党员马扎利所写的一本自我批评小册子的题目《社会党的赎罪》，就说明了这种探索的意向；后来，彼特罗·南尼和卡洛·罗塞利于1926年年初创办的杂志《第四状态》则成了这种探索的喉舌。彼特罗·南尼与卡洛·罗塞利之间存在着许多政治思想分歧，但恰恰是由于缺乏一种坚定不移的共同立场，《第四状态》变成了这些左翼青年骨干分子之间展开辩论的有效工具，莱利奥·巴索也参加了这场辩论。奥利维耶罗·祖卡里尼的杂志《共和党批评》对这一批判性探索作出了独特的贡献，鲁道夫·莫兰迪就是在该杂志上迈出了反法西斯战士的头几步的。在这些反法西斯青年中，有许多人在1924年和1925年参加了大学生争取自由联盟的活动，该组织在各大学中开展政治性极强的反法西斯统一行动，与共产主义学生小组经常接触并不时发

^① 乌戈·拉马尔法，已故意大利共和党领袖。——译者

生冲突。

11月1日,皮耶罗·戈贝蒂的杂志《自由党革命》遭到查封,因为它多年来一直代表着反法西斯主义的批判意识,头脑清醒地参加了旨在对意大利社会进行真正的道德和政治“改革”而不是恢复法西斯主义所据以产生的旧式民主的斗争,使青年们得到了坚定的思想政治指导。在此基础上,戈贝蒂向反法西斯青年们指出了工人阶级的作用和展开一场不是由少数开明的优秀分子而是由广大“沉默不语”的工人群众进行的新的复兴运动的意义。戈贝蒂肯定了与共产党人建立一种统一关系的必要性,他的行动有助于使更多的人了解共产党人,尤其是葛兰西和《新秩序报》的发起人所提出的那些政治和文化问题,戈贝蒂《自由党革命》一书就对这些问题作过简要介绍。戈贝蒂因墨索里尼命令都灵省长“让他难以呆下去”,而不得不移居国外。到巴黎后,他因所遭受的折磨摧残而渐觉体力不支,并于1926年2月16日逝世于乔瓦尼·阿门多拉曾住过的同一诊所。

六、共产党的行动

随着阿文汀派的失败和解体,原有的反对派逐渐四分五裂了:许多人被迫走上流亡之路(尼蒂、斯图尔佐、萨尔韦米尼、《人民报》社长多纳蒂),另一些人则在法西斯暴力的打击下先后去世,如阿门多拉和戈贝蒂。与此同时,正像我们已经说到的,开始了一场探求和兴起新反法西斯主义的运动。当时已出现了一些运动,它们力图用全国联盟周围的那些小组所热切期望的“新民主”来改造自由民主制,并通过随后由《第四状态》于1926年发起的批判性修正行动对社会主义运动进行革新。这些青年小组和学生团体认识到了皮耶罗·戈贝蒂和《自由党革命》所进行的战斗的意义,深深

感到，必须对反法西斯主义进行全面的革新，才能通过长期的理论研究和组织准备工作建立起一支能够同法西斯主义进行战斗并战而胜之的有效力量。

面对着这种混浊不清的批判性修正运动，共产党通过新的领导集团的艰难形成以及为使党摆脱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而进行的反对波尔迪加的斗争，正在实现深刻的革新。然而，与阿文汀派各党不同的是，这一革新进程是在继承中实现的，是在已经得到巩固、开始半合法活动，并同共产国际保持有机关系的那个组织当中进行的。共产党为确立自己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领导权而进行努力的最初时刻恰恰应当由此算起。

1925年，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还未从其内部的痛苦经历当中摆脱出来，但面对着社会党、团结社会党和共和党所发生的危机，它已确定了自己的政治行动。在上述三个党的内部，在对失败原因进行批判性探讨的基础上，其骨干集团开始向左转。意大利的共产党向这些力量指出了组成统一阵线和工农委员会的问题，尽管这些力量还很弱小，但可以把它们看作是更广泛进程的最初萌芽和新型政治组织的基础。政治对话当时已变得很具体，而且快要与戈贝蒂、卢苏、米廖利碰头了。这一对话是由葛兰西进行的，目的是为了便于统一进程的发展，但是他没有作任何让步，以免使统一阵线丧失其工农特性，从而变为一种空泛的反法西斯联盟。

1925年6月，意大利的共产党向这些声称代表劳动阶级的政党提出建议，要它们注意到阿文汀派已告失败，并且建议在下述三点基础上确定一项共同行动计划，即：一、工人控制工厂；二、给农民土地；三、为建立一个以工农委员会为基础、把一切反法西斯和反君主制的人民力量组织起来的共和制议会而斗争。阿文汀派左翼各党对此作出了否定的回答。意大利的共产党事先已预料到这一点，它这样做是想向这几个党内部正在寻找新道路的团体，特

别是那些青年团体作出愿意实现团结的积极表示。当然，以工农委员会为基础的共和制议会的方案是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而且在以后几年中它也绝非偶然地在共产党内部引起了争论：一些人强调其阶级特性，把它作为接近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同义语；另一些人则强调其作为过渡性民主目标的特性，认为它的目的是要最广泛地团结愿意为争取共和民主制而斗争的力量。

实际上，意大利的共产党关心的仅仅是来自下面的统一阵线，它的团结建议一直是为了加速两个社会党内部有分裂趋向的集团向左转移的进程。

不管怎样，看来这些老党在遭受打击之后已陷于瘫痪，无力进行任何革新的努力。因此，那些为革新而努力的集团便置身于党组织之外并凌驾其上。于是，人们就开始力求对这些反法西斯政党进行改组，寻求新的政治组织形式，企图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党，“新”的激进党或“新”的自由党；然而，这些尝试是在没有达成使内部分歧真正得到克服的思想和政治一致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些老党和新的反法西斯行动集团（其中绝大部分后来在某一时刻汇集到正义与自由组织中去了，随后又聚集在行动党的旗帜之下）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困难而混乱的，这种关系是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一直特有的那种不断分而又合、合而又分的根本原因所在。从长远看，老社会党由于得到劳动群众的坚定支持，其自身的强大是超过它的多次分裂和建立“新”社会党的尝试的。

99

从反法西斯运动在各党之间关系以及各党内部关系上所表现出的这种混乱的重新组合进程当中，虽然没有显示出人们有能力对失败的原因作出自我批评的解释，没有提出彻底的纲领主张，但却涌现出一些新的干部和新一代反法西斯战士，他们由于看到自己被要求¹在道义上和文化上负起责任来同法西斯政权作坚持不

渝的斗争，因而能领悟到反法西斯斗争的失败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就当时来说，这只是涉及到人数不多的、孤立的若干反法西斯团体的半地下活动，但其重要意义却为事实所证明，即：正是在这一活动中，一些青年人得以茁壮成长，后来变成了抵抗运动的主角和共和国的缔造者。

在这一批判性的修正和反法西斯力量革新的进程中，意大利的共产党开始赢得权威，并且很快就成了所有打算继续进行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人们必不可少的支柱和对话者。

七、里昂代表大会

共产政策的力量来自对法西斯主义的阶级性的揭露，而其弱点仍在于它提出民主目标所用的那种模棱两可、混淆不清的方式。然而，意大利的共产党的进步已表现在它这时提出了它以前曾拒绝过的中间性目标，而且这些目标还为党内多数人所接受。而这一点之所以成为可能，正是因为提出的这些中间性民主目标不会与阿文汀联盟各党提出的“恢复”民主的目标混为一谈。

工农委员会是作为组织统一阵线的工具以及发展国内（反法西斯斗争工农委员会）和工厂内（鼓动委员会和保卫工会委员会）统一运动的基础而提出的。对社会党的论战仍然十分激烈和严厉，甚至进而断言，在总的历史前景中，社会党人将变成法西斯主义的左翼。但是，对社会党的论战是根据一种不同的政治判断展开的，因为它并没有否认应寻找资产阶级各派之间存在的矛盾和政治分歧，并且提出了一个从基层进行统一动员的纲领。这已不再仅仅是一个出于明显的论战意图、主要是为了向群众“揭露”社会党头目们的嘴脸的上层统一建议了，而是成了一个接近社会党劳动群众和反法西斯劳动群众基层以便从基层建立统一运动的自觉行

动。在阿文汀派失败所引起的方针上的危机当中，共产党所采取的如此广泛、如此不同的行动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1925年，群众的统一行动日益发展。共产党人在菲亚特工厂厂内委员会选举中赢得了多数。为庆祝五一节，举行了意义重大的示威斗争。为《团结报》开展的募捐活动在非共产党劳动群众中也得到了响应。党员人数达到了2.5万。具有战斗精神的分子脱离了阿文汀派的左翼，力求与共产党进行政治接触。在此基础上，党的领导向戈贝蒂和最有战斗力的反法西斯分子、向米廖利和天主教农民运动、卢苏和撒丁联邦运动展开了多种多样的统一行动。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标志着向左的转折，修正了上一次代表大会中确定的路线。主要是由于内部的争论（由于德国共产党内部斗争与俄国共产党内部斗争交织在一起，也由于季诺维也夫在列宁去世之后企图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确立他自己在国际场所的领导作用），第五次代表大会强行提出了新的革命危机的前景。因此，对社会民主党的批评变得更为激烈了，指责它是法西斯主义的左翼，并提出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同义语的工农政府的口号。尽管发生了这种向左的转变，波尔迪加仍旧强调他的反对意见并且向托洛茨基的立场靠拢。意大利的共产党新的领导集团仍然反对向社会党接近并与之合并的政策，它从这场加剧了的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中得到了好处，加强了它反对社会党的论战。在这种条件下，葛兰西为意大利的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做了准备，为把那些以前站在波尔迪加立场上的同志一个个争取过来进行了艰难的斗争。这是在绝不轻易采取纪律措施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场典型的政治斗争。甚至当波尔迪加顽固地拒绝接受交给他的工作、拒不接受共产国际副主席的任命而去组织具有公开分裂特点的“谅解委员会”时，葛兰西仍只是揭露这种态度，以便说服尚在犹豫不定的同志不要参加任何分裂活动，而避免采取纪律措施。

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26年1月在里昂举行，它是在半地下的情况下筹备的。陶里亚蒂1925年4月3日被捕，一直关押到7月25日。几天后，特拉齐尼被捕，并坐了6个月的监牢。这类逮捕打击了党的所有组织，使工作变得极为困难。尽管如此，大会的活动仍是极为严肃认真的，对三年来的政治活动和组织工作进行了总结。

大会的提纲对意大利的现实作了历史的研究，对意大利资本主义作出了判断，揭露了法西斯主义作为企图把国家所有财富控制权集中在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农业寡头政治的工具的阶级性。法西斯主义代表着工农业领导阶级的帝国主义倾向。但是，法西斯主义在加紧剥削和压迫的同时，也使矛盾增多，加速了群众的激进化，为爆发新的革命准备了条件。革命进程的发展取决于革命的两个动力，第一个是工人阶级和农业无产阶级，第二个是南部和岛屿的农民以及意大利其他地区的农民。把这些革命的动力组织起来，就应当意味着使这些群众摆脱“自封的”民主党派、尤其是社会党的影响。但这应当以发展统一阵线为基础，把统一阵线组织在工农委员会中，以便实现眼前的要求和中间性目标，如在工农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共和制议会。

里昂代表大会结束了建立意大利的共产党这一长期痛苦历程。会上通过的提纲为党提供了一个行动和斗争纲领。纲领在一些问题上还保留错误观点和教条主义的僵化，如在对其他政治力量、尤其是对社会党人的判断方面，在指出法西斯主义与民主制之间在反革命任务上的所谓分工方面，在把中间性政治目标仅作为一种手段方面，在不能始终如一地把争取民主的斗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联系在一起方面，都是如此；这种情况并不是为了满足内部的策略需要，促使以前站在波尔迪加一边的干部转到共产国际的立场上来，而是因为党在其发展的那一阶段必须提出一条有

别于右派的路线，以免被卷入民主联盟的营垒，并确立自己的自主地位。1921年，意大利的共产党曾批评社会党不善于将革命形势变为一场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尽管当时这样做是别有用意的，但这却有助于使意大利的共产党摆脱本来不属于它的失败责任，而1926年的里昂提纲也同那时一样，是为了把意大利的共产党可以认为不属于它的失败责任再次推到阿文汀派各党的身上，尽管意大利的共产党也为这一失败付出了代价。

第三次代表大会选出了中央委员会，鉴于该委员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现将其成员开列如下：葛兰西、斯科奇马罗、陶里亚蒂、格列科、卡米拉·拉维拉、拉瓦佐利、莱奥内蒂、特拉齐尼、塔斯卡、塞拉蒂、杰纳里、马菲、佛莱基亚、切里亚纳、纽迪、奥贝蒂、韦内戈尼、波尔迪加、巴尼奥拉蒂，阿莱加托和的里雅斯特的一名工人。候补委员是：特雷索、罗韦达、泰雷萨·雷基亚和阿扎里奥。指导委员会（政治局）由葛兰西、斯科奇马罗、陶里亚蒂、特拉齐尼和格列科组成。在里昂选出的领导集团的命运是悲剧性的。仅仅一年之后，就有半数的中央委员落入了法西斯警察的魔掌。

里昂代表大会结束了建党、探讨制定一项纲领和建立党的团结的阶段。在里昂代表大会之后，意大利的共产党便能够走自己的道路，发展自己的政策了，它有能力应付地下活动的严峻考验并为此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在里昂代表大会之后，意大利的共产党在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尖锐的政治斗争的基础上，建立起围绕在葛兰西周围的团结一致的领导集团。因此，可以说意大利的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是真正的建党大会。传奇式的宣传把葛兰西和陶里亚蒂说成是党的“缔造者”的那种说法，可以在里昂代表大会在意大利共产党历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这一点上找到解释，如果不是理由的话。

103

第五章 法西斯政权的建立

一、国家的改革

104 1926年初，墨索里尼在击败反对派后，打算巩固其胜利成果，为建立政权奠定牢固基础。他不想坐失时机，这也是因为里拉不断贬值所引起的经济困难在日益加剧，里拉贬值使英镑比价上升到150里拉，这导致生活费用上涨，激起人民广泛、强烈的不满。阿文汀派失败和解散后出现的这种在新的基础上把反对派重新组织起来的迹象虽然还很微弱，却使当时对于哪怕是处于萌芽状态的政治运动也仍然十分注意的墨索里尼感到，不能丧失时机，而要尽快在权力集中和更彻底地确立权威的等级原则的基础上实现体制改革，建立一个组织上强大的政权，以此来阻止可能出现的反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再度高涨。

墨索里尼企图通过加强国家权威、进而加强其个人权力来克服1924年和1925年聚集在法西斯主义周围并使法西斯主义免遭垮台的那些势力之间存在的冲突。这些五花八门的势力现在都在竭力按照自己的需要对政府施加影响，力图把它导入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向。在1924年和马泰奥蒂危机期间尚属有效的那种把“追随者”与法西斯分子从形式上区分开来的做法，这时已失去了它的意义，因为通过新的、肆无忌惮的玩弄随风使舵手法的阴谋活动，大部分“追随者”（自由党人和有民族倾向的教权派人士）甚至在形式上105上也转而加入到法西斯党的队伍当中。来自自由民主派的玩弄随风使舵手法的老手、众议院议长安东尼奥·卡塞尔塔诺加入国家

法西斯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工业联合会主席斯特法诺·贝尼和吉诺·奥利韦蒂加入国家法西斯党，这意味着意大利金融资本的领导集团最终从形式上也与法西斯政权同流合污了。

这样，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斗争就转移到法西斯党内部，并逐渐形成了两大派别。一派是保守派，在政府内他们以民族主义者集团（内政部长费代尔佐尼和司法部长罗科）、金融界领导人（财政部长沃尔皮·迪·米苏拉塔和工业部长贝卢佐）以及军界各个部长为首。另一派则是极端派，他们以党的书记、最死硬最残暴的一翼的首领法里纳奇为首，主张必须掀起“第二次浪潮”，以便使政权免遭因保守力量的拥抱而窒息的危险。

在危机关头，墨索里尼曾不得不对两个派系各作让步，把内政部让给了费代尔佐尼，并在1月3日讲话的第二天就把法里纳奇调到党的书记处。“正常化”的许诺和暴力的讹诈是墨索里尼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惯用伎俩。墨索里尼力图在争夺国家领导权的两个势力集团之间确立自己的个人作用，这种作用实质上是调解作用，尽管为一种专制态度所掩盖。一方面是君主制，包括军队、上层官僚机构、司法部门和控制着银行与大工业的金融资本。在这一势力背后还有梵蒂冈，它正在为在适当时机缔结和解条约准备条件。另一方面是党的组织和工会组织，它们掌握着平民小资产阶级的基本群众，并在施加压力，以图随着国家的法西斯化使党和工会正式渗入到国家中去，成为国家的主要结构。1925年和1926年在法西斯报刊上展开的极为激烈的论战就表明，政权内部存在着一道永远无法弥合的裂痕，这条裂痕的深度，在很久以后，即1943年7月，就暴露无遗了。

费代尔佐尼打算把作为政治组织的法西斯党彻底铲除，把其组织力量并入国家机关，而法里纳奇则企图把党变成国家的基础结构。他们之间的斗争表明了葛兰西在1926年8月11日向党的中

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的法西斯主义的两个矛盾：地主与工业家之间的矛盾和小资产阶级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葛兰西认为，法西斯主义远不是一个利益一致的集团，而是一个由不同社会力量组成的集团，在这个集团内，“企图使国家的所有生产力都为自己效劳”的金融资本占居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墨索里尼竭力避免被这些矛盾碾成齑粉，甚至企图重新确立他作为该集团的团结保障的个人领导作用，这个集团曾克服过战后的社会危机并击退了1924年的反法西斯活动。

先后成立了两个都是由乔瓦尼·詹蒂莱领导的国家改革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的工作都指出了恢复专制以建立一个确保执行机构占主要地位的强大国家的方针。因此，执行机构首脑就变为政府首脑，其作用，亦即墨索里尼的作用就大大抬高了，只有君主的权力才能使他的权力受到制约。1928年12月通过的有关法西斯大议会的建制和职能的法律（这个大议会要成为“国家立宪机构”，甚至有权研究王室继承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似乎表明前几年多次提出的一切权力归法西斯的目标已经达到了。然而，两巨头共掌大权的体制始终没有真正消失，而君主政体后来到1943年仍然表明它是善于保住权力的某些主要杠杆的。

这主要是政治问题，而不是体制和司法问题。墨索里尼的权力后来时强时弱就取决于他政治行动顺手与否。1926年，墨索里尼表明他能够将所有大权集于一身。在1926年至1927年一年之内，墨索里尼成功地削弱了费代尔佐尼的地位，在波尼亚案件后把他调离内政部，贬为众议院议长；并削弱了法里纳奇的地位，用奥古斯多·屠拉梯取代了他对党的领导。阿尔弗雷多·罗科则留在政
107 府内，他通过对法典的改革建立了镇压性国家的专制结构；直到今天，尽管制定了宪法，这种结构仍在很大程度上抗拒着政治社会变革所施加的压力。

二、里拉的升值

当时法西斯政权面临的最困难的考验就是经济问题。1926年，通货膨胀加剧。实际上，这是整个欧洲的现象，但是在意大利，它却变得更加无法控制。即使求助于美国贷款，即使沃尔皮·迪·米苏拉塔十分有效地结清了与英美两国的战争债务，并严格保持住由此而实现的国家预算平衡，也未能阻止英镑于1926年7月28日达到1:153里拉的比值。当时必须使通货膨胀切实稳定下来。最强大的金融集团并不反对有限的、得到控制的通货紧缩，因为这有利于资本的积聚和集中，淘汰那些在前几年经济扩展、通货膨胀的易于应付的气氛下发展起来的最弱小的企业。沃尔皮·迪·米苏拉塔和最强大的金融集团赞同把比值稳定在1:120的水平。而墨索里尼由于三个主要原因却想走得更远，企图达到1:90的比值。他企图使里拉恢复到1922年10月份的汇率，以便不让人说什么是法西斯主义使里拉贬值。他企图使里拉恢复与法郎的等值，以便不让人说什么民主的法国在保卫货币价值方面比法西斯的意大利要更胜一筹。最后，面对着沃尔皮和贝卢佐等这些代表银行和工业界、企图控制政府经济活动的人，他想在这方面也确立起他自己的最高地位。

为了恢复里拉与英镑 90:1 的比值，法西斯政府进行了长期而艰难的努力。这种努力实际上一直持续到 1927 年 12 月 21 日，当时通过的一项法案决定，100 里拉可兑换 7.911 克黄金，等于 92.48 里拉可换 1 英镑。因此，1926 年 8 月 18 日墨索里尼在佩萨罗的讲话^①意味的不是里拉的立即升值，而是长期痛苦的通货紧缩进程

^① 墨索里尼在这次讲话中强调要保卫意大利里拉“直到最后一息”。——译者

的开始,这一进程到1927年底才告结束,使意大利劳动阶级作出了
108 巨大牺牲。通货紧缩给劳动群众带来的负担是沉重的:劳动日从
8小时增加到9小时;工资减少10%;租税增加;农业爆发危机:
“谷物之战”开始时本来颇有希望,但到1927年就骤然中断了。

在这种形势下,那些曾在1925年接受了维多尼宫条约和工会法、承认了法西斯工会的垄断地位并于1926年初正式授与自己的组织以法西斯称号的工业家们,便作为支持法西斯政权的交换条件,要求法西斯工会应受到严格的约束和控制,放弃在工厂实现劳动者权利平等的奢求。在工厂,权威原则不应受到限制,因为这会损害工业家们所谓的行动自由和企业指挥权,也就是说厂主意志的优先地位。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1927年4月21日由大议会通过的劳动宪章的起草工作,在以工业联合会为一方、法西斯工会为另一方的你争我夺当中进行得极为艰难。宪章第一稿由劳资合作部副部长博塔伊起草,罗科从法律角度进行了重新删改,限制了法西斯工会的权利;随后墨索里尼又进行了最后修改和充实,他也想借此机会确立自己的调解作用,以免遭到法西斯工会的群起攻击。实际上,经过长期争议炮制而成的劳动宪章,为行会式国家奠定了基础,在这种行会式的国家内,法西斯工会后来发生分化,与之平行的“招工者”与“工作出借者”组织同法西斯工会分庭抗礼,这些都实际上为企业家们在为祖国最高利益而协调阶级利益的借口下实现自己的统治提供了广泛活动余地。

旧的法西斯工团主义提出发挥阶级的,甚至是革命的作用的要求,已被劳资合作部彻底压制下去了。工会已经官僚化,被纳入政权的机构当中;它屈从于由上面指定其领导人的等级原则,开始越来越成为行会式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

109 与此同时,国家法西斯党新任书记奥古斯托·屠拉梯也在进行

紧张的组织工作，以图从数量上扩大党的基础，把尽可能多的市民甚至强制性地拉入党内，重新调整各级组织，减少乃至消除党内尚且残存的不同观点和强硬态度，从而加强党的组织，使之成为法西斯国家的一个工具。通过这一行动，党的官僚化逐渐完成，而且这种官僚化后来在斯塔拉切主持书记处期间得到了更明显的体现。

通过控制、人事安排以及讹诈、贿赂等一系列紧张活动，工会中最强硬的一翼与持不同政见的法西斯分子联合起来的危险，总算避免了，但是，这些活动却播下了失望和愤怒的种子，使政权的机体在以后受到了污染。但是不论如何，在各个方面同时展开的这一行动之后，法西斯主义毕竟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体制，实现了在墨索里尼直接控制下的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联盟，一个成分庞杂的组织终于把这些社会力量撮合在一起了。

法西斯主义从上台之日起就曾表示要调整国家与教会的关系，这时实现这一巨大计划也畅通无阻了。墨索里尼在良好时机（如拯救梵蒂冈金融中心——罗马银行）适时发出一连串信息，以此向庇护十一世表示了他的这种意向。梵蒂冈也发出了明确的信号，赞同把有民族倾向的教权人士纳入政权范围，并通过迫使斯图尔佐流亡而加快了人民党的瓦解。

1929年2月11日随普拉特兰条约的签署而实现的和解，固然110使梵蒂冈和教会上层在意大利国家生活中获得了重要地位，从而使国家生活的世俗性受到严重损害，但就当时来说，它也毕竟是法西斯主义在政治上和精神上的一大成功。这一和解被法西斯宣传为教会对政权的郑重承认，而且有利于巩固聚集在法西斯主义周围的各种社会力量的团结。墨索里尼被庇护十一世称为“神圣的天意派来的人”，因而在意大利人民的心目中变得日益高大，成了必将把国家引向更加宏伟的前程的“领袖”。

1929年的大选被公然装扮成一种公民投票性质的征询民意，

选民们被召来通过法西斯大议会指定的“议员名单”。然而，选举虽然是在司空见惯的暴力和恐吓条件下举行的，但还是表明：法西斯政权在那几年当中已赢得了广泛的支持，而任何有组织的反对派则已不复存在。各统治阶级尽管一直派系林立，不断冲突，但它们却都把法西斯政权看成是它们实行阶级统治的工具。中小阶级尽管受到新经济困难的打击，但也接受了这一政权，因为这一政权为他们的最无所顾忌、最能钻营取巧的子女打开了在社会和政治上晋升发迹之路。工人阶级和农民一时还无法找到奋起斗争的道路，不得不忍受这一政权的重压。他们在忍受，但却没有让法西斯政权把他们争夺过去。后来，他们成为沉默的，但也是永久的反对派，而这个反对派也成为使法西斯政权长期无所作为的一个负担。

三、共产党 1926 年 8 月的中央委员会

里拉贬值带来的经济困难引起了共产党的关注。早在 1926 年，人们就已看到，努力研究经济形势发展问题的共产党人的态度不同于其他反法西斯集团的态度，尤其是不同于曾参加阿文汀联盟的那些集团的态度，这些集团陷于土崩瓦解的深刻危机，前途未卜，只能求助于大吵大闹的宣传运动，说什么法西斯政权因沉重的经济困难和内部冲突而日益濒于崩溃。

共产国际内部进行的讨论也推动意大利的共产党去研究经济形势。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体会议上（1926 年 2 月 17 日到 3 月 15 日），人们公开讨论了资本主义相对稳定和新的革命浪潮可能在西欧酝酿成熟的问题。这一问题甚至变成了一场争论的中心，这场争论把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推上了反对以斯大林为首的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并与之决裂的道路。季诺维也夫作出的

革命形势即将重新高涨的预见，以更为隐蔽的形式重新提出了托洛茨基早已提出的论点，即在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方没有展开的情况下，不能在苏联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相反，斯大林和布哈林则表示不相信革命的高涨已迫在眉睫，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巩固苏联工农联盟的必要性，把它作为在受到资本主义包围的单一国家内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

波尔迪加同托洛茨基曾保持着包括个人关系在内的直接接触，他拾起并发展了托洛茨基的观点。他的这一立场加剧了他与代表里昂代表大会，亦即代表中央委员会大多数的意大利代表团大多数人的冲突。

其实，意大利里拉贬值带来的困难似乎证实了资本主义稳定性面临危机的判断。

1923年和1924年在阿尔贝托·德斯特法尼自由主义路线推动下出现的轰动一时的生产大发展，到1925年下半年已进入危机。以沃尔皮·迪·米苏拉塔取代德斯特法尼，标志着法西斯经济政策从自由主义的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实现了国家对金融资本领导集团活动的有机干预，而且为干预经济生活而重新评价并加强了政府掌握的一切手段，首先是由尼蒂提出的资助工业证券康采恩，它是后来形成的国家工业的第一个核心。

经济大繁荣由于大量较小的银行机构，尤其是许多民间储蓄银行在资本集中过程中相继破产，转而成为危机。农业税的增加、因“谷物之战”而征收的谷物税、就业减少的初步征兆以及失业率的长期居高不下，所有这些都使劳动阶级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更加令人难以忍受。通货紧缩的急剧转折导致了出口的减少、货币流通的阻塞、信贷的紧缩和工业的日益集中。

通过“鼓动委员会”（它们是共产党人发起组织的，往往只由身为党员或党的同情者的工人组成）在主要大工厂立足的共产党感

112

到人们的不满日益增长,但是它从这里得出了过分激进的结论(当时采用的方法后来成为共产党人一直难以克服的方法)。葛兰西在1926年8月11日中央委员会上说,“经济总危机是政治危机的决定性因素”。

在共产党人看来,也是由于法西斯政府实行的政策,经济危机在使劳动者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日趋恶化的同时,“不能不激起群众的更大反应,使他们转而采取越来越坚决的斗争形式”。葛兰西十分尖锐地指出了法西斯政权的矛盾和“强硬的法西斯主义”在大资本和小资产阶级之间展开的阶级冲突中的软弱性。然而,共产党却没有注意到墨索里尼当时所进行的如下工作的重要性:这项工作的目的在于要建立一个能够把各种矛盾限制在其自身结构之中的政权,因为这些矛盾正在使那些庞杂的,然而却一致接受专制约束性政权的社会力量所组成的集团陷于四分五裂。后来,就连法西斯国家的强制性约束也无法承受这些内部矛盾的冲击了,不过,这需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经过不同阶段,最后还需要有来自军事失败和对意大利的占领的压力。目前出现的仅仅是导致很久以后发生的那一分裂的前提罢了。

但是,共产党领导集团和葛兰西本人(在他8月11日的报告中)却认为,经济危机可能会迅速发展,而且不久就会转变为政治危机。在提出一种原则性见解——在政治上,无产阶级专政可能将取代法西斯主义——之后,葛兰西指出了一种“民主中间阶段”的可能性,设想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在这个政府内,像乔利蒂、奥兰多、迪切萨罗、德加斯佩里这样的人应当以自己的经验和权威作出贡献。也就是说,据葛兰西推测,在危机的压力下,追随法西斯主义的自由党分子将会脱离法西斯主义,与阿文汀旧联盟的右翼合为一体,在国王和军队的必要支持下建立一个保守政府。但是,葛

113 兰西也没有忽视另一种假设,即:在经济危机迅雷不及掩耳地猝然

而至的情况下，得到一部分军队、国家官员和民兵支持的“共和联盟”将上台掌权，因为它“能够遏制革命”。在“民主中间阶段”的设想被确认后，共产党人的努力应当是使这个中间阶段尽可能缩短。这就要求进行斗争，反对那些能够组成民主联盟的政党。这一斗争的矛头自然要指向社会党人，因为他们是“使群众变为一盘散沙、迷失方向的一种消极因素，这种因素应当铲除干净”，“使之从舞台上消失”。

经济政治危机当时的确存在，但是，它还在墨索里尼的控制之下，而且墨索里尼利用危机的势头加强了镇压性政权。他不但没有被资产阶级势力所抛弃，反而成功地把这些势力牢牢控制在一个新的政权组织之中。为了使群众的不满不致妨碍正在进行的使里拉升值的努力，他准备把螺丝拧得更紧。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作为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的陶里亚蒂比在意大利国内的同志们看得更清楚些，他在10月27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墨索里尼有一个计划，这就是大肆加强恐怖政权。仅仅时过三天，这一计划就在10月31日事件之后付诸实施了。

四、波洛尼亚谋杀事件和葛兰西被捕

几次谋杀墨索里尼的事件，直到大约50年后，始终仍是一个谜。1925年11月4日扎尼博尼第一次行刺早已受到警察的严密监视，这一行动为政府解散屠拉梯的团结社会党提供了借口。英国吉布森夫人1926年4月6日进行的谋杀也是令人迷惑不解的，因为由一个疾病缠身的妇女单枪匹马地作出这一举动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无论如何应当有指使者和组织者，只是人们没有找到他们的线索罢了。如果说无政府主义者卢切蒂行刺可能确实是出自某一政治动机，那么到底谁是青年人安泰奥。赞博尼在波洛尼亚

进行的谋杀案的策划者和组织者，至今仍是极为暧昧不明的。当时不可能没有策划者和组织者，而且是他们鼓动这个反法西斯青年采取行动并作出牺牲的。年轻的赞博尼立即遭到杀害，无法出来讲话了。这一案件的组织者固然就在持不同政见的法西斯分子中间，但是，能透露出幕后背景的人却被封住了嘴。随后不久行动队发动的暴力行动一直使人推测：是那些强硬派的法西斯分子企图寻找机会使党恢复作用。几个小时之内，行动队果然采取行动，进行野蛮残酷的袭击。

法律上的镇压也随之展开。在几天之内，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所谓“非常”措施，取消了当时残存的集会结社自由；取缔了所有申明反对法西斯政权的政党、协会和组织；设立了警察拘留所，政治审查机构；制定了对政治犯判处死刑的刑律。各党总部均被占领，反法西斯报纸被停刊。在整个意大利，有几千人被逮捕，几百人被立即押往流放地，此外还有几千人受到警告处置。几百人被关入监狱，坐等当时尚在筹建中的特别法庭对他们进行追究既往的审讯。与此同时，各反法西斯政党数以千计的骨干分子虽然护照被吊销和审查，却成功地逃到国外。

共产党遭到了异常沉重的打击。11月8日晚，当日下午曾在蒙特齐托里奥宫举行共产党众议员会议的安东尼奥·葛兰西在罗马被捕。所有其他共产党议员也都被捕，只有格列科、本迪尼和杰纳里躲过了搜捕。与此同时，有许多同志在党的活动中心被捕，其中包括毛罗·斯科奇马罗。特拉齐尼当时早已身陷囹圄。因此，葛兰西、斯科奇马罗、特拉齐尼都落入敌人的手中。

一个已经在半地下条件中进行活动的党，怎么竟能够毫无准备，让这场风暴搞得措手不及呢？原因是多样的。党作出的政治预测是，在君主制的支持下，危机很有可能通过保守性的民主—自由式的办法加以解决，甚至没有排除民主—共和式的解决办法。

这种政治预测对应付非法性的组织准备工作不能不产生消极影响。政治局的同志们对葛兰西早已受到的严密警察监视感到担¹¹⁵心。在8月份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曾提出让葛兰西离开意大利的问题，并决定在瑞士建立一个由葛兰西和卡米拉·拉维拉组成的、与国内中心保持密切联系的国外中心。此外，当时还采取了一系列组织措施（联络、地址、地下印刷设备、技术处）来保证党在全面转入地下时的活动。9月12日特拉齐尼被捕和某些地下机关同志落入敌手表明，绳扣正在收紧，而且将在适当的时候拉动。

然而，国外局的技术性非法组织工作在9月和10月份一直拖拖拉拉进展缓慢。直到10月24日，葛兰西在罗马莫尔加尼大街的房间遭到警察搜查。只是到了这个时候，葛兰西才表示愿意转移到瑞士去，在那里进行党的领导工作。但是他还没有完全相信这一措施的正确性。他认为，只要有可能，领导人就应当留在意大利，留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以免脱离党的实际和意大利社会的实际。因此，在10月24日搜查之后，他在11月1—4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结束时，又推迟了前往瑞士的行期。他本想到达秘密开会地点，然后非法越过边界。这次推迟是致命的。

葛兰西执意要参加中央委员会会议，因为会上将研究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对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党内政治斗争作出估价的问题。这种关系已达到困难的地步，而且可以说“俄国问题”在10月的那几个星期里引起了葛兰西的特别关注，并且分散了他对意大利国内形势尖锐化带来的问题的注意力。在半地下状态的最后几个星期里，葛兰西和政治局同志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苏联共产党当时的内部情况。以斯大林为首的中央多数派与左翼反对派之间的冲突，在那几个月内有了剧烈的发展。《新闻报》、《世界报》和《共¹¹⁶和之声》报所参加的报刊宣传运动，企图把正在苏联进行的那场斗争的发展说成是社会主义的破产，是通过农业改革重新转向资

本主义的证明，而国家社会主义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手段。

葛兰西感到了这场论战的危险性，直接在《团结报》上作出了回答。他驳斥了上述那些论点，肯定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奉行的路线的有效性，并确认了在一个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与农民结成联盟来完成这一事业的必要性。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内部的冲突以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投降而告结束，他们10月4日在政治局提出停战建议，这本身就意味着他们开始退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求反对派分子作更加广泛的自我批评，承认他们违反了苏联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既定方针。反对派屈服了。《真理报》10月16日发表了他们按中央委员会的要求所作的自我批评声明。

苏联共产党内政治斗争的发展，尤其是这场斗争中使用的方法，使葛兰西和在政治局讨论“俄国问题”的意大利领导人十分担心，他们委托葛兰西给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写信，阐明意大利的共产党的意见。葛兰西的信是在反对派签署投降书之前、也许是在10月14日拟就的。他的信虽表示同意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奉行的政治路线，承认这场危机的主要责任在于反对派，但并没有排除多数派对于在同反对派的斗争中使用的方法也应承担一部分责任。因此，葛兰西的信自然使共产国际（其中包括布哈林）和苏联共产党（斯大林）的领导同志感到不悦。实际上，反对派的投降仅仅是这场斗争的一个暂时休战，斗争是注定要加剧的。

117 葛兰西要求“非机械的、非强制性的团结和纪律”，呼吁要“正直”，实际上是对苏联共产党采用的方法含蓄地表示了某种批评，也就是说指责斯大林使用不“正直”的手法，企图强行实现一种更多地不是建立在思想一致而是建立在纪律基础之上的机械团结。

陶里亚蒂10月18日收到了葛兰西的信，并在同布哈林商议之后立即作了答复。他要同志们“静下心来”，并把苏联共产党中央

委员会实行的路线的正确性问题放在首位。如果这条路线是正确的，那么就必须善于作出选择，站在正确的一边。这一问题是严重的，而且共产国际已决定把对意大利的共产党了如指掌的瑞士共产党员朱尔斯·亨伯特·德罗兹派往意大利，以便参加意大利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对苏联共产党内部冲突的发展情况予以必要的说明。派出亨伯特·德罗兹的消息和必须为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秘密会议进行准备，使葛兰西和他的合作者在暴风雨前相对平静的最后那几天不得不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

葛兰西10月28日复信，肯定了自己的立场，并反驳了陶里亚蒂的论据。10月29日，亨伯特·德罗兹抵达热那亚。据卡米拉·拉维拉回忆，10月31日是同志们聚会的那一天，也是波洛尼亚事件发生的日子。葛兰西没有到会，中央委员会其他许多委员也未出席。会议持续了两天，是在紧张的形势下举行的。当时大家为许多同志未能到会和开始传来的镇压消息而感到不安。格列科的报告保持了葛兰西主张的立场，但对此并未再三强调，因而使这种立场受到削弱。同时报告确认赞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执行的政治路线。意大利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后同意正式收回政治局发给苏联共产党的那封信件，亦即批准陶里亚蒂不把它转交给苏联共产党。

许多人都想强调葛兰西和陶里亚蒂之间存在的这一冲突的意义，这一冲突由于葛兰西的被捕和无法继续展开讨论而骤然中止。其实，一个领导集团在其活动中有时不能不就某些问题展开争论，¹¹⁸甚至发生冲突，这些争论和冲突，一般只有在继续展开辩论、澄清事实、尤其是在取得新的经验和必须掀开新的一页的情况下才能消除。实际上，政治局中那些曾经支持葛兰西并通过了他致陶里亚蒂的信的同志们，后来都毫无困难地减弱并撤回了自己的保留意见。相反，人们对于这场争论的实际后果却不够重视。

为了同苏联共产党进行讨论并就此举行中央委员会会议，意大利的共产党付出极高的代价。在急剧转折的前夕，意大利的共产党政治局同志们的主要注意力被吸引到“俄国问题”上，而没有集中到意大利经济政治形势发展的问题上。总之，人们感到在政治上措手不及，因为事态是朝着同“民主—自由的前景”所指出的方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的；而且在组织上也措手不及，因为敌人逮捕了葛兰西，使整个党群龙无首。当然，其他有关因素也起了作用：如葛兰西的个性、他对突然出头露面的厌恶、他对他个人的事情采取的满不在乎的态度以及他那种极为坚定的信念，即：一个领导人必须迎战属于他职责范围内的一切危险。

事情是这样的：葛兰西在1926年10月31日到达米兰之后，警察局便要求他返回罗马。为了不暴露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地点，葛兰西不得不遵从警察局的要求返回罗马。在那里，他仍住在莫尔加尼大街的寓所中，受到严密的监视。由卡米拉·拉维拉派去的女同志埃斯泰尔·赞博尼看到了他，但发现他已受到监视。11月8日下午，他前往议会出席议会党团最后一次会议。当时决定，由里博尔迪代表共产党人表明反对取消阿文汀派议员议会任职的法里纳奇法案和非常法的立场。实际上，共产党议员在11月8日还被排除在应取消资格的议员名单之外。但是，如果认为在那种情况下共产党议会党团还能继续展开活动，那是一种奇怪的、政治上错误的幻想。而实际上正是在11月8日下午，也是由于国王的一再坚持，共产党议员被列入应取消资格的议员名单之内。当天晚上，葛兰西便被捕入狱。他不得不呆在狱中，受到监管，一直到死。

促使党决定采取上述态度并且不愿从半地下状态转入绝对地下状态的，也包括这样一种信念，即：认为资产阶级政府为稳定局势而进行的任何尝试注定要失败，而且可以预见，将出现一个反

动和革命运动重新高涨这两种不同阶段交替出现的阶段，通过这种交替出现的阶段，资本主义总危机将表现出来，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条件也将趋于成熟。这是一个错误的预见，它低估了资本主义建立一个能在一定时期内(但这个时期不一定是短时间的)遏制其内部矛盾爆发的能力。

必须承认，当时预见的前景尽管是错误的，却具有巨大的动员力量。政治预见的错误再一次增强了活动能力。在镇压下遭受打击的骨干党员坦然地迎接了这场考验，他们确信：无产阶级革命条件“正在成熟”。但是，这一成熟期却持续了约20年之久，而且它导致的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而是反法西斯革命和“民主中间阶段”。但是，就连这一“中间阶段”也不是“短暂的”，何况其延续时间之长已使它失去了过渡性的特点。

共和国宪法已变成了行动基础，这种行动将通过对国家进行大多数人民所要求的民主和社会主义深刻变革，把国家导入社会主义的道路。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自1946年起便从共产党的战略中消失了。20年的时间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是漫长的，而且可以改变他的命运，但在一个国家的人民生活中却是短暂的，人民的历史在各个漫长的时期内缓缓而进，只有到了特定条件下才会飞跃发展。

有人虽然不断写信安慰家人，却并不幻想身陷囹圄之苦是短期的，这种人也许恰恰就是安东尼奥·葛兰西，他在那悲惨的日子里陷入悲观的思绪当中，但这并没有磨灭他意志上的乐观精神，也就是巨大的勇气和崇高的道德观，他正是以这种勇气和道德观与 120 狱吏、与折磨着他的病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留下了他最后的著作，这些著作今天不仅是共产党，而且也是意大利人民文化遗产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第六章 地下活动

一、非法状态中的共产党人

共产党人在非常法造成的严峻形势下提出的口号是：“一切照旧”。党遭到了打击，在中央，葛兰西、斯科奇马罗、特拉齐尼和其他一些中央委员会的同志都遭到逮捕；在基层，成百上千名共产党人被拘留、被投入监狱、被流放，或者经记录在案和受到警告之后获得释放。然而，党的中级组织当时却几乎完整无损，这个中级组织由已经转入非法状态的骨干分子组成，即：起协调各大区之间工作的作用的一些机构，它们是用数字代表的，以及分布在不同城市的各局领导人，当时党的领导机构划分为组织局、新闻宣传局、“军事局”、技术局。

躲过逮捕的同志积极进行了重新建立组织的活动。最初，连像格列科那样的一些同志对于能否在新条件下继续展开党的组织工作也表示过某些疑虑，但这种疑虑很快便烟消云散了。11月10日，未遭逮捕的领导人在米兰举行了会议，出席的有卡米拉·拉维拉、格列科、塔斯卡及其他同志。会上确定了一条斗争路线，这条斗争路线被概括为“共产党仍在意大利，并在继续进行斗争”这样一个口号，这一口号立即开始传播到各地。为实现进一步分散权力，
122 采取了一系列组织措施，并立即大力推进宣传活动，散发地下报刊，刷写标语，以便向劳动群众证明，党没有被摧垮，它仍巍然屹立，继续进行它的斗争，而没有逃往国外。

当然，这种斗争使党遭到一系列极其严酷的打击。到1926年

年底,当时15000名党员中有很多人被投入监狱。他们大多数都是因前几年展开活动而出名的共产党人。此外,有越来越多的党员在地下活动中倒了下去。后来,“照旧”继续党的活动的路线受到严厉的批评。人们承认,党没有及时看到1926年底发生的形势变化,即从半合法化过渡到绝对非法化。法西斯主义为了克服里拉贬值和通货紧缩所导致的政治经济困难,被迫撕下最后的合法面纱,对工人阶级展开了严酷进攻。这一事实促使党从政治上重新研究了形势,全面改变了自己的工作方法。随后,在1928年,所有同志——无论是像陶里亚蒂、格列科和拉维拉那样捍卫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路线的延续性的同志,还是像隆哥和谢嘉那样批评这一路线的同志(他们认为,必须摒弃可能在工人阶级面前模糊无产阶级专政目标的中间目标)——都同意这一批评意见。各方一致承认,党在非常法面前采取的“一切照旧”的态度是正确的,但同时也认为,必须更多地考虑这样一种事实的重要性,即:法西斯主义会有效地实行非常法,因为它有力量这样做。这就要求党必须中止“照旧”活动,改变工作方法,以便不致在短期内使可以动用的力量丧失殆尽。

今天,人们很容易看出,“一切照旧”的方针表明,党对非常法和国家结构本身出现的变化所导致的形势缺乏分析,当时法西斯党和国家已融为一体,金融资本的统治集团与国家之间已通过行会主义建立了新的有机关系。实质上指导党的工作的那种预见,即认为资本主义稳定性注定要破产、新的革命形势将迅速在欧洲臻至成熟,是错误的。但是,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这种预见的错误反而又一次表明是大有裨益的,因为它促使共产党展开活动,使党在那惊心动魄的几个月中一跃而获得了意大利反法西斯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正是在那时,共产党在劳动群众眼中成了不屈不挠、在逮捕和迫害面前无所畏惧,并且不惜任何牺牲继续“一切照旧”

地进行斗争的一支力量。

尽管共产党也为非常法所取缔，但它是唯一已经准备好自己的地下组织、拥有一批已经转入地下或随时准备转入地下的领导骨干的党。意大利的共产党是唯一事先部署了联络网、技术据点和非法住所的党，是唯一在11月初（11月10日在米兰）举行自己的领导机关即扩大到某些尚在活动中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书记处的会议的党。1926年秋和1927年冬，共产党的组织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宣传运动，散发《团结报》（15天一期）和其他各类地下刊物，包括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机关报《先锋》、《女同志》以及幽默刊物《红小鸡》等。甚至还散发了一份地下儿童报纸《无产阶级少年》。工厂地下报纸也是数量很多的。在这种着意显示出版大量地下报纸的能力，当中有某种大无畏的精神，因为这些报纸都具有极为激烈的、进攻性的、几乎是粗鲁的论战特点，这表现了共产主义先锋队的愤怒和斗争意志。这些材料的大部分都被警察局查抄了，警方发现了许多秘密纸张仓库和地下印刷所。正如谢嘉在1928年6月中央委员会一次发言中痛苦地指出的那样，到1927年6月，一张工厂报纸和地方报纸都没有了。

二、旧反法西斯主义运动的瓦解

124 党的地下报刊的散发和大批党员被捕证明，共产党依然存在，与此相对照，其他反法西斯政党陷入的瓦解和消极状态就显得尤为突出了。

在那急风暴雨的日子里，行动队的暴力行动横行无阻。反法西斯政党的所在地、1926年还在继续展开活动的为数不多的报纸编辑部纷纷被捣毁，最著名的反法西斯领导人的住宅，甚至像贝内代托·克罗切、罗伯托·布拉科这样的人物的寓所也遭到破坏。在

暴力的打击下，这些反法西斯政党的领导集团在一片混乱中瓦解：其中一部分人为逃避逮捕而流亡国外；另一部分则被逮捕、拘留、或年限不同地流放他乡。新会党和共和党的领导人以及与共济会有联系的人中间最显要的人物，其命运尤其如此。

在这种形势下，这些反法西斯左翼政党的领导集团没有能力、也没有可能来采取一种抗议性的政治态度。人们没有听说这些反法西斯政党的领导机关在11月的严峻日子里举行过什么会议。实际上他们是“尽可能保全性命”。那些使自己免于当即被捕的人，都躲在朋友们的家中，伺机流亡国外。应当考虑到，绝大部分反法西斯左翼政党的领导人都都是年迈的人，过去主要从事议会和记者活动。他们没有向非法状态过渡的任何思想准备。尤其是，这些党因遭到失败而情绪沮丧；它们不仅由于所受打击之严重，而且也由于无力理解意大利民主横遭摧残的原因而感到茫然，不知所措。1926年夏，不少人曾幻想经济危机将会转变为政治危机，从而带来一种温和的或是保守性的解决办法。因此，行动队10月31日的暴力行动和宣布实施非常法所带来的打击，产生了使人手足无措、无法作出任何迅速的政治反应的效果。

这种政治上消极、拒绝转入国内地下斗争战场的态度，其政治意义已被下述事实所证实，即：许多在1926年无力采取政治行动的反法西斯领导人，却在17年之后，于1943年12月9、10两天从容地过渡到非法状态。这证明，即使在组织方面和地下活动方面，起 125重要作用的也主要是政治前景、思想方针和自信心。1943年，非法状态是维持生存和坚持到胜利的条件，当时胜利已经临近；而在1926年，一个黑暗的时期才刚刚开始，谁也未能理解其原因，特别是未能预见其结局。

事实上，在旧日的阿文汀联盟当中，已经产生离异现象，而且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1943年。一方面，阿文汀左派的领导人被迫

开始移居国外，该派主要由意大利社会党（最高纲领派）、团结社会党（改良派）、自由党这三大政党以及自由民主党，和人民党最强硬的领导集团中的某些个别领袖组成。由于法西斯的镇压矛头除了针对共产党人以外，在11月份已开始指向以上这些政党，因而主要问题便是组织被通缉的领导人顺利向国外转移。为组织这一转移，决定留在意大利发展地下活动的反法西斯分子，如费卢乔·帕里、卡洛·罗塞利、山德罗·佩尔蒂尼、埃米利奥·卢苏等进行了最大的努力。筹划屠拉梯逃往科西嘉岛以及对这一事件的组织者进行的萨沃那审讯，就是采取大量行动使一批重要的反法西斯领导人逃往法国的活动中最广为人知的事件。在法国，成立了一个协调中心，后来被称为“反法西斯大同盟”。为躲避逮捕而被迫秘密逃到国外的山德罗·佩尔蒂尼，因一项重组社会党的使命以非法方式重返意大利；他遭到逮捕，并被特别法庭判处徒刑，随后在流放地一直囚禁到1943年8月初。

当时留在意大利的都是社会党、共和党的基层骨干以及大学中的反法西斯团体，这些团体中有许多是以皮耶罗·戈贝蒂的教导为指南的。他们决定不移往国外，而是试图以出版文学刊物等可能的合法手段以及通过地下活动的方式继续组织国内斗争。毫无疑问，这些党的基础在意大利保存下来。虽然有许多人处于绝对的消极状态，希望能够找到什么办法使人们忘掉他们的政治活动，从而躲过法西斯政权的迫害，但为数不少的另一些人，尤其是那些在自己职业方面有特别专长和才干的人，则投身于对青年人的道德和政治教育工作，传播一些陶冶人们思想的书籍。而这项工作后来恰恰成为那些非法组织的骨干分子得以层出不穷地产生
126 的一个源泉。

然而，人民党人和自由党人采取的态度则与此不同。他们反对组织非法活动的设想，打算在法西斯政权面前维持个人尊严，坚

持下去。对于那些拥有显要社会地位的人说来，这种态度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因为他们有财产、科学院院士头衔或大学职位）。但是对于那些经济拮据的人说来，这却意味着接受一种艰难的、备受屈辱和歧视的生活。也就是说这些党内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反对态度：一些最勇敢的核心力量在寻求地下活动的道路，而另一些集团却逆来顺受地容忍法西斯变更国家后所强制推行的新法制，这些集团在遭到法西斯镇压打击时毫无作为，但也不支持法西斯政权。

法西斯警察在展开镇压活动时采取因人而异的灵活手段助长了各党之间这种态度上的分歧。警察的打击对象主要是共产党的组织，因为认为它们是主要的对头。后来在警察局档案中重新找到的文件不仅对共产党当时的活动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说明，而且也证明共产党人当时被看作是经受一次次打击之后又顽强地重新展开斗争、从未被打垮、从未放弃自己事业的唯一力量。此外，法西斯警察局往往是善于使用各种武器的，从威逼恐吓到以饥饿相威胁，从以政治理由进行解雇到强迫流放（流放期的长短经过精心的研究，而且流放地点各异，有的在岛上，有的在内地），直至逮捕和投入监狱。

任命博基尼负责领导公共安全和组建“镇压反法西斯分子警惕委员会”——专门负责打击反法西斯活动的特别机关——说明当局采取了一条极端的全面镇压方针。法西斯政权建立了一个无孔不入的暗探网，力图以此来瓦解各种反法西斯运动，使反对派意志消沉下去，从而在人民群众当中散布一种普遍的不信任感，使人对反法西斯解放的即将到来失去任何信心。

因此，人们在地下小组的活动方面对其骨干分子的胆量固然感到敬佩，但也不无某种怜悯心理（可谁让你们这样干呢？），而且 127 人们一直担心，某些冒险行动，如散发传单、刷写标语、在工厂进行鼓动工作，可能会导致一连串的逮捕。所以，这些地下工作者并不

像后来在抵抗运动中那样如鱼得水，而是感到自己被一种担惊受怕的气氛所包围，这使他们彼此难于联系，很难找到可靠的地址和住所，即使接头会面也是来去匆匆，举行会议也是短而精。显然，在这种条件下进行的地下活动就连政治指导工作也是无法搞好的。

然而，在这种形势下意大利的共产党能够“留在意大利”，照旧开展宣传活动，这本身就使共产党人赢得了崇高的威望。此外，一些有关共产党人接连被捕入狱、受到特别法庭审判的传闻和法西斯报纸传播的消息也使意大利的共产党宣传活动的影 响得以扩大。

由意大利社会党、团结社会党、共和党及人权联盟组成的反法西斯大同盟在巴黎宣布成立和《自由报》的出版，标志着这些旧的反法西斯政党已经把它们 的领导中心移往国外，放弃了国内的活动。菲利波·屠拉梯声称，“在意大利已经无事可作”，此话在传到仍在国内积极从事活动的小型反法西斯团体那里之后，立即引起了强烈的谴责。实际上，屠拉梯的话代表着一条路线，这条路线主要是力图通过宣传来使外部了解法西斯政权的真实面目，以便使其在国外失去支持和同情，因为法西斯政权当时不仅在反动右派集团中，而且往往也在所谓民主派的那些人士中仍然得到这种支持和同情。

在总工会旧的改良主义领导人里戈拉和达拉戈纳通过发表一项实际上意味着支持法西斯政权的声明宣布总工会解散之后，斗争中心应当留在意大利还是应当移往国外的问 题便立即成为具有具体意义的问题。博齐在国外谴责了这种投降行为并以意大利冶金职工联合会书记的名义代表总工会要求保留其在阿姆斯特丹工
128 会国际中的成员地位。而意大利的共产党国内领导中心则根据卡米拉·拉维拉和保罗·拉瓦佐利的倡议采取了行动，召开了一次自然是秘密的工会会议，谴责里戈拉和达拉戈纳擅自作出的投降

决定,明确指出总工会打算仍然留在意大利,留在各个工厂和劳动场所。

这次会议是1927年2月20日在米兰举行的。各主要联合会的代表以及米兰、都灵、热那亚、的里雅斯特、波洛尼亚、维琴察、贝尔加摩、罗马、那不勒斯等地的市工会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宣布里戈拉—达拉戈纳集团擅自作出的解散总工会的决定无效,并要求恢复这个在国内处于地下状态的组织对整个工会运动的代表权。然而,博齐却力图要求总工会的一个国外局代表意大利的工会运动,而且这一要求为工会国际所接受,这就在意大利的共产党内部引起了关于是否应当求助于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激烈争论。工会国际的反共立场,工会方面主张加入红色工会国际这种分裂路线在共产国际内部的发展,使上述问题在国外移民当中得到解决。相反,意大利国内却主张:工会必须在劳动场所唯一合法存在的工会即法西斯工会内部展开活动。然而,这条路线在意大利的共产党最初制定时就是困难重重的,而随后在具体实行时就尤为困难了。

“总工会生活和战斗在意大利”,这曾是当时的口号。虽然在当时条件下这一口号实际上无法贯彻下去(因为很难使一个群众组织在地下条件下长期生存),但它却发挥了重大的政治影响,明确表明了共产党人力求把自己的活动中心保留在意大利国内、尽量与工人和农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意志。

三、留在意大利

尽管共产党人的意图是“一切照旧”,但这个意图是很难实现的。在被打入地下的头几个星期的迷雾逐渐消散之后,党的状况极为困难。中央委员会失去了一半成员,其中有的被逮捕,有的被

流放。在里昂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中，只有 10 名正式委员和 3 名候补委员还在活动。因此，中央委员会不得不通过遴选进行扩大，增补的有西洛内，利考西，特雷索，尼斯基奥。政治局在失去葛兰西、斯科奇马罗和特拉齐尼之后，只剩下陶里亚蒂、卡米拉·拉维拉和格列科，随后增补了莱奥纳蒂、塔斯卡、特雷索和西洛内等作为候补委员。而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则委托隆哥、谢嘉和多扎领导。

党的领导工作重新进行了调整，成立了由陶里亚蒂、格列科、塔斯卡组成的国外中心和由卡米拉·拉维拉负责的国内中心，即书记处。青年联盟国内中心由谢嘉领导。一些最著名的同志如朱塞佩·迪·维托里奥、马里奥·蒙塔尼亚纳、乔瓦尼·杰尔马内托等人被派往国外。而与此同时，利考西、拉瓦佐利、莱奥内蒂、西洛内、切里亚纳、韦内戈尼、特雷索和泰雷萨·雷基亚等同志则在国内进行地下工作。这次工作分配是在莫斯科一次共产国际会议上决定的，陶里亚蒂、格列科和塔斯卡出席了这次会议。

陶里亚蒂从共产国际委托给他的重要职务中抽出身来，在一段未加确定的时间内重新致力于意大利党的工作，这是在经过与共产国际艰难的谈判之后才实现的。当时，共产国际的领导机构忽视了意大利党强烈地提出、陶里亚蒂本人也曾提醒过的问题，即陶里亚蒂应当在党内发挥作用，这不仅是为了完成实际任务，而且尤其是为了有助于组成意大利的共产党新的领导集团，在具有不同修养和经历的骨干分子中实现真正的政治团结。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陶里亚蒂和格列科之间实现了特殊的协作，尽管他们两人在学识、政治经历和个人气质上是如此不同。

会议决定在巴黎出版理论杂志《工人国家》，即《无产阶级政治评论》，并准备在瑞士建立与国内中心密切接触的国外中心。后来，国外中心在 1928 年迁往巴黎。当时，巴黎是使意大利的共产

党领导人能够展开政治、思想和组织等方面的大量活动、能够以坚韧的耐力继续进行组织国内联络网的艰巨工作的唯一城市，因为它是欧洲和世界的文化政治中心，是为数众多、国籍各异的政治流亡派别的避难所，而且还有法国共产党为意大利的共产党提供慷慨的帮助。此外，巴黎也是意大利其他流亡的反法西斯政党的领导集团所在地，在这里，人们可以进行更直接的论战和交锋，这种论战和交锋可以在移居国外的劳动群众中引起直接的、有实际意义的反响。然而，意大利的共产党的国外中心一直保持其非法性，这既是为了避免法国警察局的袭击（因为它时常逮捕并驱逐正在进行活动的意大利的共产党骨干分子），也是为了隐蔽自己，以防法西斯警察局组织的间谍中心的监视和渗透。处于非法状态（使用伪造身份证、用各种化名租借住房和办公室）的必要性固然给人带来了风险，使人失去了一些时间和失掉工作，却有助于保持对非法生活条件的适应能力，而这无论是对在意大利国内四处奔走来讲，还是对安然地穿越欧洲各国边界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130

在这个紧张的阶段，国内中心的活动由卡米拉·拉维拉坚韧不拔地领导着。她在热那亚附近的斯图尔建立了地下活动基地。1927年5月，根据人们的粗略统计，党大约还有6500多名党员，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表明了自己与党保持联系的愿望。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约有3000名成员。总之，当时总共约有1万名党的活动分子，而在那一年之内，由于警察局的搜捕，这些活动分子的数量又迅速地显著减少了。被投入监狱或流放荒岛的同志有千人左右。数以百计的领导干部不得不流亡国外。

这样，我们党便开始了它在秘密状态下的漫长征途。它当时能够依靠的有三种强有力的因素：在意大利国内有一个由与劳动群众血肉相联的党员积极分子构成的人数虽少却很牢固坚强的基础；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以及当时在意大利国外移民劳动

者中存在的群众基础。

当时，在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因内部冲突而陷于分裂的情况下作出阵营的选择有着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在当时情况下，无论是各革命先锋队还是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把苏联看成是一面希望的旗帜，看成是不可磨灭的力量和信心。把共产党人诽谤为“俄国奴仆”的宣传运动，反而有利于站在正义一边、站在独一无二的一个由被压迫者打碎剥削锁链的国家一边的共产党人。除了共产国际和列宁的党给予意大利共产党人以这一庄严的革命称号之外，意大利的共产党还得到了物质上和政治上的巨大帮助。它参加了共产国际的辩论和斗争，从这个伟大的世界性组织中汲取了经验，并利用机会派遣党员骨干到俄国的党校进行学习。此外，我们还得到了物质、经费和技术方面的帮助。意大利的共产党拥有秘密跨越边界的必要手段这一事实，不仅有无庸置疑的实际好处，而且也使共产党人因此而感到骄傲，他们知道，在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他们能够打碎法西斯法制的链条，跨越边界，出入意大利。

从监狱和流放岛屿开始辗转传来的消息说明，同志们在那里士气高昂，学习热情高涨，而且生活在平等和兄弟般的情谊之中。这些消息使从事地下活动的年轻“职业革命家”和许许多多基层党员们都不致过分畏惧，而把铁窗生活看作是进行学习和修养政治品德的良机。当然，这种情怀固然不足以防止党员被捕，却有利于吸收新的同志投入地下活动，这些同志从一开始就有思想准备：他们迟早必将落入敌人之手。

共产党强有力的另一个因素，就是它在国外移民群众当中，尤其是在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和瑞士等国的移民群众中有着强大的基础。1920—1926年的移民浪潮虽然主要是由经济原因促成的，因为当时意大利失业严重，而那些惨遭战争蹂躏的国家则因重建

工作和经济发展而为人们提供了广泛的就业机会，但在更大的程度上，这一浪潮却是在一种强烈的政治热情推动下形成的：当时一些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由于遭到法西斯分子的“取缔”或遭到警察的迫害而不得不移居国外。由于政治原因被意大利工厂开除的高级熟练工人，在移民中所占比例也很大，他们在巴黎和里昂的工厂中找到了工作。这些工人慷慨无私地为党提供了资金、住所、地址和热情的招待，尤其是那些骨干分子，他们随时准备响应党的号召，以合法的方式、或者在必要时以非法的方式重返意大利。移民们为党提供了大量来自国内的消息。当然，这些消息往往倾向于 132 把意大利的政治形势描绘得比实际情况要好，但是对于那些善于摸透来自国内信息的实际内容的人说来，这些消息毕竟仍是有益的。

此外，意大利移民的存在也为党与其他反法西斯流派进行政治交锋以及往往是极为激烈的斗争提供了条件；这种论战不仅是在移居国外的各政治力量之间展开的，而且它还不断使群众的立场发生有利于党的转变。实际上，最高纲领派和改良派在移民中有着重要的群众基础。移居国外的合作社改良派领导人甚至利用来自意大利的资金在法国建立了劳动合作社，这些合作社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不仅为一批移民提供了就业机会，而且使他们得到保护，能够从法国当局那里获取必要的逗留证件。然而，尽管最高纲领派和改良派因法国社会党和激进党的援助而具有这种实力地位和各种手段，但是在移民当中还是逐渐地出现了有利于意大利的共产党的力量转移，这也是因为共产党人在意大利进行的非法活动为自己赢得了威信。

移居国外的反法西斯人士——即社会党和民主派反法西斯人士与立足国内的共产党反法西斯人士二者之间的对峙，在当时进行的论战中，变成了在蒙巴纳斯咖啡馆中高谈阔论的反法西斯主

义首领与在意大利工作和身陷囹圄的共产党人二者之间的对立。公式化地看待这种对立,对这种对立作出不正确的概括,从而把涉及前景问题的政治冲突变成道德品质方面的差异,所有这些并没有阻止上述对立情况在意大利广为流传,也没有阻止在非共产主义的、甚至政治上是反对共产主义的民主反法西斯分子中间引起对共产党普遍尊重的感情,因为共产党以无数牺牲的代价成功地在意大利站住了脚跟。

四、非法活动的初步总结

1927年底,在国内展开活动的书记处虽然仍与设在瑞士的国外中心保持着联系,但它已无法再充分发挥作用来克服意大利的共产党中央与基层组织丧失联系的危机,无力避免与国内接触范围进一步缩小。而且,从1927年下半年起,中央与南部各级组织已失去任何联系。这并不是说,风暴过后,南部的共产党核心组织未能残存下来,而是因为这些组织无力为党中央提供有助于恢复与党中央长期有效接触的条件。在卡米拉·拉维拉领导的书记处第一次迁到卢加诺之后(当时书记处仍与留在意大利的各“局”、尤其是组织局和群众劳动局保持着联系),年底又迁到了巴塞尔。这时,国外中心暂时还设在这里,因为它已把部分活动,如《工人国家》的出版工作,转移到了巴黎。

1928年1月26—29日,意大利的共产党在巴塞尔召开第二次全国会议,对党在第一年绝对非法状态下的情况作了总结。从政治方面讲,结论是积极的。与其他反法西斯政党相比,党有力地确立了自己在国内的地位,在宣传鼓动方面开展了重要的组织活动。党与社会党及巴黎反法西斯大同盟的论战,不仅表现在针锋相对的口号和激烈的语调上,而且还表明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行动方针;

共产党人坚持在国内进行地下战线的斗争，而参加巴黎反法西斯大同盟的各党则逃避这一斗争。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后来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道德上也具有越来越重大的意义。

党在1926年11月虽然遭受到极为严重的损失，却成功地重新建立了团结在1927年1月莫斯科会议上选出的陶里亚蒂、格列科、塔斯卡等三人周围的领导核心。此外在领导集团中还有书记处负责人卡米拉·拉维拉，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书记隆哥。这些同志素质不同，在里昂第三次代表大会前后的内部讨论中常常意见不一。因此，领导集团总是通过重申里昂纲领，强调执行葛兰西制定的路线及其全部丰富的内容来寻求自己的团结，并且不断努力使自己与国家的实际联系起来，以便仔细研究国内层出不穷的各方面情况及其不断的变化。

陶里亚蒂是1927年初从共产国际回到意大利的共产党中央工134作的。他与格列科之间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合作关系。这是一种政治合作关系；虽然共产国际在政策上进行调整和党不得不相应地对自己的路线进行不断的纠正，从而给这种关系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困难，但这种关系还是维持下来了，一直维持到1934年，即陶里亚蒂为筹备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而重返共产国际工作为止。1927年，人们对陶里亚蒂还是满腹猜疑，怀有反感的，而且他本人对自己的价值和作用也还没有充分的认识；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他逐渐赢得了党内最高领导人的地位，这是他在1927年不曾有过的。然而，仅仅过了两年就发生了把领导集团搅得一团糟的一场党内斗争，这场斗争很快就表明：陶里亚蒂的地位还是多么不稳定，他的权威还是多么没有得到公认。

1927年，为了把因骤然转入非法状态而陷于混乱的党员骨干重新聚拢起来，陶里亚蒂和格列科进行了耐心的工作，并且成功地组成了包括卡米拉·拉维拉、塔斯卡、拉瓦佐利、特雷索、莱奥内蒂、

西洛内、隆哥和谢嘉在内的领导集团，这个集团在1927—1928年的最初阶段看来实现了行动上的充分一致，虽然还不是政治团结。然而，实践很快便表明，这种一致的思想政治前提是何等脆弱，而这种一致之所以遭到破坏，也是由于受到旧日个人恩怨的影响。

陶里亚蒂曾特别注意把安杰洛·塔斯卡吸收到领导集团中来。塔斯卡成长经历不同，里昂代表大会之前一直是右翼派别的重要成员，但却有着无可争辩的才能，陶里亚蒂吸收他完全是想使他以自己的才能重新为党的工作尽力，而且也是为了与无疑是建党初期的一个重要人物保持直接联系。相反，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领导集团（隆哥和谢嘉）当时与陶里亚蒂却是分道扬镳的，他们公开要求抛弃在里昂通过的政治纲领，放弃可能会使无产阶级革命目标失去其有效性的任何中间民主目标，因为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革命是唯一能够动员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目标。

五、巴塞尔会议

1928年初，意大利的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也是良好的。陶里亚蒂作为意大利的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在莫斯科从事活动的一年中，已经取得了强有力的地位，而且在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布哈林负责领导共产国际之后，里昂代表大会的路线自然也被纳入共产国际采取的方针之列。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体会议（1926年11月）把苏联共产党内发生的反对派集团（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与以斯大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之间的分裂转而扩展到了共产国际内部。陶里亚蒂在与葛兰西通信骤然中断之后作出了果断的选择，并且得到1926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这几个黑暗日子中侥幸在热那亚举行的意大利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所作决定的确认。作出这一选择是有其基础的，这个基础除了是

对苏联将发挥主要作用的估价之外，还在于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体会议上所确定的政治路线。

斯大林反对任何投降主义或冒险主义论点、坚持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这一主张既是迫不得已的，也是可能实现的。其所以是迫不得已的，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时期暂时结束了战后的经济社会危机，而苏联的生存不能依赖西方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再度兴起，因为这在当时不会马上到来；其所以是可能实现的，是因为：虽然像布哈林强调的那样，美国资本在欧洲的出现标志着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时期已经开始，但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不会缓解，而且已经发生新的斗争现象，从英国矿工的罢工到中国革命的发展。自然，新矛盾导致了新问题，提出了随后几年一直讨论不休的新课题，后来共产国际内部的政治斗争恰恰是围绕资本主义稳定的破裂和国际工人运动振兴的速度问题展开的。

在宣布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公开谴责的第八次 136
共产国际全体会议上（1927年5月），主要议题便是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战争问题（这个战争被认为是“迫在眉睫”）。资本主义侵略苏联危险的临近也成为努力加速苏联工业化的论据，因为这被看成是能够抵御敌人进攻的“迫在眉睫的危险”的条件。陶里亚蒂在会议上坚持认为，“保卫和平”的口号有积极意义，但这个口号却遭到大多数人的拒绝。然而这一挫折并没有损害陶里亚蒂的个人地位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代表团的地位，尽管由此积累起了与德国党和法国党发生冲突的原因；在随后几年中，这些党在评价意大利的共产党的政策时发挥了强大的批评性影响。

总之，意大利的共产党领导机构在巴塞尔会议上的立场与共产国际的立场实质上是吻合的。这在意大利的共产党动荡不定的历史上是所见不多的。

固然新领导集团在巴塞尔所作的政治总结十分积极，但对国内开展的组织工作所作的总结却是严峻的。共产党人在国内要进行有效的政治活动，这是他们在反法西斯斗争中获得领导权的前提，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党曾付出了极高的代价。1927年，即在1926年11月几次大逮捕之后，又有大约3000名同志被捕。大多数被捕者都受到警告并被立案，警察局对他们进行严密的监视，这对意大利的共产党这批干部重新进行活动说来是极其危险的。被捕的另一一些共产党人则被拘留或送上特别法庭。特别法庭在开始开庭审理的头几个月中，就宣布了225项判决，被判处者几乎都是共产党人，刑期总计达1371年。而且对葛兰西、特拉齐尼、斯科奇马罗及其他同志已经开始的诉讼也已宣判在即。

1927年对劳动群众是严酷的一年，他们不得不承受里拉贬值引起的危机的后果：工资降低20—30%，失业增加，剥削加重，工人大批被解雇，工厂纷纷关闭。对于这种生活和工作条件的恶化，
137 工人阶级未能作出应有的战斗性回答。当然人们也进行了一些抵抗，举行了抗议示威甚至若干次罢工行动，然而，这些行动少得可怜，只能表明群众普遍处于消极状态。此外，这些战斗性行动往往发生在农村而不是城市，这也说明工人阶级在前几年遭受严重挫折之后恢复得还是多么缓慢。事实上，法西斯主义已控制住了里拉贬值引起的经济危机。法西斯主义当时可以利用来自国外（特别是美国）的借款，但它主要则是采用了不断压缩国内消费、通过贷款促进资本积聚和集中的剧烈进程的办法来克服危机。

格列科代表政治局在巴塞尔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从对经济危机的仔细而又谨慎的估计出发，强调了危机的严重性和严重后果，但当时却没有预料到它迅速导致的政治事态发展。相反，塔斯卡则一再特别提到法西斯政权已变成某些资产阶级阶层的“代价昂贵”的政权问题，在他看来，本来是能够使这些资产阶级阶层脱离

法西斯主义并使之转变为反对派的。

然而，陶里亚蒂和格列科则强调资本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已结成有机的关系，指出法西斯主义是意大利资本主义的有机表现，是“意大利资本力量的组织中心和政治统一中心”。意大利的共产党领导人在巴塞尔表明，他们已领会到1926—1927年间打乱国家生活的那两件大事即里拉贬值和非常法的实施所具有的实质意义。他们懂得国家的法西斯主义变革进程意味着什么，同时他们也深知金融资本与农业资本正在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使法西斯政权更多地成为意大利资本主义最有活力、最先进的力量的代表，而不是其最落后的阶层，即农业资本阶层的代表。

在这次会议上，《工人国家》杂志在其第一年的活动中一直予以注意的那些问题又再次从不同的角度重新提出，但目的仍是要得出这一结论，即法西斯政权不像反法西斯大同盟所作的肤浅解释那样，是“一支在占领土地上暂时安营扎寨的敌军”，而是代表着意大利资本主义统治力量，同时又不仅在小资产阶级中间、而且 138 也在广大劳动者阶层有其群众基础的政权。在格列科看来，正是资本主义统治力量与群众基础两者之间的这种根本矛盾，将会为革命斗争的到来打开通路。

然而，意大利的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在巴塞尔并没有指出反法西斯斗争迅速发展的前景，大家一致认为，法西斯政权已稳住了危机。因此，党必须采取一项“谨慎”的群众性行动，通过建立“鼓动委员会”，提出具体的、哪怕是不高的要求来首先确保党在劳动者当中，尤其是工厂里的存在。当时人们宣称，必须从小事做起，“无小不成大”。陶里亚蒂当时提醒道，党的中心与南部断绝联系已经一年多了，这说明要达到工农联盟的目标还相距多么遥远。必须准备改变这种状况，然而这需要进行耐心的、坚韧不拔的工作，并提出了在法西斯工会内部寻求合法的鼓动方式的问题。

坚持在工农委员会基础上建立共和制议会这一口号，对于意大利的共产党领导集团说来有着三重意义。首先，这就肯定了里昂代表大会通过的路线的延续性，也就是肯定了葛兰西教导的现实性。其次，这给党提出了一个中间民主目标，这一目标能够促进与社会党人和反法西斯劳动者自下而上的重新接近与团结。最后，在党与其他流派的反法西斯政党的论战愈演愈烈的时刻（论战的加剧不仅是因为共产国际从中鼓动，而且也是由于意大利共产党人天生习惯于与社会党人论战，由于反法西斯大同盟不断进行反共诬蔑宣传），这一口号可以有利于打破共产党人政治上的孤立状况。

对“共和制议会”这一口号的解释的确有许多含混不清之处，正如陶里亚蒂后来在1929年决定建议取消这一口号时指出的那样。在把这一口号解释成为立宪议会的同义语和把它解释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同义语这两类人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立场，人们对于从法西斯倒台到无产阶级专政确立这二者之间的“民主中间阶段”这一时期可能具有的特点作了数不胜数的不同解释，有人称之为“运动”或“一站”，有人则说它是一个“阶段”或“时期”。实际上，在这种今天看来是经院式的、繁琐不堪的不同论据背后，隐藏着两种观点：一种是公开的、宣传鼓动性的，这种观点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唯一能够打倒法西斯主义的力量，法西斯政权完全代表着资本主义的利益；另一种是含蓄的、不言自明的，这种观点并不排除民主中间阶段的可能性，认为这种中间阶段应当使无产阶级能够像1917年2月至10月在俄国发生的那样，把自己的力量重新组织起来，以便随后在与农民结盟的情况下一举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然而，无论是在认为有可能直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人看来，还是在接受“民主中间阶段”设想、决心尽可能缩短这一中间阶段以便使国家资本主义无法东山再起，用社会民主主义代替法西

斯主义作为压迫工人运动的力量的人看来，在上述两种前景中，与社会民主主义进行严峻的政治斗争都是主要的任务。

这一论战是在共产国际就社会法西斯主义采取立场之前展开的，在这一论战当中，人们再一次看到了里昂代表大会提纲的延续性，因为里昂提纲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是资本主义反动派的一支臂膀。而且，来自国内社会党基层本身的、矛头指向两个社会党和反法西斯大同盟的那些批评，以及对这些党放弃阵地、逃亡国外以待时机的行为所提出的指责，也使这一论战变得更为激烈。

意大利的共产党内部在如何估价社会民主主义在意大利保存的实力方面，存在着意见分歧。多数人认为，社会民主主义固然是意大利资本主义的一支后备军，但它尽管没有投入到地下斗争的阵地中来，却仍保存了大部分旧有的群众基础，而这就需要对这些流亡国外的党不断进行批评性的政治工作，并要主动团结其基层党员。相反，另一些人，如隆哥和谢嘉则认为，这些社会党既然放弃了意大利国内阵地，便已不复存在，因此无需过高估计其重要性和对它们过分注意。后来，在很长时期内，意大利的共产党在政治分析中一直低估社会党原有基础的抵抗能力，尽管时代和政治方针都发生了变化。 140

隆哥和“少壮派”与多数派的分歧，不仅仅表现在如何估价社会民主党立场在意大利的实力这一问题上。他们在继法西斯主义之后将会出现何种阶段这一问题上也断然推翻了那一套往往是暧昧不明的推理和假设。早在1927年10月20日，隆哥就以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书记处的名义给政治局写了一封长信，批评党遵循的政治路线，要求撤销“共和制议会”的口号。隆哥认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了群众的激进化，意大利人民劳动和生活条件的恶化为革命的新发展提供了前提。反法西斯民主党派放弃斗争阵地使意大利的共产党的行动有了自由活动的天地。因此，必须站在斗

争的前头,取消任何可能会引起思想混乱的中间民主目标,指出无产阶级专致目标,开展各种形式的行动和群众动员。

在巴塞尔会议上,隆哥和谢嘉的立场不堪一击。陶里亚蒂和格列科根据1927年的经验轻而易举地证明,群众的激进化不会变成对斗争的更大推动,不会化为更大的战斗力。“少壮派”受到了批判,因为他们所作判断的出发点是,意大利的共产党已经赢得了群众,而其他反法西斯党派则无足轻重。他们还被恶意指责为“波尔迪加的公式主义”,为的是提醒人们注意,他们在1925年以前一直是与波尔迪加站在一起的。实际上,他们的立场与波尔迪加的等待主义毫不相干。这条政治路线虽然失之莽撞、片面,却完全注重于行动,是要提高群众的战斗力,扩大共产党的斗争范围,并缩短革命前景的距离,取消任何中间目标,明确指出最终目标即无产阶级专政。“少壮派”在为取代多数派的路线而提出的纲领中得出必须加强对国内的主动工作的结论,这不是偶然的。这种在与国内进行联系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在推进组织工作方面所表现的顽强而积极的精神,表明了这个“少壮派”集团的素质,他们把每一次讨论都导入他们所要下的结论:党应当立足国内。

六、特别法庭

巴塞尔会议结束时决定,在国内建立一个国内中心,以便恢复与各级组织的联系。然而,这一尝试又没有成功。由利考西、阿莫雷蒂、多诺弗里奥和隆哥(代表少壮派)组成的国内中心的活动,由于1928年4月12日米兰博览会事件而被打乱了。安放在国王前来主持样品博览会开幕式的必经之路上的一颗定时炸弹提前爆炸。死20人,伤40人。这一谋杀案的来龙去脉一直是个谜。事实则是,法西斯警察局试图把肇事责任推到共产党人身上,但未得逞,

它还是进行了大批逮捕，被捕者包括西洛内的兄弟罗莫洛·特兰奎利。在对共产党人的大搜捕中，连与国内中心保持联络的同志也未能幸免，整个中心全部落入警察局手中。这次大搜捕表明，警察局对共产党组织监视得多么严密。只有隆哥奇迹般地得救，逃到了科莫；他本来是要在那里与几小时前刚刚被捕的罗莫洛·特兰奎利碰头的。

5月28日，特别法庭开始审判葛兰西、特拉齐尼、斯科奇马罗、罗韦达及其他20名在押者。法庭使用了特别法，坚持该法有追究既往的效力。这完全违反了任何法规的准则。正如共产党人骄傲地回忆的那样，葛兰西在审讯最后回答庭长的一个问题时说，“将军先生，我想，所有军事独裁迟早将被战争席卷而去。我认为，到那时，显然，就要由无产阶级来代替统治阶级掌管国政，拯救民族的命运。”这句话似乎就是司法当局纪录下来的、被说成是葛兰西的那句名言，即：“你们把意大利引向毁灭，而它将由我们共产党人拯救出来”。

6月4日宣布了判决：特拉齐尼监禁22年，葛兰西、斯科奇马罗和罗韦达各20年。对其他犯人也判了重刑。镇压在继续加紧。¹⁴² 1928年全年，特别法庭判决了636人，刑期共3404年。10月16日，共产党员米凯莱·德拉马焦拉被判处死刑并被枪决，因为德拉马焦拉在侨居国外返回意大利后，屡遭法西斯分子暴力迫害，他在用武器自卫时打死了两名向他寻衅的暴徒。

这样，一方面，国内中心的陷落意味着与国内联络的中断，表明敌人的挑衅活动已渗透到党的队伍中来，而另一方面，对葛兰西、特拉齐尼和斯科奇马罗的判决则表明了法西斯政权的镇压决心。特别法庭公诉人伊斯格罗把葛兰西看成是法西斯政权继续存在的最危险敌人，他似曾说过：“必须让这颗头脑停止工作20年。”这句话也没有正式证明属实，而后来却变成了流传在工人运动中

的一个传奇式说法。

6月份，意大利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再次在巴塞尔举行会议。书记处、尤其是陶里亚蒂和格列科受到了不仅来自隆哥和谢嘉，而且也来自塔斯卡、特雷索、拉瓦佐利和莱奥内蒂等人的强烈批评。前者断言，如采取更果断的行动，本可以改善国内的组织情况，而后者则批评书记处拒绝及时进行组织退却。激烈的讨论表明，在敌人的严酷打击下，领导集团的团结是多么的脆弱不稳。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及随之而来的事件将导致党的领导机构陷于真正的四分五裂。由于很难寻找新的国内工作方式来克服从1928年4月至1929年8月持续一年多的组织脱节状况；由于苏联共产党内和共产国际内部曲折的政治斗争在党内的反响，在1926年11月遭受打击后得以恢复的党的领导集团终于发生了破裂。

第七章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143

一、苏联共产党内的斗争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于1928年7月至9月在莫斯科召开，历时47天。上次代表大会是在四年以前，即1924年列宁逝世后不久召开的，在共产国际觉察到资本主义欧洲革命运动停滞之后，这次大会对列宁在1921年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广泛统一行动路线作了狭意的解释。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许多参加者已经从舞台上消失，其中包括当年共产国际的主席季诺维也夫，他是在苏联共产党内部斗争中同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一起被斯大林击败的。意大利人也缺了好些人：葛兰西、特拉齐尼和斯科奇马罗，他们被关在监牢里，而且刚刚被特别法庭判处重刑，还有波尔迪加，他被流放到蓬扎岛。

在那些集结在共产党周围的工人群众和工人运动中的很大一部分人看来，第六次代表大会是宣告资本主义的稳定发生危机的代表大会。这个宣告虽然还不意味着对爆发周期性危机的预言，因为那次危机要到一年多以后才发生（布哈林的报告中则谨慎地作了这样的预言），但这并不削弱大会的宣告所具有的政治意义，这个宣告变成了争取革命运动新进展的斗争号召。它所揭开的不是一个消极等待由经济危机的爆发造成资本主义的灾难的时期，
144
而是一个新的斗争时期；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的终结所造成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矛盾的爆发开始了这个新时期。在帝国主义战争和战后的革命危机时期之后，以及在资本主义稳定和革命运动

处于低潮时期之后，宣告了第三时期的开始。

事实上，在第五次代表大会和先前几次全会上并不乏关于资本主义稳定的相对性和脆弱性的多少有些武断的指示。现在人们认为，稳定已经结束，阶级冲突尖锐化，群众激进化，新的革命高潮迅速成熟，危机和战争，甚至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时期迅速成熟，但资本主义国家却都是要侵略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

在布哈林作了报告之后，大会辩论的整个进程都趋向于强调发生侵苏战争的紧急危险这一前景。而围绕这个前景及其对苏联共产党人的实际后果问题，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范围内，在苏联党代表团内部却发生了隐蔽而激烈的斗争，最后，这一斗争在其他共产党内也引起了反响。

事实上，在前一个阶段，在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那种密切的一致已经削弱了。由于斯大林和布哈林在共产国际内采取一致的态度，那些否认在一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可能性的派别于1926年被击败以后，如今又在进行这个建设的方式问题上发生了争执。究竟应当像布哈林和右派（托姆斯基和李可夫）主张的那样，必须继续沿着新经济政策的道路走，甚至加速这个进程，通过适当的农产品价格政策、提供贷款和供应工业设备以促进农村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农民，发财吧！”），还是应当像斯大林主张的那样，以强制的速度促进工业化进程以便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的技术呢？这就意味着，要像斯大林所主张的，优先向基础工业，特别是冶金工业投资，以及为战胜富农的反抗而进行加速的集体化，甚至不惜采取强制的办法。这些就是斯大林和布哈林争执的客观基础，这个争执早已在苏联共产党内爆发，而在第六次代表大会后不久就通过在苏联报刊上刊载的布哈林的一篇文章而明朗化了。

在当时，争执还不是正式的，但已经支配了代表大会的整个过

程。所有被提出来加强和突出中心论点的各个因素，如：资本主义稳定发生危机、群众激进化、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日趋一致、必须向革命运动提出先进的目标、革命危机迅速成熟因而出现帝国主义要在迅速发动侵苏战争中找到摆脱本身困难的出路，这一切都用来支持斯大林的主张，即实现一种加速的，甚至是强制的工业化进程，使苏联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拥有必需的手段来抗击敌人的进攻。

因此，许多共产党内极其激烈的派别斗争便同苏联共产党内正在进行的斗争结合起来了；依仗斯大林权威的左翼集团在代表大会内加紧攻击被认为是右的共产党人和妥协分子，这些共产党人——举例来说——试图反对那种把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等量齐观的过于鲁莽的做法，而且拒绝把社会民主党的左派看成主要敌人。

布哈林作的报告没有得到苏联共产党的正式批准；苏联共产党抱怨事先未曾得悉发给其他党的报告。在批评布哈林的报告方面，德国共产党的领导特别突出；他们希望摆脱党内的右派和中派。但其他党也这么干。意大利的共产党却反之。这并非由于陶里亚蒂和布哈林之间在他们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任职时期建立起来的合作和互相尊敬的个人关系，而是由于在葛兰西门下成长起来的陶里亚蒂、格列科和意大利共产党人本身有这样的倾向：即始终喜欢对事实进行周密的分析，以便得出符合形势要求的方针，而不喜欢仓促的概括。

陶里亚蒂在发言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共产国际内部生活的问题，并坦率要求更多的民主和“更多的光明”。陶里亚蒂的发言在会议尴尬的沉寂中结束，而且是被打断的，因为超过了规定的时间。代表大会文件集和报纸都刊载了他的讲话全文，并作了一些小的修改。陶里亚蒂还作了一个副报告，谈殖民地世界的形势，特别谈

到社会民主党对殖民地人民解放斗争问题所采取的态度，揭露了社会民主党为了本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要控制这些解放运动的意图。

委托陶里亚蒂来作这个副报告突出表明他作为共产国际领导人的重要作用，这个作用这时已经得到承认了。然而，这个事实并没有缓和他的发言所引起的批评，因为这个发言同苏联共产党领导集团和斯大林的意图是背道而驰的。除了所采取的立场以外，陶里亚蒂和意大利党代表团的多数成员都希望自己有别于其他党的代表团，拒绝在没有事先进行公开的、有说服力的交锋的情况下无批判地支持斯大林所表明立场。

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意义

对第六次代表大会实况的研究以及那些干扰了会议的争执，甚至是触目惊心的个人之争的暴露，不应妨碍我们评价会议在那个特定形势下取得的结果及其实际意义。不要局限于把第六次代表大会所描绘的前景同后来几年形势的实际发展加以对照，这样的对照会表明上述前景是错误的。然而，需要考虑的是第六次代表大会为指引和动员劳动者而实际提出的方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犯的¹⁴⁷错误，其根源正在于这一方针的宗派主义性质，在于它促成工人阶级的分裂。鉴于那些导致希特勒在德国获胜的惊心动魄的经历，这些错误就变得昭然若揭了。而在当时，第六次代表大会是对共产国际的力量和意志的一次考验。

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含糊的¹⁴⁸词句发出一个强有力的简单宣告，提醒人们注意革命运动的重新高涨。关于经济危机的预测，固然就其所使用的术语来看，确实颇有分寸而谨慎，但在当时还是有广泛而不无根据的重要意义的，而且在一年之后这场危机就爆发了，

这在很长一个时期被认为是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一项功绩。经济科学的各个学派有大量关于危机的文献专谈 1929 年以后,亦即危机爆发以后的经济周期发展的情况,这些文献广泛传播了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这些进程的知识;当然,不要误将所有这些内容丰富的文献的日期提早了。1928 年对资本主义稳定性的危机的揭露是以通俗的政治术语作出的,这在危机实际爆发以后,看来竟成为共产国际具有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预见事态发展进程的能力的一个证明。

从讨论的进程来看,布哈林试图保持对形势进行与众不同的具体分析的做法是被葬送了,这不仅是由于苏联共产党领导所施加的压力,而且也是由于某些共产党领导集团企图及时地站在必胜者一边,亦即站在斯大林一边的意愿。

陶里亚蒂和意大利的共产党的领导集团由于悠久的文化教养以及为了驳斥“少壮派”——隆哥和谢嘉提出的笼统批评而参加了上述行动。这些“少壮派”看到他们坚持用来反对陶里亚蒂、格列科和塔斯卡的领导的论点已为代表大会所接受和发挥,他们本来可以利用他们的立场得到权威的肯定来进行他们在党内的论战。但隆哥和谢嘉并不愿使他们在意大利的共产党内的斗争同那些从共产国际的认可中寻求力量来进行党内斗争的其他集团以并不总是清白的手段和目的进行的斗争混淆起来。

就对外来说,第六次代表大会所作的结论变成了要求动员群众的强烈号召,并体现在如下行动上:挫败各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倾向和右的倾向,使之不能妨碍群众的斗争性;加紧对被认 148 认为是主要敌人的社会民主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使之不能给革命运动的发展设置障碍;指出要在基层建立统一阵线,以求使劳动者摆脱社会民主党的有害影响。

事实上,意大利共产党并没有等待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召开再来指出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的左翼（如果不是说它们简直就是法西斯的左翼的话）。正是葛兰西本人早在1926年8月他的最后一次报告中，就已经指出，社会民主党甚至可能使用镇压措施来阻挠革命力量利用短促的“民主中间阶段”推进革命进程。但是，意大利共产党人始终力求区分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基础和法西斯主义的基本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基础；他们指出，使法西斯主义和其他专制政权有区别的特点正在于法西斯主义可以依靠一种群众的基础。必须指出，社会民主党人当中的反共主义，就激烈程度来说，并不亚于共产党人的反社会民主党的论战。社会民主党人除了使用辱骂和寻衅的词句来反对共产党人外，凡在他们执政的地方，还采取镇压行动，这就削弱了工人的抵抗并给法西斯暴力开辟了道路。

陶里亚蒂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代表团多数派所无法接受的是第六次代表大会那种蓄意作出的简单分析和粗陋的公式主义；这在最初可能有，而且肯定有某种宣传效果和动员能力，但却使各国共产党看不到确切的政治社会实际情况，从而妨碍它们提出具体的目标和探讨哪些力量应当使它们中立，或者哪些力量可以看作可能的同盟者。

世界危机的爆发、数以百万计失业者的出现、“两个世界”之间的鲜明而生动的对比（一个是资本主义世界，它宁可焚烧粮食而不把它送给饥饿的人们；一个是社会主义世界，它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建立了一个新社会），这一切似乎证实了第六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指示。这种对比并非没有简单化之嫌，但是，在当时那个危机的形势下，这种非黑即白的简单做法却也能够给数以百万计的劳动者指出斗争的方向和希望的前景。

149 资本家及其辩护士指出资本主义扩张有无限的进步前景，不会发生危机；他们故弄玄虚，掩盖资本主义以对工人阶级的剥削、

农民的贫困和对殖民地人民的掠夺为其真正基础这一事实；面对资本家及其辩护士的这种乐观姿态，共产党人宣布了资本主义稳定的结束和危机的到来；他们言之有理。这就是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当时特定条件下所具有的政治意义。

如果人们想研究大会讨论的真实情况并批判地拿这次讨论同共产国际那次大会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作个比较，那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理解二者之间存在差距的原因。而这些原因应当从苏俄当时在那么多国家的人民、那么大的一部分劳动者的心灵和希望中所占据的地位中寻找，应当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腐败和堕落以及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本身的严重性在青年的意识中所造成的空虚中寻找；当时资本主义为了克服危机需要从方法上和技术上实现现代化，而且只有事态本身才会迫使它这样做。

世界现实的一个时期（而且这不仅是共产国际提纲对这个现实所作的公式化的表述）实际上已告结束。第六次代表大会表明它意识到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动荡阶段的开始，这个动荡阶段最后以爆发新的世界大战而告终。从1929—1939年这10年确实是一个“铁和血”、法西斯罪行和战争的恐怖时期。为了拯救苏联，需要动员各国人民来保卫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由于缺少革命党以及社会民主党的背叛，这在1919—1920年使人未能把战后危机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现在，各国共产党已经摆脱了机会主义积垢并在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依靠它们开展的行动，各国人民按照共产党人的要求为保卫苏联而进行的动员就会变成无产阶级革命。在这期间，由苏联共产党用武力和纪律领导的苏联将会以强制的步骤完成其工业化以便在敌人进攻时一切已准备就绪。这是一个初步的纲领，它无疑发挥了动员的效能。

150

然而，突然发生了两件事，使实现第六次代表大会规定的前景

的可能性成了问题。自下而上地扩大共产党工人和社会民主党工人的统一阵线不可能实现了。这些工人都同各自的党和各自的领导人站在一起。对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攻击越激烈，其基层也就越同这些旧组织联系在一起；由于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之间日益深刻的裂痕以及工人阶级内部的激烈斗争所造成的裂口，法西斯主义的毁灭性残酷进攻才得以畅通无阻。

此外，各国共产党对第六次代表大会路线的适应以及上面对各国共产党领导集团人员的更换，留下了后来发生分裂的危险种子。但只有1929—1933年的可怕经历才检验出第六次代表大会后果的严重性。共产国际所预计的经济危机在欧洲找到了右的出路（纳粹主义），在美国找到了民主的出路（新政），但没有在任何地方找到革命的出路，促成制度的革命性变革。诚如人们所说，这场危机是“制度的危机”，但它却“在制度内”结束了。在危机结束时，斯大林曾提到，任何危机都可能有一种不同的解决办法，这要看工人阶级及其阶级政党即共产党的干预能力而定。这是陶里亚蒂所喜欢的一个具体说法，但它只是在危机已经趋于结束时才提出来。

然而，在1929年，注意力并没有放在作出谨慎而恰当的论述和分析上，而是放在作出简单化的笼统指示上。对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实际情况所作的批判性检查，不能抹杀大会在动荡的20年代末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当时的许多和平倡议和和平会议无法掩盖凡尔赛条约的失败以及战胜国（甚至主要是英法两国）对欧洲和世界的瓜分。军备竞赛这时已经表明，德国重新武装的时刻已经临近了。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已经临近，而在10年后，果真爆发了。这的确是一个不长的时期，即使是从政治事态发展来看也是如此，
151 但就是在这个时期内，纳粹竟有时间来蹂躏欧洲和摧垮德国工人运动。

三、对塔斯卡的斗争

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内部争执的发展，特别是1929年7月3—19日举行的第十次全会，给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结论作了广泛的说明。在这次全会上，意大利的共产党成了严厉批评的对象。

尽管陶里亚蒂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反潮流”的发言受到冷遇，但在大会结束时，意大利的共产党的处境还是相当好的。对第六次代表大会进程发生了不良影响的那些暧昧不明的情况，使意大利的共产党代表团得以离开莫斯科而无须改变本党当时的内部关系。第六次代表大会结束后，1928年9月初由共产国际拉丁区书记召开的会议上，隆哥再次对党领导机构的工作提出批评，并建议取消过渡性的口号；谢嘉也跟着提出同样的批评和建议。隆哥能够在国际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的批评（他在意大利的共产党内已经无数次提出这些批评）这个事实表明，意大利的共产党内的生活制度与其他一些党是何等不同，其他党，如德国党，曾使内部争执激化到使党濒于破裂。隆哥又一次被击败，但不久形势发生了变化。

意大利的共产党领导机构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在较短的时间里发生了突然的转折。陶里亚蒂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建议指派塔斯卡为意大利的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当时人选特别限制在陶里亚蒂、格列科和塔斯卡等三人身上。鉴于党组织状况恶化以及必须实现党内的团结，包括同“少壮派”集团的团结，以便在国内重新建立同基层的联络网，陶里亚蒂和格列科顶住了种种压力，决定留在意大利的共产党中央工作。另一方面，也不能派保持其批评立场的隆哥，因此就选择了塔斯卡。陶里亚蒂还想促成将塔斯卡彻底安插到领导集团中，在共产国际生活如此微妙的

152

时刻,把重任委托给他。

对这位右翼元老来说,这个考验太艰巨了。他马上被卷进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党内部都无例外地进行的派别斗争中去。陶里亚蒂曾指示他,不要卷入集团斗争和会外活动的漩涡里;当时在挑拨者和告密者四处活动的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寓所——古老的“豪华旅馆”——中,这类斗争和活动特别活跃。当德国共产党经过不明不白的事态发展发生了危机、被指控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对台尔曼的塔尔海姆尔和布兰德勒尔以及其他领导人被开除时,塔斯卡便同斯大林发生了公开的冲突。

问题确实严重。这涉及到其他共产党顺从共产党国际的意志,实际上是顺从苏联共产党的意志的问题,归根结底则又是顺从斯大林的意志的问题,而这样做也是由于这些党的领导人的抉择所致。斯大林和瑞士共产党人亨伯特·德罗兹公然指责塔斯卡是“游手好闲的机会主义”,甚至说他是“企图颠倒黑白的讼棍”。意大利的共产党被要求表态。它必须选择,要么撤回对塔斯卡的支持,要么加入反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斯大林的斗争。

截至当时为止,陶里亚蒂实质上同意塔斯卡所采取的立场,虽然也劝过他要十分谨慎。德国党的问题背后,还是苏联共产党的路线问题,还是右派(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同苏联共产党领导又一次团结在斯大林周围的多数派的冲突的问题。双方争执的是关于斯大林提出的用各种手段从农村获得工业投资所需的资源来推行强制性工业化的路线问题。

因此,从莫斯科召回塔斯卡已成为势在必行。于是,塔斯卡便在1929年1月初被召回巴黎,并受委托向党中央委员会作关于共产国际主席团内部发生的情况的报告。然而,塔斯卡被召回而且离开莫斯科一事却使他得以不受任何拘束地阐述其批判立场,这些立场不仅同德国共产党有关,而且涉及共产国际的整个组织

和生活方式，并把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和斯大林的作用作为中心问题提出来。

中央委员会会议原应在巴塞尔召开，但瑞士警察逮捕了聚集到该市的意大利共产党人；经过短时间拘留后，把他们带到边境并驱逐出瑞士的领土。这个事件说明了当时共产党领导处境之险恶；他们脱离本国，没有任何安全的条件来开展自己的政治工作。

在1929年2月28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塔斯卡遭到孤立，被谴责为公开的机会主义，受到大家的指责。这次讨论反映了共产国际内存在的新气氛。波尔迪加可以在共产国际讲台上批评列宁而没有招来纪律处分后果的年代已经是很遥远的事了。现在，国际运动内存在的紧张局面，意共领导集团的孤立并与本国隔离的严峻处境，都直接反映在意大利的共产党内部的激烈论战上。任何争论都被搁置一旁，它又一次面临这个主要难题：支持还是反对共产国际。

陶里亚蒂越认为塔斯卡由于轻率和虚荣要对党被拖进这个境地一事负责，他对塔斯卡的抨击就越猛烈；塔斯卡此举迫使他笼统地在纪律上作出抉择，而他本来是想要像意大利的共产党通常的做法那样，从政治上解决的。此外，对塔斯卡的斗争更加突出了塔斯卡的政治立场（即肯定过渡性口号的价值、否定意大利存在革命的条件、社会民主党同法西斯主义有区别），这就迫使陶里亚蒂和格列科放弃了因人而异的分析方法的旧有特点。在抨击塔斯卡方面，隆哥能够作得比陶里亚蒂有分寸，因为他可以把塔斯卡犯错误的责任推给陶里亚蒂。塔斯卡的问题已经超出策略争执。中心问题还是意大利的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问题，就是说，在苏联作出决定表明它已采取新方针（即放弃新经济政策、实行工业化和五年计划）的时刻，意大利的共产党同俄国革命、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

因此，对塔斯卡的审查终于变成了对陶里亚蒂和格列科的攻击；这些攻击来自各个方面，各自怀有不同的动机。陶里亚蒂虽然改变了自己对第六次代表大会结论的立场并接受了关于“第三时期”的提法（尽管还是打了一些折扣），但他不准备把意大利的共产党在里昂代表大会之后遵循的总路线的有效性提出来讨论。他要求承认路线延续性的价值；这种价值使得党能够担负起它的职责。这是一种坚定而庄重地进行的、几乎是毫无希望的守势，但这也必然是一种暂时的立场，注定要在批评和事态发展的逼迫下予以放弃的。

然而，会议的结论还是“意大利式的”，符合意大利的共产党一向使用的方法。塔斯卡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但未被开除出党，而且他提出不当政治局委员的辞呈也被拒绝了。共产国际认为，对塔斯卡的立场所作的政治谴责是不够的。它要求开除他；对于它认为是证明意大利的共产党和稀泥的那些事情，它向意大利的共产党提出了严厉的斥责。实际上，意大利的共产党又一次沿用葛兰西对波尔迪加使用过的老办法，即只要可能，而且只要还没有彻底弄清政治问题的底细以及党还没有理解那些政治批评的正确性，就不采取纪律措施。

四、共产国际对意大利的共产党的批评

为了论述党的生活中的这个困难时期，并不怎么需要追溯那些令人痛心的一次又一次政治退却，而需要衡量一下从1928年秋到1929年秋这一年里党所走过的路程，即从对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几点明显的结论作出粗浅但又丰富多采并与众不同的阐释到接受第十次全会的决定。

1928年10月在意大利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上，陶里亚蒂指出，

意大利的形势虽然存在经济政治危机,但预计会稳定“一个时期”;因此,还可以说是“相对的稳定”。在同塔斯卡斗争中,在短时期内,陶里亚蒂被迫接受了共产国际领导机关提出的不精确的过激论断,即认为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业已结束,群众在激进化,形势处在新革命高潮的前夜。这种论断的根源是斯大林和苏联党领导集团所作的下述抉择:进行强制的工业化,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用各种办法击败富农在俄国农村的抵抗。对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看法使上述抉择显得是有道理的。从认为战争危险迫在眉睫这一信念中得出了加速工业化准备阶段的必要性。在1929年4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斯大林同右翼反对派的冲突公开爆发了。许多左翼反对派也聚集在斯大林周围。他们无法再批评实质上是要求同富农斗争和加速工业化的政策。

意大利的共产党领导集团在第一次讨论塔斯卡的立场时发生了分歧。但是最艰巨的考验还有待克服,这就是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1929年7月)上同国际运动领导者们的直接交锋。由陶里亚蒂、格列科和迪·维托里奥组成的意大利代表团立即发现气氛不对。他们遭到粗暴的质问:为什么不开除塔斯卡?这是像曼努伊尔斯基冷嘲热讽地说的,只是“碰”一下呢(他指的是意大利的共产党在1926年10月对托洛茨基问题所采取的立场这类先例),还是像德国共产党人乌布利希严厉暗示的,是“别的什么东西”呢?这一打击是在斯大林怂恿下苏联同志所要搞的,但最热心的则是德国共产党人;他们要对意大利的共产党过去不支持台尔曼集团斗争“右派”和“妥协分子”进行报复。

在第十次全会上意大利的共产党的立场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性审查。人们从不开除塔斯卡一事追究到意大利的共产党自里昂代表大会以来的政策转变;一切都受到了极其严厉的批评。受到打击的是陶里亚蒂在意大利的共产党从2—3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

会议上谈到的论点，他当时力求根据这个论点制定一条防御性路线，同时还根据对本国特点所作的与众不同的分析和研究，强调了意大利的共产党所执行的路线的“延续性”，目的在于弄清本国的独特性和特殊性以及反法西斯革命本身的特点。

如果说意大利的代表们经过犹豫不决之后才同意把“社会法西斯主义”这个概念延伸到意大利的话，那决非由于他们缺乏批判的精神和对意大利的社会主义问题缺乏论战的劲头（事实上他们决不缺乏这种精神和劲头，而且自从成立反法西斯大同盟之后，在移居国外的情况下，这种精神和劲头反而更加强了），而是由于他们正确地反对将两种运动混淆起来，单只就这两种运动的群众基础之不同就应当把它们看成有区别的两种运动，社会民主党的基础是工人阶级，而法西斯主义的基础是小资产阶级。对于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式和时机以及对于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不同看法，早就存在分歧，而且从来没有公开交过锋，事实上，在那次讨论中爆发的就是这个分歧。

陶里亚蒂和格列科对会上的围攻进行了反击。这次围攻企图使他们孤立。他们两人的反击很有力而且语气坦诚，表现出了反击的能力。例如陶里亚蒂对苏联的洛佐夫斯基所建议的工会政策的反击就表现出了这种能力；洛佐夫斯基不考虑各种不同的工会运动存在的差异，竟从大多数工人不参加工会的情况得出结论说，社会民主党工会代表少数工人。格列科更加激动，他公开地提出了意大利的共产党领导集团的团结问题：由于曼努伊尔斯基的严厉批评，意大利的共产党领导集团的团结已经陷入危机。陶里亚蒂先接受了共产国际方面提出的批评，接着努力勇敢地捍卫了意大利的共产党开展的工作的“延续性”。陶里亚蒂实质上说，我们接受你们的批评，我们保证执行你们的指示，但我们不想再拿出里昂代表大会后的政策转变来讨论。

这是遵守纪律的行动，但也是极力维护党的财富的行动，即维护葛兰西的教导；人们没有提到葛兰西同志的名字，但在每次提到里昂代表大会时，都是有他的。这尤其是为了使意大利的共产党至少在分析形势上保持自主和研究的活动余地以及保持不放弃与众不同的分析方法的可能性而作出的一种努力。

因此，无论是在全体会议上还是在更严格地专为研究意大利党的情况的人数很少的委员会会议上，陶里亚蒂都要求有讨论意大利革命特点的权利。“提出同党中央的同志们讨论这些问题（即意大利革命的特点和意大利的共产党的职责问题）是否正确呢？¹⁵⁷如果共产国际认为不正确，那么我们将不再提出这些问题；我们每个人都会想这些事情，而将不再谈论它们……但我们每个人都会认为，我们决不会从一开始就掌握（革命的）领导权，而且认为，只有在斗争过程中才会夺取到领导权。”陶里亚蒂还捍卫了研究意大利形势特点的必要性，即研究在大会讨论中遭到批评的那个“特殊性”。“我们一直认为，研究意大利的特殊情况是我们党的任务。……如果共产国际要求我们不再研究这些特殊情况，我们将不再研究。但是，研究（意大利）地区的特点，难道不是一个政治问题吗？……如果进行这种研究是搞‘特殊’，那么我们将不再研究它。但既然人们无法阻止思考（表示着重的字体是我用的。——乔·阿·），我们将把这些事情保留给我们自己，并将限于一般地谈一谈。但我肯定，这种研究必须进行。”

陶里亚蒂被委托在第十次全会上致闭幕词的任务。这是一项荣誉，但按照共产党的习惯，这也是迫使他再采取那个时期共产国际官方立场的一种手段。陶里亚蒂接受了这个任务，显然出于两个原因：一是由于强烈的国际主义纪律观念，他是在共产国际中生活和成长的人，这种纪律观念在他身上是根深蒂固的；一是由于其他任何考虑都必须服从于对苏维埃国家的忠诚。

陶里亚蒂只能在这个处于主导地位的、持久的原因这个限度内去谋求给自己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保留研究和行动的自主余地。这也是格列科的立场，他是强有力地采取这一立场的，而且也许还抱有更加激动的屈辱情绪。在这些立场上形成了意大利共产党人的习惯，他们能在最严格的纪律约束的条件下应付各种考验。这种习惯当时并没有被抛弃，但后来却被克服了，即在战后，由于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取得迅猛的进展，并根据意大利共产党人当年努力捍卫的“特殊性”和“特点”（他们认为这是意大利革命发展的条件），不可避免地要寻求和发展走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上述习惯就被克服了。

五、“转折”的原由

代表团回到了巴黎，它为经受的考验所震撼，但确信已经克服了最坏的遭遇。然而，留在巴黎的同志们的迎接却是抱有敌意的。在1929年8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陶里亚蒂和格列科再次受到围攻，其激烈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而且还有直接的人身攻击。这些攻击立即针对陶里亚蒂，要他个人对1926年11月到1929年8月他领导党的活动负责。

陶里亚蒂作了“阵营的抉择”，并遵守纪律，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路线，这就改变了批评者的态度；第三时期的政策问题和共产国际的内部制度问题都不讨论了，而在以前的辩论中，这些问题都曾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样一来，塔斯卡的问题就毫不困难地解决了，一致决定把他开除出党。况且，塔斯卡在3月到8月期间的态度也使这种决定成为不可避免的。塔斯卡当时利用最后的可能性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发言，以证实和加剧造成破裂的原因，这种破裂早已在事实上成为定局。

陶里亚蒂重新把必须使同机会主义作斗争居于首位同战争危险的威胁和社会冲突的尖锐化联系起来。他作了自我批评，承认在调整共产党的政策、使它适应进一步发展的斗争的需要方面有“延误”了；同时已承认了“一些”错误，但拒绝背弃意大利的共产党奉行的整套政策。而在这一点上，会议也以各种不同的理由集中批评了政治局原有多数派的成员，这些成员一直支持陶里亚蒂，而且始终拒绝隆哥和谢嘉一贯提出的批评。这些“少壮派”表示，他们不愿同党内这些新的反对者混同起来；他们不是向后看，而是向前看，即谋求实现这样一种政策，即从共产国际的立场出发，通过必要的批判性调整，争取实现党内的转折，包括政治上的转折（放弃争取成立共和制议会口号）和组织上的转折（党在意大利国内设立领导中心）。此外，他们对于同陶里亚蒂和格列科个人关系上的态度并没有什么变化。而其他的人，即以后的“三人团”（莱奥内蒂、特雷索、拉瓦佐利）却在陶里亚蒂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上，即在里昂代表大会以来所执行的政策延续性问题上（这三个人始终是赞成这一点的），攻击陶里亚蒂。总的说来，他们不是向前看，不是注意有关党的工作和行动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他们表现出举棋不定和思想混乱），而是向后看，企图把被笼统地认为是机会主义和摇摆的政策这方面的责任推给陶里亚蒂。在他们所持的立场中把以下两种情况混为一谈（而在某些发言中，这种混为一谈的现象就显得更加严重了）：他们一方面要求执行里昂代表大会执行的政策而指责陶里亚蒂和格列科抛弃这些政策；另一方面，他们又利用共产国际对意大利的共产党提出的其含意与上述指责相反的批评来反对陶里亚蒂。讨论的记录表明，一些政治局委员对陶里亚蒂怀有强烈的不满和怨恨，而且想利用他在共产国际中的困难处境从政治上消灭他。动机上的这种混乱也说明了莱奥内蒂、特雷索、拉瓦佐利的活动后来的发展以及他们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拥护；这在事

159

实上打破了里昂代表大会政策的“延续性”，而他们却责备陶里亚蒂没有确保这种“延续性”。尽管他们后来作了各种努力，但他们的批评所具有的特点还是使人无法把他们的批评和葛兰西从监狱中以慎重的形式对“转折”路线提出的批评混同起来。

在1929年9月3日的会议上，一向批评陶里亚蒂的隆哥和谢嘉与新反对者之间的裂痕扩大了，这也是由于隆哥在前一天即9月2日向政治局提出的关于组织工作的报告造成的。会议结束时一致赞成开除塔斯卡和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和指示。9月间，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也召开了会议，在会上陶里亚蒂得以确切说明和解释了他所作的抉择。

160 政治局、党中央委员会和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等召开的一系列国际和国内会议表明了讨论的激烈紧张程度。

轻易卷进这一场令人头晕目眩的混乱讨论中去的是几十个与本国实际脱节、同被关在监狱中或被流放的同志脱节的一小部分党员。在每一次会议上，陶里亚蒂都留下一些他自己的政治观点。他经历了作为党的活动家生涯中的激动人心的时刻。这时，他曾吐露，他又想实现青年时的宿愿，即要重新学习了。甚至这些心里话当时也是危险的。他成了“三人团”地道的人身诽谤运动的目标。党的行政人员丽塔·蒙塔尼亚纳遗失所保管的3.2万法郎一事，也成了向陶里亚蒂发动猛烈攻击的理由，因为他被认为是对这件事负有责任的人。这里提到这个插曲是为了表明旧领导集团的裂痕已经严重到了什么程度。现在一切节制都已经被打破，对陶里亚蒂的斗争已经没有任何政治团结的意图。

陶里亚蒂和格列科代表着唯一的延续性因素。但是这两位同志在气质和所受的教育方面是不相同的，而且按照习惯，他们同任何派性都是格格不入的。有人从共产国际那里拿来枪枝瞄准陶里亚蒂，准备一见到他的弱点就进行射击。怎样拯救党，拯救作为党

的领导人和作为路线、分析与风尚的某种延续性的保证人自身呢？陶里亚蒂利用了他的批评者之间存在的分裂所提供的机会。在过去和未来之间，他选择了未来，选择了青年，因为他们为他提供了行动纲领。讨论进行到一定的时候，对路线的检查就必须依靠实际经验，依靠实现路线的可能性了，而这个教训后来也就成为意大利共产党的政治财富的一部分。

共产国际提供的纲领——加速打破稳定的局面，加速群众的激进化，使革命危机迅速成熟——为组织上的转折提出了政治前提，这个转折使国内的工作成为全党注意的中心。

对陶里亚蒂说来，作出这个抉择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他必须放弃争取共和制议会的口号，这事他已通过1929年11月的《工人国家》所刊载的一篇文章来作了。这个口号现在只会成为造成含糊不清和繁琐争论的原因，同反法西斯运动的实际状况没有任何一
161
致之处。然而，三年来捍卫这个口号，反对隆哥批评，已成为称赞和发扬整个政治路线的一种手段。而且陶里亚蒂不能不设想，那些在监狱中被忽视的人们，特别是葛兰西可能作怎样的阐释。可是他还是作了决定。格列科被派到莫斯科，在那样微妙的形势下代表意大利的共产党。陶里亚蒂留在巴黎，他投入斗争，争取实现党的活动方面的“转折”。同已进入政治局的隆哥和谢嘉达成的协议表明是积极的。地下活动逐渐显出恢复的迹象。共产国际宣布1929年8月1日为争取和平、反对法西斯的日子；在这一天连意大利也发生了一些共产党人的政治活动，如张贴标语、旗帜和散发传单等。

三个事件加强了陶里亚蒂所作的抉择。10月24日，华尔街的“黑色星期四”，在全世界揭开了震撼人心的、规模越来越大的经济危机。同年11月，斯大林发表了《伟大转折的一年》；这篇文章要全党投入斗争，争取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化和农村集体化。资

本主义世界的危机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努力两者的对照，具有启发性的价值；并且肯定，意大利的共产党对阵营所作的一劳永逸的选择是有效的。

最后一件是，国内终于传来了好消息，而这些消息也是朝着早已露出苗头的方向发展的。在国内，共产党人小组增多了；这些小组进行组织工作，制订政治路线，促使法西斯政权更加不稳定，使群众具有更大的战斗性，并要求党中央更多地在意大利活动。因此，埃米利奥·塞雷尼到了巴黎，同党中央和陶里亚蒂本人联系，他指出：在那不勒斯，有一个党组织曾按照同“转折”路线基本一致的路线，在主要的工厂和大学里积极活动，而且有能力给《工人国家》撰写有创见的稿件。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陶里亚蒂走得更远，甚至于1930年1月8日在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宣称：“我们正在走向起义的形势，我们正在走向内战”。这是一次向左跳跃，这在政治行话中就叫做“鹤鹑的跳跃”^①。

由于陶里亚蒂建议把这个报告作为《工人国家》的社论发表，他就向全党指出了要在事实上而不是口头上成为起义和内战的党的任务。事态的发展后来证明，这种指示是多么不符合意大利形势的实际情况。但必须把陶里亚蒂的抉择看作政治的抉择，甚至看作谋求政治上生存的抉择；评断这一抉择不应根据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眼前效果，而应根据党以后的发展，而这样做，就能保证党在其延续性中得到发展。

^① “鹤鹑的跳跃”指忽左忽右地跳来跳去。——译者

第八章 大危机

163

一、危机的爆发

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爆发了华尔街交易所的危机。在1929年，并不缺少那种宣告工业发展和投机景气已告结束的警钟。在这一年中，已经有过股票猛跌的情况，最重要的下跌发生在3月份，在随后的月份中下跌就更为频繁。但是每一次股票上涨，又都重新掀起新的浪潮，这种上涨是由于英国和欧洲其他地方的银行提供了资本造成的，而这些资本又是超过100%的高利率吸引来的。

在股票价格波动的背后是工业发展的极度不平衡，在某些部门，工业发展达到非常高的水平。1929年，美国生产了500多万辆小轿车，这个数字只比50年代初所达到的数字略低一些。相反在冶金和建筑业却已经出现了速度减缓的征兆。但是，日益增长的不平衡是在工业和农业之间。1921年危机之后，农产品价格大大降低，并且再也没有回升过。农村更加贫困，这样就把农民赶到工业都市的贫民区中来了。从1929年一开始，经济就朝着危机方向发展，但是想使经济重新回升的力量曾加强自己的行动，而不顾最明智的观察家的小心翼翼的警告。因此，崩溃就更加是毁灭性的和惊心动魄的。

10月24日标志着“大危机”的正式开始。仅在一天之内就卖出 164
了1300万份股票，大部分是小额储蓄户。大笔储蓄户则达成协议来对付危机并以低廉的价格把卖出的股票聚拢起来。但是到了10

月 29 日,连大笔储蓄户也支持不住了。到处是一片惊恐。胡佛总统枉费心地大声疾呼,说只有歇斯底里才是危机的罪魁祸首:“经济在坚实的基础之上运行”。总统本人早在经济兴旺时期就曾断言已经接近结束贫困了。尽管情况恶劣,胡佛仍然坚定不移,固执地认为事情靠自己就能加以调节,危机能使经济得到整顿,能清除掉最弱的部分和投机的阵地。因此,他不愿进行任何国家干预(额外的公共劳务),也不向失业者发放补贴。消费骤然收缩,这就造成了物价再次下跌和连锁反应式的破产。工业生产猛烈收缩,失业者从1929年的250万增加到1932年的1200万。

危机很快跨过了大西洋。前几年涌向欧洲的美元(这使重建工作得以开始)一下子就停了下来,而同时,用于华尔街交易所投机活动的欧洲资本却掉进了10月24日所造成的深渊之中。1930年1月,美国政府确定的新的、非常高的保护主义税率阻碍了欧洲足以保持这样一种出口量:这种出口量曾提供资金来偿付美国借贷利息,特别是战争赔款,而通过道威斯和杨格先后制定的计划^①的复杂办法又使德国承受了每年达20亿金马克的重担。沉重的战争赔款和债务使欧洲在世界大战之后不能迅速恢复。

美国交易所危机在欧洲变成了银行危机。起初是1931年5月奥地利的信贷银行破产,后来立即扩大到德国。在那里,德国政府被迫于1931年7月采取措施关闭银行,然后决定事实上暂时停止发放贷款。银行危机在中欧蔓延开来并很快就涉及英国。在此之前,英国曾大力从事挽救奥地利和德国银行的尝试。冻结在德国和中欧投放的资本动摇了对英镑的信任。外国资本迅速从英国撤走。1931年9月21日英国政府不得不放弃英镑同黄金的相等比

^① 道威斯和杨格计划系指1924年美国金融学家查尔斯·盖茨·道威斯制定的调整经济和德国战争赔款的计划。以及另一美国金融学家、政治家欧文·德·杨格于1928年制定调整德国战争赔款的计划。——译者

价。英镑贬值30%。英镑跌价又席卷了其他那些同它挂钩的货币和那些拥有英镑或是用英镑签订合同的人。这样大不列颠为之付出许多牺牲而换来的使英镑重新同黄金比价相等的努力失败了，保持一种以黄金和英镑为基础的国际体系的尝试也失败了。货币不稳定的时期就此开始，同时交换关系变化多端，国际性混乱日益增长。

这场危机特别打击了资本主义的心脏。世界工业生产的四分之三都集中在四个国家(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工业生产的削减在美国和德国最厉害，几乎是40%。由于物价下跌，农业更是处于危机之中，物价下跌在美国达60%，在德国则是50%。工业国失业从1929年的1000万上升到1932年的4000万。国际性世界贸易在两年中骤然减少，这是由于金价和贸易量的大幅度减少。

以黄金和英镑为基础的货币体系的破裂，货币和信贷危机，最后还有生产的削减，农业价格的崩溃和销售不了的产品形成大量库存，这一切都促使各国为自己的利益而采取关税保护主义的措施，以及禁止或限制将会加剧危机的进口。货币自由流通的取消就导致对外汇实行愈来愈紧的控制，这样就开始了严峻的闭关自守的紧缩时期。

经济危机的爆发不仅仅造成了经济的后果，而且也造成了政治的、文化的和道德的后果。1929年的危机不像以前的周期性危机。那时在发生危机之前是物价、利润、就业上升，而这次危机之前却是长时间的停滞。这种停滞没有能减少失业人数，特别是在农业方面。即使在充分发展时期，失业人数也始终是保持在1000万人的水平上。

二、欧洲的衰败

欧洲始终未能从它被投入的1914—1918年大战的状况中恢复过来。1914年以前，欧洲在世界上掌握了实力和安全的垄断权。三个欧洲国家（英国、德国和法国）自己就保障了工业制成品生产的十分之六。欧洲控制着世界贸易的63%。伦敦曾经是货币、信贷和贸易的世界性首都。但是，欧洲也曾受到日益增长的帝国主义冲突激化的威胁。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在中欧和东欧的存在，奥托曼帝国直到20世纪初在巴尔干和爱琴海的长期存在，这些都使欧洲大陆很大一部分处在长期的经济政治落后状态，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大战在欧洲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根据不同的估计，战死的人数在1000万到1200万之间；2000万人受伤；动员了6500万人。战死的人年龄介乎20岁到40岁之间，是各国人民的精华。平民百姓受到灾荒和瘟疫的沉重打击。所谓的“西班牙”流行性感冒造成了对居民的地地道道的屠杀。对土地、居民和生产机构的有形破坏席卷了处于危难之中的欧洲大陆。

各国都通过增加国内外的债务来对付战争的经济需要。美国以原材料、军事供应和食品向盟国提供援助。货币的价值从官方来说保持到大战结束的时候。但是，谁来偿付战争中积累起来的债务呢？在经受了可怕考验的各国人民面前，法国和英国曾经持这样一种主张，即由战败者德国人偿付一切。而有人则说，凡尔赛条约已经把迦太基式的惩罚性和平^①强加给战败者了。

德国是应当偿付战争赔款的。但怎样偿付呢，当时缺少一个

^① 指公元前3至2世纪古罗马和迦太基的著名的“布匿之战”。最后，迦太基为罗马所灭。——译者

重建经济的计划。为了偿付赔款，德国不得不增加出口量，并使战胜国的经济处于危机。经济学家凯恩斯的批评就曾阐明凡尔赛条约的灾难性后果。¹⁶⁷

十月革命为各国人民指出了一个新的前景，但是西欧并没有追随俄国的榜样。在德国，帝国军队老的参谋部同社会民主党的联盟把无产阶级革命扼杀在血泊之中。凡尔赛条约并没有保障一个公正的、持久的和平，相反却在一个被民族主义争夺所毒化的大陆上留下了新的冲突的萌芽。重建被破坏地区的工作是由法国通过这样一种主张来开始的：即重建的代价将由德国以偿付赔款来保障。但是德国如果不能做到有能力来生产，特别是出口货物，那么它就不可能偿付赔款，就不可能移交财富。

1920—1929年这一时期在欧洲是经济停滞和货币不稳的时期。1922—1923年的德国的巨大通货膨胀不仅动摇了德国人民，而且也动摇了各国小资产阶级对可靠未来的信心。同时欧洲在世界上的作用也减少了。尽管拥有殖民帝国，但欧洲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从1913年的63%下降到1920年的52%。持续的失业表明欧洲经济削弱了。垄断资本的发展造成了资本的高度集中，并且促使人们采取严厉的工业改组措施，实行新形式的劳动合理化，也就是进行更加沉重的剥削。在这种条件下，即使生产有了增长，也同时存在着在业工人人数减少的现象。

大战不仅仅是动摇了欧洲社会的物质基础和打破了欧洲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早在大战之前，19世纪老的唯科学论乐观主义就发生了危机：在科学研究方面是相对论和原子革命、在哲学方面则是唯心主义和各种非理性主义流派的进展使它陷于危机。所谓人没有能力认识事物的真正本质就已经为非理性打开了大门。人们不愿把新的科学发现看成是为人类研究开辟巨大的和新的前进发展余地的手段，却宁可把这些发现看成是科学——被武断地与

老的实证主义决定论相提并论——的破产。

168

非理性流派越来越有力地站住了脚跟，尤其是在德国。在那里，战后的情况和通货膨胀使人们陷于惊慌失措的状态，从而使人们对原有的一些价值失去了任何信心，这些价值不是人类根据自己的漫长而痛苦的历史过程，而是根据自己的个人生存为自己提出来的。这样一来，人们最后就落入了随心所欲的主观主义，并试图从信仰上帝方面寻求解救办法来逃避绝望。精神分析学和社会学就作为科学研究的工具被宣扬为新的世界观，并用来缩小乃至否认历史作为不断创造新价值的过程和促成进步的工具的作用。对进步的希望受到嘲弄和公开践踏。那些年月的艺术创造经验的多种多样的丰富内容，结果竟被用来颂扬毁灭信心和把客观现实推向新的灾难。人们怀着新的兴趣重读叔本华和尼采等哲学家的书，对文明末日的灾难性看法也有了发展，这都不是偶然的。

与此同时，特别是在那些遭到大战和通货膨胀打击、被投进新的社会政治动荡的漩涡之中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当中，在变化不定的失业者和对未来失去信心的青年大军当中，对新秩序的渴望在增长。要使西方文明可以得到确保，而不致在布尔什维克危险的威胁下遭到毁灭，似乎不是要依靠认识的发展和民主政治愿望的加强，而是只要依靠一种以权威、等级和命令为基础的新秩序就可以做到了。

这样，1920—1930年的10年表明：几乎所有西欧国家的政治领导都不断地、大大地向右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作的第一批革命尝试失败之后，几乎各地都确立了温和的和保守的政府。因此1922年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的出现，就在欧洲，并且不仅仅是在特权阶层当中，引起了很多好感。左翼很少的一些成就（1924年法国左翼协定的胜利和英国工党1929年的胜利）在碰到了坚固的银墙时就很快化为乌有了，这座银墙是由大的金融集团组成的，只要能

阻止本国政治领导向左转，它们甚至准备好实行货币贬值的讹诈。从工人运动方面看，无论是社会民主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不理解国家垄断资本发展和金融集团新的国际规模所提出的新问题。¹⁶⁹ 尽管有社会民主党人希法亭论金融资本的著作，但德国社会民主党并不善于赋予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对经济生活进行公共领导的作用，即制定结构性改革政策和规划政策。后来沿着这一方向前进的还有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像鲍威尔这样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实际执行中局限于按照维也纳市取得的经验给市镇新的经济和社会职能。通过民族主义分子的暗杀使主张既同苏联又同西方国家实行国际性和解和团结的政策的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丧生，这件事又打破了从思想上看是大胆的一种孤立的尝试，这种尝试旨在推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再生，并通过对生产进行规划化的监督来恢复这一制度的合理性。

德国资产阶级拒绝任何使制度现代化的尝试，它既反对在国际上通过促进和平政策做到这一点，也反对在国内通过国家对生产进行监督和规划做到这一点。应当说明的是，德国资产阶级的保守主义受到了法国和英国资产阶级的狭隘民族主义的鼓舞。这种情况就阻碍所有国家用新的干预手段来对付1929年的经济危机。

阶级斗争继续在原来轨道上进行，社会民主党领导只起保护争取权利要求的传统行动的作用，但是，这种行动从一开始就遭到严重的通货膨胀，最后则是遭到世界经济危机的毁灭性爆发的阻挠。魏玛共和国的繁荣昌盛的左翼先锋文化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缺少一种能为德国阶级斗争提供革新方针、能及时察觉密布在地平线上的严重危险的政治理论主张。

在德国，中左联合政府（社会民主党、天主教中心和民主党）的领导越来越向右转。1925年选举兴登堡为总统就为集合在参谋部

周围的老的领导阶级提供了指挥棒，事实上，后来正是兴登堡在1933年把希特勒召去领导政府的。在巴尔干从奥地利帝国解体中产生的所有新的国家，都迅速地朝着专制和独裁的方向发生变化，
170 而这些国家本来就是曾经阻挠土地改革、代表地主的腐朽政权。只有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得以把民主政治领导一直保持到爆发经济危机。

由于1919年的分裂而严重受挫，同时又遭到中等阶层和农民群众孤立的工人阶级，显得没有能力为欧洲国家提出和平和民主进步的前景。还在共产党关于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出现之前，分裂就已经很快变成了深刻决裂，甚至是武装对抗。德国的斯巴达克运动被扼杀在血泊当中，这就已经在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留下了不能填平的鸿沟。虽然在1921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促成了联合意义上的短暂转折，但是共产党人的政策还是通过其宗派主义的条条框框而使分裂工人阶级的冲突加剧了。

对1920—1930年这10年欧洲经济形势的分析表明，共产国际有关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危机的看法是有根有据的。但是，共产国际并没有从这种正确的经济分析中得出有效的政治结论。由于坚持主张群众发生所谓激进化，坚持认为存在着新的革命高潮这一虚假前景并把社会法西斯主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主要障碍加以揭露，共产党人由此就表明他们并不理解，工人运动还没有从1919年革命前景失败和运动内部分裂所造成的后果中恢复元气。老的统治阶层的反革命行动也就轻而易举地渗透到工人阶级的分裂之中，这些统治阶层由于害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而变得有眼无珠。1929—1932年的大危机为反革命开辟了新的天地直至1933年使希特勒得以上台。

三、意大利的经济危机

1929年，意大利经济在由于里拉贬值而在稳定性方面发生了危机之后，又有了初步复苏的迹象。共产国际的经济学家瓦尔加¹⁷¹准确地观察到这一事态发展，而这恰恰是在陶里亚蒂由于低估了意大利经济危机的严重性而受到共产国际主席团批评的时候。实际上，在1929年，人均国民收入稍有增加；在工业部门就业的工人数目增加了，回到了1926年就业人数的95%；失业减少到30万；随之而来的是原材料进口的增加和贸易平衡的相对好转。

意大利经济的相对复苏是在总的生产改组和集中的基础上实现的，而生产的改组和集中又是由1927—1928年的货币贬值和大批破产之后实行的紧缩信贷引起的。通过利用外国借款，特别是美国的借款，通过把意大利股票放到世界各主要银行中去，在工业的所有最重要部门——钢铁、冶金机械和军火、化工、电力、造船、海运、汽车、橡胶——出现了大规模的生产改组和集中过程，这就产生了一些主要的垄断集团，它们在地区和干预方面分工，主宰意大利的经济生活直到大战爆发，其中一部分甚至还经受住军事失败和政权崩溃的考验而生存下来。

这一进程的弱点在于：大银行（特别是意大利信贷银行和商业银行）和半国有的信贷机构（储蓄和借贷银行、公共工程信贷康采恩等）必须不断起为工业提供资金的作用，不仅要保证运转的贷款，而且还要担负起长期投资和生产集中的资金等活动的重担。国家不得不通过自己的工具进行干预来保护大银行并负起日益沉重的担子，而这又恰恰发生在国家预算掌握了日益增多的金融手段的时候。在同一时期，农业由于全面改良土壤政策和“谷物战”也一直需要新的资金。工业家和农业主为了搞到贷款而在制度范

围内所进行的斗争造成了社会和政治的紧张,这就使墨索里尼进行调解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172

国际危机打击了处于改组过程这一微妙时期中的意大利经济。世界危机立即造成了明显的倒退倾向:生产和贸易减少,失业增加(1930年底又迅速地达到70万人,而随后几年则超过了百万大关)。从比例上看,意大利经济下降并没有美国、德国和英国厉害。以1929年人均国民收入为100,在美国,1930年降到85,1931年降到67,1932年降到47;在英国,分别降到91,87,84;在德国,分别降到85,67,47。意大利的情况则相反:从1929年的100降到1930年和1931年的93,但1932年则回升到96,1933年回升到95。货币稳定后所达到的低水平,生产繁荣在1926年的突然停止以及随之而来的衰退,这些都使意大利在1930年减缓情况恶化的速度。危机变成了停滞,这种停滞实际上一直持续到战争爆发。由于实行严格的居住条例和把城里无业者强制遣返农村,失业人数正式得到限制。

意大利经济固然能在生产方面减轻世界危机的后果,却受到欧洲银行危机影响的沉重打击。除了长期外国贷款外,意大利银行过去还可以从国际市场上取得大量的、经常更新的短期贷款,其总额约达50亿里拉。在危机的压力下,特别是在英镑贬值后,外国银行匆匆撤回自己的资本。这就给意大利银行造成了危急的局面:外国贷款收回,存户惊恐万状并纷纷提取各自的存款,工业补助的负担日趋沉重。

国家政权从两个方面进行活动来对付危机。一方面,对劳动者施加压力,减少了他们的工资。尽管批发价格下跌,但生活费用却下降不等。因此,危机期间实际工资水平降到1919年和1922年的水平之下。在工业部门,工资缩减得最少,但是,在那里,却越来越系统地采用超剥削的方式,诸如减少计件定额、削减工时、减少

职工人数。实行泰罗制、运用贝多制^①来计算工作时间，这一切在科学合理化的借口下，掩盖了意大利工厂中所实行的越来越沉重 173 的剥削。相反，减少工资和劳动日的情况在农村就更为严重，再加上强制性地遣返回乡，于是农村中密集并增加了大量失业者和半失业者。在1930—1931年，意大利农村中发生了更多、更有战斗性的斗争和示威，更广泛地发展了地下活动网，这一切就不是偶然的了。

与此同时，政府越来越扩大了国家对经济干预的范围。它像其他一切国家一样不仅采取了关税保护主义和监督兑换外币措施，不仅增加了公共工程，而且还通过国家担保向企业主发放贷款，为企业合并提供方便，促进成立康采恩。国家在经济生活中活动的增加主要表现在拯救银行，其办法是把工业证券转移到一个新的公共机构即意大利动产公司，这种情况在理论上的表现则是主张建立行会式的国家。

四、危机的政治后果

这场从根基上动摇了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在意大利使人感到，其政治上、道德上和文化上的影响要胜过经济上的后果。以为资本主义有能力保证人类不断进步的幻想遭到了打击。议会制发生明显的危机，民主制没有能力指明广阔的革新前景，这些西方的政治事态，早就为法西斯主义提供了论据来向那些被强行纳入政权组织之中的青年人揭露所谓民主——财阀统治的腐败，歌颂行会式国家，在这种国家中，法西斯主义的革命才干将得以体现。对于那些怀念期待已久的“第二个浪潮”的老法西斯分子和那些把法

^① 贝多制指美国查理·贝多创立的以一分钟计算一个普通工人劳动积累量的劳动组织方法，同泰罗制一样旨在提高工人平均劳动生产率。——译者

西斯主义看作是进行社会民族革命的手段的青年人来说，危机似乎证实了现制度对于完成行会式革命的有效性。具有反对资本主义意义的“革命振兴”是可以导致行会式国家的建立的，而在这个国家中，¹⁷⁴ 产权则会从劳动中找到自己的合法性的主要源泉。这就是在1932年5月菲拉拉会议上表现得最为系统的一些立场。

从另一方面看，则有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当时苏联正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前进，开始了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就是正在规划着自己的未来。一方面，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蔓延着失业，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世界中则通过强制规定的一些阶段走向工业化。当时在青年人的热烈讨论中常常提到和议论这“两个世界”的对比。

我国的报纸以及在我国发行很广的外国报刊常常发表国际上引人注目的赞同十月革命事业的消息。“莫斯科之行”开始变得越来越频繁了。尽管回来时人们是痛苦和失望的，但在当时去莫斯科的情况仍然有重要国际意义。经过政府同意，在《晚邮报》上发表托洛茨基的文章以及发行他的著作，固然激怒了工人党员并把那些长时间仍然是波尔迪加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的人推向共产党，但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却激起了对俄国革命及其走过的道路的兴趣，这种情况结果往往是加强寻求同共产党取得联系的决心。

政府试图利用世界经济危机来进行宣传。法西斯宣传人员声称：一场革命应当清除腐败无能的老的民主：“要么是罗马，要么是莫斯科！”其结论当然是，最好由法西斯领导意大利革命。工业家和银行家们对这种厚颜无耻的宣传并没有表现出忧虑，因为他们对政府在等待行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向劳动者转嫁危机负担这一点表示满意。但是，行会主义革命的主张激发了这样一种青年，这种青年是在政府的青年组织中成长起来并被纳入其中的，他们在寻找新的前景以摆脱货币稳定年代曾使他们深陷其内的萎靡、“冷

漠”(莫拉维亚语)、精神崩溃、“挥霍无度”(普拉托利尼语^①)的道德危机。货币稳定结束了,危机使形势动荡起来,只有通过制度进行著名的“第二次革命”才能摆脱危机。

如果说在法西斯主义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人被上述前景吸引过去了,那么留在国内并准备开展地下斗争的反法西斯主义残余力量在当时情况下则力求把自己重新组织起来。当时有天主教反法西斯力量和自由党反法西斯力量:前者局限在自己的组织之中,尽管当时已有和解协议^②,却仍受到法西斯分子的监视和攻击,后者则停留在研究和教育文化工作上;除了这两股力量之外,在国内还有其他以社会主义和民主党派为背景的反法西斯小组,它们及时学习了戈贝蒂的《自由党革命》,拒绝接受流亡国外的做法,认为应当在国内进行反对现制度的斗争,包括使用非法的手段。最初,他们曾试图聚集在像继承《自由党革命》的文化事业的都灵《巴雷蒂》这样一些文化杂志周围,或是热那亚的《石头》杂志周围。后来,在1928年4月米兰谋杀案导致的逮捕之后,在上述各杂志被取缔和短时间溃散之后,这些力量又试图奠定一个非法组织的基础。

在都灵是围绕在卡尔罗·莱维、阿达·戈贝蒂、阿尔多·加罗西、马里奥·安德烈斯的周围;在米兰是围绕在鲁道夫·莫兰迪、埃内斯托·罗西、里卡尔多·鲍威尔、翁贝托·切瓦、欧金尼奥·科洛尔尼、朱赛佩·博雷蒂的周围;在热那亚是围绕在维尔吉利奥·达尼诺和弗朗科·安托利尼周围;在特兰托是围绕在吉吉

①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和瓦斯科·普拉托利尼都是当代意大利著名作家。——译者

② 和解协议指1929年2月11日墨索里尼法西斯政府同梵蒂冈签订的协议。通过该协议,签订了“拉特兰条约”。主要内容为:意大利正式承认梵蒂冈主权属于教皇,并以“赔偿”教皇国结束后教廷所丧失的收入为名,给予一笔巨款;教廷则同意和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合作,并规定意大利天主教会必须忠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译者

诺·巴蒂斯蒂周围；在佛罗伦萨是围绕在内洛·罗塞利和内洛·特拉宽迪周围；在罗马是围绕在乌戈·拉马尔法、塞尔焦·费诺阿尔泰亚、彼特罗·格里福内、弗朗切斯科·范切洛、利昂纳·卡塔尼周围；在那不勒斯是围绕在恩里科·塞雷尼、乔治·阿门多拉、欧金尼奥·雷阿莱、马里奥·帕莱尔莫的周围；在巴里是围绕在托马索·菲奥雷和那些为建立地区组织而采取行动的青年人周围。从威尼斯、帕多瓦到巴勒莫和萨萨里，青年小组都在寻找着重新掀起反法西斯高潮的道路。

共产党的榜样和它在多次逮捕后依然顽强地开展活动以便重新建立地下组织网这对所有人都起了推动作用。在局外人看来，在一个不能了解意大利的共产党在同共产国际和本国保持双重联系方面遇到越来越多的政治困难和组织困难的人看来，共产党显示出它是一支同工人阶级血肉相联的力量，有能力顶住一切迫害。在信仰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反法西斯小组当中，人们除了钦佩共产党人的勇气和力量外，还抱有不让意大利的共产党垄断反对派的176 愿望。因此，当时存在着一种竞争的打算，这种打算有时甚至表现为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反共高潮，然而，并没有因此而同流亡国外的共产党人进行激烈论战，也没有因此而拒绝在共同的反法西斯团结中同共产党人进行接触和达成协议。在国外，共产党人和反法西斯大同盟成员之间的鸿沟变得越来越深，而与此同时，在国内，团结的理由却往往最后压倒了对立的原因。

反法西斯大同盟的领导集团曾几次尝试要从国外找到具体的技术和财政支持，以便在国内建立一个非法组织，但这些尝试没有获得积极的结果。克劳迪奥·特雷维斯^①曾对那些向他提出地下组织计划建议的人老实地说过：“请你们不要相信我们。我们是失

^① 克劳迪奥·特雷维斯(1869—1933)，意大利社会党最早的领导人，属改良派。
——译者

败者。你们自己去寻找你们的道路吧。”只是1929年7月27日卡洛·罗塞利、埃米利奥·卢苏和福斯托·尼蒂从利帕里逃走才使民主派反法西斯力量有了一个行动中心。到巴黎后，卡洛·罗塞利创建了正义与自由，这是一个打算置身于党派之外，把民主人士、共和党人和社会党人都收集在一起的运动。正义与自由打算首先在国内行动，因为国内有一个在颇有魄力的人物埃内斯托·罗西周围形成的强有力的指导中心。

正义与自由这一组织在1930年发展之快就表明在我国并不缺少强烈的反法西斯愿望和愿意“像共产党人那样做”的人；如果需要，他们也准备进监狱，只要能在我国加强以社会党和民主派为背景的反对派的存在。但是，这个运动的弱点在于它缺少有力的和团结的纲领基础。正义与自由实际上是一个由共同的行动愿望把社会党人和民主派人士联结在一起、但在纲领上意见又有分歧的新的反法西斯小组联合体，这一事实妨碍了这一运动对意大利现实作出仔细的分析。尽管正义与自由有像埃内斯托·罗西这样有水平的人，但这一组织却没有能力说明法西斯之所以取得胜利并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的原因，也就是说，它没有能力作出能同《工人国家》杂志所提出的看法较量的分析。只是更晚一些时候，即在1931年底，通过右翼和左翼分子的妥协，才得以制定出正义与自由的纲领，这时，该组织由于国内领导班子被捕，在反法西斯大同盟 177 的委托下，已具有流亡国外的各政党展开活动的那种运动特点了。也是在埃内斯托·罗西的影响下，正义与自由以老的自由主义教诲为依据长期批判法西斯经济政策，这种批判没有看出资本主义在结构上的变化，也没有看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迅速发展。

正义与自由没有明确的政治方针，但这种情况被革命的辞藻和对现制度可能垮台的预见所掩盖住了，而这种预见比共产党人在“转折”后那段时期所提出的预见更加冒失。这个运动的座右铭

是：“为复兴而起义”。正义与自由也主张举行政治罢工，并指出武装起义是推翻法西斯主义的唯一斗争形式。所以，在正义与自由中，深入群众的各种努力被弃置一边，相反却盛行轰轰烈烈的壮举，这实际上表现为对大胆的行动和“少数优秀人物”的个人活动给予援助和精神上的鼓励，因为当时认为这些行动和活动将会震动群众的麻木不仁，如社会党人费尔迪南多·德罗萨1929年10月24日在布鲁塞尔行刺皇太子翁贝尔托和1930年7月11日乔瓦尼·巴萨内西驾着飞机冲向米兰那样。就连在马里奥·温奇圭拉推动下成立的全国联盟这样一些温和小组也相信劳罗·德博西斯不幸的飞行这种宣传性行动的效果（劳罗·德博西斯曾驾驶飞机在罗马上空散发宣传性传单，之后在返回法国途中丧生）。

1930年10月30日，正义与自由的国内领导班子被捕，他们是：埃内斯托·罗西、里卡尔多·鲍威尔、费鲁乔·帕里、翁贝托·切瓦（在狱中自杀）、内洛·特拉宽迪、吉吉诺·巴蒂斯蒂、弗朗切斯科·范切洛。特别法庭迅速审理了案件并判以重刑。在这次打击后，正义与自由的国内组织就一蹶不振了。这不仅是由于组织上的原因，而且也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该组织在政治上和纲领上的软弱无力促使那些原来加入正义与自由的社会党人自行组织起来，如鲁道夫·莫兰迪和欧金尼奥·科洛尔尼所做的那样，建立了社会党国内中心。另一方面，还有一些受克罗切的主张直接影响的具有民主—自由主义倾向的反法西斯小组，如乌戈·拉马尔法、利昂纳·卡塔尼、塞尔焦·费诺阿尔泰亚，尽管他们保持着个人关系，却避免促使人们采取地下组织的形式。此外，还有一些反法西斯青年小组，它们没有参加正义与自由，尽管它们参与了筹备工作。这些小组被共产党对国家现实的分析 and 苏联所起的国际作用所吸引，已经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并且相信工人阶级是反法西斯革命的领导力量。先是曼利奥·罗西·多里亚，后来则是埃米利

奥·塞雷尼，以这些小组的名义在1927年底和1930年1月同我们党的中心有了接触。埃米利奥·塞雷尼曾对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小组进行过耐心教育工作和吸收共产党员的工作，他当时能够为党的中心提供同一个在那不勒斯工厂和大学中有基础的组织建立直接联系的手段。

五、意大利的共产党的“转折”

在世界和意大利形势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党的中心迅速发展了为争取实现“转折”的斗争，其目的在于不仅使党的工作，而且也使“党组织的领导总部”返回意大利。

从隆哥于1929年底拟定的文件中可以找到这些说法。这个文件说明，上述方针应以“一切必要的谨慎”来实现，但接着又补充说，要“在今后几周内”实现。确实，当时存在着国内形势急剧发展的政治前景。在这种情况下，拖延实现使党的领导返回意大利这一目标将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在1929年12月2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隆哥的计划遭到莱奥内蒂·特雷索和拉瓦佐利的反对。看来，分歧很大，并且关系到党的整个工作纲领和政治方针。特雷索提出一个相反的计划，强调党在国内开展行动所要付出的代价，并提醒说，数千名共产党员已被关进了法西斯监狱。“三人团”声明反对把政治行动中心转移到意大利，也反对把一些政治局委员派往意大利，因此也就是反对建立政治上有效的国内中心。

个性上的冲突和道德上的怀疑更毒化了这一争端。开除塔斯卡已经破坏了意大利共产党特有的老一套做法，即把冲突保持在政治方面，而不使其变为个人的事情。“三人团”就丽塔·蒙塔尼亚纳丢失现款一事攻击陶里亚蒂，并指责他是机会主义和搞两面

179

派，这造成了恶劣的后果。另一方面，“三人团”被指责不想实现转折，是为了不致因此而被迫秘密返回意大利，从而有被捕的危险。直接参加国内非法工作的个人问题是所有主张转折的人所强烈感受到的问题。陶里亚蒂就曾向共产国际提出他自己也要非法地回到国内去。为了不让陶里亚蒂、隆哥、格列科和迪·维托里奥从事国内非法活动，共产国际主席团曾不得不正式开了一次会。但是，这样做当然并未使解决同“三人团”的关系的问题变得容易些。

政治局分成了两派：多数人同陶里亚蒂、隆哥、卡米拉·拉维拉以及代表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彼特罗·谢嘉一起主张“转折”；少数人同莱奥内蒂、特雷索和拉瓦佐利一起反对“转折”。西洛内当时患病并滞留在瑞士，他长时间保持一种暧昧的立场，实际上是对“转折”有反感。格列科当时在莫斯科，他自然是表示赞同多数人的路线。冲突立即变得尖锐起来。共产国际主席团过去总是指责意大利的共产党为调和主义，这次看来对该党内部斗争的迅速发展感到意外，并在莫斯科召开了意大利党委员会会议。这一次陶里亚蒂表现出决心迅速地走到底。他给莫斯科送去了作为政治纲领的文章《转折的必要性》。这篇文章登在《工人国家》1930年2月号上；在这篇文章中重新提出1月8日在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上曾经阐明的¹问题：形势恶化、群众趋于激进和加强斗争、法西斯群众基础陷于瓦解。“主导因素将是劳动群众的造反、起义和内战”。必须填补起义的可能性与党的组织力量薄弱之间的差距。当时指出的政治目标是政治总罢工。

180 在莫斯科，“转折”的主张通过了，并在作出最大努力挽救前领导集团中唯一的工人成员拉瓦佐利之后，终于支持了陶里亚蒂，但并不是满腔热情地支持。有了莫斯科的赞同，陶里亚蒂立即行动起来。“三人团”在莫斯科寻求保护，因而奉行忠于共产国际的路

线,但是,这条路线同他们已经向托洛茨基运动提供的支持是相矛盾的。1930年3月20日,“转折”的主张在列日明显地占了优势。中央的决议得到了一致通过,也就是说,连那些过去曾对这一决议的有效性表示异议的人也同意了。只采取了一些无足轻重的组织措施。

根据贝尔蒂提出的报告,大家也同意开除波尔迪加;当时,贝尔蒂已经摆脱了警察的流放,秘密侨居到国外,他能够证明波尔迪加在托洛茨基问题上所挑起的争论。党的中心提出要帮助波尔迪加离开国内,这样做既是为了使他能去找共产国际谈谈对他采取的措施,也是为了使他能躲避警察的监视和不致有在道德上身败名裂的危险。但是,波尔迪加对直接由共产党那不勒斯省委员会委员乔治·阿门多拉向他提出的建议作出了否定的答复。

“三人团”也同意开除波尔迪加,但是随后他们马上就在法国托派报纸《真理》上展开了批评意大利的共产党和对陶里亚蒂进行恶毒人身攻击的宣传运动。“三人团”聚合在一起的政治基础能是什么呢?他们尽管都曾反对波尔迪加并赞成开除托洛茨基,但在《真理》上却又开展上述宣传运动,其原因又是什么呢?他们聚合在一起的唯一可能的基础看来是拒绝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口号和必须用工人和人民力量的统一阵线来对抗纳粹主义。但是,这一政治理由表露得并不明确,而且也并不能为这种不可否认地具有两面派色彩的行动辩解。尽管共产国际作出最后的努力来推迟事态发展,但情况还是急转直下,中央委员会1930年6月9日扩大会议决定把莱奥内蒂、拉瓦佐利和特雷索开除出党。对于试图既同意大利的共产党中心又同“三人团”保持联系的西洛内的决定则在稍后一些时候才作出。

就这样,在一年时间内,过去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从未采用开除这一武器的意大利的共产党不得不开除了整整四名政治局委员,

此外还要加上波尔迪加。这是采用共产国际所提倡的新方法的迹
181 象，尽管这一次共产国际主席团却想使用它过去多次指责意大利
的共产党的那种调和主义来和稀泥。但这也是党的中心处于严重
局面的迹象；当时，党的中心脱离国内，不得不讨论一些未被事实
和足够深入的工作经验所证实的分析。今天看来，当时双方在讨
论中的论证都是错误的，同当时国内实际情况并不相符。中央委
员会多数所决定的路线固然没有导致起义和内战，但它毕竟还是
保证党在意大利能积极地存在下去，使党能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
建立起同国家现实的联系。这样，党就得以避免陷入移居国外人
士的争论、严重的个人之争、由共产国际从上面强迫改变领导班子
这种泥潭之中。

“转折”将再次表明，一条政治路线的有效性并不在于提出这
一路线的理由，而在于这一路线使人能够取得的结果。

六、葛兰西和特拉齐尼的批评

意大利的共产党通过组成新的领导班子而实现的转折，把像
莱奥内蒂（曾参加过《新秩序》工作）、特雷索和拉瓦佐利（工人出
身）等这样一些党员开除出党，以及拒绝共和制议会这一口号，所
有这些都不能不在囚禁在法西斯监狱内的同志们中引起激动和批
评。葛兰西、斯科奇马罗和特拉齐尼当时是这样一个领导班子的
代表：这个领导班子曾使党从波尔迪加同共产国际决裂所引起的
危机走到里昂代表大会。葛兰西对陶里亚蒂的修养和才智当然是
有好评的，因为他曾依靠同陶里亚蒂的合作来起草在里昂代表大
会上所提出的提纲材料。但是，1926年10月，在葛兰西写给共产
国际的信而陶里亚蒂又没有把信呈交上去这一问题上所发生的冲
突，不能不在葛兰西这样一个敏感的人的心灵上留下长久的痕迹。

根据过去的经验，葛兰西对格列科和其他同志的看法肯定不会是好的。葛兰西反对隆哥和谢嘉，因为他们执迷不悟地、令人厌烦地反对过渡性口号。 182

领导班子的破裂、“三人团”的被开除、党的领导由一个看来是混杂的集团所接替，这些就是引起一些同志怀疑和不信任的原因，这些同志就像所有那些突然失去活动的人一样，必然还会留恋自己被捕时所采取的政治立场。同样，后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转折在开始时也曾使那些在1930—1933年亦即按照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会和第六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政治路线进行活动时期被捕的同志感到困惑，并遭到他们的批评。党的政治路线的改变在监狱中引起了旷日持久的强烈反应和纷纷议论：在关于1929—1930年的转折是否有效的讨论还在热烈进行时，就传来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所决定的新的团结政策的回音。

在图里监狱中，大家都很重视葛兰西对“转折”所持的批评性立场和他对共和制议会这一口号的维护，把这一点看成是“击中要害”，开阔人们的思路，引导公开讨论。葛兰西没有把讨论继续下去，因为这时他看到这种讨论有可能变为派别斗争。另一方面，葛兰西同其他被关押在图里监狱中的共产党员的关系变得格格不入了，这不仅是由于葛兰西性格忧郁所致，而且还由于葛兰西因健康原因和当局对他的照顾肯定有一些政治考虑而得以享受到相对优惠的条件所致。葛兰西不接受在狱中集体内处理共产党员关系的过分的平均主义。他认识到自己正在撰写的著作的重要性，因此就珍惜地维护能使他继续从事自己工作的条件。

即使排除了上述属于个人方面的看法，党的中心和被囚禁在狱中的最有威望的同志之间的冲突也是巨大的。而且由于新来的人对新的政治路线所作的介绍往往是简单和幼稚的，冲突也就变得更加严重了；这些新来的人都是在1930年和1931年大逮捕时

183 入狱的，他们很容易谈论什么法西斯即将垮台，群众在激进化，要清除社会民主党的基础以及政治总罢工、起义和内战的条件在加速成熟。那些虽然被关在狱中，却仍然掌握一些情况（依靠家庭联系、监狱卫兵的举动和仔细阅读杂志来了解这些情况）从而能判断政权的牢固程度的人则拒绝了上述前景。

最明显的冲突可以从特拉齐尼和陶里亚蒂之间的书信往来中看出，但这一冲突的表现却还是十分心平气和的。特拉齐尼曾主动从他的女友阿尔玛·莱克斯那里秘密地得到了刊登在1930年3月号《工人国家》上的14点决议：《论意大利局势和意大利的共产党的任务》。1930年8月，特拉齐尼写了一封长信（还是通过上述途径），明确表示了自己对党的领导工作的批评性意见。为什么要“清除一批……英勇的革命分子”呢？党的中心“过高估计意大利形势的严重性”。当然，在经济方面“情况微妙”，但还是会有“某种回升”。特拉齐尼说，因此应当排除“形势决定性地恶化了，或有了重要的变化”等说法，这些说法是用来证明党的路线要作“果断有力的转变”的，所以也就必须拒绝政治总罢工这一目标，“保留到一个有更大得多的发展的阶段”。特拉齐尼引用他与葛兰西和斯科奇马罗在“大审讯”时所交换的意见坚持说明，无论如何，应当预见到资产阶级在困难的情况下将会退到“民主执政的方式”上去。人们如果要正确地避免混淆法西斯主义和资产阶级，那么就要看到，实际上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一个工具，而并不是资产阶级绝无仅有的执政方式。这就是“民主中间阶段”的主张。这一主张理所当然地排除社会民主党法西斯化的论断和社会法西斯主义这一口号，尽管也认为社会党人起了维护资产阶级的作用。

特拉齐尼的批评是一针见血的，但表达方式却是平静的。他要求了解情况并自荐负责同党的中心保持接触。现在还存有1932年陶里亚蒂写给特拉齐尼的信，在这封信中，陶里亚蒂重又强调指

出那种认为民主阶段必不可少的观点的机会主义危险性。总而言之，政治冲突泾渭分明，但这一冲突并没有发展到组织方面，这既¹⁸⁴是由于狱中同志们的公正态度，也是由于陶里亚蒂的谨慎小心，尽管当时意大利的共产党受到压力，但他还是避免不让来自狱中的批评得到传播，这也是为了避免产生新的问题。

安东尼奥·葛兰西不愿意采用秘密通信手段。1930年6月16日，他的兄弟杰纳罗到图里来看望他，他是从杰纳罗那里了解到情况的。在巴黎党的中心工作的杰纳罗受陶里亚蒂的委托向他的兄弟扼要地通报了“三人团”的问题。后来，也就是25年后，杰纳罗承认自己当时撒了谎：告诉陶里亚蒂说葛兰西表示同意，这是由于害怕引起决裂。但是，十分可能的情况是：意大利的共产党中心通过杰纳罗和其他消息来源已了解到图里政治集体中所进行的政治性讨论。

不论如何，1933年葛兰西的一位狱友阿托斯·利萨在大赦出狱后，来到国外并在一份报告中汇报了讨论的情况以及葛兰西所阐明的观点。这些观点同特拉齐尼已经表明的意思一样，是明显反对共产国际所决定的路线的。葛兰西论点的中心问题是“立宪”。葛兰西提出了著名的“击中要害”说法，指出无产阶级同中等社会阶层结盟的政策的重要性，团结，特别是同南部劳动人民团结政策的必要性。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不是什么一蹴而就的东西，而是一个过程，是接连不断地发生一些事件，这一系列事件使工人阶级得以赢得稳定的领导权，并在社会力量方面以及与这一基础相联系的政治力量方面建立由工人阶级及其盟友组成的新的“历史性集团”。

葛兰西的教导当时主要是针对最高纲领主义的。最后，连葛兰西也并不认为形势是爆炸性的。所以就不必害怕搞政治，就应当采取政治主动，对其他政治力量开展工作，就应当让共产党员表

现出是“立宪”口号的旗手。

185

由于葛兰西本人的意愿，图里集体中的讨论不久就中断了。他希望避免造成分裂主义的气氛，不使小集体的生活受到这种气质的毒化。也许他兄弟的来访尽管并未使他相信“转折”的有效性，却使他不加加深同党的中心的冲突。当时葛兰西还感到自己有一项工作要做，他也不想因此而分神。这样就造成了他在精神上的某种孤立，并且由于一些同志对他在狱中的态度提出批评，这种孤立变得更加严重了（这些同志认为，他在狱中的态度是合法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在狱中集体生活中，平均主义是使党员在思想上和感情上互相帮助的基础，它使党员得以迎接并克服那些年月中的严峻考验。但有时，在某些情况下实行某些平均主义准则却是僵硬的，甚至是可鄙的。对葛兰西本人的尊敬以及他的身体状况虽然使葛兰西摆脱了一些不正确的平均主义措施，但并不能使他避免他不得不痛苦地忍受的批评和埋怨。

在党的中心，陶里亚蒂努力避免把争取执行通过“转折”决定的新的政治路线的斗争机械地搬到意大利监狱中来进行，从而造成新的分裂。所以，他千方百计地避免把葛兰西、特拉齐尼和斯科奇马罗的名字牵扯到就“转折”问题所展开的论战的炽热气氛中去，甚至不通报自己所掌握的情况。在1930年1月号《工人国家》上发表葛兰西有关南部问题的论文是一个政治行动，其重要性是不应低估的。葛兰西这篇文章的中心是工人阶级同农民和南部劳动群众联盟的问题。这一问题的阐述对知识分子作用的强调，都是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所产生的公式主义相悖的。1月8日，陶里亚蒂在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上讲话，他采取了破釜沉舟的做法，投入争取“转折”的斗争，而与此同时，他又通过公布葛兰西关于南部问题的主张，明确地重申他所一直努力维护的这一政治财富的有效性。葛兰西的这篇论文是用薄纸出

版的。这个小册子在意大利广为传播。被派往国内去的人的箱子在夹层中不仅隐藏着有“转折”口号的《团结报》铅版，而且还有葛兰西的这篇文章的印本。还在1931年和1932年冬，由党的干部送到意大利去的箱子中就有葛兰西这篇著作的印本，这就使正义与自由和意大利社会党的成员也能得到这些材料了。

新的政治运动成员们第一次直接了解到这个被关在图里的人的思想。在这些人的思想中，葛兰西文章的立场同党的中心所作的与之矛盾的指示之间怎样实现政治上的联系呢？当时在基层工作的党员所抓住的中心论点是葛兰西对意大利资本主义及其在历史上没有能力解决全国社会性问题所作的批判，是他对老的统治阶层集团所进行的活动活动的揭露，而他之所以这样做，也是由于像贝内代托·克罗切和朱斯蒂诺·福尔图纳托这样的知识分子所进行的工作的结果。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和现实性，工人阶级为进行反对法西斯和资本主义的共同斗争而同农民和南部劳动群众建立联盟的必要性，这些都是来自这一批判。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极其严厉的批判，可以不包含社会法西斯主义这一用语，但同党对社会党人的激烈论战却是相吻合的。这样，在1930年看到葛兰西文章的党员的思想中，就确认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反法西斯和人民的性质。反法西斯革命要么是无产阶级的，要么则不是。这一立场后来遭到共产国际热心的检查官们在第十一次全会上严厉的批判。这些人希望人们只谈无产阶级革命，而不要加上无益的、在他们看来是危险的形容词。强调无产阶级革命的“人民性”的格列科，就曾在共产国际杂志的一篇社论中被正式扣上“臭名昭著的机会主义者”的帽子。

在狱中进行的讨论当中，特别是在文章当中，葛兰西立场中一个确定不移的观点是对托洛茨基立场的批判，指出托洛茨基是“在正面进攻只能导致失败的时期却主张正面进攻的政治理论家”。当

然，葛兰西的批判是从另一个历史角度，从不同于同一时期共产国际所采取的方针上提出的，当时共产国际自己也在鼓励进行正面进攻。但是，当“三人团”同托洛茨基勾结在一起时，葛兰西对托洛茨基的批判就表明后来有人抱有这样一种企图是多么牵强附会；
187 这种企图居然想把葛兰西对“转折”的批评同导致“三人团”被开除出党并同托洛茨基相接近的态度联系在一起。

在反对当时的凭空捏造时必须指出，意大利的共产党的中心，特别是陶里亚蒂，始终保持着同葛兰西的接触。如果没有党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包括物质支持），葛兰西的妻妹在意大利的处境就不可能有保障。

此外，“转折”之后，在党的报刊和行动中没有明确提到葛兰西也并不是真实情况。大家都看到，《工人国家》在1930年1月份发表了葛兰西论南部问题的文章。在乔治·阿门多拉刊登在1931年6月号《工人国家》上的文章《同无产阶级站在一起或者是反对无产阶级》中就广泛引用了葛兰西的话，而且也提到了戈贝蒂。任何人都不会由于提到这些话而对这篇文章提出批评，这篇文章是由格列科和陶里亚蒂修改过的。

七、实现“转折”的困难

有关“转折”的消息固然在监狱中受到意大利的共产党前领导人的许多批评，但在意大利侨民中，在旅居国外并参加其他兄弟党和反法西斯无产者委员会的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小组当中，意大利的共产党的新政策却激发出巨大的热情（反法西斯无产者委员会曾想成为群众性的团结组织，但相反却是小小的、孤立的战斗先锋队）。此外，其他反法西斯政党的报刊在当时也强调意大利经济危机的严重性，并指出这在政治上可能造成的后果。逃离利帕

里,建立正义与自由,德罗萨、巴萨内西和德博西斯壮烈之举,无政府主义者斯基鲁刺杀未遂,这一切都表现当时出现了恢复反法西斯行动的尝试。

反对“三人团”的政治斗争在参加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和瑞士兄弟党的党员小组当中进行得很激烈,并重新提出和进一步强调最近几年进行的对托洛茨基分子和波尔迪加分子集团老一套论战的原因。问题变得既简单又单纯:是千方百计地返回意大利,包括采用非法手段,以便反对现政权的种种势力,并从一开始就作为共产党人去领导人民运动,使之走向胜利呢,还是仍然留在国外“潜伏”下去呢? 188

经济危机到处泛滥,并且动摇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从苏联传来了社会主义建设困难的消息。这时在由于政治原因而移居国外的意大利劳动者当中也出现了转向赞同意大利的共产党的情况。在各个反法西斯政党中都形成了少数派小组,它们敦促同意大利的共产党保持接触并达成协议。侨居国外的共产党员中自愿表示要担当共产党的非法专职干部和在意大利开展政治工作的人成倍地增加了。新的一批职业革命家给削弱了的党的力量补充了新鲜血液。

“转折”已经决定了,1930年6月中央委员会已开除了“三人团”,党的中心任何犹豫不决的理由都没有了。在炽热的论战气氛下,毫无道理的希望变得更加强烈,政治纲领的提法也进一步夸大。当时甚至还不乏向左转的推动力,特别是来自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和谢嘉的推动力。他们指出,必须建立不仅由共产党员而且由愿意采取行动的工人组成的“保卫小组”。他们向青年人提出成立“青年义勇队”的指示。党实际上拒绝了搞个人恐怖活动的提议。这是同共产党人的习惯和修养格格不入的斗争形式。在党的中心的内部讨论中找不到准备开展恐怖活动的具体建议。

当时对反法西斯的斗争问题始终是从政治上来看待的，是把它作为一种推动群众运动的需要。要求建立武装小组，从而很快地把群众广泛发动起来的前景是没有根据的。共产党的报刊当时用起义前的语言来讲话，并且强调必须加速武装斗争的准备。实际上当时有一些组织把8月1日国际反战斗争日同政治总罢工日混为一谈，这些组织后来受到失望情绪的冲击，并由于鲁莽的和过早的暴露而遭到警察局的打击。

共产国际并不是没有批评极端主义的表现和号召以暴力形式进行街头示威的做法。格列科在从莫斯科写给陶里亚蒂的信中也批评了这种勉强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也使反对“三人团”的斗争在政治上变得更加困难了，而在1930年春天这场斗争还没有最终结束。陶里亚蒂试图掩盖所犯的错误并为之辩护，他敦促谢嘉自己去采取行动纠正极端分子中的混乱现象。但真正地纠正错误首先是在事实的压力下进行的。

经济危机并不具有崩溃的特点。而是在政权的控制下慢慢地发展的。工人和人民的示威游行同前几年相比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而且，根据警察局的统计，1930年的示威游行次数还少于1929年，176次对190次。这些示威游行都是突发性的（一般是为了反对减少工资），而且都是以民兵和宪兵以及工会干部迅速介入而告终，并没有造成强力镇压。警察局把示威游行的鼓动者孤立起来，对他们进行威胁，有时也对他们提出警告。旷日持久的司法审讯是很少的。1930年11月24日在都灵发生的失业者在劳动局前示威是重要的事。该市约有2万名失业者，他们代表一种危险现象，这就促使省督下令把在都灵没有住处的失业者立即强迫遣返回乡。这样一来，政府就把一场可能变成危险的斗争运动压制下去了。面对这种镇压性的干涉，都灵劳动者的反应却没有能够得到具体的表达。

农民斗争具有更为激烈的性质，如马尔蒂纳—弗朗卡一地的

斗争就是这样,在那里,为了抗议对葡萄酒征收新税而于4月间放火焚烧了税务所。这样的事实就成了进行批判性思考的理由:骚动的中心是在雇农和农民地区,如艾米利亚、托斯卡纳和普里亚,与此同时,大的工人中心却没有动静。而且党的组织也是在雇农和农民地区得到蓬勃的发展。1930年初,党的统计数字表明,仅在艾米利亚一个大区所登记的党员就比北部所有大区的党员还要多。这种不平衡在这一年中更加严重了。秋天,在艾米利亚和托斯卡纳的党员分别为1624人和1215人,而在都灵和米兰分别仅有63名和70名工人党员。根据党的中心寄给共产国际的汇报材料,在菲亚特—林戈托就仅有11名组织起来的党员,在布雷达—圣·乔瓦尼仅有2名党员。而利古里亚大区(热那亚、拉斯佩齐亚、萨沃纳)工厂中的共产党的存在则较明显。 190

在这些统计数字中,“组织起来的共产党员”是指这样一些党员,他们冒着危险同党的中心保持有组织的联系。那些“没有组织起来的”共产党员则很多,但无法统计其数,这些党员蓄意不想参加组织生活,也不接受党指出的法西斯主义垮台近在眼前和存在起义前形势这一前景,因此他们不愿过早地卷入主要是宣传性的活动,看不到这种活动究竟有什么具体好处。

党在大工厂中力量薄弱是一个使党的中心长期伤脑筋的问题,并且这种情况也同党组织在艾米利亚、托斯卡纳以及南部的普里亚的蓬勃发展形成了鲜明对照。1930年和1931年,在艾米利亚出现了工人党员大批从改良主义和最高纲领主义立场转向共产党立场的情况。在雷焦·艾米利亚省不少劳动者虽然仍拥护普兰波利尼^①,但他们还是决定加入意大利的共产党。甚至还有这样的传闻:正是普兰波利尼本人作出这个指示。1930年和1931年发生

^① 卡米洛·普兰波利尼(1859—1930),雷焦·艾米利亚人,记者,主张发展合作社运动,为意大利社会党改良派。——译者

的上述变化所取得的宝贵结果，后来从抵抗运动中体现出来。

实现“转折”的真正困难在于难以在意大利建立起一些能够持续存在下去并得以把党的领导活动从国外转移到国内的国内领导中心，而最初的意图正是这样的。由卡米拉·拉维拉和巴蒂斯塔·桑蒂亚所领导的第一个国内中心在进入国内一个多月后就失败了。1930年7月10日，卡米拉·拉维拉和布鲁诺·托辛就在阿罗纳被捕了。这两位同志被捕是由于埃罗斯·韦基告密所致，此人也是党的专职干部和国内中心成员。他在被法西斯警察局抓获并在提供出抓到拉维拉的办法而获释后，企图打入党的组织继续进行其特务活动。然而，韦基在企图销毁其叛变痕迹之后，其特务身份还是在拉维拉本人提供的情况的基础上被党的中心识破了，并在191 萨特鲁维尔(巴黎附近)受到国外中心的一个委员会的审判。10月25日他被判处死刑，他的头部被一颗手枪子弹击中。人们以为他已经死了，但他却趁审判员们不注意的当儿，从屋子里跳了出去，并得以逃之夭夭。萨特鲁维尔这个小城市曾有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一个基地，这样，这个小城市就遭到了法国警察的搜查。这件事引起了不少议论，但也表明就是在主张武装斗争的人中间也有不少心血来潮和唐突之举。

桑蒂亚是唯一在上述尝试中得以保全下来的国内中心成员。一个由朱赛佩·多扎和多梅尼科·丘福利所组成的新的国内中心建立起来了。第二个国内中心没有垮台，其存在的时间延长了，但几个星期后，又被另一个新的国内中心所代替了，这一次是由谢嘉本人领导的，他受命筹备党的代表大会。

1930年对党来说是以沉重的损失而结束的。根据共产党的统计，被告发到特别法庭的人在1930年约有3000人，其中大部分人获释或者被流放。1930年特别法庭审理的案子共35起，对199人判了刑，刑期总计达962年监禁。政府用强硬手段回答了重新掀起反法

西斯活动的尝试。案件审理的速度加快了，报刊对刑期广为宣传。继埃内斯托·罗西、里卡尔多·鲍威尔、弗朗切斯科·范切洛和自由党人马里奥·温奇圭拉被判以重刑后，轮到共产党人埃米利奥·塞雷尼和曼利奥·罗西·多里亚，他们被判刑15年。

尽管有逮捕，但宣传性示威游行还是增加了。1930年11月7日是在墙上书写标语和悬挂红旗以示纪念的。但是，党的活动并没有超出断断续续的宣传性示威游行。党不得不承认，由于经济原因而爆发的自发运动并没有转变成公开同法西斯合法性相决裂的尝试。1930年最初几个月发出的起义前的号召，被更加平心静气地研究意大利阶级斗争赖以进行的具体条件所代替。“转折”在不多几个月后就趋向于使自己的推动力枯竭了。这也是促使党的领导要组织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来仔细研究意大利形势，讨论并通过党的政治路线，使为反对“三人团”、塔斯卡和波尔迪加而采取的组织措施得以通过，从而最后使新的领导集团能具备合法资格的一个原因。

八、第四次代表大会

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在由谢嘉领导，安东尼奥·奇卡利尼，路易吉·弗劳辛和路易吉·格拉西组成的国内中心的有力推动下紧张地进行着。这时“转折”到了最高峰，党动用了自己最优秀的力量。在谢嘉的合作者中有三位同志后来在抵抗运动中牺牲了；为了纪念他们的牺牲，授予这三位同志三枚金质奖章。他们是：路易吉·弗劳辛，吉诺·门科尼和桑泰·温琴齐。

通过报刊的传送和口头通报情况，党员都动员起来用当时可能的方式来讨论党的文件。各省代表大会是用分散开会的方式来进行的。与会者不知道他们中间谁将被选为自己的代表去参加全

国代表大会。谢嘉亲自参加了都灵、莫德纳和拉斯佩齐亚省的代表大会。此外，还必须使每个代表都能秘密地离境，为他们提供证件和住所，过问技术和组织准备工作中最起码的事情。代表们常常不得不使用注册为外国公民的证件，而他们并不懂这些公民所操的语言。警察局在侦察这类加紧展开的活动，并加强了自己的工作。3月份，许多党的干部被捕。包围圈在缩小。3月30日，切尔索·吉尼被捕，与此同时，这次代表大会的组织者彼特罗·谢嘉在离开意大利的前夜也落到了警察局的手中。

28名基层代表终于还是克服了重重障碍，越过国境来到科隆。1931年4月14—21日在这个德国城市中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28名基层组织的代表除一人是南部(那不勒斯)的以外，几乎全都是中北部的。这些代表带来了新鲜空气，他们同中央委员会10名成员、国外中心机关的1名代表，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3名代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的代表，意大利共产主义国外(法国、比利时、瑞士)小组的代表以及各工作
193 部门7名来宾相比是占优势。国内组织代表28名，国外中心和侨居国外的组织的代表才21名。参加这次大会的还有共产国际的1名代表，德国人赫凯尔特和比利时、法国共产党的代表。在与会者中有35名工人、3名手工业者、2名雇农、2名农民、7名职员、2名学生、5名知识分子，但是这种社会成分并不反映党组织的实际情况。党在工人集中地区中力量薄弱，而在雇农和农民地区中则发展迅速。代表的平均年龄是31岁，但是在基层28名代表中有10名代表是1926年以后入党的。这表明党在革新，在发展，通过吸收新党员而填补了由逮捕所造成的空白。

第四次代表大会是“转折”最宝贵的成果。这次大会打破了只在上层进行有害无益的讨论这种恶性循环，使国外中心直接同基层和国家现实有了接触，消除了许多框框和被曲解了的观点。代

表大会开始是陶里亚蒂作报告，报告持续了四个小时。这使基层代表感到吃惊，他们不习惯这样长篇大套的演说。报告谈了许多有关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会的立场，这一立场后来被意大利的共产党在反对“三人团”的斗争中接受并加剧了。陶里亚蒂指出，已经持续了一年半的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的危机。这场危机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范围内发展的，其结局并不一定是灾难性的。一切都取决于革命运动的行动能力。危机不会机械地导致无产阶级革命，任何一次经济危机的政治结局总是取决于阶级冲突中占优势的力量。危机促进资产阶级力量的反动性团结。法西斯主义体现了这种团结，社会民主党的法西斯化是这一进程的另一个侧面。在意大利，问题是要从宣传活动走向群众性的斗争活动。这是代表大会的主要结论：在由政权组织起来的群众基层中进行工作；面向农民和天主教群众；使法西斯内部矛盾爆发出来。号召在那些不仅在组织上而且在政治上仍受法西斯主义控制的群众当中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以此代替了1930年初的那种火一般热情的语言。共产党员如何在法西斯组织中积极开展工作的问题是党在科隆代表大会之后讨论的题目，也是党据以作出努力和进行工作的题目。

这样，“转折”的路线就被接受了，但也作了明显的修改。来自基层的党员所介绍的情况肯定不是起义前的形势。实际上政治总罢工的口号无人问津。很少提到组织武装小分队。相反，强调的却是必须在士兵中有组织地开展的工作。从发言看，共产党员不仅在推动工人和人民群众进行广泛的斗争运动中有明显的困难，而且在同党的中心保持固定的组织联系上也有明显的困难。劳动者生活条件恶化的情况被揭露得一清二楚。来自国内的代表还谈到：存在着不满情绪，但这种情绪并未能变为有组织的斗争运动。会上有力地强调了南部问题和民族问题（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并且也引用了葛兰西的教导。在大会前的讨论过程中，《工人

国家》也发表了葛兰西的东西（1931年第3、4期合刊登载了葛兰西1925年的文章：《群众思想准备的必要性》）。

社会民主党变成了社会法西斯主义的论点毫无困难地被接受了，大会确实是以仇视的态度把攻击矛头指向了该党侨居国外的领导集团，在国内则是对准了改良主义者里戈拉和达拉戈纳，他们通过《劳工问题》杂志表示赞同法西斯政权。这两个人立场本来应当证明社会党那种要与法西斯主义同流合污的倾向。然而，这并没有排除党同社会主义运动和正义与自由的国内领导人采取联合行动的可能性，据说其目的是为了“分化”这些组织，使最有战斗性的分子站到共产党一边。但与此同时，为对付危机而聚集在法西斯主义周围的资产阶级力量集团的确立和存在却排除了这样一种假设：即意大利资本主义能奢望社会民主党领导政府。这实际上有助于表明：法西斯主义同社会民主党是有区别的（尽管有种种论战性的说法）。

195 因此，第四次代表大会有助于在党的中心和国内存在的基础之间确立了新的政治关系。在国外召开特别代表大会而大多数代表又来自国内这一具体事实，再一次使共产党同侨居国外的其他反法西斯党派以及正义与自由组织本身相比，威信增加了，这种新的威信在经历了前几年痛苦的事变和深刻的分裂之后，正是共产党所需要的。正像发生在波洛尼亚暗杀事件的悲惨日子里，意大利的共产党是唯一于1926年11月10日召开了它的最高领导机关例会的政党一样，这次它又是唯一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有力量在国外召开有如此众多非法离开意大利的共产党员与会的秘密代表大会的反法西斯政党。

为了筹备这次代表大会，有许多共产党员被捕，其数目要多于抵达科隆的代表，但这一事实并没有减少召开代表大会这一事件的重要性。这一事件使国内积极活动的党员骨干有了新的、更

大的理由感到自豪。尽管有监视、特务、边界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政府的敌视，共产党员还是能成功地到达党指定的地点，即使是三个人中只有一个人做到这一点。事实上，尽管同党的中心保持组织联系的困难增加了，但在代表大会推动下，基层继续扩大自己活动的范围，直到1932年全年出现了一批批共产主义者加入党的新情况，这些共产主义者是依靠某些同志的个人主动性而造就出来的。

第四次代表大会是在德国共产党人兄弟般的协助下组织起来的，当时他们的力量正处于顶峰。德国共产党同意大利的共产党之间的分歧丝毫也没有影响科隆和杜塞尔多夫的共产党员所表现出的努力和热情。大会的几次会议是在体育馆里和位于上述两个城市之间树林里的“自然之友”协会会址举行的。当时，在来自国内的意大利的共产党人看来，共产国际是一支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但是两年之后，这些德国同志本身却被希特勒上台所掀起的风暴所席卷了。

第四次代表大会选举了由仍在活动的党员骨干组成的中央委员会，没有包括被捕的同志。这一事实事后引起了一些非善意的解释。实际上，代表大会提到了所有被监禁的同志，从葛兰西到特拉齐尼、斯科奇马罗，直到最后一名被捕者彼特罗·谢嘉这位英勇无畏的代表大会组织者；大会对所有被捕的党员都表示了应有的敬意。但如果中央委员会要想成为一个真正有效的领导中心，那么它就不应当是一个代表性的机构。当时中央委员会正式成员是：贝尔蒂，切里亚纳，基亚里尼，丘福利，迪·维托里奥，多扎，弗劳辛，杰纳里，杰尔马内托，纽迪，格列科，隆哥，奥利瓦，桑蒂亚，陶里亚蒂，维亚纳；候补委员是：比安科，格拉西，洛梅利纳，马里奥·蒙塔尼亚纳，普拉托隆哥，扎内利。有一些名额留给了基层组织代表，这些人的名字没有透露。但是中央委员会的组织不得不越来越有

196

变动。在仅仅一年当中，许多中央委员会成员被捕了，其他党员补进了中央委员会：阿尔图罗·科隆比，贾恩卡洛·巴叶塔，泰雷萨·诺切。中央委员会选举了政治局：陶里亚蒂、隆哥、格列科，迪·维托里奥，桑蒂亚，多扎和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书记贾恩卡洛·巴叶塔。

九、“转折”的总结

代表大会给党的活动带来的活力并未有助于克服法西斯警察所设置的障碍。与此同时，劳动者的示威游行也更加弱小和稀少了。只是1931年夏季诺瓦拉和维尔切利省的春米女工的罢工把来自艾米利亚和下伦巴底大区的数千名女劳动者动员起来，她们反对削减先前根据合同规定下来的工资。虽然有法西斯工会的斗争和参加，工资却仍然被强令削减了；即使小于开始时宣布的数字。当时在拉斯佩齐亚省的一些工厂中，在卡拉拉开采大理石的工人中，在乌迪内省的奇维达莱窑厂工人中，在苏尔摩纳都曾发生过重要的罢工。后来到1932年罢工就更少了，主要发生在农业地区。当时，不仅是在缺少群众斗争运动或在群众斗争运动有所发展时，而且在1930年本来就已经恢复得不稳定和时断时续的反法西斯斗争又陷入低潮时，在这种情况下，为确立党的中心在国内的存在而从组织上进行的努力，也变得越来越费劲了。

197 被派往国内执行任务的人在出发时就知道自己很可能会被捕。那些少数在执行任务后又能回来的人，不仅要向负责他们旅行和对他们的报告进行审查的组织委员会进行汇报，而且从政治方面来说，也还要在中央委员会的秘密机关召开的会议上进行汇报；参加这些会议的人不仅有完成其他旅行任务归来的同志，也有等待出发前往国内的同志。从政治上看，这些会议是十分严格

的，在许多发言中不仅提出正当的政治性要求及向报告人询问有关共产党员在工厂中存在的情况，有关妇女状况、其他反法西斯小组的活动、法西斯工会的行动等等，而且在回答问题时也谈到了国内有组织的共产党员小组之间联系薄弱的情况。这些会议的记录就能很好地表明，当时共产党人十分宏大的政治抱负同行动实践上有限的可能性二者之间存在着矛盾。

实际上，这一矛盾表现在：硬要把发动群众和打入法西斯组织的任务交给一些有组织的小组，这些小组同党的中心虽有接触，却又几乎总是聚集在早已为警察局所熟悉和监视的党员骨干周围。警察局严密地控制着局面。如果不发生什么情况，警察局就不采取行动，但只要出现了某些新的情况，宣传活动更广泛一些，接触稍加频繁，或者出现了同当地环境不相干的生人时，警察局就知道从何处下手。即使一名共产党员专职干部旅行时有伪造的证件，并且能通过这种证件在非党人士当中找到住处，他也总是因为工作需要而不得不与同志们见面。这样，他迟早就会被捕，而他的被捕结果又会牵连到同他有接触的那个组织。就这样，在代表大会后建立起来的由巴蒂斯塔·桑蒂亚、桑泰·温琴齐和泰雷萨·诺切所领导的第一个国内中心，存在的时间不长。早在1931年6月28日，桑蒂亚就被捕了，而泰雷萨·诺切虽然为设法领导春米女工的罢工而延长了逗留时间，却得以奇迹般地脱身。11月，由弗劳辛和奥利瓦领导的国内中心落网了。在这一年中，许多其他党的专职干部都遭逮捕。由于不能保证上述国内中心有一定的活动时间，这就使党重新展开了有关组织工作方法的讨论。

尽管许多人被捕了，但在党的专职干部中还是洋溢着极大的热忱和积极性。中央委员会的机关中的同志们并没有后退，相反，他们施加压力，要求不是“隐蔽”在巴黎，而是被派往国内执行秘密任务。在巴黎举办的“短期训练班”增加了，这种训练班是为那些

由国内非法派来的同志开设的。这些训练班大体上是为时一周左右，随后同志们又被派回原地，去干过去所习惯的工作，脑中则装满在如此之短的时间中所灌输的指示和情况。然而，薄弱的环节仍始终是非法的专职干部在意大利逗留的时间。

陶里亚蒂努力推动对法西斯工会进行工作，并鼓励对国内其他反法西斯小组提出团结的倡议。当法西斯党和天主教组织之间的矛盾由于法西斯党企图限制各种不是严格从属法西斯政权并受其监督的组织（包括教会组织）而再度激化起来时（1931年9月），陶里亚蒂对面向天主教群众的行动也给予必要的重视了。实际上，尽管有和解条约，教会还是得以保持了成年人组织（天主教行动）和大学生组织（意大利天主教大学生联合会）一定的自主，但它却不能在工人中开展任何自主的活动，而且也不得不同意把儿童和青年纳入政权所属的各个组织之中，这些组织包括从“母狼之子^①”到“巴利拉^②”和“先锋”。

陶里亚蒂当时曾设法使“转折”主要意味着要在国内开展更多的政治工作，并给予其他政治组织以越来越多的注意，但他的这一尝试在政治局内却遇到了坚决的抗拒，因为自“转折”以来，已经有很多同志牺牲了，这种情况开始产生了影响，包括在人心方面产生影响。这时就开始产生了使陶里亚蒂与隆哥之间发生政治冲突的新的原因。因此，陶里亚蒂为评论由正义与自由的一个左翼小组（卡洛·莱维、马利奥·安德烈斯、维托里奥·福阿）在都灵编辑的地下小报《工厂之声》创刊而写的一篇善意文章也遭到了隆哥的猛

① “母狼之子”系法西斯组织的儿童团，其名称来自有关罗马城的传说，即罗莫洛和雷莫两孪生兄弟由“母狼”用乳水喂大。至今罗马城徽为一母狼腹下有两婴儿吮乳即是这一传说的反映。——译者

② “巴利拉”系18世纪意大利热那亚一个11岁儿童的绰号，据说该儿童发起了反抗当时奥地利占领军的斗争。法西斯统治期间，以“巴利拉”作为爱国象征，从而成立了以此命名的青年突击队。——译者

烈批评。同样，阿门多拉在1931年10月提出的在米兰使社会党人鲁道夫·莫兰迪同共产党人朱赛佩·博雷蒂联合起来共同出版地下小报《反法西斯团结报》的倡议，也受到严厉批评，博雷蒂还被指令必须立即同被认为是意识形态上的统一战线决裂，因为隆哥认为，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统一战线有助于敌对思想渗透到党的队伍中来。 199

陶里亚蒂和隆哥之间的分歧又一次表现出来了。隆哥试图让“转折”继续延长下去，把它当作主要是组织上的事情，以便确保党的中心在国内的存在。当时，政治局只是在“开展瓦解其他反法西斯政党的活动”这一说法的掩盖下（特别是在同这些政党的国内组织来往方面这样做），才得以通过针对其他党派采取的为数很少的团结倡议（因为上述说法是共产国际警卫机构所能够接受的）。这样，在正义和自由组织内部就同埃米利奥·卢苏和卡洛·莱维进行了直接的接触，在意大利共和党内部就同由拉法埃莱·罗赛蒂和年轻的多梅尼科·博沃内组成的反对派取得了联系（后来博沃内由于他在热那亚自己家中准备用于刺杀的炸弹爆炸了，遭到逮捕并被枪决）。同样，在巴黎的意大利社会党组织中间冈雷焦·艾米利亚的工人切萨莱·坎皮奥利所发起的行动取得了联系。

党当时提出同其他反法西斯组织开展联合行动的政治基础（尽管曾被莫兰迪所接受）可归结为如下四点：即反法西斯革命要么是无产阶级革命，要么不是；工人阶级是反法西斯革命的领导力量；意大利的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党；其他政治社会力量可以参加这一革命，但他们的地位要同各自作出的贡献相符合（这四点在每次团结会晤中都要提出）；既然如此，那么前面提到的那些微乎其微的、有限的尝试又能有什么结果呢？这实际上是企图要求可能的盟友事先承认共产党作为唯一的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承认它是唯一能代表工人阶级的真正革命愿望的党。

看一看像鲁道夫·莫兰迪这样一个社会党人是如何毫无困难地承认意大利的共产党在国内地下斗争中的领导作用（这一作用是斗争过程中取得的），是有趣的；莫兰迪曾有过种种经历，先是参加共和党，后来又参加正义与自由。他甚至还曾准备接受意大利的共产党的行动纪律。他的保留完全是意识形态上的保留。实际上他认为，他承认有必要保卫苏联，但这种必要性不能阻止在意大利探索实现“民族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连这种保留看来也使共产党人和像莫兰迪和巴索这样的社会党人之间共同的团结经验变得不能再维持下去，因为这些社会党人被指责为在意大利的共产党中贩卖“左翼”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立场的私货，因而根据共产国际政治路线的看法，这些立场要比改良主义立场更加危险。况且，当时共产国际的生活正处在动荡阶段，日甚一日地强制推行苏联共产党亦即斯太林的集中领导，在这样的阶段又怎能接受对“民族社会主义”的探索呢？

新的反法西斯联合行动的最初迹象从1932年罗曼·罗兰、安德烈·纪德和亨利·巴比塞为筹备阿姆斯特丹和平会议而发起组织和平委员会这一过程中可以看到。但是，就连这些迹象在当时也未能得到应有的注意，那时（1932年夏），共产国际的全部论战都是集中在猛烈地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上。该党被指责为阻碍德国工人运动用革命的办法来解决德国危机，而与此同时，希特勒却在日复一日地增加他的压力，他上台的时刻也在日益迫近。

1931年8月和11月以及1932年3月召开的各次中央委员会也都只是日益强调共产党人在法西斯工会活动中开展工作的要求而已。陶里亚蒂尽力说明在工会和从事秘密斗争的需要二者之间的矛盾问题，因为工会应当必然是群众性的，而从事秘密工作则只可能为少数先锋分子所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组织固然也能在非法的条件下开展活动，但这只是在短暂的时期内和处于革命前夜

的形势下才能做到。1943年3月和1944年4月群众性罢工的现实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规律。然而，讨论的结果始终是要重新寻求更好的办法，以便成功地扩大党在国内的组织基础。

1932年6月，党的许多专职干部在边境上或是刚进入意大利几个小时之后就几乎同时被捕，这一情况又一次使党的中心几乎全部丧失了同基层的联系。显然，在党的中心的工作中是犯有一些严重错误的。于是开始怀疑在党的一些最微妙的部门混进了某些奸细，如为非法旅行作准备、制造假证件、安装夹底皮箱等，也有一些部门是因为需要而了解被派遣执行任务的同志的旅行路线和目的地的。这些部门交由一位从共产国际派来的同志来监督。尽管发生了上述几次被捕事件，但经过短暂的重新组织后，党又开始作出努力，把最后一批宝贵的财产也搬上了。这样，1933年，贾恩卡洛·巴叶塔、阿尔图罗·科隆比、安东尼奥·吉甘特以及其他被派往直接寻求同一些组织取得接触而不是设法建立新的国内中心的党的专职干部都被捕了。这些尝试也没有成功。1933年，“转折”所起的推动作用仍使人感受到其影响，尽管时间已经推迟了，这种影响反映为许许多多共产党积极分子都遭到逮捕。

因此，应当看到，1930年初所决定的“转折”并未达到自己的目标。从1932年9月第十二届全会起，共产国际的批评就变得极其严厉了，特别是在1934年5月人数很少的政治书记处里更是这样，当时对意大利的共产党再次提出了一贯的指责：指责它有烧炭党^①倾向，是脱离广大群众的秘密宗派小集团，仿佛共产国际从第十届全会起所制定的全部政治主张对缩小党开展群众性行动的可能性一点没有起过什么作用似的。怎能硬要意大利的共产党在无视过渡性口号并猛烈攻击所有其他反法西斯组织的情况下，以“无

^① 烧炭党系19世纪中叶活跃在意大利的秘密团体，有自由、独立、共和等思想政治主张。——译者

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来开展广泛的群众性联合行动呢？

1933年3月的中央委员会顺利地“转折”危机作出了组织结论。隆哥并没有对他离开组织委员会领导并作为意大利的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派往莫斯科设置困难。他早就运用了一种在形势已经改变并需要寻找新的政治行动工具时就“不算旧账”、不坚持势必会纠缠往事的争论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后来成为党的老领导集团的习惯准则。在“转折”结束时，隆哥犹如在“转折”开始时一样，又一次证明他是不愿意提出个人问题的。1934年，在他从莫斯科回国后，又是由他本人提出去负责领导侨居国外的意大利共产党人小组的活动。这对他来说是一种新的群众政治工作经验，加上他后来在西班牙的经历，这一切对隆哥在政治上的成熟是十分有益的。但还要再过10年，即到了1943年8月，路易吉·隆哥才又重新在意大利共产党最高领导机关中负起十分重要的职责。

从组织角度来总结“转折”，可以把它看成是消极的。最初提出的保证党的领导能在意大利国内立足这一目标并未实现。就像在1927年已经发生过的那样，所有国内中心经过几周的短暂存在之后全部都失败了。三年之中，被捕的党的领导骨干的数目几乎是100人。但是，“转折”也有一个重要的政治成果，这就是党的中心同党的基层的联系得到了更新。以广泛开展群众工作为方向发展政治路线，也由于更加仔细地了解国家现实而得到了促进，而对国家现实更加仔细的了解恰恰是通过为实现“转折”而作出的努力才获得的。“转折”实际上把起初的政治性动机——即认为存在着臆想的起义前形势——搁置在一边，而有了另一种动机，这种动机要求共产党人在意大利积极地置身于劳动群众当中，以便在他们中间开展群众工作。

当然，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数字比某些有关损失情况的介绍要小，因为这些损失被夸大了，而夸大的目的是想抬高党

所作出的努力，或者则相反，是为了批评共产党中心所执行的政策，这一政策在争论中被说成是“自杀”政策，是让党员“铤而走险”。迄今为止，警察局和特别法庭档案材料中所作的调查都还不足以提供有关共产党人从1926年11月到1932年10月28日（这一天是“十周年”纪念^①和颁布大赦令）在意大利开展地下活动的准确情况。就连意大利共产党的档案所提供的材料也是支离破碎的，因为这些材料是在不同时期，用不同的标准搜集起来的，有些材料来自寄送到共产国际书记处的报告，内容往往不确切，这些报告的寄送目的是要把实际进行的非法工作作最完美的汇报。同时也要指出，共产党的档案材料仅仅是提供直接由党的中心纪录下来的活动情况，这些活动肯定要少于党员自己或小组在同中央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在或短或长的时期内所进行的活动。党的中心提供的材料不过是漂浮在非法活动深水中的共产党这座巨大冰山露出水面的那个顶端而已。

203

因此，在警察局和党的档案中收集起来的数字是微不足道的，只反映出极小的、人数有限的少数小组的活动。党的地下活动从客观上说是有限的，而同其他反法西斯政党实际上消极被动的情况相比，才显得突出，因为这些政党仅仅有少得可怜的短暂的地下活动经验。

党的地下工作是在沿着上下起伏的一条曲线进行着，最高潮和消沉时期交替出现，而消沉时期往往很长。1926年11月，党的中心直接在国内组织非法工作，开始时情况很好，接着在1927年下半年情况急转直下。在1928年初（巴塞尔会议后）试图重新开展活动之后，又出现了一个危机时期，活动几乎完全陷于停滞直到“转折”时才有所突破。1930年1月—1932年6月这段时期说明党

^① 指1922年10月28日墨索里尼通过“进军罗马”而上台执政的“十周年纪念日”。——译者

为在国内开展非法工作作出了最大努力。

只要浏览一下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数字(举这些数字只是为了说明问题)：1928年视察了20次，1930年81次，1931年头9个月71次，从1931年11月到1932年7月102次，总计有300次非法旅行；在活动最频繁的时期(1931年冬到1932年)差不多每三天党的中心就派出一次视察。

当时党员数目变动不大：1927年是6521人，1930年是5521人，1931年是5638人，1932年是7554人。这些党员是同党的中心有联系的组织中的党员，因此比在国内活动的共产党人要少。关于散发党的中心寄送的秘密出版物，也有一些大致的材料，这是包括各期《团结报》、《工人国家》、《先锋》、各种小册子(第四次代表大会材料、葛兰西论《南部问题》的文章)以及各种传单标语：1927年是15万份，1931年是14万份，1932年是11.2万份。这些数要少于实际情况，因为这并不包括在国内全部翻印的东西，不包括用党的中心通过党的专职干部用夹层皮箱送来的用铅版翻印的《团结报》。

特别法庭力图镇压各种形式的地下活动。宣布的判决数目每204年多少不一。一年宣布的判决数目(如1928年是154起)就表明了前一年开展工作的频繁次数。1927年有517起判决，219人被判刑，1928年有154起判决，636人被判刑，1929年有43起判决，159人被判刑，1930年有35起判决，199人被判刑，1931年有84起判决，519人被判刑，1932年有44起判决，213人被判刑。1932年大赦后，情况有了新的变化：被判刑的人数由于党从1933年起减少非法活动而下降，与此相应的是被判刑的人的开释：因刑满释放的在1932年有150人，因大赦获释的则有600人。

1933年初，被监禁的党员剩500人左右。随着“转折”劲头逐渐消失，非法行动也放缓了，这就使审讯和被判刑的数目逐渐减少，一年之内不超过100起，直至1937年，活动才重新恢复起来。在判

刑数目减少的同时，每年又有一定数目的被监禁者获释。但是，从1936年起，从监狱中释放的人大都又被流放了。

从1934年起特别法庭审判数目减少也可能表明地下工作的质量改善：审判之所以减少，是因为工作做得更好，而不是因为工作做得少了。遗憾地是还有其他一些材料表明：审判数目的减少是同有组织的地下活动的减少相应的。

在党被迫重新研究自己的组织工作和批判性地总结“转折”的时刻，有500名党员仍被囚禁在监狱中，另有500名党员被流放。还有数千名共产党员受到警告和特别监视。

被释放的共产党员通过他们的文化政治修养和他们更加坚定的精神表明，在狱中度过的那些岁月并不能看成是白白浪费掉了，被囚禁狱中的这段时期已经被共产党组织充分地用来在牢房中和流放的孤岛上培养党的新的领导干部。在党的实际可能所允许的限度内，同时也根据党员个人在想方设法同组织取得联系或秘密出国方面的主动能力大小，出狱的党员的出国现象一直延续到1936年。后来，除少数特殊情况外，被释放的共产党员都立即被流205放，有时是直接送到流放地，根本不让在家中作短暂的停留，而且在流放地，流放时间也自动地延长了。特拉齐尼、斯科奇马罗及其他一些同志就是这样从1926年直到1943年这一时期一直不断地处于被囚禁的状况。在大赦后被捕的一些同志，如贾恩卡洛·巴叶塔和阿尔图罗·科隆比，在狱中呆了10年。在9月8日前夕^①出狱和从流放地回来的人后来担负起游击斗争的不少领导责任。

如果把共产党的命运同其他反法西斯政党的命运相比较，大家就可以懂得“三人团”的立场是多么错误，因为这种立场是反对“转折”，断言“转折”将要毁掉党的干部。相反，“转折”却造就了强

^① 指1943年9月8日全国起义。——译者

有力的领导集团，当然是通过以牺牲为代价的痛苦道路。如果不是在1930—1932年作出了重大的努力，人们有理由要问，党的领导集团的命运又会怎样呢？那时党的领导集团被种种冲突，包括个人的冲突所毒化，像其他一些非法的共产党一样，被拖进了派别争执的危险泥潭，而这种争执又是由共产国际根据其多变的方针来加以仲裁的。“转折”固然没有实现最初确定的政治目标，“转折”的理由固然看来同意大利形势的实际发展相矛盾，但是“转折”却毕竟使共产党同国家建立起新的联系，获得了新的力量，使党受到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在精神上更加坚强的决定性考验。

第九章 · 希特勒上台

206

一、世界经济危机的后果

1932年间,经济危机发展到了最低点。货币贬值、汇率变换不定、出口的障碍,这一切都给经济复苏造成了新的困难。到了1932年5月,德国终于从缴纳赔款中解脱出来。在这以前,德国已缴纳了总数为320亿金马克的赔款,大部分是从美国国外借款中提取的。法国这时则由于不再得到德国的赔款,宣布不再考虑战争期间所欠美国的债务了。

经济周期的曲线表明在1932年6月转折达到最低点。由于缺少自觉的政治领导和对危机原因的明确分析,复苏的到来是迟缓的、不正常的和混乱的,没有形成新的发展,而是变为缓慢的停滞,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战争爆发。

危机像龙卷风一样过去了,造成了财富、生产力和资本的极大破坏。宝贵的食品原料被烧毁,与此同时,无穷尽的失业者队伍则在等待可怜的、数量不足的救济。生产设备闲置不用,商品堆积在仓库中变质,而得不到满足的需要则在增加。危机以具有巨大破坏性的爆炸力向全世界暴露出资本主义自身的种种矛盾:一方面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的能力,另一方面则是需求不得受到限制,因为市场本是以消费者拥有购买充裕提供的商品的实际可能为基础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是通过技术的革新,而是通过对工人剥削量的加大,是由于因大批失业者的存在而压低工资水平

207

(甚至在短暂复苏时期间失业者也是众多的,而农村的独立小生产者因农业危机而破产,流入大城市,壮大了领工资者的队伍,从而也扩大了失业大军);所有这些情况都表明: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了。

危机发展到了最低点。必须改弦易辙。但是朝什么方向发展呢?共产党人所宣传的社会主义解决办法,也就是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不仅在工人运动几十年前就已陷于四分五裂的美国,而且就是在受危机打击最重的德国,也没有必要的力量加以实现,因为在德国,共产党力量虽在增长,但一直处境孤立。工人阶级的多数始终是同社会民主党有联系的,而与此同时,新的一批批失业大军则被纳粹分子的蛊惑宣传所吸引。

世界经济体系由于金本位制被打破而陷于支离破碎的境地,这就助长了自给自足的锁国现象。资本、商品和人员的流动越来越困难。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寻找自己的道路来摆脱危机。

经济危机固然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转化为制度的政治危机和无产阶级革命,然而,以国际市场作用和货币体系稳定为基础的老的资本主义制度却仍必须改变。胡佛总统徒劳地执意继续指望从危机的发展本身得到复苏:破产,失业,降低工资,清除最薄弱的部门,把最强大的部门集中起来,从而平衡国家的预算,增加税收、紧缩信贷。

在危机过程中确立了一项新政策,这项政策后来以凯恩斯命名。这位英国剑桥经济学家积极主张需要扩大国内需求和必须在萧条阶段通过国家干预(包括由国家负债)来增加需求,其办法是:
208 要在基础设施、农业改造、向工业发放优惠贷款方面进行投资,以便刺激生产活动的发展,从而也就为国家创造新的税收来源。国家应当干预,但不仅限于用老一套的办法(保护主义、倾销贬值),也不仅限于通过在利率上和向银行和出口发放贷款的体制上做文

章。国家应当亲自进行直接干预，自行担负起实施广泛的公共工程、改造环境、重组并保护农业的新任务，甚至直接掌管对生产活动的某些部门的经营。

资本有机构成的增加，不变资本增加的必要性，技术革新所必需的补充资本，同消费资料的增长相比生产资料的更加迅速的增长，所有这些实际上给运用资本的过程造成了巨大的困难，而运用资本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主要条件。所以资本积累的过程就要求国家不断进行干预，以便汇集节省下来的资金并把它投放到垄断资本集团不会对之立即感兴趣的那些部门的活动中去。但是，这些集团自己也是需要使社会资本从总体上得到利用的，因此也就需要保障非垄断资本以及农民和手工业平均生产的再生产。

作为1929年大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的农业危机要求国家直接干预，以便组织分配信贷、保护价格、为在资本主义农业企业中形成有差别的利润、增加地租创造条件，这些条件由于小农企业得以保存而成为可能。

就是在自由主义经济阶段，国家也始终是干预经济生活的，创造了有利于增加利润和地租的客观条件。早在大战期间，国家更直接地干预组织给养，为战争提供物资，制约消费，就曾是有必要的。但这时问题就有些不同了。国家垄断资本已成为资本主义结构中一种永久性因素，而不仅仅是特定经济政策的表现。国家垄断资本的任务是保证资本从总体上得到运用这一进程。尽管资本主义集团本身对这种作用难免有不同的政治评价，但这种作用毕竟是符合这一阶级的总体利益的，特别是符合占主导地位金融资本的利益的。国家垄断资本体系的发展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及50年代大发展的过程当中得到更广泛、更系统的确立。但是就在当时，帝国主义冲突的范围已在全世界逐渐扩大。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导致了許多新的权力中心(如日本)的建立并使国际冲突

尖锐化。与此同时，民族解放的起义，首先是印度的民族解放起义使人越来越感到它的影响，这些起义动摇了老的殖民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的统治遭到越来越多正在迅速发展中的力量的反对，这些力量要改变凡尔赛条约所确定的欧洲关系与世界关系。

像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改变了世界范围内老的力量对比。正像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所预见的那样，开始了一个危机和战争的时期，这一时期持续整整10年，从1929—1939年，直到1945年。在日本入侵中国之后，是法西斯帝国主义征服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共和国争取独立和自由、反对纳粹和法西斯入侵的战争，为德国侵略的开始、吞并奥地利、侵略和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准备了条件。国际联盟在这种急剧扩充军备和准备战争的情况面前束手无策。

在美国，国家规划干预取名为“新政”，这种干预是1932年11月共和党人胡佛竞选失败之后，由罗斯福在1933年开始实行的。但是，应当指出，这一政策并不曾由罗斯福在竞选期间加以宣布和阐明，尽管规划经济和对经济活动进行公共协调的要求不仅在大学界，而且在经济界的一些集团中早已提了出来。对国家直接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要求表明生产力的发展（趋向于社会化）同生产关系（趋向于保留私人利润）之间矛盾的尖锐性。当时已开始谈论规划和计划，谈论救济性国家，在这种新的语言中就已经有了凯恩斯思想的直接影响。只是到了1933年，罗斯福才开始一步步地采取使美国经济开始“新进程”的措施：让美元贬值；使农业重新拥有更大的购买力（限制种植、强行整顿价格、奖励减少生产、提供优惠贷款）；把失业者安插到特殊公共工程中去并让他们得到“有保障的工资”（但低于正常工资）；着手大规模改造环境：设立一些公共机构，如治理田纳西流域。尽管国家进行了这些干预，美国经济还

是没有能够达到 1928 年战前所达到的水平，到 1939 年失业者仍有 800 万左右。

二、意大利工业复兴公司的诞生

在垄断资本大集团更强硬更严厉的控制下整顿、积聚和集中意大利经济这个进程，在意大利危机过程中有一些新的表现。上述集团本身就敦促国家日益全面地发挥国民经济活动最高调节人的作用。新的世界性冲突的前景看来是越来越清楚了，这一前景要求集中使用力量，这种力量的集中后来在 1934 年在司法上就采取了行会体制的形式。在政权周围形成的并受其严格控制的集团的形形色色力量之间的斗争中，金融资本逐渐拥有突出的作用，成了主宰的力量，这是在工业领导集团和大农业主领导集团之间更为紧密的相互渗透的条件下发生的。大农业主中最有代表性的姓氏出现在强大的工业公司董事会中也就表明了这种相互渗透情况。这说明主要的工业集团关心保持并扩大大农业地租和城市地租的地位。 211

意大利的农业也受到世界经济危机后果的沉重打击，总的农业收入减少了 50%，但在最受保护的部门（粮食种植，减少 30%）和最受打击的部门（大麻，减少 70%）之间差别很大。政权所采取的办法是：建立强迫性的康采恩、设立各部门机构、编纂出口者花名册、强迫减少某些种植、建立佃农机构、增加分益农并保持必须雇用一定劳动力的做法；最后则是建立“缴纳公粮”制度，后来这成了必须承担的义务。

在工业部门，危机也加速了为法律所承认的强制性康采恩的成立。按部门成立的强制性康采恩的做法是要对新的工业设备进行控制。向工业投资提供资金的问题要求银行摆脱长期提供资金

的任务,首先是银行不再作为负担日益沉重的为工业服务的钱库。商业银行的流动资金危机促使上述做法开始实行。为了不致对市场施加压力,不致因设置清算银行帐目制度而造成恐慌,曾采取一系列过渡办法,通过这些过渡办法,最后成立了意大利动产公司(1931年11月),这个公司开始有10亿里拉的资本,这是由储蓄信贷银行提供的,后来,它又发行了价值50亿里拉的债券。这样,通过向储蓄户发出呼吁的办法,商业银行就得救了(由国家向储蓄户提供保证)。

既然银行不再从事发放长期贷款的活动,就必须建立一个负责重建各大工业部门的机构,这个机构要向这些工业部门提供必要的资金。这样,伊利公司(意大利工业复兴公司)就在1933年初建立起来了。伊利公司还担负了监督三家全国性有息银行——商业银行、意大利信贷银行、罗马银行——的任务,以使这三家银行不致亏本太多。这一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国家的预算,影响到意大利银行和整个负责筹集储蓄的公共银行系统。到1933年212 为止,有关挽救,但也是整顿经济生活的全部活动共花费总数为160亿里拉的开支,其中将以后几年预算中开支数字也计算在内了。按法西斯的说法,这笔款项要比以后征服埃塞俄比亚战争所需要的资金还要多。然而,正因为如此,法西斯政府不仅得以避免银行的破产,避免由银行资助和控制的大工业的危机,而且还能够保持住储蓄者对由国家作保证的证券和债券的相当水平的信任。1934年,把过去利息为5%的定期借款变成了利息3.1—3.2%的定期借款,同时发行了70亿定期9年的国库券,这些都为国家提供资金来平衡救急活动所用的开支。

如果说救急活动1931年受到工业集团积极欢迎的话(这些工业集团遭到银行破产严重后果的威胁),那么当局则是把这些活动当成了“行会革命”的主要内容。“行会革命”要导致这样一种国家,

在这种国家中私有制要从属于国家的最高需要，因为国家是民族利益的独一无二的代表。

在行会部长朱赛佩·博塔伊的推动下，广泛地掀起了一场歌颂行会的运动。对于“行会左翼”各集团来说（乌戈·斯皮里托、内洛·奎利奇），行会应当变成“有产行会”，即变成克服私有制的工具。

墨索里尼暂时认可了类似的提法，他自己就声称“法西斯国家要么是行会性的，要么就不是”。法西斯的宣传不放过机会通过报刊和纪录片《光明》来介绍国际危机最严重的情况：美洲失业者的长队、小麦和咖啡被销毁、西德的激烈冲突和日益混乱的秩序。面对着被说成是以“自由的主动性”为基础的民主——自由制度的瓦解（而且这一制度早已不复存在了），当局夸耀在意大利所取得的成就，国家对局势的控制以及阻止发生经济灾难的政策的有效性。如果不是国家进行干预来拯救银行和大工业，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法西斯的宣传人员这样提出问题是为了得出一个结论，即意大利人应当信任法西斯国家，储蓄户应当把自己的存款交付给能够为振兴经济而利用这些存款的人。 213

三、法西斯上台的十年

建立行会国家这一计划所发起的思想运动是不应当低估的。在这场运动中有一些集合在一些青年杂志（这些杂志常常是由法西斯大学生小组〈GUF〉^①负责出版的）周围的小组起着突出作用，这些小组后来又大部分投身于成立法西斯政权自身内部新的反对派的活动当中去了。这一思想运动在1932年5月菲拉拉会议上发

^① “法西斯大学生小组”意为 *Gruppi universitari fascisti*，简称“GUF”。
——译者

展到了高潮。应当把一些在文学方面要表达新倾向的尝试也同这场由“行会革命”所发起的政治社会运动联系起来，尽管这些尝试是在不同方面进行的。遗憾的是，这些运动当时同共产党及其他反法西斯政党所组织的活动二者之间的关系非常稀少，尽管意大利的共产党并不是没有看到这一新反对派的新生而又依然脆弱的幼芽的意义。

只要经济危机在继续，墨索里尼就听任这种运动发展，而当时在法西斯主义内部保留那种自称为“革命”的前景看来是有好处的。但他刚刚看到复苏的初步迹象，就毫不犹豫地背弃了任何诺言。对制定国家行会制度法的准备工作（这一法律是要把属于各行会的职能限定在严格的法律规定之内）以及1932年6月改组内阁，两者都表明法西斯政权开始走上一个新的政治阶段，这个阶段体现在把新的权力集中到墨索里尼的手中。博塔伊离开了行会部长的位置，被任命为罗马总督。与此同时，墨索里尼还把那些曾经协助他建立政权的老民族主义分子赶出了政府。费代尔佐尼成了参议院议长，罗科又重新去教书，格兰迪被派往伦敦当大使，巴尔博被任命为的黎波里塔尼亚总督^①。在内阁中，只剩下墨索里尼一人主宰着舞台，握有全部权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外交、内政、
214 军事和行会等部的领导权集中到自己的手中。而在党内，在朱里亚蒂之后紧接着就是斯塔拉切，前者在反对教会组织的论战中过分地积极，并且使法西斯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政治化；后者曾奉命进一步扩大党员队伍，并使法西斯党最终成了一个没有政治生活的官僚组织、颂扬“元首”作用的驯服工具。

墨索里尼想作为“元首”来庆祝进军罗马十周年，从此“元首”就成为正式称号。此时颁布的大赦和免刑是要表明政府的力量，

^① 的黎波里塔尼亚，今利比亚，当时为北非意属地，作为省份划归意大利管辖。
——译者

表明反对派的失败和无力。当时那个有著名艺术家参加的法西斯革命展览、一些文学家和知识分子乃至长期一直持有保留立场的人们对法西斯政权的赞同、几乎所有大学教授效忠政权的宣誓，这一切都表明当时赞同的基础如何大大地扩展了。确实，在 1200 名教授中只有 12 人（在 1931 年 11 月）拒绝宣誓效忠法西斯主义；还有其他少数人以种种借口放弃了教学，他们是：弗朗切斯科·阿采里·瓦卡、埃内斯托·博纳尤蒂、朱赛佩·安东尼奥·博尔杰塞、马里奥·卡拉拉、加埃塔诺·德桑克蒂斯、安东尼奥·德维蒂·德马尔科、乔治·埃雷拉、乔治·莱维、德拉维达、法比奥·卢扎托、皮耶罗·马尔蒂内蒂、巴尔托洛·尼格里索利、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奥兰多、阿戈斯蒂诺·罗西、埃多阿尔多·鲁菲尼、弗朗切斯科·鲁菲尼、皮耶罗·斯拉法、利昂内洛·文图里、朱赛佩·维琴蒂尼、维托·沃尔泰拉。

上述赞同得以扩大的根本原因与其说是对法西斯政权的能力的信任，还不如说是对能否在意大利和世界上恢复民主抱有深刻的怀疑。民主制表现出没有能力克服资本主义的矛盾和阻止右翼运动的发展。许多人都已经在这个胜利者面前屈膝投降了。警察局的档案和当年的报刊就提供了这种投降的证明。面对这种情况，国内只有一些在道义上和文化上进行抵制的孤立的呼声。恢复民主的希望除了寄托在共产党的顽强斗争之上外，也还寄托在正义与自由和其他一些少数派小组的持续斗争之上，如以鲁道夫·莫兰迪为首的社会党国内中心、由皮耶罗·马尔韦斯梯蒂发起的奎尔福行动运动^①天主教徒小组。但是，民主的恢复后来与其说是来自这些地下活动中心，还不如说是来自政权的自身内部，来自当时

^① 源自 12 世纪意大利两个德裔大家族即拥戴教皇和中世纪城市国家的“奎尔福”派和拥戴王权的“吉伯林”派争夺王位的史实，最后“吉伯林”派获胜；“奎尔福”派在此有不屈服之意。——译者

那些年代为行会革命思想所陶醉、随后又由于墨索里尼突然变卦而感到失望和受到屈辱的青年人。

四、魏玛共和国的危机

世界经济危机的后果在德国特别严重。在造成毁灭性恶果的大战之后，德国经济的恢复之所以可能，是由于大量国外借款的涌入，主要是美国的，但也有英国的。这样就使出口激增。危机的爆发造成了外国借款突然终止。储存在德国银行中的许多短期外国资本纷纷取走。1931年5月最大的奥地利银行——奥地利信贷银行——破产之后，外国资本的撤走就使许多德国银行关闭了。1931年7月，德国政府不得不暂时关闭了一切银行。

世界贸易的减少造成了出口的急速下降。德国工业离开了出口就不能维持其生产机器的运转。从1929到1932年，工业生产下降了一半。胡佛总统于1931年7月决定延缓偿付一切战争债务，包括德国的赔款，也只能是限制了灾难。德国经济得不到贷款和出口，就缺少了必要的氧气。数百万工人和职员失去了工作。连锁式破产也席卷了中小工商企业。危机在德国农村尤其严重，在那里，农产品的价格暴跌。

社会民主党总理米勒受到危机的冲击，不得不于1930年3月辞职，因为他所领导的主要是以社会民主党、天主教中心和自由党人联盟为基础的联合政府无力解决救济失业者的问题。米勒是最后一任社会民主党总理。耐人寻味的是：社会民主党失掉领导权并不是在经济政策问题上，也不是由于对工业活动进行有计划的恢复所致，而是在救济失业者的问题上，是在救济问题而不是在对生产进行公共干预的问题上。德国社会民主党尽管为德国资本主义的重建和管理效了劳，但还是丧失了政治领导权，尽管作为中间

派联盟的最强大的党，它本应担当得起这种领导权的。政府领导权落到了中间派天主教党的领袖布吕宁的手中。他通过实施严厉的通货紧缩政策来对付危机。他不是寻求形成一种能够刺激生产振兴和同失业进行斗争的国内需求，而仅仅是考虑不惜一切代价来遏制通货膨胀。对1922—1923年巨大通货膨胀的记忆仍然如此痛楚，以致不敢冒险去走老路。这就是布吕宁所选择的经济路线，并且得到了民主联盟各派，以及社会民主党的赞同。但是这样一来，就使大部分生产机器闲置起来了，使数百万德国人陷入了失业的绝望之中。

布吕宁没有能够使国会通过某些财政措施，于是就求助于兴登堡，指望他根据宪法第48条赋予共和国总统以紧急权力，颁布一道总统命令，使财政法草案得以通过。

国会投票通过了一项有关废除财政法令的规定，布吕宁因而要求共和国总统解散议会。这样一来，在经济危机的高潮中又爆发了政治和体制危机。议会失去了自己的作用，德国政治生活的最高调节人和仲裁者的任务交付给共和国总统兴登堡元帅。他是德国军国主义专制传统的继承人。

1930年9月14日的选举表明政治危机在急剧发展。共产党议员从54名增至77名。但是，纳粹分子的成绩更大，他们的议员从12名增为107名。中间派联合政府的基础被缩小到使布吕宁在议会中得不到稳定多数。

布吕宁不得不依靠越来越频繁地求助于兴登堡的紧急法令来执政。他想利用诸如盟军撤出莱因兰—法尔次及延期偿还赔款这样一些外交政绩，但也无济于事。布吕宁政府越来越软弱无力，受到右翼和左翼的攻击。当时的情况是，纳粹主义一方面同军队领导和大金融工业集团确立了日益紧密的接触，另一方面又开展厚颜无耻的蛊惑人心的宣传，为失业青年提供参加行动队的机会，这

些行动队的任务是要在国内恢复秩序并为德国重新赢得自由和独立。排犹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是一场猛烈而狂热的宣传运动以肆无忌惮的方式谈论最多的问题，这场宣传运动充斥着谎言和咒骂，把为数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卷了进去。德国共产党也在扩大着自己的群众基础，向国内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共产党人指出，社会民主党曾在1919年将无产阶级革命扼杀在血泊之中并为德国资本主义效犬马之劳达10年之久，在这以后，他们又使德国陷入目前这种四分五裂的状况。只有击败社会民主党才能使德国无产阶级重新实现团结，才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在德国实现社会主义。但是纳粹主义在极力实现激进化方面速度要比共产党快，而且这种差异变得越来越突出。

日益被迫求助于共和国总统的紧急法令来执政的布吕宁，在1932年3月的总统选举中动员了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所有中间派力量来支持兴登堡。兴登堡获得49.6%的选票，希特勒30.1%，共产党人台尔曼13.2%，民族主义者迪斯特尔贝格6.8%。兴登堡获得了他过去所瞧不起的力量的选票；他之所以瞧不起这些力量，是因为他过去从来就不承认魏玛共和国这一德国新的民主现实，而那些希望尽快终止民主共和经验的人则投了希特勒的票。

选举结果使布吕宁强硬起来，他要求兴登堡发布解散纳粹冲锋队的法令，因为纳粹冲锋队不仅已经变成了公共秩序的一种经常性危险，而且还开始不断向军队渗透。兴登堡颁布了法令，但这件事却在军队中引起了对支持布吕宁的国防部长格仑纳将军的反抗；在军队中，冯·施莱歇将军哗变，他打算建立一个由他领导的总统制内阁。在反对格仑纳的军人集团的压力下，兴登堡指责布吕宁在解散纳粹冲锋队的同时却没有解散社会党人的准军事组织——帝国旗帜^①。5月29日，兴登堡召见布吕宁，要求他辞职。布吕宁早就使议会徒具虚名，把所有权力都交付给兴登堡，现在他

自己也只能自食投降的恶果了。社会民主党人过去曾借口布吕宁是“二害之轻”来支持他，但很快就发现这个二害之轻如今已变成飞快蔓延的致命瘟疫。

兴登堡组成了以冯·巴本为总理的内阁，这届内阁称为男爵内阁。老的领导阶级都聚集在新总理的周围，以便作出最大的努力来保持对政权的充分监督。兴登堡解散了议会并决定再次大选。取缔纳粹冲锋队的禁令取消以后，纳粹冲锋队四处横行。冯·巴本借口无力维持治安，解散了由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的普鲁士政府。社会民主党人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这一打击，而根本不打算发动政治性罢工，尽管共产党人提出了这一建议。1932年7月31日的选举再次表明纳粹分子的进展，他们的选票达到了1374.5万张，拥有230个席位。共产党人的席位增加了12个，达到89个。社会民主党人的席位少了7个，减到133席。中间派政党和胡根堡的民族主义分子则为纳粹的进展所冲垮。当时的情况很清楚：资产阶级和中等阶层都集合在希特勒的周围；此外，希特勒还又一次在青年选民中赢得了选票。从1928到1932年的四年之间，纳粹分子的选票从80万变成了1374.5万。然而，希特勒仍未得到40%的选票。

五、民主的失败

总起来看，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保住了他们的阵地，而且共产党人的力量还略有增长。当时较量尚未定局，但社会民主党在危险迫在眉睫之时却束手待毙，毫无反应。共产党人一方面在街头以勇猛的武装对抗来反对纳粹冲锋队，但另一方面却仍然坚持把

① 帝国旗帜系1924年成立的左翼组织，以社会民主党为主，1933年被取缔。——

社会民主党看成无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的主要障碍这一自杀政策。

冯·巴本政府仅仅获得 32 张信任票，513 名议员投了反对票。纳粹分子拒绝支持冯·巴本政府。他们要掌握政府领导权，而不满足于得到冯·巴本领导的政府中的几个位子；冯·巴本政府这时已经准备好了新的解散议会法令。11 月 6 日新的选举表明纳粹分子的选票第一次下降了，他们丢失了 200 万张选票和 34 个议席。在左翼方面，共产党人的选票再次增加了，他们从社会民主党人那里获得了 11 个议席。

曾作为唯一支持巴本政府的党的德国民族党从纳粹分子那里赢得了 15 个议席，但是在国会中还是缺少一个多数。现在全部权力都掌握在兴登堡总统的手中，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任命或撤换总理。冯·巴本的尝试失败后，施莱歇将军被任命为总理。这个人为了取消共和体制玩弄的阴谋诡计最多。然而施莱歇将军也不过维持了 57 天，这段时间是兴登堡同希特勒达成协议所必需的。1933 年 1 月 30 日，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

但即使纳粹党在内阁中仅有三个部长席位又有什么关系呢？通往建立专制制度的道路已经合法地打开了。在政府中派有代表的纳粹党和民族主义党在议会的 583 席中只有 247 席。必须进行新的选举。这次选举定在 3 月 5 日举行。纳粹分子全力以赴地用残酷无情的暴力开展了广泛的宣传。任何共产党的集会都被禁止、共产党的报刊被查抄，党部被占领。纳粹的暴力也指向了社会民主党。冲锋队驱散了社会民主党人的集会。社会党的主要报纸不断被停刊。

这还不够。2 月 27 日晚，发生了由议长戈林策划的国会纵火案。纳粹分子收买了一个名叫范·德尔·吕贝的荷兰假共产党人。纵火案迅即扩大了范围，这表明必须出动更多的冲锋队。共产党

立即被指责制造纵火案。共产党议会党团主席托尔格勒尔听说戈 220
林指责共产党人制造了纵火案就马上到警察局自首了。几天后，
当时根据共产国际委托秘密住在柏林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人格奥尔
基·季米特洛夫、波波夫和塔内夫被捕。审讯的结果使戈林很难
堪。这次审讯是1933年9月21日在莱比锡开始的，正当希特勒政
权全盛时期。季米特洛夫成功地证明了自己是无罪的。保加利亚
共产党人和托尔格勒尔被释放，范·德尔·吕贝被斩首。保加利
亚共产党人在苏联保护下获得了自由，离开了祖国。季米特洛夫
成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所实行的政治转折的中心人物。相
反，托尔格勒尔则在“监护”之下仍留在纳粹魔掌之中，战争期间死
于狱中。

1933年3月5日的选举正是在上述条件下举行的，这次选举
使希特勒得以让纳粹选票上升到17277180张，计增500万张。但
仍只占选票的44%。天主教中心和社会民主党人基本上保住了自
己的阵地。共产党人尽管遭受着迫害，仍获得大约500万张选票。
但是，288个纳粹议席，再加上52个民族主义者的议席，在议会中不
过只组成了多出16个席位的多数。但这个多数足以使议会于3月
23日通过一项赋予全权的法令，这项法令使希特勒拥有一切宪法
手段来实施其纲领。共产党议员被阻止参加新议会的开幕式。在
与会者中，只有84名社会民主党议员投票反对授以全权。在这种
恐怖气氛下，所有其他党派都同意了希特勒的要求。但是，5月19
日的投票却使社会民主党人用以悬崖勒马洗刷自己先前让步的自
豪行动化为乌有了，在这次投票中社会民主党人也同其他所有议
员一起一致同意了希特勒的对外政策。没有参加投票的人是已经
侨居国外或被希特勒警察局所逮捕的人。社会民主党工会领导人
提出他们要同希特勒政府合作的建议，结果也成为泡影。1933年
5月各工会会址都被占领，工会经费被没收，组织被解散，领导人

被捕或屈膝投降而充当纳粹组织“劳工阵线”的雇员。罢工权利当即被取消，一切集体合同都宣布失效。

221 社会民主党虽然对希特勒的对外政策投了信任票，但还是被解散了，并且还被宣布为国家的敌人。同样的命运后来也轮到了其他党，包括天主教中心，尽管它投票赞同赋予希特勒以全权。1933年7月14日，在民族党宣布自动解散后，通过了一条法律，规定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为德国的唯一政党。这样，一个刚刚出现就已经领导政府并只拥有44%的选票的党竟成了德国生活的绝对主宰，这个党后来在12年中把德国引向战争和失败。

六、失败的原因

德国一切政治力量都为希特勒上台提供了方便。民族主义右翼敌视民主共和国，渴望退回到能够维护统治阶层利益的最高专制制度，这就为希特勒打开了通向政府的大门，从而体现了德国大事业的愿望。天主教中心同布吕宁一起奉行通货收缩政策，使数以百万计的失业者感到失望，促使他们站到纳粹一边去冒险；它还破坏共和体制的权威，把一切宪法权力都交到了兴登堡总统的手中。社会民主党的责任更甚于别人。该党从共和制成立起就放弃任何切切实实的改革愿望，同意把主要权力继续掌握在参谋部的手中，直到1932年的总统选举，又赋予兴登堡本人以切断希特勒进路的任务。

德国共产党的责任也是严重的。该党集中同社会民主党进行斗争，以为这种做法尽管在开始时可能会有利于纳粹政权上台，但这个政权的寿命是不会长的，并且还会加速资本主义的危机，随后在纳粹主义的废墟上，共产党人会最终取得胜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雷梅尔就说过：当法西斯分子上台时，

无产阶级阵线的团结就将实现，社会民主党就会被一扫而光。

德国共产党的路线得到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共产国际坚持²²²认为社会民主党是主要的危险。社会民主党的危机被看成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德国无产阶级团结的条件。后来几次选举结果表明，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是坚实的，仅在共产党的压力下失去了一小部分，但这些情况都无济于事。共产党人甚至发展到同纳粹分子结成联盟要求立即解散普鲁士邦议会，因为这个地方政府是由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的，他们可以拥有一个办事干练的警察局。共产党人同纳粹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一起投票反对社会民主党政府，但是这个成分混杂的反对派还是被击败了。由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的普鲁士政府后来是由兴登堡亲自解散的，而只是在那时，共产党人才建议社会民主党人搞抗议性总罢工。为时已晚！

托洛茨基指出了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所犯的错误，并建议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结盟。托洛茨基也批评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只信赖国家和军队。他主张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应共同行动，因为任何共同行动都会增加无产阶级的力量，开辟新的前景。托洛茨基在“德国问题”的论战中否定社会法西斯主义的论断，指出社会民主党组织与法西斯组织之间的阶级差别；他的这一发言结果却促使共产国际的立场变得日益强硬。德国形势越是急转直下，共产国际就越是一味地把社会民主党当作德国工人阶级团结的最大障碍。

在共产国际第十二次全会（1932年9月）上，陶里亚蒂指出德国形势和意大利形势之间有虚假的一致之处，这时他甚至抛弃了意大利共产党的独到见解，竟然认为德国法西斯比意大利法西斯更加虚弱，因为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是在工人运动走下坡路的阶段时上台的，而在德国，纳粹则是在资本主义稳定完全陷于危机，也就是处于内战前夕和群众运动沿着上升路线发展的时刻得势的。²²³

只需短短几个月就足以证明这种前景是站不住脚的。1933年2月，希特勒领导了政府，而德国工人阶级则未能作最后的努力来采取某些联合斗争的行动以保卫民主。共产党人仍然宣称他们相信：纳粹主义将会清除社会民主党的地盘并最终创造条件使工人阶级能在德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联合。德国共产党人为他们的错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逃脱了希特勒的镇压，到苏联去避难，后来却遭到斯大林主义暴力的打击。但是，为德国工人运动两个誓不两立的部分——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所犯错误以战争付出沉重代价的毕竟是德国人民和整个欧洲。德国和欧洲的分裂，在战后几十年的今天，仍然是这一致命行动所遗留下的恶果。

七、国际工人运动对希特勒胜利的反应

希特勒依靠 1700 百万德国人的选票上台的消息传到意大利，甚至使意大利为数不多有组织的反法西斯力量的微弱战斗愿望也遭到了削弱。这种愿望早在前几年由于法西斯政权得以克服经济危机和耀武扬威地庆祝其上台执政十周年已经遭到沉重打击。正当法西斯政权声称其牢固性时，希特勒上台似乎就是对那种被称为“法西斯革命”的原理的有效性作出国际确认。

政权当局广泛利用了希特勒获胜的消息，把它作为证据，证明世界正朝着墨索里尼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率先指明的方向前进。人们固然可能会对纳粹取得的胜利在外交上带来的后果感到某些忧虑，特别是在涉及到奥地利能否保持独立和能否避免使第三帝
224 国的力量对上阿迪治^①直接形成压力等问题上是如此，但是在看

① 上阿迪治系指意大利北部与奥地利接壤的地方。——译者

到被宣传家们称为“法西斯思想普遍有效性”的那个问题已为事实所证明时流露出来的那种自鸣得意的情绪却暂时掩盖了这种忧虑。

希特勒上台的消息在人数有限的有组织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战士队伍中所造成的影响是令人沮丧的。从1933年起开始了意大利反法西斯历史上最低潮的阶段，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1936年。1933年是无所作为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意大利的共产党的“转折”在作出最后绝望的尝试中宣告结束，这些尝试的结果是使诸如贾恩卡罗·巴叶塔、阿尔图罗·科隆比、安东尼奥·吉甘特这样一些党员被捕入狱。在1933年，政权当局的权威变得更强大了，几乎达到至高无上的程度。

侨居国外的反法西斯组织所受打击尤其沉重。共产党人（但最初也有社会党人）曾徒劳地执意把希特勒的胜利看成是暂时的胜利，认为这表明动摇资本主义的危机的严重性。那些仍然追随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把德国社会民主党不战而降看成是使整个工人运动遭受打击的一个严重失败。他们不禁问道：“一个选举力量未被触动并拥有自己的工会、青年组织，甚至准军事组织的社会民主党，怎么就不能用某种方式来抵制纳粹上台呢？甚至当社会民主党的普鲁士政府被蛮横地解散时也没有这样做？”

社会民主党在普鲁士政府被解散以及1月30日兴登堡赋予希特勒以总理职务时，曾拒绝共产党提出的发起总罢工的建议，看来不能以共产党的建议带有明显的示威性和宣传性为由来证明社会民主党的这种拒绝是正确的。3月国会纵火案后举行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人的选票和共产党的选票（共产党当时实际上已被解散并遭到迫害）加在一起约有1200万张，这表明：只是由于工人阶级的分裂才未能有效地阻止法西斯主义得势。

225 第一个反映出欧洲社会民主党这种不幸处境的就是社会党国际的书记、奥地利人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他感到希特勒的胜利使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维也纳所取得的成果处于危险之中。维也纳这个红色城市这时已经被不断高涨的黑色浪潮所包围，同邻近的德国和奥地利本国各省相隔绝，在这种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它又怎能抵抗得住呢？实际上，维也纳也正是于1934年2月被法西斯教权分子多尔富斯通过炮击和名副其实的大屠杀攻陷的。此人用这种方式为纳粹的长驱直入打开了方便之门，而他本人却在几个月之后，亦即1934年7月，成为“褐色”暴力的牺牲品，当时，纳粹第一次企图利用奥地利纳粹分子从内部策反来进行吞并，但这次行动失败了。

在阿德勒的倡议下，社会党国际呼吁共产国际研究在什么条件下能够采取共同行动反对法西斯危险。但是，社会党国际的呼吁(1933年2月)却受到共产国际的冷遇。共产国际揭露德国工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头目一味企图要希特勒政府接受他们的合作，从而容许他们作为“合乎宪法的反对派”。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拒绝两个国际从上面进行直接联系，而与此同时，却又同意共产党和社会党在各国国内为组织统一战线共同行动而进行谈判。

社会党国际1933年8月会议通过奥托·鲍威尔建议欧洲工人阶级从政治上“结束分裂”。鉴于共产国际的态度，会议并未提出具体的建议，但是新的对话终于开始了。然而，第一步还是艰难的。各国共产党提出了共同行动的建议，但是缺乏信心，斗争的纲领也是局限于某些具体的眼前目标。法国共产党要求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会晤，以便共同商定一个十分有限的斗争纲领。这总算是某种东西了。几十年间形成的冰块和无数次的正面冲突开始融化和缓和了。但是布鲁姆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要求两个国际之间事先把问题说清楚。

1933年3月,意大利的共产党也直接向社会党工人、最高纲领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和各有关政党的领导发出了联合呼吁,以制定共同联合行动纲领。社会党拒绝了呼吁,并且指责这一建议的狭隘性,因为这一建议仅仅是为了达到有限的目标而实现统一战线,社会党人以论战的口气把这些目标称作是改良主义的,而与此同时,共产党人则拒绝参加制定一个更加广泛和深刻的联合纲领,这种纲领将意味着更改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指出的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的总目标。 226

事实也是这样,意大利的共产党是带着“揭露”社会党、加速大同盟的危机的意图提出联合建议的——这一点在党内文件中写得清清楚楚。意大利的共产党的建议虽然如此有限,但既然是向各党领导机构提出的,就遭到了共产国际的批评(当时意大利的共产党的代表是路易吉·隆哥),因为这个建议被看成过分笼统,很不明确。陶里亚蒂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在此情况下,行动十分谨慎,始终不让同社会党人论战之火熄灭。但还是有了一些新的东西:多年之后,两党总算寻求并建立了直接的联系,然而,还没有出现一条同希特勒的胜利在欧洲造成的局面的严重性相适应的新路线。显然,陶里亚蒂希望首先在社会党和反法西斯阵营方面能出现自我批评式的探索。

在社会党和反法西斯阵营方面的反应是强烈的。南尼在1933年6月的一篇文章中揭露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把社会主义束之高阁”的责任。正义与自由也在1933年6月通过卡洛·罗塞利的一篇文章谈到德国社会民主党“普遍销声匿迹”了,认为反法西斯力量如果不想使自己成为一个影子,就应当认识到这种危机。过了一些时候,卢苏对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卢苏认为,经验已经表明:老社会党已经不能肩负起推动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了。此文引起社会党的强烈反应,导致正义与自由同意大

利社会党协议的破裂,根据这一协议,意大利社会党委托正义与自由负责组织在意大利的秘密斗争。

反法西斯大同盟的危机与正义与自由对各国社会民主党提出的批评,加强了正义与自由要使自己变为一个党派的倾向。这时,227 该组织自称为“争取社会党统一运动”。罗塞利一直有这样一种想法:即老社会党不能起革命的作用,必须对之进行深刻的改造。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在当时那一阶段中就把注意力转向诸如法国新社会党人(德阿特)和比利时全球主义者(德曼)这样一些声称要革新社会党的小组。

使社会党营垒和大同盟遭到打击的这一危机,促使共产党加强了对社会民主党的批评,用以掩盖共产党人对希特勒的胜利也应负有的责任(陶里亚蒂在1933年5月《工人国家》上的文章)。此外,共产国际也顽固地坚持着过去的路线(正像1933年11—12月第十三次全会那样)。共产国际还在声称革命运动处于“方兴未艾阶段”。甚至认为纳粹上台也应当有助于德国革命形势的成熟。共产国际不愿承认德国工人运动完全失败了,一味强调纳粹的弱点和矛盾,指出还存在着革命重新高涨的可能性。他们声称,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同那些对希特勒作出让步甚或唯命是从的投降分子和叛徒休战。

共产国际第十三次全会把法西斯说成是“金融资本中最沙文主义、最反动、最帝国主义的分子的公开恐怖独裁”。这个定义指出法西斯主义是主要的敌人,并把金融资本中“最”反动、“最”沙文主义和不太反动、不太沙文主义的分子作了区别。但是,并没有根据这一定义相应地作出战略上乃至是策略上的必要改变。在第十三次全会的文件中,仍把法西斯国家中的社会民主党作为资产阶级的主要支柱。显然,共产国际不想开始一种自我批评的过程,也不想承认所犯的错误,因为这样一来就有可能被说成是承认托洛

茨基所主张的立场是正确的了。共产国际也不想去批评德国共产党,因为当时该党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进行着殊死的斗争。

八、国际联合的转折

然而,由于两个不同原因一并出现,改变路线就成为必要的了,这两个原因,一是苏维埃国家的安全,一是欧洲工人和人民运动对联合斗争的强烈要求。希特勒在德国的胜利很快就被看成是对苏联安全的一个危险。对苏联共产党来说,当时是一个艰难的时期。在作出巨大努力,消耗大量人力资源,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苏联领导看到有必要进行休整。在国内战线上出现了缓和的新的可能性,已经向过去年月中被批判过和打击过而现在又重新使用的党员发出了呼吁。因此,需要奉行一种维护和平和在资本主义阵营中寻求新的盟友的对外政策。 228

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讲话的重点是法西斯主义对维护和平所构成的危险。如果说1932年的周期性危机看来已处于克服阶段的话(尽管保护主义措施加强了,国际货币也日益陷于混乱状态),那么这种情况在德国的出现则是由于大力加速了军火生产。实际上,德国破坏了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已经开始大力重新武装。苏联不打算维护凡尔赛和约,但是又拒绝这样一种假设:既认为如修改该和约,世界就会被投入战争深渊。因此,斯大林希望改善苏联和法国的关系。斯大林曾呼吁法国政府采取旨在确保有力维护和平的行动,这一呼吁正是在法国工人阶级致力于在反对法西斯危险的斗争中重新找到联合行动(尽管在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仍然存在分歧)的途径时提出的。

在巴黎,来自下面的这一行动到了2月份变得更加强大了。希特勒的胜利推动了法国的右翼势力,他们在经济危机和许多丑闻

229 使共和制度丧失威信所造成的局面下，企图也在法国实现一个专制主义的转折；他们发起了一个反对共和制的前军人、民族主义分子和青年人的广泛运动。这一运动得到重要的金融集团的资助，受到警察署长让·希亚普的庇护，同军队指挥机关和国家上层官僚有着有效的联系。作为不断妥协的产物的软弱的激进党政府，没有力量来有效地对抗法西斯进攻。只有达拉第政府在1934年2月才敢于采取撤销警察署长希亚普这个法西斯匪帮的庇护人的措施。为了取消这一措施，1934年2月6日，在反动的法西斯组织领导下，前军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他们向议会发起进攻，同共和国武装力量在协和广场上发生了冲突。在冲突中有16人丧生。法西斯进攻的严重性和激进党议会多数的让步（它同意在温和的基础上组成民族团结政府）引起了工人的强有力的回击。最初，实现工人阶级必要的联合还有困难。2月7日，法国共产党又一次拒绝了社会党人提出在斗争中采取共同行动的号召。法国共产党自己则呼吁共社两党劳动者上街示威。但是，呼吁书中列举的理由却仍然有强烈的反社会党的论战。

2月9日，响应法国共产党呼吁的不仅是共产党劳动者，而且还有社会党劳动者，他们从“红色地带”来到巴黎市中心。同警察局的激烈冲突造成6人死亡和许多人负伤，但是在斗争中共产党员和社会党员终于联合起来了。通往联合的道路由此打开。分别由共产党和社会党领导的两个总工会，一起宣布2月12日举行24小时罢工。同一天，还发起了联合的街头示威。联合的势头席卷了仍然犹豫不定的领导。制度危机严重地打破了种种迟疑，这也是共和和民族精神的反映。2月12日，两支游行队伍在巴士底狱和共和广场汇合了。100万劳动者涌向广场。400万人参加了罢工。这是法国劳动群众联合反法西斯愿望的强有力的证明。法西斯“不会得逞”。

就在2月12日同一天,在维也纳为了反对法西斯教权分子多尔富斯的专制主义尝试,维护社会民主党所取得的强大地位,开始了一场没有希望的斗争。维也纳的工人经过四天的流血斗争被击败了,有400人丧生。这是艰苦斗争的一年。在西班牙,阿斯图里亚矿工的暴动被枪杀在血泊之中。在法国,外交部长巴尔图被害,因为他特别努力准备采取同苏联结盟政策以对付德国危险;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也在法国被克罗地亚法西斯分子所杀;这两起暗杀事件揭示了危险的国际阴谋的存在。7月,多尔富斯总理本人在未遂的纳粹政变企图中也被杀。纳粹主义咄咄逼人的阴影笼罩着整个欧洲。然而,严重的危险也使许多人觉醒,使新的力量奋起行动,向整个西方工人运动提出了一项紧迫的任务,迫使他们进行思考和作出自我批评,并为实现更有成效的联合行动而寻找新道路。

莱比锡审讯在全欧激起了广泛的反法西斯声援的感情。戈林遭到的惨败,纳粹分子利用国会纵火案进行无耻挑衅的被揭露,这些都突出了季米特洛夫的形象,季米特洛夫无比自豪地进行了斗争,使真理在法西斯的法庭上获胜,使纳粹借以上台的那套把戏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在亨利·巴比塞、安德烈·纪德、罗曼·罗兰的和平委员会推动下发展起来的联合运动,对向季米特洛夫和其他莱比锡被告者表示反法西斯声援的这一行动作出了有力的贡献。这个联合运动曾于1932年组织了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后来于1933年又在巴黎的普莱耶尔大厅举行了代表大会。这个运动吸收了许许多多个人参加,他们打破了森严的党派壁垒,带动许多没有参加任何政党的反法西斯分子参加了人民民主动员。为联合行动创造新的天地的倡议就这样增多了。对纳粹主义是欧洲和世界和平的危险的这一认识使新的力量奋起参加斗争,冲破了过去激烈的党派论战所造

成的种种束缚。

苏联当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宣告结束并艰难地通过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后，需要一个长期和平阶段（斯大林就指出，至少要10年），因此，根据苏联利益而提出的国家理由以及劳动者联合运动首先在法国，但也在西班牙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体现出来的势头，便汇合在一起，使共产国际不得不抛弃第六次代表大会奉行的仍然把社会民主党作为主要敌人的路线。1934年7月27日，法国共产党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法国社会民主党）在巴黎签订了统一行动公约。

九、意大利的共产党的联合转折

意大利共产党在这几个月中一直保持一种审慎的态度，并且执意继续奉行老的路线。甚至到了1934年5月，共产党对意大利社会党和正义与自由的论战的调子也还极其激烈，竟然指责南尼、莫迪利亚尼和博齐为亲法西斯分子，指责罗塞利甚至是持不同政见的法西斯分子。

陶里亚蒂和意大利的共产党这样做的原因，首先应当从如下事实来寻找：即共产党在1934年处境极其困难。1933年下半年和1934年上半年是一个无所作为的阶段，因为党的中心同国内地下组织的联系极少，派往意大利的干部过易地遭到逮捕。由于工作成效甚微，意大利的共产党在1934年5月还受到了共产国际的严厉批评。这一攻击的尖锐程度也反映出当时共产国际领导机构内部为寻求新方针而发生矛盾的紧张状况，同时也表明存在着一种要把批评的重量全都落在最弱小的党身上的倾向，而当时最弱小的党就是意大利共产党。出于谨慎的原因，陶里亚蒂也不想在那种情况下采取危险的先进立场，因为这种立场有使意大利的共产

党内再次发生新的冲突的危险。

转折是在1934年上半年实现的，而且并非没有困难。1933年底，共产国际第十三次全会再次固执己见地重申了过去路线的有效性。然而，1934年1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却指出，纳粹主义对欧洲和世界和平，对苏联的安全构成危险。整个1934年春季，苏联外交活动增多了，在改善同法国关系的同时，也在准备使苏联参加国际联盟。2月27日，季米特洛夫到达莫斯科，他立刻被指定参加共产国际书记处。季米特洛夫不仅是在莱比锡法庭上成功地进行斗争的主角，而且还是一个有自己的一段历史的共产党领导人。1928年以后，他曾由于被硬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而成为严厉批判对象，并被排除出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班子，因而他曾被委派去领导共产国际的一个负责西欧党政策的局的工作，特别是注意参加阿姆斯特丹—普莱耶尔和平委员会和一些群众组织的共产党人的活动。季米特洛夫还曾以应有的形式对德国共产党在希特勒上台之前最后几个月的做法提出过自己的批评。 232

在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围绕必须也在德国为纠正老的政治路线而行动这一问题展开一场斗争的时刻，让季米特洛夫参加共产国际领导机构这一事实就具有政治意义了。德国共产党政治局的多数人同共产国际的一部分领导人（皮亚特尼茨基）站在一起阻碍转折。巴黎、维也纳和阿斯图里亚的事态发展表明必须纠正过去的做法。5月28日，委托季米特洛夫向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政治报告，这一事实表明，由于有斯大林决定性的支持，主张实现同社会民主党人联合行动的新路线占了上风。

尽管有了这些指示，陶里亚蒂以及同他站在一起的整个意大利共产党领导集团虽然也同意这一点，但他们并不打算抛弃对社会民主党进行批评的原有立场，因为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后来则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失败已经在意大利社会党当中，在整个

反法西斯阵营直至正义与自由当中都开始了修正和自我批评的过程。意大利共产党因而想以自己的批评来打击这些党派，促使它们承认意大利的共产党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和国内开展的非法活动中所担负的领导作用。

233 此外，还看得出陶里亚蒂讨厌各种以模棱两可的大体一致为基础的谅解。所以，联合纲领的界限也就应当十分清楚，要提出若干明确的眼前目标（反对法西斯主义、争取和平、争取经济权利要求），而不要在某种程度上把不同的纲领主张混为一谈和使之含糊不清。此外，有关在意大利实现统一战线以及有关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同在工会和法西斯群众组织中进行合法工作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是急待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后来成了意大利的共产党的主要问题。

总而言之，尽管有种种迟疑，意大利共产党还是不得不考虑共产国际的新方针。此外，它也感到侨居国外的劳动者的压力，这些劳动者曾参加在法国开展的联合行动，他们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继法国共产党和法国社会民主党达成协议之后，意大利的共产党和意大利社会党就不能也达成协议呢？隆哥从共产国际回来后（1934年初）曾领导法国共产党和其他欧洲国家共产党中的意大利共产党员的反法西斯活动，他同南尼进行了初步的接触。隆哥和南尼一起发出了反对战争危险的呼吁。应当指出，联合行动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反对调动那些本来被派往勃伦纳山口、负有反纳粹任务、防止吞并的意大利师，也就是说，反对这样一种军事外交行动：这一行动表明，法西斯政府的方针本来是要使意大利参加欧洲反对纳粹扩张的那个营垒的，但是，这个方针很快就被抛弃了。

意大利的共产党和意大利社会党的接近加剧了老的大同盟的危机，这使正义与自由更加不安，它感到自己受到排斥。但是，侨居国外的各反法西斯组织之间的新论战在意大利的反响并不大，

而法西斯报刊上报道的有关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之间实现联合行动的消息在意大利却引起了广泛而积极的反应。尤其是青年人，他们没有体验过分裂和激烈论战的痛苦经历，而是经过新的途径参加反法西斯的政治活动的；这些青年人从实现联合行动中、随后则是从组成人民阵线中受到强有力的联合教育，这就使反法西斯一代新人成为一支在抵抗运动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全部精力的联合力量。意大利的共产党对实行共产国际政策转折的最初抗拒并不太为人们所知。作为意大利政局中政治教育源泉起作用的是种种事实，这些事实有力地克服了党派论战和法西斯审查机关所造成的重重障碍；这些事实就是：阶级团结、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²³⁴

第十章 征服埃塞俄比亚

一、法西斯的对外政策

在1920—1930年的10年当中，欧洲政治形势在凡尔赛条约所确定的限度之内，形势基本上没有变化，是处于法国和英国控制之下；法英两国之间虽然经常产生许多相互冲突的原因，但在反对对条约进行任何修改这一点上却始终是一致的。卢加诺条约（1925年）规定德意志共和国要接受战争结束时所确定的力量对比。美国不断在欧洲插手，而且不仅限于经济方面。实际上，通过有关处理德国赔款和战胜国战争借款问题的道威斯和杨格两项计划这一套复杂的办法，美国曾确保欧洲经济政治关系的平衡。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动摇了好不容易才保持住的局面。

虽然墨索里尼常常扬言要修改对外政策，但法西斯政府实际上是继续奉行传统的意大利外交政策，这一政策旨在利用意大利的各盟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以便为自己小算盘开辟活动余地。法西斯尽管以谨慎的态度保持着“平行外交”，并以此告诫“法西斯思想”的鼓吹者和那些要求修改凡尔赛条约的法西斯运动的支持者；但实际上却是奉行着民族主义温和路线；这一路线是在外交部老秘书长孔塔里尼领导下由意大利外交界制定的。这一政策的指导思想是要寻求英国和法国在签署和约时所许诺的“补偿”，而这种“补偿”又是应当在非洲，在利比亚南部（乍得一喀麦隆线）或是在埃塞俄比亚得到。但是，这种许诺的提法是含糊的，很难变成具体

的事实。

意大利资本主义中占优势的力量要求恢复帝国主义扩张。但在选择有待实现的目标上则存在着冲突。金融集团和消费品出口商主张向欧洲的多瑙河和巴尔干地区扩张，这一路线同法国的经济政治利益发生了矛盾。重工业集团(冶金、造船、军火)则主张必须在非洲夺取新的殖民地，也就是靠武力打回埃塞俄比亚。直到1932年为止，意大利的所有帝国主义企图都是在英法两国的殖民体系和美国在欧洲的存在所确定的范围之内进行的；美国曾以贷款帮助意大利克服货币贬值危机，但是，经济困难阻碍了法西斯政权在对外政策上采取行动。

墨索里尼一方面在国内政策上，只给主张对国家实行全盘法西斯化的人以有限的可能性，尽管同时又利用这种压力来推进政权建设，另一方面在对外政策上，也给那些主张推行一种由相同的意识形态决定的对外政策的人留有一定限度的行动自由。事实上，在科孚岛行动(1923年)^①开始受挫之后，墨索里尼正是在以意大利外交这一连续性为特点的狭小轨道上行事的。1929年任命迪诺·格兰迪为外交部长也没有表明这一路线的中断。相反，格兰迪却加强了意大利在国际联盟中的活动。他把意大利对外政策说成是不时用来赞成英国或法国的“决定性砝码”。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同法国或英国就取得通往非洲的自由通道达成协议。实际上，同作为弗朗丹政府阁员的法国外交部长赖伐尔于1932年建立起来的关系只是提前显示了后来在1934年恢复的那种关系，这种同赖伐尔的关系，实际上为埃塞俄比亚行动打开了方便之门，尽管其方式是模棱两可的。总之，在非洲(埃塞俄比亚或利比亚南部)采取

^① 科孚岛即希腊所属克基拉岛。1923年8月27日，曾发生意大利将军泰利尼等被杀事件，在国际联盟支持下，意大利当即出兵，占领该岛，后因当地人民反抗，被迫撤出。“科孚岛行动”即指1923年8月事件。——译者

行动的各种前景在当时都是从属于同英国和法国事先达成协议。

度过经济危机的最尖锐阶段和希特勒上台这两件事情使整个欧洲形势发生了变化。

尽管从宣传上利用希特勒取得的胜利(1933年1月)来证明法西斯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尽管这位新独裁者向那个曾在欧洲为法西斯主义开拓道路的先驱者表示感激之情而使人感到满意,但这些都不能消除墨索里尼乃至意大利外交界心中对奥地利和勃伦纳山口边界一带德国大军压境所感到的忧虑。法西斯政府于是开始展开外交活动,其目的在于重申同法英两国和好关系的有效性,希望以意大利参加反德联盟来换取对方为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打开自由通道。1932年7月,在格兰迪同赖伐尔初步接触之后,墨索里尼便责令殖民地部长德博诺准备一份在埃塞俄比亚采取行动的计画。1932年12月,这份计画由德博诺交给了墨索里尼。计画中指定:1935年是开始这一行动的预定期限。

二、决定的理由

在有关埃塞俄比亚行动的外交准备和军事实施方面,墨索里尼所起的作用看来是决定性的。由于种种原因,意大利被墨索里尼推向了战争,而所有这些原因都应当研究。

这里有经济上的原因。意大利经济由于建立了伊米公司和伊利公司并加强了采取行会组织形式的国家干预的分量,在经受了危机考验之后改组了结构。但是,工业需要有不断增加的需求,而当时像在意大利历史的其他时期一样,由于人民消费水平低,又有日益严厉的保护主义措施和外汇限制给对外贸易造成的越来越多的障碍,这种需求的增长只能靠国家大量定货。埃塞俄比亚行动将会要求增加公共开支(军火、军用消费、重建储备),因而也就是

大幅度增加工业生产。扩大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的控制区（即使当时还没有考虑全部征服的方案），就给经济发展、投资，特别是需求的增加（主要还是国家需求的增加）打开美妙的前景。因此，这一行动的准备也就意味着加紧控制，加强行会结构和向名副其实的战争经济过渡。

墨索里尼决定为征服埃塞俄比亚而准备战争，也还出自更为直接的政治原因。意大利在摆脱经济危机之后，失业人数增加了。在最紧张的时刻，政府曾用强迫命令的办法把失业工人和建筑工人从工业城市转移到乡村去。战争可以为失业人员所施加的压力找到出路。

此外，战争还可以把青年人的积极性引向民族主义的目标，而直到1932年和1933年为止，这种积极性却是向着左的方向发展的，并对行会主义作出革命的解释，尽管这一切都是在法西斯组织限定的范围内进行的。起初，政权当局曾赞成这些解释，这时则开始看到这些解释的危险性了，于是力图将青年人的热情导入歧途，重新煽动起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神话。这一做法在一定时期内曾对于改变法西斯青年当中一些最积极的小组的倾向确实有效。然而，战争的经历却在某些青年人中引起了疑虑不安和丧失信心，并为日后很快成为新反对派的不同政见播下了种子。

墨索里尼知道他能够在一些问题上动员起广泛的人民阶层，而过去就这些问题进行发挥的，除了有民族主义组织之外，还有工人运动的一些派别。这些问题就是无政府工团主义所鼓吹过的问题，即有关成立致力于在阳光下争得一席之地、反对帝国主义大国的利己主义的无产阶级国家问题。墨索里尼正是根据这些原因（而且这些原因是为绝大多数意大利人所同意的）确信，埃塞俄比亚战争可以成为一场人民战争。

在墨索里尼的上述决定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这样一种考虑：欧

洲政局的发展所提供的机会不能丧失掉。希特勒上台对欧洲安全和保持现有力量对比的可能性构成了紧迫的威胁。然而，纳粹的威胁当时还仅仅是处于开始阶段。因此就必须在德国能够打破越来越不稳定的欧洲平衡之前，或者在德国能够利用意大利去插手埃塞俄比亚方面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从而以单方面行动对奥地利问题作出有利于它的解决之前，利用现已掌握的短暂时期。

这些考虑促使墨索里尼在新的四方条约上采取了主动。根据意大利的意图，条约应当重申修改凡尔赛条约的可能性，但是要按照国际联盟规定的程序。一旦裁军会议不能取得具体的成果，条约则必须规定德国要承认权利平等的原则。总之，墨索里尼建议承认德国的要求是合理的，确定修改条约和军备对等原则，但同时又按照条约规定的程序限制德国扩军，确认国土现状，因而也就是确认奥地利的独立。

新的四方条约不过是卢加诺条约的新版本，适合德国新的立场。不过，条约不是由施特雷泽曼而是由希特勒签署的。德国接受了墨索里尼的建议，以便打破孤立、争取时间，但丝毫也不打算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所以，1933年10月14日，当裁军谈判毫无进展时，德国就退出了国际联盟，从而阻碍四方条约生效。

这一事件表明法国和英国没有能力看到纳粹的胜利所意味的新情况。这两个大国只是目光短浅地维护既得地位，即使在那种局势下也不能打破帝国主义在欧洲多瑙河心脏地区进行徒劳无益的争夺把戏。这样，两个大国也表现出不懂得在中欧进行可怕的战争准备这一情况所具有的巨大力量。

墨索里尼为遏制德国压力所作出的第一个努力就是重申意大利保证维护奥地利的独立。墨索里尼推动奥地利总理多尔富斯利用1934年2月残暴的反人民镇压来走上国家法西斯化的道路。但是，这个没有人民支持的专制教权政权始终都面临着不断增长的

纳粹压力。1934年6月14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威尼斯进行了第一次会晤。这次会晤暴露出长期存在的矛盾。7月25日，纳粹分子在维也纳举行的政变失败了，但是多尔富斯本人却在暴乱过程中被纳粹分子杀死了。意大利政府谴责了德国的责任。四个师处于紧急动员状态，意大利军队接近了勃仑纳山口边界地区。 240

希特勒被迫推迟实现其吞并奥地利的计划。他发现在外交上处于孤立地位，在军事上也没有准备好。首先应当使莱茵兰—法尔次重新军事化，并取消凡尔赛条约和卢加诺条约中的军事条款。意大利同德国发生大冲突的时期开始了。9月，墨索里尼在巴里发表讲话，强调罗马文明同条顿野蛮誓不两立。就是这篇讲话后来召唤许多法西斯青年反对纳粹主义和罗马—柏林轴心政策。

希特勒立即进行反击，并且是不择手段的。10月9日，在马赛杀死了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和法国外交部长巴尔图。谋杀是由安特·帕维利奇所领导和受意大利法西斯所保护的克罗地亚法西斯运动——乌斯塔什分子干的。但实际上这一行动却是由纳粹分子策划的，是为了败坏墨索里尼的声誉，使法意关系紧张，特别是为了清除掉法国外交部长，因为他看出纳粹的危险，并决心通过法苏两国直接达成协议来完成反德和反对修改小协约国（捷克、罗马尼亚和波兰）的联盟圈。

赖伐尔代替了巴尔图，他坚决主张法国必须依靠意大利的支持。他于1935年1月4—8日的意大利之行，对开始埃塞俄比亚战争是决定性的。在访问中，赖伐尔得到的是意大利宣布放弃对突尼斯的旧日野心，并就取消保障调节意大利民族群体利益（学校、卫生）的（法意）协约达成一项协议。作为交换的代价是法国不过问埃塞俄比亚问题，仅仅保护其经济上的利益。这就是墨索里尼所期待的畅通之路吗？当时这件事造成了很大的疑点，影响了事 241

态发展,并在德国准备迈出重要的最初几步来摆脱任何控制时,严重影响了意、法、英三国关系。

法国通过赖伐尔保证不给意大利制造困难(其实,后来它就是这样做的),但在事情复杂化时却不支持意大利,尽管赖伐尔(私下)也不是没有为墨索里尼提供宝贵的经济援助和有用的情报。赖伐尔的亲法西斯态度也不得不考虑到在人民阵线组成之后法国舆论已向左转,特别是不得不考虑到英国的反应:在那里,已出现赞成裁军和加强国际联盟的强大和平运动;最强大的经济集团以及军事和殖民地指挥机构已经因为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干涉有改变地中海、阿拉伯和非洲平衡的危险而感到不安。

三、战争准备

1934年底,墨索里尼决定意大利进行战争。这是一个个人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在普遍困惑不解的状况下作出的。当时备战工作显然是迟延了。国王反对这样干,因为他担心在埃塞俄比亚的负担过重会削弱意大利在欧洲的地位。工业集团也在抵制,因为他们希望能继续进行备战,以增加军事订货,但又不致冒实际作战的风险。巴多利奥正如他一贯的做法,反映了国王、武装力量和工业主的保留态度,建议把事情推迟到1936年或1937年。就是在法西斯党内也有不少人表示反对。这就形成了一个营垒,这个营垒正是1943年7月25日出于不同目的而形成的那个营垒的提前表现罢了。

但是,墨索里尼却认为机不可失。所有主要的政权力量都把同法国与英国达成协议作为采取行动的先决条件。墨索里尼巧妙地利用了同法国外交部长赖伐尔在其罗马访问时所达成的含糊其词的妥协,把这一妥协当成了放行的绿灯。所以,早在赖伐尔到达

前夕，墨索里尼就已经拟订好最终解决埃塞俄比亚问题的行动计划，公开宣布的目标是摧毁阿比西尼亚武装力量并征服埃塞俄比亚。为使其他大国面对既成事实，行动应当是迅速的。计划声称，如果军事行动迅速造成既成事实，那么任何人都不会制造困难。因此，决定动用强大的力量：飞机、大炮、毒瓦斯（1934年12月30日的指示中明确规定的），实行全国军队动员。殖民部部长德博诺、总参谋长巴多利奥同陆军部副部长巴伊斯特罗基之间的激烈论战持续了一年。德博诺希望这次行动带上殖民主义的特点，动用本国军事力量要有限，而应广泛利用当地的力量。他想维持对行动的控制，并且不致被迫把控制权丢给军队指挥机构。

巴多利奥将军和巴伊斯特罗基两人虽然也有争论，但都以不同的方式和在不同的时间承认：必须最大限度地动用陆海空军事力量来采取直接行动。这样一来，巴多利奥就想把行动的指挥权留给总参谋部，也就是留给他自己，尽管这也是出于在协调方面的客观需要。然而，巴多利奥还注意不要过分减少驻意大利的军队力量，以便始终能应付大陆上的需要（奥地利）。此外，他同德博诺一样，要求在厄立特里亚精心筹备后勤基地。所以，他的结论是：必须推迟战争（这也是为了在战败的情况下有托词）。

墨索里尼听任其合作者之间的争论发展和加剧，以便使一方反对另一方，这样好由他自己来调解。1934年12月30日，当墨索里尼决定了一项一开始就需要动员整整12个师的行动计划时，他迫于迅速行动的需要，也曾表现出低估武装力量没有组织就绪的情况，低估将领之间存在的争夺和相互嫉恨的严重性，低估各军种之间联系的缺乏，尽管他已经把陆海空军作战部部长职权都统揽到自己手中。墨索里尼还表现出无视军备和后勤准备情况。1935—1936年间所作努力的后果（以及后来1936—1938年间通过干涉西班牙所产生的后果）到1940—1943年就反映出来了。

1934年12月30日的指示下达10个月之后，敌对行动就开始了，动员了约有22万人的两个远征军团，其中13.5万人是本国人。战争结束时，在非洲和爱琴海投入的力量共有40万意大利人和9万殖民地人。

面对着这种损害意大利国家的人力物力资源的行动，巴多利奥最初是持保留立场的，正如1940年意大利开始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远征希腊时一样。但是，他最终还是执行了墨索里尼所要求的路线，墨索里尼当时坚持必须迅速行动，因为国际形势正在日趋复杂化。

四、战 争

1935年1月7日，同赖伐尔达成的协议尽管是含糊其词的，但由于英国完全敌视意大利干涉埃塞俄比亚的计划，仍然很快就缩小了其作用。4月11—14日，在斯特雷萨举行了一次会议，研究由于德国决定单方面宣布凡尔赛条约有关禁止德国重新武装的条款失效而引起的问题。墨索里尼亲自出席了斯特雷萨会议，并同由英国外长西蒙陪同的英国首相、工党人士麦克唐纳以及由法国外长赖伐尔陪同的法国总理佛朗丹分别进行了会晤。尽管当时军事准备正在进行，英国代表团却并不想讨论埃塞俄比亚问题。而且英国代表团也没有回答墨索里尼所作的敦促，他建议明确限定欧洲应作出有效的努力，“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反对“任何可能会使和平处于危险的单方面废除条约的行动”。

墨索里尼的建议有明确的意义，这是不能忽视的。因此，英国的沉默只能解释成是默许埃塞俄比亚行动，即使意大利方面非常清楚英国反对这一行动的原因。实际上1935年下半年英国的政策，无论是麦克唐纳—西蒙政府也好，还是随后的鲍德温—霍尔—艾

登保守党政府也好,始终都是敌视意大利的埃塞俄比亚行动的,虽然一开始就排除了英国可能会采取带军事介入性质的态度。 244

6月24—25日艾登罗马之行公开暴露出英国的反对立场。当时英国曾要把埃塞俄比亚的欧加登地区奉送给意大利,以说服意大利不要武装入侵阿比西尼亚。墨索里尼愤怒地拒绝了。他说,意大利动员起来不是为了欧加登。在8月16—18日的意、法、英三国巴黎会谈中,法西斯政府提出让意大利保护或托管阿比西尼亚,以此作为避免战争的条件。

英国不同意。英国舆论越来越带有和平主义和亲国际联盟的性质。在1935年6月27日争取和平的民意测验中,1100万英国人要求英国努力维护和加强国际联盟,主张普遍裁军政策。民意测验要求,如果一个国家侵犯了另一个国家,那么它就不仅要受到经济上的制裁,而且也应当受到军事上的制裁。

在国际联盟9月会议上,英国敌视的态度更加公开了。从1935年4月起,埃塞俄比亚就要求把乌阿尔-乌阿尔油井之争提交日内瓦大会审议(这是索马里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纠纷,意大利政府利用它来说明埃塞俄比亚的侵略性和不承认意大利在索马里的权利)。实际上英国并不愿意把这个问题拿到大会上讨论,为的是防止意大利继德国之后也退出国际联盟。所以,英国建议争端在意大利-埃塞俄比亚之间的谈判范围内审议,以便最终按1928年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条约的规定办法来裁决。无论如何,英国是公开地采取维护埃塞俄比亚的立场,它声称希望和平解决,实际上是以先发制人的方式谴责各种武力行动。意大利被说成是可能的侵略者。

9月25日,在霍尔为使国际联盟的义务得以兑现而大费了一番口舌之后,通过了国际联盟给予埃塞俄比亚以援助的建议。早在9月10—11日的赖伐尔——霍尔会晤中就已经决定只实行经济制

裁，而避免军事制裁，排除了动用舰只进行封锁，而且也不关闭苏伊士运河。9月20日，向地中海派出霍姆舰队，看来这是违反上述协议的。在日内瓦讨论前夕，英国舰队开进地中海是为了支持霍尔的讲话，这一讲话要求英国保证支持国际联盟所作的决定。

这只是一种宣传行动，是对表面力量的一种显示，而没有什么实际的军事价值。墨索里尼已经从赖伐尔那里知道，法英两国的真实意图是排除动用武力。他还得知，霍姆舰队并未准备进行真正的作战行动。因此，他结束了拖延做法，并于10月2日在威尼斯宫宣布战争开始。

墨索里尼在10月2日的讲话中概述了战争的目标。这个讲话标志着法西斯政权的一个转折时刻。讲话中的一个问题是指责1915年所作的承诺没有兑现，当时意大利曾“铤而走险”，但是“在意大利为共同的胜利作出有60万人牺牲、40万人致残、100万人受伤这种最大贡献之后，在以高昂代价换来的和平谈判桌上分给意大利的只是其他殖民主义者的战利品中的残羹剩饭”。讲话的另一个问题是谴责“那种剥夺了我们在阳光下一席之地”的不公平。全国举行了有数以百万计意大利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集会。所有的人并不是像法西斯宣传所扬言的那样，都是听从指挥的。许多人只是相信，战争符合民族生存的需要。

1935年10月7日，国际联盟谴责意大利是侵略国，11日，决定实行经济制裁并禁运武器，但不包括石油。也就是说，允许意大利购买这一作为继续战争的条件原料。仅这一例外就表明了制裁收效甚微，尤其在短期之内是如此。诸如奥地利、匈牙利、阿尔巴尼亚等国际联盟成员国以及德国、美国、巴西、日本等非国际联盟成员国均未实行制裁。瑞士实行了制裁，但并不过份积极。实际上，在进口原料、食品和工业品方面的唯一困难是意大利所拥有的金融手段有限。

德国采取了一种特别的、肯定是并非友好的态度。德国在向埃塞俄比亚提供了武器之后宣布，既向埃塞俄比亚又向意大利禁止出口武器。德国的目的是使战争持续下去，以便使法英两国不去注意重新武装莱因区的准备工作，并使意大利疏远法英两国，打破斯特雷萨战线。正是在1936年埃塞俄比亚战事处于最困难的时刻，墨索里尼迫于同英国和国际联盟的矛盾，决定接近德国，宣布奥地利问题不应使两个法西斯大国分裂。他宣布：“斯特雷萨已经完蛋了”。一个使意大利在法西斯主义领导下同德国结成军事同盟，建立罗马—柏林轴心并逐步屈服于更强大更有准备的盟友的机器从此就运转起来了。德国当然立即利用了这一新形势。1936年3月7日，德国进行莱因区的重新武装。法国和英国没有作出反应，被迫接受了既成事实。意大利表示赞同，但仍坚持要致力于保障奥地利的独立。希特勒果然向墨索里尼提供了后者所要求的保证。同时，法英两国由于忙于欧洲心脏地区出现的新问题，而且对埃塞俄比亚军事行动进展之迅速感到措手不及，也就减少了对意大利的压力，准备承认既成事实。

开始时，作战行动是进展迅速的。10月6日，德博诺指挥的远征军团抵达阿杜瓦，10月16日到了阿克苏姆，11月9日到了马卡累。后来，在厄立特里亚战线上的攻势不得不停下来。德博诺实施的计划是稍加推进，以便在高原上等待埃塞俄比亚反攻，进而发动摧毁敌军力量的战役。这种谨慎在墨索里尼看来是过份的，它表明：德博诺想把这一行动的性质限制在用老一套办法进行的军事行动上。

但是，国际形势和宣布制裁却迫使法西斯政府不得不速战速决。墨索里尼决定召回德博诺，而委派巴多利奥指挥战争。选择巴多利奥是为了强调这次行动的全国性。对于国王、军队和工业集团来说，巴多利奥的名字是一种保证，因为他们在1936年初曾对

于战争带来日益增加的困难和同法英两国断绝关系感到惊慌失措。

247 同法英两国的关系实际上在赖伐尔—霍尔计划失败后就恶化了，这个计划向意大利割让了大片领土，以便迅速了结冲突。有关赖伐尔—霍尔计划的泄露在英国舆论界引起了愤慨的抗议，这就迫使外交部长于12月18日辞职。这样一来，达成妥协的可能性就化为乌有了，而大议会在12月18—20日会议上曾表示打算同意妥协的。赞成签订协议的人中间有格兰迪、费代尔佐尼、巴尔博、德斯特法尼、沃尔佩，也就是后来在1943年7月25日造成墨索里尼倒台的那一批人。在他们后面，像过去一样，是国王、武装力量指挥机关和最强大的资本主义集团。

1936年1月20日，在最初遇到的一些困难之后，又恢复了攻势。在墨索里尼的催促之下，巴多利奥动用了一切手段（用飞机狂轰滥炸并使用了毒瓦斯）。格拉齐亚尼在索马里战线上的进攻于1月20日攻占了内格里，这就加剧了巴多利奥同格拉齐亚尼的争斗。墨索里尼本人煽动这场争斗，他敦促分别从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出发的两股力量开展竞赛，争取首先到达亚的斯亚贝巴。巴多利奥通过安巴阿拉吉峰^①和阿散季湖之役的胜利，于5月8日首先到达了亚的斯亚贝巴，从而使埃塞俄比亚皇帝出走，导致埃塞俄比亚国家覆灭。这正是人们所希望的军事解决办法，这一办法既吞并了阿比西尼亚，而又不要同埃塞俄比亚皇帝谈判，还避免了国际联盟的干预。

5月9日，墨索里尼在罗马宣布帝国“重新出现”。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作了埃塞俄比亚的皇帝。6月18日，艾登宣布要建议国际联盟废除制裁。7月6—7日国际联盟宣布从7月15日

^① 厄立特里亚的一个山峰，二次大战时，意军在此曾进行殊死抵抗，终告失败。
——译者

起取消制裁。7月9日英国政府决定把霍姆舰队撤出地中海。这等于承认了既成事实。

五、帝国宣告成立

1936年5月是墨索里尼威望最高、政权的赞同基础最广泛的时刻，也是反法西斯前景最暗淡的时刻。从1936年7月起，在干涉西班牙、支持佛朗哥暴乱后，政权很快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赞同基础也开始慢慢地、然而却是不断地出现裂痕，随后则是逐渐缩小²⁴⁸了。但是，就在那一短暂时期，从1936年5月到7月的三个月当中，政权却处于走红运的顶峰。

意大利资本主义的人物和集团曾焦虑不安地看待埃塞俄比亚行动所具有的性质，这个性质在1935年6月24—25日艾登的罗马之行后就尤为明显了。特别是在1935年9月，制裁的威胁和霍姆舰队被派往地中海曾改变过埃塞俄比亚行动的最初性质，即目标有限，不使埃塞俄比亚作为一个独立国而消失，因而所要得到的结果应是英法两国和国际联盟都可以接受的。面对这种令人不安的前景，麇集在王室周围的人物和集团宣布他们讨厌迅速开始敌对行动，要求推迟战争，其论据是巴多利奥讲过的理由，即要更好地进行准备。这些集团也参加了大议会，他们的态度甚至迫使墨索里尼不得不考虑必须接受1935年12月霍尔和赖伐尔建议的妥协。但是，英法两国的尝试失败正是时候，使法西斯政权避免接受妥协。这就为意大利重新发动攻势开了绿灯。

面对着取得胜利这一即成事实，战争前夕持不同政见的人就不得不承认墨索里尼的成功，并力求使人忘记他们在危机时刻所采取的立场。国王在成为埃塞俄比亚皇帝之后对墨索里尼感激不尽。墨索里尼拒绝了巴多利奥和格拉齐亚尼所要求的贵族称号，

而指使别人把他任命为帝国第一元帅，同国王平起平坐，国王因而不得不蒙受屈辱。然而，墨索里尼已经在普遍的欢呼声中成了“元首”。墨索里尼取得的成功使他洋洋得意，这就妨碍他以应有的方式来估量国际局势的新发展。成功还有助于他暂时打破不信任的包围圈，这种包围圈后来每当危机时刻总会在他身旁出现，特别是1940年6月当他想要仓促决定意大利参战时是如此。

249 在埃塞俄比亚行动从外交上和军事上进行准备之初，意大利人民当中从上到下最初都存在着犹豫和恐惧，后来由于在一系列特别是为失业者、雇农和农民所理解的问题上进行广泛的人民动员，终于成功地使埃塞俄比亚行动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而这一直是在为民族主义的花言巧语所毒害和急于打破过去在社会上及政治上无所作为的窘境的小资产阶级推动下实现的；对于这种支持的原因和局限性是应当弄清楚的，但是不应否认其广泛性。过去那种披着工会权利要求外衣的民族主义鼓动起了作用，当时，意大利正开始一切“无产阶级的战争”，来争得“阳光下一席之地”，赢得“可以耕种的一块土地”，满足意大利农民“要求土地的渴望”，从而在各个国家之间实现“社会公平”，打击富足的英国这个“可恶的白化病人”^①的利己主义。由于法西斯主义展开的活动，由于缺少足以引起政权内部矛盾爆发的国内反对力量，阶级冲突就被引上了歧途，走向帝国主义对外征服的目标。农村居民更为广泛地欢迎进行这场战争，与此同时，工人则持保留和不信任的态度，尽管不仅为满足武器、车辆、轮胎的需要而且也为满足武装力量的供应，生产是在加紧进行，从而保证维持高的就业水平。

教会的赞成态度在战争期间对促使意大利人支持政权当局起了有效的作用。梵蒂冈固然采取形式上的中立态度，但实际上教

^① “白化病人”原文为“Albione”，源出于罗马人古时称谓英国的一种轻蔑说法，可能是从英国海滩多白色沙土而来。——译者

会人士并不是没有以种种手段（包括举行公众祈祷和从圣坛上布道），给政权以支持。像舒斯特尔红衣主教这样最高宗教权威人士也公开为战争祈祷。教会的立场对侨居国外的意大利人有广泛的影响，并且还具体地转化为向驻埃塞俄比亚的意大利军队提供必需品的有益的经济活动。主教和教区神甫除了少数例外，都亲自投身于动员意大利人的活动当中，他们在居民中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工作，做到各家各户，特别是把话说到妇女的心坎上。教权所展开的活动以及许多自由党、天主教和改良派领导人所表现的对政权的支持，为成功地动员人民起了作用。

最明显地表达人民支持的情况发生在“效忠日”这一天，那是1935年12月18日，意大利妇女，首先是埃莱娜皇后，拿出自己的结婚戒指“为国献金”。捐献黄金和贵重金属的活动使政府在1938年3月31日得到几乎是3.7万公斤黄金、11.5万公斤白银和其他财宝。在国外的反法西斯宣传为了缩小这一行动的政治意义曾宣称，意大利妇女是迫于政府的压力、威胁和讹诈而交出自己的结婚戒指的，而且这些戒指中大部分都不是真金的。当然，威胁和讹诈不会没有，但是不能低估了上述行动的意义。实际上，假的金戒指的比例极小，这一点也表明了意大利人民的民族主义狂热程度。

当然，反对派并没有从国内消失。但是，地下的反对派由于前几年遭到警察的打击，特别是由于谴责埃塞俄比亚行动和要求外国干预（这看来是主张败北）而在政治上陷于孤立，已经遭到削弱。1934—1936年间政治犯和被流放的人数大体没有变化，这一情况也表明：国内抵抗已减少到最低限度。

战争期间，其他或多或少合法的反抗形式，除个别外，也都逐渐衰弱了，甚至实际上消失了。419名参议员中有415名（其中包括贝内代托·克罗切、路易吉·阿尔贝蒂尼、维·埃·奥兰多、伊万诺埃·博诺米）在当局发起捐赠时都献出了自己的议员金质

奖章。

一些著名的反法西斯人士承认了政权当局以及埃塞俄比亚行动的民族性质，这些人士为当局的宣传工具所利用，被说成是实现民族团结的证明。下述几个人的表现特别令人震惊，他们是：罗伯托·本奇文加将军，他曾作为乔瓦尼·阿门多拉领导的全国联盟的阿文汀派议员，支持埃塞俄比亚行动；剧作家塞姆贝内利，他曾要求自愿前往非洲；阿尔图罗·拉布里奥拉，他曾从流亡地返回国内，表示愿意保证对自己国家的“充分支持”（1935年9月）。

251 在这种情况下，伊万诺埃·博诺米要求（1936年1月）墨索里尼同意他建立一个民族社会主义者联盟，其核心由前反法西斯议员、改良派社会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和民主自由派人士组成。看来博诺米当时可以指望有40来名前议员参加。由于伦巴底大区法西斯组织中最强硬的派别，尤其是法里纳奇的激烈反对，博诺米的倡议没有成功。博诺米、卡尔达拉和达拉戈纳曾试图同政权当局融为一体，从而取得最低限度的结社自由，他们在这方面的种种尝试表明，过去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一部分人对彻底改变形势已经没有信心了。相当多的反法西斯人士，由于十年来被迫处于消极被动、既软弱无力又无可奈何的境遇，无法忍受身受监视和歧视（其实，这种监视和歧视还是非常有节制的和灵活的），曾设想可以利用战争提供的机会，为自己屈膝就范的行为从民族利益方面找到理由。一些天主教领导人和天主教组织也效法教会的榜样，参加了对意大利人民的动员活动。

这是反法西斯运动的艰难时刻，当时，曾经有过法西斯活动经验的青年反对派刚刚初露头角，而一大批老反对派则由于长期无所作为的等待而精疲力竭，最后还是向政权当局的力量投降。

六、反法西斯运动的弱点

埃塞俄比亚行动是在意大利反法西斯运动的各个领导中心处于极度虚弱的状况下发生的。在墨索里尼上台之后，人民阵线建立之前，反法西斯运动还缺乏联合一致的方针。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之间的统一行动政策在保留和互不信任的气氛下开始艰难地起步，而正义与自由则在自我批评式的探索阶段当中，独自处在常常是自相矛盾的对别人进行批评的鼓动立场上。卢苏又一次于1935年3月在《正义与自由》周报上对意大利反法西斯运动的弱点发表了严厉的看法。他指出：“近年来没有发生任何预示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事件。甚至情况恰恰相反。出于政治原因而侨居国外的情况甚而也减少了，而不是增加了。从国外回来的要多于从国内出走的。假如在意大利能干一些事的话，上述情况倒也不是什么坏事。但是，什么也干不成。”

最初，耸人听闻的宣传鼓动夸大了来自国内的消息，把一些事252情渲染得似乎证明国内的抵抗正在日益壮大，甚至显示出有造成起义形势的可能。尤其是强调了从内部破坏政权当局的那些冲突，特别是在军事行动处于冬季停滞状态时是如此。正如人们所见，抵抗和冲突确是存在着，但其重要性却被夸大了，甚至发展到完全置现实于不顾。

对意大利的制裁得到人们的赞同，而且还要求加重制裁和严加实施制裁；这是一种口头上的失败主义态度，然而，这种态度并不能变为具体行动，因而这就使政权当局有可能把流亡在外的反法西斯力量说成是祖国的敌人。1935年10月24—25日，意大利侨民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召开，当时战争已经开始。这次大会汇集了侨居国外的反法西斯人士，但并不是全体，因为有许多人

因故没有参加大会。但是，侨居美国、拉丁美洲、非洲(突尼斯)和欧洲各国的大的团体却支持埃塞俄比亚行动，把战争的顺利进展看作民族自豪的理由。意大利侨民中的多数人第一次觉得意大利是一个既令人害怕、又使人尊敬的国家了。因此，长期受欺凌受侮辱的意大利侨民是怀着钦佩和感激的心情来看待法西斯主义的。在反法西斯宣传开展得最为活跃的法国，据统计，在85万意大利侨民当中，受反法西斯党派活动影响的还不到10%，这一比例只是在人民阵线胜利之后才稍有增加。

参加布鲁塞尔大会的既有个人，又有团体，但侨民当中的“大人物”(尼蒂、斯福尔扎、斯图尔佐)以及正义与自由未参加这次大会。罗塞利说，据他估计，大会不可能激起意大利群众当中的那种动荡情绪。正义与自由实际上是对国内形势作了一番不符合实际的描绘，认为国内形势是正在朝着起义危机急速发展。在罗塞利看来，意大利共产党没有看到立即采取行动的需要，而宁愿致力于筹备像召开侨民大会这样的宣传性活动。

然而，布鲁塞尔大会也指出法西斯主义垮台为期不远的前景。南尼的报告强调法西斯政府从敌对行动一开始就遇到了财政军事困难。他指出，已经出现了革命性危机。战争结束时，即使在打胜的情况下，意大利社会也将会发生彻底的变化，尽管估计到政权仍操在现制度手中。战争引起政权变化这一前景对有组织的反法西斯力量的领导人想必是有吸引力的，因为格列科在布鲁塞尔大会上发言时甚至就表示，意大利共产党“保证从国内外支持一个打算维护一切人民自由权利、用一切手段维护和平并采取足以打破垄断资本力量的政府”。但是，这个政府又会以怎样的方式，依靠哪些行动出现呢？这个观点隐含着这样的意思：即政权当局要发生变化，因为它已经被战争削弱到不得不接受从自由意义上进行改变的地步。这种前景只能由战争彻底失败来证实。

一位年轻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在大会上发了言，他带来了米兰社会主义青年的敬意。后来大家才知道他是安东尼奥·佩森蒂教授。他返回意大利后几个星期就被捕了，被特别法庭判了24年监禁。在狱中，他加入了共产党。其实，由鲁道夫·莫兰迪、卢乔·卢扎托和欧金尼奥·科洛尔尼在米兰建立的社会党国内中心是批评布鲁塞尔大会的，特别是批评格列科的立场。莫兰迪拒绝意大利共产党的路线。这条路线主张把反法西斯力量同法西斯内部的反对派力量结合起来。他否认存在“内部反对派”，批评共产党所看到的那种动荡并不存在。他担心，相信法西斯主义内部存在反对派的这种主张，其结果是为法西斯帮忙，推动青年人参加法西斯组织活动，从而造成青年人遭受法西斯党更严密控制的危险。与此同时，正义与自由还从反面来批评共产党人，说他们没有看到法西斯主义已陷入决定性危机，再过几个月，形势可能会急转直下。因此，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不能寻求妥协。

1936年春天发生的事件把这种错误的前景一扫而光。面对着帝国取得的胜利，侨居国外的反法西斯力量，根据各党派及其在前几个月所采取的立场，作出不同的反应。指望出现革命性危机的人的反应，像罗塞利一样，是茫然不知所措。这时，罗塞利沮丧地写道：“老的反法西斯主义已经完结了”。但是，如果看不到在法西斯主义内部已开始出现了新动荡的话，那么新的反法西斯主义又应当是什么呢？在1935年下半年，越是充满对法西斯主义即将垮台的奢望，失望就越大，结果则是挑起了一场激烈的、神经质的、更多是有害而不是自我批评的争论。 254

七、战时共产党的状况

意大利的共产党注意到战争获胜所造成的新形势，重新提出

对法西斯反对派做工作的主张，并且使这一主张的内容变得更为广泛。1934—1935年，意大利的共产党经历了一个从政治上和组织上进行艰难探索的时刻。同国内的关系，特别是同基层组织的关系减到最少程度。基层组织指的是什么呢？在国内存在着一些据点、联络点、交通员和许许多多孤立的、而且被迫处于消极状态的共产党员或党员小组。有多少组织真正地或者至少是打算开展集体活动、甚而哪怕仅仅是宣传性的集体活动呢？在1935年头9个月，只有28名专职干部秘密地返回意大利，这是几年来最少的。8名专职干部被捕了，其百分比是25%。这同1930—1932年转折年代最高的百分比相比算是低的了。但现在专职干部回国则是分别派到一些组织和党员个人那里去的。

党已经放弃了组织国内中心的打算。实际上是重新采用了“转折”之前的组织办法，即少量地非法返回国内，然而要开展所谓的合法工作。当时更喜欢使用的是“合法联络员”，即一些可以借工作或家庭为由合法地往来于意大利和法国（或是瑞士和比利时）之间的党员。就是那些返回意大利探亲的侨民，只要他们有政治水平，也可以顺利地进行政治性工作，收集情报，并把这些情报反映给中央。信件交往越来越多了，这些信件是按照商定的地点发往国内的，或是同样按照一定的地址从国内寄往国外的。然而，这些地点——既有国内的，很多则是国外的——受到监视：警察局等待着信件，把它们复制下来，然后再按地址发出去，以便能监视中央和基层之间的关系。

那时，党的组织领导已经改变。1934年，陶里亚蒂担任了共产国际书记。但他始终还是意大利的共产党的“领袖”，这是当年各国共产党越来越常用的词。格列科成了政治局负责人。政治局的成员还有马里奥·蒙塔尼亚纳、隆哥、杰纳里、迪·维多里奥、比博洛蒂以及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代表内加维莱。中央委员

会的组成是流动性的，这取决于在意大利的被捕情况和从监狱中获释的人来自国内的情况。1935年，在党的中心工作的人是“转折”失败之后在第四次代表大会组成的领导班子中幸存下来的人，同时还加上从狱中释放出来以及随时准备出国的人。像内加维莱、诺韦拉、比博洛蒂、塞雷尼、佩莱格里尼等一批被释放的共产党员的到来，为党的中心作出新的贡献。

那时，塞雷尼的地位很强，《工人国家》的编辑工作交给了他。隆哥于1934年初回到了巴黎，他负责协调侨居西欧各国的意大利共产党员的活动，这些党员一般也参加法国共产党和其他欧洲国家共产党的队伍，但他们负有在反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应当完成的自己的任务。

格列科的处境并不容易。陶里亚蒂同格列科之间的书信往来，以及党的政治局或书记处同1936年由贝尔蒂领导的驻共产国际的意大利代表团之间的更为正式的书信往来，表明大家都在共同努力进行不断的探索，但同时也表明：每天都有批评的压力，这种批评来自一个像陶里亚蒂这样的同志，他是根据自己的个人威信以及在共产国际书记处中所占有的地位提出批评的，但久而久之，这种批评就使人无所适从了。陶里亚蒂并不是没有告诉格列科他对形势的看法，建议采取什么政治立场和倡议。但是，当格列科努力把所得到的建议付诸实践时，陶里亚蒂却又批评在接受他的建议和把他的建议贯彻到政治行动中去时所用的那些提法和方式了。陶里亚蒂的批评常常是尖刻的，有时甚至是轻藐的，这就使格列科心神不安，不知如何是好，在工作中失去了自信。此外，这些批评也在人数不多的领导班子中引起困惑和议论，这些都损害了党的行动负责人的威信。当陶里亚蒂不在时，格列科被指定担任党的书记，但在上述情况下，格列科的威信降低了。

总的政治路线在发生变化，这就使党的中心内部关系变得更

为困难了。《工人国家》这份杂志使我们能了解当时争论的情况，那场争论当然十分热烈，但也反映出一种举棋不定的情绪，这种情绪在以后几年就更加厉害了。有关社会法西斯主义的路线只是在1934年中才被抛弃掉；1935年年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结束了，这时就需要理解大会的结论，特别是需要设法把这些结论变为在国内开展政治行动的指示。在疑虑重重之中走上同意大利社会党实现统一行动的道路之后，问题就在于如何把法国和国际上的公式变为意大利的公式，也就是说，要具体地看一看：人民阵线政策在意大利应当是什么样的。当然不能照抄法国执行的路线。然而，那些直接参与许多不同国家、经验的侨民党员的基层组织却倾向于执行这一路线。甚而连在巴黎处于地下的、同其他反法西斯政党领导有政治接触的领导班子也不能摆脱周围环境的牵制。

处理好各反法西斯党派团结的路线和打入法西斯组织这一路线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处理好反法西斯战士们这一反对派和新的法西斯内部反对派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非易事。困难不仅仅来自社会党亦即最高纲领派的社会党、意大利共和党以及正义与自由的领导集团，而且还来自国内，特别是来自莫兰迪的社会党国内中心，这个中心公开反对“结合”路线。困难也来自共产党自己的组织和分散的老党员，他们不理解怎么能同法西斯分子建立接触，不管他们的立场如何。探索一条既能符合侨居国外的反法西斯力量团结的要求、又能符合在国内同新的法西斯内部反对派结合起来的要求的联合政治路线，正是意大利的共产党在以后几年所从事的工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在这期间，意大利的共产党始终都是在采取向法西斯内部形成的新力量大胆开门的行动和迅速退回到实现狭隘的反法西斯力量团结这一僵硬立场之间强烈地摇来摆去。

八、“和解”政策

埃塞俄比亚之战，必然使意大利的共产党采取坚决谴责这一行动和坚定反对的立场。鉴于国内反法西斯力量方面（包括工人和农民当中）有不少人作出让步，这一立场就有重要意义了。同意进行制裁和义不容辞地声援被侵略的埃塞俄比亚人民，这两点最初并没有促使反法西斯反对派和新的法西斯内部反对派之间建立起政治关系，当时这一新的法西斯内部反对派还刚刚形成，这个反对派与其说是拒绝战争，倒不如说是倾向于使战争具有特定的民族和“革命”的性质。况且，意大利的共产党在1935年下半年也曾抱有过分的幻想，甚至急急忙忙地表示要支持一个过渡政府，而当时这一政府的存在条件并未具备，也看不到近期有这种可能。陶里亚蒂立即从莫斯科对格列科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匆忙而又幼稚的声明进行了批评。

但是，意大利的共产党并没有陷入正义与自由那种认为革命危机业已在临近的错误。特别是共产党一直密切注视着政权内部正在发生的情况。共产党直接针对军官和士兵进行工作。从战争一开始，党就号召反对法西斯的工人要在反对老板和高官显宦、维护自身阶级利益的斗争的基础上把支持法西斯的工人“当作兄弟”。党在1936年2月的一项决议中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推动法西斯内部反对派的形成……并把这一反对派同反法西斯反对派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要识别反对墨索里尼政府的所有各种流派，以便达到推翻这一政府、把战争的罪魁赶下台去的目的”。

把韦利奥·斯帕诺派往埃及亚历山大港的这一行动是有意义的，此行目的是要设法通过侨居埃及的意大利人当中的共产党员和反法西斯分子的帮助，对途经苏伊士运河的意大利军队进行宣 258

传。尽管共产党宣传的政治内容同具有败北主义性质而不太容易为开往埃塞俄比亚的军队所接受（这些军队中大部分人还充满幻想，未遭受悲惨的战争经历的打击）。但是，当时播下的种子后来在战士们直接遭到战争的痛苦和种种不公平待遇的打击时，仍然在他们的心中发芽成长了。

既然埃塞俄比亚行动以胜利告终，这就使加强对政治上为法西斯主义所控制的群众的工作的必要性变得显而易见了，当时这些群众构成意大利人民的大多数。于是，在党的领导机构中展开了一场讨论，这场讨论是从如下观点开始的：即认为，存在着一个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基础，必须考虑到政权的持久性及其内部多种矛盾的性质。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即感觉到党很弱小，没有必要的力量来展开彻底的斗争活动。隆哥就说过：“我们是侏儒，我们根本不能反对敌对的组织”。必须在国内摆脱孤立，大胆地执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政策。党的领导机构认为，政治危机把意大利反法西斯力量（包括共产党本身）已经削弱到这样的程度，因此，最大的危险就在于：思想上无所作为，没有能力摆脱陈旧的、过时的框框，而当时，却必须不继续成为老看法和老公式的俘虏。

既然承认必须成功地把老的反法西斯反对派同新的法西斯内部反对派联系在一起，那么问题就在于在什么基础上更易于实现这一汇合？是主要进行反对大资本和战争获利者的经济社会斗争呢，还是从体制上通过选举立宪议会来把现政权改变为民主共和国呢？鉴于在当时状况下没有可能推翻政权，那么变革现政权是否可以局部的和仅仅是“改善”法西斯主义呢？

在党的生活任何其他时刻，从来也没有像这次这样坦率的讨论，出现了如此相距甚远的立场。没有一个发言，甚至是最异端的发言，受到谴责，或是在发言之后使人采取组织措施——尽管在那

个时期，这种做法是各国共产党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这一事实就表明了讨论的性质是进行不带偏见的政治探索，而不是在既定派别之间进行政治斗争。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法西斯主义在埃塞俄比亚的胜利和反法西斯力量所显示的软弱无力，都动摇了过去所作的一切分析和所采取的一切政治立场。

陶里亚蒂从遥远的地方参加了讨论，而且他还以自己的看法推动了讨论。早在1935年陶里亚蒂就认为，党的主要任务是在各个老的反法西斯政党的反对立场和“真正不满和愤怒的法西斯分子”的反对立场二者之间找到共同的基础，因此也就是必须通过有助于“把我们的力量同他们的力量联合起来”的口号和语言来向这些人做工作。他认为，“立宪议会的口号既不能动员群众，又不能组织群众，不值得滥用这个口号来组织侨民当中不同的头面人物和小组”。陶里亚蒂表明他的看法，即认为，为了有助于反法西斯反对派和法西斯内部反对派之间的汇合，最好从社会角度进行鼓动，而不是从政治一体制角度进行鼓动。因此必须使各党派的鼓动更具有反对资本主义的性质，而不是反法西斯的性质。

根据这些包含在陶里亚蒂寄给政治局的信件中的方针，人们应当认为，在讨论中占优势的是主张探索对实现反法西斯反对派和法西斯内部反对派结合更为有利的条件的方针，这个方针得到了陶里亚蒂本人的支持，尽管他保持了必要的距离，以便不对这种方针以何种形式变为事实和具体行动一点负起共同责任。

在这场讨论中是蒙塔尼亚纳以最明确的方式提出了“改善法西斯主义”的目标，“因为我们不能做得更多”。他曾断言：由于“反法西斯分子、共产党人本身的活动几乎等于零”，“仅有的活动分子是法西斯分子，因此必须使共产党人变成法西斯领导人的领导”，这时，他就使自己发言得出不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的结论了。但蒙塔尼亚纳并不是孤立的。诺韦拉、迪·维托里奥、丘福利也接近

他的立场，尽管采取的形式不同。在这些领导人的发言中可以看到对陶里亚蒂某些建议的反应。格列科、多扎以及同各个反法西斯政党的领导保持关系的隆哥，都并没有追随蒙塔尼亚纳，他们相反提出必须不要低估反法西斯力量，充当法西斯分子的尾巴。格列科认为，必须保持民主共和国即“资产阶级民主”的目标；隆哥则进一步指出，这一目标可以通过“反法西斯人民革命”来实现。在格列科和隆哥看来，保持并加强反法西斯团结是对法西斯内部反对派进行有效工作的必要条件。实际上，在当时，也就是在1936年夏季，距帝国宣告成立只有几个月，还不能说有什么法西斯内部反对派，而只能谈到一些处于萌芽状态的倾向，这些倾向在以后几年才具体形成。这只是一时恰好得到应验的猜测，是一种工作设想，而并不是什么业已准备就绪的阵地，使已有一定程度的自主和觉悟的各种力量得以汇合起来。

这只是一个处于第一阶段的进程，这个进程要达到汇合还不得不经历漫长的道路；七年之后，只是在全民反对德国压迫者及其走狗萨洛共和国^①的斗争中，汇合才得以完全实现。

这场讨论的结果是1936年8月中央委员会通过了题为《为了拯救意大利，为了意大利人民的和解》的告意大利人民书。62名共产党领导人在上面签了名。他们写上了自己的真实姓名、职业头衔及其荣誉称号（被判刑的年限：全体签名者共被判处137年监禁和30年流放）。第一个签名是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接下去是：鲁杰罗、格列科、埃吉迪奥、杰纳里、朱赛佩·迪·维托里奥、安塞尔莫·马拉比尼、彼特罗·法里尼、埃尼奥·纽迪、乔瓦尼·杰尔马内托、圭多·皮切利（5年流放）、罗马诺·科基、朱赛佩·多扎、马里奥·蒙塔尼亚纳、路易吉·隆哥、朱赛佩·贝尔蒂（5年流放）、阿拉

^① 1943年9月，墨索里尼在北部德占区，由希特勒德国扶植，成立了“萨洛共和国”傀儡政府。——译者

迪诺·比博洛蒂(8年监禁)、多梅尼科·丘福利、朱赛佩·阿莫雷蒂、埃多阿尔多、多诺弗里奥、乔瓦尼·尼科拉、泰雷萨·诺切、阿托斯、利萨(6年监禁)、埃米利奥·塞雷尼(5年监禁)、安布罗焦·多尼尼、切萨雷·马西尼(5年流放)、温琴佐·比安科(3年监禁)、卡洛·雷贾尼(5年监禁)、埃托雷·菲亚门吉(5年监禁)、路易吉·维森廷(3年流放)、阿戈斯蒂诺·诺韦拉(4年监禁)、路易吉·阿马代西、伊万·莱根特、尼科拉·波滕扎、丽塔·蒙塔尼亚纳、弗朗切斯科·利昂纳(6年监禁)、伊利奥·巴龙蒂尼、阿布东·马尔塔利亚蒂(12年监禁)、戴维·马焦尼、阿尔比诺·沃多皮韦茨(7年监禁)、贾科莫·佩莱格里尼(5年监禁)、乔瓦尼·福尔纳里(6年监禁)、弗朗切斯科·斯科蒂(3年监禁)、亚历山德罗·瓦亚(5年监禁)、乔瓦尼·法里纳(7年监禁)、朱赛佩·切雷萨(12年监禁)、阿尔多·兰普雷迪(7年监禁)、安娜·贝索内(4年监禁)、阿尔曼多·费代利(5年监禁)、切莱斯特·内加维莱(7年监禁)、朱利奥·切雷蒂、埃格莱·瓜尔迪(3年流放)、莱奥·瓦利亚尼(2年流放、4年监禁)、克拉伦佐·梅诺蒂(5年流放)、朱赛佩·里莫拉(3年监禁)、乔瓦尼·米凯兰杰利、路易吉·波拉诺、梅尔基奥雷·瓦尼(1年监禁、1年流放)、欧金尼奥·比安科、朱赛佩·皮耶雷蒂、费鲁乔·马里尼、亚历山德罗·德尔马格罗、维托利奥·维达利、维托里奥·弗莱基亚(7年监禁)。没有任何证明能证实这种说法：即陶里亚蒂没有批准这一步骤，这一步骤如此令人吃惊地打破了地下工作准则，暴露了1936年党的领导班子(这是后来几年发生触及这个领导班子的危机之前的情况)。

1936年9月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重申并发展了解和路线。会议通过的决议的标题是：《意大利人民要实现和解和行动起来，争取维护面包、和平和自由》。

8月的呼吁书在颂扬了国家的力量和“美丽”(“意大利能养活

她的全体子女”)之后,谴责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财富却不属于创造财富的人,而是归大银行家、资本家、大地主所有,他们是国家财富的真正的主人”。呼吁书提到了“人民敌人”的名字:沃尔皮、莫塔、阿涅利、多内加尼、皮雷利、莫尔普尔戈、奇尼等,指出:“这些鲨鱼们必须支付”战争的费用和为使意大利人能有工作和改善意大利人民状况所必需的费用。诺言必须兑现:面包、土地、和平。至此,呼吁书提出了引起极大震动的中心论断:“共产党人把1919年法西斯纲领作为自己的纲领,这是一个自由的纲领”。

262 鉴于任何人不了解这个纲领是什么,呼吁书列举了纲领的要点:有保障的最低工资;给农民以土地;全部军火装备工厂收归国有;对资本按累进率征收特别税,以达到剥夺其部分财富的目的;修改全部军事定货合同并没收85%的战争超额利润;在大区一级实行普遍的无记名投票,保证选民的代表性以及妇女既作为选举人又作为被选举人参加政治生活;取消参议院;建立全民性民兵(取代现有军队,民兵服役期应极短,因它应只有纯粹的外交目的);对外政策“应在一切和平事业中发挥意大利民族的作用”。

呼吁书直接面向“老一代法西斯分子”和“青年法西斯分子”,以便在争取实现上述目标的斗争中达到意大利人民的和解。如果实现了意大利人民的团结的话,那么这一斗争就是可能的,所以呼吁书直接面向青年人——给青年人让路!——“给你,法西斯劳动者让路!”“给你,天主教劳动者让路!”

只是在呼吁书的结尾处,在欢呼法国和西班牙人民阵线胜利之后,才简要地用三行话提到西班牙人民已经拿起了武器来维护自由。

9月中央全会通过的报告重申并发展了和解路线,还努力在为实现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必要性和同新老法西斯分子并肩战斗以实现1919年纲领的必要性二者之间建立正确关系。呼吁书确定

的目标是：“建立以人民为主、为人民所保护的民主共和国作为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最彻底形式，作为开展广泛斗争和取得重要人民成果的最适宜的场地”；接着，呼吁书确认：“共产党人准备支持任何民主政治改革，即使是部分的改革，即使这一改革没有超出现政权的框框（如1919年纲领），只要这一改革是意大利人民所需要的，并且在目前形势下符合意大利人民最切身和最紧迫的利益”。

九、对“和解”政策的批评

意大利人民“和解”路线和把反法西斯反对派同法西斯内部反对派结合起来的路线是在整个1936年发展起来的，真目标首先是要要求结束战争，然后在获胜后对现制度进行民主的和反资本主义的改造，让“鲨鱼们”支付战争费用，信守诺言。 263

从文献上看，在当年以及在2月、8月和9月的三次中央全会上，和解路线受到了陶里亚蒂和共产国际的批评。这些新东西（即使是形式上的新东西）、以真实姓名在号召拯救意大利的8月呼吁书上签字的做法、9月会议的庄严召开，所有这些都不能不引起陶里亚蒂和共产国际书记处的注意。9月，通过格列科和内加维莱的报告，这条路线又有了新的独特发展，研究了知识分子和青年的问题。埃基迪奥·杰纳里的动员报告以《意大利在前进》（1936年巴黎“社会文化出版社”），为题发表了并且直到1937年还在继续发行。

丘福利在1936年11月初转达了最初的批评。在这之前，他曾在莫斯科见到了曼努伊尔斯基和陶里亚蒂。但是，批评主要是针对这种情况提出的：即意大利的共产党表现出没有立即理解西班牙共和国抵抗受法西斯、纳粹和整个国际反动派支持的佛朗哥叛乱的重要性。因此，按照共产国际的意见，必须加强在国内反对政

权的斗争，以挫败对西班牙的干涉。这样做不应当妨碍继续开展旨在对法西斯工人和反对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分子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动员，而是应当使这一新的团结的反法西斯特点变得更加明确。“和解”公式不应理解为同法西斯政权的和解，而应理解为意大利人民的和解，其目的是打倒法西斯政权，因而是要打倒它，而不是像讨论过程中有人主张的那样，要改善它或改造它。

干涉西班牙造成了一个新的形势。对于国际反法西斯主义来说，西班牙变为一个活动场地。卡洛、罗赛利立即认识到这一新的斗争场地的重要意义：“今天在西班牙，明天就在意大利”。意大利的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的统一行动从法国人民阵线和占领工厂运动取得的胜利当中得到了新的推动（占领工厂运动取得了诸如每周工作 40 小时和带工资的休假等成果）。意大利反法西斯主义恰恰在极度衰弱和混乱的时刻，从参加保卫西班牙共和国这一活动当中重新获得了存在下去的基础和确立自己作用的可能。

当然，反法西斯力量的联合并不排除呼吁意大利人和解，以便团结起来反对现政权。形势的新进展证实了格列科和隆哥在讨论过程中所主张的立场是正确的。他们极力主张在寻求同法西斯内部反对派结合时也必须保持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但即使批评主要是针对蒙塔尼亚纳的立场而来，这些批评也毕竟涉及到整个中央委员会，因为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人都接受了上述那种立场。实际情况是，所有其他反法西斯政党，无论是国外领导机构，还是国内组织（如意大利社会党米兰中心），都拒绝了和解路线，甚至否认法西斯内部反对派这一概念本身。就连在意大利国内的共产党基层组织也不能不对诸如“黑衫兄弟们”这种提法，或者对向老法西斯分子，亦即1921年和1922年从事过行动队活动的那些可悲人物发出呼吁感到反感。当时存在着党员不服从命令的情况，他们的仇恨与日俱增，这种仇恨不是针对抽象的政权，而是针对作为个人

的法西斯分子。囚禁在狱中或被流放的共产党人的批评性反应更是十分激烈。

正当大家准备日益大胆地执行和解路线时，陶里亚蒂和共产国际的批评使意大利的共产党领导陷于危机。过去，批评曾使党加强了在国内所作出的努力，加紧开展在国内的活动。现在，批评则是敦促党在意大利的组织，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是敦促剩下为数不多的组织，公开进行反对政权的宣传鼓动，这就意味着不考虑力量对比，不考虑党组织的软弱无力以及“镇压反法西斯分子警惕委员会”对党员的监视，这些党员获释往往恰恰是为了使警察局随时可以记下任何可疑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国内又能多干些什么呢？特别在当时，大家都还没有被鼓励去走新的行动道路，而走这样的道路的目的原是要依据一个特殊纲领，把法西斯方面的潜在力量动员起来。共产国际的批评以及在有关迅速开展国内活动的要求同开展国内活动的微小可能性二者之间的矛盾，这些都使党的领导集团更加感到无能为力，而这种感觉也是出于认识到意大利现有的力量对比相差悬殊。 265

西班牙的召唤，通过组成编入西班牙军队的自愿小组采取直接行动的必要性，这些很快就把前往西班牙的问题和加强反法西斯政党团结的问题提到了首位。这种情况固然使党的中心暂时摆脱了不知何去何从的状况，却无助于为党开展国内活动打开新的局面。

十、“和解”政策的未来发展

在以后几年，党的领导机构于1936年为制定政策而作出的努力当中仍然有对法西斯主义内部各种运动和新老矛盾的发展的注意，并且对所有在反对政权方面展开活动的法西斯分子也仍然发

出团结呼吁。尽管瓜达拉哈拉战役^①在激烈进行当中，却仍向法西斯士兵们发出呼吁，这一点就表明了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后来在抵抗运动时期又再次采取了。但是，以后几年的事态发展，人民阵线的危机，纳粹威胁的加强，德国发动战争的迫在眉睫，特别是斯大林在苏联强行采取残酷镇压措施在党内造成的后果，这一切在当时都使意大利的共产党在呼吁和解方面采取的主动性无法取得任何“大胆”进展，并使党的领导班子，随后则使整个党组织在方针上和活动上发生日益严重的危机。

在和解纲领中有许多错误。在实现对政权的改造方面，一个策略性错误就是向1919年法西斯元老派和年轻的法西斯分子发出呼吁，而这些力量对于改变政权方针这一目标作用并不大。从表态来看，当时真正能在短期内实现改变的力量恰恰是被意大利的共产党相反认为应当打倒的真正敌人——右翼保守派、金融资本集团，他们这一批人同王室、军队指挥人员一起曾力求推迟敌对行动的开始；正是这些集团后来在1943年7月导致了政权垮台。另一个错误就是重提1919年法西斯纲领，这是一个已经过了时，而且是被流逝的岁月所埋葬了的纲领，这个纲领最初还为一些蛊惑人心的主张所掩盖，后来则暴露出货真价实的法西斯主义本质的真面目了。然而，面向那些从革命角度来看待法西斯主义，即把法西斯主义看成反资本主义的革命力量的老年和青年法西斯分子，这种做法固然不能有助于实现眼前的目标，却也推动了产生于法西斯主义内部的各反对派转向左边，转向各反法西斯政党，特别是转向那个曾以无数牺牲使自己得以在国内始终存在下来的反法西斯党。事实是：从那时起，从法西斯内部出发、朝着反法西斯方向行动起来的那些新的力量，同共产党的政策走到一起来了，尽管还

^① 瓜达拉哈拉战役指1937年3月西班牙内战中决定马德里保卫战的一场重大战役。——译者

不能轻而易举地同共产党组织暗地接触。因此，1919年的法西斯纲领有助于指明一个方向，筑起一座桥梁，以便能够把法西斯主义内部的反对派和种种形式的持不同政见分子同反法西斯党派联系起来。从这一意义上说，“和解”政策究竟有多大成效，这只有在以后年月里，特别是在二次大战和抵抗运动时期才能看得出来，那时从法西斯主义内部出现的新的反对派为老的反法西斯运动，首先是为共产党带来了新的活力。

和解政策长时间影响到党的方针和行动。这一政策使党认识到国内力量对比的真实情况，也就是法西斯运动和天主教运动所占的地位。多少次，而且是在埃塞俄比亚战争时期，那种披着宣传色彩外衣的鼓动工作曾掩盖了国内现存的严酷现实。承认党在组织上的弱点，承认在秘密群众组织中实际上没有共产党员，这些都是努力打入法西斯组织的前提，因为这些法西斯组织当时被看成是反对政权的唯一斗争场地。

最后，党采用了面向全国讲话的做法。拯救意大利的口号高于一切，而且民主目标本身的提出也是为了取得切实维护意大利利益的手段。当时党的语言也是在努力摆脱老的、过时的宣传框框，从而有了一种新意，一种为劳动者所能理解的明确性。党重新获得了意大利优秀爱国者所积累的思想文化财富。加里波第重新被发现是意大利人民的民主斗争最美好传统的代表人物。因此，《工人国家》在1936年第10期上刊登了雅科波（朱赛佩·贝尔蒂）的一篇文章《论意大利民族革命的加里波第》，这就不是偶然的了。那种把加里波第和统一运动时期的爱国者看成是法西斯主义先驱的倾向被抛弃了，而这种倾向在许多文章乃至党校教材中也曾明确地出现过。

1936年的呼吁书突出了意大利的共产党的民族民主特征：“我们共产党人捍卫一切人民阶层的利益，捍卫全民族的利益，因为国

家就是人民，就是工作，就是意大利人民的智慧，因为意大利国家就是我国人民所经受的一切困难和世世代代为争取幸福、和平、自由而进行的斗争的总和；因为共产党在为人民的自由，为人民的物质和文化进步而斗争，反对一小撮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寄生虫的同时，也就是继承了全国统一运动时期的革命传统，继承了加里波第、马梅利、皮萨卡内、卡伊罗利兄弟、班迪耶拉兄弟^①以及成千上万不仅为了意大利民族独立，而且也是为了使人民获得物质福利和政治自由而奋斗的先烈和英雄们的事业”。

最后，把三色旗同红旗一起高举起来，作为为自身解放而斗争的意大利人民的旗帜（参见1936年第10期《工人国家》中阿·阿斯佩塔蒂的文章：《红旗和三色旗》）。即使是在今天，只要一想到要把三色旗从统治集团手中夺过来，使它变成沿着民主和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人民的旗帜曾有过多少困难，就可以估量出上述说法的重要性了。后来，在抵抗运动中三色旗就成为团结在争取祖国解放的武装斗争中的爱国者的旗帜。

^① 哥弗雷多·马梅利（1827—1849），意大利统一运动时期的英烈、诗人，其诗作《意大利兄弟们》（1847）经谱曲后百余年来一直作为意大利国歌，称《马梅利之歌》；卡洛·皮萨卡内（1818—1857），那不勒斯爱国者，为意大利统一作出卓越贡献；卡伊罗利兄弟（兄为贝内代托，1825—1889；弟为恩里科，1840—1867），意大利统一时期功勋卓著的爱国者；班迪耶拉兄弟（兄为阿蒂利奥，弟为埃米利奥，分别生卒于1817—1844，1819—1844），为意大利统一和独立同时献身的英雄。——译者

第十一章 新反对派

268

一、经济困难

有种种原因使法西斯制度在宣布帝国时所得到的广泛支持的基础很快受到了限制。英国把它的霍姆舰队撤出地中海和国际联盟，并取消制裁，这两件事等于承认了既成事实，从而为宣扬胜利增添了新的气力，但却无助于阻止人们的觉醒和对埃塞俄比亚行动的结局作出批判性的思考。经济原因、政治失望、人民阵线在法国和西班牙的胜利所产生的影响、对干涉西班牙的忧虑和谴责，所有这些都使人很快感到困惑和提出批评。与纳粹德国接近的政策（这个政策很快转化为罗马——柏林轴心的形成），在法西斯党内部也引起了抵制和反对。

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很快就开始产生影响。这一计划的费用是巨大的。据统计，需要 210 亿里拉现金。10 月 5 日，继美元、英镑、法国法郎以及其他欧洲货币贬值之后，意大利里拉也贬值 40%。如以 1929 年的生活费用指数为 100，这个指数从 1934 年的 77.2 增加到 1936 年的 84.2，到 1937 年则增加到 92.2。实际工资指数由 1934 年的 106.1 下降到 1936 年 92.7。工业生产未能像支持帝国的集团所希望的那样增长。实际上，以 1929 年增长指数为 100，由 1934 年的 80 增长到 1936 年的 86.6。工人就业指数只增长很少，从 1934 年的 82 增加到 1936 年的 93。 269

尽管有服兵役和 50 万名士兵和劳动者被派往埃塞俄比亚，失

业人数却仅从96.3万下降到70万。当然，冶金工业生产指数从1933年的72增长到1936年的106，机器制造业则从72增加到120。但是，如果说股份公司的净利润从1935年的5.24%增至1936年的7.28%的话，那几年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却只每年勉强上升半个点，按今天的说法则实际上是零增长。

此外，埃塞俄比亚并不像战争爆发以前和战争期间所鼓吹的那样能提供就业机会。如果从1936—1938年有60万名要求去埃塞俄比亚工作的人，那么则仅有19万人被接受。到1936年底，有14.5万名意大利人在埃塞俄比亚就业：他们在公路建设、基本设施和行政部门工作。到了1937年下降到75000名，1938年则为50000名。这一做法曾被宣扬为其主要目的是向意大利人提供“阳光下的一席之地”，提供一块立足之地实际上则只不过是向大约10万名意大利人提供了不固定的工作。创造就业机会与为此所耗的费用（210亿里拉）之间的关系看来失去任何比例。开发占领的土地需要大量的投资，而意大利经济对此又缺乏财力。1936年3月，当战争走向胜利结局时，墨索里尼曾提出“经济调节”计划，这个计划是一个战争经济计划，它加强了所有行会式和自给自足性质的约束，遏制了特别是中小工业发展的可能性，这些企业在分配原材料和发放用于支付一直严加控制的进口所必需的外汇方面总是承受牺牲。

此外，生活费用的增长和实际工资的下降，使法西斯工会更加活跃起来，它们要求把工资至少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工会大部分活动证实了共产党1936年所作的分析，也证实了共产党为号召和解和拯救意大利而发出的呼吁中所作的有关法西斯工会在法西斯政权范围内的作用的说明。

二、政治失望

除经济方面的原因（这些原因在社会所有阶层，在工业界人士，受到生活费用上涨打击的中等阶层和工人中间引起了困惑和批评）之外，还有政治方面的原因。

青年们曾相信过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的文明使命，但严酷的战争经历打破了他们的幻想。意大利的损失并不严重，伤亡不过几千人。但是，胜利是通过使用各种惨无人道的手段而获得的。埃塞俄比亚人被法西斯侵略者说成是渴望“解放”的奴隶，相反，他们却是怀着伟大的民族尊严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开展了英勇抵抗斗争的。早在亚的斯亚贝巴暗杀格拉齐亚尼之前（1937年2月19日），侵略者就对人民实行了镇压，而镇压手段就是以后纳粹分子在意大利所使用的。他们所遵循的准则是：认为整个集体要对集体的各个成员在同占领者进行斗争当中所采取的行动负责。

暗杀格拉齐亚尼事件发生后，墨索里尼亲自打电报责成他系统地实行恐怖灭绝政策和贯彻十倍报复性惩治法，这个比例正是以后德国人在实行阿尔德亚蒂纳坑大屠杀^①时所采用的。

法西斯在战争中残酷地使用瓦斯，在和平时搞恐怖活动，这在许多士兵的心灵上引起了痛苦的反响。法西斯主义为镇压埃塞俄比亚抵抗运动而使用的惨绝人寰的恐怖主义使士兵中间产生了危机，如今很难弄清这种危机的深度和广度。但是，许多见证（书信、日记、回忆录）都说明，这场思想政治危机的开始可以追溯到上述惨痛经历，正是这场思想政治危机后来促使许多士兵去寻求反法西斯斗争道路。

^① 阿尔德亚蒂纳坑系在罗马一高地挖出的地道；1944年3月24日，希特勒德国占领军在該地实行报复性屠杀，有335名意大利人同时遇害。——译者

造成士兵思想混乱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进行战争，秩序陷于一片混乱；由于通讯设备落后，军需供应缺乏，特别是那些享有特权的法西斯党魁厚颜无耻地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他们拥有优厚的物质条件，争风吃醋，勾心斗角，还追逐高官厚禄。

正是由于组织混乱和通讯困难，士兵不得不忍受许多痛苦。271 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愿望：返回意大利后，一定要进行争取变革政权和发展法西斯革命的斗争，以求使党摆脱官僚主义的积垢和经济特权阶层的束缚。人们普遍期望政权即将实现自由化。许多事情都证明，这种期望是存在的，这也是由于某些法西斯党魁采取的立场所致，他们当中有博塔伊和齐亚诺，后者是当时法西斯政界的一颗新星，并且即将通过任命为外交部长而成为墨索里尼的正式接班人。

罗马一些人士极其热烈地期待自由化，以此作为对于像克罗切、博诺米、奥兰多等自由党老反法西斯人士对政权所表示的声援以及对于危机时期人民所表现出的纪律性的回答，这一点想必是共产党领导机构所看到的。这就说明，“改善”政权的论点何以能在党的中心所进行的讨论中得以通过。自由化进程若能开始，共产党所采取的做法将不会是要以过于激进的要求来遏制这个进程，而是要推动这个进程发展，看来那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自由化进程并没有开始。伴随干涉西班牙而来的是加强警察镇压和法西斯冲锋队暴力卷土重来。

三、工厂中的再兴

经济困难和政治失望为在法西斯内部形成新的反对派创造了条件。1936年8月，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当时还处于萌芽阶段的法西斯反对派发出意大利人和解的呼吁。正如前几次一样，共产

党人以敏锐的分析抓住了进程的开端,但是,由于直觉所致,并在重新产生的希望推动下,他们把这一进程的发展提前了,并且过急地加快进程速度。

在工人阶级当中,有一些近几年,特别是在危机之后才进入工厂的青年,他们没有那种妨碍反法西斯的老工人按照共产党指示参加法西斯工会的活动的阻力(抱有成见,怀有怨恨、恐惧之感), 272因而他们认为,在工会内部,在好歹以某种方式存在的唯一阶级组织内部,因生活费用上涨和剥削强度上升而提出经济权利要求,那是理所当然的。在工厂选举可信赖的人和选举地方领导人,这种做法虽然几乎总是有名无实,但毕竟创造了一些新条件,而那些不为警察所认识、也不必太担心被认出是反法西斯分子的青年工人就力求利用这种新条件。这样,工会工作日益活跃的阶段开始了。在工厂里,重新组成了工人小组,他们越来越懂得经济要求与争取自由的政治要求二者之间的关系。

看到青年人准备在法西斯组织范围内进行活动,那些被迫长期处于谨慎孤立状态的老的工人共产党员,开始隐约看到新的行动可能性。此外,党也不断要求他们去接近青年,要求他们不要先验地不信任那些自称为或自以为是法西斯分子的人。与此同时,青年也日益经常地去接近这些老工人党员,因为他们佩服这些老工人党员的高度职业素质和坚定不移的政治立场。

这样,在劳动场所,老年人和青年人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关系。工人运动旧有的政治价值和道德价值,以及为了解工人阶级失败和法西斯主义上台的原因所必需的种种信息,都以口头形式传给新一代工人队伍的自愿代表。高尔基的《母亲》,杰克·伦敦的《铁蹄》等一些书籍又重新在人们手中传阅。萨尔瓦托雷·卡恰波蒂在《一位工人的回忆录》中写到他如何在那不勒斯一家五金机械工厂中被补选入共产党一个支部中去的情况,以及他受党的委

托在法西斯工会内部如何开展工作的情况。当时，有些工人从活动中消失了（据悉，他们是因政治原因而被捕了），或者又有些工人从监狱或流放地回来了，这一切都说明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的存在，看来当时对地下组织的实际活动限度了解得越少，这个地下组织的力量也就越大。

警察局材料、回忆录、通信都提供了许多证据，证明了从
273 1936—1939年反法西斯老工人同在法西斯组织中成长起来并在工会中积极活动的青年工人在工厂里联合起来的事实。这种“联合”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促成的，并在1942—1943年日益活跃起来，直至发生1943年3月的罢工。就连始终忠于自己理想的社会党老党员也同青年工人重新建立了联系。但是，由于社会党中央不推动他们去接近法西斯工会，也由于社会党对他们灌输的教育当中有等待主义和宿命论观点（这种教育同共产党的顽强自愿的精神是迥然不同的），这就使他们的行动始终是有限的。

在1936年6月法国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捷报和西班牙共和国坚定抵抗佛朗哥叛乱及法西斯干涉的消息鼓舞下，工人斗争开始振兴了，党的中心及时地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党的地下组织却未能利用当时工人斗争的振兴来壮大自己。当党试图与工厂取得新的联系时，最终选择的仍旧是接近老同志的道路。但是这些老同志早已为警察局所熟悉，成为监视对象。因此，党的每一个与老党员取得联系的尝试都在被认为是适宜的时刻被发现和葬送。本来是必须越过受警察监视的党员而直接与新一代领导人取得联系的。由于缺乏经验和抱有一些陈旧偏见，寻求新的工作方法受到了阻碍，党的中心也无法从工厂中组成的新工人反对派核心当中汲取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力量。

四、利托里奥分子文化协会^①

在参加法西斯大学生小组的青年学生中间，因实行“行会革命”的落空和埃塞俄比亚战争令人痛心与失望的经历而引起的不满情绪，再次有可能表现出来。从1934年起，独立于意大利法西斯青年组织而与国家法西斯党书记处有直接联系的法西斯大学生小组中央书记处开始组织利托里奥分子文化协会举办文化比赛和讨论会，参加者都是经由党的书记处任命的各学科委员会在各大学审查和推荐的优良学生。利托里奥分子文化协会规定比赛是以书面形式就所指定的题目进行的，讨论会则是以口头形式就类似问题进行的。讨论会上，争论激烈，各种意见相持不下，有时竟吵得不可开交。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参加者是用这种办法选择出来的，各委员会做这项工作又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它们所作出的选择乃至它们本身的组成也时常受到公开的批评，因此，那些一味喋喋不休地不加批评地颂扬政权的最狂热最顺从的人并得不到奖励。而正如被选拔和获奖励的名单所证明的，更经常得到肯定的却相反是那些最有才华、本着更为严肃的态度进行批判性研究的青年。

利托里奥分子文化协会使各大学之间得以交流思想。它们提倡来自边远省份的青年与来自大的文化生活中的青年进行个人交往。在主张必须为争取法西斯行会革命彻底发展而斗争的各个小组之间，借这种机会开展有益的联系，从而得以从法西斯左翼立场转到真正的持不同政见立场，这种持不同政见者提出更为激进

^① “利托里奥分子文化协会”系法西斯党的一个青年文化外围组织。利托里奥分子是法西斯时代青年文体活动分子。原文“利托里奥”(Littorio)源自古罗马时期荷斧头与木棒的官吏，而法西斯党徽记即为斧头与木棒，故“利托里奥”同“法西斯”成为同义词；墨索里尼统治期间，意大利大学生法西斯组织曾沿用此称。——译者

的要变革政权、革新方法与作风的目标。法西斯当局组织利托里奥分子的目的是要给青年大学生的激动情绪找一条出路，要选拔优秀分子，把他们吸引到政权活动中来，给他们打开易于发迹的前景。但是这种企图破灭了。1934年，利托里奥分子文化协会在佛罗伦萨成立，随后又先后于1935年、1936年、1937年、1938年、1939年、1940年在罗马、威尼斯、那不勒斯、巴勒莫、的里雅斯特、波洛尼亚成立。然而，矛盾变得一年比一年尖锐，法西斯大学生小组的领导机构曾组织力量企图阻止不同政见扩大影响，但却引起许多人的激烈反抗。

反法西斯青年参加利托里奥分子文化协会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他们克服了形式上的一切保留，理解了有必要在法西斯青年陷于怀疑和忧虑的时刻使自己和同学们站在一起。1935年乔瓦尼·阿门多拉的儿子安东尼奥·阿门多拉参加利托里奥分子文化协会就曾给人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参加利托里奥分子文化协会曾遭到反法西斯老战士的猛烈批评。就连他的被关在监狱中的兄弟乔治起初也批评这一举动。安东尼奥·阿门多拉参加利托里奥分子文化协会（他未加入法西斯大学生小组），不能不得到法西斯当局的赞许。安东尼奥·阿门多拉得到了新闻头等奖，因为他为20世纪初佛罗伦萨一些杂志撰稿。当局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即要利用一位自由党人的儿子参加利托里奥分子文化协会这件事作为在埃塞俄比亚战争准备期间对法西斯政权的一个认可行动，而这位自由党人同贾科莫·马泰奥蒂和明佐尼神甫一起都被反法西斯运动的宣传称作是反法西斯殉道者的典范。安东尼奥·阿门多拉拒绝任何批评，强调反法西斯分子的责任是到法西斯青年聚会和讨论的一切地方去。党的领导机构得知安东尼奥·阿门多拉参加利托里奥分子文化协会的理由后，消除了一切困惑不解，并鼓励青年共产党员和反法西斯战士参加利托里奥分子文化协

会。这一事件表明，1935年共产党中心是如何朝着能使反法西斯反对派与法西斯反对派相“结合”的方向行动的。

反法西斯青年参加利托里奥分子文化协会和法西斯大学生小组（如帕多瓦的欧金尼奥·库列尔和罗马的安东尼奥·阿门多拉），使法西斯持不同政见者得以在尖锐批评的推动下转向反法西斯主义，因为他们具有了明确的方向和美好的行动前景。

用鲁杰罗·赞格兰迪——法西斯内部不同政见的推动者和首创者——的一句话来说，从法西斯主义（尽管是左翼的）到反法西斯主义是一次“长途跋涉”，这一跋涉是人们通过种种不同途径完成的。有的人是在反法西斯战士的帮助下快速地走完了这个旅程，迅速地获得了明确的反法西斯觉悟和斗争意志，从而能更有效地在他的朋友中间开展澄清和争取的工作。有的人则相反，在这条道路上起步缓慢，这有时是因为缺少有力的推动，希望能在法西斯党内部实行革新。从法西斯左翼到持不同政见的个人，到持不同政见的组织，到反抗直至转为坚决反对法西斯主义，这些不同阶级对于实行这种来之不易的解放的主角们来说，大致是一环扣一环的。可以说，每一个青年都在自身觉悟的成熟和偶然因素出现的推动下实现这一“长途跋涉”。有时，道路是崎岖的，有重返法西斯主义乃至在道德上和政治上让步的现象。应当从整个发展中去看待这些过程，而不应当要求这些青年从一开始就像久经考验的战士那样具有敏锐的政治头脑和坚强的意志。许多青年把脱离法西斯主义变成否定政治，逃避到文学和科学研究中去。9月8日^①是决定站在哪一边的日子，每个人都要作出自己最终的选择。那些在战争中阵亡的人就没有必要作出这一选择了。在阵亡者中间值得提及的是，某些青年是为了避免作出上述选择而自愿上前线的，并在战争最初几周就牺牲了，例如贝尔托·里奇就是；同志们

^① 9月8日系指1943年9月8日全国起义。——译者

一直记得他那绝望的批判激情和对革新的热切盼望。

如果浏览一下由利托里奥分子文化协会选拔的名单，便可发现，在一些法西斯分子的名字（如，意大利社会运动众议员乔治·阿尔米兰特和尼诺·特里波迪）和其他一些阵亡者的名字（如站在德国人一边的萨洛共和国分子）旁边还有一些走上光荣和抵抗运动的道路的人的名字，而且这些人还为数不少。

这些人中有的后来成了共产党员，他们是：马里奥·阿利卡塔、安东尼奥·阿门多拉、佛朗科·布塞托、伊塔洛·布塞托、乔治·科帕、拉法埃莱·德格拉达、雷纳托·加尔多·加尔代里西、阿方索·加托、佛朗哥·卡拉曼德雷、维琴佐·卡瓦拉里、费利切·基兰蒂、雷纳托·古图索、彼特罗·英格拉奥、卢乔·隆巴尔多·拉迪切、路易吉·皮拉斯图、阿尔曼多·比齐纳托、瓦斯科·普拉托利尼、阿德里亚诺·塞罗尼、吉罗拉莫·索朱、安托内洛·特龙巴多里、艾马努埃莱·图卡里、托诺·赞卡纳罗。在解放战争中阵亡的有那不勒斯大学的雷纳托·加尔多·加尔代里西。贾伊梅·平托尔是最早阵亡中的一个，他来不及使经过深思熟虑而转向意大利共产党的这一倾向获得积极的结局。其他人最后都成了游击队战士。

值得提及的还有其他参加社会党和行动党的青年，像米凯兰杰洛·安东尼奥尼、乔治·巴萨尼、罗伯托·巴塔利亚、卡洛·博、马里奥·卡尔多纳、温迪切·卡瓦莱拉、米凯莱·奇法雷利、阿基莱·科罗纳、朱赛佩·格拉纳塔、卡洛·穆谢塔。还有许许多多反法西斯积极分子的名字，都是参加过大学选拔竞赛的人提供的。

277 当人们研究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纳粹主义之间存在的区别时，也许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内部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领导格局，这个格局通过自身独特的道路发展为反法西斯主义，从而在追求民主和密切联系法西斯当权年代出现的新

现实方面作出了新的贡献。

在德国则恰恰相反，步调一致、纪律严格的青年紧跟希特勒，直至柏林被攻克。在德国青年当中，除了少数几个孤立的例子外，没有出现任何准备改变或推翻纳粹政权的政治运动，即使是在纳粹失败已成定局的最后几年也是如此。纳粹主义的失败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发生的，以致造成了文化上和政治上的真空，这就使东部和西部的解放力量和占领军力量得以起决定性的作用。

在意大利，反法西斯反对派与法西斯内部新反对派的结合使1936年共产党制定的“和解”政策成为可能。1943年的“45天”期间和9月8日之后，当意大利共产党公开出现时，它已不仅仅是一个来自“外部”、来自国外移民、来自监狱或来自最困难的地下状态的党了，它也是以参加过地下斗争的老党员为宝贵核心善于吸收在工会与大学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青年的党，这些青年善于将民族团结政策贯彻到抵抗运动中去。所以荣获抵抗运动金质奖章的贾伊梅·平托尔后来以他的牺牲成为法西斯主义内部积极的新反对派的最杰出的代表。

五、文化革新

那几年，青年大学生的满腔热情不仅来自最新最直接的政治经验，而且还来自1926—1936年这10年的意大利文化变革。

多数知识分子曾拥护法西斯主义掌权。由于缺乏一种社会主义的文化，也由于在意大利未能发展一种能解释和吸收意大利文化最宝贵的世俗民主传统（尽管这些传统是孤立的，包括从维科到德桑蒂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即使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在这方面有所论述，这就造成一个真空，使工人运动陷于孤立。在这种文化真空的条件下，唯心主义和非理性思想流派向素朴唯物论和

实证主义发起了进攻；持这些流派的立场的有克罗切和20世纪初佛罗伦萨一些杂志，他们的立场虽有区别，但也有一致，正因如此，这一进攻当时得以毫无困难地朝客观上是反民主和反人民的方向进行。

在战后危机时期，由于各种原因，大多数意大利知识分子最终还是支持法西斯主义上台。老的人文主义徒有其表的立场、达依丘的宣传鼓动、未来主义、收复领土主义的残余、民族主义以及教权温和派，所有这些都汇集成各种民族集团的一个文化支柱，赤裸裸地表示要恢复受“赤色分子”威胁的秩序。这种既非人民性又非民族性的旧文化传统所起的作用，使各种倾向都汇集到一个方向去了，即要拥护和支持法西斯主义。尽管反对“主张放弃参战的人”的民族主义宣传运动来势凶猛，但是，主张参战的民主派分子与主张参战的民族主义派分子之间一向还是有区别的，这种旧有的区别最终使他们还是服从于一种需要，即要阻止令人生畏的“赤色分子”取得胜利，或是阻止懦弱无能、管理不善的自由民主党政府继续存在下去。萨尔韦米尼在1922年对法西斯危险所采取的消极态度就是一个征兆。只有在马泰奥蒂危机后才出现初步差异，当时萨尔韦米尼和卡洛·罗塞利一起发起出版第一份地下刊物《不让步》，克罗切的宣言则得到人数不多但作用不小的支持。戈贝蒂的《自由党革命》和随后的《巴雷蒂》杂志聚集了一些后来在意大利文化革新中占有主要地位的新“力量”。但就当时来说，这些力量还是孤掌难鸣。

墨索里尼对获得意大利知识分子对政权的支持感到满意。他也没有更高的要求。除了唱高调以外，他并不认真地想要推动发展“法西斯文化”，使之成为政权的正式文化。他那浅薄和折衷主义的文化修养以及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使他不致让法西斯政权纠缠到哲学派别和艺术流派之争中去。于是，他听任这种斗争公开

进行。行政干涉、约束、限制和压力并不是没有，但都是断断续续、时有时无的，并且与某些法西斯党魁的奢望和野心连在一起。然而，这些并不能阻止各派斗争掌握有效的工具（大学讲坛、文化机构、出版社、竞赛、杂志、展览）。

政权没有阻止某些集团力图确定法西斯文化、艺术和文学的存在，但是它后来又让各种竞争者对法西斯主义的定性问题进行²⁷⁹争论。政权在政治上和宣传上的需要，要求在一些重大集会上，如法西斯革命展览，有数量最大、质量最高的人们参加，这就阻止以所谓法西斯文化的名义进行严格挑选。1926年创立，只是在1929年才落成的科学院，在人员组成上，有接受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文化界人士，但他们并不是法西斯文化的代表，不是信奉统一的、有别于旧民族主义和唯心主义文化的学说的代表。意大利科学院的组成分为四个方面：道德历史科学、物理数学和自然科学、文学、艺术，1939年又吸收了已解散的林琴学院，从组成人员名单上可以明显看出墨索里尼的人选标准。1929年3月18日的法令任命了下列名单：安东尼奥·贝尔特拉梅利、彼特罗·邦凡特、菲利波·博塔齐、阿尔曼多·布拉西尼、彼特罗·卡诺尼卡、弗朗切斯科·科波拉、焦托·达伊内利、萨尔瓦托雷·迪贾科莫、恩里科·费尔米、卡洛·福尔米基、翁贝托·焦尔达诺、亚历山德罗·卢齐奥、安东尼奥·曼奇尼、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彼特罗·马斯卡尼、弗朗切斯科·奥雷斯塔诺，阿尔弗雷多·潘齐尼、尼科拉·帕拉瓦诺、马尔切洛·皮亚琴蒂尼、路易吉·皮兰代洛、彼特罗·罗穆阿尔多·皮罗塔、埃托雷·罗马尼奥利、朱利奥·阿里斯蒂德·萨尔托里奥、弗朗切斯科·塞韦里、博纳尔多·斯特林格尔、托马索·蒂托尼、阿尔弗雷多·特龙贝蒂、贾恩卡洛·瓦劳里、焦阿基诺·沃尔佩、阿道夫·威尔特；9月，第二个法令任命：迪奥尼西奥·安齐洛蒂、切萨雷·巴扎尼、丹特·德布拉西、安东尼奥·迪奥尼西、

阿尔图罗·法里内利、卡米洛·圭迪、安焦洛·西尔维沃·诺瓦罗、罗伯托·帕里贝尼、埃托雷·铁托、朱塞佩·图奇(接替已故的特龙贝蒂的职务);从1930—1932年任命的名单有:鲁道夫·贝尼尼、阿尔贝托·德斯特法尼、帕斯夸莱·雅纳科内、卡洛·阿方索·纳利诺、萨尔瓦托雷·里科博诺、阿布鲁齐公爵、路易吉·迪萨沃亚-奥斯塔、加埃塔诺·阿尔图罗·克罗科、弗朗切斯科·焦尔达尼、古列尔莫·马尔科尼、朱塞佩·皮亚内塞、朱利奥·贝尔托尼、马西莫·邦滕佩利、乌戈·奥耶蒂、切萨雷·帕斯卡雷拉、保罗·埃米利奥·帕沃利尼、洛伦佐·佩罗西、奥托里诺·雷斯皮基、罗马诺·罗马内利、阿蒂利奥·塞尔瓦、多梅尼科·特伦塔科斯泰。以后又任命了里卡尔多·巴凯利、埃米利奥·切基、加布里埃莱·达依丘、乔瓦尼·詹蒂莱、阿达·内格里、乔瓦尼·帕皮尼、阿尔登戈·索菲奇。

在向政权大献殷勤，对“领袖”顶礼膜拜之后(这是最重要的!)，意大利知识分子才能在不受过多干扰的条件下，进行他们的研究。这样，文学、绘画或音乐才成为符合自主需要的研究领域，从而有助于振兴意大利文化，并使它的最进步的种种流派能摆脱华而不实的旧人文主义羁绊。最初，振兴意大利文化是闭关自守式的，只求从形式上进行革新，其结果是语言晦涩和注重形式，但这种做法却使人能更为严厉地、不加修饰地反映现实，从而使人不致由对政权的政治支持变为接受其宣传内容。但是，由于受到一些更进步的团体的影响(例如《巴雷蒂》、《文化》以及后来的《阳光》等杂志)，在形式主义形成的保护层中，很快就开始注入一些新生活的氣息，使人产生联系现实的需要，人们要求了解意大利社会，了解意大利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即使仍然处在法西斯统治之下也罢。这就是走向现实主义的开端，而正是这个现实主义后来成为解放运动的伟大文化纪元的灵魂。但是，开头几步是在30年代的

哲学争论与文学争论当中迈出的。

1925年詹蒂莱宣言和克罗切宣言之间发生的对抗不应使人产生误解。直到30年代初,詹蒂莱一直是那个在政治上拥护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文化界的最高人物。詹蒂莱是颂扬国家政权的,他认为,人民的全部活动都应当纳入国家政权范畴;他对国家的这种颂扬乃至他那狂热的民族主义,都使他成为这样一个人,他最能把建立一种政权的努力反映到哲学方面来,在这种政权下国家应该是一切,而法西斯党本身也应纳入国家范畴。事实上,一旦承认国家权威是民族生活的最高要求,那么它也可以是宽容的;只要这种宽容对国家利益有好处。特雷卡尼的《意大利百科全书》在詹蒂莱领导下曾征集到意大利文化界最重要的人士的合作,而他们中间许多人都曾在克罗切的宣言上签过名。法西斯全国文化学院在詹蒂莱领导期间曾一直遵循高度折衷主义的路线,鼓励意大利文化界各个领域的权威人士进行合作,并为一些以反法西斯主义而知名,但也因此而被警察局记录在案的知识分子提供工作和保护。恰恰相反,法西斯全国文化学院并没有真正努力创立法西斯文化。只是到了1937年,当詹蒂莱放弃院长职务而由彼特罗·德佛兰奇西接替时,这个学院才正式改名为“全国法西斯文化学院”。然而,改变领导和名称无助于法西斯文化的发展,因为缺乏思想前提。 281

1930年在出版克罗切的有关意大利和欧洲的《历史》这本书之后,克罗切的领导地位也逐步地开始发生危机。他崇尚自由并建议青年埋首学习,以便专制时期一旦结束,就能适应新的工作;如果说这一点能使一度曾是反法西斯主义者,却不愿从事地下斗争而仅想忠于自己信仰的人在心灵上得到某种平静的话,但却无法为那些刚刚走上生活,并寻求一条道路以便在为争取变革法西斯政权或促使这一政权倒台而进行彻底斗争方面向前迈进的青年人提供有效答案。

与此同时，詹蒂莱在法西斯阵营内的领导地位也陷入了危机。各种倾向的斗争结果使他失去了当时他所施行的控制，尽管这种控制是宽松而又宽容的。一方面，存在着狂热支持法西斯学说的人，他们甚至发展到组织起法西斯神秘主义问题讨论会，但却从来也没有能够使给“意大利文明”这一说法下定义这一奢望具有科学的严肃性。另一方面，存在着这样一些倾向：即主张先在行会革命的意义上采取行动，然后再整顿和革新法西斯政权或使法西斯政权自由化。

老的唯心主义的领导地位发生了危机（这种老的唯心主义有以詹蒂莱和克罗切为代表的两种相互对立的主张），这一危机有利于新康德主义和存在主义的思潮在意大利的传播。但很快在政治上对共产主义产生的不断增长的兴趣就促使人们去寻找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著作了。他们著作的外文版传入意大利并不是特别困难，甚至在大学的图书馆里都能找到。先后由博塔伊和克罗切出版的拉布里奥拉的《历史唯物主义论文集》，曾为10年后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铺平了道路，10年后的那个时期，解放使人们得以了解到葛兰西的著作，并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籍得以广为传播（其中也有在斯大林领导下编写的《布尔什维克党史》）。

282 由于打破了唯心主义的领导地位，意大利文学的复兴就得到了促进。人们又回过头来研究韦尔加和现实主义了，这就为像托齐、帕拉泽斯基、加达等这样一批作家的的工作开辟了道路。在那些年代里，人们又重新发现了皮兰代洛青年时期的长篇和短篇小说；青年时期的皮兰代洛曾对南方各省小资产阶级在文化上和精神上的贫乏与悲剧及其极端个人主义进行过苦心孤诣的研究。人们对像伊塔洛·斯维沃这样一位与欧洲最新经验相联系的作家的认识也是迟缓的。《文学国家主义论》（以阿尔登戈·索菲奇和米诺·

马卡里为代表)与《文学世界主义论》(以马西莫·邦滕佩利为代表^①)之间的争论曾使文坛活跃起来。不久,莫拉维亚以其《冷漠的人们》(1929年)开拓了一条道路,随后卡洛·贝尔纳里、罗马诺·比伦基、切萨雷·帕韦塞、瓦斯科·普拉托利尼、马里奥·索尔达蒂、埃利奥·维托里尼也走上这条道路,尽管他们的要求与结果各不相同。翁贝托·萨巴、欧金尼奥·蒙塔莱、萨尔瓦托雷·夸西莫多、阿方索·加托等这样一些诗人的诗作开始流传起来了,同时人们也以新的注意力阅读卡尔达雷利和翁加雷蒂的诗句,这两位诗人虽然拥护法西斯政权,但也表达了人们在寻求同社会建立新的兄弟般团结关系方面的不安心情。

像《阳光》(阿尔贝托·卡罗奇和亚历山德罗·邦桑蒂主编)这样一些杂志曾有效地推动了开放行动的发展。而且奥耶蒂主编的折衷主义杂志(《天马》和《畜牧神》)和安杰洛·弗拉基亚主编的《文学意大利》也在那些年代使一些文人和评论家各不相同的,有时是对立的经验汇合在一起;这些文人和评论家有来自反法西斯主义的,如贾科莫·德贝内代蒂和纳塔利诺·萨佩尼奥;也有些人则来自法西斯主义或更确切地说来自民族主义;这样,他们就都汇合在一个过渡性的思想领域了。在某些立场中,有许多模棱两可的东西,而在所有立场中都有很大一部分是掩饰真相,亦即那种所谓“尼科德莫主义”^②;这种主张是由德里奥·坎蒂莫里在研究意大利异教徒问题时重新发现的,这是一种“以说理来掩饰真相”的做法,其目的是要掩盖自己的信仰,以等待能自由宣布这种

① 《文学国家主义论》和《文学世界主义论》都是意大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两股文化思潮:前者主张文学不打破民族地区界限,反对世界主义化,后者则相反,主张文学打破民族地区界限,参与欧洲文化流派。——译者

② 尼科德莫在《圣经》里是一位圣贤,曾同另一位圣贤将被钉死十字架上的耶稣取下埋葬。因他先是追随残害耶稣的法利赛人,而后又归依耶稣,成为神学的忠实信徒,“尼科德莫主义”即由此而来。——译者

信仰的时机。这样就可以说明何以某些人低三下四地对墨索里尼表示敬意,颂扬他的为人,甚至赞美他的演说,而写这类文章的人又都是一些曾同戈贝蒂主办的杂志进行过合作的人。罗马的《南方报》是一份赞成不同派别汇合的报纸,不久就成为最激进的法西斯集团的攻击对象。

在日益动荡不定的形势下(政治形势也是如此),文学艺术派别的斗争日趋激烈。各派与国家法西斯党的关系不尽相同,这取决于党的书记和省委书记的变化(有时这些书记是想保护这一批或那一批知识分子的);或者取决于与一些有文化事业心的法西斯全国领导人士所建立的关系。

283

在那些年代里,在罗马这个法西斯政权中心,曾有一个主张使法西斯政权自由化并为法西斯党注入活力的集团(因为法西斯党由于斯塔拉切的等级制度和侮辱人格的体力锻炼以及形式主义礼仪而受到压抑)。当时是否有可能用一种新的、思想上的赞同来代替形式上的、表面的纪律呢,或者至少通过提供使个人得到保障的可能性来把那些不能容忍“斯塔拉切主义”的人重新争取过来呢?博塔伊通过《法西斯评论》似乎是促进人们持各种不同政见,但其目的却是要把这些持不同政见的人重新争取到党内来。事实上,由于博塔伊对墨索里尼俯首贴耳和害怕毁了自己,这就使他的行动无法超出墨索里尼所确定的范围。因此,那些最初曾受到革新幻想鼓舞的持不同政见者到一定时候就把他们的失望变为名副其实的反对了。每逢革新浪潮看来要超出所容许的限度,博塔伊就总是提醒人们就范。工会方面的恰内蒂和新闻界的帕沃利尼的情况就是如此。此外,当墨索里尼支持受其儿子维托里奥和鲁杰罗·赞格兰迪影响的团体活动时,他有时也赞同具有批判精神的表现,甚至委任赞格兰迪负责《意大利人民》杂志非常重要的短评专栏的编辑工作,这些专栏一般是谈论元首的。

在上述条件下，就有可能进行不受过多制约的文学和艺术的探讨了。当然国家订货，颁发奖金以及新闻广告是对一些艺术家和一些派别的支持。在某些领域中法西斯政权的庇护常常是决定性的，特别是有助于马尔切洛·皮亚琴蒂尼及其追随者们的“帝国式”建筑学的发展。在绘画或雕塑方面也有法西斯政权的宠儿。在电影界，国家干预常常也是决定性的，例如支持焦阿基诺·福尔扎诺的帝国倾向，其目的是要创立一种露骨的法西斯主义电影。

但是，主张描写小资产阶级生活琐事的现实主义倾向还是在“保密电话”操纵的骗人银幕后面逐步地崭露头角了。虽然有名目繁多的严密限制，但在绘画方面对新的表现形式的探索还是不顾那种支持政府的表现或艺术家本身所具有的同样意图而独立地进行着。如果说莫兰迪还把自己封闭在必然是自我限制的视野之内，把自己关在窗户之内，或者关在他的书房四壁之内的话，一个像西罗尼、卡拉、富尼或马尔蒂尼这样的人却可以宣布他们的法西斯信仰，而又不致妨碍他们的作品去了解欧洲的新经验，并为新的主角开辟道路。正是在那些年代里，继从希皮奥内到马法伊的“罗马画派”站住了脚跟之后，在都灵，在卡索拉蒂的指导下成立了包括卡洛·莱维在内的“六人团”；在米兰，那些后来创办《流派》的人（从比罗利到萨苏）则在深造，而与此同时，倡导从事新探索的人也成长起来了，如贾科莫·曼祖那样的雕塑家，如雷纳托·古图索和科拉多·卡利那样的画家。这样一来，在建筑学界，占统治地位的皮亚琴蒂尼学派就不能阻止现代理性建筑学在意大利也得到发展，而这一建筑学的发展是要归功于帕加诺和佩尔西科的大胆工作的。

当时是一个文化大觉醒的时刻。欧洲重大的文化斗争在意大利也有了反响。纳粹主义焚烧了书籍和画册，但是这并不能阻止表现主义艺术、一些反映德国人民苦难的小说和电影进入意大利

并流传开来。当时，由于把《三块金币》搬上银幕，布莱希特的名字开始为人所知；况且，在雷米焦·帕奥内和安东·朱利奥·布拉加利亚的倡议下，从1931年起，《三块金币》在罗马独立剧院上演了。在意大利知识分子看来，法国始终是世界的文化中心。《新法兰西杂志》，加利马尔、安德烈·纪德、毕加索、布雷东和超现实主义以及后来的阿拉贡都提供了新的研究目标和新的研究工具。俄国电影的声誉从法国传入意大利；人们对新的苏联文学，对皮利尼亚克到奥斯特洛夫斯基所描绘的实现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壮举的长篇小说的好奇心有增无减。同时，斯拉维亚出版社也使一般老百姓了解到伟大的19世纪俄国文学。弗朗科·安东尼切利以自己小小的出版社保障了伊萨克·巴贝尔的《骑兵团》这部史诗般的长篇小说的翻译出版。

继描写美国经济危机的悲剧性短篇小说之后，罗斯福的胜利在意大利引起了人们对新的美国文学的好奇心，并促进了对这一文学的了解。此外还出现了诸如切萨雷·帕韦塞和埃利奥·维托里尼这样的翻译家。马里奥·索尔达蒂的《美国初恋》一书为青年的兴趣开辟了新的天地。美国的电影、爵士音乐吸引着青年人越来越大的注意力，他们已经不再只注意小小的文化俱乐部了，这表明青年人要摆脱法西斯统治桎梏的意愿。不仅是卓别林的电影，
285 而且还有大量的美国电影都使人们了解到不同的生活方式，更少约束的人际关系和现代问题。这些就成了打破狭小的自给自足式文化樊笼的推动因素，而有人却想把意大利文化禁锢在这个樊笼之中；意大利文化虽然在形式上尊重法西斯政权，实际上却在培植着深刻革新的萌芽。上述情况固然是对意大利文化所采取一定方针造成的积极结果（这种文化虽然得到法西斯政权的正式承认，却善于保持自己在进行研究和语言上的自主），但也还有其他一些不能不被认为是消极的结果。

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惯于掩饰真相、不断玩弄两面手法、正式表态同个人真实想法相分离等现象是得到鼓励的，这是重蹈过去知识分子对王公贵族阿谀奉承、唯命是从这种古老的意大利传统的覆辙，而正是这种传统曾推迟和阻碍了意大利争取独立和统一的斗争。在新的意大利共和国的生活中也可以感受到这种掩饰真相的做法的后果。这种情况说明何以迟迟不就法西斯时期和知识分子与法西斯政权的关系问题进行自我批评式的探讨的原因。上述后果尤其阻碍了知识分子在改革国家方面所负有的政治任务，这一任务随着时间推移固然变得更加重大，但是模棱两可的、习惯于玩弄两面手法的倾向却依然存在。最后一点是：意大利知识分子拒绝从事地下斗争（在被特别法庭判刑的5000人中只有几百人是大学毕业生或大学生），从而阻碍了在政治上及时建立强大的反法西斯政党和为反法西斯文化本身作好准备，并使这些政党的成立变得更加困难了，同时也使它们更加难于了解和解决意大利社会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正是在法西斯当政的年代里发生了变化。

监狱是无法阻止头脑运转的，安东尼奥·葛兰西就是一个伟大的例证，他在狱中写下了20世纪意大利政治思想最伟大的篇章。但是，在法西斯主义内部成长起来并开始组织新的反对派的青年，只是在解放以后，当葛兰西的著作成为意大利文化革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才了解到他的著作（秘密流传的少数片断除外）。

六、干涉西班牙

286

如果说主张使法西斯政权自由化的论点从来就没有什么坚实的基础的话，那么支持佛朗哥将军反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法西斯干涉就很快打破了任何幻想。

1936年2月16日举行了大选，这次大选使人民阵线的议会多

数得以组成。右派立即表示不愿接受人民的裁决。7月17日，在西属摩洛哥和加那利群岛发生了军事叛乱。7月18日叛乱蔓延到西班牙本土。当时佛朗哥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去指挥摩洛哥军队。在布尔戈斯成立了由莫拉将军领导的国防军政府。共和国政府武装工人民兵来抵抗反叛。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和西班牙国土的大部分地区叛乱都被镇压下去了。在人民的参与下，开始了保卫民主共和国的战争。

7月29日，两架飞往佛朗哥司令部的意大利军用飞机被迫降落在法属摩洛哥。这样就暴露了法西斯的干涉；其实，法西斯的干涉早在7月17日以前就开始了，并在随后的几个星期公开进行。物资和武器的供应量愈来愈大，还向叛乱者提供了飞机和军舰。一支所谓的志愿军远征部队（其中大部分人被送到无人知道的目的地）很快就达到5万人之众。罗阿塔将军领导的一个参谋部负责把军事行动同政治要求协调起来。纳粹德国插手西班牙提出了协调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在筹备成立罗马—柏林轴心的气氛中加以研究的。

意大利军队在西班牙的军事介入给它的素质和效率带来了严重后果，由于意大利军队过去必须要在短期内结束埃塞俄比亚战争行动早就经受过严峻考验。它需要一段和平时期以整顿自己的队伍，充实自己的仓库，特别是要弥补在埃塞俄比亚战争事件中暴露出来的在现代装备上（飞机、坦克、摩托化运输工具）的严重缺陷。但是，从巴多利奥到格拉齐亚尼和卡瓦莱罗这些军事头目们却忙于分享荣誉、贵族头衔、封地和权力，他们都不敢反对墨索里尼，而墨索里尼在获得建立帝国这一个人成就之后，变得越来越自负了。此外，像罗阿塔那样的新将军，也在跃跃欲试，罗阿塔是野心勃勃的军事情报局局长，在荣誉和桂冠面前他也是一个垂涎三尺的家伙。

埃塞俄比亚战争结束不到三个月，法西斯就干涉西班牙，这在意大利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工人和平民住宅区以及工厂，都出现了这一事件使人们情绪激昂的明显状况。人们还组织起一些团结小组，以便开展声援活动，如在米兰，由阿利吉·萨苏、拉法埃莱·德格拉达和阿尔贝托·马拉古吉尼创建了称为伦巴底红色小组的组织。不久，马德里、巴伦西亚、巴塞罗那电台的意大利语广播就直接报道了有关反法西斯斗争的性质和发展的消息。西班牙共和国战士们的英勇斗争和国际志愿者，特别是意大利志愿者抵达西班牙，激起了强烈的钦佩心情并点燃了新的希望。但是，警察立即加强了镇压行动，挑衅性和残暴的法西斯小分队也很快地重新出现了，其目的就是要阻止“赤色分子重新抬头”。1936年8月，不仅在米兰、都灵、热那亚、威尼斯、的里雅斯特等工业大城市，而且在维罗纳、帕多瓦等一些小省城以及南部布里亚大区，都有许多人被预先扣押起来。

在青年大学生中也并不是没有自愿参加法西斯远征军的例子。作出这些决定往往是出于追求飞黄腾达的机会主义目的和摆脱省城狭小天地的愿望，但也不是没有反共的信念。持不同政见运动在意大利大学校园中出现不过是刚刚开始，而且参加这一运动的动机又是如此不同和混乱不堪，以致这一运动无法阻止法西斯活动在反共旗号下死灰复燃。

当时整个教会都站在支持佛朗哥分子阵营一边，教会采取的立场有效地支持了法西斯政府的行动，它指控和严厉谴责“赤色分子”在反对教会和修道院时所采取的“野蛮”暴力行径。就连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采取的反教会的暴力行为也被算在共产党“赤色分子”的账上了。当然，教会对法西斯分子的屠杀行径就没有说过一句谴责的话。国际志愿者的参战，国际纵队的组成，还有苏联志愿人员的介入，这些都被说成是苏联企图在西地

中海建立基地的证明(难怪当时报界谈到国际纵队自愿人员时,总是说斯拉夫人了)。

除了主要针对工人和劳动者的警察镇压之外,国家法西斯党对任何一项社会活动的控制也大大加强了,其目的是阻止和压制在出兵埃塞俄比亚期间和之后出现的种种要求自由化的倾向。墨索里尼在战争期间固然是强调战争的民族性,以便把某些不是法西斯分子的人民阶层动员起来,让他们支持出兵埃塞俄比亚,声援正在经受如此严峻考验的国家,但是在宣布帝国成立之后,他却要突出这场战争及其胜利的法西斯性质了。一切都应当是法西斯的,是赤裸裸法西斯的,都应当把法西斯的标记大事炫耀一番。这种日益严重的、极端的法西斯形式主义必然使掩饰真相的做法变得越来越困难,然而,这种掩饰真相的情况却仍继续存在,甚至在某些场合竟成为不折不扣地玩弄两面派手法,在其他场合则又成为道德上进一步堕落。这就开始了“斯塔拉切主义”的鼎盛时期。

七、“斯塔拉切主义”

1931年12月7日,正当经济危机处于最严重时期,阿基莱·斯塔拉切被任命为国家法西斯党的书记,接替了过于热衷同天主教行动派进行论战的乔瓦尼·朱里亚蒂,并致力于增强党的活力和选拔党员的工作。遵照墨索里尼的指示,斯塔拉切把不守纪律的人开除出党,同时又增加党员人数,使属于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的意大利人领取党证。仅仅宣誓忠于法西斯政权这时已经不够了,还需要领取党证,这已经成为被政府行政部门录用和获得特定官职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1937年3月9日,大议会规定:所有国家雇员都应当加入法西斯党。这样党员人数就从1931年的1305253人增加到1937年

底的 200 万多人。1937 年 1 月 11 日，为了强调党的书记职务的重要性，他被授予部长的头衔和权限。其实，这样一来，党就被置于 289 法西斯国家的范围之内，起一种从属作用。这样就开始了名曰“斯塔拉切时代”，这一时代始于埃塞俄比亚战争结束，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在这一时期，墨索里尼想要把他称为“帝国作风”的那种作风，即严格的纪律和百依百顺、墨守成规强加给整个国家。所谓“反资产阶级的法西斯革命”被降低到搞形式上移风易俗的尝试，其办法是：采用一种所谓的法西斯作风，而这种作风无非是采取如下一些措施：如强迫使用“您”这样的尊称；在军队里采用走正步；强迫穿法西斯制服；对法西斯党徒进行操练；加强法西斯星期六的活动。这种做法引起了普遍的消极抵抗，人们以冷漠和嘲弄的态度接受这种做法，这也就使那些厌恶这种屈辱人的可笑做法的公民联合起来。连一部分仍然被认为是法西斯分子，但已经开始看到法西斯政权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存在着日益严重的真空的青年人也对那种越来越多的表面服从迹象感到气愤。

为了教育年轻一代信仰法西斯主义，1937 年，所有的青年组织都合并为一个组织，取名为“意大利法西斯青年”。在取消了长期设在国民教育部中的青年和体育教育副部级机构之后，参加各种组织的青年男女（从“母狼之子”、“法西斯少年先锋队”、“法西斯青年先锋队”、“法西斯青年”到“意大利少女”、“意大利女青年”、“法西斯女青年”）都统统要参加“意大利法西斯青年”。1937 年 10 月 28 日，直接受党书记领导的“意大利法西斯青年”总共吸收了 700 多万青年参加它下属的各种组织。除了每星期一般规定的体育运动、政治等教育活动外，“意大利法西斯青年”还发起竞赛、郊游、海上运动以及名为杜克斯宿营的夏令营活动。

至于约有 10 万名成员的“法西斯大学生小组”，除了进行准军事教育外，还负有开展救济、体育工作和利托里奥分子文化艺术活

动的任务；此外，从1936年起，该组织还要开展劳动界利托里奥分子的活动，要组织青年工人和学徒工在技术、政治和文化方面开展竞赛。通过劳动界利托里奥分子的活动，要使工人和学生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这样，青年大学生就有条件接触到工会现实，而工会则始终是为法西斯当局提供有组织的群众的最重要基础。然而，由于工人采取保留和怀疑的态度，实际上这一类活动的宣传效果甚微。青年共产党人欧金尼奥·库列尔曾设法在帕多瓦通过大学报刊《布报》来利用学生和工会的这一联系，以推动对工人的初步动员，但也正因为青年工人对“法西斯大学生小组”的宣传活动持不信任态度，库列尔的上述尝试并未得到积极的进展。

工会成为法西斯政权的有组织群众的主要基础。各工会是分属于同各类企业主组织平行的各组织，这些工会负有行会制度所规定的各项任务。根据1934年9月颁布的法律，法西斯工会组织在基层领导可由选举产生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来了。地方工会书记和领导人以及工厂代理人本应由工会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然而由于共产党员在政治上抵制选举，这就使落实共产党员有关在工会中集中力量动员工人的指示遇到困难，从而使工人反对派无法充分利用选举提供的可能性在工会内部进行政治斗争。

到1937年10月28日为止，参加各类工会组织的工人、雇佣劳动者、职员共有5650649人。为了开展工会活动，还需要很多的在工厂和地方工会中选举产生的领导人、专职干部和代理人。

不应忘记工余活动所起的作用，这一活动是为使劳动者开展娱乐、体育、艺术活动而组织的。这些工余活动往往在老的人民之家进行，使当局能够满足劳动者的需要，让他们利用今天所说的业余时间来消遣娱乐和了解国家情况。最成功的活动是人民列车，即以减价的办法让成千上万的劳动者领略威尼斯、佛罗伦萨、那不勒斯的美景。自然，优先安排的旅行是去罗马。这种旅行除可以

游览“罗马帝国遗址”外，在必须参观祖国祭坛的同时，还可以去威尼斯广场，在据说是元首曾在里面为国家前途而工作和彻夜不眠的大楼前面停留片刻。

体育活动由意大利奥林匹克委员会下属的各体育协会组织。²⁹¹对在世界运动会上取得的成绩进行民族主义的狂热吹捧有利于宣传法西斯政权，意大利人增强体质被说成是这个政权造成的。

至1937年10月31日为止，大部分意大利人都参加了各个不同的组织。500万意大利人参加了国家法西斯党和其他法西斯团体（加入国家法西斯党的有215.2万人）；700万人参加意大利法西斯青年，550万人加入工会，300万人参加工余组织。参加各种组织的人数达到2000万，差一点就相当于意大利人口的50%（全国共有4300万人）。当然，有的人既参加国家法西斯党，又参加工会和工余组织。仅把参加法西斯党和法西斯团体（包括意大利法西斯青年这一组织在内）的人算在一起，就达1250万人，接近全国人口的30%。在2000万参加者中间，大大小小的领导人和党魁，必然至少有20万名（每100名参加者中有1人）。

这些形式多样的群众组织所开展的活动满足了劳动人民在救济、文化和体育等方面的大量需求。当更有修养的青年在思想方面感到不满足，基层工人当中开始有权利要求的觉悟时，法西斯政权却能够通过严密的组织网成功地控制住广泛的群众基础，上述组织把每一个意大利人从小就吸收进去，并随着他的成长和在他所从事的各种活动中对他严加管束。

在一个法西斯上台前仅在少数地区和很短时间内发展过各种权利要求联盟、有组织的政治党派和文化体育组织活动的国家中，竟然进行了广泛的组织群众的工作，这在客观上肯定超出了当局的本意，成为一种令人不能忘记的结社经验。过去有人正确地指出，1944年以来人们之所以竞相领取某个政党的党证，这是由于早

在法西斯统治下就已养成的参加组织的习惯造成的。全国解放初期，固然在加入政党的人们当中不是没有人抱有机会主义的考虑，但是，人们对结社的价值及其所具有的基本的民主性质的理解，人们对参加组织的价值的理解，最终毕竟得到了肯定。特别是在工会方面，组织性的价值是作为满足每一项权利要求（即使是最起码的权利要求）的主要条件提出来的。

最后，不应否认的是：由于群众组织的广泛性，某些活动——从“意大利法西斯青年”组织成员到青年营，从体育竞赛到人民列车——最终还是担负起有益的任务。这些活动促进了交往、会晤，形成了新的经验，初步打破了陈旧闭塞的乡土环境。在组织群众方面，也必须看到，早在法西斯政权之下，许多包办一切的群众组织内（这些组织出于政治控制的目的，本想把意大利人民纳入组织之中）就已经播下了第一批种子，这些种子只是在全国解放后新的自由与民主的气候下才得以开花结果。

意大利社会当时仍有许多由过去继承下来的东西，这些东西没有被解放斗争清除掉，而结果是在新的共和国中把老的法西斯君主制国家的一些保守机构和工具保留下来，群众参加工会、娱乐体育协会等组织在客观上是代表了这样一种进程的开端，即在重新获得的自由范围内，这一进程应当获得进一步带有民主标志的发展。

共产党曾善于抓住法西斯政权下群众基层组织的特点和这些组织结构所提供的可能性，这在有组织的反法西斯党派当中是独一无二的。法西斯主义竭力把群众置于自己的组织之下，以便更好地控制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有些矛盾在当时已经缺乏生气的法西斯党内部是无法表现出来的，这些矛盾于是就在群众组织生活中表现出来，尤其是在具有内在的人民性特点的组织 and 具有强迫参加和等级结构的压抑性的组织的生活中表现出来。

陶里亚蒂1935年1—4月间在莫斯科列宁主义学校意大利班讲授《论法西斯主义》课程时，就仔细地分析了法西斯政权下群众组织的结构。这种分析与众不同，它把政治组织（“国家法西斯党”）和军事组织（“国家安全志愿民兵”）、工会以及被称为宣传性的组织区分开来。这些课程是给准备回国开展地下工作，从政治上引导基层党员的共产党人开设的。陶里亚蒂在1935年对法西斯组织所作的分析是1936年将要完整提出的政策的前提，这一政策的目的是要把反法西斯反对派同法西斯内部反对派结合起来，并使党的活动中心转向法西斯组织内部。 293

八、企图建立法西斯文化

1937年，法西斯主义在努力扩大其有组织的群众基础的同时，竭力阻止在法西斯政权内部出现新的革新动荡。政权当局要求公民严格接受明确的纪律并鼓励制定出彻底法西斯的意识形态，力图压制在尊崇法西斯主义的外衣掩盖下异常活跃的各种思想艺术的流派。但这是徒劳的。只有从纳粹德国引进的种族主义为法西斯政权提供了僵硬的歧视工具。而正是对种族主义的拒绝变成了意大利文化在维护自己的自主地位过程中得以确立的原因。

把新闻宣传部改为人民文化部，并先后由迪诺·阿尔菲耶里和亚历山德罗·帕沃利尼出任部长，就表明了法西斯政权为使意大利文化真正法西斯化所遵循的路线。每天通过人民文化部下达的指示要求报刊完完全全一致，甚至是在印刷工作的细微末节上都要一致。把人民文化部的指示收集起来，就可以得到有关什么是真正的法西斯文化的耐人寻味的说明。真正的法西斯文化就是：轻视真理，把意大利人当作孩子，必须不给他们以任何思考的推动力，每天颂扬元首。现在，这种日复一日的恭维不仅越来越遭到

消极接受法西斯政权的人民的唾弃，而且也遭到日益增多的法西斯分子的唾弃，因为他们不愿让法西斯当局把自己当作愚昧无知的孩子。

在法西斯上台15年后，当局才认识到，意大利文化保持住它特有的自主，虽然这中间有许多人为的东西，并且往往是苍白无力的。当局决定缩小直至取消这块地盘。因此，正如我们在前面说过的那样，就在1937年，“法西斯全国文化学院”改为“全国法西斯文化学院”，乔瓦尼·詹蒂莱不得不把学院院长职务让给彼特罗·
294 德佛兰奇西。“全国法西斯文化学院”通过各省分院加强了宣传工作，米兰的法西斯神学院不得不颂扬为法西斯祖国牺牲的法西斯分子的英雄气概。

当局竭力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对意大利人进行严格的控制，但未能获得预期的效果，在法西斯组织和意大利人的志向之间反而产生了愈来愈深的鸿沟。但不满情绪、反抗、对法西斯规定的批评和讽刺性的驳斥之所以没有形成积极的政治力量，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一点是：有组织的反法西斯政党对此明显地毫无准备并在政策上举棋不定。因为当时这些政党正在尽最大的努力为西班牙共和国提供有效的帮助。当时的国际前景令人担忧。在西班牙爆发了佛朗哥的叛乱；意大利和德国的公开干涉引起了连绵不断的战争事件；民主国家以不干涉政策为由采取了姑息政策；这一切自然不会使那些反法西斯小组得到鼓舞。从法国传来了令人失望的消息：人民阵线政府发生危机，而这一危机在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只有几个月之后就已经显而易见了。

在前景不明朗、纳粹德国的侵略计划日益左右着国际局势的条件下，法西斯政权危机开始走上了漫长而又曲折的道路，这一危机只是在六年以后，即1943年7月25日灾难业已降临时，才公开爆发出来，并为抵抗运动争取自由的浴血战斗开辟了道路。

第十二章 人民阵线的经验

295

一、法国短促的夏天

1936年春，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推进和走向战争的势头，由于人民阵线的胜利而暂时停止了。这不只是一次停顿和一场迫不得已的防御性战斗。在1935—1938年这一短暂时期内，若干惊心动魄的大斗争使千百万男女行动起来了，在这些斗争中一些旧障碍得到了有力的克服，并为西欧工人和人民运动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取得新的发展创造了前提。从上述迫不得已的较量当中诞生了民主民族团结，这种团结是欧洲抵抗运动取得胜利的条件。这些实现团结的经验即使未能消除旧的宗派主义和僵硬的教条主义，但在创造性的实践中却有助于削弱它们，并在事实上为走向社会主义开辟了新的民族道路。然而，当时还缺乏对这些新经验进行理论思考的能力和愿望；这种理论上的思考是会有助于加强劳动者的政治觉悟，有助于克服旧公式和新行动之间的日益脱节以及防止某些倒退现象的，而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后，竟发生了这些倒退现象。

在西班牙2月16日和3月2日的选举中，联合的左翼取得了
对保皇反动右翼的胜利，尽管胜利不大。在法国4月26日和5月
3日的选举中，在人民阵线旗帜下组成的共产党、社会党和其他较
小党派的左翼联盟获得了376席（其中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社会党人
得147席，激进党人及其盟友得106席，共产党人得72席，新社会党

296

人得25席,还有其他无党派人士)。共产党议员从10人增至72人。这是很大的跃进;由于达成在第二轮投票时提出统一候选人的协议,这次跃进就使共产党的代表比例更加符合它所得的选票(共得150万张选票,而1932年得80万张)。在共产党候选人最有希望当选的选区,737976名社会党和激进党的选民中有600723人按照纪律一致投了共产党候选人的票,这项纪律表明当时人民阵线的选举基础是多么牢固。

法国和西班牙人民阵线的胜利是依靠人民的广泛动员夺取到的。当然两国人民阵线的胜利具有不同的性质,但都表现出巨大的战斗意志,表现出力图达到进步目标的巨大努力和强烈的反法西斯的义愤。推动力量无疑是工人阶级,更确切地说,是工人阶级战斗的先锋队。但是,在这一统一阵营中还有其他阶级力量,它们害怕无产阶级力量向社会主义性质的目标推进,它们还受到温和与反动势力的压力诱迫。为了促使这些在政治上和社会上都参差不齐的力量保持团结,必须有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广泛的团结意识,并提出一些能够在不引起阵线破裂的条件下实现的短期具体目标。

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政治领导,西班牙的社会紧张局面很快就有了破裂的性质,并激起了极其尖锐的论战乃至武装冲突。西班牙共和国诞生以来,工人阶级、雇农和贫苦农民曾同旧特权阶层发生过多次激烈的冲突事件,这些旧特权阶层顽固地保卫其具有前资本主义根源的统治地位。人民运动当时处在非常混乱和无秩序的状态。无政府主义力量及其工会组织(全国工会联合会)当时集中在以下几个地区:加泰罗尼亚、安达鲁西亚、马德里。在一个仍然存在广泛而浓厚封建残余的国家中,无政府主义者仍有广泛影响,这种影响表明:阶级冲突的性质仍是落后的。西班牙共产党当时只获得16席(阵线总共得到230席)。这个富有战斗意志和经过长

期抑止的爆炸性义愤的人民运动，仍然缺乏强有力的政治领导、牢固的团结和明确的政治觉悟。

在法国，人民阵线的选举胜利是在有强大的斗争运动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个运动使 400 万工人占领了工厂。这个运动是纯粹的无产阶级运动，是工人阶级的运动，这个工人阶级保持着，甚而是自豪地表现出一种不受小资产阶级渗透所侵蚀的无产阶级的风格、习惯和思想状态。然而，在战斗的工人周围，实现了广泛的人民团结，其中有少量的中等阶层，他们使工厂占领者不致缺少抵抗手段，包括物质的抵抗手段。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对运动的关心和参与是广泛的。当时，无产阶级的——或更恰当地说是民粹主义的——文学、电影和艺术繁荣起来了；在资产阶级腐蚀并准备背叛祖国的法国，这种文学、电影和艺术从“人民之子”^①身上重新找到了实现国家革新的新的健康的主人翁和重新执行在世界上反法西斯的解放使命的能力。在被占领的工厂内，人们通过劳动组织和集体生活，广泛地依靠群众的幻想和创造性的合作，采取了新的斗争方式。运动没有消逝，它站稳了脚根，并向前推进，以达到可以由工会控制的当前具体目标（劳动合同、工资、工时、节假日）。然而，运动还是缺少一个执政纲领。其实，阵线当时是有一个总的政治纲领的，那是一个反对法西斯和争取和平的纲领。但是，大的政治目标（反法西斯、和平）和工会的具体目标之间的关系却未曾向群众阐明过。这种模糊不清造成了僵持局面和对立要求，从而使阵线容易陷于瓦解。而旧统治阶级立即看出，这个情况对于运动原有秩序是具有真正咄咄逼人的危险性质的，并马上作出反应，开展了有计划的诽谤和仇恨的运动，不仅肆无忌惮地打击政党和工会，而且也涉及个人，这些个人受到真正的政治和道德迫害，被诬

^① “人民之子”原系法国共产党已故总书记多列士的同名著作，这里用来比喻共产党人。——译者

陷为法国的敌人。

298 6月4日，成立了布鲁姆政府。共产党人没有参加内阁。多列士曾建议共产党参加，但以杜克洛为首的法国共产党政治局的多数，在共产国际的规劝下，主张只给新政府以外部支持。占上风的是某些策略考虑呢（不给右派提供反对布鲁姆政府的其他把柄），还是政治上的保留呢（即不致使党在同社会党主持的政府——一个肯定不能被认为是“工农”政府的政府——直接合作中败坏名声）？整个讨论情况使人们认为，在法国共产党（它为争取实现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所决定的国内转折而卖的力气最大）的方针中公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浓厚残余依然占上风。多列士和共产党人参加政府能否使法国对弗朗哥叛乱采取另一种政策，这个问题至今仍是不准提出来考虑的。

布鲁姆政府成立后，占领工厂运动继续扩大。托洛茨基当时派了他的朋友们加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以便影响和制约这个组织；托洛茨基认为当时处于临近起义的形势，并进行煽风点火。他声称，运动不应停止，革命者的岗位是在工厂里。这是一个危险的指示，它使工人阶级在全国陷于孤立，并同激进党破裂，而该党当时仍然代表着法国广大的外省和农民。社会党左派领导人马塞尔·皮维尔特宣称：“一切都是可能的，而且都能立即作到”。多列士毫不犹豫地采取了明确有力的立场，回答说：“现在并非一切都能办到”。6月11日，他宣称：“必须懂得结束罢工”。对工厂的占领又拖延了一些时候，最后终于烟消云散，因为工人在取得一些重大成果之后，可以同时举着红旗和三色旗走出工厂大门了。9月初，众议院通过了意义重大的措施：40小时工作周（原为48小时），15天带薪假期，承认工厂中的工会代表，承认集体谈判合同的原则，增加工资12%。对法兰西银行进行了改革，延长学龄，大赦令颁布。40多年以后，1936年6月运动所取得的成果还一直保持它的重要

性。

7月14日，庆祝胜利的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走过了巴黎的街道。在队伍的前头，围绕着列昂·布鲁姆的有莫里斯·多列士、达拉第和以佛拉桑和儒奥为首的重新统一的总工会的领导人。

十月革命之后，震撼资本主义欧洲的最伟大的斗争胜利结束了，这一胜利大大改变了法国人民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人们抱巨大的希望。在一场未曾导致过度创伤的斗争中发生了社会变革。政治和社会的进步呈现出合乎人情的可喜面貌。从当时那些斗争中保留下来的是关于工厂会议、人道的声援和大规模游行队伍²⁹⁹的不可磨灭的、令人陶醉的记忆。共产党的所有宣传都强调了对生活、对未来必定幸福的信念。妇女成了新斗争的主角，同她们的伴侣肩并肩地展开声援行动。伸出来的手代替了紧握的拳头。人类的爱压倒了阶级仇恨。青年们——新法国的建设者——在前进，儿童——未来岁月的肩负者——在歌颂生活的欢乐。法国民主传统所固有的无政府主义激情和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操表现为这类博大的理想。共产党人善于把握住这些思想感情，并使它们同爱国主义感情融合起来，而爱国主义感情也是大革命留传下来的雅各宾党人民性传统的一个持久因素。

然而，这些却不过是瞬息即逝的希望、明日黄花而已。法西斯势力在逐渐收紧它对法国的包围：纳粹主义在莱茵河这条边界上，法西斯主义在阿尔卑斯山那条边界上。在北方，在英法海峡的彼岸，保守主义的英国一心只想不惜一切代价去拖延捉摸不定的局势和促使德国的侵略转向苏联。英国的资本主义不希望法国的榜样被人仿效。伦敦的金融中心号召法国资本家输出他们的资本。从6月至9月人们以飞快的速度从法国提取资本。政府不得不将法郎贬值25%，而基层的权益要求的势头并没有减弱。一些势力在阴谋策划政变，而正在此时，布鲁姆政府却在极端主义的势头

和专制的阴谋与压力夹缝中间日益削弱了，因为共产党的支持始终只在议会内，而没有转变为基层有组织的新团结。多列士扩大了团结政策，向天主教徒伸手，发展了民族独立的主题。但是社会党人由于害怕被共产党人挤到右边，就力图把共产党人推到左边。阵线执政只有几个星期，内部矛盾就已经膨胀起来了。最后的一条自由边界就是同西班牙的边界；在西班牙，类似的进程也正在开展，但其局面更加混乱，在政治上更加难于控制。7月17日，佛朗哥派的叛乱使西班牙共和国的生命和比利牛斯山这条边界都处于危险之中。

二、保卫西班牙共和国

2月16日和3月2日的选举使联合在共和国阵线中的党派获得了议会多数。胜利只是相对的。人民阵线获得了470万票，而右派获得400万票，中间派30万票。在人民阵线中，主张共和制的各党共获得121席，社会党人89席，共产党人16席。人民阵线所取得的微小优势表明，须作谨慎的打算，以巩固已经取得的阵地，并采取行动去分化对方的阵线。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不寻常的支持使得人民阵线取得了胜利。但是，这些力量立即把选举结果作了引申的解释，断言一场社会革命已经开始，应当把它进行到底。5月10日，激进党人曼努埃尔·阿萨尼亚当选共和国总统。新议会的首届政府首脑是共和党人圣地亚哥·卡萨雷斯·基罗加。选举后经过了一段长时间才成立政府，这加剧了国内当时存在的不稳定和混乱的状态。人们认为选举结果是暂时的，无论右派还是左派都在准备进行决定性的冲突。反动派在组织它的反革命，左派则力图在社会方面取得成就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进。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全国工会联合会和社会党的劳动者

总联盟所发动的罢工在扩大。暴力行动层出不穷。

7月13日,作为对一名共和国警官被害的反应,绑架并杀死了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党——西班牙革新党头目卡尔沃·索特洛。7月17日,爆发了佛朗哥将军率领的军事叛乱。在最初24小时,政府的反应很软弱。政府最初的优柔寡断使叛乱得以在国内一部分地区蔓延开来。西维利亚、萨拉戈萨,潘普洛纳以及其他城市很快被叛军控制。佛朗哥担任了叛军司令;他从非洲率领4.5万“摩尔”雇佣军^①和一支强大的外籍军团来到西班牙。大多数将领和高级军官都投到了叛军一边。只有海军依然忠于共和国。

马德里几乎沦陷,但人民立即动员起来,拯救了这个城市。巴塞罗那也被人民拯救了。立即成立了民兵,他们都是用从军队那里获得的武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直接从军营和军火库中夺来的兵器武装起来的。7月18日,政府的领导职责移交给何塞·希拉尔。扩大人民的动员是有决定意义的。工人要求武装并进入兵营。民兵同仍忠于政府的正规军并肩战斗。战争立即具有内战特征,而且这场内战是残酷无情地进行的。在头几周,双方或多或少立即处决的达数万人之众。那是毫不含糊的阶级冲突。在一方战斗的有工人阶级、雇农、贫苦农民和一部分政治上先进的知识分子。也有仍忠于誓言的职员、官员和法官,但他们为数很少。也有一些没有转到敌对一方的工业家和地主,但数目微乎其微。大多数资产阶级都属于另一方,那里存在着反动教权主义的、保皇的、教會的、黠武主义的旧西班牙。而这个旧西班牙并不是孤立的。同它站在一边的不仅有法西斯国家,还有国际资本主义和大金融集团,它们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原因都希望“红色”共和国败北。共和国加强和重申其民主的合法性都是徒劳的,它依然是“红色”的共和国;

^① 摩尔系毛里塔尼亚、埃塞俄比亚一带棕黑色非洲人种。——译者

在欧洲历史的那个时刻，它失败的头一个原因就在于它的这个特征。

在得悉佛朗哥叛乱消息时，最初布鲁姆政府似乎愿意接受西班牙合法政府7月20日提出的援助要求。航空部长激进党人皮埃尔·科特负责立即派遣一些飞机赴西班牙。但是，由于其他激进党人部长坚决反对，并以辞职相威胁，同时也由于军队指挥员的抵制，布鲁姆不得不作罢。右派掀起了一场制造恐慌的运动，谴责政府想削弱本国的防御能力，有利于西班牙“赤色分子”的胜利。与此同时，报纸（乃至教会）也发动宣传运动，渲染“赤色分子”搞暴行，破坏教堂和修道院，屠杀俘虏。当然，它们对佛朗哥分子所干的勾当则闭口不谈。英国政府施加的压力表明是更加有效。由于法国财政处在困难之中，伦敦金融界——它早已敌视西班牙和法国的人民阵线政府的活动进程了——所采取的立场对于决定法国政府的方针立即产生了影响。

布鲁姆处在两种压力的逼迫下：一方面是工人的压力，他们上街游行，要求“把飞机送往西班牙”；另一方面是法国和国际上大金融集团的阴谋诡计和激进党人的讹诈；正因如此，布鲁姆不得不放弃了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援助。7月25日，西班牙发生叛乱后恰好一周，法国政府声明法国不会进行干涉，并建议签订“不干涉”国际协定。在这期间，意大利已经在大肆干涉，德国的干涉也已开始，葡萄牙则向叛军开放它的边界，这些叛军还从葡萄牙取得援助和供给。美国则宣布中立。

苏联立即申明它对西班牙政府完全友好，并呼吁国际上给西班牙政府以援助。斯大林不想让布鲁姆政府处境困难，这不仅是为了不损害伟大人民斗争所取得的成果，而且主要是为了不削弱以法苏联盟为基础的抗德安全体系的支柱。因此，他强调西班牙人民斗争的民主性质。8月6日，苏联接受了法国提出的关于参

加不干涉国际保证委员会的建议，条件是，除了法国、英国和苏联外，捷克斯洛伐克、荷兰、波兰和葡萄牙也应参加，并应停止意大利和德国已经进行的干涉，而且要它们也参加该委员会。

经过一系列毫无结果的会议之后，苏联面对意德两国对西班牙的蛮横无耻的干涉日益加剧的情况，于9月初宣布决定向西班牙共和国销售武器。苏联的武器于10月底运抵西班牙；随着武器到来的有技术人员，还有苏联和国外的军人、飞行员和志愿人员。从法西斯政权统治下的国家逃亡到苏联的数以百计的共产党骨干动身赴西班牙。这是成立国际纵队的开始。

法西斯和纳粹的干涉已经十分猖獗。在齐亚诺和冯·瑙伊拉特的柏林会谈中，德国和意大利已经分好了任务。德国人派遣了一个叫作神鹰的军团，只有6千人，但装备非常现代化，特别是拥有一支强大的空军，其任务是去试验摧毁性的轰炸新技术，像后来在格尔尼卡所发生的那样。意大利干涉具有大规模的特点，它派遣到西班牙的共有7万人。意大利海军的干涉是大规模的，它帮助弥补了佛朗哥由于西班牙海军对共和国事业的忠诚而蒙受的损失。不久，意大利海军的活动就转到阻挠从海路运往西班牙的供应品。 303

西班牙事件在意大利政治流亡者当中引起了很大的激动。卡洛·罗塞利首先觉察到西班牙爆发的冲突对于意大利的重要性。他曾立即指出，西班牙革命就是我们的革命；意大利革命者的岗位在西班牙。当时，他只限于建议派遣技术人员。7月28日，在巴黎召开了意大利共产党人、社会党人、最高纲领派人士、正义与自由组织、无政府主义者的会议，号召意大利流亡者开展大规模的声援运动，并建议通过派遣技术人员乃至军事人员的办法立即进行强有力的干预。

最初，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都由于有国际方面的某些担心而

没有立即行动起来：共产党人的担心是出于共产国际所持的态度；社会党人的担心是由于需要避免使布鲁姆政府的困难加剧。但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注视马德里的合法政府，因而他们使人民声援的成果都汇集到这个政府方面来。正义与自由组织、最高纲领派和无政府主义者立即宣布要组织一支意大利军团，目的是使战争取得革命性的发展。因此，他们转向巴塞罗那，那是不受政府在政治上控制的一个自主的中心，在那里，聚集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周围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派分子起初曾占有突出的地位。这是一种分裂行动，削弱了意大利反法西斯运动的统一努力；这种分裂很难弥合，而且造成有害的后果。

这期间，意大利反法西斯人士参加最初几次战斗的消息传到了巴黎；这些反法西斯人士早已到达斗争的地点，并参加斗争，在军队中作战。共产党人维托里奥·维达利（即卡洛斯^①）担任了第五团的政治委员，该团被公认为“模范团”，有1千名工人，在马德里保卫战中战斗在最前列。

304 在最先阵亡者中有社会党人费尔迪南多·德罗萨，这个年轻人1929年在布鲁塞尔曾试图暗杀翁贝尔托太子。他当时被判刑七年，三年后获释，逃到西班牙；他曾参加阿斯图利亚起义因而被判刑九年。1936年2月获释后，他参加了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

9月16日，他在马德里前线阵亡。9月30日，共和国军队最早的飞行员之一乔尔达诺·维耶佐利也牺牲了。

在最早到达西班牙的人当中有伦佐·朱亚，他是米凯莱·朱亚教授的儿子，曾同都灵的正义与自由小组（维多里奥·福阿）一起被判刑15年。伦佐成功地非法出国，同正义与自由组织断绝关系，逃到了洛桑。但在7月底，他已到达巴塞罗那，加入杜鲁蒂无政

① 卡洛斯系维·维达利当时的绰号。——译者

府主义纵队，后来成为国际纵队的军官，1939年在爱斯特雷马都拉阵亡。还有尼诺·南内蒂，前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曾于1926年被判刑六个月，后参加意大利的共产党，在利帕里又被判刑，但成功地秘密出国，在土伦居住下来。7月20日，他到达巴塞罗那，加入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队伍，很快就成为旅指挥员，后来又担任师指挥员。他的火热的革命生涯于1937年6月骤然中断了，当时他由于在毕尔巴鄂保卫战中负伤而逝世。在最早参加战斗的人们当中有维尔切利市的弗朗切斯科·利昂纳，他曾被特别法庭判刑；他于8月间组建了索齐连队，该连队曾在马德里保卫战中名声大振。

最初一批人的出发、来自前线的消息、最初一批阵亡者的宣布，这一切激励了侨居国外的劳动者的斗志。这些年来，他们一直忍气吞声。一些人响应意大利的共产党的号召，成了职业的革命家。但其他人则不耐烦，他们要战斗，要在行动中补偿那些被迫无所作为的岁月。他们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在沙场上迎击敌人。各反法西斯党派在基层的这种推动下行动起来了。在意大利的共产党内，路易吉·隆哥在党的政治局中表达了要有组织地到西班牙去的要求，他当时是法国、比利时、瑞士和卢森堡等几个共产党内讲意大利语的共产党人小组的负责人。继莱奥·瓦利亚尼之后，第一个工作委员会被派到西班牙，其中有贾科莫·佩莱格里尼、奥斯瓦尔多·内加维莱、弗朗切斯科·斯科蒂、埃托雷·格拉西。他们的第一个报告最后曾要求尽快派遣志愿人员到西班牙参战，甚至以意大利共产党人的身份参加也行。

正义与自由组织头一个到达，这一点使该组织有资格长期正当地自我夸耀。阿尔多·加罗西是被卡洛·罗塞利派往西班牙的一个人，而罗塞利不久也就在巴塞罗那和他碰头。很快成立了第一支意大利纵队，交由共和党人马里奥·安杰洛尼指挥。该纵队参加了皮拉托山（胡埃斯卡）的战斗，指挥员是8月28日最初阵

305 亡者中的一个，同他一起的还有其它一些意大利战士。

意大利的共产党行动缓慢得多，但更加有组织，而且在政治上符合西班牙共产党的要求。如果意大利战斗人员要到西班牙，他们的活动就要恪守马德里政府的指示，以免造成引起担心和磨擦的新原因。8月，隆哥在马德里同西班牙共产党领导进行了接触。他了解，必须以意大利共产党人和反法西斯人士的身份出现在西班牙，但要编入西班牙军队，以便作出有效的贡献。要真正援助西班牙，而不要为了自己的政治打算而利用西班牙。必须消除互不联系的行动阶段。9月18日，隆哥把意大利的共产党党旗献给了第五团。

社会党国际代表团成员彼特罗·南尼也在8月间出访。他同整个欧洲左翼一起要求社会主义工人国际采取更坚定地支持西班牙共和国的态度和执行同共产党人团结的政策。

三、国际纵队

由于意大利的共产党的主动性，意大利反法西斯运动的干预有了更有成效和更有组织的形式。在法国，意大利人成立了一个援助西班牙人民统一委员会，由朱利奥·切雷蒂^①领导，并同法国共产党的行动密切配合。9月底，隆哥重返西班牙。但共产国际不久就决定在西班牙组织国际纵队。9月15日，斯大林声明，如违反不干涉条约的行为不立即停止，苏联将声明不受任何义务的约束。

国际纵队的指挥部和队址设在阿尔巴塞特。不到一个月，许多国家成千上万的志愿人员被编入该纵队，工作进行得很紧张，并

^① 朱·切雷蒂，已故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曾任意大利全国合作社联盟首任主席。——译者

具有非凡的运筹能力。国际纵队必须编入西班牙正规军，并按国家组建为营。但规定在国际部队中西班牙人要占一定的比例：1937年春，这个比例达到35%，到战争结束时则上升到80%。罗阿西奥^①是意大利营的首任政治委员，该营暂编入第一旅。意大利营取名加里波第营，后来加入了第十二旅。在第十一国际旅中也有意大利战斗人员，其中有尼科莱蒂政治委员（即朱塞佩·迪维多里奥）。其他意大利人编在第十五国际旅。在参谋部内有韦利奥·斯帕诺和最年轻的旅政治委员卡门（即朱利亚诺·巴叶塔）^②。

意大利志愿人员编入国际纵队和西班牙正规军一事曾引起一些争论。在巴黎，反法西斯党派已同意组建一个意大利军团，并任命帕恰尔迪为指挥员。到达西班牙后，帕恰尔迪不同意把意大利营编入国际部队。意大利营在人员未滿和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被仓促派到马德里。加里波第营的人员于11月13日已在马德里前线参加塞尔罗—德洛斯—安赫尔斯的战斗。头一次交战非常激烈。1月5日，圭多·皮切利在圣克利斯托瓦尔阵亡；他在1922年8月曾是帕尔马市^③奥尔特雷托伦特保卫战的组织者。他的牺牲把无产阶级的殊死抵抗同新的反法西斯战争直接联系起来。

3月，参加佛朗哥部队进攻行列的几个法西斯师企图打开走向马德里的通道。但它们遇到了共和国强大的守军，加里波第营参加了这支守卫部队。加里波第营的战士同法西斯分子进行了激战。他们的攻势猛烈，并辅以对法西斯官兵开展政治工作，用架设在卡车上的扩音器播送对法西斯官兵的呼吁，并由共和国飞机散

① 罗阿西奥，名安东尼奥，已故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译者

② 韦·斯帕诺，已故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朱·巴叶塔，已故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贾·巴叶塔之弟。——译者

③ 帕尔马，意大利中部城市，奥尔特雷托伦特为该市一市区，当时曾进行反法西斯浴血战斗。——译者

发传单。1937年3月18日，这几个法西斯师被迫撤退，把数以百计的俘虏留在加里波第营战士手里。加里波第营在瓜达拉哈拉获胜的消息通过意大利语广播传到了意大利，使反法西斯人士欢欣鼓舞；这些反法西斯人士怀着焦急的心情收听并传递用收音机收集到的消息。按照卡洛·罗塞利的说法，这像是一种预演，今天在西班牙，明天则在意大利。但罗塞利的话只表达一种愿望和希望。事后表明，道路还是漫长的。

307 国际纵队的组建需要几个星期。斯大林在8月底那几天决定向西班牙共和国提供具体的援助，供应武器、军用品，派遣技术人员、文职人员和军事人员，从那时算起，一个多月已经过去了。斯大林致西班牙共产党书记何塞·迪亚斯的电报指明，西班牙的事业是全体先进和进步人类的事业。斯大林的干预有助于促进有效的援助行动（包括捐款、医药、武器），并使人们广泛地立即行动起来，奔赴西班牙；这些人来自欧洲所有的国家，也有来自美洲，乃至澳大利亚的。早在10月初，以各种办法（往往是地下途径）到达的战斗人员就在阿尔巴塞特基地逐渐集结起来。迅速地开展如此广泛的动员表明当时斯大林拥有何等的领导能力和个人威望。

8月间，在莫斯科举行了第一次公审，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判处了死刑，其罪名是共谋暗杀基洛夫。这次公审引起了人们的疑问，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托派和社会民主党人以及社会党人也提出了批评，这些批评事实上是很有分寸的；然而，既然斯大林能够通过他的个人决定促使人们如此迅速而有力地集中意志去达到他所指出的目标，那么上述疑问和批评也就触动不了斯大林的权威了。

下述事实解释了斯大林的第一次公审所受到的批评何以如此温和：苏联是准备向西班牙共和国销售武器的唯一国家，这是通过通常的贸易换取黄金的买卖，然而这个交易具有明确的政治含义。

正如参加西班牙政府的那批共党分子所承认的，苏联是准备冒外交和政治风险给共和制的西班牙提供武器的唯一国家，这些武器是对付佛朗哥叛乱的保卫战所必需的条件，而那些自称为民主国家者却拒绝提供这些武器。

战争期间，来自好些国家的大约 5 万名志愿人员来到西班牙，当然他们不只是共产党人，但所有人都接受共产国际的组织工作。尽管人们注意使不同政治组织的人联合组成指挥部，实际的指挥权却依然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在一个共产党还弱小、社会党和无政府主义组织却更为强大的国家中，上述事实就免不了要造成政治上的复杂情况，带来越来越多的导致磨擦的原因。

308

国际纵队的组建加剧了组织在共产党和社会党中的左派同无政府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极端势力之间的论战，前者支持马德里的中央政府，后者在巴塞罗那拥有他们的中心。政治上的争执由于存在加泰罗尼亚民族问题和要求自治的势力而加剧了。

争执涉及好些问题。首先就是领导作战的问题。共产党人在支持政府方面比那些举棋不定、分成派系的社会党人更为彻底；他们支持政府努力实现对作战的集中和统一的指挥，支持政府努力保证最严格的纪律以及把民兵、党组织和国际纵队纳入正规军范围。这是一场艰巨的战斗。对于遵守纪律的要求，甚至意大利共产党人也有所违抗。加里波第旅政治委员、共产党人伊利奥·巴龙蒂尼被立即撤职的例子是众所周知的，他的罪名是：由于他的队伍被迫在倾盆大雨中等待视察达数小时之久，而视察人员又迟迟未到，于是他就叫队伍撤退了。几小时后，克莱贝尔将军来到，但一个人也没有了。这一严厉措施曾引起激烈的批评。要勇敢无畏的人们接受往往是礼节性的、令人难以理解的纪律规定，那是不容易的。然而，要在现代化战争中战胜有组织的手，就需要有效的协调。这不是游击战争，而要革命战士理解这个现实，却非易事。

事实上，不守纪律的政治委员伊利奥·巴龙蒂尼后来在意大利的游击战争中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今天人们都会说，如果要打胜仗，就不可能容许在作战方面自作主张，就像特别是在加泰罗尼亚前线上所做的那样，因为在加泰罗尼亚前线上，经常发生战士个人随便进城游逛的事，不是去参加政治集会，就是回家过夜。

四、人民阵线的前景

309 国际纵队提出了不同国籍团体和不同政治团体之间的关系这一非常复杂的问题；上述每个团体都想突出本民族的特点和本党的作用。因此，为了使国际纵队能够积极行动，纵队的领导要求实行政治上可以接受的自觉纪律以及采取坚定和灵活的行动。在这一点上，路易吉·隆哥是很出色的，他成了整个国际纵队的监察长。

然而，在纪律问题以及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之间的争执问题背后，还存在着政治前景这一中心问题。政府和人民阵线的多数认为，由叛乱引起的这场战争应当恢复共和国的合法性，恢复已遭到意大利和德国的武装干涉蹂躏的西班牙的民族独立。这不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战争，而是争取民主和民族独立的战争。当然，有一些改革要进行，首先是肃清封建残余的改革，特别是土地改革。但是，这些改革的实施也取决于战争的要求和为战争调动全国一切经济资源的需要。正是由于需要给国家供应粮食以满足作战之需，土地改革就有了一个新的理由。而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派分子则主张推进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在战争过程中就施行社会主义的措施，如农业集体化和管理工厂，而且不仅仅是管理倒向佛朗哥的厂主所抛弃的工厂。

因此，共产党人主张执行广泛的民族民主团结的政策，停止一

切不仅会破坏共和国纪律，而且最后也会把中等阶层推到佛朗哥一边的活动。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派分子则从下述论断出发：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一场社会革命；他们认为，为了防止反动派取得胜利，应当建立自由化类型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托洛茨基公开主张的论点是以西班牙革命和十月革命相似这一非现实的想法为依据的，按照这个论点，必须提出更先进的目标，如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使群众得到更大的动力去进行斗争。这是仍然时常被提出来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为了有效地动员群众，必须有先进的目标，而这些目标显然不是根据客观需要提出来的，因而也是不可信的，这些目标只会缩小阵线，充其量只能调动人数很少的先锋队，把很大一部分工人阶级推出去，把那些应被号召走上沙场去自主地对斗争作出决定性贡献的力量排除在外。³¹⁰

必须使斗争激化的论点受到共产党人坚决反对，也受到社会党人的批评（尽管他们经常在宣传上向革命辞藻让步），但是，这个论点却受到对来自巴塞罗那的自由主义号召很敏感的卡洛·罗塞利的某种欢迎。此外，他还担心国际纵队所规定的（更确切地说，是正在规定中的）军事纪律乃至政治纪律，最终会缩小正义与自由的活动余地，并削弱意大利志愿人员的民族特色。1936年11月13日，他在巴塞罗那广播电台发出的著名呼吁恰当地强调了这种民族特色，当时他提出了一个口号：“今天在西班牙，明天则在意大利。”但是，在同一个呼吁中，罗塞利却把当时在进行斗争的民主的西班牙称为无产阶级的西班牙。不论如何，一位意大利反法西斯人士在通过无线电广播向意大利反法西斯听众讲话时竟然证实了法西斯主义所炮制的布尔什维克和反基督教的“赤色西班牙”的形象，总是不合适的，因为不仅是法西斯分子而且还有梵蒂冈上层人士都在说：要同“赤色西班牙”斗争，以保卫文明和信仰。罗塞利在他的讲话中对西班牙人民所进行的战争的性质的判断同对共产党的下

述主张的拒绝混杂在一起：共产党认为，必须使反法西斯在野党派同新的法西斯内部反对派相结合，而这种结合只能在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斗争基础上才能实现；西班牙共和国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战斗的。

在西班牙，由于惊心动魄的局势所造成的高度紧张和暴力行为，使法国左派也感到不安的一个问题被公开地提出来了，而且是作为生死攸关的问题严酷地提出来。这个问题就是：在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激进党人的选举基础上以及在工人阶级、农民以及中等阶层在社会方面形成的联盟其前景究竟如何？当然，这个前景不可能是社会主义革命前景，因为一些参加联盟的力量（激进党人和社会党右派）不同意这样的前景，而且无论在法国（那里，一部分资产阶级决心不惜采取任何手段阻止人民运动采取这个步骤，甚至宁可要希特勒而不要布鲁姆），还是在欧洲，都缺少这样的条件，而当时，苏联正处在执行几个五年计划和斯大林进行镇压的艰难局面之下，处境孤立，受到包围，法西斯国家则在进行侵略扩张，英国也一味寻求同德国的妥协。因此，正如共产党人所主张的那样，左翼力量应当孤立那些随时准备背叛民族独立以便依靠外国援助来扼杀民主自由的最反动集团，并谋求实现人民力量最广泛的联合。

人民阵线由于其成分以及由于有相当多的资产阶级政党参加，只能提出加强民主、改善生活和劳动条件以及维护和平与民族独立等目标；这一事实并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意味着人民阵线只具有防御作用。法国在最初几个星期所取得的成果已经大大改变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使之有利于前者。但是人民阵线的进步作用并不局限于这些重要成就。

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团结打破了那种曾经使社会民主党同资产阶级政党集团联系起来的从属关系。当然，无论是统一行动还是

打破上述从属关系，都不能认为是已经完成以及不可逆转。种种情况表明，这些新的关系是不稳定的。然而，自从共产国际成立以来就在工人阶级当中起作用的那些趋势的扭转，以及那些反对顽固的分裂主义并表明能够克服这种分裂主义的新团结势头的重新出现，这种情况正如陶里亚蒂指出的，表明已经有可能以新的方式提出政权问题。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共产党方面没有任何人表示愿意收回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目标。统一战线政府和人民阵线政府本身被认为是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阶段和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些因素。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一把火烧掉了中间阶段和过渡性目标以后，在保持最终目标的同时，现在已经把注意力集中到为创造条件以便有可能把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具体政治目标而不是作为宣传口号提出来所必需的进程上了。然而，事实上，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提法不仅从当时的鼓动中，而且从宣传和政策制定中都消失了。

由于注意力集中到保卫和加强民主的问题上，这就促使人们 312
去研究新民主、进步民主的特点，而这种民主的主要特点看来就是成为国家领导力量的工人阶级所起的作用。工人阶级在争取民主斗争中的领导权开辟了进步民主的前景，而进步民主正是为了自身的发展，才提出了社会改革和革新的目标。当然，当时并非所有的事情都已经一清二楚，甚至在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心目中也是如此。但是，在40年之后的今天，可以看出，在1934—1936年那短短的几年中，共产党人的方针在事态发展的压力下已经发生了变化。开展政治行动的必要性促使他们把纯属宣传性的、公式主义的和宗派主义的旧东西搁置一旁，而去寻求一些新的主张，这些主张能体现对符合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本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所进行的探索。

在西班牙，作战的任务使共产党政策的变化变得更为明显。陶里亚蒂在1936年11月《工人国家》发表的《论西班牙革命的特殊性》一文中，指出了西班牙革命的民主、民族和反法西斯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消灭旧的封建关系，但要用新的方式，即要依靠工人阶级的首创精神并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来进行所有这些工作。

人民阵线改变了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并使工人取得了领导地位，成为领导力量。领导权不仅要在夺取政权的时刻实现，而且也要在创造夺取政权的条件的过程中获得。始终存在着“两个阶段”，但第一个阶段要有具体性和深刻性，而且在时间上要延长，而第二个阶段则像终极目标那样，是遥远而渺茫的。这是把前景分成两个部分，这种情况后来在工人运动中曾长期存在，而且助长了两面性^①，这种两面性曾为人们自觉地认识到，但很迟才加以克服。重要的是要抓住这个过程的开端，这个开端并非可以任意选择和妄加推断的，它是作为一种客观必然性在斗争现实中出现的。

313 进步民主将赋予旧的议会机构以新的特点，这个新特点将由人民最广泛地不断地参与国家大事和在工厂、农村和城市成立统一的人民行动机关来加以保证。进步民主的特点表现在从工会到更广泛的文化、娱乐、救济各方面的结社得到扩大以及青年和妇女自主地组织起来。新的民主应当是一种有组织的民主，在这种民主中，政治不能仅仅归结为投票，而是要扩大和延伸到生活的一切领域。当然，在工人运动拥有悠久结社生活的国家中，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革命早已创立了使工人运动得以通过自己的斗争取得结社、罢工和出版等自由的国家中，要实现上述民主，困难较少一

^① 这里“两面性”指意大利共产党内对社会主义革命和民主革命两个阶段的认识曾在较长时间内认识模糊，有人长期把“民主革命”视为暂时的策略，一心只图立即夺取政权。——译者

些。工人阶级同城乡中等阶层的联盟要求执行一种旨在为革新纲领争取到最广泛民意支持的政策。正是这种谋求民意支持和为取得多数而付出努力的做法，将通过自身经验开辟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新前景。

第十三章 黑暗的一年

一、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的暴动

在西班牙1937年战火纷飞的春天,由于战争需要刻不容缓,对西班牙革命如何发展提出不同战略主张的情况竟成为导致剧烈冲突的根由,而这些冲突的暂时解决并不是靠说理,而是靠动用武力。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派分子当时曾采取具体行动,企图把反法西斯运动同法西斯主义的军事斗争前线变为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的斗争前线,其结果将是断送工人阶级的政治社会联盟体系并为法西斯主义获胜提供方便,而共和国政府尽管朝不保夕、举棋不定,却仍代表着工人阶级与中等阶层的联盟,它针对采取上述行动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派分子,作出了极其严酷的回答。

理论上的争执这时已成为要重新树立共和权力的权威和打破建立不同对立的权力中心的任何企图的行为。这场冲突以5月3—6日的巴塞罗那事件而悲惨地结束了。中央军事当局采取了措施,把巴塞罗那电话中心控制在他们手中(当时,这个电话中心一直是由无政府主义组织掌握的),这一措施引起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一部分无政府主义小组的有组织的暴动。

战斗持续了三天,在大量流血牺牲后,暴动失败了。镇压是残酷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被解散了。托派分子被指控策划暴动反对共和国政府,实际上是帮助佛朗哥分子,否定只有一个军事指挥中心的需要。

无政府主义工会组织背弃了暴动分子。不仅共产党人，连社 315
会党人也谴责这场暴动是挑衅，是企图从背后捅共和国一刀。卡
洛·罗塞利的立场比较暧昧：他谴责暴动，但也批评对暴动进行镇
压。这次镇压确实是既残酷又迅速的。斯大林关于要对阶级敌人
的代理人保持革命警惕的观点似乎在巴塞罗那事件中找到了有力的
根据。当时，有人断言，在那几天，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派分
子小组离开了军事前线阵地，到城市参加暴动。由于指控他们同
佛朗哥分子勾结，因此有理由以简便的方法进行暴力镇压。意大利
无政府主义者卡米洛·贝尔内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杀的。马克
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安德烈斯·宁也未经审判就被处死了。

巴塞罗那事件导致了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的倒台（因它在
极端分子组织面前表现得软弱无力而受到指责）和内格林政府的
组成，在这届政府中，统一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影响显得更加强大。
西班牙共产党以最大的努力支持内格林政府，该政府的任务就是
持久地实行民族团结和民主的路线，加强政治纪律，为改善战争前
途进行更有效的军事努力。

共产国际以最大的努力声援西班牙共和国。但是，巴塞罗那
事件引起了批评和焦虑。在西班牙发生的事情，加上在莫斯科的
审讯，向欧洲工人运动提出一个方向问题，即企图把对国内反对派
的政治斗争变成暴力镇压。在非共产党的左翼队伍中间，担心的
原因是共产党的影响在扩大；在战争期间，共产党以它在议会中一
块很小的地盘获得愈来愈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据说它还利用苏联
政府为它提供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使自己获益。西班牙社会党
内大部分人一直是积极反共的，在欧洲社会民主党队伍中反共的
气焰则更为强烈，这种反共情绪从西班牙战争的发展中又得到进
一步助长。

316 在法国，布鲁姆政府于1937年2月曾要求“暂停”，以巩固在1936年6月取得的成果和对付因法国资本外流而引起的货币危机及英国金融集团的对抗。法国共产党人对“不干涉”政策以及政府在右翼和法西斯集团的阴谋面前所表现出的软弱无力感到不满，并对政府的失策进行日益激烈的批评。社会党则不时指责法国共产党耍两面派手法，即：在议会内支持政府，而在国家内又攻击政府。苏联国内继续进行的审讯引起了不安和批评，这种不安和批评当时还是有节制的，但注定要日益毒化共产党与社会党的关系。

为了改善共产党与社会党之间的关系和推进有利于西班牙的更有力的统一行动，季米特洛夫建议共产国际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领导人举行会晤。1937年6月21日，双方在法国与瑞士边境的安纳马斯举行了会晤，但并未超出泛泛承担声援义务的限制。由于社会民主党右翼更加坚决的反对（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英国社会民主党右翼的力量特别强大），社会党代表团不愿采取具体行动。

布鲁姆政府的垮台促使安纳马斯会晤陷于失败。法国共产党批评布鲁姆6月15日为维护法郎而采取的措施（资本大量外流打击了法郎，法郎因而成为一场要求法郎贬值的强大宣传运动的对象）。法国共产党尽管提出上述批评，却仍毫不犹豫地投票赞成政府的这一方案，以避免政府垮台。它甚至还表示愿意参加政府，以便在一个得到加强的政府中承担全部责任。1936年5月，共产党曾拒绝参加布鲁姆政府，而1937年6月，当阵线的联合基础已经破裂时，共产党却又表示愿意参加政府了。这时已为时太晚！激进党人这时已不再愿意支持政府了。布鲁姆提出辞职（1937年6月21日），政府领导权转入激进党人卡米耶·肖当手中。

共产国际决定委派陶里亚蒂去西班牙，任务是向西班牙共产党提供政治帮助。陶里亚蒂在安纳马斯会晤结束后抵达马德里，

非常谨慎地开展他的工作。他以阿尔弗雷多的化名竭力帮助西班牙同志制定一项稳定的政策，挖掘国家的一切经济资源支援战争，开展诸如土地改革之类的改革，这些改革对提高国家生产是必不可少的。陶里亚蒂作为共产国际的最高代表，也负有推进重组国际纵队的任务，目的在于克服各种民族本位主义，推动共和国军队实现更为有效的统一。

重组国际纵队当然也涉及到意大利。帕恰尔迪总是设法强调意大利反法西斯运动参加战争的特殊性，于是他离开了纵队的指挥岗位，其公开的目的是要在美国从事宣传活动，实际上则是不同意意大利志愿人员完全编入西班牙军队和不愿忍受指挥部内日益增长的共产党的影响。帕恰尔迪的去职说明反法西斯各党之间的团结关系在恶化。军事行动的进展使政治困难变得更加严重了。

二、加里波第纵队失利

加里波第纵队参加了由共和国军队发起的反攻，以便稳定中部战线。在布鲁内特和瓜达拉马战役中，加里波第纵队损失惨重。因此，部队的有生力量发生危机。1937年一年之内，纵队中意大利志愿人员的比例下降到20%。此外，总形势也妨碍了志愿人员的大量补充。军事行动的进展变得日益艰难。在桑坦德尔失陷后，10月份北线就崩溃了。军事形势的恶化加剧了政治冲突。法国人民阵线的危机和安纳马斯会晤的失败加深了共产党与社会党之间的鸿沟。虽然西班牙、陶里亚蒂和隆哥不断提出要求，但是，到1937年下半年，意大利志愿人员的补充每月降至八十名。

如果把参加国际纵队的意大利人和参加西班牙军队各类部队的意大利人算在一起，意大利志愿人员约有5千名。编入国际纵队的有3358名，其中3108名属战斗部队。现在只知道2057名战士

318 抵达的日期：1051名于1936年抵达西班牙，726名则是在1937年（310名是在下半年），280名在1938年。关于他们从何处而来，已经查明的2626人中2000多名来自法国，只有223名来自意大利。志愿人员中50%是工人，农民和雇农只有几十人，职员、自由职业者和学生共150名。年龄在30—40岁的占2/3；他们虽然不算年轻，但大部分战士是在艰苦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大约有500名是威尼托人，150名来自南部和岛屿。这些数字表明，大部分志愿人员是在法西斯上台后移居法国的劳动者，他们曾是同法西斯冲锋队进行最后几次殊死战斗中的坚韧不拔而又遭遇不幸的战士，他们随时准备重上战场，同不共戴天的敌人作斗争。作为国际主义者，他们愿意对西班牙人民表示声援，但他们尤其是在自己反法西斯思想的推动下同法西斯黑衫党进行武力交锋的。正是这3000名志愿者曾为意大利游击战争作出伟大卓越的贡献：在西班牙的许许多多加里波第纵队战士后来在游击战争中都占有重要的战斗岗位，他们是：贝尔托·阿尔贝蒂，安杰洛·安东尼尼，维托里奥·巴尔迪尼，伊利奥·巴龙蒂尼，爱丽莎·贝尔维索，乔瓦尼·贝尔托利尼，雷纳托·贝尔托利尼，贾科莫·卡兰德罗内，乔万·巴蒂斯塔·卡内帕，奥贝丹·基耶萨，切萨雷·科隆博，彼特罗·达尔波佐，朱赛佩·迪·维托里奥，埃多阿尔多·多诺弗里奥，卡洛·法里尼，阿尔曼多·费代利，维托里奥·吉尼，阿尔多·兰普雷迪，彼特罗·拉里，弗朗切斯科·利昂纳，路易吉·隆哥，埃托雷·马洛齐，阿里斯托代莫·马涅拉，朱赛佩·马尔凯蒂，瓦斯科·马蒂奥利，马里诺·马采蒂，切萨雷·梅纳里尼，蒂娜·莫多蒂，丽塔·蒙塔尼亚纳，朱赛佩·莫斯卡，奥斯瓦尔多·内加维莱，泰雷萨·诺切，朱赛佩·奥索拉，朱利亚诺·巴叶塔，彼特罗·巴叶塔，贾科莫·佩莱格里尼，阿尔迪托·佩利扎里，乔瓦尼·佩谢，费利切·普拉多内，内洛·波马，马里奥·里奇，安东尼奥·罗阿西奥，迪诺·萨琴蒂，安

东尼奥·萨尔托里, 弗朗切斯科·斯科蒂, 亚历山德罗·西尼加利亚, 韦利奥·斯帕诺, 艾米利奥·苏阿尔迪,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 多梅尼科·托马特, 亚历山德罗·瓦亚, 洛伦佐·瓦内利, 维托里奥·维达利, 费雷尔·维辛廷, 利诺·佐基。

在西班牙进行的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武装斗争路线, 同在意大利试图使反法西斯反对派和新的法西斯内部反对派相“结合”的路线, 二者之间客观上存在明显的差异。“结合”路线虽然取消了有关和解和“黑衫党兄弟”等词语, 却仍要求寻求与一部分劳动者进行初步接触, 这一部分劳动者不仅都参加了法西斯工会和其他组织, 而且仍被看作是法西斯分子, 尽管他们希望改变法西斯政权的性质。从这两条路线的客观对立中, 应当找出说明来自意大利的志愿人员何以不多的原因。确实, 意大利的共产党领导机构曾拒绝那些同国内地下组织保持联系的共产党员多次提出的要求, 以便使党的组织网不致减少有才干的人。当时主张只秘密派出从监狱中或流放地回来的少数党员, 因为人们已经了解他们的底细, 并可能担心他们再次被捕, 但却没有大批志愿人员自发前往的情况。甚至在某些情况下, 直接敦促某些青年团体参加志愿队伍的做法也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319

三、安东尼奥·葛兰西之死

对意大利的共产党领导机构来说, 巴塞罗那事件标志着困难时期的开始。西班牙战争进展不利, 反法西斯各党之间隔阂加深, 法国人民阵线政策陷于危机, 民族和解政策从一开始就受到许多批评而未能得到发展。所有这些导致了共产党领导集团政治上举棋不定的状况, 并很快达到几乎不知所措的地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斯大林 3 月 3 日的讲话宣布提高警惕的一个时期已

经开始,这个时期被猜疑和如下一种论点所主宰:这种论点主张把一切持不同政见的表现都视为替法西斯主义服务的反革命活动。德国和意大利的联盟日益加强,而与此同时,法国和英国则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不能阻止德国迅速地重新武装,它们在反应迟缓和矛盾重重的情况下,不得不仓促加强军备;国际联盟这时也由于制裁德国遭到失败,对热衷战争的现象无能为力。

1937年4月27日,安东尼奥·葛兰西在罗马逝世。他是在假释阶段结束前几天去世的。葛兰西那时已经自由了。他曾计划去撒丁岛疗养并看看他的家庭。但是,他的这些打算都是不具体的,这表明他当时非常疲惫,渴望回到家乡恢复体力。同时,葛兰西与他的朋友斯拉法一起准备提出申请,以求去莫斯科同妻子团聚。长期的折磨、精神上无休止的困扰、个人和政治上的与世隔绝、疾病的痛苦已经把他拖垮了。

3月25日,他的至友皮耶罗·斯拉法最后一次见到他。谈话内容仍然是政治问题。葛兰西在给党的领导机构的一封信中,再次建议在发展人民阵线政策时要以建立立宪议会为目标。这是他给党的领导机构同志们提出的最后一个政治建议。同志们从斯拉法那儿听到安东尼奥健康状况恶化的消息后,建议派一名医术高明的法国医生去罗马。人们甚至打算在葛兰西申请去莫斯科的护照未被接受的情况下,准备让他秘密出国。但是这些计划当时还没有制定出来,也没有做好实施的准备。警察的严密监视和葛兰西拒绝考虑上述建议的态度,特别是他的身体状况,都造成了很大的客观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潜逃会导致一场灾难。

4月25日,他突然大出血,一切计划都化为乌有。4月27日4点10分,葛兰西与世长辞了。4月28日举行了葬礼。遗体在维拉诺火化,骨灰安放在英国公墓。

意大利报纸立刻发表了一条简短的消息。4月28日《人道报》

在巴黎沉痛地宣告了这一消息。消息传到法西斯的监狱里，传到蓬扎岛，传到熟悉葛兰西的业绩、熟悉这位革命领袖的伟大之处的人们那里。被监禁在监狱中和流放在岛屿上的斯科奇马罗、特拉齐尼、利考西、谢嘉、巴叶塔、科隆比以及其他领导人怀着激动的心情举行了简短的追悼会。他的逝世在党的中心，在国外移民和国际工人运动中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实际上，人们对安东尼奥·葛兰西本人的具体情况了解不多。但是他的名字却激发过声势浩大的人民声援运动。他被看作是领袖，被看作是意大利的共产党的创始人（这是人们所希望的，尽管从历史上讲不够确切）；人们知道，他被特别法庭判处20年零4个月的监禁，受到种种疾病的严重摧残，而由于铁窗监禁的折磨和缺乏相应的治疗，他的病情更加恶化了。只有很少一部分老同志真正知道葛兰西的情况，了解他为建党所做的贡献，知道他在罗马代表大会到里昂代表大会期间，曾为引导意大利的共产党走上共产国际的路线和为共产党人指明新的行动方向而进行斗争。

在地下斗争时期入党的党员仅了解葛兰西著作中的少量片断，例如1930年发表在《工人国家》第一期并在国内秘密散发的《南部问题的几个课题》这篇论文。这篇文章成为被监禁在狱中和被流放在岛屿上的同志们组织学习南部问题的基本文件，并为给共产党新的一代指明方向作出了有效的贡献。对意大利社会根本矛盾的揭露，对组成统一国家的评论，同主要对话者贝内代托·克罗切的论战，关于知识分子在组成历史集团方面的作用，为使反法西斯知识分子转向为工人阶级服务而对戈贝蒂的论述，关于同农民和南部居民联盟的问题，关于寻求可能的同盟者的必要性，所有这些都是这篇文章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提出的主张，陶里亚蒂领导下的党很快就吸收了这些主张，因为这个党已经在了解意大利现实的过程中寻求符合本国情况的战略的前提了，尽管当时还受到共

321

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局限。

当时，党还不了解葛兰西在狱中完成的著作。只有陶里亚蒂猜想到葛兰西在狱中的著作的广泛性，因为他曾看到葛兰西从狱中发给他的妻子和妻妹的信，并且从斯拉法那里了解到他与葛兰西的谈话和葛兰西所要的书籍和杂志的单子。葛兰西死后，是他的妻妹塔克娅娜和他的朋友斯拉法保护了他的札记。这些札记最初在友人拉法埃莱·马蒂奥利的帮助下存放在商业银行的保险柜里，1938年夏天转到莫斯科。陶里亚蒂在西班牙时对札记早有耳闻，只是战争时期在莫斯科才亲眼看到这些札记。直到解放以后，葛兰西的著作才被共产党人和意大利人民所了解。在抵抗运动时期形成的、由陶里亚蒂领导的新党，努力探索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开始学习《狱中札记》。葛兰西逝世10周年时，纪念活动的主要内容仍然是他的关于南部问题的论文。正是参与制定和通过宪法的共产党，在1947—1957年这10年当中，为阅读和掌握葛兰西思想集体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葛兰西在10年多的监禁中受到许多痛苦。疾病的长期折磨、多次病危和不断的失眠把他的身体折磨垮了。由于与家庭相距遥远，家人不可能探望，妻子患有精神病，长时间不能正常通信，这些都使葛兰西与家庭的联系变得很困难。妻妹塔吉娅娜的精心照顾也无法弥补他远离妻儿的痛苦。与狱中同志们的联系也不容易，因为他的处境特殊，他要利用机会保护身体和坚持学习。他的本来已经急躁和执拗的性格变得更加孤僻和多疑，这使他与党的中心的关系变得更加困难。葛兰西对那些被委任领导党的同志们想必也并不十分尊敬。葛兰西的被捕中止了他与陶里亚蒂在极其紧张的时刻的关系。格列科于1928年曾像给特拉齐尼和斯科奇马罗写信一样给葛兰西写了一封信，葛兰西收此信时是有怀疑的，这种怀疑始终没有减轻：似乎写信人（对他来说，或许还有其他一些人）

在开庭审判前夕有意加重他的罪名。在关于“转折”方面的政治矛盾，特别是在关于撤销中间阶段这类口号方面的政治矛盾（如建立立宪议会的口号），使葛兰西与意大利的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产生的新领导集团之间的政治隔阂加深了。隆哥和谢嘉是以一贯反对建立立宪议会口号著称的，他们二人的提升使葛兰西与党的中心的关系更加恶化了。葛兰西立刻中断了从图里监狱中开始的讨论，因为他不愿意干预改变党的领导机构决定的路线，但这条路线他是不同意的。他在政治上和精神上受到的孤立变得更加厉害了。

党一直与葛兰西保持着联系，从未抛弃过他，让他听天由命。由于他的妻妹塔吉娅娜身在罗马，这就使苏联大使馆有可能向葛兰西提供保护和物质支持。皮耶罗·斯拉法先是通过陶里亚蒂，后来通过格列科一直与党的中心保持联系。

苏联与意大利交换政治犯的粗略计划也未能实现。葛兰西虽然强烈劝阻声援运动，但这一运动还是取得一些成果，使他从巴里的图里（他在那里从1929年生活到1933年）转移到福尔米亚的库苏马诺博士的诊所。但他的身体日趋恶化。所以在1934年10月，他要求转到另一个诊疗所，但直到1935年8月才被允许转到由普里切利教授领导的罗马圭西萨纳诊疗所。 323

正当保持警惕运动进一步轰轰烈烈地开展时（这一运动是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在3月3日斯大林讲话之后发起的），葛兰西逝世的消息传来了，党的中心决定发表陶里亚蒂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文集。文集于1938年出版，它表达了意大利的共产党领导人对葛兰西的评价，把他视为“20世纪最伟大的人”和“意大利工人阶级的领袖”，同时也指出了当时葛兰西思想在认识上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不仅影响到他在狱中完成的著作，而且也影响到他在1917—1926年青年时期和作为政治领导人时所写的著作。共产国

际发来信电，赞扬他是“布尔什维克一代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但是，当塔斯卡发表葛兰西一封信的片断时，党的中心却表现出忐忑不安的情绪，因为信中批评多数派对少数派进行斗争的方法，这封信是寄给陶里亚蒂转给苏联共产党的。显然，人们担心公布葛兰西信件会引起共产国际对意大利的共产党整个党的批评。后来，当塔斯卡发表这封信的全文时，迪·维托里奥和贝尔蒂等一些同志就认为必须采取主动，并建议对葛兰西的书信进行公开批评。幸而大家当时决定听取陶里亚蒂的意见。陶里亚蒂想必发表了与此相反的意见，或想方设法息事宁人，因为意大利的共产党没有对葛兰西的信件进行公开批评。这件事说明：任何时刻陶里亚蒂的行动都起着决定性作用，无论是阻止传播葛兰西从图里狱中提出的批评，以避免把葛兰西的名字卷到关于“转折”的论战中去，还是在葛兰西逝世后防止他的名字被反斯大林运动所利用，都是如此。陶里亚蒂继承了葛兰西政治和思想的遗产，他希望以“葛兰西的优秀学生”而现身，极力强调自1926年以来意大利的共产党领导的连续性，一方面精心保管和以最恰当的方法介绍《狱中札记》，另一方面把意大利的共产党培育成为一个善于理解和掌握葛兰西教导的党。

四、罗塞利兄弟被害

5月22日，在巴黎联合举行的葛兰西纪念会上，卡洛·罗塞利以正义与自由组织的名义发表讲话。在西班牙人表达不同意见之后，罗塞利激动地参加这次联合集会，这说明他想把他的不同意见保持在维护反法西斯运动团结的限度之内。那是他最后一次的政治演说。几天以后，即1937年6月10日，卡洛·罗塞利和他的兄弟内落在巴尼奥尔-苏尔-洛尔纳温泉被“蒙面

党”^①组织暗杀；“蒙面党”是一个法国右派的地下恐怖组织，它是在意大利法西斯要求下行事的。

罗塞利兄弟之死似乎充分证实了斯大林的“保持革命警惕”的理论，证实了在反对为法西斯效劳的犯罪挑衅组织的斗争中克服任何软弱表现的必要性。卡洛以大胆勇敢著称，但又以慷慨好客、大开门户闻名。他在巴黎居留是合法的，住址是众所周知的，对镇压反法西斯分子警惕委员会的暗探来说，控制他的行动并不困难，而且暗探也能混到出入他家的客人中去。

卡洛和内洛·罗塞利兄弟之死引起广大人们的悲痛。也许，当时对意大利复兴运动历史学家内洛之死未能立即感到是对意大利反法西斯运动一个沉重打击（在意大利，他创立了一个常设行动联络中心）。人们更多地感到的是，卡洛这一重大损失。虽然共产党同正义与自由的这位发起者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对他进行过严厉的指责，而且这些指责时常是冒失的，明显地毫无根据的，但总的来说还是承认这位人物的人品，承认他的慷慨大度和才干。卡洛·罗塞利坚决主张必须把反法西斯行动中心设在意大利，而后来，由于他遭受到种种打击，尤其是由于第一个国内中心（即埃内斯托·罗西和里卡尔多·鲍威尔的中心）成员被捕，他不得不同反法西斯大同盟的各党达成协议，这些党由于采取等待主义，同他那热情奔放、往往也嫌考虑不周的积极态度恰好唱反调。他同意大利社会党达成协议，是试图在社会党这个古老的家注入新的、生气勃勃的因素。但是，国内形势处于低潮过去曾迫使意大利的共产党注意到“转折”行不通，这时也使正义与自由组织无法保持它在国内的联络网。1935年前后发生的最活跃、组织最严密的都灵小组成员的被捕（朱亚、福阿、安德烈斯、卡洛·莱维）更给该

325

^① 蒙面党（La Cagoule）成立于法国人民阵线选举胜利后的1936年，为法国极右翼暴力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成员于1948—1949年受审。——译者

组织以沉重的打击。

在由希特勒胜利引起的痛苦而带有自我批评性质的论战中，罗塞利断绝了正义与自由组织与意大利社会党的联盟，但同时，他又寻求与意大利的共产党建立团结关系。但是，自1934年8月起，意大利的共产党就同意意大利社会党签订了统一行动公约。这样，在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和人民阵线成立以后，共产国际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相互接近，这就使罗塞利陷于孤立，使他对工人运动的传统老党的地位加强而感到不安和担忧，因为在他看来，这些党之间的分裂，它们同国家的联系和对国家的依赖，妨碍它们进行独立的革命探索。他担心，这两个分别参加两个国际的党之间的协议会使意大利反法西斯运动失去在充分独立自主的条件下主动采取必要行动的可能性。

正如后来意大利行动党领导人在1943年后所做的那样，罗塞利总是以某种低估的心理无视这些被称为“传统的”和“老的”党的力量，而这些党却是以牢固的组织关系，以坚持不懈的“不断”努力，数十年如一日，一代一代地承担起父辈的未尽事业，成为真正的劳动者运动的力量。罗塞利不理解党的力量并不在于政治目的，因为政治目的必不可免是临时性的，因而也是多变的；党的力量也不在于意识形态正确与否（如果要把意识形态看成是僵硬的、束缚手脚的教条的话）；党的力量在于它的参加者的意志，在于它的参加者有能力反映一个阶级的利益、情感和希望，同时又有能力建立一个广泛的政治社会联盟体系。

从1934—1937年，罗塞利以明显的政治盲目性多方寻求同反对“老的”社会党改良主义的力量建立接触，从无政府主义者到新社会党团体（如法国的德阿特，比利时的德曼，他们批评老党，但很快又表示愿意靠拢法西斯主义）。但与此同时，罗塞利也拒绝上述派别的反共成见。他甚至愿意同共产党人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

在西班牙,他曾力求加强意大利的行动,认为意大利在行动上的独特性不应因为国际纵队占据优势和意大利志愿人员被编入西班牙军队而被埋没。正是在他大力进行探索的时刻,他却被法西斯刽子手杀害了。他在巴尼奥尔—苏尔—洛尔纳温泉疗养期间,曾进行过一番思考。但是,他无法为解决有关正义与自由的方向和组织工作的严重问题尽力,他把这个问题留给了他最亲密的同志卢苏和加罗西;这些问题后来在意大利左翼当中也仍然得不到解决,上述两位正义和自由成员的不同的、乃至相反的政治遭遇就说明了这一点。

第十四章 斯大林的镇压

一、移民中的共产党人

1937年初，共产党在国内和移民中的活动看来已取得可喜的发展。1936年9月中央委员会会议郑重通过的全国和解政策还没有被共产国际提出的初步批评所压制，也没有公布。从意大利传来了一些积极的消息：反对法西斯在西班牙的干涉的声浪增强了；埃塞俄比亚行动结束后人们感到失望。有关声势浩大的国际声援西班牙人民的运动、苏联的重大援助和国际纵队的成立等消息，促进了共产党组织活动的恢复，而且一般地讲，这些消息也促使反法西斯情绪重新高涨起来。法西斯警察虽然加紧镇压，却不能阻止法西斯在瓜达拉哈拉失败和加里波第纵队胜利的消息使人们感到欢欣鼓舞。巴伦西亚广播电台和巴塞罗那广播电台意大利语广播的消息很快地流传开来，并打破了法西斯新闻检查的屏障。

1936年底到1937年第一季度期间，在西班牙的意大利反法西斯力量达到了顶峰。按照意大利共产党人在1936年8月和9月召开的会议所通过的文件记载（这些文件表明当时对西班牙战争问题很少注意），意大利共产党人的贡献开始时迟缓，后来则变成在
328 数量上是重要的，在政治上也是高质量的。国际纵队内给予意大利共产党人的地位表明了意大利共产党所起的卓越作用，而这也免不了在其他反法西斯党派中引起妒忌和焦虑。

在意大利移民当中，特别是在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和瑞士的

意大利移民当中，党设法建立了更加广泛的基础，并为自己的政治行动寻求更有力的支持（但也日益注意其他国家——突尼斯和美国——的意大利移民）。当时在法国大约有 85 万意大利人，但只有 10% 参加了工会。在 1936 年 6 月的斗争之后，工会会员增加到 13 万人。在意大利移民当中加紧开展亲法西斯活动的不仅有法西斯组织和使领馆的组织，也还有天主教的传教团。一大部分移民同国内保持联系，不愿把桥弄断；他们力图使自己在政治上不受牵连，并同领事馆保持有益的关系。与此同时，许多移民，特别是那些住在法国的时间较长、已经同法国人结婚并有子女在法国学校上学的人，则需要同法国民政当局和法国居民建立良好的关系，从而谋求民主党派，特别是当时执政的民主党派的保护。

意大利移民中很大一部分是工人，小业主、小商人也不少，在某些地区，还有农民。这是缺乏意大利文化的移民，很大一部分人是文盲。大多数不讲意大利语，只讲方言。因此，这是可能容易失掉民族性而且容易被居住国同化的移民。如果说欧洲国家中的一部分意大利移民能够抵御同化趋势的话，那是因为他们仍然依靠一种基本上是政治的坚固纽带——反法西斯情绪——同祖国联系起来。共产党人认为自己可以发挥民族作用，维护移民的意大利本性，使移民更多地参加反法西斯斗争，加强移民同祖国的联系。

由于法国共产党解散了各种语言小组，共产党人在移民群众中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了；这些语言小组是把当时在法国的不同国籍的，并具有自己的工作独立性的共产党员分别编成的。法国共产党由于要发挥它作为民族政党的性质，不能够允许在它的责任下有 10 来个由外国劳动者组成的组织完全自主地活动。因此，329
法国共产党决定，每个共产党人，不论属于哪个国籍，都要同法国共产党员和其他国籍的共产党员一道，加入法国共产党的党组织、工厂支部和地区支部。

这样一来，外国劳动者就直接参加法国共产党的工作了，他们不再处于被隔绝的状态，并从法国人民的斗争经验中受到扎实的民主教育。这种更密切地参加法国劳动者的斗争，尤其是在人民阵线这个伟大经验的时期参加这种斗争，使意大利的共产党员和反法西斯人士得到了团结政策方面的教益，这种教益必将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

当时仍然存在意大利共产党员应当如何在意大利移民群众当中开展工作的问題。为此，他们首先必须参加意大利统一的群众组织的活动。为了进行党的活动，特别是为了进行国内的工作，成立了“工人国家社”；这些社团是在《工人国家》这份共产党杂志读者的基础上成立的，这份杂志给予所有意大利共产党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移居国外——以同样的政治指导。1937年11月在阿格伊召开的会议为“工人国家社”这个新组织制定了组织结构和行动纲领。在阿格伊会议上，估计当时加入法国共产党的意大利共产党人为8000人。

为了在移民群众中开展良好的团结工作，共产党人决定将政治基础很狭窄的旧统一战线委员会改变为一个真正的群众组织，这个组织根据一项协作、互助、娱乐和文化的纲领努力把尽可能多的移民团结起来。这样就成立了人民联合会，提出“和平、面包和自由”的口号，该联合会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目的是要防止意大利特色的旗帜落入法西斯分子之手，亦即落入民族利益的真正敌人之手。

社会党人对意大利共产党人取得领导地位感到担心，他们害怕这个新成立的联合会可能成为确立共产党在反法西斯运动中的领导权的一种新工具。因此，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愿意参加成立这个组织的工作。正义与自由组织也是如此，它从1937年初以来，就同共产党人讨论西班牙革命的性质和意大利反法西斯力量参加保

卫西班牙共和国所产生的种种问题；但作为一个组织，它没有正式参加新联合会。同共和党人达成协议比较容易，因为在进行谈判时，意大利共产党在西班牙同帕恰尔迪的关系还没有遭到破坏。同路易吉·坎波隆吉领导的意大利人权联盟达成的协议是有益的，该联盟同很有声望的法国人权联盟有联系；人权联盟是法国所有民主左翼力量——从激进党人到社会党人乃至一些无政府主义集团——的世俗的中心。领导这个人权联盟的是维克托·巴希教授，他后来和他的妻子一起在里昂被纳粹分子暗杀了。

人民联合会的成立代表大会于1937年3月28和29日在里昂召开，与会代表500多人。被选进领导委员会的有共产党人、共和党人，但也有以个人名义当选的社会党人和正义与自由组织的成员，如西尔维奥·特伦廷。在第二个时期，即在该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在社会党人得到保证他们的重要贡献能为人适当承认之后，社会党人也决定参加人民联合会的活动了。

然而，人们更加广泛地一致参加“人民联合会”并不能取消共产党人给人民联合会印上的政治特色，因为共产党人是这一行动的倡导者。被里昂代表大会选举出来担任人民联合会总书记的是罗马诺·科基(阿达米)，他是当初被意大利的共产党选派来进行人民联合会的组建工作的。科基是天主教徒出身的共产党员，原来是布雷夏地区白色工会的组织者。在人民联合会的活动中，他表现出具有开展联合行动和组织群众运动的真实才干。

反法西斯统一行动在突尼斯取得了异常突出的成果，那里原有的核心组织就是意大利人权联盟分会。1882年突尼斯成为法国的保护国，废除了似乎是久居突尼斯、人数众多的意大利移民所争取到的权利，在这以后，意法两国又签署了协定，使法西斯主义得以控制这里的一些重要机构，特别是学校和医院，因而也就是控制了系统培训意大利殖民的种种手段。而且几乎全部意大利移民

都赞赏法西斯主义所采取的旨在加强意大利国家的威信，从而给
331 全体在国外的本国人提供更有效的保护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
反法西斯分子开展活动，以证明意大利的对外政策是危险的，因为
它客观上是要为战争准备条件，而首当其冲的就是意大利移民，那
是不容易的。当时紧密团结在反法西斯周刊《突尼斯的意大利人》
周围的只有极少数人。从这些人当中涌现出一些英勇战士，后来我
们看到，这些人又在意大利肩负重任，如毛里齐奥·瓦伦齐就是。
1937年9月，共产党领导人、工人朱赛佩·米切利被阿梅里哥·卫
斯普奇海军学校的50来个学员在进行一次讨伐行动中杀害了，这
是粗暴地违反任何国际法规的。这一罪行招致广泛的谴责，但它
也表明，法国的国家机关对日益表现出来的法西斯侵略性是低声
下气和无能为力的。

党为了在意大利移民所提供的基础上在国外建立一个意大利
反法西斯力量的合法代表机构和一个宣传乃至处理政治关系的中心
而展开了活动，在这一活动当中，从1937年初起倡议在巴黎出版
了一份意大利文日报，从而使意大利反法西斯力量在国外有了自
己的声音。这份报纸不应当是党的机关报，而是团结和政治倡议
的中心。由于社会党和正义与自由组织的作梗，也发生了在成立
人民联合会时所遇到的同样的困难。《意大利人之声报》最初的领
导人是埃吉迪奥·杰纳里和路易吉·坎波隆吉。第一期于1937年
7月11日出版。后来由朱赛佩·迪·维托里奥和马里奥·蒙塔尼
亚纳接任该报的领导。

只有在1939年3月才出版了另一份意大利文报纸——突尼斯
的《意大利人日报》，这是人权联盟反法西斯团体同一批意大利犹
太富翁共同提供经费出版的；这些犹太富翁原来是法西斯分子，后
来被种族法推到反对派一边。乔治·阿门多拉和韦利奥·斯帕诺
被聘为该报的领导；由于报纸的基础在政治上和财务上存在混杂

现象，报纸存在的时间短暂，而且矛盾重重。

在葛兰西逝世和罗塞利兄弟被害后分别于1937年5月22日和6月在巴黎举行的两次大规模的哀悼活动和斗争集会表明，在最严重的时刻，意大利反法西斯力量表现出了多么深广的团结。但是，这个团结是通过意大利的共产党同社会党、共和党、正义与自由组织以及一批最高纲领派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通过人民联合会和意大利人权联盟之间一系列杂乱而矛盾重重的双边关系表现出来的，而且这是一种犬牙交错的团结关系。这种关系变化不定，而且时常受到那种紧张和捉摸不定的总气氛的影响，受到人民阵线的危机和法西斯主义在国际上所取得的胜利的影响。斯大林镇压在意大利反法西斯力量队伍中的影响也是严重的，这场镇压大张旗鼓地宣称要同托派分子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引起并加剧了人们的怀疑、担心和抗议。

罗塞利的继承人，特别是埃米利奥·卢苏（但阿尔贝托·钱卡和阿尔多·加罗西也一样），想要加强正义与自由组织的社会党特色，这就恶化了正义与自由组织和社会党之间的关系。共产党人当时曾使意大利的共产党和社会党统一行动公约在反法西斯运动中起中心作用，并且拒绝把统一行动公约扩大到正义和自由组织，这件事使正义与自由组织成员对共产党人的态度恶化了。因此，1937年6月底召开的社会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是从团结社会党人和最高纲领派老党的多数派于1930年重新合并后算起的）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同共产党的关系问题成了讨论的中心议题。

意大利的共产党向社会党代表大会发出了一封公开信，建议由两党代表成立一个“统一委员会”负责研究合并问题，“目的是加速工人阶级的政治统一”。事实上，这个建议受到了冷遇，甚至以南尼为首的最主张团结的集团也这样对待这个建议。南尼的报告

事实上坚持加强团结政策的必要性，特别是为了适应法西斯猛烈进攻和战争危险加剧所产生的需要。南尼积极评价了共产党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所采取的行动，并由此将社会党列入社会党国际内部营垒中的左翼；他还强调同意大利的共产党统一行动对于争取建立意大利人民阵线的有效性。由于他把人民阵线的公式搬到意大利，这就使他能够同时重申他对全国和解政策的批评。当时，
333 塔斯卡接受同共产党人团结的政策，因为他认为，必须以伦敦—巴黎—莫斯科集团去同柏林—罗马集团抗衡，但他坚持必须同共产党人进行意识形态的论战，以便拯救民主原则并同共产党人划清界线，特别是在苏联现行制度所提出的各种问题上更须如此。莫迪利亚尼同塔斯卡站在一边，而萨拉盖特为了加强统一行动而站在南尼一边。社会党代表大会决定续订并批准1934年的统一行动公约。

1937年7月26日签订的新公约表明3年来团结政策所取得的进展。政治目标的提法是明确的：争取民主和自由，争取在意大利建立“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彻底摧毁反动派和法西斯主义经济基础的民主共和国”。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而指出的手段是所有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和建立人民阵线运动。这种更加广泛的人民团结的条件应当是意大利的共产党和社会党的牢固联系。“两党声明，它们认为统一行动是走向工人阶级单一党的第一步，这种工人阶级单一党是无产阶级反对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的最有力的武器。”这一说法后来一直没有变成任何具体行动；这种愿望后来曾几次重新表现出来，但始终未能消除两党之间的鸿沟。此外，社会党在国内最强大的地下组织——米兰国内中心对接受新公约并不太热情，这也是更为顽强地抗拒这项公约的一种迹象；社会党的米兰国内中心同其他非法团体有联系，在鲁道夫·莫兰迪和卢乔·卢扎托被捕后由欧金尼奥·科洛尔尼领导。科洛尔尼声明，

不能接受共产党人所要求的反托派的纪律。在这个问题上，以及在另外一个对于国内当时行动的目标来说是更加重要的问题亦即同法西斯内部出现的新反对派的关系问题上，社会党国内中心的态度同共产党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

共同文件固然很有限地承认，为了在国内开展群众斗争，甚至可以利用“法西斯主义的一切合法的可能性来达到此目的”，在签订新统一行动公约后，共产党则实际上放弃了全国和解政策的路线。在意大利缺乏能够构成人民阵线结构的有组织的反法西斯政党的同时，却提出把人民阵线公式搬到意大利这一目标并指出民主共和国的目标，就当时来说，根据法西斯主义内部出现的新反对派的政治成熟程度，这个目标是过于先进了，这就使共产党的整个纲领朝着反法西斯这一政治方向激进化了，而这一方向是同陶里亚蒂 1936 年指出的方向截然相反的，当时陶里亚蒂建议的政策是“与其说是反法西斯的，倒不如说是反资本主义的”。334

共产党领导集团在内部讨论时曾试图捍卫立宪议会的口号，把它看成最适当的口号，因为它不排除同天主教徒和保皇党人团结的道路，从而可以实现更广泛的联合，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他们曾试图从政治上证明，上述两个口号虽不等同，但应当而且能够相互协调，但是事实上，立宪议会的口号被取消了。

实际上，主要的注意力是放在移民中的政治斗争问题上（首先是参加保卫西班牙共和国问题），因而也就是放在同其他反法西斯政党领导的关系问题上，这就导致了下述政治后果：即把有关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基础开始出现的政治危机和“新反对派”的形成在国内提出的各种问题，甚至像仅仅是利用“合法的可能性”这样的问题，都摆到了次要的地位。

在 1936 年和 1937 年期间，共产党依靠更大的威望，确立了它在移民反法西斯运动中的作用：它在西班牙享有威信，它成立了人

民联合会，出版了《意大利人之声》日报，续订了同社会党的统一行动公约。但在同一时期，它却牺牲了在意大利国内的政治主动性，也牺牲了实际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的发展。意大利的共产党的优秀干部事实上都在西班牙和法国活动，而且中央（书记处、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的活动本身也日益被吸引到移民的活动所提出的问题上。事实是，在1937年初，共产党领导集团一度陷于政治上的困窘境地，这种困窘很快就变成了极其严重的危机。维护和解政策的主要实质的可能性（不是维护它的错误提法和宣传方面的不能令人满意的说法）、对意大利现实和法西斯主义内部矛盾的分析，这些都由于党中央所处的令人担心的意见分歧状况而受到损害，这种状况主要是由于1937年3月斯大林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发表讲话后发生斯大林进行压制的情况造成的。

二、斯大林的镇压

1936年8月对“十六人”集团的审判开始了斯大林镇压时期，这十六个人被指控同托洛茨基密切勾结，策划了对基洛夫的暗杀。主要被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早从1935年起就被监禁起来了。由于实际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耶夫被杀，可能作证的证人被消灭，所有线索都被消除，基洛夫之死迄今仍然是一个谜。这是不是斯大林要从舞台上除掉一个可能的竞争者的结果呢？虽然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已经提出指控，但这些说法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证明来证实。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被告的供认当然不足为凭。这些供词是用残忍的物质精神暴力，通过党和家庭的讹诈勒逼出来的；今天看来像是一些骇人听闻和杂乱无章的虚构故事。季诺维也夫甚至宣称，他通过托洛茨基主义走到法西斯主义。托洛茨基

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一个变种，而季诺维也夫主义又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一个变种。指控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互相勾结所依据的材料，当时就被流亡国外的托洛茨基以无可辩驳的证明所驳倒。1936年8月24日，这十六个人被判处枪决。

一场审判就这样以处死俄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传奇式领导人而告终，它在国外只引起微弱的反应。

法西斯报纸接受了被判刑者有罪这一说法，其目的是证明：共产党人在他们的内部斗争中使用了多么残酷的方法。国际上的大报特别强调审讯过程中最残忍的表现：在审讯中，被告们竟然以令人毛骨悚然的狂热同原告一方竞赛，提供他们本人被指控犯有罪行的证据。左翼民主报纸和社会党报纸表示反对和怀疑，但没有发动一场谴责运动，这显然是出于不愿给已在破坏人民阵线的那些争执增添其他争执理由。《新前进报》只不过把莫斯科的处决看成“错误和罪过”，而没有深究其原因以进行全面的批判。诚然，就在当时那几个星期当中，苏联政府根据斯大林的决定主动向西班牙共和国提供了政治经济援助，这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共产国际发起了全面的动员，向西班牙派遣志愿军。事实上，苏联被确认为是争取自由与独立的反法西斯斗争的旗手，而同时它又发动了一场可怕的镇压。各种民主力量没有以批判的态度对待这个矛盾，因为它们出于政治或外交的种种原因，有理由为反对希特勒的威胁而谋求同苏联联系。就在那几个星期当中，苏联新宪法通过了，苏联还在国际联盟内致力于推行彻底的和平与裁军政策，这就使人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抱希望。

336

1936年底通过的宪法主要是由布哈林和拉狄克起草的，而不久他们也遭到了镇压。宪法重申了作为唯一革命党的共产党的作用，扩大了民主权利，维护普遍的自由，给公民自由、出版言论自由和公众示威自由提供了保证。正当资本主义世界由于危机和备战

而缩小自由的范围以及法西斯主义取得危险的进展之时，宪法的通过似乎表明，在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在狠狠地打击剥削阶级的残余和帝国主义的奸细，同时也保证人民的大多数在建设社会主义中享有日益广泛的自由和民主。这是当时共产党宣传所作的错误解释。

意大利共产党当时的态度是坚定地、无条件地声援苏联政府和赞同审判的结果。陶里亚蒂认为，这场审判是维护民主、和平、社会主义和革命的必要行动。托洛茨基主义的革命宗派力图打断国际工人阶级同苏联的联系，阻止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引起统一运动的瓦解，阻挠工人阶级同最广泛的人民阶层以及同争取民主的中间阶层结成联盟。意大利共产党人指责意大利托派分子和波尔迪加派同法西斯警察合作。

共产党领导人卡米洛·蒙塔纳里在1934年惨遭暗杀一案，被用来证明法西斯挑拨者和托派分子之间有勾结。内部消息指出，警察曾力图利用波尔迪加分子的消极态度和波尔迪加本人的行为：波尔迪加当时已经退出各种政治活动，法西斯当局甚至允许他在流放地点蓬扎岛上自由自在地干他的工程师职业，而不受当局的阻挠，这一点就成为上述合作使党的地下活动变得更加困难的证明。共产党人得出结论说，工人阶级如果不能把敌人的奸细从自己的内部驱逐出去，就不可能打败敌人。

托洛茨基主义当时被说成是法西斯主义用来阻止反法西斯人士和法西斯左派在他们脱离法西斯主义时走向共产党的一种手段。埃米利奥·塞雷尼在1936年10月写道，托洛茨基主义是法西斯主义对知识分子产生影响的一条途径；塞雷尼认为，意大利出版的像阿瑟·罗森堡的共产主义史或托洛茨基传一类的书籍对意大利知识分子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这类书籍的传播表明，青年要了解俄国革命的一些情况的好奇心在

日益增长,而且在那个时期,这并不妨碍青年知识分子对意大利共产党的注意力和同情心日益增强。

意大利共产党人完全接受斯大林为镇压所作的理论上的辩解。苏维埃国家实力的增长促使正在灭亡的阶级的最后残余进行抵抗。正是由于他们感到已经注定要灭亡,这些旧剥削阶级的残余就求助于破坏活动、暴行和犯罪勾当。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阶级斗争也激烈起来。因此,必须更加密切而严格地保持警惕。敌人的主观奸细和所谓客观奸细之间的区别消失了。因此,所有那些未能实现苏维埃国家提出的目标的人都变成了阶级敌人的客观奸细。党的总路线的反对者不再是应当给予批评和谴责的338机会主义者,而是必须予以消灭的敌人和毫不犹豫地杀死的猛兽。

今天,在事过40年之后,距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也有20年之后,我们应当自问一下:斯大林镇压时期的开始为何在反法西斯党派队伍中引起那么微弱的反应,而且得到意大利共产党人那样深信不疑和热情的赞同。当时存在着法西斯主义,希特勒在取得进展,西方民主国家呈现出无力推行积极维护自由和平政策的一派灰溜溜的景象。当时国际资本主义集团和纳粹主义公开地狼狈为奸,希特勒的密探厚颜无耻地向法国这样的国家的报纸、文化生活和内部的政治斗争渗透。雅各宾党的恐怖例子也起很大的作用,好像这是保障苏维埃国家的独立、反对贵族和资本家阴谋诡计的唯一手段。这些资本家表明他们一直作好准备,为阻止劳动者前进不惜要求外国干涉;希特勒比布鲁姆好。

这就是当时的情况,另外还有来自苏联本身的教训:在内战期间和战后,革命国家之所以能够得到维护,那是归功于用暴力镇压反革命勾当的能力。然而,当时人们没有看出斯大林镇压所发生的质的变化和突变;没有看出:暴力不再被专门用来对付阶级敌人,而是打击党内,打击党的心脏,而且不仅用来对付那些反对实

现党所决定的政策的人，还用来对付那些努力实现这些政策的人。

当意大利国内有能力在近期内达到推翻法西斯主义目标的反对派即使在埃塞俄比亚战争之后也难以恢复元气的时候，当欧洲纳粹主义的威胁正在增长，而实行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却表现出完全没有力量挫败敌人阴谋的时候，在意大利共产党人看来，同苏维埃国家的联系则是唯一可能的依靠，这种联系使意大利的共产党不致被污浊的潮流席卷而去，东飘西荡。

1956年，陶里亚蒂在对《新议论》杂志谈话时就已经试图解释当时决定党的立场的各种原因，从而规定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揭发迫使意大利共产党人不得不作出自我批评的限度。陶里亚蒂提醒说，当时没有什么因素使人可以对被告们准备进行反革命活动一事有什么怀疑。但是，由于使用非法的审查办法，这就促使对托派和右翼反对派进行的正当而有道理的斗争蜕化成为一场镇压，这场镇压必然也要打击那些对反革命活动没有责任的人。这表现出一种严重的倾向，即认为社会主义建设遇到的困难始终是，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来自阶级敌人和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活动与勾当。这就势必使人不去研究造成困难和延误的真正原因，不去承认发生错误的真正根由，从而也就不可能纠正所遵循的路线。

意大利共产党当时不能估量斯大林领导下的苏维埃国家机关进行镇压的全部广泛性。因此，意大利共产党人对于斯大林镇压过程中所犯罪行负有的真正共同责任是政治性和理论性的，即在于无批判地接受斯大林企图用来证明使用暴力的必要性的那些错误理论根据。

第二次审判开始于1937年1月22日，对象是老布尔什维克皮达可夫、拉狄克和索科尔尼科夫领导的一个同托派平行的中心，这次审判标志着斯大林镇压的新阶段。1936年9月前，工会主席托

姆斯基自杀了。后来人们还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获悉奥尔忠尼启则也在1937年2月自杀了；镇压的第一个组织者雅戈达被叶若夫代替了。被告们不再被指控策划推翻国家领导，而被指控企图瓜分国家领导。这时的指控已是说他们同外国人，同国际法西斯主义和同谍报人员策划，同德国政府和日本政府的代表联系，以便取得帮助推翻斯大林，甚至是不惜以割让乌克兰和远东的领土为代价。皮达可夫、谢列布里亚科夫和其他人被判枪决，而拉狄克和索科尔尼科夫保住了性命，被判处10年徒刑。

国际上对第二次审判的反应仍然是微弱、捉摸不定和互相矛盾的。当时西班牙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而法西斯主义策划国际阴谋的证据每天都明显地出现。甚至塔斯卡在他的日记里都表示相信被告犯罪的可能性，或者至少他并没有说确信他们无辜。亨伯特·德罗兹也声明相信对被告们指控的有效性。正义与自由组织虽然也批评托洛茨基主义并承认托洛茨基不如斯大林，但它只是认为，枪决无辜的对手而不准抗议，这是和反法西斯主义者不相称的一种同谋形式。但是，在莫斯科审判同法西斯勾结的托派时，正是托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在西班牙由于破坏共和国纪律而被指控同法西斯狼狈为奸的时候，这件事曾导致对无政府主义者在巴塞罗那的叛乱的镇压。³⁴⁰

对于像皮达可夫这样的元老们的处决，在苏联共产党内引起了日益增长的不安，这种不安也以批评1937年2—3月的中央委员会会议采取的方针的方式表现出来。起来发言的人当中有布哈林，他大胆地谴责了斯大林为扩大个人权力而采取的行动。在这一届中央委员会会议期间，布哈林和其他人也被捕了。斯大林为了压制任何抵抗，于3月3日发表讲话，题为《争取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他严厉地批评了一些人，说这些人不懂得托洛茨基主义已经不再是劳动阶级的一种政治倾向，而已经变成一帮疯狂而无原

则的破坏者、恐怖主义者、间谍和杀人犯。他们企图装成好的共产党人，搞好工作，但也热衷于钻到领导地位，把自己伪装起来，以便更好地进行破坏。为了打败这类敌人，就必须采用新的办法，必须予以根除和摧毁。缺乏警惕性这时变成离经叛道，错误变成叛党叛国。谁犯错误就变成敌人。

斯大林3月3日的讲话之后，发生了大规模的镇压。1936—1937年之间被捕人数增加到10倍。1934年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有100名委员被消灭。一些人是在1937年2—3月这次中央委员会会议期间被逮捕和消灭的。几个月之内被开除出党、逮捕、判刑和送进集中营的共产党员竟达300名。

341 镇压行动漫无止境。矛头甚至指向了军队；1937年6月，对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进行了审讯。为了削弱苏联军队的力量，德国军队密探编造了伪证，证明图哈切夫斯基叛国。这些伪证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首脑贝奈斯获得，他转给莫斯科，直到交给斯大林。斯大林情愿利用这些证据而不顾镇压会削弱军队，甚至不顾军队的削弱会引起国际后果。法苏军事联盟的敌人也确实利用了镇压在苏联军队内造成的危机来使人们对受到叛国行为危害的军队的实际效力产生怀疑。事实上，对图哈切夫斯基的审讯打击了一大部分的指挥官并在武装力量中引起了深远的后果。1941年6月，当苏联必须抵挡德国的进攻时，许多将军和军官是直接从监狱和集中营派到前线的，他们只受到极短时间的训练。

恐怖已经开始了。1938年3月2日，开始审讯右派和托派集团，审讯布哈林、人民委员会前主席李可夫、雅戈达和拉科夫斯基。21名被告中有18人被判处死刑。

在审判布哈林之后，镇压放松了它那致命的箝制。那时最糟糕的事已经完成。粗略计算，在1936年和1938年两年期间，被消灭的有：列宁领导的政治局全体委员，除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

外；前部长们，两个警察首脑雅戈达和叶若夫，几乎全部苏联驻欧洲和亚洲的大使，以及许多最高级的军事指挥官。1934年召开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1916名代表中，有1013人被捕，而一大部分代表被消灭。在71名中央委员和68名候补中央委员中，有10人在1936年被消灭，98人在1937年和1938年被消灭。整个领导阶级由于它的最高代表的决定而被斩首。

三、斯大林镇压的原因和后果

是什么原因促使斯大林进行如此残暴的消灭呢？人们提出了 342 种种推测，但经过许多考虑和讨论之后，得不出哪一个是唯一的或者至少是决定性的原因。1936年，苏联经济已经积极地度过五年计划最困难的时期；然而，由于希特勒的胜利，国际形势恶化了。战争的危險可能促使斯大林从一开始就把所有这些人消灭掉，因为这些人在发生灾难性的冲突时，由于他们的才能和威望，可能成为危险的竞争者，可能剥夺斯大林的权力。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使苏联人民遭受了难以忍受的痛苦，而且要求对党和国家的领导所犯的严重错误进行无情的纠正。斯大林力图依靠镇压把党的元老们作为他本人首先犯下的错误的替罪羊。

第一个五年计划之所以可能完成，是由于在同左右两种反对派的斗争中，确立了一批由全国的、州的和省的书记组成的新领导干部，这些干部是强硬的，受过斗争锻炼，在处决中冷酷无情。他们大部分是参加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次代表大会被称为胜利者的大会，即五年计划胜利者的大会。这些领导者曾共同分担了斯大林所负的严重责任；在这次代表大会期间，他们表明认识到自己的职责，并愿意在全面领导当中起更大的作用，以避免犯错误，因为随后是要由他们来纠正这些错误的。基洛夫当时是1928—

1934年这段时期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事件中涌现出来的这批新干部当中最有权威的人物。既然镇压的起因是基洛夫遭暗杀，所有曾经表现出想要限制斯大林的权力或者被指责抱有这种意图的人都受到了冲击。从一开始，这个镇压就用来压制确认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胜利者行使新权力的任何可能性。

斯大林的镇压在共产国际内部也产生了恶劣影响。教条主义和不容异己的做法越来越严重了，这影响了共产国际的生活，直到1934年后也未见收敛；1934年那一年，尽管发生很大冲突，共产国际还是走上了广泛联盟团结政策这一新道路，后来，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则公开推行这项政策。当时是有人反对确认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来宣布的这条团结路线的，但是，消除这种抗拒并不是通过政治斗争，而是通过1934年5—6月短短几周中
343 对反对者的消灭。况且也正是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被授予特殊的荣誉，个人迷信也得到了承认；这是党的机构和共产国际逐渐蜕化的一个表现，而且不是唯一的表现。由于设立警察式的严格控制和对被怀疑的人进行隔离和迫害，在共产国际的中心造成了一种猜疑和调查的沉重气氛。

1936年，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当局解散。1937年，则是整个波兰共产党被解散。1938年，德国共产党受到沉重的打击。该党的一些知名领导人，如艾伯兰、雷梅尔、诺伊曼，都被消灭了。对这些人的指控始终是警察渗透、派别活动、缺乏警惕。但是，使诽谤中伤和纯属道德上陷害这一勾当得逞的总的猜疑气氛是有利于警察渗透的。

镇压行动也打击到意大利共产党；由于陶里亚蒂和格列科于1929年犯下的所谓机会主义错误，也由于意大利共产党未能在意大利建立一个能够开展广泛群众行动的强大而持久的地下组织网络，意大利共产党也早就坐在被告席上了。受到镇压的意大利共

产党人约有100来个。由于不可能利用苏联的资料来源，如今还没有研究当时在苏联的意大利共产党人和意大利移民遭受镇压的广泛性和性质。受到镇压之害的大多数意大利人是逃到苏联并从事生产劳动的同志，就是说进行像苏联工人的活动那样的人。当时以外国特务、法西斯间谍为打击对象的镇压想必特别严重地针对外国人，因而也就针对在苏联社会里劳动和生活的意大利人。

“复活的蒂沃利人”丹特·科尔内利曾在西伯利亚流放营里渡过24年，他的回忆录给我们提供了关于他的经历的一幅可怕的图景，但同时也是令人振奋的图景，他在那里始终是坚强的战斗者，从未丧失对人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他是在罗马蒂沃利区法西斯党书记在一次交火当中被打死之后于1922年逃到苏联的；他参加了苏联的生产和政治生活，由于被指控在11年前曾是托洛茨基反对派分子，于1935年被逮捕。他在1960年获释和恢复名誉，最后在1970年回到了意大利。有多少像他这样逃到苏联并分散在辽阔无边的苏联社会里的意大利共产党人，同苏联公民一起分担这种极为艰巨的考验而没有丧失对共产主义前途的信念呢？ 344

然而，同意大利的共产党或共产国际机构直接联系的那一批受到镇压的意大利共产党人毕竟是比较少的。最知名的是诺瓦拉机械工人朱赛佩·里莫拉，他是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驻共产主义青年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曾被特别法庭判了刑。他于1938年初在豪华旅馆被捕，死于狱中，死因至今仍是一个谜。1938年3月4日，保罗·罗博蒂被捕的事同意大利的共产党中央关系最密切。罗博蒂是陶里亚蒂内兄弟，一个熟练工人，移民俱乐部领导人；由于要他承认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交给他的“反革命任务”，人们对他严刑拷打。罗博蒂曾在第一次大战后的都灵工人斗争中，在葛兰西身边和在《新秩序》周刊社里受到锻炼，成为一个革命战士；他在坚强的共产主义信念的鼓舞下，能够英勇坚定地经受住压

力和暴行。他该指控哪一位意共领导人呢？这个行动是要指控和讹诈陶里亚蒂本人呢，还是要用对其他共产党采取的类似措施来威胁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中心呢？

因为无法看到苏联的档案，今天还是不能回答这些问题。陶里亚蒂从1937年6月起就在西班牙，而在镇压最严重时期他不在莫斯科。

在镇压打击之后，共产国际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共产国际过去曾有过生动活泼的政治生活，尽管也出现过关系逐渐紧张和越来越容不得不同意见的迹象，而在莫斯科当时存在的新情况下，已经不可能再有上述的政治生活了。事实上，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执行委员会再也没有召开一年一度的全体会议，这种会议过去曾年复一年地标志着为各国共产党规定的路线所发生的摇摆不定、发展变化或延搁耽误的情况。共产国际领导机关的活动集中在书记处和负责关注各国党工作的几个委员会里。苏联共产党给各国共产党的活动直接发出的指示变得日趋重要了，1939年3月苏联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就出现过这种情况。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向各国共产党发出关于把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旗帜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及在各国推行符合各国不同情况的政策指示，在这个时候，放松一个世界性的集中组织所规定的有约束性的国际主义关系，本来可能是自然的，而且是有好处的。然而，情况恰好相反，在共产国际公开的政治生活有所缓和的同时，苏联共产党严加控制的共产国际领导机关对各党的组织上和行政上的控制却加强了。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苏联安全事务负责人苏联共产党党员叶若夫和莫斯克温参加了共产国际领导机构，这使上述控制甚至具有了警察特征。由于在斯大林镇压过程中共产国际内部建立的那种新关系的性质，意大利的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遭受到许多损害。

斯大林的镇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严重的矛盾。只要各国共产党的中心口号是“阶级斗争”和“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包括武力和暴力）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因而也就是要在工人阶级内部同社会法西斯主义作斗争；苏联存在一个强制性的强硬政权，反对旧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反对外国与阶级敌人的代理人，在全世界共产党人看来，就是一种革命坚定性的保证。革命也要用恐怖来捍卫。但是，当宣传鼓动中已经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目标（即使在理论主张中仍然提出这一目标）并且已经提出独立、自由和民主（即使是新型的进步的民主）时，在苏联通过宪法，对保卫人民多数、反对企图破坏劳动者社会政治成果的敌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性质进行颂扬，看来也是顺理成章的。

然而，这种顺理成章的状况却被镇压打破了，镇压沉重打击的首先正是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干部。纳粹的威胁、战争、希特勒的新暴行都使那个时期的雅各宾式恐怖有很多理由得以存在，这种恐怖看来竟成为苏联的存在和胜利的条件。然而，矛盾仍然从根本346上存在着，它或多或少自觉地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起作用，而共产主义运动却日益受到民族民主性质的战争和游击斗争的令人振奋的经验的推动。这个矛盾的根本之一就是后来长期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身上的那种“两面手法”倾向，它限制着运动的扩展能力；如何彻底克服它是一个新辩证法问题，而这个问题只是到1956年才由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来。

另一方面，斯大林的镇压在共产国际的队伍中造成了一个确实没有预料到的结果，那就是促进各共产党加强同本国群众联系的趋势，加强党的民族和民主的特征。例如，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做法以及铁托为能回到本国进行地下工作而作的努力，就是能说明问题的。

一个共产党在本国越是强大，它就越是能够在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中发挥自主作用，就越是能够更好地抵制从政治上和组织上施加的集权压力，这种压力是顽固不化的，甚至在1943年共产国际正式解散、承认各国共产党完全独立自主和有责任成为本国国家政治生活的决定性力量时，这种压力也还依然存在。

四、斯大林在意大利共产党内的压力

莫斯科进行第二次审判使意大利共产党不得不加紧进行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由于必须支持斯大林在3月3日发表的关于革命警惕性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方针，意大利共产党对全国和解政策不得不重新进行批判性的审查。

1937年2月《工人国家》就已经发表了从莫斯科寄来的朱赛佩·贝尔蒂的一篇文章，贝尔蒂当时在莫斯科领导列宁主义学校意大利部。文章的题目已经清楚地表明了文章的含义：《一帮匪徒》。文章在谴责受审中的皮达可夫和拉狄克时也连带谴责了当时还没有被捕的布哈林和李可夫。贝尔蒂文章的中心内容是颂扬斯大林，
347 强调应当把斯大林的著作看作是和列宁的著作“浑然一体”的篇章。文章就这样开始了批评，它批评意大利的共产党领导集团没有给予斯大林个人以必要的突出地位。贝尔蒂通过这篇文章把自己说成是为颂扬斯大林个人、加强革命警惕性、反对思想政治软弱性、反对意大利的共产党领导在实践上的放纵主义而斗争的旗手。

书记处召开了一次长时间的扩大会议来处理这个问题；会上讨论了从莫斯科来的比博洛蒂的报告；他带来了陶里亚蒂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党的政治活动的批评。

会议于1937年3月4、5日在巴黎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格列科、蒙塔尼亚纳、多扎、丘福利；应邀出席的有诺韦拉、多诺弗里奥、马西尼和马索拉。与会者的名字表明，在那个动荡时期里，

党的领导中心人数有限。陶里亚蒂、隆哥、迪·维托里奥、贝尔蒂和内加维莱因在国际上负有任务而不能前来参加。塞雷尼这一次也不像往常那样被通知来参加书记处的会议。在这个已得不到信任和失掉威信的人数很少的领导集团中，来自莫斯科的批评引起了严重的混乱，最后加剧了同志之间本来已经很紧张的关系。

早在1936—1937年的冬天，格列科就已经纠正了全国和解路线，并放弃了受到批评最多的一些宣传性提法（致“黑衫兄弟们”的呼吁书或提到1919年的法西斯纲领），同时又用新的提法指出一种新民主的前景；这种民主能够摧毁反动派的基础，打破垄断集团的权力和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改革。

1937年3月，在莫斯科事件的压力下，意大利的共产党的领导人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共产国际和陶里亚蒂的批评。由于陶里亚蒂不在，格列科又在政治上犹豫不决而且没有什么权威，党的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甚至是个人不和，从而削弱了党的领导的政治团结；这就使意大利党的领导集团的脆弱性变得越来越明显了。政治上和组织上一再失败以及一些国家的人民阵线建立时曾引起的幻想迅速破灭，这些也使大家感受到压力，包括心理上的压力。

因此，全国和解的口号很快就撤销了，并未遇到多少抗拒，同时还承认了下述严重错误：没有把反对法西斯干涉西班牙的斗争和反对意大利对希特勒的侵略政策所采取的屈从政策的斗争作为党所注意的中心问题。当时还指出，争取民主的斗争是首要目标，然而却没有说明这个目标的内容和口号。陶里亚蒂本来坚持立宪议会的口号（这同葛兰西的最后嘱托是相吻合的），但在同社会党人谈判续订统一行动公约时，事实上却放弃了这个指示，而代之以成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 348

其实，对全国和解政策重新作批判性审查，是在缺乏信心和无条件屈从来自莫斯科的批评这种令人担心的状况下进行的。只有

蒙塔尼亚纳一个人试图避免完全抛弃全国和解政治纲领，这项纲领是中央委员会刚在几个月以前非常郑重地通过的。

事实是，陶里亚蒂对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软弱无力所提出的激烈批评也压倒了其他批评。1937年3月4—5日召开的会议结束时承认，中央委员会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中非常软弱无力，并表示要努力在意大利开展广泛行动，特别是要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这一工具在意大利采取的特殊形式即波尔迪加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所散布的托洛茨基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当时已经传到党的外围，甚至已经侵入党的队伍。

“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中软弱无力”这一问题，很快就成为讨论的中心问题，这个中心问题在1937—1939年三年期间把党的领导集团搞得四分五裂。从莫斯科来的消息加剧了大家神经紧张的状况。这不仅是一些个人的忧虑问题（虽然人们也感到这种忧虑），而是必须拯救意大利的共产党及其政治财富，使之免遭可能来自莫斯科的某些打击，鉴于陶里亚蒂在共产国际中心所持立场，这些打击可能会打破意大利共产党领导的连续性。

由于在1937年那个多事之春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也由于西班牙要求加强声援努力，由于在推行同意大利社会党和正义与自由团结政策方面遇到困难，由于巴塞罗那事件和一些国家人民阵线发生危机，党的中心未能在意大利开展同日益逼近的战争危险的加剧相适应的行动。

1937年11月的中央委员会已经是在政治混乱和神经紧张的气氛下进行的。西班牙战局的发展越来越不利；法国人民阵线的危机由于布鲁姆政府倒台（1937年6月21日）而加剧了。罗马和柏林条约的签署使意大利更加屈从德国。纳粹德国的霸权日趋加强和令人忧虑，这种状况要求开展能打动法西斯“新反对派”的民族感情的大规模行动，而且这种状况也使这种行动成为可能。但

是，抛弃和解政策和注意保持警惕使向法西斯组织渗透和在其中建立联系的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从意大利没有传来能表明斗争精神重新高涨的有关群众行动的消息。人民阵线的口号没有任何实际影响。共产国际的消极评价对意大利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产生了影响，还出现了这种流言蜚语：政治上和组织上之所以没有成绩，是由于挑拨活动可能渗透到党的领导机构。对意大利的共产党机关提出正式指控的是曼努伊尔斯基，他认为，没有取得成绩不仅是由于政治阐释工作做得很糟糕，而且由于挑拨活动已经渗透到党的中心。

1937年春，贝尔蒂第一次来到巴黎。他借这个机会使共产国际机构内流传的批评意大利的共产党对托洛茨基主义所谓长期软弱的言辞变得更加逼人和尖刻。当时那些最高领导人对这些批评的反应是，立即表明站在莫斯科提出的警惕路线一边。但是，这种做法的结果是令人失望的，甚至是令人泄气的。

格列科和多扎为了表明自己完全遵从上述路线，写了两篇关于警惕性问题的文章，结果却引起了新的、更加严厉的批评。多扎的过错是，他利用著名的马利诺夫斯基案件作为反对挑拨活动的斗争的例子；马利诺夫斯基是钻到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沙皇警察的特务，根根列宁的看法，此人为了不暴露自己，不得不做有益于党的事，因为他必须执行党关于非法活动和合法活动相结合的路线。 350

因此，多扎认为，为了有效地自卫以免受到挑拨，首要的准则是政治准则。判断的尺度应当是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迫使挑拨者也进行有益的群众性活动。多扎的见解虽然以列宁的权威作掩护，却被严厉地指责为错误的和危险的。当时有人提出异议：一个挑拨者为了爬上最高的领导职位并在适当的时机进行破坏，可能成功地执行党的路线，甚至可能热诚地捍卫党的路线。贝尔蒂正是提出这种批评的代表，他从莫斯科寄来一篇措词极其严厉的批

评文章,这篇文章也是他个人对组织部负责人多扎的见解的诋毁。贝尔蒂的文章像当头一棒被接受了,谁都没有想到要抵制。有人战战兢兢地试图缓和这篇文章的激烈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格列科的意见占了上风,他认为恰当的做法是,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接受这篇文章,甚至把它作为自己的观点并作为党的书记处的集体文件发表在《工人国家》上。

格列科也因为那篇专谈《两位领袖》的文章而受到批评。格列科的愿望显然是要将列宁和斯大林相提并论,但格列科没有一直使用当时已经成为惯例的“列宁和斯大林的党”这个提法;由于没有准确摆好两位领袖的地位,他被指责说没有给斯大林的作用以应有的正确评价。格列科又一次提供证明(尽管这违反他的本意),说他不善于严格遵从共产国际队伍中享有崇高地位的礼仪,而在那些年月里,这种礼仪在共产党文献中是占有主宰地位的。

多扎的文章发表在1937年11月1日和12月15日两期《工人国家》杂志上;格列科的文章发表在11月1日那一期上。贝尔蒂的批评发表于1938年1月15日。

1938年3月12—16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在令人担心的紧张气氛下召开;当时传来了希特勒采用武力军事入侵奥地利和宣布兼并的消息。这是走向战争的新的的一步吗?在注定要改变欧洲和世界命运的悲惨事件发生前夜,意大利的共产党处境如何呢?出席那次中央委员会会议的21位同志必须对这些突如其来的问题作出解答,而这次会议,由于其成分和主要的精神状态,本身已成为软弱的证明了。

格列科在他的引言报告中指出,在德国吞并奥地利和墨索里尼日益屈从希特勒之后,应由工人阶级担任捍卫民族利益的先锋队。这是要恢复全国和解政策和利用在大学生与意大利人民广大阶层当中正在传播开来的反对意大利屈从德国的激昂感情的一种

尝试。而且甚至在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当中，日益高涨的种族主义运动也遇到程度不同的消极抵抗。法西斯主义的肌体中也发生了危机，虽然当时危机还处于开始状态，但注定是要持续和扩大下去的。墨索里尼过去一向宣称自己是奥地利独立的保护者，而且在1934年2月时曾毫不犹豫地作出姿态，在勃伦纳山口边界上进行军事动员；这时他却寸步难行了，不得不承受既成事实。这时，希特勒德国的威力已经直接压到意大利边界，压到由多数讲德语的公民集居的地区；这不能不成为引起那些不愿放弃维护民族利益路线的人们严重不安的原因。因此，这种情况就为意大利的共产党和意大利反法西斯力量提供了依靠广泛民族团结政策对政权内部的危机进行干预的可能性。

在中央委员会内，贝尔蒂是唯一批评格列科提出的政治方针的人；他再次事先透露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否定看法，即认为意大利的共产党过于坚持维护受到纳粹日益增长的侵略性威胁的民族利益，因而最后放松了反对意大利法西斯帝国主义及其特有的侵略性的斗争。因此，贝尔蒂对格列科的批评，无论在组织方面（在警惕性问题上的错误）还是在政治方面（已经受到共产国际批评的对全国团结政策的让步），都是咄咄逼人的。

格列科和书记处不顾贝尔蒂的警告，坚持民族独立政策的路线。这一次同社会党人和正义与自由成员也达成了协议。意大利的共产党、社会党和正义与自由签署了一份文件，对墨索里尼在允许德国的几个师开到勃伦纳山口边界方面所负的责任进行了谴责。³⁵²由于墨索里尼的责任，意大利屈从了纳粹德国的侵略政策，而这威胁到了意大利的独立本身。这一政策预先提出了抵抗运动的课题，而且其目的是要实现意大利人民的联合，反对民族利益的叛徒——法西斯主义。

纳粹种族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对意大利的渗透，引起了梵蒂冈

日益增长的忧虑；意大利的共产党由于觉察到梵蒂冈态度中的这种忧虑的一些征兆，便向天主教群众发出呼吁，号召他们参加反对法西斯主义促使意大利屈从德国的行径的斗争。共产党向天主教发出的信号在梵蒂冈被接受了。由于利用了安布罗焦·多尼尼在此以前非法进入意大利时所建立的联系，才有可能同梵蒂冈教廷的权威人士建立直接接触，其中有教皇拉特兰学院的讲师马里亚诺·兰波拉阁下。兰波拉阁下是利昂纳十三世国务秘书主教的侄子，同庇护十一世很亲近；他表达了国际关系的恶化和意大利推行种族主义在教廷内引起的忧虑。意大利的共产党的代表埃米利奥·塞雷尼和安布罗焦·多尼尼同高级权威教士的会晤于1938年8月在瑞士楚格区的一所寺院里进行。这个关系没有马上发展起来，这不仅是由于庇护十一世的逝世，而且由于共产党政治路线的方向发生了变化。然而这个关系留下了一些痕迹，后来在1943年7月25日后法西斯主义垮台造成的新形势下，这个关系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1938年，共产党所执行的维护民族独立以及同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作斗争的政策获得了广泛的、越来越多的赞同。共产党人传播了爱国主义口号，如：“德国棍子制服不了意大利”。人们重新肯定了矛头指向罗马和柏林轴心的爱国主义政策的价值。这项政策在一些基层组织曾遭到某些抵制，因而党的领导认为，必须批评那些利用极端的口号反对民族团结政治路线的人。反对极端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就这样同执行民族团结政策的行动益地结合起来了。

353 维护民族利益的爱国主义政策曾受到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指示和斯大林的著名指示（即认为工人阶级应当把资产阶级已抛弃的民族旗帜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鼓舞；这项政策幸运地继续执行下去，尽管不是像必要的那样贯彻始终，甚至在1938年

期间由于共产国际施加的批评压力而被放弃之后，也仍然如此。事实是：党的口号在全国传播缓慢，而地下的党组织，由于长期处于隔绝状态，不能适应党中心的政治方针不断摇摆所造成的指示上的反复变化。因此，当全国和解政策路线已经被放弃时，有的党组织仍然坚持这个 1936 年提出的立场。因此，由于同党中心的联系中断而不了解后来纠正政策的情况，有关反对德国侵略的爱国主义斗争的指示并没有发生变化。到意大利参战以后，民族团结政策才得到了更广泛和更彻底的贯彻。而就在此时，由于共产党领导发生危机，这项政策又很快被压下去了。

就在 1938 年 3 月中央委员会这次会议上，格列科的报告中提出的政治方针，由于他本人在讨论中谈到对党的状况感到担心并有所抱怨，实际上被压下去了。关于必须揭露党中心的队伍内存在的敌人特务的问题被直言不讳地提了出来。既然毫无隐讳地提出了这种怀疑，那又怎样认真地讨论政治路线呢？组织危机终于同政治危机紧密地结合起来了。

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对全党干部——从中央委员到全国地下组织的活动分子——进行整顿。贝尔蒂被委任负责这项监察和整顿的工作；在等待对进行中的工作作出结论期间，还委任他领导组织部和干部部。贝尔蒂感到他本人肩负着由共产国际领导人从季米特洛夫到曼努伊尔斯基委托给他的一项使命，这就是在移民中和在全国实行广泛的反法西斯团结政策，并加倍警惕警察和托洛茨基—布哈林异端的渗透。他立即着手工作并开始审查党的全体干部，首先是责任最大的同志的履历情况。贝尔蒂所作的严重通知常常使书记处会议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审查委员会会议。由于等待发现和揭露钻进党内的敌人特务，国内领导的全部工作实际上陷于严重涣散的状态。

五、中央委员会的解散

当时必须向共产国际领导机关说明情况。同年4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邀请意大利的共产党代表团赴莫斯科研究党的状况。格列科和多扎被派前往；他们两人动身时就已经成为对已经犯下的政治错误负有罪责的人，而且他们还对硬说他们在提高革命警惕性的斗争中表现软弱这一更加严重的政治错误负有罪责。

参加意大利代表团去出席莫斯科会议的还有丘福利、内加维莱、阿莫雷蒂、杰纳里和阿马代西几个同志。由于无法查阅共产国际保存的记录，人们可从意大利的共产党书记处8月会议的记录和参加莫斯科会晤的人提供的情况中了解到关于这次莫斯科会晤情况的详细并经过检查的消息；书记处8月会议是在代表团回来时在巴黎召开的。莫斯科会议，特别是曼努伊尔斯基，对意大利党提出了极其严重的批评。实际上，他们断言挑拨活动已渗入到党内各级组织。他们实际上决定解散中央委员会，成立一个人数有限的“改组中心”，也叫做“意识形态中心”，责成这个中心成立一个人数很少的新中央委员会，并筹备召开党代表会议（这个会议一年后于1939年8月召开）。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作出解散意大利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根据现有文献，是不清楚的。证明有各种各样，而且是混乱的。事实是，中央委员会在1938年3月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而且在莫斯科会议之后，只有负责筹备代表会议的一个人数有限的领导机关在行使其职责。

格列科在8月12日向书记处作了关于代表团莫斯科之行的报告。这次会议是非常令人激动的。

355 格列科由于他在莫斯科执行任务的做法和回来后所做的报告，再次受到批评。会议无论怎样都决定要最后解除多扎的组织

工作和干部工作，并成立由格列科、贝尔蒂、迪·维托里奥和罗阿西奥组成的改组中心。还决定由蒙塔尼亚纳、诺韦拉、丘福利、比博洛蒂和马西尼协助这个中心工作。然而，整个组织状况仍然是混乱的，并不断发生变动。当时决定由贝尔蒂接替格列科担任书记处的负责人，但没有宣布。

在政治上，意大利的共产党书记处接受共产国际对它在1938年3月采取维护本国统一和民族独立的立场所提出的批评，承认这个立场是非常错误的。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对受法西斯帝国主义侵略或者受到侵略威胁的人民来说，维护民族独立的口号是适用的。但法西斯意大利是一个侵略国，侵略过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而不是被侵略国。为了维护被侵略国的本国统一和民族独立，意大利共产党人的任务是，争取使法西斯帝国主义失败而斗争。格列科和领导集团那样迅速接受共产国际提出的批评和毫无抵制地放弃符合意大利形势的立场，这是令人吃惊的，这表明：他们当时确实惊慌失措，或者则是证明：他们害怕意大利的共产党受到打击。共产国际的批评没有理解到法西斯帝国主义在法西斯侵略国家集团中所处的从属地位。在法西斯帝国主义提出的扩张目标和它内在的软弱性之间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后来在战争中爆发了，而且使意大利在为时已晚时，即在战争打到国土上时，脱离了德国；但是，早在1938年，这个矛盾在意大利人民的意识中就已经占有日益突出的地位。意大利引进了种族主义政策，这在法西斯主义内部和支持法西斯的力量集团内部造成了注定会激烈起来的冲突，而共产党的团结政策倡议本应介入这些冲突。

在共产国际的批评中，意大利的共产党的错误被说成是由于过分注意研究新反对派，过分注意建立反法西斯广泛阵线，过分注意反法西斯反对派和法西斯反对派的结合以及联盟政策，据称这种联盟政策会使意大利共产党人无视工人阶级的作用。共产国际

甚至批评下述立场，认为它是机会主义的：这种立场号召到法西斯工会内工作，并把法西斯工会称为“现时期内的工人工会”。事实上，这样一来，又把群众性地下工会这个幽灵召了回来，而人们早已认为，这种工会在不是起义之前的非法条件下是不可能存在的。于是，这种批评就正是要打击那种看来最有可能取得成果的活动，而这种活动的目的就是要利用法西斯主义的矛盾。关于“无视”青年工人的作用和有“知识分子机会主义倾向”的批评被接受了。这个批评是针对格列科，但特别涉及塞雷尼，更确切地说，是批评格列科让塞雷尼有可能使《工人国家》具有他自己的特殊“痕迹”。

贝尔蒂又一次发出更深入一步的打击。他批评意大利的共产党没有一项培养知识分子干部的政策。他甚至指责同党有联系的知识分子没有采取应有的态度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而且在意大利把那些“乌七八糟的人”组织起来，亦即成为挑拨活动的巢穴。埃米利奥·塞雷尼是受到最严厉批评的领导人，因为他被指控影响了格列科和领导集团，而且还因为他被认为在警惕性方面是最暴露自己，从而最易遭受打击的。

意大利的共产党的全部历史都成了问题。贝尔蒂着重提醒说，反对波尔迪加主义的斗争从未深入进行过，甚至当波尔迪加被开除出党时，也是如此；格列科接受了这个批评。贝尔蒂断言，意大利的共产党没有利用对波尔迪加主义和列宁主义分歧的研究去提高党的活动分子和领导人的思想意识水平。贝尔蒂还断言，无论在1924年或1925年，还是1929—1930年，都没有进行深入的斗争，这个事实产生了消极的后果。贝尔蒂提到，曼努伊尔斯基已把意大利的共产党全部最严重的过错重又一一列举出来：葛兰西在1926年致苏联共产党的信，意大利的共产党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斗争中的摇摆，在反对布哈林的斗争中的软弱。格列科承认，应当在这些软弱表现中寻找所犯错误的思想原因和根源。而贝尔

蒂穷追不舍，重新提出葛兰西 1926 年的信件问题，他早已建议对此信进行公开批评。

格列科软弱地设法拯救在陶里亚蒂领导下执行的政策的精华，但却被指控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有人甚至企图免去他在人数有限的改组中心的职务，中伤他在最近几年想利用陶里亚蒂不在之机破坏陶里亚蒂作为全党公认的领袖的地位。

在斯大林加紧控制，这个最困难时刻，这些指责可能是很危险的。正是陶里亚蒂本人在获悉讨论的情况后制止了党中心的瓦解。陶里亚蒂主张，不要继续以诽谤的态度谈论共产党的过去。他使有关批评葛兰西 1926 年信件的建议落空了，并拒绝了把格列科排除出改组中心的企图。陶里亚蒂深知领导中心少数几位幸存的同志之间加剧斗争的严重危险性，并告诫大家必须利用现有的全部力量。在政治上，陶里亚蒂也设法把种种不同的观点概括为一点，即要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路线为准绳。尽管维护民族独立的政策受到批评，他却仍号召大家理解和阐明意大利在法西斯对外政策方针方面产生的对立、从而有可能利用这些分歧的意义；他的这个号召是重要的。

纠正路线是通过 1938 年 10 月 1 日出版的那一期《工人国家》发表的一篇文章来宣布的，文章的标题带有严厉的自我批评味道：《论党的路线的几个严重偏差》。这篇文章具有党书记处正式声明的性质。这件事当时曾在政治流亡者和其他反法西斯政党领导内部引起了若干批评性的议论。全国和解路线固然曾受到意大利社会党和正义与自由组织拒绝，反对意大利屈从德国这一新的民族团结纲领却得到大家一致的赞成。共产党在短短几个月内，根据来自共产国际中心的指示，如此大幅度地突然改变自己的立场，这只能增加共产党路线摇摆所引起的犹豫与不安，而且使当时由于其他原因而发生危机的意大利的共产党和其他反法西斯政党的团结

358

关系变得更加困难了。

六、贝尔蒂的调查

交由贝尔蒂作有关“1935—1938年干部工作”的调查结果，收集在1938年9月起草的报告中；调查结果并没有带来什么耸人听闻的揭露。对于敌人特务可能渗透到党的中心来的怀疑仍然很严重。当然，报告把党的组织状况描绘成一幅极其悲观的图景。报告断言，没有哪一个组织可以认为是牢固的，因为据说所有的组织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警察工作和挑拨活动的破坏。报告说明，党为了把人员和宣传材料送进意大利以及为了接收来自国内的情报而建立的渠道（在意大利的地址，在国外的通讯处，工作方法）是不可靠的；正如国家档案部门收藏的文件今天所证实的，这些渠道有一大部分是警察局所熟悉的和受到警察局监视的。为了获得有用的情报，警察局几乎一直只是监视这些联系渠道，而不去打断它们。因此，调查的积极结果是，停止使用这些渠道和促进寻求新的联系手段。然而，这就要求大大减少中心同国内基层的关系，使它们能够进行改组。

可是，调查无助于达到主要目的，即揭露渗入党中心内的敌人特务。捉摸不定和普遍猜疑的气氛四处传播，然而这种气氛仍然是模糊不清的，而且严重地败坏士气。

为了让党中心的全体同志了解其他同志的历史，把党已经了解的事实也拿来传阅。事实上，没有哪一位领导人在其艰难的经历中能够避免政治性，甚至组织性的错误和过失，而这些错误和过失也无损于他们个人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正直。这些历史中记下的一些事件不再是保密的了，但却助长了恶毒的流言蜚语，这些流言蜚语更直接地打击了某些同志。这种情况造成了广泛的相互不

信任,这种相互不信任则又加剧了士气普遍低落的现象。此外,虽然证实警察局在监视基层组织,但这却并没有推动党的中心寻求新的工作方法和使用刚入党不久并且尚未被列入警察监视名单的一批批同志,反而普遍放松了本应为加强党本身在国内的存在而采取的行动。老的同志受到审查,大部分来自法西斯主义内部的新反对派队伍的新的、年轻同志似乎也不可靠。结果是组织活动日益瘫痪。

调查所使用的办法促使党组织队伍内士气严重低落,这些组织有的是非法的,有的是在移民中进行工作的或多或少合法的组织。重又提出了一些事实,这些事实表明在警察局面前曾有过不坚定的情况,也表明一些同志被逮捕时行为有过错;这些事实在他们写的自传中已经交待过,而且过去也并不认为是应予批评的原因。自传中有一些可以原谅的疏漏,但这也成了受到猛烈批评的原因。在移民中从事合法活动的那些组织(如《意大利人之声》、人民联盟、出版社等)的成员也召开了会议,这些会议具有真正审讯的性质。这些会议中有一次会议竟持续了好几天,在这次会议上,埃米利奥·塞雷尼的行为也受到了无情的审查。由于没有查出他有什么重大问题,这就使审查的做法变得更加恶毒了,它破坏了一个同志的价值,而且最后贬低了他所做贡献的成效,而当时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种贡献。在这次会议上,最固执地谴责塞雷尼的人当中,有一个是阿尔博(即欧金尼奥·比安科,《意大利人之声》的经管人),此人没有多久就暴露是钻进党的中心的一个“镇压反法西斯分子警惕委员会”的间谍。在当时那种气氛下,想减轻批评的严厉程度或者想不接受被认为是错误的结论的任何企图,都遭到了驳斥,被指责为和稀泥、偏袒、警惕性不高等等,以致于虚假的一致最后获得胜利,而这种虚假的一致是信心不足的结果。

其实,整个调查是为了打击格列科,并且为了打击他而先打击

塞雷尼。他们批评格列科让塞雷尼在实际领导《工人国家》方面有过多的权限，该刊本是由蒙塔尼亚纳正式负责的。他们想通过打击塞雷尼去打击党对法西斯组织内部出现的新力量中的青年和知识分子开展的工作。他们想借助于批评对知识分子的工作去打击全国和解政策的组织基础。但塞雷尼个人也遭到了打击。尽管他在1930年的被捕曾结束党组织在那不勒斯遭受的一连串挫折，尽管他曾以坚定的态度挽救那不勒斯的共产党组织的核心，但甚至连他在被捕时的行为也仍受到了可笑的指责（例如说他容忍法西斯分子在监禁他的波焦雷阿勒牢房门上写上假名字）。1930年在那不勒斯同塞雷尼一起被捕的曼利奥·罗西·多里亚也由于在被捕时的行为而受到不公正的开除决定；这个决定也是出于要打击塞雷尼个人。此外，还勒令塞雷尼中断同罗马共产主义青年小组的任何关系。塞雷尼还因为他的妻子塞尼亚同革命社会党人莱奥·西尔贝伯格有亲戚关系而受到指责。宣布开除罗西·多里亚的决定使人震惊，并引起痛心的纷纷议论，而罗西·多里亚本人还得去平息这些议论。

贝尔蒂批评了塞雷尼在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中所作的工作（联盟的情况被认为是糟透了），还贬低了他在罗马所取得的成果，因为据调查报告说，青年联盟是“具有一般的反法西斯倾向”的组织。被认为更不行的是塞雷尼在知识分子工作委员会中进行的工作，这项工作被看成是“特别糟糕”。报告断定，知识分子工作委员会同“不可靠的人”联系，说这些人当中有“许多可疑分子”。对塞雷尼进行批评的原因中包括他曾使用因泰尔维同志（即欧金尼奥·库列尔）。库列尔案件甚至成了指控塞雷尼的主要原因之一。

库列尔于1935年在帕多瓦大学参加共产党的一个支部组织，该支部同党的地下组织有间接的联系。当时罗马的共产党大学生曾设法向法西斯大学生开展活动，争取他们投入一致反对法西斯

的斗争中来,库列尔和这些共产党大学生不同,他努力在法西斯大学生组织中向加入法西斯工会的工人开展活动。他同帕多瓦法西斯大学生组织的报纸《伊尔·博报》的合作关系使他能够研究工会和各行业组织的问题和专题。1937年3月库列尔赴巴黎,同党的中心联系,是帕多瓦共产党组织把他介绍给党的中心的。他作为打入法西斯政权的工会组织和学生组织工作卓有成效的榜样而受到欢迎。库列尔的一篇文章,以乔治·因泰尔维为笔名,发表在(1937年3—4月)《工人国家》第3—4期上;文章的标题为《我们的群众性经济—工会工作和争取民主的斗争》。文章加上了埃吉迪奥·杰纳里的脚注,杰纳里主要想说明这篇文章的重要性,说文章出自一位年轻同志之手;这位同志“经过了对法西斯主义的亲身体验而信奉共产主义”。杰纳里还指出,这种经历带来“优点和缺点”。他批评库列尔的文章中没有谈经济斗争同争取和平与自由的斗争之间的明确联系,这个批评明确指出了库列尔行动的缺点,说他企图根据工会经济主义的纲领进行工作,而没有把经济斗争同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也没有设法加强反法西斯的工人和学生的团结关系。由于这个政治方针,相应地也产生了实际行动上的局限性,即只希望局限在工会内,而没有设法建立更加广泛和巩固的党组织。杰纳里以充满信任的话语结束他的批评:“老共产党人高兴地欢迎青年们参加党的队伍,乔治·因泰尔维正是以他们的名义写这篇文章的,老共产党人还将作一切必要的工作,使这些青年成为思想上和政治上坚强的共产党干部,成为伟大的意大利工人阶级的领导者”。库列尔正是带着这个崇高的祝愿,在同知识分子工作委员会成员讨论了他的工作路线之后,作为一个得到领导承认并授予重任的共产党员返回意大利的。

从1937年8月—1938年8月,库列尔给《伊尔·博报》写了53篇文章。此外,他给巴黎的党中心寄去关于那不勒斯的利托里奥

分子（他在那不勒斯曾同安东尼奥·阿门多拉和马里奥·阿利卡塔见过面）的一些报道和供党的宣传和报刊使用的资料性笔记。1937年12月，他又回到巴黎，在那里他经常同格列科、塞雷尼和多尼尼会晤。当时他已经愿意成为从事地下斗争的一名党的工作人员。同志们的坚持使他确信不应中断他在国内建立的“合法”关系。362 政治局确认委托给他的工作任务，还派他去同社会党国内中心和该党领导合作，也给《前进报》寄去一些文章，目的是为了说服社会党人相信在法西斯组织内开展工作的必要性。但由于种族方面的原因，库列尔于1938年9月被撤掉《伊尔·博报》编辑部中和大学里的职务。库列尔曾同科洛尔尼保持密切的联系；科洛尔尼被捕引起了他的担心，1938年9月，他第三次赴巴黎。

库列尔发现党的中心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受到明显的怀疑。塞雷尼已被撤掉知识分子工作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全国团结政策受到批评，因为它使人低估意大利帝国主义的侵略性质。对缺乏警惕性和布尔什维克化不够等错误，已经开始进行严厉的指责。因泰尔维案件变成了使塞雷尼（和格列科）受到谴责的重大事件。在贝尔蒂题为《1935—1938年干部工作调查的几点情况》的报告中，主要的指责是，塞雷尼（和格列科）允许库列尔同一些可疑分子接近以及库列尔从第一次赴巴黎起就通过科洛尔尼同老孟什维克领导人阿布拉莫维奇一家以及同“托派坏蛋”希尔施曼接触，希尔施曼曾参加德国社会党青年团直到1932年。科洛尔尼是在1931—1932年在柏林大学留学期间同希尔施曼和他的妹妹乌尔苏拉认识的。当时埃米利奥·塞雷尼的兄弟恩佐·塞雷尼也在柏林；恩佐当时曾领导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科洛尔尼是塞雷尼的表兄弟。1931年阿门多拉由于党的委派，曾专程到柏林找他；当时他给阿门多拉提供路费赴米兰，同青年共产党员朱塞佩·博雷蒂联系。上述情况表明，在那个时期，意大利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

为了发展他们各自的地下组织，彼此之间已经存在着合作互助的关系了。

纳粹主义上台以后，希尔施曼兄妹逃亡法国，在那里，乌尔苏拉由阿布拉莫维奇一家接待。她同科洛尔尼结婚后，移居意大利。塞雷尼设法利用希尔施曼这个年轻人去探望其妹的机会托他把两个双底提箱带到意大利，一个带给科洛尔尼本人，另一个带给罗马的保罗·米拉诺；米拉诺和艾玛·坎蒂莫里一起，当时是罗马共产党一个小组的代表人物。贝尔蒂后来对塞雷尼作出上述决定进行了严厉的指责，同时也指责他授权库列尔在一次赴巴黎时曾到阿布拉莫维奇家转达乌尔苏拉·科洛尔尼的问候。 363

1938年秋，库列尔在同科洛尔尼、希尔施曼和阿布拉莫维奇的关系上受到严加审讯。贝尔蒂在他的“调查”中作的结论是，无论由于种族法造成的新形势，还是由于库列尔所保持的可疑关系，都不可再使用他。根据贝尔蒂的看法，也不能把因泰尔维作为党员，而只能作为教育对象。

这样一来，1937年3月曾受到拥抱欢迎的库列尔，在1938—1939年冬就不再被认为是同志而被认为是可疑分子了。那些同库列尔已开始有工作关系的同志（格列科和塞雷尼）都被撤消了领导库列尔的活动的任务。库列尔当时感到，党的中心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发生了某种变化。人们现在明白，埃米利奥·塞雷尼、他的兄弟恩佐（犹太复国主义者）、他的表兄弟科洛尔尼（社会党国内中心负责人，他反对接受反托派的偏见）、德国“托派分子”希尔施曼和俄国孟什维克阿布拉莫维奇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何以能在1938年成为严重违反必要警惕性的例子，而且几乎是典型的案例。但是，这种以所谓客观标准（自传、亲属关系）为依据的疑神疑鬼的警惕性标准无视了人的多种情况的具体性和独特性，这些情况始终是千差万别的，始终要一次又一次地评价的。因此，今天必须提到的

是,这一群国籍和政治倾向都如此不同的人当中,有三个人在解放战争期间在意大利丧生,被法西斯分子和德国人所杀害,他们是:欧金尼奥·库列尔、欧金尼奥·科洛尔尼和恩佐·塞雷尼。第四个人埃米利奥·塞雷尼当时得救了,因为在其妻塞尼亚和党的帮助下,他得以逃脱都灵“新力量”的“致命诡计”。年轻的希尔施曼自愿参加了西班牙战争(如今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因此,对库列尔来说,开始了一个仍然笼罩着一层莫名其妙的幕布的时期。过去说过,有可能派他到埃及去加强意大利共产党人核心,这时,这个可能性也消失了。由于没有职务,又得不到信任,他不得不在1939年2月返回意大利。他是抱着对前途的怎样
364 看法,怀着怎样的心情回到意大利的呢?他为什么在1939年4月同日内瓦的社会党组织接触并会见南尼呢?为什么他竟于同年5月10日在致法拉韦利的信中表露他“要参加社会党这一新做出的,但又是深切的决心”呢?为什么他又在5月12日的信中甚至说自己是“我们党数得上的最严格的社会党人”呢?是他有意在意大利社会党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内推行他个人所主张的反法西斯团结路线以便准备组织上的统一吗?有一种说法认为,党交给他一个任务,即要他依靠双重党籍在社会党内开展工作;这种说法同他离开巴黎的情景无疑是不相符的。此外,在意大利的共产党政治局的同志们当中,对于派遣共产党员到社会党内开展工作是否合适是存在不同看法的,其原因也是为了不致损害两党的团结关系。

人们认为,根据现有文献,很难找到答案。也许应当从库列尔当时丧失信心和茫然失措的心情去寻求解答。他当时是受到怀疑的;“可疑的接触”的责任落在塞雷尼和格列科身上;封闭和猜疑的气氛使库列尔失掉了一切热情。他不得不独自决定应当开展的活动。也许这种心情能说明他所犯密谋活动错误的原因,说明他何以于同年5月中在很开放的法国和瑞士边境上遭在逮捕。这是一

次奇怪的逮捕，它可能是根据一些打入社会党内的情报人员提供的一些信号进行的，库列尔在瑞士逗留期间曾同这些人有过接触。后来库列尔向托诺·赞卡纳罗吐露，他是因为一个奸细告发而被捕的。

瑞士警察释放他之后，人们不知道对他是否采取驱逐出境的措施，还是仅仅通知法西斯当局。但即使是被驱逐，他本来也可以设法返回法国的。然而，由于得悉他的父亲逝世的消息，他回到了意大利。同年6月21日，他到达的里雅斯特，并于6月24日被捕。为什么法西斯警察推迟了几天才拘留他呢？也许是为了监视他所进行的接触。他立即被转移在米兰，6月25日，受到第一次审讯。公安检察长佩鲁齐草拟的于同年12月26日发出的报告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在这份报告中，硬说库列尔招认了一系列事实，主要是关于他同党的中心的关系，他与之联系的共产党和社会党领导人的名字，甚至还有意大利的共产党提供给他用来发送信件到瑞士和法国的通讯处。这份报告的真实性的确是受到怀疑的，因为硬说是库列尔提供的这些情报可能是由“镇压反法西斯分子警惕委员会”用其他手段收集起来的，把这些情报说成是库列尔透露的，正是为了掩盖其他情报来源，因为当时党的中心已经有了奸细，后来被识破了，如《意大利人之声》的经管人阿尔博（即欧金尼奥·比安科）就是。但是今天，在警察档案中已找到了那一年6月25日和29日在米兰审问库列尔的记录。毫无疑问，这些记录中的情况只能是库列尔本人提供的。

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没有保留地认可这些审问记录。首先，审问记录没有采取通常的一问一答的形式，而是名副其实的报告，似乎是库列尔起草的，而他当时才被捕两天，这似乎表明，他不大可能马上屈服。有关同意大利的共产党的关系、一些通讯处、他曾接触过的一些同志的住处、他在巴黎常去的咖啡馆等情况，都是杂乱

无章的，往往是错误的，而且都是涉及一些合法的事情（某些同志的住处）或是法西斯警察局通过其他途径已经知道的事情。但记录中有一部分只能是库列尔提供情况的结果。这一部分情况对于同社会党的关系这个复杂问题给予了新的说明。从库列尔的招供看来，他自认为已经摆脱党的义务，而且既然不同的同志——贝尔蒂或比博洛蒂——所作的指示又相互矛盾，他在回到意大利后就似乎倾向于在社会党内开展独立自主的行动，不受对党的义务约束，并按照他个人对反法西斯团结政策的看法行事，他要在共产党和社会党内开展上述活动，目的是要实现两党在组织上的统一。在第二次审问时，库列尔还透露了他同两个联系人的约会，这两个人曾把双底提箱交给了他；同时，他说明了会面的方式以及由巴黎派来的几位女同志的身份。

但是，6月25日和29日的审问记录并没有证实库列尔招供了在意大利开展的地下活动和国内的联络网。然而，1939年春，库列尔曾同“潮流”组织接触过，而且仍然同帕多瓦的同志们和托诺·赞卡纳罗有联系，同罗马的知识分子同志们也有接触。确凿无疑的是，库列尔的被捕并没有在米兰、帕多瓦和罗马引起什么后果。彼特里洛博士于1940年3月4日写的一份笔录曾断言，有一份由库列尔起草的“关于科洛尔尼颠覆活动的极其详细的大事记”，而且这份大事记曾被警察利用来否决释放科洛尔尼出境，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证明。这份大事记是什么时候写的呢？是在米兰省政务委员会1940年1月13日决定把他送到边界之前吗？还是在他到达文托特内之后？在文托特内，在科洛尔尼夫妇被转移到国内的一个地方（梅尔菲）之前，库列尔曾及时地见到了他们。

要重视库列尔一案，这不仅是由于必须彻底弄清一位注定要成为抵抗运动中战斗的青年一代的象征性人物的行为，而且还由于这个事件很能说明斯大林的压制和党的中心当时形成的那种怀

疑气氛在意大利的共产党内所造成的后果。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只有像埃米利奥·塞雷尼那样久经考验的同志们才能挺得住，他们即使受到不公正的批评和怀疑，也能做到这一点。像库列尔那样的青年，在经受考验时，就显得不那么坚强，他们还有杰纳里在其脚注中所揭露的缺点，特别是有野心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促使他们进行独立的活动，而不等待明确的指示，不善于等待一些同志们提出的看法得到纠正。库列尔在警察局面前所采取的态度只能被认为是屈服，这是道德和政治危机引起的，也是他同党的关系恶化造成的。

事实上，1939年春发生的库列尔事件（这事件至今还不大清楚）、他在政治上的犹豫不决、他那种没有明确目标的徬徨，这些都表明，他身上存在着政治和道德危机。只有抵达文托特内以后，他才解决了这个危机；在文托特内，他找到了一个牢靠的共产党组织，这个党组织使他恢复了对自己和对党的信心。1943年8月底，他离开文托特内去担任青年阵线的领导职务；正是在担任这个职位期间，在1945年起义前夕，他在米兰的一个广场上，被那个小共和国^①的法西斯分子杀害了。 367

贝尔蒂的报告打击和低估了在全国建立若干新的共产党中心这些最重要的事件；这些新的中心是由新近入党的同志们建立的，他们有一大部分来自“新反对派”队伍，他们有能力用新的组织工作方法从事活动，这一活动遍及整个半岛，从都灵到巴勒莫，并且在政治上同青年当中已有的其他团体（社会党、正义与自由、克罗切自由党的团体）的活动联系起来。

诚然，知识分子工作委员会联系的那些同志往往显得“不大可靠”，而且他们当中不乏“许多可疑分子”。必须善于区别未经过法

^① 指墨索里尼于1943年9月在意大利北部成立的萨洛共和国。——译者

西斯阶级而直接成为共产党员的知识青年和来自“新反对派”队伍的知识青年。后者的历史往往是曲折的，往往有一些令人不安的情节；这些人还有一些有雄心的、不切实际的计划，主张按照密探准则，采用两面手法，在法西斯组织内开展工作。他们还往往表现出从他们的知识分子教师那里过分学会弄虚作假的做法。党校可以教育他们，使他们的行为更加坚定和彻底。但上述区别依然存在。在罗马，只消把布法利尼和阿利卡塔二人的历史作一个比较就够了：保罗·布法利尼是从民主反法西斯运动直接参加共产党的，而马里奥·阿利卡塔则是有过一段法西斯经历，然后才参加共产党的，因此，阿利卡塔的历史有更多的波折。

鉴于这些新同志年轻，又是在法西斯组织里成长的，而且往往是突然跳跃到反法西斯立场上的，应当以批判的精神和明智的关心来审查他们的历史，以便不致把一批新的积极分子都关在党的大门之外。在实践中，正是这种更加开放和谅解的方针在国内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也由于党的中心不可能对个人进行任何监视，不可能以学究方式来贯彻有关斯大林所说的警惕性的指示。许多来自法西斯主义的青年，耻于自身的一些可能有的弱点或者曾经顺从过法西斯主义的豪言壮语（这种顺从的做法并不总是必要的），而试图隐瞒某些事情，根据共产党要求每个党员完全真诚坦白的伦理教育，这已经是犯了严重错误。幸而意大利城市中的很多老
368 工人同志，由于没有受到斯大林式的思想压制，都表现出合乎人情的谅解这种崇高素质，因而能够成为这些新党员的能力既深、要求又严的老师。

但是在巴黎，在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时，却盛行严厉的警惕性准则，鼓励把所有人都怀疑成可能的敌人特务。由于害怕在这场反对法西斯主义、支持共产主义的运动中会有“很多坏蛋”（这是贝尔蒂使用的粗话），党的中心在开展地下斗争中宁可避免同意大利

许多城市中成立的新中心保持密切和有约束力的联系，因为它认为，这种联系是危险的。这样一来，党的领导就必须不去充分利用新组织的成立所提供的新的可能性来进行地下工作，而不必再去利用已受警察局监视的旧的联系了。而这种新的可能性的利用，在1943年7月25日^①前后，都是极其广泛的；而这在同年9月8日^②以后则成为“新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发展的条件之一。

新的改组中心不研究这些新经验并从中得出改正旧工作方法的理由，反而准备用旧办法再次在意大利成立一个国内中心，这个中心将由丘福利、马西尼和马索拉建立，首先在米兰和利吉里亚建立两个基地。他们已经做了一定的筹备工作，并在意大利进行了一些非法的考察。但是，1939年3月朱塞佩·托姆贝蒂被捕，这使这个有雄心的计划失败了。托姆贝蒂是党中心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是一个技术性办事处的负责人，掌管一部分秘密工作，负责安排在巴黎的同志们——包括合法的同志——的工作；他还担任司库职务，是个总管，也是党的非法中心同在移民中从事合法活动的各机构之间的联络员。由于他日常同很多人接触，他在工作运转中不再露面一事使许多同志作出合乎情理的有根据的推测：认为他已经非法地到意大利去了。“镇压反法西斯分子警惕委员会”可能当时已经获悉托姆贝蒂不在巴黎。托姆贝蒂一到利古里亚就遭到逮捕（也许有人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他立即作了“妥协”。托姆贝蒂向警察局提供了许多情报，既有关于在巴黎的国外中心的组织情况的情报，又有关于要在意大利建立国内中心的情报，贾科莫·佩莱格里尼刚到利古里亚，就和他的同事玛丽亚·贝尔纳蒂希和费迪亚·萨萨诺一起被捕了。党在利古里亚的旧组织网络遭到了

369

① 系墨索里尼政府倒台的日子。——译者

② 1943年9月8日，德国入侵意大利，从而引起意大利抵抗运动的兴起。——译者

破坏。马索拉在米兰由于他那谨慎而又干练的秘密工作而得以幸免，并把建立国内中心的尝试失败的消息带到了巴黎。

就在这些日子里，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曼努伊尔斯基再次用极其严厉的措辞重申对意大利的共产党的批评，说“必须强调它的重大弱点”。经过两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纠正之后，共产国际的否定看法仍然没有改变。对意大利的共产党的严厉批评以及不承认意大利的共产党所作的努力这种不公正的态度，沉重地打击了已经得悉共产国际的看法的意大利党的积极分子，并且扩散了士气低落和无能为力的情绪。这是这样一种工作造成的恶果：两年来，这种工作进一步削弱了党的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无视“新反对派”的形成在国内提供新的开展工作的可能性。

鉴于形势恶化和战争危险加剧，共产国际曾在1939年2月号号召加紧进行国内的工作；对于这个号召，新的“组织中心”未能积极响应。这个情况可能成为曼努伊尔斯基提出极其严厉的批评的原因之一。事实是，意大利共产党是在组织软弱和政治混乱的严重条件下去经受战争的决定性考验的。

第十五章 痛苦的前夜

370

一、德奥合并

1938年3月12日,德国军队进入奥地利领土,13日德国单方面决定奥地利同德国合并。希特勒的残暴统治越过了第三帝国的疆界。强行移民、肆意逮捕、关入集中营的黑暗时期开始了。疯狂野蛮的镇压矛头指向工人党员、犹太人、知识分子和所有曾支持过奥地利独立事业的人们。这是上演的一幕悲剧。短短的几年内,在欧洲所有的国家,从俄罗斯平原到大西洋沿岸,从挪威的北端到地中海的岛屿,悲剧接二连三地出现。

墨索里尼在德军已经侵犯奥地利边界时才得到消息,他并未表示抗议就接受了这一既成事实。3月16日,他甚至在议会上为德奥合并辩解。他回顾意大利复兴运动的例子,说什么当时皮埃蒙特军队的干预使国家的统一得以实现。1934年采取的那个行动,即引人注目地公开把两个师调到勃伦纳山口边境以支持奥地利的独立的举动,就这样被一笔勾销了。对那些以为希特勒根据意德友好至少会保证维持奥地利独立的人们来说,意大利急剧改变态度是没有道理的。德国的强大力量已经直接威胁到勃伦纳山口边界,这一事实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批评和不安。

意大利有不少大学发生了骚动和风潮。最意味深长的事件发生在罗马大学。当法西斯外交政策的官方评论员温琴佐·加伊达记者在罗马大学讲课时,有个学生,即法西斯党内“新的”持不同政

371

见的代表人物并且是“新事物”运动的主要人物鲁杰罗·赞格兰迪，站起来公开批评意大利没有反对德国吞并奥地利。他得到了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反法西斯组织的学生们的支持。事实上，示威游行就是由这个反法西斯组织发动和组织的。这件事后来曾在巴黎举行的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传达过。这件事是符合保卫民族独立的团结路线的。但是，由于共产国际的批评，意大利的共产党不得不很快放弃了这一路线。

受到多方批评的墨索里尼感到需要出来为政府的行径辩解。于是3月30日，他在众议院议长和众议员参加的一次参议院的隆重会议上提出总体战争前是这样一个涉及面极广的问题。这是一次旨在宣扬军事力量的演说，他强烈呼吁必须使全国严肃地作好准备，以便有秩序地去对付即将来临的严重考验。这完全是夸夸其谈的表现。为了应付这种困难的局面，众议院议长科斯坦佐·齐亚诺除建议创立意大利帝国第一元帅的军衔外未能提出别的建议；这一军衔应授予国王和墨索里尼，这样，他们二人就被置于同等的水平上了。国王不喜欢这个使墨索里尼和他平起平坐的建议。在签署有关的法令之前，他要听取国务会议关于这项立法的意见。当然，国务会议是支持众议院建议的。国王屈服了。这一事件表明了一国二君之间的勾心斗角；一直到1943年7月25日，由于灾难临头，国王才通过逮捕墨索里尼而废除了一国二君的制度。

德奥合并为希特勒在欧洲多瑙河流域各国的扩张开拓了道路。恰恰是英国促使希特勒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的。英国本想把德国的侵略引向东南，特别是引向东方，引向苏联。1938年的2、3月间，英国准备同意大利达成一项协议，尽管艾登反对这样做，并被迫辞职，该协议承认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征服，协调意英两国在地中海、北非和红海的关系。该协议是1938年4月16日签定的，11月16日开始生效；1939年1月，张伯伦首相访问罗马进一步确

认了这一协议。英国努力与意大利建立良好的关系，这就只能加深墨索里尼关于英法联盟软弱的错误判断，促使他更加相信同德国站在一起是有益的，虽然他也试图在二者之间起调解作用。后来慕尼黑会议期间墨索里尼所起的作用使他的这种幻想进一步增长；正是由于这种幻想，四年过后，意大利被卷入两个强大敌对势力的冲突之中。

英国努力同德国达成一项限制德国海军重新武装的协议，因为它希望缓解和消除同希特勒矛盾的原因。

完成德奥合并有利于德国对巴尔干半岛施加与日俱增的压力，而这种压力使意大利在该地区继续进行渗透的政策遇到更大的困难。过去，意大利帝国主义目光盯着巴尔干地区，把它视为自己进行经济政治扩张的场所。但是现在，接受德奥合并就等于向巴尔干各国说明了意大利的软弱和德国日益强大的力量。

法国曾同小协约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执行一条维护由凡尔赛和约所规定的维持现状的路线，并且同苏联签定过互助条约，以便对付希特勒打算用武力改变现存边界的那种政策的威胁。虽然苏联一贯批判在凡尔赛和会上确定的领土现状，但它反对借助武力改变领土现状的论点。当时法国显示出它没有能力执行彻底保卫和平的路线。在列昂·布鲁姆经过短期（1938年3月）重新执政后，成立了达拉第政府。也正是由于达拉第政府中那个同亲纳粹集团有直接联系的外交部长博内所开展的活动，达拉第下决心追随英国政府所选择的投降路线。法国资本的外流和英国金融集团利用法郎贬值所进行的讹诈，加剧了法国的经济危机。但是，法国资产阶级尤其不愿承认工人阶级在1936年6月的斗争日子里所取得的成就。

达拉第一博内政府的组成意味着人民阵线的结束。在激进党人拒绝左翼为同盟者而求得保守集团和右翼集团的支持后，以左 373

翼多数开始的议会再次以右翼多数的形成而告终。人民阵线的结束，在工人阶级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并且使人因许多希望迅速破灭而深感痛苦。这种精神状态为那些亲希特勒的绥靖主义集团的失败主义活动提供了方便。事实上，在法国国内，甚至通过一些左翼集团，像德阿特和马尔凯这样一些新社会党人，特权阶层以及对工人怀有怨恨和嫉妒心的广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层的那种屈膝投降的失败主义日益广泛而有害地扩散开来，这种失败主义表现在“希特勒比布鲁姆好”这一口号上，这就为1940年法国的投降作了准备。

德奥合并轻易得以实现这件事不能不鼓励希特勒继续推行其侵略政策。

二、西班牙共和国的结束

当时，西班牙共和国是西欧唯一抵抗纳粹和法西斯长驱直入的国家。只有苏联同西班牙共和国站在一起。在第二届布鲁姆政府的短暂时期（1938年3月），苏联提供的或用苏联的钱从资本主义国家购买的重要军事装备可以通过法西两国边境运送，因为布鲁姆决定重新开放两国边界，这一决定加速了布鲁姆的最后下台。但是这是最后一批援助。不久，陆地上的边界关闭了；由于意大利舰队的活动，海岸线也被封锁了；日益孤立的西班牙共和国继续坚决地进行光荣的抵抗斗争。最后的希望是：斗争能够延续下去，只要证明纳粹侵略性的越来越多的事件能在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引起民主和民族舆论的震惊，从而迫使本国政府采取声援第一个起来反对法西斯暴力的国家的反法西斯政策。这种前景却受到阻挠，因为当时普遍接受投降政策，这种政策在慕尼黑更得到了最严重的表现。然而，已经处于绝望状态的西班牙抵抗运动却在

继续进行，一直继续到慕尼黑会议和会议之后的 1939 年 3 月。

1938 年 4 月，阿拉格纳防线被突破以后，西班牙被已经抵达海岸的佛朗哥的力量切成了两段。得到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积极支持的内格林政府进行人事调整，解除了投降主义者，反共分子普列托国防部长的职务，并再次通过从军事上和政治上恢复实力的惊人努力，成功地巩固了防线。埃布罗河战役打了整整一个夏季，许多英勇的国际战士和加里波第纵队队员在前线阵亡。³⁷⁴

国际志愿军的英雄史诗就要终结了。9 月 21 日，内格林政府向国际联盟宣布共和国决定把所有的国际志愿军从前线撤回，并建议组织国际监督委员会。这是一个政治谈判的建议，它不仅遭到佛朗哥分子及其纳粹和法西斯盟友的坚决拒绝，而且也遭到一些民主国家的坚决拒绝。

当时在西班牙有 12000 名志愿军。他们离开西班牙并不意味着可以和平地返回家园。许多人是从法西斯独裁的国家来的，或者是政治流亡者。所有这些人曾遭到打击和政治迫害。迫害、监禁和死亡的厄运在等待着他们。甚至在苏联，许多在西班牙战斗过的战士也被卷入斯大林镇压的悲剧之中了。最著名的是革命家安东诺夫-奥夫谢延因，他在 1917 年曾指挥攻打冬宫；面对着死亡，他仍然重申自己作为共产党员的骄傲。最幸运的人在后来都能站在欧洲抵抗运动的前列，以他们在西班牙手持武器反对可恶敌人的经验再次进行战斗，终于报仇雪恨。

1939 年 1 月巴塞罗那的陷落使志愿军的离去变得更为慌乱和凄惨了。当内格林政府回到中部地区，回到马德里时，最后一批志愿军就离开了那片被倒下去的同志们的鲜血浸湿了的土地。在西班牙大约牺牲了 1000 名意大利志愿军，有 3000 人受伤。现在只能追忆某些人的名字以说明意大利共产党人作出的牺牲：阿尔曼多·安东尼尼，阿代尔莫·巴基莱加，乔瓦尼·巴埃西，路易吉·巴里

索内,昆托·巴蒂斯塔塔,福尔图纳托·贝洛尼,朱塞佩·贝雷塔,马里奥·贝尔泰,罗伯特·比科基,巴尔洛梅奥·比索蒂,乔瓦尼·博基,卢多维科·博宁塞尼亚,朱塞佩·博雷蒂,卡洛·博罗尼,路易吉·博斯卡里尼,路易吉·坎诺内罗,伊沃·卡蓬切利,杏尔贝托·卡尔博尼,托马索·孔朱,朱塞佩·法基尼,伊多·法莱斯基尼,埃拉斯莫·费拉里,莱蒙多·福尔詹齐,利贝罗·加尔赞蒂,维塔莱·詹博内,皮耶罗·吉贝利,米凯莱·吉利,阿里戈·戈亚克,加埃塔诺·戈尔法雷利,农齐奥·圭里尼,安东尼奥·圭泽蒂,安东尼奥·拉曼泰奥,阿尔多·兰布罗基,阿姆莱托·洛卡泰利,安东尼奥·曼布林,阿尔多·马尔基尼,奥雷斯特·马鲁奇,安杰洛·梅内加佐,乌戈·穆奇尼,尼诺·纳内蒂,阿尔曼多·内格罗尼,阿梅代奥·内罗齐,彼特罗·内维卡蒂,圭多·皮切利,雷纳托·里乔尼,马里奥·列蒂,马里奥·罗梅伊,阿尔瓦罗·鲁斯蒂卡利,阿纳克莱托·萨尔托里,普里莫·塞加利尼,安东尼奥·泰萨罗,泰雷西奥·泰斯塔,埃托雷·瓦基耶里,乔万尼·泽纳罗。弗朗切斯科·斯科蒂司令员在志愿军师部的旗帜下检阅了要穿越国境线的加里波第纵队的战士们。参加西班牙战争的战士们激动地回忆着战斗的情景。隆哥和加里波第志愿军的领导核心于2月12日越过了边界。

意大利反法西斯战士带着在将近三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的种种苦难告别了牺牲的战士。共产党人在表现意大利人的反法西斯精神方面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他们后来在抵抗运动中又进一步作出贡献。

西班牙战场上那些战士,流落各地,有的被关入法国的集中营,有的去开展地下斗争,后来他们又站出来领导抵抗运动,得以把他们在西班牙积累的军事经验用于意大利的斗争。只要粗略地列举少数几个人就可看出游击战争是谁领导的了。在西班牙的加

里波第志愿军司令员隆哥后来在意大利成了加里波第游击纵队的司令员。同隆哥一起在西班牙的除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之外，还有未曾被监禁和流放荒岛的意大利共产党最优秀的领导人。

西班牙共和国的抗击，又坚持了几周；卡萨多上校的叛变加速了投降的到来，（他把马德里交给了佛朗哥分子）。内格林政府离开巴伦西亚去国外作长期流亡。陶里亚蒂同志留下来同西班牙同志一道战斗到最后一刻。1939年3月25日，他乘一架军用飞机离开了西班牙。

第三帝国获胜和宣布德奥合并之后，西班牙抵抗运动失败的消息传到意大利，挫伤了意大利反法西斯志士的希望。在监狱中，在流放地，对这次新的失败原因的讨论是痛苦而又激动的。谁能阻挡希特勒的前进呢？少数仍在开展活动的反法西斯战士忧虑地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只有苏联能这样做，因为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显示出是自由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堡垒。当时这并不是什么宣传说法，而是一种坚定信念，共产党员——而且也不仅仅是共产党员——的希望和斗争目的都同这一信念联系在一起了。尽管有法西斯报刊关于莫斯科审讯的大量报道，但斯大林的威望却仍在增长；虽然分散在国内的共产党许多组织几乎一直同党中央联系不上，但参加党组织的人却仍在与日俱增；这一切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三、慕尼黑会议

希特勒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就实现了德奥合并，这促使他毫不迟疑地提出了苏台德问题，这实际上是涉及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存亡问题。这个国家有自己的防御工事和35个装备精良的师，位于欧洲的中心，成为纳粹主义实现其扩张计划的障碍。

深刻的民族矛盾削弱了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这些矛盾在由曾为争取独立而进行过反对奥匈帝国斗争的旗手马萨利克总统和贝奈斯总理这两个伟大人物强有力地控制的议会共和国范围内没有得到很好的调解。除了波希米亚人和斯洛伐克人之间存在着长期纠纷外，德意志人、匈牙利人、卢西尼亚人等一些强大的少数民族也不能忍受凡尔赛条约造成的局面。当时1000万捷克斯洛伐克人当中有300万是德意志人，他们大部分集中在与德国接壤的苏台德地区。1933年以后，绝大多数德意志人参加了由纳粹分子领导的苏台德人阵线，他们在喀尔斯巴德“八点纲领”中提出了一些旨在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要求。

英国曾表示支持苏台德人的事业。朗西曼勋爵受命前去考察，结果是承认苏台德人的要求的有效性。1938年9月17日，英国政府正式把朗西曼报告中的结论变成了自己的结论，但是，早在3月24日，即在德奥合并只有几天之后，张伯伦就曾声明，一旦法国根据法捷条约规定为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给予援助而引起法德战争时，英国将不给予法国以军事援助。

377 9月12日，希特勒在纽伦堡年会上公开提出必须毫不迟疑地解决苏台德问题，同时要求给苏台德以自决权。9月15日，苏台德人阵线的头目、纳粹分子海伦宣布苏台德同第三帝国合并。同一天，张伯伦飞往贝希特斯加登，到希特勒的官邸；9月17日，英国决定接受苏台德人的要求。达拉第领导的法国政府也屈膝了。面对闻所未闻的压力、希特勒的威胁和来自伦敦和巴黎的投降建议，捷克政府不得不认可。但是，希特勒在其最后通牒中又改变初衷，提出了更苛刻的要求。如果接受他的要求，就无法维持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独立。

看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事实上，法国军队已开始总动员。在火车站上，应征入伍者被许多忧心忡忡的公民围拢着；公民们希

望和平，他们不再像1914年那样相信未来的战争是一场短暂的、幸运的战争了，他们不懂得为了尊重一项援助一个边界不肯定的新国家的条约，为何就必须要进行战争。

在意大利，墨索里尼早已开始在威尼托地区的所有省会搞狂热的演讲运动，以宣扬德国要求的合理性；他从9月18日在的里雅斯特发表演说，到26日在威尼斯发表演说，都是为了这一目的。当形势即将急转直下时，他在希特勒的赞同下，提出召开德、意、英、法四国会议，以求达成协议和阻止战争爆发。由于德国的要求而受害最大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却未被邀请。这就是说，这个国家的命运要在其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决定下来。此外，保证捷克斯洛伐克独立的国家苏联也未受到邀请。四国会议于1938年9月28日在慕尼黑举行，30日夜结束，会议签定了一项实质上接受德国要求的协定。

张伯伦和达拉第分别返回伦敦和巴黎时，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那时，慕尼黑会议的当事者得到了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拥护。短视而懦弱的和平主义的论点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并掩盖了威胁各国人民独立和自由的危险。在法国，左翼和各种倾向的极端主义集团都站在公开亲纳粹的右翼一边。敢于反潮流和谴责慕尼黑协定的是少数人：在英国，有丘吉尔（他在作强烈的批评性演说时被激烈地打断了）和他的朋友们以及多数工党党员；在法国，则有法国共产党。在1938年10月4日的议会上，只有共产党议会党团议员、社会党人让·布耶和民族主义独立人士亨利·德·凯里利斯投票反对通过达拉第政府活动的提案。大多数人民对慕尼黑协定危害和平的严重性缺乏认识。英法两国在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决定了它的命运。一个得到许多援助诺言的国家被抛到了敌人手中。

苏联声明它准备信守法苏条约和苏捷条约所承担的义务，并

准备切实而迅速地援助受希特勒威胁的国家。李维诺夫9月21日在国际联盟大会上的演说庄严地肯定了这一立场。诚然，苏联要去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就应当得到允许其部队假道罗马尼亚（或波兰）的领土。因此，苏联政府在国际联盟大会上宣布了自己的意图，以便使其军事行动具有国际联盟的性质。但是，苏联的建议根本没有得到重视。斯大林当时并非没有从慕尼黑的经验中吸取教训，而他后来也表现出他是及时地懂得了这一教训的实际含意的。

慕尼黑协定迫使捷克斯洛伐克把设有最巩固防御工事的地区送到侵略者的手中。过了几个月，德国部队就通过敞开的大门开进来了。1939年3月15日，希特勒来到布拉格，他宣布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结束，德国作为波希米亚保护国的建立和由傀儡政府统治的斯洛伐克的独立。波兰得到了相当大的一片领土。军人政府参与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瓜分，他们事先就支持希特勒进行侵略的借口。下喀尔巴阡乌克兰割让给匈牙利。牺牲捷克斯洛伐克而进行的领土瓜分粉碎了原有的小协约国的虚假团结，显示了凡尔赛条约创立的国家没有人民基础。这一既成事实又一次没有引起人们迅速而强烈的反应。

然而，新的侵略行动促使人们开始以自我批评的方式改正一直到当时为止对希特勒的嚣张气焰所采取的态度。这种进程在英国根基更为雄厚，丘吉尔和艾登的行动在那里赢得了地盘。日益明显的是，实属投降的所谓“绥靖”政策并不能阻止希特勒的前进。在舆论运动的推动下，张伯伦于3月31日声明：英国全力支持法国，如果法国根据所承担的义务，为保卫波兰的独立和领土完整而卷入战争的话。未来宣战的外交前提就这样提出来了。但是，张伯伦的内心深处却认为，这种声明还不意味着要承认必须彻底反对希特勒和寻求联盟体系；为了使联盟体系在军事上变得强大有力，它应当扩大到苏联。由于同苏联没有军事协定，英国向波兰提供

的保证就毫无价值。但是，英国政府尚未下决心作一切必要的准备，短期内还不打算同苏联签订真正的军事条约。

而在法国，舆论则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共产党议员们对批准慕尼黑协定投了反对票，这就引起污蔑和仇视法国共产党的运动，该党被指责为战争贩子，为苏联的利益效劳，要把法国引向失败。11月30日为反对授予达拉第政府全权和保卫1936年成果而进行的总罢工的失败，促使那些一心想孤立法国共产党的力量力图进一步打击法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之间的矛盾由于双方激烈地相互指责要对人民阵线失败负有责任而变得越来越尖锐了。这种论战也渗透到意大利流亡者的队伍之中，使各反法西斯政党的团结关系也变得困难了。加里波第志愿军战士从西班牙归来，以及法国当局把许多志愿军战士关入集中营，这些都使政治流亡者当时的处境变得日益混乱和动荡。同时，各反法西斯政党的国外中心同国内小组的联系也变得更加薄弱和困难。

四、钢铁条约

380

在召开慕尼黑会议期间，墨索里尼表面上是自主地提出倡议，实际上是紧密配合希特勒的计划。他所起的这种调解作用提高了他的威信，激发了他的虚荣心，并促使他同希特勒缔结更加紧密的联盟。

自签订反共产国际的协定(1937年11月6日)以来，国家的整个生活的特点是越来越迎合纳粹方针这样一个进程。1937年9月，墨索里尼前往德国，参加了纽伦堡代表大会，希特勒为他组织了盛大的欢迎，德国独裁者对他的这位意大利“先驱者”一再表示个人的谢意，这一切都使墨索里尼得意洋洋，并使他相信必须加强“两个革命”之间的军事政治关系。这就要求意大利也应在民族纪律

和改变陈规陋习方面作出更严肃的努力。

1938年是种族主义输入意大利和开始迫害犹太人的一年。为了迫使意大利人民采取一种更严格、更守纪律的作风，亦即所谓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作风（这不过是一种要在社会上蛊惑人心的廉价说法），当时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国家职员必须用“您”相互称呼；在军队中必须行法西斯礼，尽管国王反对（他费了很大力气才得以使人保持对戴军帽的官兵行军礼）；采取正步走式的步伐，也叫做罗马步伐；国家工作人员必须穿法西斯制服；由法西斯政权培植的亲信来对群众进行细致的排队，把政治监视的任务交给各区的法西斯小组。采取所有这些措施的目的在于把意大利人民的生活，甚至私人生活更严密地纳入法西斯制度之中。

更严重的是开始搞种族运动。之所以发动这场运动，既是出于对纳粹做法进行通常的奴才式的模仿，也是出于墨索里尼的特殊意愿，因为长期以来他就鼓励生育以增加人口。尽管开展了这样的运动，但出生率还是年复一年地绝对下降。在鼓励生育的运动中，不仅采用某些奖励办法（多口之家奖金）和惩罚办法（独身税），而且还采用发展福利的政策，从而保护了近250万儿童，这一政策是由全国妇幼事业局和法西斯党本身负责执行的，在当时的情况下，该政策甚至有某些积极方面。1936年以后，每年把近70万儿童送到海滨和山上度夏令营，当时，大多数劳动者的子女从未见过大海。虽然政府出面干预，出生率却仍趋下降。意大利人在阿比西尼亚的态度已经说明，他们并没有种族主义思想，意大利人倾向于博爱和建立不同种族的结合。政府的宣传机构禁止演唱著名的歌谣《黑色的小脸蛋》，并不是偶然的。

墨索里尼相信“人多力量大”，他痛恨那种在他看来是缺少种族觉悟和他所说的意大利“劣根性”，天生的懦弱无能等症状。齐亚诺的日记描绘了日益混乱和猛烈地冲击着这位独裁者灵魂的那种

激动心情：他仰慕德国盟友的力量；他有时还感到自己的低劣性；他对希特勒对待他的方式以及总是到最后一刻才把情况告诉他的做法也时有抵触情绪；他试图把法西斯制度的失败归咎于意大利人民，指责他们软弱和胆小。墨索里尼轻易地发泄他的怒气，发表反资产阶级的激烈的演说，这是一种无大危害的怨恨表现，而且这种情绪很快就变成了法西斯制度对工业和金融大亨的一贯的顺从。在事情进展顺利的情况下曾跟着法西斯政权走的那些意大利人，这时也表现出不断增长的厌倦和憎恶情绪，他们特别讨厌那些甚至打乱家庭私生活的强制性法律。按照墨索里尼的打算，引进种族主义是本应有助于使人民对法西斯制度更加明显地俯首贴耳，更便于孤立和镇压某些人对法西斯制度的反抗的。

1938年7月14日，一批科学家和大学教授提出“十诫”，这是一个“维护种族”的宣言，在这个宣言中正式宣布了意大利的种族主义。《保卫种族》杂志开始出版，并大量发行。这不是什么简单的文化宣传行动。9月2日，政府决定不准犹太人从事教育，禁止犹太人上学，命令犹太人离开科学研究所和科学院。11月10日，又通过了一条大力限制犹太人经营不动产和管理企业的权利的法律。1938年12月，开始搞所谓“文化改良”行动，决定禁止出售900种作品，警告书商不要卖外国作家的书籍。事实上，这一行动没有什么效果，而且只经历了很短的时间，外国作家，甚至当代外国作家的书籍仍继续出售，甚至在流动书摊上出售。应当指出，当局的这种行径是说明它妄图效仿纳粹主义，在意大利也推行极权性纪律的例证，而这种极权性纪律是纳粹主义以另一种手段推行的。 382

必须指出，意大利人是以痛苦、怀疑的心情和越来越强烈的、无声的消极抵制来接受政府所有这些措施的。当然，也并不乏赞成政府做法的情况以及道德上和思想上表现懦弱与委曲求全的情况。

虚情假意、两面三刀、大肆吹捧元首的伟大以及个人作出痛苦的保留等表现也层出不穷。但是，普遍的态度则是拒绝政府的措施，即使这种拒绝是谨慎的和有分寸的。最自觉的抵制表现在对待反犹太人法上。由于人们对受害者广泛地、千方百计地表示声援（即使这种声援是不动声色的和消极被动的），反犹太人法收效甚微。

除个别情况外，意大利各个学派的哲学思想同种族主义的观点是对立的，并且反对输入那些宣扬德国人是“超人”和“优等种族”的荒谬理论。达依丘曾试图提出一个意大利超人的样板，虽然他的这种论调曾在索菲奇的《声音》杂志派运动^①中找到了几个支持者，而且还得到了领袖的夸奖，但还是陷入了可笑的境地。天主教传统是拒绝这种胡言乱语的。法西斯对种族主义的支持使梵蒂冈十分尴尬，而过去梵蒂冈从不掩饰它对墨索里尼及其政权的好感。早在1938年1月，参加天主教会议的60名意大利主教和2000名教区神甫曾前往祖国祭坛，随后又去威尼斯宫向墨索里尼致敬。教皇庇护十一世曾较坦率地批评过种族主义理论。据说，正是在坚决谴责把种族主义引进意大利的前夕，这位教皇于1939年2月10日去世了。他的继承人帕切利红衣主教（庇护十二世）加强了政策上的模棱两可性；这一政策是想把对种族主义的隐晦批评与对法西斯主义的不断支持协调起来。法西斯政权的困难不断增长使那种长期以来认为天主教可以取代法西斯主义的设想变得更加现实而具体了，这一设想使梵蒂冈的外交政治行动变得更加谨慎。尽管教会有其正式立场，但它并不是没有给予犹太人一定的支持。意大利天主教徒、神甫、世俗人士对种族主义的实际态度几乎总是同情受害者。反种族主义和反纳粹主义的情绪有助于唤醒天主教运动内的民主觉悟，这种觉悟后来在参加抵抗运动中得到了最重要的表现。

^① 指20世纪初意大利主张革新意大利文化的文化运动，其发起者为《声音》杂志，因而得名。——译者

对法西斯政权来说，进一步从属于德国是一种危机的因素和衰败的开始。由于法西斯政权采取了同德国结盟的政策，由于他们执行这种政策的方式，也由于在这两个盟国之间出现了另一种力量对比，作为法西斯的支柱之一的民族主义遭到了打击，民族主义认为，法西斯政权是加强意大利实力的工具，而加强意大利实力则是民族的主要目标。这种信念破灭后，从被从属于外国的那一政策所伤害和叛卖的民族主义中产生了用另一种方式来维护民族利益的新意愿，这种情况在青年人中间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种意愿注定在未来的9月8日之后变成民族和反法西斯的觉悟。这将是缓慢而艰难的发展，然而这一发展自1937年和1939年起就随着意大利日益屈从于德国而开始了。

墨索里尼试图用各种方式去阻止政权和人民之间相互分离的进程，这一进程虽然还刚刚开始，但却已经很危险。他下令取消有关选举的任何残存形式。1939年1月，在短短的几天内，众参两院就决定和通过了成立所谓法西斯行会组织议会。这个议会由国家法西斯党全国委员会和各行会组织全国委员会联合组成，所有这些行会组织的名称由上面根据赋予参加该组织的各行业的作用确定。

在对外政策方面，面对德国的扩张，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也想提出扩大领土的新目标，但是它只是简单地在宣传上有所表现。这样，在法国承认意大利帝国后仅仅过了几周，意大利外长加莱亚佐·齐亚诺便于1937年11月30日在众议院发表演说，针对法国抛出了关于突尼斯、吉布提和科西嘉岛的领土要求，议员们当时还吵吵闹闹地从蒙特齐托里奥宫一直游行到威尼斯宫，这样一来，他就以这种狂妄之举破坏了同法兰西共和国的关系，对意大利法西斯政 384 府来说，同法国的关系曾一度是有用的（如在阿比西尼亚事件中），这种关系可以用来缓解意德之间新的僵硬关系。

1937年12月11日，意大利政府宣布退出国际联盟，尽管这一组织对承认意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亚并不是没有提供过方便。1938年5月13日，国际联盟对意大利政府的进攻性举动的回答最终是使每个成员国摆脱禁止承认（尽管是纯属形式上的）意大利帝国的建立这一既成事实的约束。退出国际联盟和发动反法宣传运动就使意大利脱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阵营，尽管尚有意英协定；这就使意大利更紧密地同纳粹德国站在一起，事实上则是追随纳粹德国。

墨索里尼徒劳地力图把这种方式说成是符合意大利利益的方针。同德国结盟一直是不得人心的，甚至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希特勒占领布拉格后，意大利政府为使最强大的资本主义集团一向希望的在巴尔干半岛进行渗透的道路畅通无阻，决定占领阿尔巴尼亚，执行早已拟定好的计划。1939年4月7日，意大利军队在都拉斯登陆，并于4月8日占领地拉那。4月12日，突然召开制宪会议，宣布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为阿尔巴尼亚国王。4月16日，国王接受了新的王冠。然而，这一事件并未引起人们热烈的反响，而是引起了意味深长的疑虑，因为它几乎被人们视为一幕小小的丑剧。

在墨索里尼看来，同希特勒签定正式的同盟条约的时刻到了。1939年5月6—7日，齐亚诺和里宾特罗甫在米兰举行会晤，意德盟约的基础确定下来了。里宾特罗甫急于达成协议的态度使齐亚诺感到意外。不久，双方于5月27日在柏林签订了宣布民社党的德国同法西斯的意大利结成紧密联盟的条约。这是一个军事的攻守条约。条约第三条规定，如果一方陷入某一冲突（即使这一冲突是它发动的），另一方必须给予全力支持，并且参战。这意味着把意大利的手脚捆绑起来，事先无需进行任何磋商就可以把意大利拖进德国的一切侵略之中。然而，该条约所附带的一个协议规

定和平时期不少于四至五年，这期限正是意大利为了完成战争准 385
备并用新式武器补充在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战场上损失的装备所
需要的。这一条约说明墨索里尼心甘情愿地把大门敞开，也说明
他是知道意大利军队处于没有准备的状态。

这一条约被正式地叫做“钢铁条约”。实际上，它是套在意大利人民脖子上的绞索。意大利参加谈判的那些人并没有想到，希特勒愿意马上签订条约的急切态度取决于他已决定在9月1日开始入侵波兰。希特勒肯定并不指望意大利对他入侵波兰给予具体的帮助，但他希望有把握得到意大利政府对他的行动的默许，防止墨索里尼以某种方式搞一些会引起麻烦的不合时宜的动作。

五、外交准备

捷克斯洛伐克被德国轻而易举地占领之后，希特勒的注意力立即转向波兰。由当地纳粹党管理的、四周都是波兰领土的不设防城市但泽变成了希特勒宣传运动的新目标。但泽市政府要求并入德国领土，并要求取消根据凡尔赛条约割让给波兰通向海口的“走廊”。这种行动的目标是昭然若揭的，它实际上旨在肢解波兰，如果可能则瓜分波兰。1939年4月3日，希特勒占领布拉格之后，便命令新任总参谋长凯特尔将军准备于9月1日进攻波兰。他更想不用战争就可像在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轻而易举地取得新的胜利即使是部分的胜利。但是，如果以外交手段不能达到目的，德国军队就必须在9月1日开始进攻波兰。

伴随外交行动而来的是对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大规模宣传。法一德委员会除聚集了纳粹事业的狂热支持者外，还聚集了一些站在左翼立场上、但却主张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以最严重不过的投降行为为代价）奉行和平主义的知识分子；该委员会散布“不

386 要为但泽送死”的口号，好像他们的赌注就是这座波罗的海城市的命运，而不是整个欧洲的命运一样。法国领导集团发生了深刻的分歧，但是那种听天由命的被动思想在他们中间却占了上风，与此同时他们还恶毒地仇视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他们想把法国陷入困境的责任推到共产党人身上。他们把难以迅速地、大量地扩充军备的原因归咎于劳动者的态度（每周工作40个小时，生产效率低和工资高等等），而不是从主宰法国军队的那些战略方针错误中寻找原因：低估飞机和坦克的作用，因为飞机和坦克总是用来支援步兵，而不是作为独立作战的力量；固守马奇诺防线的陈旧防御理论。事实上，马奇诺防线在法国同比利时的边界上就已经到了尽头，并未伸展到海边，这就使左方侧翼即比利时一直处于门户开放的境地，德国军队因而可以展开包抄行动。

在1939年动荡不安的夏天，欧洲急剧地走向灾难，人们无法阻止事态的迅速发展。在波兰，军人政府（这是一个寡头专制的政府，没有社会基础，其军队缺乏现代装备，并且违反时代潮流死抱住它那套陈旧的战略理论不放）坚持拒绝德国要求的态度，自以为可以满足于英国和法国将给予援助的保证，因而它顽固地拒绝苏联军队在其领土上采取行动的的任何计划，而苏联军队又是在那条战线上可以设法遏制希特勒进攻的唯一的军事力量。

3月18日，英国政府决定对德国的要求采取抵制态度。为了不再重犯1914年的致命的错误（当时英国犹豫不决的态度一直继续到最后一刻，这是促使德国发动战争的原因之一），英国政府这次向德国发出了不准触犯波兰的警告，因为它将会帮助波兰。但是，英国那些亲德的保守集团玩弄模棱两可的手段把张伯伦首相3月31日在下院发出的警告的明确含意搞乱了，他们向希特勒作了意
387 思正好相反的保证。而张伯伦本人和英国外长哈利法克斯的态度也是有利于这种解释的。

无论如何，英国政府毕竟为签订英、法、苏三国条约开始谈判了。4月17日，苏联政府的回答是：它准备缔结法、英、苏三国同盟，如果这种同盟包括这样一项义务：即在任何缔约国受到侵略的情况下，其他缔约国将立即给予援助。条约还应当提供军事保证：在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与苏联接壤的任何东欧国家遭到进攻的情况下，应自动履行上述规定。此外，签署该条约时还应同时签署一项军事协定。尽管苏联一再催促，但英法两国对苏联的建议有好几周都不予答复。接近5月底时，英法两国作出了赞成签订条约的初步答复，但又缺乏具体的诚意。他们既没有表示接受军事协定的建议，也没有表示把条约扩大到波罗的海沿岸的那些共和国。而把波罗的海沿岸的那些共和国排除在条约之外，也就是给希特勒指出可以用来进攻苏联的“缺口”。其实，张伯伦认为，同苏联的谈判不过是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是为了推动希特勒达成一项全面协议，一项能导致欧洲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达成谅解的新的慕尼黑协定。

根据英国人的看法，谈判进展缓慢的公开原因在于波兰的态度。一向反对苏联在其领土上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的波兰政府，拒绝在德国进攻的情况下苏联主动给予援助，除非它向苏联明确提出这种要求。好像一次军事行动竟可以在最后一刻突然发动而不需要进行认真的准备和事先达成协议，以便使受援者一方和应采取行动援助被侵略国家的一方之间在行动上必要的配合似的！由于波兰拒绝接受苏联在其领土上采取行动，由于波兰军队的软弱，由于英国和法国与波兰相距遥远，英法军队的作战能力又不足，苏联军队同德国军队的冲突将来就只好在苏联的领土上进行，而且条件将会对苏联极端不利，因为当时苏联已经要在西伯利亚边境上对付日本帝国的力量了。

决定性的几周就这样过去了，而这时纳粹对格但斯克的攻势

则在日益展开。在英法方面明显地故意慢吞吞地同苏联互换照会结束后，一个由二流人物组成的、无权签订条约的英国军事代表团才于8月5日由海上动身赴苏，好像是为了强调他们有意使谈判缓慢进行似的；8月11日，这个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只是到了8月12日，英国军事代表团才同苏联政府进行接触。

六、德 苏 条 约

为时过晚了！苏联没有被动地坐等英法方面模棱两可的和拐弯抹角的反建议。斯大林获悉希特勒决定于9月1日开始入侵波兰。他通过严厉的镇压而消灭了国内的反对派之后，利用其全部威信，利用他对全部政权机器的控制，得以完全不受限制地使苏联的政策开始一个所谓最符合苏维埃国家特别利益的进程。他一贯执行“不可分割的和平”以及民族民主力量联合的政策。在慕尼黑协定签订以后，甚至在德国入侵和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以后，他仍坚持同法国和英国结盟的必要性。对苏联政府为促进迅速达成适当的协议所作的努力，任何历史学家都不能提出怀疑。但是，几周过去了，斯大林不愿意去为他人“火中取栗”。

3月10日，他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就已经阐述了这一立场。他们讲话明确地说明了苏联政府将要执行的路线。斯大林指出，瓜分世界的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已经开始，甚而已经成为“事实”，尽管还没有变成全面性的世界大战。当时斯大林仍旧坚持把侵略国家（德国、日本、意大利）和非侵略国家（英国、法国）加以区分，但是，英法两国已经抛弃了集体安全政策，宁愿实行不干预和中立政策，并希望侵略者把矛头指向苏联。张伯伦曾把捷克斯洛伐克拱手让给了希特勒，想以此推动他进攻苏联，但是，德国向张伯伦要求归还德国以前的殖民地作为向苏联进攻的交换

条件，意大利也向法国提出了领土要求。一场危险的大赌博可能会自食恶果。因此，斯大林得出的结论是：必须谨慎，不要让挑衅者把苏联拖入一场冲突之中。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重申了为集体安全和不可分割的和平而斗争的政策，并向英国和法国提出了建立军事同盟以反对新的侵略的建议。苏联政府坚持这一路线，但也发出了不要以为苏联头脑简单的警告。莫洛托夫接替李维诺夫的职务突出地说明斯大林打算加快苏联的对外政策的节奏。

莫洛托夫于5月3日就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领导。9月1日的限期临近了，苏联政府不愿意被动地坐视英国政府的犹豫不决和玩弄手腕。于是，斯大林决定进行“平行谈判”：在继续同英法两国政府谈判的同时，也同德国政府建立外交接触。这时，苏联已经在同德国就续订贸易条约进行谈判。5月20日，莫洛托夫向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建议赋予苏德双方的贸易谈判以政治的发展。这一建议马上被德国方面理解和接受了。5月30日，德国政府决定开始同苏联进行政治谈判。德国答复的迅速和英国答复的令人气恼的缓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8月4日，舒伦堡向莫洛托夫承认苏联在波罗的海利益的存在。8月18日，莫洛托夫答复德国，并提出了一些条件。德国政府迅速地接受了这些条件。8月4—18日苏德双方中断谈判，其原因在于当时苏联等待英法两国的军事代表团以及该代表团可能提出的建议。莫洛托夫指出，西方的代表没有带来任何具体的承诺，特别是有关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苏联可以在波兰领土上采取行动的承诺。苏联政府掌握的情报是，德国军队准备越过波兰边界。这已是几天之内就要出现的问题了。

德苏协议极为迅速地达成了。8月19日，德苏贸易协议在柏林签字。里宾特洛甫于8月23日飞往莫斯科，并签署了德苏条约。

德苏条约的宣布（以及里宾特洛甫同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在一起的照片的发表）像一枚炸弹一样爆炸了，使世界形势的一切政治军事条件发生了变化。德苏互不侵犯条约还附有一个确定相互势力范围的秘密议定书。苏联的势力范围包括所有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立陶宛除外），直到那累夫河、维斯瓦河和散河一线的波兰东部以及根据以前的条约割让给罗马尼亚但苏联一直要求归还的比萨拉比亚。

德苏条约的签字，使英国和法国有责任和有必要决定是否确认它们所承诺的在德国发动侵略的情况下给予波兰援助的保证。但是，如果英国和法国实际上并不能对将在波兰平原上进行的战斗立即作出贡献，他们的那类保证又能有什么具体价值呢？那几天是一系列紧张的外交谈判、激烈的新闻和政治论战、徒劳的调解尝试的日子，这种情况甚至延长到战争在波兰领土上开始以后。波兰拒绝了德国的最后通牒，把自己的全部武装力量动员起来。法国政府决定确认其保证，命令进行全国总动员。英国政府终于也决定确认自己的保证。德国先是粗暴地企图把首先开火的责任加在波兰人身上，随后则把军队于9月1日这一事先确定好的日期开进了波兰。又经过了好几天艰难的试探和最后的考虑以后，在德国拒绝停止敌对行动的情况下，英国和法国的大使才向里宾特洛甫递交了正式的宣战声明。这对希特勒是一次打击，因为直到最后一刻他还指望英国放弃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这样开始了。

德国强大的武装力量在空军的配合下，以机械化部队分几路包抄的快速行动，粉碎了波兰的一切抵抗行动。仅用了三周时间，德军就把波兰打败了，占领了。波兰政府撤退到罗马尼亚，随后又流亡英国。波兰军队的残存部分为摆脱德国军队的歼灭，撤至靠近苏联的边界。于是，苏联政府9月18日决定不再像它同德

国签订的条约附带的秘密协议书规定的那样占领整个波兰东部，而是决定只占领楚尔宗勋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划分苏波边界的建议(楚尔宗线)中早已提出割让给苏联的那片土地。

9月28日，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再次举行会晤，双方研究了波兰抵抗失败而形成的局势。双方确认了8月协议，并作了某些重要修改。这时，立陶宛也包括在让予苏联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了。德国重申，苏联在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北部采取什么行动与它无关。波罗的海沿岸那些共和国迅速地同苏联签订了互助条约。1940年6月以后，这些共和国被苏军占领；这些国家的新政府建议举行全民议会选举，新议会宣布三个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并决定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罗马尼亚也不得不接受苏联割让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北部的要求。

在9月28日莫斯科会晤通过的声明中，德苏两国政府首先表示，因波兰的瓦解而出现的所有问题已最后解决，从而为东欧的持久和平创立了牢固的基础，同时双方表示，结束德国为一方同法国和英国为另一方的战争状态符合所有国家的真正利益。德苏两国政府建议进行共同努力以尽快达到上述目的。然而，如果德苏两国的共同努力不能成功，英法两国就要承担继续战争的责任。在战争可能继续的情况下，德苏两国政府将相互磋商采取必要的措施。

在此情况下，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变成了共同行动和相互协商的条约，这使法国和英国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要么承认既成事实，也就是说承认对波兰的瓜分；要么就要承担继续进行战争的责任而受到指责。事实被完全颠倒了，对战争负责的不再是德国，反而变成英法联盟了。这就加剧了西方各国共产党的困难处境。

德国在波兰所取得的闪电般的胜利不能不使斯大林担心。他从战争的发展和西方盟国按兵不动的情况中得出了结论：证明为了不致使苏联卷入战争和单枪匹马地同德国打仗，他的做法是正

确的。但是，他开始担心：法国和英国也不能长久地抵抗德国的力量；在苏联军队加强装备和进行改组的计划完成之前，在乌拉尔以以东的工业中心（这些中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继续进行反对侵略者的斗争所必需的）发展起来之前，英法两国的失败将会使希特勒集中全力反对苏联。因此，必须赢得时间，必须结束战争，必须使现存关系固定下来，即使是暂时的固定。从苏联的利益来看，这种论点是正确的，但它不能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束缚起来。

通过与德国签订条约和9月28日发表莫斯科声明，苏联成功地摆脱了可能在孤立无援的条件下被卷入战争之中的危险，不必单枪匹马地去承受德国进攻的压力，而让法国躲在马奇诺防线后边，英国则脱离欧洲大陆，日本却在东方虎视眈眈。即使对英法资本主义国家的反苏（反共）方针不作应有的估计，西方军队也没有能力在西线发动强大的攻势，能给予苏联军队以及时有效的援助。英国的第一批部队在10月份才到达法国的领土。另一方面，斯大林了解苏联武装力量的训练水平，他不得不考虑因枪决图哈切夫斯基将军而进行的可悲的清洗给军事指挥机关造成怎样的影响。

苏联军队缺乏训练在1939年12月对芬兰的战争中想必已经充分地暴露出来，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在芬兰湾取得几个军事基地和进行领土调整，以期使列宁格勒远离边界几十公里。战争开始时，苏军显然低估了芬兰军队的抵抗能力和芬兰人民围绕政府所实现的民族团结，战争延续了整整一个冬天；经过艰苦的最后一战，双方在3月11日签订了和约，根据这一条约，芬兰向苏联割让的领土比苏联政府当初向芬兰所要求的领土要大得多。这场战争使苏军遭到了巨大损失，死4.8万人，伤15万人，但这场战争尤其暴露了苏联在军事上的弱点。苏联政府当能从芬兰战争中吸取严肃的教训，于是它推动军队进行改组，采用新式装备和新的战略战术。

1939年9月，苏联需要时间和空间。它由于同德国签订条约而取得了空间，到了1941年秋天，这一空间就显示出它是有用的了。因为当时德军尽管是快速前进，但当它到达莫斯科附近时已是疲惫不堪。苏联取得了近两年的时间，这对它改组武装力量是宝贵的。苏联取得了不必去冒单独对付纳粹力量的危险的有利政治条件，随后又取得了同为生死存亡而战的英国站在一起的有利政治条件。最后，苏联取得了获胜的首要条件，即：为捍卫自身独立不受侵犯而参加战争，从而掀起蓬勃高涨的爱国热情，调动苏联各族人民的全部取之不尽的战斗力量。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些有利条件对苏联得以生存下来所具有的意义。但是，这些有利条件对于整个工人运动、对于仍然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本身是否也同时是有效的呢？苏联的国家利益同英国或法国工人的民族利益难道就没有矛盾吗？关于这个问题，曾发生激烈的论战，这场论战不仅使共产党人脱离本国工人运动的其他部分而陷于孤立，而且还破坏了各国共产党本身的团结，散布了混乱和疑虑。各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在1939年确定的那条要同苏联政府的路线绝对吻合的路线所付出的代价至今也还是很高的。各国共产党还要继续付出代价，尽管他们在反对纳粹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争取本国的独立和自由的爱国斗争中英勇地经受了考验。面对德苏条约的签订，有关共产国际的解散和各国共产党的自主问题就有了重大的现实意义。

七、意大利不参战

394

在西线，法国军队在马奇诺防线和西格佛里多防线之间的区域作了短暂的进攻之后，于1939年10月又重新退回到原出发时的阵地。“奇怪的战争”开始了。西线的战争实际上并没有开始。希特

勒一直到最后都认为英国是不会参战的。10月6日，他再一次向两个西方国家提出了以承认既成事实为基础的和平建议。这是一些不能接受的要求。战争陷于停滞状态，人们在焦虑不安地等待着新的、更加严重的事态发生。在法国和英国，重整军备进行得很困难，而且战略和战术观念也是落后的，依然沿用1914—1918年战争经验遗留下来的那些老办法来使用空军和坦克。在等待的这段时期，人们并不是有效地进行准备，而是最后地，也是暂时地松了一口气。战争只是推迟了。丘吉尔在重新掌握了政府的实际领导权之后，加快了重整军备的速度，特别是重整空军，并为使英国在1940年夏季得以用空军击败德国进攻准备了武器。相反在法国，雷诺在接替达拉第之后发表了夸夸其谈的宣言，用毫无根据的乐观主义掩盖了局势的严重性，没有使法国人从思想上对1940年5—6月间出现的惨败局面作好准备。与此同时，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宣传运动则肆无忌惮地进行着，并加剧了对共产党人的迫害，这就为苏联关于这是一场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的论点提供了有力论据。

对于意大利来说，奇怪的战争也是拖延时日问题。1939年8月，意大利政府又一次只是在最后一刻得悉进攻波兰的决定。在夏季，墨索里尼已经日益不安地注视着危机在加剧，后来，但泽冲突的爆发使意大利在英国和德国之间不得不进行选择。当时英国在地中海有自己的舰队，在直布罗陀、马耳他、埃及的亚历山大都有基地。此外，英国还采用大量的办法劝说意大利资本主义领导集团。不仅仅是国王，而且大议会中的一部分人（格兰迪、巴尔博、费代尔佐尼和齐亚诺本人）也不愿同英国决裂，因为那时英国已经承认了帝国这一既成事实。但是，意大利也通过“钢铁条约”同德国联系在一起了。在大议会中有坚决忠实于同德国结盟的人（法里纳奇、斯塔拉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墨索里尼宁愿形势不

要急转直下，以便能够发挥他自认为在慕尼黑所发挥过的调解人的作用，其实他当时的行动是代表了德国人的利益。

当时意大利的处境是：它在军事上和经济上都没有作好准备，因而绝对不能卷入冲突之中。因此，墨索里尼在7月份向希特勒建议召开国际会议，以便在但泽问题上达成和平协议。他曾提出一个并非没有根据的观点，即在会议上英国政府将会接受协商一致的解决办法，并且还会再一次迫使法国和波兰也接受这一解决办法。而这正是希特勒所不希望的。他不希望某些“猪猡”（他当时就是这样说的）提出调解建议，从中作梗。他始终相信，英国和法国到最后一刻就会往后退。

但后退的却是意大利。在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被拒绝后，墨索里尼为了不承担明确的义务，避而不到布伦纳山口去见希特勒，而是派齐亚诺于8月12日和13日去见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德国人确认他们愿意经受考验，但是没有提供确切的消息。希特勒反对公布一份确认要达成和平解决的意图的公报。即使在那时希特勒也没有向意大利当权者透露早已作出的9月1日开始进攻的决定，但是他也没有掩饰进一步强行提出最终解决波兰问题的办法的愿望。希特勒当时也没有透露同苏联已经开始的谈判的真实情况。只是到了8月22日，在里宾特洛甫赴莫斯科的前夕，齐亚诺再次会见了她，这时才告知意大利政府有可能同苏联签定条约的某些初步情况。在进攻波兰的前夕，当希特勒竟慨然让墨索里尼知道早已作出的决定时，墨索里尼及其最亲密的合作者们感到十分意外，极其恼火和格外沮丧。这时有必要援引条约中规定使意大利能有四至五年和平时期的条款了。

墨索里尼本想向希特勒表明自己参与的愿望，但在这种条件下又怎样做呢？况且希特勒并不需要意大利的帮助来迅速完成对波兰采取的行动。他只是希望墨索里尼的外交行动不要打乱已经

制定好的计划的实施。意大利政府想方设法避免作出必要的抉择；8月25日，它向德国重申自己完全的支持和严格履行在“钢铁条约”中所承担的义务，但与此同时，它又公开宣布还没有作好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准备，因而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只有接受这些要求，意大利才能参战。这一系列要求是过分加码的，以致可以确信，德国人一定会加以拒绝。而由于据说是阿托利科大使提出的一个条件，即援助应“立即”送到这些要求就变得更加严重了。

希特勒没有拒绝要求，并且声明，尊重促使意大利政府不参战的理由，但他仅仅要求开展有效的反法宣传，以便促使法国在对意战线上保持重要兵力。这样，意大利政府就能宣布不参战状态；这种状态不是中立状态，因为意大利政府宣布它认为德国干涉波兰是有道理的。

德苏条约的消息和割让领土给苏联的消息在法西斯领导集团当中，同时也在广大共产党员和广泛舆论当中引起了震惊和忧虑。在反共旗号下发展起来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难堪地作出反应，墨索里尼本人也由于事先没有得到消息而感到不快，他没有能够控制住对德国盟友所作出的反应，这些反应表现为越来越不信任，甚至是敌视。这样就通过梵蒂冈、西欧国家和美国政府，使许多情报和磋商的渠道保持畅通，美国政府当时正以日益不安的心情关注着欧洲。

9月1日的内阁会议怀着大大松了一口气的心情通过了不参战的声明。极力主战的那些人，如法里纳奇，在会上默默无言，因为他们确信国家的军事准备尚未就绪。但是反对同德国结盟的人并没有作出任何努力来采取真正的中立状态，断绝同德国的任何联系，把不参战变成重新恢复传统联盟的第一步，而这在当时是有可能做到的。大家都宁愿观望，为一时能避免更糟的情况而感到满足。不论如何，不参战可以保障拖延时日，虽然拖延期限多少一时

不能确定。当时有可能变不参战为中立，特别是存在着这样一种希望：即通过德、英、法三国的协议尽快结束战争，使意大利不必被迫上阵。此外，不参战也使意大利工业在出口方面有很大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可以被广泛利用来向法国和英国出口物资，包括军用物资，从而使意大利避免做军事上的准备。意大利摆脱了海上军舰的封锁，就可以进口和出口英国所需要的产品。这些商业交往也是政治接触的手段。

从社会和政治的角度看，有许多不同力量希望阻止意大利从不参战变成直接参与冲突。这一主张中立的集团的最高领导又一次是那些后来在1943年7月25日导致墨索里尼下台的力量和人物。然而，主宰所有这些人情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等待，是关心自己不要受到损害，是拒绝在希望变不参战为中立的人和相反把不参战看成是在同德国一起参加战争之前不得不暂停行动的人二者之间进行公开的冲突。政治冲突于是被玩弄个人阴谋、散布流言蜚语、搞虚伪的应变诡计所取代了。从墨索里尼开始，所有人都是匆匆忙忙地从一种立场转向另一种立场。在法西斯领导集团当中，中立主义者占优势，但他们不敢声明自己是中立主义者。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不参战状态，使意大利置身于战争之外，就需要有一支有组织的政治力量，这支力量要能够把上层的行动同人民对和平的普遍要求联系起来；人民的这一要求是极为强烈的和自发的，但也是分散的，实际上不能取得具体成效的。国内和侨居国外的反法西斯政党和组织，当时全都处于士气十分低落、在政治上和纲领上既有分歧又很混乱的状态。意大利的共产党所处状态也同样如此；意大利的共产党在1939年最后几个月，由于领导中心的瓦解，正经历着建党以来最严重的时期。

398

八、战争开始时的意大利的共产党

当共产党正处在以批判态度重新审查自己的结构和活动这一微妙关头时，一场风暴发生了。

8月11—13日，在巴黎召开了经过一年筹备的会议，这次会议后来被称为“8月会议”，尽管在由代表意大利常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格列科和马尔蒂尼于1940年6月在莫斯科起草的一份文件中，这次会议被称为“国外中心扩大会议”。筹备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交给了1938年组成的“意识形态中心”，会议的目的是要建立新的中央委员会来取代被解散的中央委员会。

现在已找不到这次会议的记录了，而会议参加者在不同时期所提供的回忆录又是各种各样和相互矛盾的。但是，所有人都一致指出，党的中心当时是处在不景气的状况之中。就从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来看，中央委员会实际上是在1938年被解散的。只要对比一下参加这次会议的名单和在1936年8月全国和解呼吁书上签名的名单，就可以看出有多少前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没有应邀参加1939年8月会议以及许多人缺席的原因。在没有参加会议的人中间，多扎和塞雷尼是由于采取针对他们两人的组织措施所致。最消极的情况是国内组织的代表很少，仅仅只有四位同志（米兰的焦苏埃·卡萨蒂、贝尔加摩的安杰洛·莱里斯、阿维扎诺的费尔迪南多·阿米科尼和泰拉莫的切萨雷·马尔库奇）。来自国内的代表不多表明当时的情况同意大利的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有了差异，因为在那次代表大会上来自国内的代表居多数，同时也突出了这样一种矛盾：即一方面是党的领导中心工作成效不大，另一方面则是党的基层组织当时在国内已经得到扩大，成立了许多小组，尽管这些小组并没有同其他组织取得联系，这说明党组织正在恢复

和发展。

但一个积极的事情是陶里亚蒂和隆哥同“意识形态中心”的成员一起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们两人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一起参加党的领导中心的会议了。这样一来，陶里亚蒂、隆哥、贝尔蒂、格列科、罗阿西奥、迪·维托里奥、比博洛蒂、蒙塔尼亚纳、马西尼、马索拉、诺韦拉、内加维莱以及来自国内的卡萨蒂、莱里斯、马尔库奇和阿米科尼就重新聚会在一起了。在这份名单上还缺少某些其他与会者，因为看来当时出席这次会议的大约有20位同志。现在看来，当时一个最重要的情况是，在这次会议上，近10年来领导意大利的共产党活动的最高领导人以及后来保证党在战争过程中和在参加1943年的政治斗争过程中从政治上和组织上恢复实力的新领导班子的主要核心都聚会在一起了。

由于没有当时会议的纪录，因此人们不太知道会上讨论的政治性内容；这次讨论从贝尔蒂的报告开始，而以陶里亚蒂的发言结束。根据当时意大利形势的发展，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本应是反对意大利屈从于德国的斗争，因而也就是全国团结的政策；为了把有志于使意大利摆脱德国控制的力量联合起来，就必须执行全国团结政策。但是，由于共产国际提出了批评，这一政策的执行受到了阻挠，而当时国内的地下小组则是广泛执行了这种政策的。共产国际批评的是它所说的全国和解路线，担心这条路线可能会模糊斗争的阶级性质，因为这场斗争主要应当把矛头指向法西斯帝国主义。其实，反对德国的政策同时也就是反对法西斯的政策，因为这一政策打击的是墨索里尼和作为意大利屈从德国的工具的国家法西斯党；反对德国的政策同时也就是阶级的政策，因为它打击的是意大利资本主义的领导集团，这个集团是从继续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当中牟取利润的。从1939年9月到1941年7月这段时期，共产党所遇到的政治困难是要设法执行民主民族团结政策，事

实上，这项政策从未抛弃过，尽管由于要服从共产国际的纪律而不得不唯唯诺诺（在德苏条约之后，特别是在1939年9月28日莫斯科声明之后，这种纪律变得更加严厉了，其约束性也更大了）。

在这次会议上指出了战争危险的严重性，德国进攻波兰迫在眉睫以及英国和法国举棋不定和有意拖延旨在同苏联达成军事协
400 议的无休止谈判。8月13日的政治结论仍然是要施加压力，以便克服上述举棋不定的现象并尽快组成反对希特勒的联盟。这条路线同法国共产党所执行的路线没有区别，当时刊登在《意大利人之声》日报上的文章都是根据这种路线精神所写的。然而，现在看来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希特勒的进攻是真正迫在眉睫，更没有意识到要对德苏条约有所准备。

这次会议结束之后，领导同志又用了个星期的时间开会和讨论，以求作出组织上的必要决定。正是在那几天讨论了重组领导中心的原则问题。也正是在那几天贝尔蒂准备起程去纽约，因为《工人国家》报社将要搬到那里去。事实上，9月1日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决定，很难不是经过某种方式的讨论，至少是经过个人之间的磋商。在巴黎应当保留一个国外中心，以便在侨民中开展活动，保持同其他政党的关系和对国内开展活动。而在意大利则应当组成一个享有广泛行动自主的国内中心。意大利的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应当建立一个陶里亚蒂领导下的总的领导中心。当时有关这些措施的讨论还在进行当中。当8月20日德苏条约的消息像炸弹爆炸一样传来时（先是贸易协议，然后，23日，则是政治协议），党还处在研究总的方针、审查个人情况和研究开展说服工作的阶段。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同其他反法西斯政党的关系方面，上述消息的宣布使一切都重新成了问题。

就在这之前的几个月中，意大利的共产党同意大利社会党的关系，同正义与自由组织和意大利共和党的关系都严重地恶化了。

西班牙共和国的完结使反法西斯团结丧失了一个强有力的理由。相反，帕恰尔迪从强烈的反共动机出发采取了支持卡萨多的立场，这更加剧了共产党人和共和党人之间的论战。这场论战阻碍了组成反法西斯联盟的努力。共和党人企图把共产党人排除在协议之外，以便实际上恢复昔日的反法西斯大同盟。慕尼黑协议之后，法国社会对法国共产党施加的全部猛烈的反共压力（因为法国共产党是唯一反对通过这一协议的）也冲击到意大利的共产党。正义与自由组织继续采取行动批评意大利社会党和意大利的共产党的统一行动，因为这一行动把已经自认为是社会党之一的正义与自由组织排除在所有社会党达成的协议之外。正义与自由集中批评意大利社会党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保持特殊的团结关系，同时它还一概反对“老”党，认为要以工人阶级的新党来取代这些老党。在意大利社会党内，南尼是批评慕尼黑协议的，并且一向赞成同共产党人搞统一行动，但是，他的这一立场遭到塔斯卡所进行的斗争的破坏，当时塔斯卡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一些团体有联系，这些团体对投降的绥靖主义主张更为敏感，因此，它们曾赞同慕尼黑协议，并且后来终于支持贝当。

401

共和党人以提出先决条件为借口阻碍了制定反法西斯联盟的纲领。在共产党人看来，共和党提出的这个口号将会使团结动员的能力受到限制，而这种能力本来是可以由立宪会议的口号来加以保障的。这个问题过去曾使共产党人自己产生分歧，而后来却使民族解放委员会得以产生。当然，共产党人打算明确表示他们选择共和制，但是他们也愿意通过立宪会议这一口号，向那些非共和主义者或当时还不是共和主义者，但却同意由人民行使主权选择新的民主国家所采用的体制的人们提供一个团结纲领。

人民联合会那时已有4万名成员了，这个联盟内部正在进行着打击那种被人以论战口吻称之为共产党统治的那种做法。尽管

大家努力建立反法西斯联盟和维护人民联合会的团结特点，但在危机前夕，聚集在巴黎的各反法西斯政党的中央还是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意见分歧了。

德苏条约的宣布在法国掀起了反苏运动的新高潮，这场运动很快就变成了名副其实地驱逐共产党。在一片仇视的气氛下，特权阶层的全部恐惧、工人取得的成就所引起的怨恨、共产党人的行动在左翼队伍中所助长的妒忌，所有这些都变成了无情的迫害，而且在宣战之后，这种迫害就变得更加严重了。8月25日，《人道报》被取缔。

402 尽管如此，共产党人在9月3日议会开会时还是赞同了国防贷款。多列士和其他共产党议员在应征入伍时都规规矩矩地响应了号召。多列士宣布，如果希特勒发动战争，那么他将会看到，法国全体人民为维护国家的安全、自由和独立而团结起来，共产党人则站在第一线。

法国共产党人和意大利共产党人在德苏条约宣布时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继续施加压力，以便结束英、法、苏三国之间有关军事协议的谈判。德苏条约宣布的次日，《人道报》写道，坐飞机去莫斯科还不算为时过晚。由于宣战，这一行动受挫了，于是共产党人就力求把对德苏条约的支持（这是作为苏维埃国家的行动，而对各国共产党没有约束力）同在本国为保卫祖国和反对希特勒而作出的努力调和起来。正因如此，内加维莱在世界青年理事会上曾指示，共产党人将不会在反对希特勒方面落在最后。侨居在法国的意大利共产党人的行动同这条路线是一致的。他们参加了法国军队，为维护自由而战。但是法国政府立即扼杀了这种主动性，关闭了第一批征兵中心，使侨民只能参加外籍军团。

除了法国政府的上述态度外，其他反法西斯政党所掀起的针对意大利的共产党的反共运动，也扼杀了任何想要在意大利侨民

当中恢复在外国领土上也为自由事业而奋斗的这种加里波第传统的尝试。人民联合会又一次成了斗争中心。罗马诺·科基（阿达米）谴责了德苏条约，并同意大利的共产党决裂了；他在意大利社会党、正义与自由、意大利共和党和意大利人权联盟的支持下，试图使人民联合会整个组织积极参加保卫法兰西的战争。在由路易吉·隆哥、埃米利奥·塞雷尼、朱利亚诺·巴叶塔等参加的一次争论激烈的会议上，科基的行动被击败了，但是人民联合会却被法国政府解散，路易吉·隆哥也遭到逮捕。

在意大利社会党内，南尼的那种既谴责德苏条约又保持同共产党人统一行动的立场被击败了。南尼由于陷于孤立，辞去了社会党书记的职务。塔斯卡和莫迪利亚尼于是就担负起该党书记的职能，同意大利的共产党断绝了任何关系。8月26日，《意大利人之声》报被取缔，《工人国家》也被强行停止出版，这就使意大利的共产党丧失了回击有关背叛反法西斯事业的种种指责的一切手段。在《意大利人之声》报最后一期上，社长马里奥·蒙塔尼亚纳⁴⁰³就已经确认意大利共产党人要致力于反对法西斯。

意大利的共产党关于德苏条约的声明并没有为人所知。据说，这项声明是由陶里亚蒂起草的。这项声明想必散发范围有限，因为至今连一份声明也没有找到。相反，却找到了陶里亚蒂写给意大利社会党的信稿。在这份文件中，陶里亚蒂为德苏条约辩解，谴责意大利社会党给意大利无产阶级团结所造成的打击，然而，他继续把德国说成是主要敌人，并指出，不管怎么样，如果发生战争；共产党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全力以赴，进行战斗，使法西斯主义在战争中最后遭到失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共产党人将利用一切可能性，包括参加法国军队，来同法西斯分子作战，并协助击败他们，就像在瓜达拉哈拉所发生的那样。

德苏条约公布两天之后，也就是8月25日，陶里亚蒂在同内加

维莱谈话时用下述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如果战争爆发，法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就应当执行类似克莱蒙梭在1914—1918年世界大战期间执政之前所奉行的那种政策，即尖锐批评政府在进行战争方面的一切软弱表现。陶里亚蒂在被捕之前所采取的立场是明确的，同法国共产党人最初的立场也是相吻合的，即同希特勒作战，批评各届政府拒绝号召人民联合起来的作法。

在德苏条约宣布和战争开始之间曾有过一些宝贵的日子，但党的中心却不善于利用这些日子。如果说，当时开过一些会，正像罗阿西奥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的8月25日的会议，这些会议的特点也不过是磋商性的，是为有待作出的决定作准备。据说在8月25日会议上通过的那份文件的文本并不为人所知，那份文件据说是确定了共产党的立场，共产党当时的立场是：揭露英法两国政府对有关组成反纳粹军事联盟的谈判失败应负的责任；批评这些国家采取不介入从而损害西班牙共和国的暧昧政策；批评慕尼黑条约的反苏作用。最后则是反对在法国掀起的旨在支持法国法西斯势力的猖狂反共运动。在没有文件文本的情况下，能够表明意大利共产党人当时所采取的实际立场的就是陶里亚蒂给南尼和社会党人的信、蒙塔尼亚纳在《意大利人之声》最后一期上的文章、内加维莱的声明以及隆哥在人民联合会会议上所采取的立场。

不管怎么说，看来上面提到的那次会议上没有作出任何政治和组织决定。当时也没有号召意大利人民争取和平，反对意大利同德国并肩作战。这时，争取和平、使意大利站在冲突之外的口号是能够在争取中立（以及反对模棱两可的不交战状态）的斗争中团结许多力量的有凝聚力的目标。一些宝贵的日子就在政治上犹豫不决和个人忧心忡忡当中极为迅速地流逝了，而没有提出任何有助于表明立场和为今后发展奠定前提的政治倡议。显然，当时所有的人，包括陶里亚蒂在内，都对形势将会急转直下、法国

也会参战的危险估计不足,其后果是极其危险的,即使对同志们个人安全来说也是如此。正像在1926年11月第一周那些动荡的日子里一样,这时在1939年8月底,政治上的意外因素妨碍了立即采取必要的措施。

为了避免孤立,意大利的共产党采取了种种极端的努力。苦心经营的团结大厦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倒塌了。共产党人开始遭到了迫害。不仅在意大利,而且在法国,党都被禁止发表言论,上面提到的那次会议的失败就表明党是处于什么样的状况之中。同国内组织几乎没有联系,前途捉摸不定。为了阻止意大利卷入战争,该怎么办呢?

波兰前线上开始敌对行动以及宣战同党遭到劫难是同时发生的。9月1日,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在供他使用的办公室中同切萨雷·马尔库奇和切萨雷·马西尼一起被捕,那时法国共产党人也用这间办公室开展活动。陶里亚蒂被捕时持有一份外国护照,但他立即声明,这是假证件,并且声明他是在法国过境的意大利反法西斯主义者。他被捕后,因使用假证件而被判刑六个月。在困难的情况下,陶里亚蒂又一次表现出他的沉着冷静、极善于控制情绪。由于翁贝托·马索拉、巴尔迪纳·迪·维托里奥和法国同志们的援救,陶里亚蒂才得以逃脱那种处境。陶里亚蒂落到警察局手中,法国政府并不知道。意大利的共产党的非法和合法组织中的很多同志都知道了这件事,但这一消息尽管成为内部抱怨的话题,却并没有搞到敌人那里去。这件事就表明,挑衅性渗透活动并没有扩展到党的中心,尽管有这方面的指控。陶里亚蒂被判刑六个月之后于2月底获释,他利用被驱逐出境前仅有的几小时自由时间转入了地下,躲藏到马索拉的秘密寓所。

405

在陶里亚蒂被捕之后,其他一些人也跟着被捕了。连路易吉·隆哥也于9月1日在参加了人民联合会一次争论激烈的会议之后,

在自己合法的寓所中被捕。在这次会上，他反对让侨民参加外籍军团的主张，但却不反对意大利人参加保卫法兰西，正像他在《意大利人之声》上所写的那样，参加保卫法兰西应当在更能体现意大利传统的标志和旗号之下进行。在隆哥之后被捕的有朱利亚诺·巴叶塔、马里奥·蒙塔尼亚纳、费利切·普拉托内、阿拉迪诺·比博洛蒂、乔瓦尼·帕罗迪、泰雷萨·诺切、莱奥·瓦利亚尼、弗朗切斯科·利昂纳、欧金尼奥·雷亚莱、乔瓦尼·尼科拉、切萨雷·科隆博。被送往维尔内集中营的有在巴黎或其他城市被捕的共产党人，或从其他集中营转来的人：朱赛佩·阿尔贝甘蒂、维托里奥·巴尔迪尼、迪诺·萨琴蒂、卡洛·法里尼、彼特罗·达尔彼佐、阿里斯托代莫·马涅拉、马里奥·里奇、维托里奥·弗莱基亚、欧塞比奥·詹博内、欧金尼奥·焦瓦纳尔迪、埃托雷·马洛齐、费鲁乔·雷贾尼、西罗·罗西、亚历山德罗·瓦亚、阿代尔莫·梅尔坎迪诺、亚历山德罗·西尼加利亚以及其他许多人。党的领导干部都是些能干的、经受过考验的党员，他们大部分坐过意大利监狱，又参加过西班牙战斗，后来则又被关过集中营，这时则一下都不能活动了。许多人后来逃到法国，并且随即就同法国爱国者们一起参加了地下斗争。另一些人则被送交给了意大利，被关押在监狱之中或流放，到9月8日之前才被释放，并得以立即在加里波第纵队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40⁶ 这是一些可怕的日子，在这些日子里，优秀党员们的心灵经受了锻炼，他们表现出了勇气和决心。签订德苏条约所引起的怀疑、试图把苏维埃国家的行动同反法西斯团结路线调和起来的努力、同希特勒作战并以尊重加里波第纵队的民主民族特点的形式来保卫法兰西的长期愿望、希望既做到传统的“忠于”苏联又奉行民主民族政策这种混乱的情绪，所有这些都不能不在同志们的心上，包括人数不多的领导集团当中引起困惑和争论，这种困惑和争论进

而成为实实在在的瘫痪状态。在整个9月份，不的路线最后就不仅同时存在于同志与同志之间，而且也同时存在于一个人的身上了。这种混乱现象之所以没有变为同党决裂和违反纪律的行为（个别例外情况除外），怀疑和批评之所以能被压下去，这不仅是由于多少年来所养成的那种服从共产国际的习惯（共产国际认为自己拥有一切必要的条件来发表有根据的见解），而且也由于这样一种信念：即认为苏联和共产国际之间的革命利益是密不可分地一致的。

当时首先必须对迫害法国共产党人的可耻行径作出坚决的和恰如其分的回击；法国共产党人当时尽管作出爱国声明和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却仍被文明集体所取缔。事实是，法国政府拒不认为这场战争是反对法西斯的战争，因而继续寻求同墨索里尼达成协议，同时拒绝有关在法国建立意大利反法西斯志愿人员组织的各种计划；在意大利共产党人看来，上述情况就成为证实共产国际如下说法的最好证明：共产国际认为，这场战争，无论对交战双方的任何一方来说，都不是民主的。意大利共产党人被捕以及后来法国共产党人被捕、共产党领导的市政委员会被解散、对共产党人的疯狂迫害、一些法国社会党议员发表的要求对共产党人处以死刑的声明（而相反，他们却允许希特勒的追随者们开展宣传、贿赂和渗透活动），所有这些都促使所有共产党人——法国共产党人，尤其是那些由于是被剥夺了任何权利的侨民而遭到更大打击的意大利共产党人——不得不从道义上打消任何疑虑，不向暴力讹诈低头。因批评斯大林和德苏条约而同党决裂的莱奥·瓦利亚尼，只是在他已被关押在维尔内集中营中可以表现他个人的勇气时才这样做的，同时他拒绝同非共产党人一起获释。

政治的困难由于个人的困难，包括经济 and 家庭的困难而变得 407
更加严重了。大部分住在法国的共产党员是受党派遣在侨民当中

开展活动的，或是在报刊出版部门从事工作，他们在人民阵线成立之后曾得到合法的安置，但也往往是不稳定和临时性的（他们持有可以更换的签证而被允许居留）。像隆哥、贝尔蒂、格列科、迪·维托里奥、蒙塔尼亚纳这样一些领导同志也有了合法的住所。给予这些同志的指示是让他们保持合法地位，这就需要弄到一份工作证明。实际上，能够合法利用自己地位的人为数并不多。但不管怎么样，所有人都处在合法地位，他们不得定期更换居留许可证，而这样一来，他们也就成了被逮捕的对象。因此，一批经受过考验的同志就这样四下散失了，他们大部分都是从监狱里出来的，这时则变得无依无靠，缺吃少穿，并要冒种种危险。人们当时并未立即理解到：意大利侨民，包括出于工作的原因而来到法国的意侨劳动者，乃是一股宝贵的基本力量，可以向他们求援，以便得到资金、非法住所和热忱的支持。

这种情况也证明了：继德苏条约签定后的几天之内，党的中心，或者说是在8月会议不幸结局之后所残留下来的那个机构，是处在怎样一种政治上迷失方向的境地。在那几天里，一方面是没有通过任何政治文件，而另一方面中央却又作出了一些严重的决定。由于没有记录，现在无法确切地知道究竟有哪些同志参加了罗阿西奥回忆录中所提到的9月1日会议，这次会议是在陶里亚蒂被捕后举行的。贝尔蒂、迪·维托里奥、格列科、罗阿西奥、诺韦拉、马索拉，也许还有内加维莱肯定是参加了这次会议。为了保证一些同志的安全，会上接受了帮助贝尔蒂动身赴美国的建议，该去美国的还有迪·维托里奥，他们去那里是为了出版意大利的共产党机关报《工人之声》。实际上，根据陶里亚蒂的谈话，早在前几天就在酝酿这一决定了。错误就在于：在战争爆发之后，在陶里亚蒂和隆哥被捕之后，仍然保持了这一决定。正当应当作出一切努力返回意大利时，党的中心却派遣贝尔蒂和迪·维托里奥去美国、派

遣共产青年国际领导人格列科和内加维莱去莫斯科，从而加大了同国内的距离。诺韦拉、罗阿西奥、马索拉和其他几名合作者本来是应当留在巴黎，以便保持在法国和瑞士的地下组织来开展对国内的工作的。陶里亚蒂在会议后所进行的磋商中，也曾准备提出权力分散的建议。然而，战争的爆发要求开展强有力的政治活动，而这些政治活动是不能由一个实际上由于大批英勇无畏的同志被捕或者四下失散而无能为力的中心来采取的，当时必须把少数可以动用的力量集中起来，组成一个拥有强大政治能力的机构。

408

这样一来，在短短几天内，随政治上的突变而来的是组织上的瓦解，是从事移民工作的大批机构不起作用，这些机构本来应当立即用来对国内开展工作的。只有意大利的共产党中心的非法机构中一个很小的核心小组，由于得到牢固的保护而依然处在非法条件之下。但是，党的中心为了存在下去，在那几个星期之中也转入绝对的地下状态，以致于同党的其他组织的关系变得微乎其微。

1939年最后几个月完全是一片黑暗。陶里亚蒂和隆哥在法国被捕，斯科奇马罗和谢嘉在意大利被捕。如果看一看1945年12月底在罗马召开的意大利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产生的领导机构成员名单，那么人们就会发现，在这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出的领导机构中只有少数几个新当选的成员在战争最初几个月中仍然是自由的。征途正是从党的中心四下溃散，甚至几乎陷于解体的地步开始的，这一征途后来使意大利共产党经过无数牺牲才夺取到在抵抗运动进程中所占有的地位。

第十六章 世界大战

一、法国的失败

“奇怪的战争”只延续了几个月。芬兰战争推动法国和英国制定了对苏联采取行动的狂妄而混乱的计划，但在这些计划付诸实施之前，冲突就结束了。因此，英法两国把准备组织远征军的目标转向了挪威，试图在纳尔维克建立盟军基地，从而切断向德国输送瑞典钢材的供应线。但是，希特勒在时间上对英法联军提前采取了措施，因此发动了1940年4月9日的“威悉河行动”，而这一行动早从上一年10月起即英国拒绝接受德国的和平建议之后就已开始了。

帝国的军队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丹麦，丹麦对德国的占领未进行任何抵抗；随后，德国军队又进入了挪威，挪威国王和政府拒绝了德国的最后通牒。因此，德国军队在24小时之内占领了奥斯陆、港口和机场以及一些主要城市。尽管如此，国王还是力求在北部地区组织抵抗。英法军队也于13日从纳尔维克登陆，援助挪威国王，但为时已晚，救援未能成功。4月27日，盟军最高委员会决定逐步撤离挪威。最后一批军队于6月10日撤离，但此时法国实际上已经失败了。在挪威的农村也存在着德国空军的优势，这一优势使英国海军无法控制海域和切断德国在斯堪的纳维亚沿海的供应线。德国与盟国之间发生的第一次直接冲突对于西方力量来说是灾难性的。正当挪威战线上的最后战役仍在进行时，德国

却又于5月10日对西线发动了攻势。

只用了10天时间，法国的防线就被炮火轰垮。原为1914年战争准备的施利芬计划已作了重大修改。军事包抄的行动应当延伸到卢森堡、比利时以外，直至荷兰，以便保证德国在北海海岸拥有对英国发动进攻的基地。这次进攻的最大任务应由一个兵团承担，这个兵团拥有大量精锐的装甲部队，它的力量集中在包抄线路的左翼和法国阵营的中心，即位于马奇诺防线和比利时与荷兰平原的开阔地带之间。突破阿登山隘口，进入那慕尔和色当之间险峻难行的地带，从而突袭了法国指挥部，仅在三天之内就让经常配合有强大空军掩护的德国装甲部队打开了通往海边的道路；5月20日，德国装甲部队又进发到海边。法国的精锐部队和英国的先头部队登陆之后，原是向前挺进，以求同比利时部队会合，协同作战，对付德国部队，这时却因腹背受敌，被切断了同法军其他部队的联系。法国5月20日曾试图粉碎德军阻击，以期同比利时的部队恢复联系，并帮助它们撤退，但这一尝试失败了。5月23日，奉命接替吃了败仗的加姆林的新任参谋长魏刚，就已经承认失败在所难免，并同作战部长贝当一起向政府提出了必须寻求停战的建议。

从5月20日到6月5日，身陷埋伏的盟军部队尽管进行了英勇抵抗，仍不免遭到挫败和削弱，最后全军覆没。直至6月4日，敦刻尔克的大门一直敞开着，将近33万英法士兵依靠英国海军的特别动员和志愿军的广泛参与才得以在此登上军舰。6月5日，法国抵抗力量的主要迂回部队被歼，比利时国王的军队被迫投降，德军开始了法国战役的第二阶段。德国国防军从各条战线向卢瓦尔河包抄，试图在兰斯和贝藏松之间开辟一条新的战线，使巴黎的保卫战无法进行，并从背后绕过马奇诺防线。6月10日，政府放弃了巴黎，先后向图尔和波尔多转移。同日，意大利也对法宣战。6 411

月14日，巴黎被攻占。6月17日，贝当新政府要求停战。6月22日，在贡比涅的雷东德林中空地签署停战协定，其签署地点正是在1918年11月11日签署宣布德国战败的停战协定的同一个火车车厢里。

尽管试图把灾难(每周工作40小时、生产率低下、无纪律)的责任推卸给工人阶级和人民阵线，但事实已经表明，这种灾难首先是军事上的真正惨败造成的。同人们长期所说的相反，力量对比并非一开始就对德国绝对有利。问题并不在于数量上的劣势，而在于他们不能根据战事的新发展采取相应方法来调配和使用军备。德国在空军方面较占优势，但法国的这一劣势主要是由于法国指挥部在理论上的薄弱、在全局部署上的落后、对空军和装甲车的新作用的低估，是由于法国指挥部看不到有可能恢复速决战和运动战，而仍然死抱住从1914—1918年战争经验中继承下来的阵地战方案不放。这种全局部署落后有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原因，即军队与人民缺乏联系，军事指挥部有贵族观念。在投降时，法国反民主力量从贝当和魏刚身上找到他们的最高代表人物，这并不是偶然的。

第三共和国及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领导阶级的先天毛病都从如此迅速之失败当中暴露了出来。法国人并非真正表现出不愿打仗。短暂而不幸的战斗正表明了许多将领、军官和士兵的战斗能力和牺牲精神，缺少的是指挥，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指挥。战略上的出其不意是对德国人有利的，因为他们懂得集中优势兵力进攻法军阵营最薄弱的一点。而将空军与装甲兵同步兵与炮兵同时并用则是技术上的出其不意。

412 军事上的失败立即转化为政治上的危机，造成了政府和领导集团的分裂：一部分人想继续同英国并肩战斗，主张撤到北非并接受丘吉尔关于建立法英联盟的建议；而另一部分人则想不论在任

何条件下都尽快实现停战。第二种意见占了上风，这部分人得到亲德党和主要的资本主义集团的支持，其最有权威的代表是贝当元帅和魏刚将军；在法国初战失败后，他们分别被雷诺调至作战部和武装力量指挥部。这是一场不择手段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赖伐尔战胜了软弱无能和不能始终一贯的雷诺。恐慌在政府成员、国民会议主席团和议员当中广泛蔓延。那些接受失败以便使法国能从人民阵线的残余力量和颠覆性“灾祸”中解脱出来的人们的愿望，压倒了主张抵抗和继续战斗下去的人们的日益软弱的意志。失败成了专制势力进行反扑的机会。

6月17日，贝当向全国发表演说，表示他愿把“自己作为礼物”献给国家。同时，他要求德国人提出停战条件。法国人战败了，分裂了，他们绝望地背井离乡，备受折磨，家庭支离破碎，成群的士兵变成了俘虏，城市被占，所以，这一天，绝大部分人欢迎贝当的演说，就像能由此后摆脱恐惧和饥饿一样。停战条件还不为人所知，为老元帅的号召所感动的法国人清楚他们面临的是何种前途，他们将要作出何种努力和牺牲，将要用多少鲜血来染红解放的道路。但是，生来在议会玩弄权术的条件下运转的旧政治机构，却知道投降的条件和后果将会是怎样的。

议会，或者说，那个在排除了已被囚禁的共产党人之后，在许多议员出于谨慎或爱国精神，宁可不再出席已经丧失了合法性的国民议会之后所剩下的那个机构，赋予贝当以充分的权力来对法国的国家政权进行专制性的改组。在850名参众两院议员当中，有660名议员出席会议，他们投票赞成维希政府。赖伐尔向议会提出的决议授予贝当为首的政府公布法国国家新宪法的具体权力。这一决议得到561名议员的支持。只有80名议员反对，17名议员弃权。社会党人和激进社会党人的多数同保守党人的多数联合一起，葬送了第三共和，而他们曾是第三共和的主要支持者，也曾使

第三共和陷入灾难。共和国总统阿尔贝·勒布伦支持了他们的全部行动。主持参议院会议的该院议长让纳内没有投票，但他也为这一专制行动的成功作出了贡献，因为他曾阻止在参议院会上展开正常辩论。众议院议长埃里奥是整个激进传统和共和传统的代表，他在投票时弃权。列昂·布鲁姆对决议投了反对票，但在整个危机期间，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在波尔多和维希，他都从来没有为使社会党成为一支争取法国独立的力量而进行过任何斗争。社会党的大多数是消极被动和软弱无力的，他们容忍社会党同那些早已积极从事失败主义和亲希特勒阴谋活动的集团的气焰嚣张和咄咄逼人的行为。社会党人来到维希，这本身就等于承认法国国家新体制的合法性。

在法国危机中，工人阶级未能作为一支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出现。社会党由于最终卷入投降而声名狼藉。停战的条款之一是规定法国政府必须向德国当局交出犹太人和政治移民。这样，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些老的代表人物在他们的法国同志的同意下，就被交给了纳粹分子，并很快就受到纳粹的镇压而被消灭了。

被迫处于非法地位的法国共产党在秘密出版的《人道报》上，坚决支持必须迅速缔结和约的观点。这一观点来自9月28日的德苏声明和季米特洛夫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一文。这一路线本来在“奇怪的战争”期间可能还有一定的效用，而竟然在4月9日之后（即威悉河行动开始之后）和5月10日之后（即法国战争开始之后）依旧保持下来。即使战争已在法国国土上进行期间，共产党人也仍然认为，应当尽速停止战斗，并指责法国资产阶级、政府、激进党人和社会党人把法国推向灾难，为英帝国主义的利益而继续战争。但是，当德国侵略者已进入法国境内并接近巴黎时，头一年冬天讨论过的有关战争性质这个政治问题——即战争是民主性质的，还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才从法国革命伟大传统即雅各宾派

和巴黎公社的做法中找到了简单的直接答案，即应当保卫祖国。工人阶级不能置保卫巴黎于不顾。

当时秘密地留在巴黎的法国共产党领导集团是由雅克·杜克洛和伯努瓦·佛拉桑领导的。他们非常重视这个问题。6月6日，正当德国人向巴黎逼进时，法国共产党的权威代表乔治·波利瑟（不久之后他被纳粹分子枪决）向政府成员阿纳托尔·德蒙齐转达了共产党人关于保卫巴黎的建议，“把巴黎拱手让给法西斯侵略者，那将是一种犯罪”。共产党人当时指出，为了能够实现广泛的人民动员，必须改变战争的性质，变战争为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民族战争；必须释放共产党议员和战士，释放被关押的劳动者；必须逮捕敌人的代理人，武装人民，使巴黎成为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

号召落空了。政府放弃了巴黎，人们成群结队地逃离了首都，无依无靠，备受饥饿的折磨和德国飞机的轰炸。在被占领了的巴黎，共产党人从另一个方向采取了其他行动，如莫里斯·特雷昂所做的那样，他曾要求占领者当局批准恢复公开出版《人道报》。

这是一些自相矛盾的行动，说明由于战争爆发的情况，在那个曾指引共产党人进行人民阵线斗争的伟大的民主民族前景化为泡影之后，党的领导机关内部出现了巨大的混乱。后来，莫里斯·特雷昂的主张遭到了党的领导中心的否定，但尽管他遭到严厉批评，党还是派他承担领导非法斗争的重大责任，他以巨大的才干和胆识进行了这项工作。行动的需要不允许继续采取犹豫不定的态度。德国占领者当局和法国政府的态度表明，试图采取合法活动是徒劳无益的，它们也不给共产党以喘息的机会。

《人道报》继续秘密地出版，停战后最初几周，一些散发《人道报》的地下工作者被捕。抵抗运动在工厂和街道组织了起来。7月10日，法国共产党号召人民同常败将军贝当展开斗争。共产党人指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巨大希望只能蕴藏于人民之中。在

415

工人阶级的周围，可以组成争取法国自由、独立、复兴阵线。应当反对的敌人是贝当和把法国推向灾难的法国资本主义。矛头只是间接地指向德国占领者。但这只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区别，实际上这一区别很快就取消了。反对贝当的斗争变成了反对他的德国主子、反对希特勒的斗争。

6月18日和22日，戴高乐将军从伦敦向法国抵抗运动发出了号召。戴高乐的动机完全是为了民族。但就一个人的立场来说，他的出发点不具备阶级性，也不可能具备阶级性，而且没有追究旧领导阶级的责任，因为他的号召对象也包括那些曾经负有一部分责任的人。在失败的日子里，在旧的共和国崩溃和老的特权阶级不顾祖国的呼声而复辟专制政权的条件下，共产党人的号召同戴高乐的号召是不同的，其动机也各有不同，然而，他们的号召——一个是从国外、从伦敦发出的，另一个则是从国内、从被占领的巴黎这个心脏地区发出的——却都激发了争取解放法国的游击战争和人民战争。从上述两种不同的号召中产生的两个运动的会合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这一会合到晚些时候才实现，它为法国抵抗运动的团结和力量提供了保障。然而，这两种不同的渊源在法国抵抗运动中始终保持一种对立状态，因此，在法国无法建立基本团结，而这种基本团结却是意大利抵抗运动的主要特征。

二、意大利不参战的结束

希特勒在欧洲的胜利前进使意大利人感到十分困惑。不论这些意大利人是法西斯分子还是反法西斯战士，也不论他们是主张意大利参战，还是赞成意大利保持不参战地位，德国在从4月9日（斯堪的纳维亚战役开始）到6月22日（同法国签订停战协定）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占领了丹麦、挪威、荷兰、卢森堡、比利时和法国

这一事实，都向他们表明了德国在武器上的优势，集中表现了德国的统治欲望，而这些情况看来使反法西斯战士丧失抱有希望的任何可能性。但是，由于力量对比的明显悬殊，德国国防军的力量不能不使那些鼓吹同德国结盟的人也感到忧虑。在被纳粹德国强权统治的欧洲（从维斯瓦河到大西洋这片地带已全部被占领），意大利应当采取何种立场呢？

书信、备忘录、日记都如实地记载了当时的主要情绪是什么：混乱和恐惧。在国内，只有少数被孤立了的人才懂得保持平稳的评价能力。也许必须到奇维塔维基亚监狱里的政治犯当中，到文托特内岛的被流放者当中去，这样才能发现最公正和最负责的看法。事实是：在希特勒胜利面前，出现了总崩溃，出现了向厄运投降的行为，出现了在代表和保护民族利益的方面软弱无能的迹象，上述情况从国家领导层普及到全体意大利人中间，甚至挫伤了为数很少的几个四下分散的反法西斯小组的行动能力和斗争能力。

墨索里尼的回答是：在停战协定签署以前，结束意大利的不参战地位，投入反对法国和英国的战争。这一决定是1940年6月10日在威尼斯广场上宣布的。墨索里尼的这一演说没有像1935年10月4日埃塞俄比亚战争开始时所作的演说那样受到欢迎。与会者的表现是一致的，他们表明，人群当中存在着无声的担忧，出现了比以往更为勉强的赞同迹象，有一种人为的、不是触动真情实感的冲动表现。那一天，意大利人的心灵深处各种情感交织在一起：有个人的害怕，有对国家前途的担忧，还有为后来被称为在法国背后捅了一刀（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而感到的羞愧。许多可信的回忆录和纪实文章都讲到，在宣布这一严重决定的时候，会场上曾有人放声大哭。

墨索里尼曾向巴多利奥将军指出，需要把几千具尸体抛到和谈会议的桌子上去。战争的进展将会是快速的，就像希特勒当时

进行的战争一样，是一场“闪电战”。不过，倘若同各种预见相反，战争竟然拖延很久，那又该怎么办呢？最为悲惨的预感在震撼着意大利人。的确，也有人在指望战争使政权因军事失败而陷于崩溃。但这不过是个别人的立场，没有一个反法西斯政党采取这样的立场，没有一个人希望通过祖国的毁灭获得自由。当时，共产党是反对那种希望意大利参战的消极地等待军事失败的倾向的。相反，应当行动起来推翻墨索里尼及其政权，防止把国家推向灾难性的失败。当时在意大利之所以未曾出现直接而有效的反对参战的行动，那是因为反法西斯反对派缺乏力量和一致，而不是出自深思熟虑的政治估计。

墨索里尼的决定结束了那种使政权领导集团在整个不参战期间发生分裂的犹豫不决、举棋不定的状态。1939年9月的选择，在当时受到了所有意大利人如释重负的欢迎。最初，政府内部占上风的是这样的解释：使不参战成为持中立立场的先决条件。1939年11月，政府决定在勃伦纳山口边界一带建筑阿尔卑斯山防御工事，其目的显然在于应付可能来自德国的压力，这一举动不是没有意义的。在1939年12月7日举行的大议会会议上，继加莱亚佐·齐亚诺报告之后展开了一场讨论，讨论中以格兰迪和巴尔博为首的中立派多数占了上风，公开主张尽快采取行动与德国并肩作战的人寥寥无几，只有以法里纳奇和斯塔拉切为首的几个人。

墨索里尼当时采取了中立立场：拭目以待，利用时间发展意大利经济，进行周密的军事准备。他在发言中说：“让（英国和德国）两头巨狮相互残杀吧，等它们两败俱伤的时候，我们再去收拾残局。”但这次大议会会议之后，墨索里尼却又故伎重演，加速参加战争、与德国并肩作战的准备。他不想认可他在大议会会议上实际所处的少数派地位。于是，他不再召开大议会了，直到1943年7月24日，由于战争的毁灭性发展才不得不召开这个会议。

墨索里尼在答复希特勒1939年12月31日电报的一封信里，进一步信誓旦旦地确认了“两国革命”之间的相互支持；他还在信中强调指出，特别要对德苏条约保持十分明确的态度，即以反共为目标。墨索里尼加紧战争煽动，他多次声称，意大利不能总是不介入冲突而成为一个“二等国”。然而，有关战备糟糕状况的消息频频传来，在2月14日召开的一次最高防务委员会会议上，人们承认：意大利只有到1941年底才能自认为作好参战准备，而且还没有任何把握。墨索里尼像国王、将领、经济界代表人物、政治领导人一样，对武装力量的情况是一清二楚的。但他拒绝从这种了解当中得出必要的结论。“谁也不能拿我们可能有的缺陷作为意大利不参战的借口”，他一再重复这一说法，似乎应当不对军队的实际准备情况进行分析就作出决定，而他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 418

2月3日，英国正式要求向意大利政府购买武器，但这一要求得到的答复是否定的。意大利政府继续为向盟国出售武器提供方便，直至6月9日，即在宣战前夕，运往德国的两万车厢战争物资还从意大利过境。然而，墨索里尼不敢正式接受英国的建议，因为他担心那样会影响同德国的关系。由于意大利拒绝向英国出售武器，英国政府于3月1日扣留了意大利的13艘轮船，以此作为报复。其后，英国政府又准许这批轮船继续航行，返回意大利，但此事成了墨索里尼的口实，他借此揭露英国舰队控制地中海封锁意大利，使意大利处于被囚禁状态，并就此要求开放海洋通道。

直到1940年3月，中立派的抵制仍然很大。国王和教皇的互访(1939年12月)突出表明了梵蒂冈和魁里纳尔宫^①的共同立场：他们都希望意大利避免参加战争，然而又避免同墨索里尼发生冲突。中立派集团没有采取任何决定性的行动去打破越来越密切的

^① 魁里纳尔宫系当时的王宫，今天为总统府。——译者

意德两国相互声援的关系。包括国王、将领、工业领导人、法西斯党魁在内的所有人都过分姑息政府，过分担心会惹怒墨索里尼，以致不能摆脱沙龙阴谋的雕虫小技和阶级团结的清规戒律。他们只敢私下批评墨索里尼的方针，而在公开场合又喋喋不休地对他奉承赞扬。朱赛佩·博塔伊就是这种两面派的一个典型，他的意见是模棱两可的，他一面通过《首位》杂志网罗年轻的持不同政见者，希望同他们合作，一面却又在他的社论当中大声疾呼地表示对领袖忠贞不渝。

里宾特洛甫1940年3月10日对罗马的访问促使墨索里尼作出了决定。希特勒与墨索里尼3月18日在勃伦纳山口的会晤使他的选择确定了下来。但是，为了制服中立派的抵制，也并不需要通过巨大斗争。4月9日开始了第三帝国的进攻。德国的每一个胜利都消除墨索里尼一部分踌躇。5月29日，墨索里尼召集军事将领开会，告诉他们，6月5日起，意大利参战的时刻随时都可能到来。6月4日，内阁会议被告知他的决定，但没有被召去进行任何讨论。大议会没有开会，也没有一个议员想要召开会议。就这样，在没有任何机构召开集体会议批准已经作出的决定的情况下，意大利被拖进了战争。从不参战到卷入战争的过渡是如此突然和没有准备，以致1/3的商船队及其精华部分都遭到了损失。这是意大利参战后不久即遭到的第一次失败，而在这场战争中，意大利最后也是一败涂地的。

三、意大利的经济状况

由于墨索里尼的个人决定，意大利被投入了冒险行动。但他却可以为所欲为，因为寡头领导集团的所有成员都是胆小怕事、姑息养奸的。那些直到3月还试图用某种方法反对或延缓墨索里尼

作出这一抉择的人们；这时也为希特勒一再告捷所震惊，作出了让步，实际上是同墨索里尼一样短视，只关心坐到谈判桌上，瓜分战利品。

在没有任何民族原因的情况下，意大利政府把国家推上了战场。在帝国节节获胜以及既成事实得到国际承认之后，意大利就像墨索里尼曾承认过的那样，加入了得意洋洋的帝国主义国家集团行列。1940年春季，针对英国而提出的“开放海洋通道”的要求，并不能像过去争取获得“阳光下的一席之地”的要求那样把人民动员起来。这个阳光下的一席之地早已被意大利利用暴力夺取到手了，而意大利人也早已开始懂得，这并没有为解决国家的实际问题提供什么好处。无论如何，本来没有必要攻打那个依靠苏伊士运河控制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亚通道的国家，从而使这一阳光下的一席之地重新成为问题。意大利参战缺乏民族原因还表现在：在1940年4月至5月混乱的几周内，意大利在制定军事计划方面困难重重。墨索里尼希望打仗，但他又不知道从何处下手。他希望打一场齐头并进的战争，据他说，这场战争不是为德国打的或同德国一起打的，而是同德国并肩作战。这很快就变成了一场跟在德国后面跑的战争。直到最后几天，墨索里尼还在两种方案中间举棋不定：一是参加法国战役，即派遣远征军，直指贝尔福和罗讷河流域，从南部迂回包围马奇诺防线，这不过是在阿尔卑斯山防线上采取一种象征性的行动罢了，其目的相反却是转为进攻非洲；一是与此相反，只是在最后时刻才向法国战线发动突然进攻。其实，一切都取决于德国前进的速度。

政治上的摇摆不定和战略上的考虑不周使军事上的无准备情况变得更为严重了。有关军事上无准备的情况是众所周知的。连巴多利奥那样主张必须把意大利参战推迟到1941年的人也非常清楚，要到那一天把军备真正准备就绪，那是根本办不到的，因为军

事上之所以无准备，正是由于经济上和工业上的无准备，是由于经过20年法西斯统治之后，意大利经济在机构上无力承受生产有效的现代化武器的重担。然而，波兰战役、斯堪的纳维亚战役和法国战役都表明，没有装甲车，没有飞机，是不能进行战争的。

由于墨索里尼的罪责，意大利始终只能自吹拥有“800万把刺刀”。但事实上，不仅缺少装甲车和飞机，就是步枪和刺刀也不足。在战事开始之初，军力只不过有150万人稍多一些，而且是通过用寄送入伍通知书这样的办法进行杂乱无章的动员和在明显的社会与个人歧视的条件下（差不多有100万人不准报到）胡乱地征集起来的。况且，就是对这些人也不能做到人手一枪；这枪是老式的91
421 步枪，在1915—1918年战争中使用过，1938年进行过改装。这些应召入伍的人的军衣也不能保证每人一件。就是为了补充主要的行动部队，至少也还需要再动员100万人。但又缺少武器和装备。对以下一点墨索里尼是清楚的：军需储备只够维持几个星期，而且无法得到补给。实际上，在陆军编制规定的73个师中，只有少数几个师准备停当，可以立即动用，作好70%准备的只有20来个师，还有20来个师只作好50%的准备。这些数据和情况巴多利奥说是已在1940年5月26日向墨索里尼汇报了，而且墨索里尼从卡洛·法瓦格罗萨将军送上的报告里也非常清楚这些数据和情况；法瓦格罗萨将军当时是主管战争物资的总督察。

工业生产不能在短时间内弥补这种严重落后状况，根据法瓦格罗萨提供的资料，1938年“现有生产能力”只相当于对装甲车辆和各种炮兵武器的需要总量的30%；巨型卡车、拖拉机和81毫米口径的迫击炮的生产分别相当于需要量的50%和70%。直到1940年6月，军火生产也不过只能保证每天提供40辆卡车和六七架飞机；而装甲车辆的生产还几乎不存在：全年也只不过能交付百把辆，而且还毛病百出，经常需要大整大修。空军也只有1400架飞机，比

英国逆火式飞机性能要低。条件较好的是海军，但缺少航空母舰和由海上直接协调而不是由陆地指挥中心协调的有效空防设备，这就使意大利无法切断英国通往直布罗陀海峡、马尔他和埃及的亚历山大的运输线。

法西斯主义造成国家在发展经济方面的停顿从意大利工业机器的脆弱中表现出来。在推行战争经济、实行自给自足和行会主义政策几年之后，由于政权的意愿，意大利参加了战争，但其经济在机构上是无力作出同现代战争需要相适应的努力的。法西斯主义使意大利陷入了难以自拔的经济停滞之中。意大利政权用镇压工会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手段，使意大利资本主义领导集团得以最大限度地剥削工人阶级和劳动者，最大限度地压缩工资和薪金。积累过程和高额利润虽然在相对稳定的条件下也得到了保障，但生产却未能全面增长，生产率也未能得到实质提高。

422

国民收入增长率在1874—1883年这个时期仅为0.57%，在1894—1913年这个时期为2.41%（这段时期正是乔利蒂当政、第一次工业起飞时期），但到了1920—1938年这个时期，亦即法西斯统治时期，又下降到1.82%（后来，在共和国30年中则上升为平均增长5—6%）。人均国民收入也是从1922年的100缓慢地增长为1938年的119。实际工薪（以1938年为100）从1913年的99.5增至1921年的126，而在法西斯独裁时期则历年下降。

只是在法西斯垮台之后，由于意大利取消了自给自足和行会主义的羁绊，越来越广泛地开展对外贸易，同时也由于抵抗运动打开了突破口，长期受到压制与打击的阶级斗争得以爆发，工农斗争得以形成起推动作用的压力，意大利经济的发展在不到30年当中达到了很高的速度，使国民生产总值（按1963年价格计算）增长了200%，机械制造工业增长了375%，人均收入增长了160%以上，实际工薪增长了166%。

谁也不能否认为法西斯主义所付出的代价，法西斯主义是经济停滞、文明和文化发展停顿、经济条件恶化的根源。当然，经济停滞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变化，阶级关系和经济结构原封不动。即使在法西斯统治时期，法西斯主义以前的旧意大利的统治集团内部的旧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工业集团加强了自己的地位，而损害了地主的地位，因为地主依靠法西斯的农业政策增加了地租收入，同时又把这些增加的收入用作对工业的投资。因此出现了工业家和农业家相互渗透的进程，并由于国家大量订货，一定程度的工业化也得到了缓慢的发展。在推行行会主义的专制政策的条件下，一些垄断集团成立了；到战争危机和失败过去之后，这些垄断集团开始朝有利于它们的方向领导意大利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国家对生产活动进行直接干预的手段越来越多，成立了国家参与投资

423 的企业，并建立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些基础部门。

经济结构、居民社会成分和有劳动能力的居民的比例，在法西斯统治时期并非没有变化，但其速度是缓慢的，规模也是有限的。共产党人对意大利社会酝酿成熟的情况进行了认真研究，即使在法西斯统治时期也是如此；在这些研究当中，他们及时地指出了当时正在发展中的变化的重要性。1940年3月，埃米利奥·塞雷尼准备了一份关于意大利经济形势的报告，这份报告是为党中央提供的。在党设在巴黎的那个中心于1940年春所处的严重条件下，在塞雷尼个人的处境中（为了保持不稳定的合法身份和求得谋生手段，他不得不到一家大的飞机厂当车工），他居然能继续进行考察国家经济状况的活动，那是意味深长的。

塞雷尼阐明了金融集中的情况和意大利工业技术集中的情况（尽管技术集中的程度要小得多）。从整体上看，虽然意大利的工业还处在量的发展水平上，而且又比美国、英国、法国要落后得多，但塞雷尼还是指出存在着工业—金融集团，它们都加入了世界上

最大集团行列，如蒙泰卡蒂尼、爱迪生、斯尼亚以及其他集团。

塞雷尼在转入地下工作之后还继续从事研究，同时还担任了沿海地区的阿尔卑斯山区意大利共产党人小组的政治和组织领导人，这些小组同法国人并肩战斗，反对意大利军事占领。

他的研究成果都收集到一份打字稿中，这份打字稿在他1943年春被捕时曾由其夫人谢尼娅保存好，解放后，以《意大利民族复兴时期的农业问题》为题发表。根据塞雷尼的看法，意大利已从农业工业国变为工业农业国。以下事实证明了这种变化：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已达到450万人，大的工业金融集中机构也已形成。塞雷尼显然要指出大的工业金融集中机构在意大利经济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亦即这些集中机构的领导人（即阿涅利、多内加尼、波雷利之流）对国家生活所起的权威作用以及作为工人阶级基本核心的大企业职工所具有的政治分量。 424

实际上，意大利从农业工业国向工业农业国的转化，在1936—1940年期间才刚刚开始。塞雷尼指出了一条倾向性路线，而这条路线当时刚刚露出苗头。根据1936年的人口普查，农业部的就业人数在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中占48%，而1921年他们则占56.2%；1936年时工业就业人数占32.5%，而1921年时才占24.9%。当时出现了倾向逆转的情况，国家是在通过显示少数几个大集团力量的过程中实现工业化的，而与此同时又产生了多如牛毛的中小型企业，在全部450万工业就业者中，中小型企业职工就占有350万。此外，在1921—1940年期间，私营工业产值第一次超过了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从过去的25.3%上升到34.1%，而农业则下降到29.4%。除了工业生产在数量上的增长外，塞雷尼还指出了工业结构在质量上的变化的意义：从1927—1938年出口成品比例增大；同消费资料部门相比，基础工业和生产资料工业得到了逐步巩固；同纺织工业或食品工业相比，机械工业或化学工

业取得更快的发展；积聚和集中进程迅猛发展。

塞雷尼正确地把注意力放在诸如意大利动产公司和工业复兴公司这样的新兴国营公司的行动上，放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的最初表现上，放在使国家负起在基础工业部门采取主动和进行管理的任务上。基础工业部门的活动是通过财政分配和开辟国内公共市场（公共工程、改良土壤、国家订货）来实现的，这种活动对于发挥资本效能和继续积累过程是必要的。

塞雷尼的分析之所以能敏锐地预见到这条发展中的倾向性路线，当然是有政治原因的。塞雷尼强调指出了侵略性的资本主义有以下现代特征：它是为大的金融工业集团所主宰的，追求成品出口，夺取市场、殖民地和原料来源。塞雷尼通过这一分析向党指出，存在着贪得无厌和侵略成性的意大利帝国主义，不能把它仅局限于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只不过是意大利帝国主义的一个只要合适就可以动用的政治工具。因此，在一部分大工业家起初反对法西斯主义时，塞雷尼就已看出这是“帝国主义反对派”的表现，这一反对派认为，要达到其扩张目标，可以不必通过意大利参战，与德国站在一起，也不必通过保持中立，而是可以通过转到英国和法国一方，实际上在1943年也正是这样做的。

1940年3月，对意大利经济特征和对政府在20年中实施的经济政策所带来的质的变化所进行的研究，必然也属于那场有关战争性质的大规模讨论的范围之内（对共产党人来说，这场讨论则是令人痛心的）；在1939年11月7日之后（当时共产国际曾发出号召，季米特洛夫也写了文章），这场战争曾被认为是帝国主义双方的战争。在意大利共产党人当中，塞雷尼是这一论点最坚定的支持者，这不是偶然的。但是，有关意大利经济当时正在发生质的变化的分析，不应当掩盖意大利经济的普遍脆弱性、其生产基础的局限性以及意大利经济对应付迫切的战争需求无能为力这个根本事

实。尽管工业复兴公司已经成立，但 1938 年的钢产量仍只不过是 230.8 万吨。此外，由于缺少外汇，意大利工业不得不向那些后来与意大利交战的国家出口军火，直到最后时刻。在冲突伊始，意大利经济的普遍脆弱就是一个中心问题，因为它决定所进行的战争只能从失败走向失败，最后陷入灾难。当时，以大金融工业集团为主宰的意大利经济就暴露了重要矛盾，后来在战后的重建和发展阶段，这些矛盾又变得更加明显和尖锐了。

1939 年初，英国在战备方面也处于落后状态，但以伦敦为世界中心的强大的国际财团、英国强有力的工业机器、英帝国提供的并因英舰队控制海域而随时可以动用的资金，所有这些都使英国在相对短暂的时间内能够应付最迫切的需要和制造一些飞机，这些飞机在 1940 年 8 月和 9 月的空战中曾获胜，并且阻止了德国军队企图在英伦三岛登陆的行动。 426

四、意大利的反对派

全国动员由于缺乏起码的民族团结而受阻。造成寡头政治集团分裂的对立，并未能阻止其所有成员在最后时刻还是接受并同意墨索里尼的选择。但这个普遍同意是害怕多于相信的结果，它没有力量促成更为广泛的民意支持。在困难当头时，每一个党魁都想推卸责任，而把责任转嫁给别人，特别是转嫁给墨索里尼。战争被说成是政府所要采取的行动，甚至是墨索里尼个人所要采取的行动。由于采用了进一步强制性招募的办法，国家法西斯党扩大了，到 1940 年已经拥有 360 万党员，但是，由于其官僚机构，它丧失了展开宣传活动的任何政治能力，并且难以控制一批参加其群众组织和工会的成员（约有 2000 万人）。穆蒂接替斯塔拉切任国家法西斯党领导人后，结束了斯塔拉切长期令人窒息的控制，从

而开始了一个由塞雷纳接替穆蒂、维杜索尼接替斯科尔扎的不稳定时期,这表明,战局发展怎样使政权的基层组织即法西斯党本身陷入了危机。

政权固然发生了分裂,并且沿着瓦解的斜坡向下滑行,到1940年6月,反对派却还没有力量用行动来表现它们在国内的存在。反对派不能像1930—1931年期间和1937年那样让别人听到它们的声音。

多少年来,反法西斯历史编纂学者曾试图夸大证明1940年意大利有反对战争的公开反对派存在的证据。有人引用了尼蒂和斯福尔扎写给国王的许多信件,其中要求国王不要把意大利推向战争。也有人力图使证明寡头集团内部存在着反对墨索里尼战争愿望的中立派抵制的证据具有更广泛的意义。有人也早已指出,中立派的这种抵制是不自量力的,因为这种抵制往往出于这样一种考虑:万一战争进展不利,可以由此寻找借口。但如果纵观全国,不能不看到,普遍存在士气低落的情况,能证明反对派哪怕有起码的活动的数据也是寥寥无几的。

省督们的报告虽然指出对参战的普遍担忧和人民群众当中广泛存在的和平愿望,在其“颠覆性活动”一章中却也并未指出,能证明反法西斯情绪继续存在的为数很少的反法西斯活动(在墙壁上书写标语、印发传单、展示红旗)在1940年夏有什么增加,从而改变这方面司空见惯的情况;当时,反法西斯情绪不过只能以某种方式时断时续地表现出来,而始终未能成为有组织的行动。那些被捕后又被送去流放的反法西斯分子、犹太人、重返意大利的移民的数目也不是特别大,无论如何,同1930年、1931年和1937年相比,这个数目要小得多。1940年被特别法庭判刑的人数也相对地少一些,最多的也不过相当于1939年的被捕人数。1940年被捕的人以及被流放的人当中,许多人很快就回到了家乡,并且恢复了他们原来的活

动，当然这些活动是受到警察监视和干扰的。

回忆录、日记和书信表明，法西斯在政治上的一系列胜利，特别是希特勒取得的最后几次大的胜利，给反对派队伍造成的损失有多大。人数很少的反对派队伍中当时散布着这样一个具有煽动性的、令人不安的问题：“墨索里尼是否又一次做对了，靠他的嗅觉选择了良好时机？”

工人阶级经过长期无所作为之后，又重新显示了自己作为决定性反对派力量的份量。当时所有的文件都指出，工人阶级是法西斯宣传最难渗透的禁区。他们不参加也不相信闪电战，并且很快就开始破坏生产，但就当时来说，他们仍然是按兵不动的。虽然已不再是一度存在的丧失信心、无所作为的情况，但仍然是一种间歇，不过，这是一种必将到来的暴风雨前的间歇。在工厂里，那些倔强的共产党和社会党老工人与一些新工人之间的联系日益频繁起来，这些老工人过去长期是很难接近的，而那些新工人则在日益增长的不安情绪的推动下，探索政治方向和更为开阔的理想。

那些年复一年地成为政权的最广泛和最可靠的基础的城乡中等阶层，也失去了过去的信心，并越来越公开地表现出它们的担 428
忧。那些曾对民族主义宣传最为敏感的人们，也警觉地认识到，德国的胜利将可能给本国领土的完整和捍卫意大利独立带来哪些后果。如果我们战败，那将是一场灾难，但如果德国取胜，那将会更为糟糕：由此可以看出一种不安情绪，这种情绪很快就变成了消极怠工，其后又变成了同仇敌忾。这种心理状况从如下一点可以得到证明：1915—1918年战争期间那种志愿入伍的现象已不复存在。当然，也有一些法西斯志愿兵，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如贝尔托·里奇和圭多·帕洛塔，出发时就已经怀着绝望的心情，准备去送死，为的是不看到他们过去曾信赖过的法西斯主义把意大利推向灾难的深渊。

资产阶级上层原是越来越团结在王室周围的，这时也准备好在适当时候把它抛弃。已经准备以天主教接替法西斯主义的梵蒂冈，力图保障君主国家的延续性，因为这个君主国家曾签署了拉特兰条约^①。

所有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都已成为一盘散沙，都各自关心自身的特殊利益。民族团结从一开始就瓦解了。一种无力阻止事态发展的沉重心情占据了主导地位。当时缺少一支能够把各种成分都团结在一起并把所有力量都凝聚到一个目标上的力量，这个目标是：尽快结束战争；把意大利从希特勒的锁链下解放出来，推翻墨索里尼及其政权。这支力量在1940年6月还未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只是在1942—1943年这两年之内才形成，但已为时过晚，未能避免意大利被占领和成为战场，然而毕竟能及时避免使我国像德国那样坠入深渊，同统治它达20年之久的政权同归于尽。

然而，在作出决定的那些日子里反对派没有行动起来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国内当时就没有来自各个阶级和社会阶层、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反法西斯人士和团体了，只不过是他们处于分裂状态，互不信任，政治上无所作为，并受到希特勒胜利以及苏联与美国当时仍然采取中立态度的影响罢了。

429 政权对这些派别的存在采取了容忍态度；对那些最知名的代表，按不同情况加以或多或少严密的监视。它令人厌恶地限制人身自由，特别是行动自由，但并未采取行政措施（如流放、警告），除了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在涉及自由职业者和教师的时候。政府的镇压活动集中对付那些从事地下斗争、破坏法西斯法制的政党的党员。这些政党都是从事反法西斯斗争的，主要是意大利的共产党，但也有正义与自由、意大利社会党和意大利共和党。政府以最

^① 拉特兰条约，指意大利王国同梵蒂冈教廷于1929年签订的以政教分离等为内容的条约。——译者

大的注意力对付共产党,其镇压行动的矛头特别指向劳动阶级,劳动阶级中被警告和在某些节日及某些正式访问期间被定期拘禁的人竟达数千。而对其他一些政治派别,特别是自由党人和天主教党,政权则仅限于采取或多或少的严厉控制。由于得到墨索里尼支持的国家警察局局长博基尼采取精明而慎重的领导方针,警察行动是以灵活机动为特征的,这就使政府能够全面控制形势,而不致使情况过分恶化和进行大批迫害。

各城市的情况也随以下因素而各异:即有无地下活动;法西斯党魁或地方长官和警察局长的方针如何;法西斯领导人同反法西斯代表人物之间是否存在个人的特殊关系。不应忘记,在上述关系中存在着一一种暧昧成分,这种成分只能是在对警察局的档案进行仔细的研究之后才能得到证明。许多法西斯党魁和反法西斯代表人物都有共同的小资产阶级出身,都在同一所学校里学习过,因此虽然他们属于各不相同的政治阵营,却能在一个依然广泛渗透着资本主义前的习俗的社会里,相互保持个人关系。许多法西斯党魁甚至能在一定限度内以先期担保的名义,对他们的反法西斯朋友提供某种保护(这种担保后来在对反法西斯人士进行清洗时果然往往是起作用的)。这就说明何以在战争初期,在法西斯实施特别法14年之后,还有成千上万意大利人可以为从事各自的工作而在国内自由活动,这些人虽然行动消极,却对政权保持一种适当的保留态度,正是这些人后来组成了领导解放斗争并为以后在意大利共和国内开展政治斗争奠立基础的各个政党的领导集团。 430

如果分析一下大区和省一级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员名单,或者分析一下协商会议或立宪会议成员的名单,就可以看出,这些名单有3/4以上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他们在战争初期享有自由,尽管已经采取了谨慎的反法西斯立场。民族解放委员会中央一级的组成是耐人寻味的:其主席是伊万诺埃·博诺米,其成员有天主

教民主党代表(阿尔奇德·德加斯佩里)、自由党代表(亚历山德罗·卡萨蒂)、劳工民主党代表(梅乌乔·鲁伊尼)、行动党代表(乌戈·拉马尔法),这些人在1940年都享有自由(或多或少地受到监视),并都已经在当时就是各个派别的代表人物,这些派别只是在1942—1943年间的冬天才设法改建为政党。只有意大利共产党代表(毛罗·斯科奇马罗)和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彼特罗·南尼)曾坐过牢和流放过(斯科奇马罗曾被连续流放17年),或是曾移居国外(南尼)。

早在1940年就有一支天主教反对派,它凭借一些得到政权合法承认的天主教组织的保护,不动声色,采取谨慎的观望立场,这支反对派的一些成员是早已为人们熟知的老的人民性政治和工会运动的代表人物:阿尔奇德·德加斯佩里、乔瓦尼·格龙基、萨尔瓦托雷·阿尔迪西奥、保罗·博诺米、朱赛佩·布鲁萨斯卡、彼特罗·坎皮利、杰纳罗·卡夏尼、马里奥·钦戈拉尼、埃多阿尔多·克莱里奇、托马索·加拉拉蒂·斯科蒂、伊吉诺·焦尔达尼、阿基莱·格兰迪、斯特法诺·亚奇尼、安杰洛·拉法埃莱·耶尔沃利诺、皮耶罗·马尔韦斯梯蒂、阿基莱·马拉扎、路易吉·梅达、彼特罗·门塔斯蒂、翁贝托·梅林、朱赛佩·米凯利、朱利奥·帕斯托雷、阿蒂利奥·皮乔尼、焦阿基诺·夸雷洛、朱赛佩·拉佩利、朱利奥·罗迪诺、帕斯夸莱·萨拉切诺、安东尼奥·塞尼、马里奥·谢尔巴、朱赛佩·斯帕塔罗、翁贝托·图皮尼、埃齐奥·瓦诺尼。列举这个名单只不过为了说明问题。除了这批人民党老领导人以外,还有天主教大学的教授以及来自天主教大学毕业生组织和意大利天主教大学联合会的青年一代,如阿尔多·莫罗和朱利奥·安德雷奥蒂等。天主教民主党未来的整个领导集团当时实际上已经形成,而且大部分成员也已经选好了。

还有一支自由党和民主自由派的反对派:由于王国参议院的

存在,这一派也有其合法性质;在参议院中,自由党参议员(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奥兰多、贝内代托·克罗切、亚历山德罗·卡萨蒂、路易吉·埃伊纳乌迪、彼特罗·托马西·德拉托雷塔、阿尔贝托·贝尔加米尼,这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阿尔贝蒂尼,他死于1941年12月)保持着得到官方承认的立场。每一个自由党代表人物都在意大利的各个城市成立了进行联络、交换情报和指导工作的中心。有些“沙龙”,如贝内代托·克罗切设在那不勒斯的沙龙和拉法埃莱·马蒂奥利设在米兰的沙龙(他们的沙龙也向最年轻的左派代表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开放),发挥全国性乃至国际性作用,它们是外国观察家和学者必定要去的地方。

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参议员以外,纯粹为了说明问题,还可以简要地列出如下名单:伊万诺埃·博诺米、恩里科·德尼科拉、卡洛·安东尼、温琴佐·阿兰焦·鲁伊兹、朱斯蒂诺·阿尔佩萨尼、维托里奥·巴迪尼·孔法洛涅里、尼科洛·卡兰迪尼、利昂纳·卡塔尼、马里奥·切沃洛托、弗洛里亚诺·德尔塞科洛、吉诺·多里亚、马里奥·费拉拉、安德烈亚·菲诺基亚罗·阿普里莱、弗朗科·利博纳蒂、曼利奥·卢皮纳奇、拉法埃莱·马蒂奥利、恩里科·莫莱、朱赛佩·帕拉托雷、诺韦洛·帕帕法瓦、莱奥波尔多·皮卡尔迪、乔瓦尼·波尔齐奥、维托·雷亚莱、梅乌乔·鲁伊尼、尼娜·鲁菲尼、马尔切洛·索莱里、恩佐·斯托罗尼、马里奥·温奇圭拉、乔瓦尼·维斯孔蒂·韦诺斯塔、翁贝托·赞诺蒂·比安科。自由派的成员当然要比上面提到的少数人多得多。该派有些人是官僚机构上层的要员,也有些官员是乔利蒂一手提拔起来的,有些则是司法当局和军队的高级人士。该派还同意大利经济界领导集团的代表人士保持着密切联系。在自由党一派中,除了自由主义和法西斯前民主派老的代表人物外,还有一些新人,他们是法西斯主义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这些人主张对意大利社会进行一定

的革新,但又希望这种革新在旧有秩序中和在延续性中实现。这一派后来又分为一些不同的政治组织:自由党、劳工民主党和公开主张君主制的团体,这些团体后来同布林迪西政府^①合作。本书只想指出如下一点:在1940年6月出现了一个自由派,它在当时并不为人所知,但后来却能在7月25日危机^②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与此同时还有一支自由社会主义派,其多数人后来促成了行动党的建立,而在该党解散之后,他们又加入共和党或社会党。他们的思想和纲领虽然不同,却拥有相互接近的一种愿望,即都主张确立一支介于老自由主义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即共产党人与社会党人)之间的、能够在行动上把对自由和正义的巨大希望协调起来的政治力量。这就是自由社会主义运动的公开目标,这个运动在阿尔多·卡皮蒂尼和圭多·卡洛杰罗的推动下,当时曾以比萨大学为大本营。自由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那进行思想酝酿的年代里曾是大家思考、研究和讨论的课题。在人们看来,正义与自由这个组织的作用在政治上多少已得到认可,但对大家来说,它应起什么作用毕竟还是一个不应无视的问题,尽管在1943年春解决这个问题时所采取的方法在政治上是暧昧的,在组织上也是草率的。

在那些希望同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工人运动建立联系的人们(如里卡尔多·隆巴尔迪)与那些反对把政治斗争看成阶级斗争的人们(如乌戈·拉马尔法)之间,已经存在着根本的对立。

在自由社会主义派当中,有许多久经考验的坚强的反法西斯战士。许多人没有追随正义与自由去组织非法活动(而埃内斯托·罗西、里卡尔多·鲍威尔、弗朗切斯科·范切洛、内洛·特拉宽迪、

^① 布林迪西,意大利南部一城市。1943年9月,德军长驱直入罗马,意政府采取不抵抗主义,南迁建都于此。——译者

^② “7月25日危机”指1943年7月25日墨索里尼政府垮台。——译者

维托里奥·福阿、马里奥·安德烈斯等人都在监狱中开展这种活动多年)。但是,这一派的所有人都是以具有高风亮节和拒绝与政权达成暧昧协议而闻名的。现也像前面所做那样,将该派人士简略列举如下:费鲁乔·帕里、乌戈·拉马尔法、皮洛·阿尔贝泰利、弗朗科·安东尼切利、阿基莱·巴塔利亚、马里奥·贝林格、诺尔贝托·博比奥、马里奥·博尔萨、利维奥·比安科、马里奥·布拉奇、皮耶罗·卡拉曼德雷、圭多·卡洛杰罗、乔治·坎代洛罗、阿尔多·卡皮蒂尼、比安卡·切瓦、费德里科·查博德、米凯莱·奇法雷利、特里斯塔诺·科迪尼奥拉、费德里科·科曼迪尼、莱蒙多·克拉韦里、埃内斯托·德马蒂诺、弗朗切斯科·德马蒂诺、圭多·德鲁杰罗、圭多·多尔索、塞尔焦·费诺阿尔泰亚、托马索·菲奥雷、弗朗切斯科·弗洛拉、杜奇奥·加林贝蒂、亚历山德罗·加兰特·加罗内、卡尔洛·加兰特·加罗内、利昂纳、金兹布格、阿达·普罗斯佩罗·戈贝蒂、卡洛·莱维、吉诺·卢扎托、奇诺·马克雷利、盖拉尔多·马罗内、埃吉迪奥·梅内盖蒂、马西莫·米拉、乔瓦尼·米腊、奥古斯托·蒙蒂、翁贝托·莫拉、阿道夫·奥莫代奥、马里奥·帕吉、布鲁诺·平凯莱、卡洛·卢多维科·拉吉安蒂、奥龙佐·雷亚莱、路易吉·萨尔瓦托雷利、埃米利奥·斯卡廖内、帕斯夸莱·斯基亚诺、斯特法诺·西利恩蒂、阿道夫·蒂诺、温琴佐·托拉卡、埃多阿尔多·沃尔泰拉。

自由社会主义派早在1940年就已扩展到意大利几乎所有的省份。其成员经常是那些收听伦敦电台广播的小组的鼓动者,他们到处散布伦敦电台的消息,并集结在一起评论事态的发展。该派在年轻的军官中有很影响,而且其影响还随着战争的严酷经历而发展了。自由社会主义派在转变成为政党时,也未能找到一个统一的表现形式。行动党后来在解放斗争中用鲜血作出了非凡贡献,它的历史表明了1940年就已存在着严重的对立,这种对立甚

433

至在它的整个经历过程中也未能克服。

还存在着一个社会党反对派，它虽然没有发展到否认设在国外的领导机构的权威，却由于缺乏国际联系，行动非常自主，它把自己的活动局限在外省范围内，并由于其思想一成不变，始终保留一些老毛病，时而是改良主义，时而又是最高纲领主义。社会党以保存旧传统的精神酷爱自己的信仰，这就使它不能作自我批评式的重新思考和革新式的探讨。自从国内中心的领导人——鲁道夫·莫兰迪、卢乔·卢扎托、欧金尼奥·科洛尔尼——被捕后，国内就没有一个享有全国威望的、在国外中心面前能代表国内斗争需要的社会党的地下组织了。但在各个大区都还有一些社会党小组，它们相互保持着稀少的联系，等待时局发生可能的变化。正是意大利社会党固有的老一套等待主义帮助了党的党员，也帮助了那些没有逃到国外或是经过短期流放又回到自己城市的老的领导人，使他们懂得如何等待良机，并以自己的行动为新一代重新思考作出了榜样并提出了根据。

莱利奥·巴索是1931年从流放回到米兰的；他同共产党和社会党有过秘密接触，但他并未参与多少地下活动，其原因不仅仅在于他对地下活动的正当担忧，而且也尤其在于他不同意鲁道夫·莫兰迪和卢乔·卢扎托所推行的意大利社会党国内中心的路线。他认为，同保存这个老党相比，更需要的是设法建立一个摆脱改良主义和最高纲领主义弊病的新的工人阶级政党。后来，他再次被短期流放；从流放回来之后，他于1940年着手在批判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基础上，建立向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开放的无产阶级团结运动。但他同社会党老的核心人物的保守主义发生了冲突，那些人总是抱住过去不放，鼓励人们对社会主义前途抱有不可动摇的希望。那些来自大学的青年人向巴索靠拢不是偶然的，他们选择了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目标，但他们支持的是一个同老社会党

迥然不同的党。巴索的尝试后来还是失败了，因为他进行这一尝试时未对传统的势力，对老牌社会主义运动所遗留下来的影响作出恰如其分的估价。

有一些社会党人从战争之初就明确主张至少要保持一个松散的联络网并为党的恢复准备条件，这些人有：格雷戈里奥·阿尼尼、加埃塔诺·巴尔巴雷斯基、莱利奥·巴索、路易吉·卡恰托雷、路易吉·卡尔马尼奥拉、多梅尼科·基亚拉梅洛、乔瓦尼·科萨蒂尼、路易吉·法布里、多梅尼科·菲奥里托、韦雷宁·格拉齐亚、安东尼奥·格雷皮、奥雷斯特·利扎德里、马里奥·隆盖纳、伊万·马泰奥·隆巴尔多、维尔吉利奥·卢伊塞蒂、彼特罗·曼奇尼、蒂托·奥罗·诺比莱、马里奥·帕索尼、加埃塔诺·皮耶拉齐尼、安东尼奥·普廖洛、莱利奥·波尔齐奥、朱赛佩·罗米塔、菲尔南多·桑蒂、路易吉·雷纳托·桑松内、阿尔贝托·西莫尼尼、费尔迪南多·塔尔杰蒂、罗伯特·特雷梅洛尼、乔瓦尼·托内蒂、罗伯托·韦拉蒂、奥林多·韦尔诺基、埃齐奥·维戈雷利、多梅尼科·维奥托、弗朗切斯科·扎纳尔迪。

在意大利的共产党内以及在其周围，也陆续建立起一些小组和组织，这些小组和组织同党的中心有一些稀少联系，或者党的中心对它们的存在多少有些了解，但这种了解往往只是间接的。这些小组由于缺少中央倡议，曾试图进行城市与城市（罗马、米兰、都灵）、南部与北部的联系。有些共产党人最后曾以某一种党的合法代表身份同其他派别的反法西斯人士取得联系。有意义的是孔切托·马尔凯西的立场，他是帕多瓦大学拉丁文学史讲师。在那些年里，他通过各种渠道把影响扩大到全意大利，甚至传到像罗马、米兰这样的重要城市。他当时被一些反法西斯人士看成共产党的大使。在1936—1937年左右的一段时间内，罗马的保罗·米拉诺、德利奥·坎蒂莫里、埃玛·梅佐蒙蒂·坎蒂莫里几位教授和斯拉

大语言学家沃尔凡戈·朱斯蒂曾被一些反法西斯小组看成是意大利的共产党的代表。事实上，其他派别的反法西斯人士都在寻求
435 同共产党人取得联系，其目的倒不是为了制定共同行动纲领，而是为了解决一些思想和政治观点问题，因为当时处在这样一个时期：这个时期虽然发生了种种触目惊心的事件，却仍是被认为是处在思想准备阶段。

党代表经常由那些已经出狱和解除流放的同志承担，为了保证地下工作的安全和随时能与那些同样也为警察局所熟悉的反法西斯人士联系，他们都同党的地下组织脱钩。比如曼利奥·罗西·多里亚，在他出狱后曾在罗马进行了政治教育和指导的重要工作，直到后来，因对他采取了不公正措施而迫使他离开了党。另一个作为党的合法代表的例子可说是福斯托·古洛。他在经过短期流放之后回到了自己的城市科森扎，继续从事他的司法工作。同类事例还有一些，但这里只能略举一二。还有一些工人党员曾经时间长短不一地对知识分子小组（他们是共产党人或仅是反法西斯人士）进行过培养和教育工作，如都灵的路易吉·卡普廖洛就是其中一例。

目前，对反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正在根据各地情况加紧进行研究，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也只有这种根据地方情况进行的研究才能对意大利反法西斯主义有一个全面了解，了解它的不同的、独特的政治情况和地理分布情况。一个越来越密集的反法西斯网是根据各个城市和地区以不同方式出现的机会形成的。就像人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法西斯主义统治的年代里，思想交流和人员接触都是有助于政治反对派的形成和发展的。有时候，⁴政权本身也通过其活动和组织机构（文体活动、集会、期刊、展览，等等），为交流和了解提供了各种可能性，帮助了反法西斯思想的传播和反对派的形成。由于这个运动还处在初级阶段，运动各个方面据以产生

的根据和时机是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的，这就使各个方面的独特性占居主要地位，而与此同时，各方面的文化立场和政治立场也必然要发生变化，所以，不应简单地介绍这些政治派别发展的状况，仿佛这种发展是在一成不变的纲领基础上，根据明显的党派之分而发生的。因此，根据不同原因参加正在形成中的各个党派，乃至根据本人经历的变化以及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考虑又从这个党转到另一个党，这些情况都是同上面列举名单时所说明的政治立场情况相符的。 436

此外，运动的特征也是因地而异的，在有些城市，如那不勒斯和都灵，严格的自由主义在文化上和政治上的传统是强大的，在这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贝内代托·克罗切或者路易吉·埃伊纳乌迪和弗朗切斯科·鲁菲尼等人。而在另一些城市，如罗马和米兰这些作为政权的文化生活中心的城市（那里有出版社、科学院、杂志），老的反法西斯主义同新的反对派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多方面的发展，并促进了新经验的成熟。

有时，是出版社在活动，如巴里的拉泰尔扎出版社和都灵的朱利奥·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借助利昂纳·金兹布格和切萨雷·帕韦塞等合作者的帮助，这个新建不久的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在都灵形成了一个活动中心，这个城市是始终存在着皮耶罗·戈贝蒂的影响的，他的学说得到了奥古斯托·蒙蒂、弗朗科·安东尼切利、诺尔贝托·博比奥、卡洛·莱维等人的继承。有时还组织律师小组，比如在那不勒斯从事保卫蓬扎和文托特内两地的流放者的律师小组，这个律师小组是由恩里科·阿尔塔维拉、克劳迪奥·费里、乔瓦尼·纳波利塔诺、盖拉尔多·马罗内等自由党人和民主派人士以及马里奥·帕莱尔莫、温琴佐·拉罗卡、阿德里亚诺·雷亚莱、温琴佐·因甘吉等共产党人组成的。有些艺术家小组也起过重要作用，如米兰的《潮流》杂志小组，这个小组由以下人员组成：

埃内斯托·特雷卡尼(社长)、拉法埃莱·德格拉达、迪诺·德尔博、维托里奥·塞雷尼、阿尔贝托·拉图阿达(以上为编辑)、比罗利、卡西纳里、米涅科、萨苏、莫洛蒂(以上为画家)。

像雷纳托·古图索这样一位画家,从巴勒莫到罗马和米兰,他所作的“耶稣受难”曾于1941年获贝尔加摩奖,他建立了促进新方针发展的宝贵联系。还有由维托里奥·墨索里尼领导的《电影》杂志,使罗塞利尼、阿利卡塔、英格拉奥、德桑蒂斯和普契尼兄弟等人为电影活动带来了新的研究风气,并同诸如卢基诺·维斯孔蒂等人建立了联系。又如那不勒斯的一个艺术中心,其活动地点设在沃梅罗的弗洛里迪亚纳别墅里的保罗·里奇的书房里,其成员阿方索·加托和瓦斯科·普拉托利尼,曾帮助卡洛·贝尔纳里和路易吉·孔帕尼奥内等年轻作家结识了罗马、佛罗伦萨、米兰的俱乐部,并同它们建立了联系。再如佛罗伦萨的“红外衣”咖啡馆、纳塔利诺·萨佩尼奥所开设的罗马大学意大利文学讲座,都是反法西斯运动的联络中心;当时,这个运动还处在组织涣散、不稳定的情况下,有人会突然从自由党的立场转到共产党的立场,但它毕竟是存在着,而且其内部还蕴藏着后来成为解放斗争和全国生活的未来领导集团的一批人员。比萨师范学院在促进新方针的发展和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该校,利古里亚大区的一位年轻学生亚历山德罗·纳塔经常同马里奥·斯皮内拉以及乔瓦尼·皮耶拉奇尼、保罗·埃米利奥·塔维亚尼等不同出身的青年有接触。在佛罗伦萨大学,拉维纳的学生朱赛佩·达莱马同卡利亚里的伦佐·拉科尼有联系。

这就是总的情况,其中以介绍某些大城市和某些活动方面为主,由于篇幅有限,意大利各省的状况就从略了。但是,7月25日之后,在中小城市也立即成立了反对派委员会,这就说明在这些城市也存在着从自由党到共产党的反法西斯小组,尽管它们的活动

几乎一直是消极被动的。说到这里，比提供详细情况更为重要的是应当说明一个普遍现象：在1940年6月，已经出现了一个密集的反法西斯中心和小组网，这时的反法西斯主义已经包括一些思想政治流派，其活动也是合法的了。同时还应当看到，在上述简略的名单中有许多人后来在共和国的新生活中承担非常重要的全国性职务，有的在政界、有的在文学界，还有的在艺术界。

应当强调指出的一个普遍情况是传统的反法西斯人士与一些青年的交往，这种交往早在1940年就已广泛进行了，这些青年从起初采取法西斯立场到后来具备反法西斯觉悟，并不是没有经历过巨大痛苦与踌躇，后悔与错误的。可以看到，这些青年的成熟得到了一些直接成长为反法西斯战士的年轻人所采取的行动的帮助，一些年轻人虽然没有经历过法西斯阶段，却懂得必须不脱离那些加入了法西斯组织的青年，并生活到其中去以帮助他们成熟起来，这种成熟应当主要在对自已的经历进行批判的重新思考的基础上实现。当然，由于一些青年有的加入了法西斯工会，有的加入了法西斯大学生小组（这是那个最活跃，也最少受到斯塔拉切官僚主义压制的法西斯组织），反法西斯青年和来自法西斯主义的青年之间的关系，因参加的组织不同（工会抑或大学生组织）、居住城市的不同、工人运动某些特定传统的多少、文化传统的多少以及参加其中某一组织的教员和青年的多少而异。

438

在1939年和1940年期间，所有政治流派都受到来自不同渠道的新生反法西斯力量的影响。自由党一派从这些新贡献中获益较少，因为它代表着法西斯前的意大利，而这段历史已不能再现。自由社会主义派和社会党一派也不善于利用这一大批人，因为它们对来自法西斯主义的青年抱有歧视性成见，并由于鲁道夫·莫兰迪的消极立场，未能理解这支新的青年队伍所代表的革新反法西斯运动的意义。最能从这批来自法西斯阵营的新生力量

中受益的是共产党，它根据 1936 年制订的民族和解政策，冲破了许多条条框框，而如果保持这些条条框框，那就势必要阻止新老反法西斯力量的汇合。

1940 年，来自大学的共产主义青年已在许多城市同老的反法西斯战士取得了联系，建立了党组织，在同党的中心没有联系的情况下，自行采取行动，以便同其他城市的小组建立联系。这种全国性活动发展最大的一个地方仍在罗马，在那里，党组织在头一年人员遭到逮捕之后，于 1941 年又得到重建，由安东尼奥·阿门多拉、马里奥·阿利卡塔、保罗·布法利尼、彼特罗·英格拉奥、卢乔·龙巴尔多·拉迪切，安东内洛·特龙巴多里、卡尔洛·萨利纳里、罗伯托·福尔蒂和蓬皮利奥·莫利纳里组成的委员会领导，这个党组织当时已自觉地开始进行从都灵到佛罗伦萨、那不勒斯、巴勒莫的协调工作。罗马小组的重要性正在于它所建立的联络网的高质量。它通过萨尔瓦托雷·迪贝内代托不仅同西西里的蓬佩奥·科拉亚尼、埃马努埃莱·马卡卢索和吉诺·科尔泰塞等共产党人组成的小组联系，还同当时与党的中心有联系的米兰小组接触。另一条联络线是由古图索同以下人员建立的关系而形成的：在米兰，同埃利奥·维托里尼、詹西罗·费拉塔、拉法埃莱·德格拉达、埃内斯托·特雷卡尼等人的《潮流》小组建立关系；在帕多瓦，同托诺·赞卡纳罗建立关系（他过去曾同欧金尼奥·库列尔有联系）。

439 罗马小组在都灵通过安东尼奥·乔利蒂同卢多维科·杰莫纳特和路易吉·卡普廖洛有联系，从而同党的国内中心以及马索拉同志取得了联系。在佛罗伦萨，罗马小组则通过维托里尼同普拉托利尼和比伦基联系。以上是从巴勒莫到那不勒斯、都灵这一横亘全国的联络网的一些部分。此外，这个罗马新组织的重要性还体现在该组织年轻成员的作用上，在党的政治行动和国家的艺术与文化活动中，他们都占有极其突出的全国性地位。只要提一下罗马小

组曾培养出像马里奥·阿利卡塔、保罗·布法利尼、彼特罗·英格拉奥(暂且只提这几个名字)这样一些意大利共产党全国性领导人就够了。

五、等待主义的起因

对意大利参战时期反对派情况的介绍不得不是简明扼要的。这一介绍的宗旨是要在不提供过多的消息和个人情况的条件下说明当时存在的一些大的思想流派以及各个流派的梗概,说明当时反法西斯运动所处的尚未摆脱的朦胧状态和反法西斯初期阶段政治进程的发展情况。反法西斯运动据以产生的原因有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原因,甚至也有家庭和不同经济结构的原因,这就说明何以不同城市和不同地区当时存在的情况是如此不同。早在那时就可以看出一些足以说明各个政党后来在意大利不同地区之所以有不同发展的根据了。

前面也指出了政府为何没有出面阻止这些流派存在的种种原因。政权采取容忍态度的主要原因是各个流派行动消极,拒绝从事地下活动(编辑、出版和发行秘密刊物)。这种消极被动之所以产生,不仅是担心被捕和被破坏(这种担心本身是完全站得住脚的),而且主要还是由于政治上不够成熟,由于面对着欧洲民主的崩溃和法西斯主义的节节胜利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思想上发生了危机。

这一思想危机不仅冲击了法西斯上台前老领导阶级的代表人物。像路易吉·阿尔贝蒂尼这样一个人(此人是矛盾重重的意大利自由党的一个勇敢而坚毅的代表),在他晚年时就曾对国家乃至自由文明所面临的黯淡前途感到沮丧,从而得了抑郁症。而且这 440
场危机也同样波及那些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成长起来的人们,他

们当时无力为民主的恢复确定任何前景。在法西斯独裁最猖獗的那些年代里，对迎接仍被看成是自由文明的那个事业的胜利所抱的希望已经大大削弱了。政治上颓废和对自由前途不抱希望，这些表现就变成了消极被动和束手坐待事态发展。证明思想危机存在的一点是：那些反法西斯政党的未来领导人当时著作很少。即使有些著作可以在少数人手中传阅（合法出版物不在其内，因为在意大利文化所处的暧昧条件下合法出版读物一直是可能的），也仍然缺少对法西斯上台以来差不多20年中国家状况进行知识性调查的作品，而这些作品对于确立未来政党的纲领基础是必不可少的。这种在文化建树方面的消极被动，也严重影响了政治组织的活动，致使这些政治组织在成立时缺乏相应的纲领准备。

在前面开列的尽管简略，却已包括了许多名人的名单（这名单有各个流派的主要组织者）里，不仅缺少那些被关在监狱或被流放或被迫流亡国外的反法西斯人士的名字，还缺少数以百计在解放斗争期间和以后曾在反法西斯政党活动中地位显赫的人的名字——我有意把他们编入本书备用人名录了。但是，本书也不想就各个流派的组成提供详细情况，而是想指出战争初期就已存在一些主要政治派别，它们只是在1942—1943年才转变成政党。介绍一个广泛的、具有多种政治背景的与法西斯主义相对抗的反对派存在的情况（这个反对派实际上已处于某种“半合法化”地位），其目的在于提出如下问题：为何一定要再等上两年才开始组成真正有组织的政党呢？这已经是迟延了，因为这对7月25日通过君主制国家政变推翻政权已经产生了严重影响。

正如前面所说，当时发生了前景危机，这个危机由于希特勒迅速获胜而变得更为严重了。而且还有一种不信任和灰心丧气的情绪，这种情绪在1940年夏影响了所有意大利人。从占领埃塞俄比亚和干涉西班牙时代起，反法西斯战士就已经好不容易地解决了

把祖国同政权当局、把希望法西斯主义失败的民族利益同民族因战争的不幸结局而不得不蒙受的损失区别开来的艰巨问题。这是一个一直难以解决的问题，不仅对于那些受过把民族与国家视为一体的教育的人们是这样，对于那些多年来一直接受无休止的民族主义宣传的人民群众也是这样。只有战争的炮火才使人们懂得，为了避免更严重的损失和确保民族的前途，必须使意大利尽快脱离战争，从政权当局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寡头统治集团内部的对立在1940年6月具有策略性质，因而未能打破政权当局的团结；而且在人民群众还来不及行动起来支持中立派时，这些对立就又快消除了。

这一普遍消极状态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仍然缺少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对抗力量的压力。这支力量还在按兵不动。到1943年3月，这支力量才行动起来，这时，整个形势就在军事失败的外部打击下和工人阶级自下而上施加的内部压力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直到1940年6月，工人阶级仍处于麻木不仁状态，这种状态是一般原因（法西斯主义的节节胜利和德苏条约）造成的，但也是如下原因造成的：共产党不仅不能提出有效的行动方针，而且也不能同工厂建立联系。

在政权危机出现初步征兆时，国内就感到缺乏一支能够推动意大利反法西斯主义各派相互接近的积极进程的政治力量了。这样一支力量只能是有组织的、战斗的反法西斯政党，只能是拒绝落入政权的合法化圈套并把中心建立在国外的政党。在慕尼黑事件和西班牙共和国失陷之后，这个反法西斯政治运动的中心已经陷入了危机。而且德苏条约签字之后，这场危机又进一步加剧了，因为条约把共产党人与社会党人、正义与自由成员及共和党人割裂开来。但在巴黎沦陷之后，老的政治中心除了上述政治决裂之外，又发生了组织上的分裂和瓦解，而这个中心长期以来一直在巴黎

442 奠定了它在理论建树和政治领导方面发挥全国性作用所必需的政
治基础和物质基础。

尽管国内对反法西斯各党的国外中心不断提出批评，这些党的领导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威望却始终是崇高的。巴黎曾是战斗的反法西斯运动处理各党关系、不断进行制定政治路线和展开思想政治论战的活动以及处理同国家关系的有组织的中心。巴黎是距离边境只有几小时路程的一座大城市，在它的内部，能容纳1914—1918年战争之后来自整个欧洲的各种政治移民组织的代表人物（他们是由于这次战争后发生的重大事件而来到这里的），因此，它成了意大利反法西斯运动真正的政治首都。巴黎失陷之后，这个中心也就被破坏了。在逃离巴黎的一批批难民中，也有意大利反法西斯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们同法国公民混杂在一起。

其中许多人跑到了美国（卡洛·斯福尔扎、路易吉·斯图尔佐、阿尔贝托·塔尔基亚尼、阿尔贝托·钱卡、兰多尔福·帕恰尔迪、阿尔多·加罗西，还有莱奥·瓦利亚尼）。加埃塔诺·萨尔韦米尼也在美国。保罗·特雷韦斯、皮耶罗·特雷韦斯、翁贝托·卡洛索和鲁杰罗·奥兰多则跑到了伦敦。弗朗科·文图里在西班牙被捕后被交给了法西斯警察局。在纽约成立了一个旨在代替巴黎中心的新的中心，但由于下列各种原因未能成功：直到那时，意大利的移民组织受到亲法西斯主义组织的广泛监督；由于共产党在美国力量弱小，这就使反共方针占据上风。团结在贝尔蒂、多尼尼以及《工人国家》美国版周围的意大利共产党人小组相当孤立。同这个小组联系在一起的是由维托里奥·维达利领导的居住在墨西哥的意大利共产党人（很快就改由马里奥·蒙塔尼亚纳领导了）。马志尼社团是一个想收容全部政治移民并按照戴高乐将军提供的榜样成为一个具有政府代表职能的解放委员会的基础的政治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为了接受还是拒绝共产党人参加，曾进行

过长期斗争。后来，帕恰尔迪建议在美国参战时，为了同盟军并肩作战，可在美国成立有组织的外籍志愿军团，但美国政府没有接受这个计划。这一斗争后来只是以一个绝大的多数（600 多张票）获胜而告终，这个多数拒绝了共和党一派（200 张票）的建议，共和党的建议是：采取主动，在不排斥任何政治倾向的条件下，建立一个更广泛的反法西斯行动和声援阵线。反共阵营的胜利终于使纽约的反法西斯中心丧失了活动能力。 443

自陶里亚蒂和格列科从法国返回国内之后，意大利共产党设在莫斯科的中心的权威得到了加强，这个中心是在共产国际内部进行工作的。由于陶里亚蒂的威望以及 1941 年 7 月之后收听“米兰自由电台”广播和陶里亚蒂用马里奥·科伦蒂的化名在莫斯科电台广播的讲话的人很多，莫斯科中心能给分散在法国、瑞士、南斯拉夫或者留在国内的共产党人的行动提出共同方针。但汇聚在苏联的共产党人仍然不能直接参加意大利国内的反法西斯运动的恢复工作。旅居在美国和苏联的意大利反法西斯人士只是在 9 月 8 日之后才得以分别从纽约和莫斯科返回意大利南部。

留在法国的反法西斯战士也是在 1940 年 6 月 10 日才获得更大的行动可能的。

意大利的共产党的国外局和参加法国人民斗争的移居法国的意大利共产党人的地下组织仍留在法国。彼特罗·南尼和朱赛佩·萨拉盖特等意大利社会党的高级代表人物也继续流亡在法国未被占领的地区，另外还有博齐（不久被法国当局逮捕并被遣返意大利，后被流放）和莫迪利亚尼（后逃往瑞士）。弗朗切斯科·萨韦里奥·尼蒂也留在法国，还有安杰洛·塔斯卡，他甚至加入了法国籍，并成了贝当政府的合作者和主张法国也像德国和意大利那样来一个“革命”的充当法奸的社会党人机关刊物《努力》的编辑。此外，正义与自由的西尔维奥·特伦廷、福斯托·尼蒂等代表人物

也留在法国,1942年,埃米利奥·卢苏也赶来同他们会合在一起;卢苏是在秘密潜往伦敦和纽约之后,为了接近本土而非法进入法国的。

意大利移民广泛参加法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这就为各方统一接近提供了基础,而这种接近早在1941年初就开始了。这些条件
444 使意大利反法西斯运动的统一中心“争取意大利人民联合行动委员会”得已于1941年9月在图卢兹重新建立,这对国内反法西斯各派发挥了具有统一性质的作用。1942年底,各政治流派改建为政党,也得到新的反法西斯国外中心所采取的行动的促进,该中心秘密地设在被占领了的法国。共产党人为新的统一中心的成立和活动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这些共产党人的活动是受1940年春在巴黎秘密成立的国外局领导的。

第十七章 战争的民主性

445

一、党的恢复

1939年8—9月的几周里,党的中心遭受了一系列沉重打击:8月会议的失败,德苏条约的签订,战争的开始,法国对共产党人的迫害,陶里亚蒂、隆哥和其他同志的被捕。在这种条件下试图使德苏条约的通过与继续推行反法西斯团结政策调和起来的意图终于失败了。其失败的原因首先在于这种意图本身内在的虚弱性,其次则是由于其他反法西斯政党都拒绝同共产党人保持团结联系,或是由于法国政府不愿意使战争具有任何民主特征,而希望通过外交和军事途径进行这场战争,不想放弃同仍处于不参战状态的意大利达成可能的协议。

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9月28日在莫斯科会晤,当时德苏两国要求英法两国立即媾和,否则就会被看成是继续战争的罪魁祸首,在这之后,共产国际采取的立场使党的中心的危机进一步加剧了。法英两国对希特勒10月6日讲话中提出的建议给予否定的答复。共产国际在11月7日纪念十月革命时发出了号召,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发表了题为《战争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文章,这篇文章在所有共产党的报刊上都刊载了,并在党处于地下的国家里秘密地散发。这两份文件确定了对所有共产党人都有效的方针。

这些方针指出,应当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看成是同第一次世界

大战一样，都是瓜分世界、瓜分殖民地和原料基地以及控制海洋的帝国主义战争。不仅没有必要再去区分侵略国和非侵略国，而且英法两国帝国主义者都被谴责为主张继续战争的最狂热的鼓吹者。因此，共产党人和工人阶级必须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本国的帝国主义。为了进行这场斗争，共产党人不应当谋求同社会民主党统一行动，因为他们已经带着武器和行囊全部投入到帝国主义阵营里去了。此外，共产党还必须清除党内机会主义分子，因为他们认为英法两国进行的战争具有反法西斯性质。

共产国际的立场是对法国共产党的直接打击，它要求法国共产党不要“保卫祖国”，不要反对德国，而是要给法国帝国主义以打击。这一方针使法国共产党人在“奇怪的战争”期间和法国战役的那几周里陷于瘫痪。人们看到，这样一条路线曾怎样阻止法国共产党及时地和公开地提出保卫巴黎和改变战争性质的建议（其办法不仅可以是非正式地朝着法国政府一名成员迈出一步，而且也可以是向法国人发出号召）。固然多列士当时擅离职守可以解释为出于避免被捕的需要，但这时从共产国际的新方针来看，这件事就具有不同的意义了。法国共产党领导机构曾在一份秘密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手册》上发表声明，公开批评党过去采取的态度：即投票赞成战争贷款，坚持主张执行反法西斯团结政策。声明断言，这一错误方针在整个9月份一直推行。这样一来，纠正这一方针的时间就同莫洛托夫与里宾特罗甫9月28日会晤的日期恰相吻合了。

德国共产党人也没有从共产国际方针中得出同样的结论，以便加强反对本国帝国主义、因此也就是反对德国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有组织的表现形式——纳粹主义的斗争。在1940年2月《共产国际》期刊上发表威廉·皮克写的一篇文章里，德国共产党表示

要利用共产国际所采取的立场来强调指出法英帝国主义的责任（说它们是“最狂热的战争鼓吹者”），从而减轻德国帝国主义对继续战争所负的罪责。尽管德国共产党人也谴责德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但他们最后却在使用单纯而抽象的阶级论语言的同时，忘记了纳粹主义的存在，忘记了纳粹主义对内残酷镇压和对外疯狂侵略的性质，没有得出像共产国际发出的号召那样的结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德国共产党人的立场给法国集中营的生活带来了消极后果，在那里，德国共产党人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都被关押在一起，其中也有许多意大利共产党人。德国共产党人的立场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这些讨论使那些被镇压的共产党人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经受了严峻考验，他们在对当时事态的分析方面发生了分歧。德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削弱它反对纳粹主义的力量呢？是否由于它习惯于作为共产国际的第一个最守纪律的学生和为了恢复它直到第七次代表大会为止所享有过的特权地位呢？要么则是为了同当时陶醉于民族主义精神并为第三帝国的节节胜利而感到自豪的德国人民群众重新取得联系？当然，德国共产党人的这种错误的出发点无助于他们旨在阻止希特勒把德国连同他自己拖进那最后的灾难，而又不致遇到德国人民有效抵抗的行动。毫无疑问，共产国际的方针遏制了欧洲许多国家共产党的反纳粹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行动，尽管在某些历史追述中，想把各个共产党本身固有的许多弱点所应负的责任完全推给共产国际的意图也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意大利共产党人来说，季米特洛夫的文章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文章说：意大利正在等待这一方或那一方获胜的可能性变得更加明确的时刻，以便站到可能的胜利者那一边。因此，意大利共产党人应当在反对本国帝国主义及其工具法西斯主义的同时，为防止意大利参战，防止意大利从不参战变为积极参加这一

方或那一方而斗争。事实上，共产党的任何文件都没有关于削弱反法西斯斗争愿望的证明，虽然从事这一斗争的种种根据在1939年9月至1941年6月这一时期里，由于犯了宗派主义，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和不自量力的。

意大利共产党曾通过一份文件对战争的爆发表示了立场，这份文件正式标明的日期是10月10日，并有意把发出的地点伪造为苏黎世，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把法国和意大利警察局的注意力从巴黎转移开来。事实上，这份文件并未在法国散发，也没有在以某种方式同中心保持联系的人数有限的小组的同志们当中散发。这份文件在1939年10月《斯巴达克通信》第一期里转载了。但《斯巴达克通信》只是在1940年3月初即陶里亚蒂出狱后才开始出版的，这是一份有待翻印的打字稿材料，其目的在于向干部指明方向。这份刊物之所以这样定名，原因是要号召继承1919年都灵工人传统，但也是要树立革命意志，要表明逆流而动、在充满革命失败主义的艰难道路上前进的决心。

10月10日的文件之所以重要，唯一的原因就在于它表明当时设在巴黎的那人数不多的领导集团的立场。文件照抄了法国共产党在转变立场的那几天所遵循的路线，但这份文件的起草日期想必比所说的日期晚几天，因为文件采纳了季米特洛夫文章确定的一些立场，尽管不是自始至终都是这样做的。文件否认法国和英国所进行的战争的民主性，批判墨索里尼的“投机性中立”，希望尽快实现和平。如果墨索里尼违背意大利人民的和平愿望而决定参战，那么，意大利的共产党将号召意大利人民“为争取使法西斯政府在战争中遭到挫败、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而斗争”。因此，这不是一个“欢迎战争”的政策，不是要通过战争促使法西斯主义崩溃，而首先是一个和平政策，如果战争终将不可避免，那么就将为争取法西斯主义的失败而斗争。对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

义的直接抨击，并不因为使用平庸的经济主义和抽象的阶级论语言而失去它的政治性和份量。最后，文件还谴责社会民主党背叛了工人阶级的利益，首先是谴责意大利社会党，因为它“落于叛徒塔斯卡领导之下”。还有一份文件题为《意大利与战争》，落款时间是1940年1月1日，发表在《斯巴达克通信》第四期上。这份文件着重揭露法英两国帝国主义强盗试图把意大利拖入战争，并在德国失败的那些地方得逞。矛头指向社会党的论战甚至扩大到针对南尼。⁴⁴⁹

如果过分看重这些文件，那就错了。这些文件同党的领导机构在那些年通过的许多其他文件一样，主要是用来确定党在一些特定时期所采取的政治立场的。其实，这些文件的散发范围很窄，对于那些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分散和缺乏联系的意大利共产党人的方针和实践产生的影响也是非常间接的。1939年10月10日和1940年1月1日的两份文件的主要目的是向共产国际保证：意大利共产党人是守纪律的。而10月10日的那份文件还保留了9月即战争爆发之后采取的最初立场的痕迹，所以曾受到严厉批评。在前面已经提过的由格列科和马尔蒂尼于1940年6月在莫斯科起草的、提交给共产国际的那份文件里，承认意大利的共产党当时对在欧洲爆发的那场战争的政治原因作了错误的评价，即没有从被斯大林称为“战争挑衅者”的“民主”国家的统治集团行动中去找原因。10月10日的文件之所以遭到批评，是因为它削弱了反对亲盟军和主张参战的“民主”派别的斗争。格列科相反却要求承认“8月底的两份文件”的有效性。但这两份文件并不为人所知。人们不得不这样想：这两份文件可能都是格列科自己起草的，但不可理解的是，为何在8月底就按照他的要求如此激烈地反对亲盟军和主张参战的“民主”派别，这明明是同陶里亚蒂被捕前在写给意大利社会党的信中所遵循的路线相对立的。格列科和马尔蒂尼似

乎有意把实际上在10月才采取的立场提前到8月底采取了。

人们对起草这两份“虚幻”的文件的情节至今还不了解，现在之所以提到围绕这些文件展开的激烈论战，主要是为了说明意大利的共产党的旧中心当时是怎样陷于混乱和政治上茫然失措的状态，说明格列科和贝尔蒂等同志之间当时是怎样进行远距离的严酷斗争。事实上，团结在意大利的共产党领导机构周围的所有旅居在法国的共产党人中间以及或多或少地同这个领导机构有着密切联系的党员中间，存在着巨大的混乱，有些党员则甚至完全陷于茫然失措的状态。

一些依然被德苏条约困扰的同志不接受季米特洛夫文章所作的路线修正，特别是不明白也不接受把论战的矛头指向英法帝国主义者和减轻德国作为侵略国应负的责任，迪·维托里奥、蒙塔尼亚纳、帕罗迪等同志就是这样。拒绝认为法国进行的战争具有民主性这一点也未被接受，根据上述同志的看法，尽管法国政府采取专制和反人民的行动，这一民主性却仍然保持住了。迪·维托里奥是很敏感的，他反映了同法国共产党人和劳动者保持着日常接触的广大侨居法国的意大利共产党人的意向；尽管有各种指示，法国共产党人和劳动者却认为，希特勒始终是头号敌人，他们谴责法国政府没有以必要的力量进行战争，并听任希特勒的代理人逍遥法外。少数同志听说过迪·维托里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主张意大利参战，于是就把他现在的立场同过去的过失联系起来，并不择手段地展开了一场激烈论战。正是在这种激烈论战和政治上举棋不定的情况下，马里奥·蒙塔尼亚纳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使他长期受到责备）：“最好还是被捕，至少在监狱中不会犯政治错误”。这又是一个幻想，当时在文托特内的党小组领导机构（斯科奇马罗、谢嘉、利考西）正是在同一问题上同特拉齐尼、卡米拉·拉维拉进行了几周的斗争，这场斗争就证明了这一点。

而另一些同志，如格列科（根据他本人在莫斯科起草的文件，就可看出他的立场），则是主张加剧反对英法帝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论战的。这些论点当时由塞雷尼、多扎、泰雷萨·诺切等同志在巴黎十分积极地重新提出来了，并在理论上努力深入探讨，加以传播。塞雷尼认为，必须在批判帝国主义和研究经济结构这一坚实的基础上对战争性质重新作出分析。英国和法国是两个帝国主义已经发展到最高阶段的国家，它们反对德国的斗争是为了保卫殖民帝国和统治海洋的需要。这些同志的态度也是根据如下需要采取的：在8、9月的失去控制之后，需要加强严格的共产党纪律，并毫无保留地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⁴⁵¹

在这两种极端立场的中间，特别是在那些参加过旧的领导机构的同志们当中（他们为了取得工作证件和谋得一席职位，不得不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由于听到的消息、接触的人和物质生活的困难各不相同，许多人是摇摆不定的，而且普遍处于迷失方向的境地。当时，团结前景已不复存在，共产党人还没有找到重建党的新的政治团结的前提和组织强大政治行动的条件。

今天，已收集到的所有文件、党员们撰写的回忆录和各种证明材料却都表明，在那几个月里，全国——共产党人之间、共产党人与其他反法西斯战士之间——都在展开热烈的讨论（也许程度上不如移居国外的人们当中进行的讨论那么激烈），因为各方都在力求弄懂事情的真相，而由于他们缺乏可靠的消息，同时又拒绝政府新闻机构提供的消息，认为这些消息都是不真实的，所以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推迟对当时正在进行中的战争的性质作出判断。其所以如此，特别是由于这些讨论在许多情况下似乎是抽象的，既然应当打击的敌人不容置辩就是法西斯政权，而它在意大利又是时时刻刻都存在，都在你的身边，都可以看到。至于把意大利拖入战争的危险，对于意大利人来说，勿容置疑，这一危险始终来自德国，而

不是像1940年1月1日的文件硬说的那样来自法国和英国。

讨论激烈的地方是在文托特内的共产党组织内部。关于这一讨论的发展状况在下面对当时监狱和流放岛屿的政治情况进行总的分析时还会再谈。

1939—1940年的冬天，是意大利的共产党的领导机构缺乏政治团结的时期，它不可能利用意大利参战前的几个月在国内采取政治行动，使反对墨索里尼每一个作战决定的斗争运动得以团结一致地和有效地开展起来。党缺乏这种政治团结究竟产生了多大影响，那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了。

452 在那几个月里，意大利的共产党力量已经达到了最低点，后来又开始缓慢恢复，但也只是在陶里亚蒂1940年2月出狱后才开始恢复的。陶里亚蒂在巴黎的短暂逗留立即被大家知道了，尽管谁也不直呼他的名字，他的出现好像使意大利共产党人越过冬眠开始复苏，给他们生活和工作带来了新的推动力，使他们无所作为的力量振奋起来了。

陶里亚蒂努力制止仍在进行中的讨论，因为这种讨论有使已经所剩无几的领导中心陷于瓦解的危险。必须完全接受共产国际制定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路线。不管是否坚信那条路线的效用，他还是像以前那样，认为继续进行这种令人心碎的讨论就会比接受领导机关制定的路线（尽管在思想上有保留）造成更多的危害，就会使党的工作陷入瘫痪。陶里亚蒂可能对那条同他自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所遵循的路线相对立的路线抱有保留。但他当时是共产国际的一位书记，他不能流露出任何保留。他果然就严厉批评了老的领导中心所表现出的纵容迁就和机会主义。

他在共产国际路线的范围之内，把党的注意力集中到国内方面。意大利的共产党的战场应是国内，是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意大利帝国主义的斗争，党的政治努力和组织努力应当集中在国内。他

建议出版《斯巴达克通信》；他为该刊撰写的第一篇文章刊登在第三期，他在文中严厉批评一些同志相当长一段时间一直把两个交战的帝国主义集团从感情上区分开来，并以同情心看待英法帝国主义集团，甚至指望英法集团采取一些行动，能使战争的性质得以改变，成为反对希特勒主义和争取自由的战争。

陶里亚蒂对那些因为政治混乱而看来已完全陷于茫然失措的同志的态度非常强硬。他对马里奥·蒙塔尼亚纳的影射是直接的，因为他在文章中写道：有些人有时似乎宁可被送到集中营去，而不愿继续留在工作岗位上，更不愿意采取一切措施争取长期留在工作岗位上，这样就可以不必负什么政治责任。《斯巴达克通信》⁴⁵³发表的那篇文章是对共产党人责任感和必要的政治勇气的严肃召唤。意大利共产党人的主要敌人在本国，但也不能使自己孤立于工人运动及其意向之外。文章的最后这句话代表了摆脱政治困惑和着手进行工作的一条出路。一切要立足于本国，那里有敌人，有法西斯主义，意大利共产党人应当从同意大利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中找到旨在集中打击法西斯主义的直接行动的首要条件。

陶里亚蒂认为，出于要从事地下活动的考虑（在法国存在着战争状态）和政治原因（个人之间存在严重对立），解散旧的领导中心，并由那些没有受到老经验牵累的同志组成国外中心是适宜的。因此，他在确认了贝尔蒂在纽约为《工人国家》刊物的领导人、把格列科调到了莫斯科（但未委以政治责任）之后，成立了由诺韦拉、罗阿西奥和马索拉组成的国外局。内加维莱当时已在赴莫斯科途中，也被调回巴黎作为新机构的候补成员。

罗阿西奥曾同贝尔蒂、格列科和迪·维托里奥一起于1938年成立了“意识形态中心”，他是该中心唯一被吸收参加新机构的成员。这个新机构在政治上是平稳的，反对卷入个人之争，是具有战

斗力的，因此，它是党的连续性、同时也是党的革新能力的一个保障。由于诺韦拉铁一般的政治毅力和内加维莱的敏锐智慧，国外局使党在政治上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内加维莱后来被调往巴黎接替马索拉，因为马索拉去了南斯拉夫）。陶里亚蒂还开列了一个名单，这个名单同他后来从莫斯科寄给马索拉的那份名单是一致的。名单上的同志都被称为“健康”的同志，因为他们都没有参加过那些给党的中心带来痛楚的论战。为了说明这一情况，他举出了斯科蒂、阿门多拉、莱里斯和兰普雷迪的名字。但对留在法国的其他同志的任务却没有指明。他在路过巴黎时，曾要求免除那些原领导机构成员的职务，让他们有可能到基层去工作。但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既要保持合法地位，又要自谋生路。这就等于使党的旧中心实际上陷于解体。

454 陶里亚蒂到莫斯科后，同共产国际书记处的同志们又重新取得联系，并推动意大利的共产党的整顿工作。在格列科和马尔蒂尼所写的非常严厉的批评报告之后，共产国际书记处同意解散党的旧中央委员会和其他一些领导机构，如1938年成立的意识形态中心，并决定在莫斯科成立由陶里亚蒂领导的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导中心”。此外，共产国际书记处还决定成立其他一些“领导点”，主要从事以下工作：重建同国内的联系；准备并向意大利寄送宣传鼓动材料和马克思主义著作；培训并向国内选派党员，其任务是推动党及其领导集团的整顿工作；在大城市以外的意大利军队中开展鼓动工作。上述各“领导点”的负责同志和那些派到国内去帮助重建组织的同志，都应当被看作党的领导机构的“代表”。必须避免重犯想从国外具体地领导党的工作的错误。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到考察国内干部的问题上，采取一切手段扶植他们，把他们看成“党的领导机构的代表”，应当赋予他们领导国内工作的职权。

关于整顿意大利的共产党的工作的计划是在共产国际的一次

主席团会议上最终通过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导中心”由陶里亚蒂、温琴佐·比安科和里戈莱托·马尔蒂尼负责，由他们就重建领导机构和安排与使用党的“健康”干部提出具体建议。值得注意的是，在新中心的人数不多的委员会中既没有格列科，也没有多诺弗里奥和其他旅居苏联的同志，如路易吉·阿马代西、乔瓦尼·法里纳、安德烈亚·马拉比尼等。以上作法表明了陶里亚蒂的宗旨：责任下放，创建许多“领导点”，使用那些未参加过旧领导机构的同志，选拔新成员。

以下决定得到了确认：由国外局负责从法国推动以国内为对象的工作；由切萨雷·马西尼和翁贝托·马索拉作为领导机构，即在莫斯科成立的新中心，亦即陶里亚蒂的“代表”负责打入意大利，建立“领导点”。⁴⁵⁵

马西尼试图从瑞士进入意大利，但未能成功而折返巴黎，后在巴黎被法国警察局逮捕，并被移交给意大利警察局。马索拉则于1940年6月7日赴南斯拉夫，恰好在意大利参战前夕到达卢布尔雅那；他在那里停留期间，得到了南斯拉夫同志的帮助，并于1941年8月1日成功地进入了意大利，成立了一个“领导点”，这是未来的国内中心的第一个核心。马尔蒂尼(绰号图蒂)被派到卢布尔雅那，在那里负责建立陶里亚蒂和马索拉之间的直接联系。他进入意大利后被捕，患重病，1942年6月死于奇维塔维基亚监狱。

莫斯科领导中心还决定派朱赛佩·阿莫雷蒂去纽约加强《工人国家》的领导工作，这份杂志被认为必须进行彻底改变。该刊1940年8、9月发表了一篇文章，论述《战争一年后的欧洲力量对比》，这篇文章介绍了苏联的军事力量和经过6月调整后出现的边境情况的改善，但受到了严厉批评，因为它没有强调斯大林关于苏联对外政策“同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者利益”一致性的论点是正确的。陶里亚蒂的批评是表明他决心在当时不引起别人对意大

利共产党人真正拥护共产国际路线产生任何怀疑的一个新迹象。此外,文章之所以受到批评,还因为它明显流露出认为苏联与德国交战将是不可避免的一种倾向。这样一来,根据由陶里亚蒂和温琴佐·比安科签发的文件的看法,《工人国家》就是采纳了英美帝国主义报刊的观点。这份文件的签发日期是1940年11月16日。然而,就这一日期来说,即在德国在西线迅速取胜之后,认为德苏条约即将破裂和预见德国将要入侵苏联,看来并不是过分错误的。阿莫雷蒂把莫斯科中心的批评告知了《工人国家》,但他未能抵达纽约。1941年1月他因病死于赴日本的途中。

456 在共产国际主席团召开的会议上,在意大利参加战争、同德国并肩作战时公布的政治路线得到了重新确认。这个声明是陶里亚蒂亲自撰写的,日期是1940年7月2日。在这份号召书里固然还有“工农政府”和“革命失败主义”等提法,但也重新提出了团结政策,声明意大利的共产党愿意同一切准备为争取停止军事行动和争取无吞并的和平而进行有效斗争的一切政党、组织和小组合作。巴黎的国外局也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开始谨慎地发展这条路线,始终保持着对法西斯主义和墨索里尼本人的抨击。在意大利参战时,国外局揭露了墨索里尼这种干涉行动的掠夺性,并发出了革命失败主义的口号,这句口号在意大利具体地变为要努力争取“法西斯主义失败”,要采取一切手段做到这一点。从要求增加工资到破坏生产和为争取政治自由而斗争。要促使从基层起采取统一行动,甚至不惜反对意大利社会党的领导人,因为他们被看成是叛徒。这又是对共产国际1939年11月7日制定的路线的让步,但是,在陶里亚蒂从莫斯科签发的号召书里丝毫未提及同社会党领导人的论战,这倒是耐人寻味的。

不论如何,从1940年3月到7月,意大利的共产党通过莫斯科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导中心”的行动,通过巴黎国外局的活动和

马索拉开始完成的使命，也通过纽约《工人国家》的发行，毕竟克服了1939年9月到1940年2月这一期间出现的危机。国外局采取了一些重要行动：通过合法途径向意大利派送侨居国外的共产党员，他们的任务是把党的方针、指示、报刊送到国内他们的故乡，并向中心报告消息。这些都是党的工作的重要部分。在当时的法国，意大利人可以随意找到工作，而且工资优厚（由于战事要求加班加点之故）。尽管许多意大利国外移民，主要是工人，回到了意大利，为的是在国内建立同党的中心的联系，有时，这些人还面临着应召入伍的危险。为了使享有领事馆给予的优待条件的合法人士当中有更多的人回国，意大利共产党人在侨居国外方面的工作作了重新调整，组成了一些自主小组，这些小组同在法国的地下组织不发生联系。1940年3月，国外局把组织回国的意大利共产党员的工作交给了阿门多拉。在短短的几周内，这项工作取得了宝贵成果。法国战役开始之后，为了便利国内工作，又决定在马赛成立南部活动中心，当时斯特法诺·斯基亚帕富利已在那里。费代利（在尼斯）和阿尔贝甘蒂（在土伦）已被逮捕，但是，他们建立了能给党的活动作出有益贡献的意大利共产党人小组。尽管斯基亚帕雷利被捕并被关押了好几个月，但马赛中心在意大利参战后便开始工作了。这个中心开始时由两名码头工人同志组成：斯特法诺·布劳和阿利基耶罗·邦恰尼（邦恰尼后来在米兰作为游击行动小组成员壮烈牺牲，当时他曾向来追捕他的党卫军开枪），后来马里诺·马来蒂也参加进去。这个中心在短时间内进行了同自由区各个大区中心联络和整顿的有益工作。共产党人除了在回国的意大利劳动者中开展宣传活动外，还收集资金，寻找住房，制作假供应卡，使一直同巴黎中心脱离联系的组织能够自己解决活动经费。

1940年6月10日对于国外局来说不是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日子。国外局早已对路线进行了初步纠正，毫不含糊地再次确认法

西斯主义是头号敌人。它那时早已开始行动起来，从国外移民中物色可供国内使用的必要力量。党当时在政治上虽然还十分孤立，但后来在意大利参战造成的新形势下，开始摆脱这种境遇。

二、意大利最初的失败

战争一开始就对意大利不利。动员是局部的、缓慢的和混乱的。6月10日突然作出的决定带来的第一个后果就是损失了商船队的1/3，由于未及时得到通知，该船队未能逃避到中立国港口。法国的迅速崩溃促使墨索里尼把未制定好的计划搁置起来，而决定在阿尔卑斯山战线发动进攻，力争在法德两国签订停战协议之前取得某些战果。6月15日，墨索里尼命令巴多利奥发起进攻，17日，这项命令又传给了格拉齐亚尼。进攻开始于6月21日，即在雷东德停战协议签订前一天。这样，在短短几天之内就要使原为防御作准备的阵势改变部署，转为发动进攻。普遍的准备不足立即暴露出来。各师人员未能完全齐备，进攻性武器缺少，可供使用的少数飞机不足以覆盖从瑞士到海上的漫长战线，后勤服务和军需供应迟缓。根据参谋部制定的计划，意大利的行动本应通过三个方向展开——小圣伯纳德山口、马达莱纳山口和沿海公路，但目标是共同的，那就是马赛。然而，由于法军的堡垒得到地形和恶劣天气条件的保护，这使他们能在堡垒里比较容易地进行抵抗。意大利军队好不容易地抵达蒙托内，这时已是11月24日晚上，法国与意大利已在罗马签订了停战协议。

6月18日，墨索里尼同希特勒在慕尼黑举行了会晤。在这次会晤中，他指出了他认为停战必须具备的条件。他要求占领直至罗纳河的法国本土和科西嘉岛、突尼斯、吉布提以及驻阿尔及利亚的海军基地。希特勒未加讨论就接受了意大利的建议。其实他对

意大利的建议根本未予置理。22日，他对实际上已被德军占领了的法国规定了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允许存在一个名义上的法国政府，并给这个政府留下了一片所谓的自由区，即使这片地区事实上处于德国控制之下。在这种情况下，墨索里尼只得大大降低自己的要求，只求得到边境地区的小片土地和蒙托内市。作为补偿条件，上述做法向墨索里尼提供了他声称需要赔偿的第一批人员损失的费用。在三天的战斗中，意大利损失约5000名官兵：打死600名，打伤2500名，冻伤2115名。冻伤人数如此之多，是皮鞋质量太次的第一个证明，这种鞋使许多在希腊和俄国战线的意大利士兵成为牺牲品。

法国短期战役的结局和停战带来的微薄成果引起了普遍失望。三天的战斗暴露了决定日后接踵而至的失败的原因：计划的突然；根据政治目的而确定的野心勃勃的目标；长期低估敌人的力量；不能准确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即为实现既定目标所必需的人力和物力；纸上规定的手段同实际掌握的手段不相符（军队人数是根据预计人员编制而不是以实际人员多少而计算的）；汽油、水和粮食一概缺乏；后勤供应混乱；指挥部门机构臃肿、组织不善；墨索里尼不自量力的勃勃野心同可供使用的实际手段之间形成日益鲜明的对比。即使在这些条件下，阿尔卑斯山战线、海上战线和其他战线也不乏一些反映出意大利官兵的战斗力和勇敢精神的事迹。但他们的牺牲又由于指挥上的混乱，特别是由于墨索里尼的战略准则而变为徒劳；墨索里尼出于政治需要，总是强求进攻（在希腊或在利比亚的绿山区），哪怕是在不给作战部队提供必要的弹药补充和生活给养（包括那些已经应允提供的）的情况下，也是这样。

因此，对于意大利来说，战争是通过一连串的失败进行的，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这些失败使意大利军队陷入了溃散状态。

在海上，因为法军已不起作用，所以意大利海军便对付一个敌

人即英国，这个敌人拥有三个固定基地（直布罗陀海峡、马耳他、亚历山大港），两支强大的装甲舰（其基地也设在直布罗陀和亚历山大）以及两艘航空母舰。丘吉尔毫不犹豫地在地中海增派兵力，并把来自帝国广大地区（澳大利亚、南非、印度）的增援部队集中到埃及。在战争头几天，意大利海军并未集中力量攻占马耳他，而当时该岛是缺少防御手段的，因此，它未能阻止直布罗陀和亚历山大之间的交通，而马耳他则是这两个港口不可或缺的供应地。意大利海军固然能在诸如7月9日的斯蒂洛海岬、7月19日的斯帕达角和11月27日的泰乌拉达角等一些战斗中取得战果，但11月11日，
460 由于鱼雷轰炸机对集结在塔兰托基地的海军发动进攻，意大利却遭到严重损失，三艘装甲舰被炸沉。地中海上的海战延续了好长时间，双方互有胜负；这次海战的目的是试图阻止意大利船队从半岛到利比亚的运行，阻止英国船队从直布罗陀到亚历山大的运行。然而，英国可以通过红海和苏伊士运河向埃及运送兵力和武器，而意大利和德国在利比亚战线的兵力却只能依靠来自半岛的船队的供应。

因此，绿山区的战事受到船队是否到达的严重制约，这些船队是运送作战活动的全部需要的。这一事实提醒人们在准备进攻时必须持高度的谨慎态度。在所部署的部队已拥有所需物资之前是不应发动进攻的，这样，就不必等待新的可能的补给，因为补给能否到来取决于船队的护卫结果如何，而这种结果又总是没有把握的。然而墨索里尼却强令格拉齐亚尼于9月12日向埃及领土发动进攻，但他没有满足巴尔博有关运去1000辆重型卡车的要求，这一要求是巴尔博早在他6月28日于托卜鲁克上空被击落之前提出的；巴尔博被击落这件事发生的情节当时曾引起许多疑问。格拉齐亚尼的进攻于9月16日受阻于西迪埃勒拜拉尼（埃及），未能抵达马特鲁港，而墨索里尼原想于10月15日征服此地。意大利的进

攻因缺乏装备而中止,于是,英国军队就于12月9日开始进攻,在短短几天之内就突破并歼灭了第一线部署,随即向纵深推进,12月10日抵达西迪埃勒拜拉尼,并继续挺进巴尔迪亚、托卜鲁克、班加西,直抵的黎波里塔尼亚边境地区的胡姆斯。在两个月之内,丧失了整个绿山区,该地的部队也被摧毁;俘虏20万,只有1万官兵逃到了的黎波里塔尼亚。

罗马发给驻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军队的第一个指示是转入进攻,但不久也遭到了英军从北部和西南部亦即从苏丹和肯尼亚发动的攻击。1941年5月19日安巴阿拉吉峰的投降宣告了成立只有五年的帝国的垮台。

在希腊所蒙受的失败是最严重的。墨索里尼曾想通过一场“平行战争”而试图在德国对面的巴尔干地区建立起以意大利为主的势力范围。由于希特勒劝阻意大利对南斯拉夫和希腊采取行动,这就加强了墨索里尼面对强大盟国确立自身的自主地位的意图。野心通常总是同认真的战略部署以及行动计划的制定不相适应的。对敌人的军事力量和对其国内战线危机的广泛性又一次作了错误的估计,据齐亚诺称,敌人国内战线已濒临解体。10月13日,墨索里尼决定同月26日开始发动以伊庇鲁斯为目标的进攻。巴多利奥只是提出自己的保留,并要求增加必要的兵力,以求能占领整个希腊,但他只获准把进攻推迟两天。意大利已有8个师驻扎在阿尔巴尼亚。派遣参加进攻的部队在发罗拉港登陆时混乱不堪。在仓促准备中,甚至连船队计划、部队和物资登陆所必需的时间、从发罗拉港到作战地带的运输时间等问题都没有估计进去。这样,派到火线上的只有一半的师,它们既缺武器又少弹药(因为一些武器和弹药还堆放在发罗拉码头,甚或又被运回了意大利)。进攻于10月31日开始,11月5日就停止了;为了冲出包围圈,部分意大利部队不得不开始撤退。11月8日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失败的

461

责任立即推给了维斯孔蒂·普拉斯卡将军,并由当时的作战部副部长、副总参谋长索杜接替了他。援兵通过海路从意大利运去,但英国潜艇击中了許多意大利船只。因此,意大利几个师到达时已残缺不全,而且这些部队早在战线上经受了考验;时值11月中旬,希腊已在这条战线上部署了编制完整、武装齐备的14个师。因此,从数量上看,意大利兵力也处于劣势,要用11个师对付希腊的14个师。这就完全暴露了墨索里尼和意大利司令部在对希腊兵力估计上的错误。11月中旬,不得不命令部队折回,保护地拉那和发罗拉港。

三、巴多利奥的政治危机

意大利军队的失败不仅造成了军事危机,也造成了政治危机。法里纳奇公开指责巴多利奥是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由于墨索里尼对法里纳奇的指责不表示反对,巴多利奥不得不于1940年12月4日提出辞职。乌戈·卡瓦莱罗将军接替了巴多利奥的职务,并兼任驻阿尔巴尼亚作战师团的直接指挥。

巴多利奥的辞职被看成是掌握着国家命运的寡头集团政治危机的第一个征兆。法里纳奇过去曾同巴多利奥一起想打击所有那些反对把意大利从不参战变为与德国并肩作战的力量。意大利的共产党对政府领导集团出现的这第一个分裂所具有的政治意义是理解的,它在《斯巴达克通信》上发表的1940年12月的声明中就着重指出了巴多利奥被迫辞职引起的危机的政治性。文件表明,在希特勒入侵苏联这一转折到来之前,共产党就已看到,在意大利存在着要以新的、多少有组织的方式结合起来的反法西斯小组和政党以及新的派别,它们要在政治领域采取行动,反对战争,争取自由。在这一形势下,意大利的共产党尽管没有放弃自身在争取和

平和政治自由的斗争方面的目标（这一目标当时至少在正式提法上还是工农政府），但也表现出愿意为争取意大利人民团结这一政治斗争确定一些主要目标：推翻法西斯专政，立即停止战争，恢复人民自由。此外，共产党还断定，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必须以“打倒墨索里尼”的口号把国内阵线和战士阵线的行动联系起来。

面对法西斯领导集团内部酝酿成熟的政治危机已经开始爆发的形势，国外局在1940年12月采取的立场表明，在那个时期，共产党人已作好了执行团结政策的必要准备，这一政策在1941年6月22日以后便公开推行了。“意大利人民团结起来，争取和平与政治自由”，“打倒墨索里尼”这两个口号都是根据国外局认为对希腊战争失败和巴多利奥被迫辞职引起的政治危机的性质的分析而应当提出的方针。得出这些结论并非不要克服一定的阻力，特别是要克服来自那些过去和当时都坚持认为战争从参战双方来说都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同志的阻力。这些同志不明白，德国对法国和对欧洲许多地方的占领、在被占领地区已经开始了的反对纳粹占领的解放斗争、英国对德国侵略威胁的英勇自卫，所有这些已在使战争的性质发生变化，这一变化在1941年春得到德国对巴尔干地区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干涉的促进，随纳粹开始侵略苏联，这一变化也就变得明显了。 463

有一种基于对参战力量及其最初提出的目标的分析所得出的看法认为，战争的性质不是永远不变的，它应当随新力量的参与和战事发展本身提出的新目标而发生变化。斯大林最初曾肯定地认为，从参战双方来看，战争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而接着在强调指出继续战争的责任应当落在法国和英国身上之后（因为法英两国没有接受希特勒于1939年10月6日提出的和平建议），他却又同样肯定地申明，对德国的战争从一开始就是民主性质的。这两个含义完全相反的说法在共产党人当中引起了无休止的讨论，他们不理

解斯大林在对基于外交活动和军事行动的多变形势以及实际力量对比的不断变化而制定的政策进行理论解释时所持的轻率态度。

事实上,由德国的侵略和扩张行动所挑起的战争的民主性,从一开始就由于法国和英国领导战争的力量的政治和社会本质、这些力量的专制和反人民的行动以及它们公开声明要把德国的战争努力引向反对苏联的意图而受到损害。但是,使法国落于德国桎梏之下的法国旧领导阶级的可耻失败以及丘吉尔和坚决同希特勒464 战斗到底的力量取代了张伯伦和主张不惜一切代价地同希特勒德国达成协议的集团在英国上台执政(尽管这也意味着要在加拿大进行斗争),这一切都已使战争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反对对法国、比利时、荷兰、丹麦和挪威的占领的人民斗争的开始,说明在1940—1941年期间,民主和人民力量的干预已经逐步得到了发展。在1940年下半年,已有数以千计的法国共产党人因反对贝当政府而遭逮捕,但斗争的矛头也日益明显地指向德国占领者了。旅居法国的意大利共产党人也同其他一些国籍(亚美尼亚人、波兰人、西班牙人,等等)的移民劳动者一起参加了法国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所进行的斗争。

共产国际的文件继续揭露双方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在法国共产党的文件里,把希特勒及其奴役法国的愿望同戴高乐的运动相提并论(戴高乐被说成是彻底反动和反民主的,被指责为一心只想在英国获胜的情况下取消法国的一切自由)。甚至陶里亚蒂在1941年5月同法西斯分子论战时还提到,对英国的战争不是争取意大利自由的战争,并且明确指出,那是一场“帝国主义强盗”之间的战争。但这些立场同当时正在发生变化的现实是不相符的,这种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共产党人的政治态度造成的,共产党人已在反对希特勒的斗争中付出了高昂的牺牲代价。在法国,人民运动已在反对占领者、保卫切身需要的推动下行动起来。在

意大利,旨在结束战争、驱赶墨索里尼和夺回民主自由的运动,已于1940年底的那个黑暗时期初露锋芒。欧洲人民的斗争已经朝着一个表明战争性质正在改变的方向发展。共产国际文件和各国共产党领导的提法是符合苏联的外交需要的;当时,苏联不愿强调打击德国,不愿承认希特勒是头号敌人,以免给德国撕毁德苏条约和提前对苏联发动战争提供口实。但在这些错误的提法下面却有一个不断增长的人民动员在施加压力,这个动员通过共产党人的英勇行动,已经在反对纳粹德国的斗争中朝着反法西斯团结政策的方向发展了。

在意大利,打破意德联盟,结束战争,把墨索里尼赶下台和夺回民主自由开始成为符合救国需要的目标。短短几周内连续发生了希腊战争中的失败、对塔兰托基地的空袭、绿山区战线被突破,这些都使意大利人认识到墨索里尼所希望的战争,对于意大利来说已经走向失败。为了继续战争,德国盟军的援助和直接干涉就变得越来越有必要了。但这样一来,意大利处于德国奴役下的情况也就会变得越来越严重和难以摆脱。为了确保国家独立和从德国淫威中解脱出来,必须尽速结束战争,把墨索里尼赶下台。但在那一时刻,即1940年底,意大利人还没有做好从灾难性的军事事实中得出必要结论的准备。固然墨索里尼的权威和人们对政权当局的恐惧已在减少,但对德国的恐惧和仇恨却在增加。德国必将战胜,对这一点还无人怀疑。因此,最好不要恶化同这个如此反复无常、如此要求苛刻、如此气焰嚣张的盟国的关系。只有少数人看到苏联和美国这些世界强大力量,正是这些力量不久都卷入了冲突,并用它们的力量保证了德国的失败。

1940年底是意大利度过的一个极其黑暗的时期。战争已经给意大利造成了损失。被英国俘虏的士兵人数不断增加。食品短缺和初期轰炸已给人民带来直接打击。而同时又看不到能够迅速摆脱

如此悲惨的境地的前景。德国的统治越来越严重了。到哪里去寻找希望之光呢？夜仍然是黑暗的。

四、苏联参战

466 法国战役胜利结束、贝当政府投降以及雷东德停战协议签订之后，只剩下英国一家与希特勒的计划抗衡了。在那些主张接受希特勒1940年7月19日和平建议的旧领导阶级的主要集团被击败之后，丘吉尔建议动员全国的所有力量。英国人民在民族团结的伟大精神鼓舞下响应了丘吉尔的号召，以必要的坚定性准备对付德国向英伦三岛发动的直接进攻，德国进攻的目的是：迫使英国投降，并像法国那样接受纳粹主义主宰下的欧洲“新秩序”。希特勒直到最后都希望能在英国领导阶级里找到同德国达成协议的支持者。当他发现期待已经落空时，就决定向英国发动进攻，但宝贵的几周已经过去了。

空战本应保证德国对空中的统治，并为德军从英伦三岛登陆创造必要的条件。然而，德国的空袭（1940年8—9月）以失败而告终。在失去了对空中和海上的控制之后，希特勒不敢再作艰难的侵略冒险。10月17日，他被迫决定推迟被称作“海狮”的作战计划。

当时德国处在力量最强的时期。它直接控制了欧洲大陆最富庶的地区，并握有大量的战利品。欧洲工业为德国军队生产。德国有一支取得一系列胜利的军事力量，这些胜利证明了这支军事力量的有效性。那么，如何使用这个令人生畏的战争机器呢？把它投向南方、地中海，投向非洲、苏伊士运河，投向英国帝国制度的心脏地区吗？这样做是要冒风险的，它要求进行空战和海战，而希特勒觉得，空战和海战不如地面作战有把握，不论如何，不能达到

击败英国并使之屈服于德国统治的目的，因为还有加拿大和美国军队作为英国最后的抵抗基地。

苏联则屹立在东方。在1940年夏季的几个里，苏联很快地利用了1939年8—9月签订德苏条约所包括的那些条款。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变成了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比萨拉比亚变成了摩尔达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而位于北部的布科维纳则并入了乌克兰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样，苏联就靠近了罗马尼亚的石油产地，那里有德国战争机器的宝贵资源。从苏联广阔无垠的领土上找到一块被认为是德国的扩张所必不可缺的“生存空间”一直是希特勒的头号目标。西方的宣传运动曾有一个目的，即消除两条阵线作战的危险。这一目的未能完全实现，因为英国仍在战斗。但是，固然就当时来说不能侵入英国，但也不能就此回到大陆。所以，必须向东方发动进攻，以便速胜，为迫使英国像希特勒久已希望的那样从政治上投降并为建立由德国领导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创造条件。⁴⁶⁷

1940年11月12日和13日，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在柏林举行了会晤；会晤中，德国试图把苏联的注意力引向大英帝国，使苏联的注意力转向南部，转向波斯湾，甚至转向印度，以期实现主宰世界的野心勃勃的计划，但未能成功。斯大林没有被令人眼花缭乱的许诺弄得神魂颠倒。莫洛托夫没有公开拒绝希特勒旨在促使苏联加入三方条约并组成世界性领导集团而作的巨大让步，但把苏联的要求集中在扩大安全区域方面，这一安全区域应包括芬兰、保加利亚和海峡地带，并在达达尼尔海峡附近建立陆军基地和海军基地。希特勒答应把印度划入安全区域，但苏联把眼睛盯着更近的海峡地带和巴尔干地区。从柏林会议上，苏联人就得出这样的信念：冲突已是不可避免，就看何时爆发。斯大林认为，希特勒如果进攻苏联，并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就会犯下严重错误。从

逻辑上讲，希特勒不该采取那个自取灭亡的行动。斯大林的谨慎怀疑态度正是由此而来的。

德国已经占领了罗马尼亚的一些战略要地。11月12—13日的会议之后，德国又迅速扩大了在巴尔干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干涉区。11月20日和22日，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加入了三方条约，1941年3月1日，3月2日，德国军队在保加利亚国王和政府的赞同下开进保加利亚。意大利在希腊的失败促使希特勒占领全部巴尔干地区。意大利在希腊战役的第二阶段再次以失败（1941年3月8日）告终，468 尽管为了取胜，墨索里尼亲自督战。南斯拉夫和希腊依然站住了脚跟，因为它们处于德国控制之外。3月27日，曾同意把国家置于德国控制之下的摄政王保罗，经过一次得到人民支持的政变被推翻。4月5日，苏联与南斯拉夫在莫斯科签订了互不侵犯友好条约。这一苏南条约的签订公开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性质发生了变化。事实上，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问题上，苏联与德国已处于公开对峙状态。

1941年4月8日，德国对巴尔干地区发动进攻。南斯拉夫军队的抵抗只维持了10天。但在停战协议签订之后，人民战争仍在继续。意大利参与了对克罗地亚和达尔马齐亚的占领。希腊也受到冲击，虽然有英国干预，但已不能抵御德国的进攻。德国得势之后，意大利人也终于有可能转入进攻了。然而，在许多地方，德国部队捷足先登，使意大利部队无法前进，他们还窃取了意大利人的胜利果实（其实，这种胜利并不存在），墨索里尼对此尽管作了抗议，但也无济于事。4月27日，德国人进入雅典。英国人在岛上继续进行抵抗，但克里特岛还是被德国占领了。6月1日，英国的最后一批部队撤离克里特岛。就像一年前在挪威发生的事情那样，英国对希腊大陆进行的干预同样以惨败告终。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德国人占领了全部巴尔干地区。这

是德国打赢的最后一次闪电战。这样，希特勒就可以转身对付苏联了。因为他的南翼已经得到了保护。6月10日，土耳其也与德国签订了友好条约，进入了德国的圈子。然而，巴尔干地区的行动使德国用去了4月和5月两个月的宝贵时间。起初，希特勒把开始进攻苏联的时间定在5月15日。但后来又不得不从5月15日推迟到6月22日，这一推迟对德国侵略俄国计划的执行带来了严重影响。

希特勒是在11月12日决定“红胡子”行动计划的，而这正是里宾特洛甫向莫洛托夫提出统治世界的宏伟建议的时候。这就证明了柏林会议和里宾特洛甫的建议都是欺骗斯大林的阴谋。德国计划的目标是在到达阿尔汉格尔斯克—伏尔加河—阿斯特拉罕战线之前，通过巨大的围歼行动歼灭苏军主力。由于相隔遥远，德国领土不会遭到苏军任何空袭。必须在美国参战以前就解除苏军的战斗力，因为美国参战是德国所害怕的，而且已越来越有可能了。 469

斯大林对希特勒要进攻苏联的意图是知道的。由于法国失陷——比他的任何预见都要快，他看到他所指望的如下可能性已经崩溃：即可以依靠双方争夺这一局面，维持到1943年；可以不受干扰地把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准备继续进行到上述日期。但他认为，希特勒不敢在消灭英国之前就对苏联发动进攻。不论如何，他决定尽可能多地争取时间；他认为，时间对于战备目标是宝贵的。芬兰战争已经暴露了苏联军队的缺陷和以枪杀图哈切夫斯基为标志的对军队干部的血腥镇压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苏联同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友好条约，这是苏联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日本当时正在中国，忙于控制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和缅甸，并准备进攻美国，所以它需要在满洲没有后顾之忧。而苏联也需要在东方没有后顾之忧，以求把所有力量投向西方，使西伯利亚成为其战争工业的基地。

斯大林预期德国会来进攻，但在德国侵略和占领巴尔干地区之后，他希望这一进攻至少可以推迟到1942年春。有关进攻迫近的消息接踵而至，有些消息来自情报机关的活动，有些则是丘吉尔1941年4月直接提供的。那么斯大林为何置这些消息于不顾呢？他是否像他在塔斯社6月13日公报里所说的那样，认为这些消息是一种挑衅呢？看来，他要把违背互不侵犯条约的责任留给希特勒这一政治考虑似乎压倒了其他一切考虑。他认为，必须使苏联受到德国背信弃义的侵略这一事实得到明确证明。他需要用这一点来点燃苏联人民立志不惜牺牲一切保卫神圣祖国的烈火。从国际上说，他也需要用这一点来为同英国、不久又同美国结成世界性反法西斯联盟奠定基础。他需要向苏联人民证明，祖国已经处在迫不得已的境地：为捍卫祖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而斗争。归根结蒂，这些考虑同罗斯福的考虑一模一样，罗斯福当时就曾因此而不愿给予有关日本进攻迫在眉睫的消息以应有的重视，从而没有以必要的力量动员美国全部武装力量在进攻珍珠港前夕处于戒备状态。罗斯福当时希望明确显示出美国受到了侵略，以此来动员不愿打仗的人民。他肯定没有预料到珍珠港事件。在这两种情况中，策略性“突然袭击”的后果似乎比任何预见都要严重得多，都具有更大得多的破坏性，这一点抹煞不了斯大林和罗斯福所采取的态度性质，即都是把政治考虑放在优先地位。

战争到来时，苏联军队在军事方面不能与德国军队匹敌。德国国防军是一部性能精良的战争机器，它久经闪电战的考验，取得一系列迅雷不及掩耳的战果，加上拥有坦克、飞机、大炮等多种最新式的武器。苏联军队则只有令人沮丧的芬兰战争经验，它曾用好几个月的时间强迫芬兰接受停战要求，其装甲部队和机械化部队人数不足，飞机和大炮也是旧式的，而且数量极少。

然而，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德国军队面对苏联的抵抗，碰得头

破血流。国防军破天荒第一次不能消灭敌人的战斗力。希特勒妄图在三个月内消灭苏军主力，并把残余部队赶到阿尔汉格尔斯克—阿斯特拉罕战线以内的战略计划失败了。“红胡子”计划确定的领土目标未能实现。尽管兵员和武器遭受了巨大损失，但到1942年1月1日，苏联军队的军事力量反而比战争开始时要强大了。1941年6月22日，德国共有190个师开进了苏联领土，其中有17个装甲师和10个机械化师，配有6000架飞机，还有德国盟国的几十个师辅佐，意大利的远征兵团也随后赶到。由于1939年和1940年从爱沙尼亚到布科维纳一带地方已合并到苏联，这就使“斯大林”防线前面400公里纵深地区可以用于苏联防御，“斯大林”防线从旧边境线后面又纵深延伸了达200公里。以装甲部队开道的德国军队迅速向前推进。但在进攻的德军先头部队经过的地方，苏联防卫并未消失。然而，战争开始的几周对于苏联来说是灾难性的。突然袭击、混乱、丧失联系等使德军得以用最快速度挺进。但一天天过去了，苏联防卫却变得强大起来。⁴⁷¹

战斗表面上看是混乱的，它体现在苏军成千上万个殊死抵抗的事例当中，苏联力量被德国攻势所压倒，但仍能把抵抗坚持到最后一击。这种抵抗使德国进攻不得不放慢了速度。苏军向后撤退，留下一片焦土。由于出色地动员了人民力量，苏联政府成功地把整个整个工厂和大量物资撤到了后方。凡是不能撤走的东西都被毁掉。被包围了的苏军宁死不屈，英勇自卫，四处出击，阻碍为前进中敌军输送所需的给养，使侵略军先头部队同主力脱节，打击敌人最薄弱的环节，迫使侵略者拉长巩固阵地的时间并为此付出昂贵代价。9月30日，基辅失陷，列宁格勒也被包围，但莫斯科的战斗一直到10月2日才开始。10月3日，希特勒在柏林宣布俄国已经完蛋了，但德国的进攻却无法前进。苏联司令部把一些精锐师部署在“斯大林”防线之后。这些精锐师在战火中也被消灭了，这样，就

从训练场及时调来了新的部队；许多将军、军官和士兵都是直接从训练场来到前线的，有的甚至是刚刚离开集中营，然而，所有人都浴血奋战。

战争开始的第一天，党中央就号召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周围，拿起武器保卫祖国。6月30日，成立了由斯大林领导的卫国委员会；从5月起，斯大林就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集党的领导权和政府领导权于一身（这又一次证明，他认为德国的进攻即将到来）。7月3日，斯大林终于讲话了。他已经有10天没有直接对苏联人民讲话，这件事引起了许多评论和严重的疑问。

不论如何，斯大林7月3日的讲话是一个相当坚定的讲话。他号召保卫苏联的每一寸土地，要求人民战斗到最后一滴血；不要给敌人留下一公斤面包和一升汽油，把所有东西一概带走，疏散或销毁一切财物，在敌占区内建立游击队的骑兵部队和步兵部队，同敌人展开游击战，炸毁桥梁和道路，烧毁树林和仓库，给敌人及其同伙造成不可忍受的条件，追击和歼灭他们。这是动员对侵略者展开全面战争的号召。

斯大林发出的号召得到苏联人民的欢迎。对初战遭受重创感到的意外、痛苦和愤怒，变成了冷静的决心、仇恨与战斗意志，变成了全苏人民共同的爱国热情。连那些受过斯大林镇压的公民也为保卫祖国作出了贡献。史学评论家曾指出，在波罗的海和乌克兰那些于1940年被迫加入苏维埃联盟的国家和地区，反对侵略者的抵抗运动比较薄弱。但即使在那些地区，大多数人民也不屈服于侵略者的暴力，展开了强大的游击活动。

德军所到之处都掀起了游击战争。德军用恐怖武器来对付这些抵抗。被俘的政治委员和共产党员立即惨遭杀害。被动员起来的人民把宝贵的物资以及经过救护和短期修复的所有工厂及时疏散到乌拉尔以东地区。德军每进犯一步，就能向纵深占领几百公里

苏联领土。但苏联人民不限于利用空间，他们在前进的敌军背后组织抵抗，并成功地在敌军先头部队同其主力之间联络的薄弱环节上和在坦克与步兵之间的空虚地带打击敌人。与此同时，苏联军队也发现了新的办法来提高对付德军疯狂进攻的防御能力，而德军的进攻在其他战场上一向是所向披靡的。破天荒第一次德军的进攻速度被迫放慢，苏联军队越来越顽强的抵抗使德军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多。先是泥泞，后是冰冻，但光是这些还并不足以说明德军进攻可以削弱，不过，这些情况毕竟为苏军加强防御努力创造了 473 条件

10月2日，莫斯科战役开始。10月19日，宣布莫斯科处于戒严状态。莫斯科居民全体动员，不论男女，组成了19个师。11月6日，在马雅柯夫斯基广场地下铁路的地下站台上，共产党员和劳动者举行了纪念十月革命24周年的例行庄严集会。斯大林在集会上发表了讲话，他的声音通过英国电台传到了整个欧洲从事艰难的反纳粹占领者的武装斗争的战士耳际，这是一个振奋人心和带来希望的信息：莫斯科坚持住了，它还是自由的，德国人没有得逞！11月7日早晨，传统的阅兵式游行具有特别意义。身着戎装的军队直接开上了前线。

德国军队只是在11月16日才进攻到莫斯科防卫体系，但它已经丧失了许多冲击力了。德军的努力继续到12月5日，但未能打开苏联防线的缺口。12月6日，苏军开始反攻，反攻进行到次年1月22日，收复了大片领土。德军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第一次从已经占领了的地盘撤退。德国人在俄国遇到了在欧洲（英国除外）从未遇到的事情：人民的抵抗以及战士、人民与政府的紧密团结。

在五个月的进攻中，德国占领了36%的耕地，这就是说，占有了33%以上的农业生产，55%的煤炭生产，60%的钢铁生产。500万苏联人丧失了战斗力，100多万人被俘，成千上万的坦克、大炮、飞

机被摧毁或缴获。然而“红胡子”计划的目标未能实现。苏军的有生力量未被歼灭,相反,在莫斯科战役中,苏军却显示出它巨大的恢复能力和战斗能力。侵略军也蒙受了严重损失:损失人员近100万,相当于发动侵略时军队人员的1/3。侵略军的部队都是经过选择的精锐部队。在以前多次战役中,德军武装精良的装甲部队相继被摧毁。德军的这些严重损失大大地影响了国防军制定1942年春采取进攻行动的计划。

日本人12月对珍珠港发动背信弃义的袭击,这使罗斯福决定让美国参加战争。但是,早在7月底,尽管美国国内有强烈的反对,罗斯福还是把他的代表霍普金斯派往莫斯科,为的是向斯大林表示,美国愿意把租借法扩大到苏联,从而允许立即向苏联提供军事援助,特别是提供飞机和卡车。希特勒发动侵略后不久,丘吉尔也曾向斯大林表示,愿提供必要的援助,以期共同战斗,反对共同的敌人,并派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去莫斯科,商讨援助方式。1941年底,英国、美国(它们于8月14日签订了大西洋宪章)和苏联已经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奠定了基础。

在被占领的欧洲,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成为在致力于抵抗运动的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寻求统一行动的条件下对解放斗争的一个新的推动力。1940年底,面对纳粹的进攻,伦敦曾肯定自由和希望必胜。1941年底,莫斯科的胜利抵抗又证明,德国军队并不是不可战胜的。总之,决定纳粹主义再经过几年战争、失望和牺牲之后最终失败的条件已经形成。

第十八章 反法西斯主义 斗争的团结

475

一、1941年6月22日以后

6月22日清晨，宣布德国军队进入苏联领土，这是对被德国或其盟国侵占的所有欧洲国家的民主民族力量发出的总动员的信号。文件资料和证明材料一致指出，在那天，力求在共产党小组和其他民主力量之间重新建立团结关系并重新寻求联合行动的基础的紧张活动开始了。在随后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因苏联军队撤退的消息而引起的忧虑，被日益高涨的苏联人民有组织的抵抗斗争带来的希望抵销了。所有不接受欧洲由德国淫威主宰这一前途的人们——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非共产党人——都明白，只有苏联抵抗斗争的胜利，才能提供通过新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来促使纳粹主义垮台和解放欧洲与世界的条件。斯大林11月6日的讲话受到欢迎，因为它证明了苏联进行抵抗斗争的坚强意志。在那些日子里，斯大林的权威和声望超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而扩展到全世界，扩展到具有各种不同政治见解但都是坚决反对希特勒的人们。

6月22日消息的宣布进一步推动了意大利共产党人已在进行的反法西斯主义、争取和平的斗争。无论在何处，在意大利的工厂和乡村，在大城市的居民区，在监狱和流放地，在遍及世界不同国

476

家的移民当中,所有意大利共产党人,无论是在孤军作战的和丧失联系的人,还是已经集聚在国内外已在活动的或正在筹建的各个中心周围的人(这些中心既包括帕尔米罗·陶里亚蒂领导的“意识形态中心”,也包括在法国开展活动的国外局),他们都在那一天感到,应当更多地做些工作,做些新的工作。如今,战争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既然关于战争性质的经院式的争论已告结束,大家就都应当致力于击败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挽救苏联的生存,同时也拯救各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抱怨这种全国奋发的情况为何以前不曾有过,那是徒劳的。事实上,从那一天起,联合斗争就开始了一个新时期。

斯大林在7月3日的讲话中断定,苏联人民争取祖国自由的战争,与欧美两洲各国人民争取自身独立、民主自由的斗争,与建立一个为自由而斗争的各国人民的统一阵线,浑然成为一体。在1939年的决裂造成破坏之后,在各国共产党赞同德苏条约和共产党人遭受迫害之后,在两年的激烈论战之后,重新从为争取保卫祖国、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中寻求团结的道路,从而重新确认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伟大团结路线,这当然并非易事。共产党人当时之所以得以克服孤立处境,那是由于如下两条相辅相成的原因:苏联人民在同侵略者进行寸土必争的战斗中所显示的坚定性和能力(他们阻止侵略者前进,甚至在莫斯科城下把侵略者击退);各国共产主义战士在反对入侵者的斗争中英勇战斗的出色表现。在法国,在未等到1941年6月22日到来之前,1万多名共产党员早在德国占领的第一年就已经遭到逮捕,而同时,针对叛徒和外国人仆从而开展的“自由射手”活动也就开始了。这是一种伟大而英勇的战斗能力在实践中的表现,它使人民对共产主义战士感到钦佩,给他们以越来越多的声援,并且也遏制了当时在反法西斯力量当中存在的那种试图保持一味歧视共产党的做法。

意大利共产党当时开展了各种各样相辅相成的活动。“意识形态中心”于1941年5月30日在莫斯科发表了《停止战争！把意大利从灾难中拯救出来！》的呼吁书。这一文件中重又提出了错误的论点，即：意大利对英国的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强盗之间为谋求世界霸权、瓜分殖民地和全世界财富而进行的战争”。但是，文件也谴责了墨索里尼及“其周围一帮唯利是图者和冒险家”，指责他们在一系列失败之后，把国家推上导向灾难的道路，特别是让国家向德国军国主义屈膝投降，让意大利人民向德国俯首称臣，这一点已经说明当时有了一种新的方针，指出希特勒是意大利人民的主要敌人。希特勒和德国军队征服和掠夺整个欧洲并不符合意大利人的利益。呼吁书要求采取的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废除墨索里尼同德国帝国主义签订的战争公约。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意大利的共产党号召爱国的工人、雇农、农民和全体公民团结起来，为迅速结束战争、争取人民的自由和独立而坚决战斗。

477

这一团结呼吁书还有一点不明确：号召“所有的人都参加联合斗争”，但还没有具体地指出其他反法西斯的民主力量；虽然明确指出要废除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签署的战争公约，并发出反对德国的号召，但却没有明确提到可以从事这场斗争的力量。然而，它毕竟摆脱了任何外交式的谨慎做法，提出了反对德国的鲜明目标。

苏联战局的开始使意大利的共产党得以彻底发展它反对德国的立场。在莫斯科的“意识形态中心”没有再发表新的呼吁。共产党人的全部活动，首先是陶里亚蒂和格列科的活动，都集中在筹备莫斯科电台意大利语广播和新的米兰自由电台的秘密播音工作上。苏联电台的广播可以利用良好的技术设备，因此在意大利也可以收听到，并且能同听众极多的伦敦电台竞争，尽管意大利电台使用功率强大的设备进行干扰和截阻。通过这些广播，意大利共产党每天都号召反法西斯力量联合起来，进行斗争。

米兰自由电台声明它愿意成为一切为打碎法西斯桎梏、把意大利从希特勒的奴役和野蛮暴行中解放出来而斗争的意大利人的喉舌。它愿代表民主人士、天主教徒、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以及一切真正爱国者的心声。它按名称介绍各个反法西斯政治力量,明确指出这些力量有保皇党人、天主教徒和反战的法西斯分子。米兰自由电台促进民族阵线的建立,并播送一些呼吁书的文本,这些呼吁书被说成是在意大利由一个争取和平与自由委员会署名的,其实,这个委员会并不存在,而是为下达具体指示特意虚构出来的。每份呼吁书的发布都是一项指示,号召在意大利成立以呼吁书内容为政治基础的委员会,而那些被收听到的、被记录下来的和被传抄的文件都有效地起了在我国开展联合行动的作用。其实,在意大利的不少地方,人们仿效这些榜样,也开始自发地成立这些联合委员会了。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在与米兰自由电台合作的同时,还在莫斯科电台每周三次以马里奥·科伦蒂的化名直接向意大利人讲话。这些讲话指出政治方针(全国反法西斯团结),抨击墨索里尼,揭露意大利越来越屈从德国的事实,号召团结战斗,并下达具体工作指示。这些讲话充满伟大的爱国气息,重申被法西斯主义践踏的意大利最崇高的民族传统。这些讲话使意大利人了解到苏联人民所亲手书写的伟大史诗和斯大林在指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

目前,人们正在对当时意大利收听地下电台广播的广泛性和地点进行研究,这些研究应当继续下去,并应加以改进,这一点正说明当时除伦敦电台之外苏联电台意大利语广播所起的影响有多么广泛,也说明这一广播对于在这一宣传的推动下使一些有组织的团体纷纷涌现出来,起了多么具体的有效作用。

在共产党分布于国内外的中心和“领导点”的活动范围还十分有限的时候,莫斯科和米兰自由电台的广播起了指明全国反法西

斯团结的政治方向和推动联合行动的作用。这项工作的积极成果到了1943年就明显地显示出来了，当时，党为成立民族解放委员会和联合开展游击战而采取的行动在共产党人当中没有遇到强大阻力，这正是因为他们已经通过莫斯科电台广播，收到有关团结的政治方针。

1941年6月22日，翁贝托·马索拉还未能从卢布尔雅那返回意大利建立一个国内中心的雏型。侵苏战争的爆发加速了他返国的时间，但也只是到1941年7月底，他才返回意大利。他于8月1日就在米兰和都灵建立了工作基地，并成立了第一个由可靠的同志们组成的小组。10月，他出版了一期《斯巴达克的呼声》，呼吁人们复印，哪怕手抄也可以，并在“可靠”的人中间传阅。这里一份主要带有亲苏倾向的战斗号召书，其总题目是：《不要派遣一个士兵、提供一支武器和一块面包去反对苏联》。这一说明当然是有益的，但也有缺陷，因为它没有同时提出明确的民族目标：即必须把意大利从德国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另有一份呼吁书，是6月23日由“意大利共产党”署名的，但它没有注明出处，后收集在为第五次代表大会提供的文件当中，这份战斗呼吁书也仅仅阐明斗争目的在于必须采取一切手段帮助全世界劳动者的祖国——苏联的军队即红军取得胜利。这份呼吁书很可能是马索拉在卢布尔雅那起草的，因为它所持主张就是那一期《斯巴达克的呼声》的主张。

1941年6月由国外局起草、也是由“意大利共产党”署名的那份长篇文件所确定的路线，则已经不同了。文件的题目把亲苏内容与民族利益结合起来：《争取苏联的胜利，争取把意大利从希特勒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争取和平》。文件的新内容体现在它有呼吁团结的突出特点，并指出成立“人民政府”的目标，因为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把国家从希特勒侵略者手中和灾难中解放出来。文件指出，意大利人民应当在最崇高的团结旗帜下开展争取和平的斗争，

这一团结应当囊括所有那些在不同程度上遭到法西斯战争政策伤害，从而真诚决心消灭那个对一切给意大利带来致命打击的灾难负有罪责的集团的人们，使他们拥有统一的行动意志。

480 意大利共产党人声明愿意同一切愿为成立人民政府而斗争的政治力量结成正直的斗争联盟，这个人民政府应当从人民中来，并能在人民的支持下采取如下必要的步骤：解除意德战争公约；立即同苏联、美国开始谈判，在无兼并和无赔偿的条件下迅速单独媾和；审判战争祸首；恢复宪法保障和人民自由；被压迫少数民族享有自决权；被法西斯主义兼并到意大利的各国恢复独立；解散法西斯民兵；对一切政治犯实行大赦；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战争利润；同苏联建立真正友好的关系。

文件中提出了一项纲领，正是在这项纲领的基础上，到7月25日，基本上逐步实现了意大利反法西斯团结，没有发生重大分歧。文件还提出一系列眼前的部分经济要求，反对生活昂贵，争取全面提高工资，争取批准士兵休假，争取享有选举工厂负责人的权利等，从而直接地确立眼前的经济要求和争取自由和独立的伟大政治目标之间存在的联系。

有必要提一下共产党人在纽约所持的立场，在那里，聚集了巴黎反法西斯中心的一部分成员。在美国，共产党人的团结呼吁由于正义与自由组织领导人的一贯反共成见而遭到拒绝。1942年初，成立了加里波第国际联盟，在这个组织内，与共产党人——在纽约的是贝尔蒂和多尼尼，在墨西哥的是蒙塔尼亚纳和维达利，在加拿大的则是埃尼奥·纽迪在一起的还有少数社会党人，如都灵的弗朗切斯科·佛罗拉，这个联盟的建立却并未能成为什么联合的基础，因为马志尼协会拒绝合作。在马志尼协会中只有斯福尔扎和帕恰尔迪赞成与共产党人建立接触（他们想成立一个意大利志愿者兵团，同盟国并肩战斗），因为他们懂得，没有共产党的参

加，是不可能组成志愿者兵团的，也不可能组成一个被盟国承认为意大利人民代表的“全国委员会”。

当时仅记录了各个共产党中心对希特勒宣布入侵苏联的反应，因为其他反法西斯政治力量当时还没有条件采取正式的、有代表性的立场。它们在国内外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国内反对派虽多，但处境不佳；在国外也做不到这一点，因为缺少能代表它们的党讲话的有权威的中心。只有那些来到美国的反法西斯的正义与自由成员、共和党人、社会党人、天主教徒和自由党人采取了立场，然而，这些立场也并不能代表他们各自的运动，且不说这些立场在政治上是过时的，因为这些立场受到反共成见的影响，而当时由于美国、苏联、英国结成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这种反共成见已经是站不住脚了，尽管它肯定还没有消失。那时，意大利反法西斯运动还缺少一个统一的负责政治指导和改组的中心。这一中心在以后几个星期，即在侵苏战争初期，很快在法国建立了，随后在1942—1943年期间又对意大利反法西斯政党的改组起了有益的指导和促进作用。

二、图卢兹委员会

1941年6月22日，国外局（罗阿西奥、诺韦拉、内加维莱）仍设在巴黎，并在德国人占领的这个城市以严密的地下斗争的方式，摆脱了意大利警察的搜捕。国外局有人数不多的一批合作者（兰普雷迪、克洛基亚蒂、莱里斯、埃格莱·瓜尔迪、迪娜·埃尔米尼、埃奇奥——一个绰号“黑脸汉子”、被迫多年过着孤独生活的技术人员）。国外局掌握了原来的中心所拥有的经费。它与法国共产党的一个非法存在的领导小组保持着联系，利用这个小组向莫斯科的中心传递消息。那时，意大利共产党人以自主小组的形式参加法

国共产党人的抵抗斗争，并流血牺牲，首批就有前驻西班牙纵队委员里卡尔多·罗埃杰尔（里查德）和曾被特别法庭判过刑的马里奥·布齐，他们二人遭到枪决。其他共产党人参加了最初的游击斗争，这一时期的游击斗争把他们锤炼成后来在意大利作战的战士，其中有北部地区的彼特罗·巴叶塔（内多）——他是在意大利最初一批捐躯者之一，还有都灵和米兰的爱国行动小组卓越的指挥员乔瓦尼·佩谢。在南部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的有伊利奥·巴隆蒂尼这位未来的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加里波第支队的指挥官和英勇的爱国行动小组分子阿利吉耶罗·邦恰尼。

1940年底，国外局得以重新和马赛建立联系，在那里，阿门多拉曾在巴黎沦陷以前奉命成立了一个领导居住在称作“自由”区（因为它由贝当政府控制）的意大利共产党人的中心。在移居法国的同志和劳动者当中进行的政治工作，委托“斯巴达克通信”编辑部以寄信的方式完成，这些信件没有直接采用该刊的名字，为的是避免太正式化，而仅仅编上号码，标明是在马赛写的，分寄到各省中心，主要是土伦、尼斯、格勒诺布尔、里昂、圣艾蒂安和图卢兹。这项工作是要成立负责吸收新党员、筹措必要资金和为必须转入地下的党员物色可靠的隐匿之处的区级委员会。这样，在短短的几周里，就与近1000名共产党员接上了关系，并可以从中挑选一定数量的骨干随时派回意大利。通过阿门多拉，还成立一个小型的协调委员会，由斯特法诺·斯基亚帕雷利和西班牙加里波第纵队队员马里诺·马采蒂组成，由阿利吉耶罗·邦恰尼、斯特法诺·布劳和玛丽亚·贝尔加米尼协助。在与巴黎中心分离一段时间之后，克洛基亚蒂和兰普雷迪先后来到马赛小组，这两人都是与国外局重新接上关系的。此外，马赛小组还与监禁在维尔内集中营的共产党员以及在法国战败的日子里从巴黎疏散出来的同志们取得了联系。塞霍尼、多扎和斯科蒂曾在图卢兹从事蔬菜水果种植活动，

并在一个佃户家中建立了一个地下斗争的根据地。

监禁在维尔内集中营的一批共产党人获得自由使政治力量大大增强了；他们是在居住美国的一些人指名保释下才脱离监禁的，美国驻马赛领事馆向他们发放了护照和入境签证，并为他们提供了船票和一笔款项。

当其他国家被流放的人，包括共产党人，都在利用这一能够得救的机会时，意大利共产党人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继续留在法国从事地下斗争。他们被转移到马赛附近的雷米勒集中营，他们获准可以为履行必要的领事手续自由出入。这样，有一天，同志们没有返回集中营，被组织上安置在一些临时住处，他们获得了假证件，然后分散到其他省份。泰雷萨·诺切、乔瓦尼·帕罗迪、阿拉迪诺·比博洛蒂、朱利亚诺·巴叶塔、弗朗切斯科·利昂纳、费利切·普拉托内都是这样转入非法斗争的。当时，一切努力都应当是准备重返意大利，这些同志于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进一步远离自己国家的机会。只有马里奥·蒙塔尼亚纳不愿接受党的号召，因为他还为1939年9月因他的表现而受到的批评所苦恼，他认为，应当去寻找一种澄清问题的办法，而这种办法是可以更容易地通过如下途径找到的：即在法国参加地下斗争，尔后回意大利参加游击战争。 483

路易吉·隆哥也从维尔内集中营转移到雷米勒基地，因为他作为苏联公民被苏联邀请作返回苏联的准备。他拒绝了有关婉拒苏联邀请、转入非法斗争的建议，以免使作为他的行动保证人的苏联领事馆陷于困窘的境地，尤其是为了不致对想必由共产国际和陶里亚蒂发出的邀请作出否定的答复。隆哥在他享有相对自由度过的日子里，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被告知工作计划和重返意大利的方案，他对党所执行的政治路线是赞同的。他之所以作出这种决定，也许是受到他了解1940年7月由莫斯科“意识形态中心”

发出的指示这一点的影响，这项指示是要委任少数不曾卷入旧日冲突的同志担任领导工作，同时免除原领导机构其他成员的职务，让他们有可能到基层去工作。国外局从巴黎向阿门多拉下达指示，令其向隆哥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但却不是把领导工作的任务交给他。于是，阿门多拉如实将指示向隆哥传达，这使他陷入困境。正当人们在讨论隆哥转入非法斗争是否合适时（阿门多拉和泰雷萨·诺切都极力主张这样做），6月22日这一天到来了，隆哥被投入监狱，并经过长途跋涉后押回意大利，后又放逐到文托特内。但这毕竟是一件幸事，因为他于1943年8月20日获释后，来到罗马，参加了8月29日党的领导机构的成立，并于9月8日之后，担任了他所创建的加里波第纵队的指挥。

在同国外局恢复联系之前，在与马赛小组保持联系的同志们当中，曾展开了热烈的争论，特别是在阿门多拉与塞雷尼之间展开这种争论。前者在一封信中强调巴多利奥辞职所引起的危机的意义，因此认为，有必要将团结呼吁从自由党人和天主教徒扩大到保皇党人以及随时准备好为实现停战和推翻墨索里尼而斗争的法西斯分子。而塞雷尼却坚持主张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保持更严格的阶级目标。这是一场激烈的争论，先是通过书信进行，后来在马赛则是当面交锋了。在一次阿门多拉和塞雷尼都参加的会上，兰普雷迪从巴黎及时赶到，他借助国外局的文件，使人在判断意大利形势发展和国内战线日趋瓦解方面重新达到令人满意的政治一致。

当希特勒宣布入侵苏联的消息传来时，马赛领导中心是有条件可以立即采取政治行动的。在维尔内集中营曾与南尼保持通信联系的费利切·普拉托内奉命立即给南尼发寄了一张明信片，称母亲身染重病，必须马上回家探视。南尼当时被迫居住在东比利牛斯山的帕拉尔达，他毫不犹豫地回了信，并按指定地点马上来到马赛。他同塞雷尼和普拉托内进行了长谈，并会见了一些社会党

员。他赞同改组政治移民队伍的建议，根据共产党人所作的调查，政治移民比他所想象的要更有力量。于是，决定尽快召开由社会党、正义与自由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代表参加的会议，从而克服1939年因分裂而导致的后果。会议于1941年在图卢兹召开，西尔维奥·特伦廷保证必要的地下斗争和安全的条件。西尔维奥·特伦廷在图卢兹保留着他的书店，这个书店是法国抵抗者的文化政治中心。会上，南尼、塞雷尼、多扎、特伦廷和福斯托·尼蒂保证三个左翼政党的领导人都参加活动。当时共和党无人参加，因为该党在法国没有任何有权威的领导人，而帕恰尔迪在纽约则持歧视共产党人的态度，到1942年其态度才有所缓和。 485

必须建立一个不是非要正式代表各个党派并要它们正式承担义务的机构，而是要有一个要求不高的机构，它只须促进各个反法西斯政党之间的统一行动，特别是在这些政党之外，在国内，做到这一点，因为许多反法西斯派别还没有组成政党，这样做就可以把一些因战争的灾难性进展而采取反对派立场的保皇派和法西斯个人及团体带动起来。于是便成立了那个有意称作“争取意大利人民联合行动委员会”的机构。图卢兹委员会就是无意代表当时尚未形成的意大利人民的联合，而是想推动和促进人民联合的发展，亦即推动和促进老的反法西斯派别同来自保皇派和法西斯阵营的新力量的团结，这些新力量愿意在为期不致过晚时为实现停战并同世界反法西斯联盟中的大国单独媾和而采取行动。在该委员会发出的呼吁书中，提供了这一消息：社会党、正义与自由运动和意大利的共产党等组织的“一批党员”（即一批普通党员，而非知名人士或领导人）认为，为反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战争而进行的斗争向意大利人民联合提出的根本要求是：1) 意大利立即同被它进攻和侵略的国家单独媾和；2) 实现国家对称霸欧洲的希特勒主义的独立；3) 恢复政治自由。

这样便指出了彼此紧密关联的三项目标：和平、独立、自由。接着又指出，反法西斯分子决心同如下一切社会、政治、宗教、文化运动结成联盟：这些运动“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准备制止法西斯主义为希特勒的利益和掠夺成性的墨索里尼财阀政治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因此，呼吁书声明，反法西斯分子不想对那些准备为争取单独媾和而战的人们的意图作任何追究。

图卢兹的发起者们确信，一部分社会政治力量会下决心抛弃墨索里尼以保护自身的特殊利益，使本身的责任和政权泾渭分明，
486 避免与它一起毁于一旦。但重要的是，这些力量要为墨索里尼的下台和单独媾和的实现作出贡献。事情很清楚，鉴于反法西斯力量地理上的分散、政治上的隔阂和国内组织的涣散，它们单枪匹马难以胜任。因此，必须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向如下一些人提供一个达成谅解的基础：这些人虽则与政权当局同流合污，而且情况往往很严重，但他们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已感到“制止战争”的需要。

这时呼吁书首次十分清楚地肯定了一条战略路线，这条战略路线后来导致了7月26日反对派委员会的建立，同时也导致了同历时45天的巴多利奥政府建立具有批评和推动作用的支持关系，然后又导致了解放委员会的成立。这份团结呼吁书的措词随后又得到进一步明确：呼吁书列举了它所号召的那些非反法西斯力量的名称（保皇派分子、持不同政见的法西斯分子），并指示意大利人民享有选择自己喜欢的政府形式的最高权利；但是，这一纲领的实质内容已经是清楚的了，并且把持如下态度的人排斥在业已开始的进程之外：这些人死抱住等待主义不放，甚至采取更为消极的态度（坐等现政权的失败，以期在下一阶段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或者有人则想进一步加强国家的连续性，以期让保守力量和天主教力量接替政权），他们看不到这样的必要性：反法西斯力量必须采取主动，在为时未晚的条件下阻止意大利遭受失败和灾难，并在政

权垮台之后，使他们自己成为新的国家领导阶级。

这份呼吁书以雄辩的历史和政治事实证明所提建议的正确性，并指明以下目标：揭露与希特勒的盟约；立即同英国、苏联及其他受法西斯主义侵略的国家单独媾和；从苏联和其他一切战线上撤退意大利的战斗部队和占领军；把希特勒侵略者从意大利驱逐出去；把墨索里尼赶下台；实现新闻、结社、言论自由；把选择符合自身意志和利益的政府的最高权力交还给意大利人民。

为了着重表示要在国内进行活动的意愿，呼吁书笼统地指出意大利边界的某一地方是会晤地点，在那里必须建立一个领导运动的政治中心。最后，参加图卢兹委员会的人决定成立争取意大利人民联合行动委员会，并号召所有团体和各政治派别协助他们进行活动和参加委员会。 487

在1941年9月举行的图卢兹会议上，共产党的代表是塞雷尼和多扎。他们抵达图卢兹以后，更加密切了与西尔维奥·特伦廷的关系。由塞雷尼起草会议文件，由南尼认真细致地加以推敲修改；南尼参加会议十分积极。会议召开前夕，在卡比罗尔蔬菜水果场举行了一次党的会议，阿门多拉和斯科蒂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要一致确定应执行的行动路线。

为使这一呼吁书具有必要的权威性，当时必须列出在意大利边界这一地方开会的这批战士的姓名，尽管不是公开这样做的。共产党代表毫不犹豫地列出与会者的姓名，即塞雷尼和多扎，他们都是人们早已熟悉的党的领导人，他们代表意大利的共产党签了字，并就此提供了必要的保证。代表正义与自由的，除西尔维奥·特伦廷外，还有福斯托·尼蒂，他与卡洛·罗塞利和埃米利奥·卢苏在从利帕里逃跑时曾是难友，他又在西班牙参加过志愿军。当然这两名代表不属于那个前几年曾领导过该运动的小组（其中有加罗西、塔尔基亚尼、钱卡、卢苏），该小组大部分人都逃到了纽约，并一

直采取歧视意大利的共产党的行动路线。后来，埃米利奥·卢苏重返法国，问题才得到解决。

对于社会党，南尼认为有必要请 1939 年 9 月离开书记处后仍保留领导机构成员职务的朱塞佩·萨拉盖特参加委员会。萨拉盖特曾反对公开指责南尼的立场（谴责苏德条约，但重申需要与共产党人保持团结关系），以免使南尼遭受法国警察逮捕的危险；他当时被迫居住在比利牛斯的圣戈丹。南尼和萨拉盖特恢复政治联系从一开始就是由阿门多拉承担的，阿门多拉秘密地到达圣戈丹，把协议文本交给了萨拉盖特。萨拉盖特不仅决定参加委员会，而且和南尼一起开始在移民中进行改组社会党小组的工作，而早从 1940 年 6 月起，迁居国外的共产党人就已经和它们建立了日益增多的合作关系了。南尼和萨拉盖特一致非常严厉地谴责安杰洛·塔斯卡对贝当政府采取的投降主义态度。南尼在移居法国和瑞士的意大利社会党人和劳动者中间开始印发通讯稿，力求在反对改良主义和最高纲领主义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在同共产党采取统一行动的情况下，为改组社会党提供新的政治基础。南尼从塔斯卡的个人问题开始，追溯到对法国的德阿特和马尔凯以及比利时的德曼的新修正主义的批判，这三个人都曾发展到同纳粹主义达成妥协。

南尼和萨拉盖特当时也批评了纽约的马志尼协会的反共路线，因为他们两人都确信必须同共产党人采取密切的统一行动。但是，他们两人之间也是有差异的，而且当时已经可以看出来：南尼主张将来建立一个单一的工人阶级政党，而萨拉盖特则认为团结是暂时的，它应当仅仅维持到呼吁书中提出的目标达到时为止。后来我们可以看到：资本多者事易成！莫迪利亚尼是在南尼被迫辞职后于 1939 年被任命为社会党副书记的，是塔斯卡的助手，他一直采取静观立场，同塔斯卡相距甚远，但他也不愿意与共产党人

一起进行共同战斗。他在维希统治下的法国的安全是朝不保夕的，这也是由于他是犹太人，又拒绝转入地下，尽管他的健康状况也使他难以从事地下活动。然而，他并没有真正阻挠南尼和萨拉盖特所倡导的重建社会党的工作；这项工作只是在马赛和尼斯，在党内最老的干部当中，遇到某些阻力，而在基层移民中却得到热烈支持，因为这些基层移民在抵抗运动的发展、意大利的共产党的活动的推动下，而且也在法国劳动者的催促下，都参加了反对德国人和法西斯的斗争。后来，莫迪利亚尼得到乔伊斯·卢苏的帮助，转到瑞士，在那里一直呆到1945年。

注意并领导成立图卢兹委员会的工作的国外局，继续既不同莫斯科的“意识形态中心”直接联系，又不同马索拉同志直接联系，它通过非法的法国共产党组织向意识形态中心报告情况，但却从未得到答复，马索拉同志当时正是在那几周内返回意大利的，也还没有人认识他。国外局在政治上确信它所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其内部并无异议。此外，播送马里奥·科伦蒂讲话的莫斯科电台意大利语广播（人们只认出他的声音）和米兰自由电台的广播，都表明，在法国执行的路线从根本上说是完全符合陶里亚蒂的指示的。因此，尽管人员阻隔和相距遥远，却仍实现了意大利的共产党的政治团结，这是在那些年月里共产党人所开展的统一行动的前提和条件。 489

加强正义与自由组织的权威代表性是很困难的，因为它当时受到纽约组织的领导人的批评。埃米利奥·卢苏曾秘密地离开美国取道英国返回意大利，他带来要在撒丁举行起义性质的武装斗争的计划，并向特伦廷转达了纽约中心提出的批评。他还把这些批评告知了南尼，而南尼则力图说服卢苏，让他相信必须同共产党人搞联合行动。卢苏就在上述情况推动下，同共产党人取得联系，开始同意大利的共产党（由阿门多拉代表）进行热烈的讨论，如今尚

存的双方交换的发言记录便是他们的讨论内容的证明。经过长时间的周折之后，卢苏终于承认图卢兹委员会的有效性，并以正义与自由正式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该委员会。于是，争取意大利人民联合行动委员会就成为三个反法西斯政党有权威的团结中心。当时仅缺共和党的代表，共和党那时在法国没有一个有权威的领导人。正因如此，共和党也没有参加反对派委员会和民族解放委员会。当时曾由行动党代表共和党，因为在行动党中也有不少共和党人。但是，这种做法却加剧了共和党的思想政治危机，后来1946年立宪选举结果证明这种做法并不失策，因为老的共和党取得了重大进展（该党获1003607张选票，而行动党则得334748张选票，共和同盟得97610张选票）。

图卢兹委员会在加强其权威性和团结的同时，还使在纽约的《工人国家》和各反法西斯中心以及马志尼协会和加里波第联盟了解呼吁书原文内容。贝尔蒂又把呼吁书转到莫斯科。呼吁书文本在法国和瑞士的意大利移民中传播，并指示人们应千方百计地把文本的抄件送到意大利。文本也转到那些受到党的政治培养、合法地回到意大利的共产党人手中。今天，从各方证据来看，从1942年初起呼吁书就已在许多地方传播，它对恢复团结关系起了促进作用。

三、国内中心

然而，只是到1942年6月，马索拉国内中心和都灵共产党组织的同志们才把呼吁书的抄件寄给社会党同志，他们于1942年9月通过由奥利亚罗、卡尔马尼奥拉、阿恰里尼、基亚拉梅洛和博齐（他在法国被捕，送往意大利流放，但与都灵的社会党同志有联系）签署的一封信，声明他们同意呼吁书的内容。这是协议正式扩大到

国内的第一个迹象。被流放在皮埃蒙特大区某一地方的布鲁诺·博齐的签字使社会党所表示的同意是有特殊的权威性。在都灵，图卢兹的呼吁书得到行动党的发起人路易吉·萨尔瓦托雷利、自由党的弗朗科·安东尼切利和天主教民主党的焦阿基诺·夸雷洛的支持。都灵是在图卢兹呼吁书的指示的基础上成立真正有代表性的团结委员会的第一个城市。

吉洛·彭泰科尔沃对呼吁书的散发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受到国外局的政治培养的，于1942年6月合法地返回意大利。他分别在米兰和罗马同乌戈·拉马尔法和埃多阿尔多·沃尔泰拉取得了联系，把呼吁书的文本交给了他们，并说明了图卢兹委员会是如何为恢复反法西斯运动的团结而进行努力的，强调当务之急是要反对任何等待主义，以求在国家失败之前，而不是之后推翻墨索里尼。

从意大利回到法国之后，吉洛·彭泰科尔沃作了一个报告，从中可以看出意大利国内反法西斯运动是落后了。与形势恶化所提出的要求相比，恢复团结的速度极其迟缓。他也了解一点关于共产党人的活动情况，然而，他们的活动是断断续续、没有联系的。相反，他得出的印象则是：人民对战争进展情况的不满和日益深重的痛苦，使人们可以，甚而要求人们迅速而集中地采取行动，把国内现有的反法西斯力量集合与组织起来。

图卢兹委员会于1942年9月起草了另一份呼吁书，谴责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萨尔斯堡会晤后强化意大利对德国的屈从关系，促使一切关心“拯救意大利”和“祖国未来”的力量展开统一行动。这份号召团结的呼吁书还明确指出它所面向的是哪些政治派别，以便使它们在这场保证意大利人民获得和平、面包、自由和独立的伟大斗争中团结起来。事实上，呼吁书的对象就是天主教徒、社会党人、共产党人、自由党人、共和党人、民主人士，甚至还有“至今仍受

墨索里尼欺骗的法西斯分子”。呼吁书还要求每一个工作中心、思想中心、生活中心都建立由属于各个政治派别的“正直人士”组成的“行动委员会”。鉴于在全国尚未形成统一行动中心，图卢兹委员会就努力促使人们开展自主、分散的活动，以便在每个地方都建立联合委员会。由于图卢兹委员会了解国内存在各种广泛的反法西斯派别（尽管当时1942年9月还没有恢复各个政党，它们之间也还没有建立团结关系），这就使呼吁书发出的号召变得很具体。呼吁书还向如下几种人提出具体斗争目标：陆海空军士兵、军官；工人、铁路员工、海员；农民和农业种植者；妇女、青年、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和自由职业者。呼吁书向所有人指出为把卖国贼从政权中驱逐出去而进行坚决斗争的道路。呼吁书号召开小差；携带武器和辎重投奔红军和盟军；破坏军火生产和运送武器；拒绝上交农产品和纳税；通过妇女示威抢了为“鲨鱼”们服务的商品齐全的商店，以救济挨饿的儿童；它还号召人们到处组织行动小组，针锋相对地以武力对付武力。这些指示的目的在于：为开展必将成为武装起义的一种行动作好政治准备。

国外局早从1940年秋起就同马赛中心恢复了联系。1941年6月22日以后，它开始准备把它的全部机构转移到法国南部工作。搬迁工作颇费了一些时日，因为越过德国人直接占领的地区与维希政府控制的地区之间的分界线很困难，同时，也由于地下工作要谨慎从事。这一工作到1942年7月才告结束，这时，在巴黎曾因重病
492 耽搁的安东尼奥·罗阿西奥也来到马赛了。

当时，问题是如何返回意大利。只是到1942年初，从合法地回到都灵的内拉·马尔切利诺同志的报告中，国外局才得知马索拉已经回到意大利。这一消息促使国外局加紧工作，将它的基地迁至法国南部靠近意大利边境的地方。马索拉何以没有音信，其原因人们当时是不理解的：马索拉没有把他已返回意大利的事报告国

外局。事后，马索拉解释说，他的举动出于地下工作要谨慎从事，他不愿冒险破坏自己不稳定的地下处境，同时也不清楚在他离开巴黎以后，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他认为自己在陶里亚蒂和莫斯科“意识形态中心”面前是负责人，他担心别人插手会干扰他的工作，而且他有理由认为，这项工作是进行得不错的。他在国内的行动谨小慎微，这是他能以自保的原因，但也有意地限制了他的活动。国外局与马索拉之间好不容易建立了通信联系，但这种联系也并未有助于便利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当时，必须使国外局的全体同志更快地返回意大利，以便在国内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内中心，并着手建立一个遵循图卢兹纲领的中央联合委员会。

返回意大利并非轻而易举。必须找到一条翻越阿尔卑斯山的秘密通道。在法国同志们的帮助下，在罗克比里埃（在圣马丁—维苏比附近），已经设置了一个出发基地，于是，问题就是如何在意大利设置一个抵达意大利的基地了。克洛基亚蒂第一次作的返回尝试失败了，其原因正在于缺乏一个抵达基地，有了这个基地，就可以休整和穿上必要的便衣，以便继续在意大利的旅程。在乌迪内的多梅尼科·托马特和诺瓦拉的朱利奥·阿尔比尼两位加里波第纵队同志的帮助下，在古内奥省的维尔南特找到一个基地，这个基地设在农民家中，这些农民最初以为是要为转送犹太人提供方便。克洛基亚蒂和后来的莱里斯，是最先利用这条新辟路线的，他们二人于1942年夏到达都灵，与马索拉取得联系。他们做得刚好及时，因为1942年下半年发生了战争的军事转折，这一转折使意大利的事态在1943年春急转直下。

四、战争的转折

493

1942年1月1日，在意大利和世界上，很少人想到，德国在欧

洲、日本在太平洋的战争在这一年会有新的发展。德国军队在意大利、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卫星国军队和被占领国卖国分子派遣的各个外籍兵团的追随下，继续在欧洲和非洲不断横行，与此同时，日本则在未遇到坚决抵抗的情况下，把侵占的地盘扩大到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谁会遏制住侵略者呢？

1942年7月1日，布莱希特在他的日记中是这样表述他焦虑的心情的：“香港和新加坡不战而陷，缅甸沦丧，同样，中国也被包围，与外界隔绝。德国战舰通过运河……军队从利比亚撤出……。德国师向前推进，入侵埃及；托卜鲁克一枪未发地陷落。”布莱希特当时远离战场，在美国避难。更有远见、更加勇敢的是抵抗运动的那些人员，他们在被占领的土地上组织起来，进行战斗，从苏联到波兰、南斯拉夫、挪威、法国，给占领军以重创，迫使它们把一定数量的师从前线撤回来。但是，1942年初，欧洲抵抗运动在政治上还是分散的，还没有取得像1944年和1945年时那样的团结和成效。因此，只有苏联一国准备在军事上顶住希特勒为即将爆发的春季战役而调用的210个师的冲击。在绿山区部署了轴心国的11个师，其中有3个德国师。然而，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在一望无垠的俄罗斯和乌克兰平原上以及第聂伯河、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进行的战斗的结果。

为抵御德国的进攻，斯大林要求有更大数量的给养和开辟欧洲大陆的第二战场。当时，在开辟波斯湾和里海之间的南路通道之前，美国的援助物资只能经北路通道运到北极港口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运送物资的船队要长途跋涉，历尽艰险，抵达目的口岸时，所剩无几。德国潜艇的行动，在1942年春，是特别具有杀伤力的。6月间，一支开往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船队，34条船中损失了24条。大规模的夏季战役正是苏联抵抗斗争的紧急关头，而就在此时，美国运来的物资却减少了。后来，强大的美国海军受命

保护船队，损失大大减少。但在漫长的一段时间里，苏联不得不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对付敌人。

为了促使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莫洛托夫于1942年5—6月间前往伦敦和华盛顿。开始丘吉尔的答复是模棱两可的，罗斯福则承担更大的义务。莫洛托夫返回伦敦后，丘吉尔于6月12日同意发表一项公报，其中明确承认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迫切必要性”。但是，在法国迪埃普登陆的尝试，由于准备仓促，于8月10日严重受挫，这似乎证明丘吉尔态度迟疑不决是正确的。为了给苏联以直接援助，英美两国对德国工业区进行了大规模的飞机轰炸。

英美两国由于缺少更有效的军事介入，便设法保证给苏联以政治声援。5月26日，莫洛托夫在伦敦签订了为期20年的英苏友好条约；6月11日，又在华盛顿签订了美苏互助条约；8月12—15日在莫斯科举行了第一次三方会议，有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的代表哈里曼出席。当时，苏联曾支持26国签订的大西洋宪章的原则。世界反法西斯大同盟日趋巩固，尽管彼此之间还有矛盾和猜疑，这对被占领国起了积极的影响，促使抵抗运动的各种力量更加团结。

然而，决定性的因素毕竟是武力，是在苏联、太平洋和绿山区进行的震撼世界的战局结果，这三个战场在地理上相距遥远，实际上却相互依存。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进攻迫使美国最初抽调欧洲的兵力，集中到这一地区。日本向前推进受阻，这就使一直视希特勒为主要敌人的罗斯福得以把越来越多的人力和物力投入欧洲，为开辟第二战场作准备。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受阻也使英国得以把用于准备10月进攻的援兵和物资从印度洋运抵苏伊士运河。于是，希特勒被迫于1942年8月从地中海撤走进攻马耳他和护卫开往绿山区的意大利船队所需的飞机，把它们运往苏联战场。美国的战略计划是受太平洋海空战役进展情况制约的，这与

丘吉尔的战略计划并不吻合，因为丘吉尔把地中海和苏伊士运河看成是为确保英帝国生存而进行的决定性战斗的场所以及在欧洲大陆软腹部打击德国统治体系的基地。苏联在本国领土上直接投入同步步进逼的敌人进行的生死搏斗。在反法西斯联盟的进攻力量日益增长的同时，轴心国和日本的军力也在继续膨胀，尽管矛盾重重，而且达到扩张的极限。

1942年夏，出现了形势逆转的势头，先是隐约的，后来则日益明显。德国和日本的进攻能力在逐渐衰退，而苏联、英国和美国的进攻力量则在增强。

这种新形势的迹象最初表现在太平洋战场上。日本人在6个月里长驱直入扩展到菲律宾，取得重要战果：日本使其防守范围远离本土；夺得盛产日本所短缺的原料的土地；通过征服新加坡和缅甸来孤立中国，并将其纳入日本的政治经济范畴。日本人依靠多年来从事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斗争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人支持，占领了菲律宾、荷属印度（今天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缅甸。在缅甸和马来西亚，只有共产党人奋起抵抗日本人，以便保持与中国联系的道路畅通（印度支那当时还由与维希政府有联系的政权当局控制，因而处于日本的势力范围之内）。由于日本的防守范围扩大过甚，有些地盘就变得无法保护了。正当日本那些极端主义分子集团进一步觊觎夏威夷群岛时，4月18日，东京首次遭到轰炸。6月4、5日两天，日本企图重演珍珠港事件，在中途岛发动了海空战，然而事与愿违，却以它的大部分舰队被摧毁而告结束。于是太平洋战争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

1942年初，意大利和德国在非洲的兵力还聚集在的黎波里塔尼亚边界，他们是在1941年几次战役之后被赶到那里去的。轴心国军队由罗梅尔指挥，尽管意大利师比德国师多，也尽管军事行动取决于意大利海军有无能力保护船队，因为任何作战和生存的可

能性都取决于船队能否到来。意德两国发动的新的进攻进展迅速。

6月20日，英国人被迫在托卜鲁克投降。墨索里尼到达绿山区，参加苏伊士运河上的胜利进军，而罗梅尔连见都不见他一下。7月1日，意德军队到达距亚历山大100公里的阿拉曼，但因缺乏燃料和物资而不能继续进攻。墨索里尼像过去在希腊的情况一样，再次被迫垂头丧气、气急败坏地回到罗马。侵占马耳他的计划也未能实施，因为希特勒已将可以动用的飞机从地中海调往俄国战线，这样，意德两国被迫停止进攻，从此一蹶不振。

7、8两月，意德两国曾企图调整兵力，储存燃料，以求重整旗鼓，继续向亚历山大进攻。但是，在海战中时有胜负，而从9月起，英国人的力量却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加强了。到10月，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大大地有利于英国军队。于是，10月23日，英国攻破意德防线。罗梅尔以最快的速度撤退，侥幸拯救了大部分德国非洲部队，却让既无燃料又无装备的意大利师负起为拯救德国“盟友”而不惜卖命的任务。在这绝望的斗争关头，意大利将士再次表现出勇敢战斗精神，遗憾的是他们却被残暴傲慢、自私自利的德国“盟友”所利用了。撤退一直继续到被迫撤出整个利比亚。1943年1月1日，497英国人占领了的黎波里。2月1日，意德全部军队被赶到突尼斯，它们在东部受到蒙哥马利军队的追击，在西部遭到由艾森豪威尔指挥的、从阿尔及利亚发起进攻的英美军队的重创。

1942年11月8日，英美远征军从北非的阿尔及尔、奥兰和卡萨布兰卡登陆。这一行动是6月30日决定的，正是在放弃开辟北欧第二战线之后，因而这一行动的政治指导思想是含混不清的。当时的北部非洲由依附维希政府的军事当局管辖。法国海军首领达尔兰上将当时正在阿尔及利亚，这就促成维希政府代表与美国人达成协议。11月12日，签订了停战协议，达尔兰下令停止同美军作战，贝当虽然也插手达尔兰的两面活动，却又矢口否认号召忠

于其领导的政府的有关方面继续战斗。而集结在土伦的法国舰队拒不执行达尔兰有关开往阿尔及利亚的命令，也拒绝接受贝当的命令；为了不致落入德国人之手，这个舰队竟毁舰自沉了。德国人占领了非洲南部地区，使维希政府的作用日益名存实亡。德国军队占领了突尼斯，而在此之前，突尼斯是由维希控制的。意大利军队受命将占领区扩大到罗讷河。

德国军队开进突尼斯，为从利比亚撤出几经战火的意德师团提供了方便。然而，对突尼斯的占领只有几个月。5月7日，英美两军会合。1943年5月12日，驻守突尼斯的意大利军队缴械投降。非洲整个北部——从埃及到摩洛哥——全部控制在英美军队手中。英美为同达尔兰达成协议，既牺牲了从德国集中营逃出的国内抵抗运动一个方面的负责人吉罗将军；也牺牲了被迫旅居伦敦的戴高乐将军，而这时，他的威望不仅得到老牌殖民帝国广泛地区的承认，而且在法国国内也日益提高。只是经过新的斗争和周折，才在戴高乐将军的领导下建立了抵抗运动的统一领导机构，其中也有法国共产党代表参加。

五、斯大林格勒

随着英美在地中海压力日益增强，苏联腹地的战争也如火如荼地展开，这场战争使德国动用了149个师，“卫星”国动用了60个师；苏联方面则动用了约200个师。

1942年5月8日，德国发动了进攻。希特勒把力量集中在南面。占领莫斯科的尝试失败后的冬季休战期间，德国参谋部统计了自发动对苏战争以来所受的损失：90万人，2340辆坦克，7.3万辆军车。德国军队元气大伤。适当增援的兵力和装备弥补不上所受的损失。最严重的问题是燃料储备很有限。到1941年年底，第

三帝国的燃料储备仅有80万吨，只够1个月耗用的。因此，希特勒曾指出，在南线的战争胜负都有可能。当时缺少从列宁格勒到罗斯托夫发动全线进攻的力量。于是，德国决定以最大的努力分两路向南面进攻，一路直接指向顿河的伏龙芝和伏尔加河的斯大林格勒；另一路攻向高加索和巴库油井。按照德国人的计划是，在中央战场与南面战线的交界处占领伏龙芝，这样就可以向北面和莫斯科采取迂回行动，或是南下进击斯大林格勒，并越过伏尔加河，指向里海。

德国人虽然因为苏联在哈尔科夫发动反攻和塞瓦斯托波尔进行顽强的保卫战而放慢了速度，却仍于7月27日占领了顿河的罗斯托夫，8月9日占领了克拉斯诺沃斯克，8月22日攻取了厄尔布鲁士山。

攻向斯大林格勒的那路德军遭到更大的抵抗。按照德军的行进速度，7月25日应当抵达并占领斯大林格勒。然而，德国人只是在8月23日才抵达斯大林格勒以北的伏尔加河。苏联军队在伏龙芝进行了长时间的、胜利的保卫战，并得以在顿河右岸保持一个桥头堡。苏军的压力对向斯大林格勒进发的德军北侧构成威胁。

苏联的反攻打击了敌人营垒的弱点。意大利驻俄军团对此付出了代价，这支军队曾按照墨索里尼的意旨，以梅塞将军指挥的意大利驻俄远征军取代了伊塔洛·加里博尔迪将军指挥的兵团。意大利驻俄军团共有22万人，分为两个军，拥有74辆坦克、380件反坦克武器、1.7万辆军车。数量并不大，但这是意大利所拥有的军力的精华，兵力和装备都是从绿山区前线上抽调过来的。意大利司令部与德国司令部的关系很糟。缺少给养的意大利兵团所接受的任务，与它的装备相比是过于繁重了。8月20日，斯弗尔采斯卡师在意大利军团和德国第六集团军的会合地点，霍漂尔河与顿河的汇合处被击溃。正在此时，8月24日，在一次企图堵塞缺口的最后

战斗中，萨沃亚骑兵队在伊兹勃鲁先斯克孤注一掷，挥刀血战，结果都牺牲了，在这次牺牲中，意大利军队耗尽最后的军事锐气。苏联军队没有继续进攻，但它在顿河右岸保持了难能可贵的桥头堡。

受到敌军进攻的斯大林格勒于8月25日宣布戒严。叶廖缅科将军和苏联共产党代表、军事委员会委员尼基塔·赫鲁晓夫动员军民奋力保卫这一城市。

当冯·保卢斯指挥的德国第六集团军拼命进击斯大林格勒外部防线时，苏军却在德军两翼迂回。城内战斗在9、10、11三个月里连续不断。从牢牢控制在苏军手中的伏尔加河左岸，向各地增派援军和物资。德国人仅占据了伏尔加河右岸的几个地方，而军民奋力保住的工厂和住宅则阻止德军控制伏尔加河整个右岸。来自斯大林格勒的消息，对军民密切合作以坚韧不拔的意志抗击敌人的事迹的了解，这些都像熊熊的烈火燃遍全世界，传到抵抗运动战士中间，像是号召人们去进行一场殊死斗争。在未受德国统治的所有自由国家，声援斯大林格勒英勇战士的活动和强烈要求开辟第二战场的呼声层出不穷。

500 正当德国第六集团军深陷绝境时，苏联从南、北两线进行的大反攻开始了。在苏联远程炮火的轰击下，包围圈不断缩小，把22个敌师（35万人）困在1500平方公里的战场上。11月23日苏军南北形成合围。冯·保卢斯建议撤出斯大林格勒市区，但遭希特勒断然拒绝。斯大林格勒不应放弃，在这个纳粹独裁者看来，任何军事考虑都超不过斯大林同希特勒斗争、布尔什维克同纳粹主义斗争这一政治意义。此外，第六集团军的抵抗也使德军指挥部得以撤回深入到高加索的那些师。

德军企图冲破苏军包围，给被围困的军团打开一条生路，使之与德军主力重新会合，这一做法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做到了。由冯·曼施泰因指挥的部队于12月19日开抵离斯大林格勒50公里的

地方,但是,被围困的冯·保卢斯的第六集团军本可竭尽全力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打开一个突破口的这一行动,却未得到希特勒的批准,因为希特勒再次下令作困兽之斗,直到最后一个人。在苏军发动新的、规模更大的两侧围攻的威胁之下,冯·曼施泰因指挥的部队不得不撤了下来。

正是在这次战役里,意大利驻俄军团于12月16日被苏军击溃,而德军司令部于12月19日才下达撤退的命令。这一延误使意大利驻俄军团遭到更加严重的灾难。一个意大利师团含有山地兵,这些山地兵配有15000匹骡马,是准备用来参加攻取科萨托山的,然而它们却被调到顿河一线。这一师团曾进行更长时间的抵抗,直到1月中,但后来也被迫撤退了。而另一师团曾被迫立即撤退。这种悲惨的撤退在1月份整整延续了1个月。意大利驻俄军团原有22万人,生还者仅10万人,他们怀着对德国人的一腔怨恨返回祖国,因为德国人曾把他们抛弃在冰冻的平原上,见死不救,但是,他们尤其立志要惩办这场灾难的罪魁,首先就是墨索里尼。这些幸存者为了进行卫生消毒而被关在收容营里达一个月之久,然后回到意大利,他们向家人、国内诉说被官方宣传所掩盖的真实情况。这些死里逃生的人从苏联返国恰好同1943年3月罢工同时发生。

斯大林格勒市中心的战斗在1月份整整持续了一个月。只是⁵⁰¹到了2月2日,冯·保卢斯才不顾希特勒的命令要求投降。德国第六集团军被摧毁。35万德国人中只有7万人被俘,这些人开始了走向伏尔加河对岸俘虏营的惨绝人寰的进发。

这样,1942年结束时,战争形势已发生逆转。英国于10月23日在阿拉曼的胜利、英美于11月8日在北非的登陆,苏联在斯大林格勒的大捷,这些都标志着战争转折时刻的到来。从时间顺序来看,斯大林格勒的胜利是最后发生的,它成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深入到高加索的德国师,由于有被围歼的危险,不得不在14天内作

了长达600公里的撤出。2月14日，苏军收复罗斯托夫，并越过顿河，直抵顿河盆地。在从列宁格勒到罗斯托夫全部长达3500公里的战线上，德军防线不得不向纵深后撤至少达200公里。对列宁格勒的包围被粉碎了，这座英雄的城市终于得到必要的救援。斯大林格勒一战败北使德军遭到致命的打击。它原来可以再多抵抗两年，但这时已经丧失它那作战的推动力。从此，它只好为保卫1940年和1941年占领的土地而战斗。

在苏联，希特勒集中了德军的精锐师。意大利、罗马尼亚、匈牙利等仆从国的军团都已被摧毁。继军事上的失败而来的是德国所控制的集团的政治上解体。意大利是第一个在1943年从事实当中吸取教训的，也是第一个以新的惨痛的代价，摆脱德国主子的统治的。意大利驻俄军团许多幸存者，都成为反对纳粹主义的游击战争的英勇战士。

第十九章 崩 溃

502

一、动荡中的国内战线

1942年是国内战线崩溃和反法西斯党派重建的一年。少数人曾希望意大利在战争中取胜,这种希望是破灭了,但德国取胜的前景却仍危险地存在。不过绝大多数意大利人和法西斯君主寡头政治中越来越多的人,已不再认为德国人是盟友了。这时,德国人已经明显地暴露了他们那狂妄而专横的统治者面目,事实上他们已经提出染指特兰托和的里亚斯特乃至弗里乌利和威尼托的要求。他们想要到何处为止呢?整个意大利半岛都被一个广泛的、渗透到各个阶层的纳粹间谍网所控制,实际上,全国已被德国国防军力量所占据。

同德国并肩进行的“平行战争”已经变成尾随德国的“附属战争”。意大利师受德国人指挥的现象不仅在东线有,而且在绿山区也有,在那里,罗梅尔行使绝对指挥权,他的工作只对希特勒负责。参谋长卡瓦莱罗对德国人的专横跋扈不敢作丝毫抗拒。他主要关心的是如何辅佐墨索里尼野心勃勃和朝三暮四的计划实现。卡瓦莱罗的责任是要赞同把意大利驻俄远征军改编为意大利驻俄军团,其结果是要从绿山区战线撤走精锐师。1942年的撤退曾把意德军队调到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以北,在撤退中,意大利部队被遗弃的事情已多次发生,因为它们被迫以不足的装备和人员的牺牲来掩护非洲军团的行动。

503

那些为了不致被遗弃在沙漠里而抓住德国卡车的意大利士兵，竟被德国人砍断双手，坠落车下，这一事实已成为奇闻，不仅如此，后来在1942年12月和1943年1月意大利驻俄军团撤退时还发生这样灭绝人性的事：德国人竟以残暴行径反对乌克兰人民给予意大利士兵人道声援。意大利军队从苏联撤退使德国掀起一场诋毁意大利官兵的宣传运动，指责他们贪生怕死，拒绝作战，因而破坏了防线。在所有被占领的领土上，意德两军指挥部之间和士兵之间关系一直是紧张的。无论如何，只要对比一下德意两军士兵的条件就可知所有意大利人，不论是将校还是士兵，何以怨声载道、感到备受屈辱了。因为德国士兵是供给充足，装备精良，拥有现代化武器和机械化运输工具，而意大利士兵则是装备低劣，武器陈旧，缺少有效的后勤供应。

到1943年1月1日，意大利动用的兵力达63个师，它们被分散到各个战线上。10个师在俄国战场，并且行将被歼（到了夏季，所剩残部又重新整编为2个师），5个师在法国、2个在科西嘉岛，31个在巴尔干，另有若干部队用于保卫突尼斯，因此，在意大利本土外共有48个师。在国内还剩15个正规师和几个沿海师，但这些师都是不满员的，仅有50%受过训练，主要是用来承担国内警戒任务的。墨索里尼出于威信考虑，并且为了捞取资本以参加最后谈判，他要把兵力部署在所有战线上。为了证明他决定把意大利驻俄远征军（6万人）改编成意大利驻俄军团是正确的，他竟然说什么在和谈桌上20万人要比6万人更有价值。他再次选择了好大喜功、不自量力的政策，这种政策拒绝考虑现实，从而扩大了所追求的目标和所拥有的实力二者之间的差距；这一政策过去曾不得不请德国插手，使意大利军队在希腊免于失败，并使那些派往伊庇鲁斯从事冒险的部队得以常驻那里。此外，德国的介入也起了重振意大利军队在绿山区的士气的作用。希特勒和德国所有指挥官都只能

从意大利军队所表现的劣势当中得出消极结论。

即使在名义上划为意大利势力范围的地区，德国人的控制也是咄咄逼人的。墨索里尼曾肢解克罗地亚，划出一个新省卢布尔雅那，将它直接并入意大利王国。在克罗地亚，由恐怖主义分子安特·帕维利奇领导的乌斯塔什分子^①反塞尔维亚运动企图建立一个独立国家。帕维利奇早在30年代初期就同法西斯有联系，当时，乌斯塔什运动的一些行动队曾在意大利的一些秘密营地进行训练。帕维利奇曾用德国间谍机关提供的装备策划了1934年10月马赛暗杀事件，导致了南斯拉夫国王的亚历山大和法国外交部长巴尔图的死亡。引渡帕维利奇的要求曾被意大利法西斯政府所拒绝。

为了披上民族的外衣，使克罗地亚脱离南斯拉夫而又不致重新并入奥地利，乌斯塔什分子运动打算把克罗地亚最后一个国王兹沃尼米罗的王冠献给斯波莱托大公阿伊莫内·迪兹沃亚。此举得到意大利国王的认可。阿伊莫内加了冕，但他没有离开罗马前往他的王国，因为那里在游击队的斗争压力下形成了一个不安全的地区，这样就使这位萨沃亚君主本来就不大的野心也鼓动起来了。实际上，在克罗地亚，反游击队的战争也是由德国人指挥的，德国人利用当地的乌斯塔什分子和法西斯分子来设法制止人民的解放斗争。克罗地亚国王的加冕只不过是维也纳轻歌剧式的令人感到羞辱的一个插曲，而人民的流血则表明：这实际上是一场真正的悲剧。

除了动员的士兵之外，被遣往德国的还有犯人（1942年初就已达23万人）和工人（约15万人）。人员损失计有死亡4万人，失散

^① 乌斯塔什分子系1929年由帕维利奇创建的法西斯分离主义同名组织的成员，1932年被取缔；南斯拉夫被意德军队占领后，乌斯塔什分子变为替占领军效劳的民兵。
——译者

3.5万人。因此,在大约200万个家庭中每家就有一名成员不在,就有一个男人往往再不能返回家园了。除了为死者悲痛欲绝,对远方的妻儿老小牵肠挂肚之外,还有物质上缺吃少穿的苦难折磨。1942年初,一个票证可购200克面包。物价飞涨,黑市价格更是劳动者不敢问津的。政府对黑市实际上不加干扰,这就使劳动者对那些靠黑市从中渔利的富人和在黑市上大发横财的中间商怨气冲天。然而到后来,大家也都设法利用黑市了,他们花掉他们的积蓄,变卖家中的金器甚至家具。日平均工资几乎不变(每小时3.8里拉),但已严重贬值,相当于1940年的33%。那时,英美大规模的轰炸尚未开始,1942年11月以后,盟军先后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有了基地,这时才越来越多地进行大规模的轰炸。但是,在沿海城市,夜晚早已能听到凄惨的警报声了。

由于缺少原料,工业生产缓慢,尽管军工能力有所增长。制造工业生产指数(1938年为100),从1940年的110%降到1942年的89%。农业在战争中也未幸免:农业生产指数(1938年为100),从1940年的98.2%降到1942年的84.5%。

大工业在调拨原料方面占有有利地位,因而生产活动尽管不足,却仍能从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利润。因此,那些大资本家,如阿涅利、皮雷利、多内加尼、奇尼,一直是支持政府的,虽然他们同时又通过瑞士与国际大资本建立了秘密联系。在1942年3月,乔瓦尼·阿涅利和圭多·多内加尼分别对菲亚特和蒙特卡蒂尼股东们作的报告,还在吹捧轴心国和日本的重大胜利,据他们说,这些胜利使原料分配更加合理,生产更加扩大,市场更加开阔。

1942年下半年,形势发生变化。在省督们每月的报告中谨慎地流露出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在日益增长。反法西斯活动的迹象在与日俱增,尽管还是断断续续的:在墙上书写口号,张贴散发标语,举行反抗示威;这都是一些起码的活动,但在组织方面,业已初

具规模。标语口号中以赞扬苏联和斯大林的居多。这种以亲苏倾向为主的标语口号表明,当时活动最积极的是共产党人,尽管他们是分散的,相互没有联系。

当时,在寡头政治的上层开始显示出在进行一种暗中活动,与此同时,有组织的反法西斯政党也初步建立起来了。随着从绿山区到北非再到苏联战场这一系列事态发展的急转直下,摆在大资本家、军队首领、国王和梵蒂冈面前的一个问题是:意大利应当调换阵线,即应当使意大利摆脱对德国的依附而同英美胜利者结成联盟。但是,这种转变能否成功是同能否抛弃墨索里尼相关联的,这就要把失败的全部责任都推到他的身上,使君主制和政权本身脱卸责任。英美与达尔兰达成协议的例子给人们带来很大希望。人们希望美国人能愿意与国王及法西斯主义的温和派领导人达成协议,以防止政权的全面崩溃会由于苏联的军事行动在整个欧洲大陆引起人们的同情而导致“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进展,像皮雷利和多内加尼这样的大工业家,这时就开始在瑞士积极发展与美国人的从未中断的老关系了。齐亚诺则设法通过弗兰索尼大使在里斯本同英国人取得某些联系。在梵蒂冈,英国外交代表奥斯博恩先生成为频繁的国际联系活动的中心。 506

梵蒂冈是关心君主制能否存在下去的,因为君主制是尊重拉特兰条约和教廷与意大协议的保障。此外,从西班牙战争到德国侵略苏联,梵蒂冈一直持反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布尔什维克主义和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对教廷来说,一向是头号敌人。况且,那些原人民党人士也有同样的看法。德加斯佩里本人在听说莫斯科陷落的消息不确时,也掩饰不住内心的失望。梵蒂冈害怕,苏联战胜德国会为布尔什维克主义在整个欧洲的传播打开一条通道。因此,必须设法以一个能遏制共产主义发展的政权来取代法西斯主义。

像其他意大利保守力量一样，梵蒂冈过高估价了意大利共产党人的实际力量。因此，梵蒂冈认为，用民主方法解决因意大利军事失败和法西斯垮台而造成的政治危机是危险的。梵蒂冈国务秘书提出的主张走的是相反的方向。教廷确信用天主教接替法西斯主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力图按照佛朗哥或萨拉查的模式，建立一个天主教国家，这个国家能最大限度地维护旧政权的连续性，既保持君主制，又广泛起用自由党人（奥兰多）、军人（卡维利亚）和温和法西斯分子（费代尔佐尼和格兰迪）。到1943年2月，教廷还向美国政府提出这方面的建议。

大工业家、温和法西斯人士和军界头目聚集在国王周围，结成了受到教廷赐福的联盟，对这些当事人来说，这个联盟似乎可以保证意大利更换阵营，保证它从德国阵营转到美、英阵营而不致为反法西斯革命开辟道路。但这个如意算盘却不是容易实现的。它忽略一个事实，即苏联也参加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而且，当时苏联是直接抗击德国军队的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个如意算盘也没有预料到，继意大利在非洲与维希政权代表签订协议造成了一些复杂条件之后，罗斯福竟会在1943年1月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提出“无条件投降”的要求，这就增加了意大利在贯彻无痛苦地脱离原来阵营这一行动方面的困难。此外还有两个障碍：第一个障碍不太危险，即墨索里尼拒绝毫无抵制地接受下台；第二个障碍则比较严重，即德国对意大利的直接控制与日俱增。在意大利军队在本国国土之外，散失自己的精锐力量的同时，德国却继续日益加强对意大利的渗透，它不仅使用一般人所共知的军事力量，而且还在罗马和意大利其他主要城市设立广泛搜集意大利社会活动情报的间谍中心。

因此，脱离原来阵营的活动进行得很缓慢，既有无穷无尽的忧心忡忡，又有持续不断的模棱两可，好像可用的时间并非只剩几个

月似的。其实，企图更换阵营的每一种力量、每一个军政大员都在为自己的私利奔走，特别是设法推卸自己的责任。这时，有人开始试图继续成立一个没有墨索里尼的专制政权以摆脱危机，而与此同时，成立政党的活动也在展开，这些政党是在要求排除旧的法西斯领导集团这一纲领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尽管并非所有的人都想同旧的君主制国家彻底决裂。

二、反法西斯政党的重建

508

前面已经说过，在战争初期，在意大利还是有几个反法西斯派别的，只要它们之间仅保持简单的个人关系，又不设法违反法西斯法制规定，就可以享有合法地位。战争期间，个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密切了，不同派别成员之间的接触大增，这并不是为了采取联合行动，而是为了交流有关战争进展的消息。只是到1942年秋，才开始成立真正的有组织的政党。从党的意图来说，那种要把这一活动开始的日期提前的倾向是可以理解的，但具体的事实却并不证明这种倾向站得住脚。这一点必须明确，正因为反法西斯政党成立得晚，才给国家的政治发展带来严重后果。反法西斯政党在纲领和组织方面的不成熟，即使在抵抗运动胜利结束以后也仍可以感觉到。

天主教民主党的改组只是到1942年下半年才开始。教廷和政权的妥协给意大利天主教徒在思想上和文化上都留下深深的印迹。教廷国务秘书处奉行与法西斯政策合作的政策，尽管开始对此有过某些争执，参加意大利人民党活动的天主教徒则不仅受到政权，而且也受到教廷当局的指责。德加斯佩里在梵蒂冈图书馆只谋到一个小小的职员位置。前人民党人积极活动，力求成立一个重振并改变旧党传统的政党。意大利天主教徒试图成立一个

政党的做法，没有得到梵蒂冈的明确批准，但也没有遭到立即谴责。然而，梵蒂冈的某些人对此还是给予一定的鼓励的，像蒙蒂尼主教便是如此。也许是梵蒂冈想在保守势力接替法西斯政权成为不可能时，留有解决问题的余地。德加斯佩里是否从一开始就希望成立一个有组织的天主教徒唯一的政党，这一点还不清楚。然而，梵蒂冈国务秘书处分析了成立两个天主教政党的可能性，一个是保守的右翼党，一个是左翼党，特别是国务秘书塔尔迪尼希望有此可能，这一点曾促使德加斯佩里建立一个天主教徒的唯一政党，这样就防止教廷在两个政党中进行选择，庇护其中的一个而把另一个革出教门。对于德加斯佩里来说，天主教徒在组织上的团结应当是自主于教廷的保证。

成立天主教民主党的基本文件是于1942年由德加斯佩里起草的，题目为《重建天主教民主党的设想》。为审慎起见，起初文件是作为“遗嘱”进行介绍的，如可能的话，在他死后再发表，这种从事秘密工作的谨慎做法不仅是针对法西斯警察局，而且也是针对梵蒂冈检查机关。这份文件依靠许多人的帮助，曾多次修改，这些人当中值得一提的有乔瓦尼·格龙基、帕维夸莱·萨拉切诺（当时为伊利财团的官员）和自由天主教人士诺韦洛·帕帕法瓦。文件暴露出明显的矛盾，即一方面有溯源于19世纪天主教思想中拥戴教皇派^①的自由天主教的特点，另一方面又有受法西斯工会影响的行会主义；文件在处理国家与教会的关系、特别是天主教党与教会的关系方面也有—种左右摇摆、模棱两可的表现，说到底，是把—在政治社会生活中贯彻教会教义的职能授予天主教党。这份文件仅在极少数人中传阅过。维帕塔罗证实，这是一份油印的文件，只是

^① 原文为“古埃尔夫运动”或称“新古埃尔夫主义”。“古埃尔夫”起源于12世纪德国王权和教皇争权时代，主要拥护教皇。19世纪意大利统一运动时期发展为一种主张在教皇领导下实现天主教民主革新的思想政治运动。——译者

到1943年3月才在少数人中间散发。

另一个重组天主教党的中心是米兰，它主要受皮耶罗·马尔韦斯梯蒂和拥戴教皇运动的影响，它是经历过地下斗争的唯一天主教团体。拥戴教皇运动有较突出的宗教色彩，从社会角度看也较先进，它曾揭露法西斯政权的阶级性质。在名曰“米兰纲领”的一份文件中，它的立场曾得到阐述。另一个天主教运动是乔治·拉皮拉在米兰天主教大学几名教授的配合下在佛罗伦萨发起的，这些教授有拉扎蒂和范范尼等，他们当时致力于克服米兰天主教大学的亲法西斯倾向。拉皮拉与天主教大学毕业生运动领导人有联系，这些领导人中以塞尔焦·皮拉内托和阿尔多·莫罗最出名；他与意大利天主教大学生联合会的民主派（安德雷奥蒂）也有联系，同该联合会的亲法西斯派（杰达）则进行斗争。

因此，重建天主教党的运动是复杂的，只有迟迟到此时，为时⁵¹⁰局所迫，才力求达成最低限度的团结。只是到了“学术周”（1943年7月18—24日），在君主制国家政变前夕，才由拉皮拉发起的运动制定了一个名曰“卡马尔多利法典”的纲领，这个纲领是以“争取天主教大家庭。社会秩序原则”为题发表的。

在天主教方面，这一时期也还存在具有其他倾向的种种不同活动，例如天主教社会派分子（杰拉尔多·布鲁尼）和天主教共产主义分子阿德里亚诺·奥西齐尼、弗朗科·罗达诺）。

所有这些运动当时仍处于对纲领进行缓慢的和混乱的讨论的情况之下。1942年夏，在瓦尔苏加纳镇曾举行一次会议，只是在这次会上才作出独一无二的试图协调各个运动的尝试。同年10月，在米兰又开了另一次会议，会议由德加斯佩里主持，与会者有马尔韦斯梯蒂、亚奇尼、法尔克、格兰迪、格龙基、马拉瓦西、克莱里奇等。这次会议可以看成是天主教民主党成立会议。确实会上决定新党的名称为天主教民主党，尽管许多前人民党人反对这样做，因

为他们要求更为明显地确定新党和老党之间的连续性。此外，还通过了纲领的基本内容，并在事实上承认旧人民党最后一任书记德加斯佩里担任新党的主席，这样做是为了确定不因新的命名而损害党的连续性。这次会议之后，是否在以后几个月内召开了其他会议，便不得而知了。可以肯定，各中心之间的联系已经变得频繁了，特别是在天主教大学毕业生代表大会（1943年1月）召开期间。然而，所有这些活动仍仅限于舆论宣传和文化运动范围之内。第一次会议只是于7月25日以后，亦即8月6日才在米兰召开，当时决定成立天主教民主委员会，而为了保持在巴多利奥时期不稳定的合法地位，这个委员会仍以学术组织的面目出现。因此，这证明在意大利危机最严重的时刻，天主教民主分子处于消极被动状态。德加斯佩里当时对合法性是忧心忡忡的，他绝不愿意破坏法西斯时期的合法地位，并避免因有人被捕而使天主教民主党遭到取缔。但是，7月25日以后，他也曾多次表示，在时机成熟之前，他
511 不愿采取行动，他想采取静观态度，等待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负有罪责的王权去签署和约，按照他的说法，也就是不必让民主派对失败后果负责。

这种等待主义也是当时其他政党行动的特点。后来成立行动党的那些小组，是1942年通过旧日的个人关系，在意大利不少中心成立的。但是，直到1942年秋，那种要把不同组织协调起来，组成一个真正的政党的要求才臻至成熟。在全国起推动作用的最活跃的是由乌戈·拉马尔法、阿道夫·蒂诺、费鲁乔·帕里领导的米兰小组，它与以塞尔焦·费诺阿尔泰亚、斯特法诺·西利恩蒂、费德里科·科曼迪尼创造的罗马小组有联系。其他发起中心分别设在都灵（萨尔瓦托雷利）、波洛尼亚（沃尔泰拉）、佛罗伦萨（拉吉安蒂）、比萨和佩鲁加（卡皮蒂尼）、巴里（托马索·菲奥雷）、那不勒斯（奥莫代奥、埃米利奥·斯卡寥内）、萨萨里（马里奥·贝林格）。拉马尔法

通过瑞士朋友与纽约以及在美国持坚决反共立场的正义与自由组织的领导人建立了联系。他与马志尼协会和斯福尔扎取得一致意见,以成立共和制为先决条件,以求从一开始就杜绝任何旨在保持国家连续性的行动。这个先决条件阻碍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线的形成。拉马尔法和他的朋友们力图从左的方面孤立共产党人,同时又同所有那些认为以共和制为先决条件是不合时宜的人分道扬镳,而当时君主制在一定时期可能对发动一场政权危机还是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究竟打算同哪些力量一起来充当以共和制作为解决危机的办法的主角呢?在他们身上也存在等待主义的立场,即坐等政权危机发展到尽头,从而俟盟军到达以后,组成一个临时共和制政府。英美起初支持维希派人物,后又不得不同意建立戴高乐领导的民族解放委员会这一事实,使拉马尔法及其朋友产生这样的想法:如果迫使王权无条件投降,那么就可以组成一个斯福尔扎政府。

不论如何,行动党也是1942年晚秋时成立的。事实上,也只在那时才定下行动党的名称。只是到1943年1月1日才出版了《自由意大利》第一期。1943年2月是《团结报》创刊20周年,它骄傲地重申继续使用这一报头的意义,正是在它的2月号第4期上发表了《向〈自由意大利〉致敬》的文章,文中向“勇敢的人们”发出了团结和扩大民族行动阵线的号召。《自由意大利》立即在1943年3月第一期增刊上以《向〈团结报〉致敬》的文章作出回答,并坚持首先声明“与共产党在最终纲领上有深刻分歧,并且不同意该党所维护的思想”,但与此同时也表示要“发扬有益于我们团结,而不是分裂的东西”。这就是双方艰难对话的起点,这一对话只是到了7月25日以后才转化为政治协议。

以共和制为先决条件使行动党人同一部分自由党人发生分歧,因为这些自由党人是主张寻求与法西斯上台前的老自由党领

领导人达成协议的。1942年9月，在罗马出现另一个地下刊物《重建》，这个刊物自称是自由统一阵线的机关报，其宗旨是联合三方面的民主志士；即自由党人、天主教人士和社会党人。尽管有此意图，天主教和社会党民主力量仍然独立自主地自行重建起来。事实上，《重建》报代表着一批与一些参议员有联系的自由党人（利昂纳·卡塔尼、恩佐·斯托罗尼、尼科洛·卡兰蒂尼）。这份刊物具有开放的特点，不抱成见，不排斥别人，包括对共产党人。《重建》认为，当务之急是解决危机，这就要求国王采取主动，并成立一个由伊万诺埃·博诺米主持的反法西斯政府。在一个策略问题（国王干预解决危机）上，行动党人拉·马尔法、帕里、费诺阿尔泰亚、萨尔瓦托雷利、奥莫代奥，同索莱里、卡萨蒂、卡塔尼、卡兰蒂尼、斯托罗尼等人发生了分裂。但是，组织上四分五裂的自由民主派人士之间的这种纷争，由于能建立一个强大的自由民主党，后来也导致了严重后果。自由党内的民主分子日后不得不把领导权让给比较保守的派别，而行动党中的民主分子则被信奉社会主义的派别所击败。

513 贝内代托·克罗切在三个方面展开活动：向天主教人士靠拢（1942年11月20日《批判》载文《我们不能不说自己是信奉天主教的》排斥共产党人）；（1943年3月20日《批判》载文《为写一部作为政治现实的共产主义的历史》），激烈批评行动党（5月9日《政治纲领笔记》）。克罗切与奥莫代奥和德鲁杰罗的决裂就是自由民主阵营的一次严重分化。

因此，建立政党的活动是很迟才开展起来的，是在战争发生转折以后才进行的，而且当时思想严重混乱，问题错综复杂，而在这种组织上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新成立的这些组织也无法立即对现实进行任何干预。

就连社会党的重建也是很迟在混乱中才进行的。当时重组社会党的一个中心设在罗马，在那里，曾由奥雷斯特·利扎德里的倡

议,于1942年9月发表了一份由朱赛佩·罗米塔、尼科拉·佩罗蒂、奥林多·韦尔诺基、埃米利奥·卡内瓦里签署的关于重建社会党的政治文件,并匆忙任命罗米塔和利扎德里分别为书记和副书记。这是一份赞成共产党和社会党统一行动公约的主张团结的文件。它号召信仰社会主义的各种运动参加社会党,说社会党虽有错误,但在它存在50多年来还是从事过伟大的解放事业的。人民统一运动的成立也要追溯到1943年1月,地点在米兰,当时在场的有莱利奥·巴索、卢乔·卢扎托、罗伯托·维拉蒂、都灵的阿恰里尼和奥利尼罗、波洛尼亚的法布里和本蒂沃利。但是,罗马中心和米兰中心之间的分歧并不严重,前者主张重建社会党,后者则以巴索为首,他力求建立一个新党。罗米塔等许多领导人曾多次参加他们双方的会议。

但是,重建社会党的活动虽然几乎在意大利所有大区都已经展开了,却缺少一个具有必要权威和政治纲领的政治中心。南尼在他签署的图卢兹呼吁书中已指出这一点,萨拉盖特也在上面签字,萨拉盖特后来于3月15日在里昂签署了意大利共产党、社会党和正义与自由的行动公约。正当山德罗·佩尔蒂尼还留在文托特内时,鲁道夫·莫兰迪正准备出狱。社会党的重建工作是在7月25日以后才真正实现的,参加这项工作的除罗米塔外还有利扎德里、巴索,以及在以后几十年中领导该党的南尼、佩尔蒂尼和莫兰迪。

因此,重建的组织工作是普遍落后了,其原因是:建党运动只是在战争发生转折以后才开始的,即当时纳粹德国已经开始显露出要遭到失败。问题还不仅是在组织工作方面迟缓了,而且特别是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准备迟缓。种种不同思潮混入各党,临时拼凑在一起。当时被无视的矛盾,以后则在政治生活中爆发出来,表现为一系列令人痛心的摩擦和分裂。当时造成的直接政治后果就

是：阻碍了有组织的反法西斯运动及时迫使人们以民主方式解决危机，从而为王权采取主动大开方便之门。事后对国家政体依然如故的抱怨并不能抹煞这样的事实：在关键时刻，反法西斯运动当时还不成其为能以民主方式解决危机的决定性力量。从长远看，推迟建党的后果也是异常严重的。当时缺少这样一种文化方面的准备：这种准备使人能在进军罗马 20 年之后明白法西斯主义得以上台和持续存在的原因以及在法西斯政权统治下人和意大利社会发生的种种变化，从而使人能制定符合意大利社会当时情况的纲领。这样，在意大利解放以后，重建和革新国家的工作也就变得更加困难了。

三、1942年共产党的力量

共产党取得了某些进展，但进展并不大。民族民主团结纲领在德苏条约发生危机之后，进一步证明它的有效性。莫斯科中心通过马里奥·科伦蒂向意大利直接发布指示。由陶里亚蒂确定的总路线被设在意大利、法国和美国的领导中心所接受。虽然在宣传和解释上难免存在差别，但基本上，各中心都为实现两项目标而努力：1) 结成包括向保皇党人和法西斯反对派开门的广泛联盟；2) 必须尽快行动起来，敦促实现单独媾和以及迫使法西斯垮台。共产党人申明反对限制民族阵线的广泛性的任何成见和排斥他人的做法，主张人民群众在为时不致过晚时立即行动起来，即要抢在国王或保守势力采取主动之前做到这一点。但是，如果从下面采取行动不可能的话，共产党人也准备赞成从上层采取行动，因为他们确信，然后可以利用群众力量来左右上层：共产党人尤其反对任何等待主义立场，因为这种立场会使工人阶级消极被动地坐待变化，其实是容忍形势发展，并错误地指望：到第二个阶段，俟灾难

临头时再采取行动，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工人阶级只有在灾难发生以前，努力避免这种灾难，或力求减少灾难后果，在任何情况下都维护民族的总利益，只有这样才能确立自己作为全国领导阶级的作用。

虽然当时党处于分散状态，但促成党内团结一致的因素是接受陶里亚蒂的最高领导，即使后来也有人承认他有下达具体指示的能力，因为他远离国内，不可能掌握作出有约束力的判断所必需的了解情况的材料，促成党内团结一致的主要因素是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因素。固然按照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对上下各级全体干部进行思想培养的基础，而且这种工作是要通过长期的学院式教育来完成的，但由这种培养干部的方法而产生的公式化和教条主义因素，却依靠共同的民族民主文化得到纠正，这种文化是以葛兰西为依据的，尽管人们当时对葛兰西所知甚少。由陶里亚蒂汇集、解释和传播的葛兰西的教诲，是意大利共产党人的文化、党的数以千计的干部的共同文化的灵魂。从1927—1939年的12年中发行的巴黎版《工人国家》，刊载了陶里亚蒂、格列科、隆哥、卡米拉·拉维拉、塞雷尼、蒙塔尼亚纳、贝尔蒂、迪·维托里奥、多扎的文章，在最初几年，还有塔斯卡、西洛内和莱奥内蒂的文章；通过这些文章，通过规定要了解意大利及其历史和现状以及要研究法西斯主义造成的变化这一纲领，《工人国家》已经给移居国外、留在国内、身陷牢狱和遭到放逐的几千名共产党人提供了文化指针，他们阅读了这些书刊，懂得了意大利社会存在哪些基本矛盾。重要的是使靠拢党的年轻一代也能具有同样的文化修养，也能阅读和欣赏如弗朗切斯科·德桑蒂斯和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等作家的作品。这种以历史主义造就出来的牢固核心，使这个新党——它是从1943—1945年形势发展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得以向那些虽有不同的思想文化立场但实际上则拥

516 护意大利共产党的政治纲领亦即其行动路线的人们开门。这种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团结的基础，使党的弱小组织得以在政治形势发展和解放斗争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1941年下半年，马索拉已经在国内建立了一个国内中心。马索拉了解到国外局所进行的活动（但他在一段时间内是有意对此视而不见的），他拒绝国外局提出的旨在规定政治上和组织上实行统一领导的准则的建议。马索拉不承认国外局在国内建立直接联系和传达指示的权利。他对陶里亚蒂交给他和马尔蒂尼建立国内中心的任务讨价还价。他指名要求罗阿西奥和诺维拉尽早返回意大利（这两位同志列于陶里亚蒂所开列的有待任用的共产党人名单之内），并要求把党原有的中央基金的经费转交国内中心，而该基金本是由国外局掌握和严加管理的。

国外局与那些和国内中心无联系的国内组织及同志建立直接关系，实际上是既危险又复杂的，而由于马索拉的多疑和嫉妒，这种情况就变得更加严重了。最典型的事例是，他曾公开表示对乔瓦尼·费罗同志不信任，这位曾被流放的同志在其弟马里奥被国外局秘密派回意大利而遭逮捕后，开始和马赛中心接触。费罗曾开始独立地进行组织宣传活动，印发过一份地下小报《加里波第》。马索拉所表示的不信任中断了他的活动，并把此事造成一个事件，直到后来该同志被承认行为正确而得到平反，问题才算得到积极解决，到这时，该同志也才能重新参加党的活动。

517 为了克服彼此隔绝，避免问题的复杂化，特别是避免在进行秘密活动时的危险性，只有将国外局迁至意大利，成立在政治上有效的国内中心，才能重新建立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统一领导。国外局同志们的功劳在于不去争夺职权，而是抓紧时间返回意大利，他们认为不在国内总是错误的。1942年下半年，开始进行重新统一的工作。马索拉着手散发图卢兹委员会的呼吁书，甚至把它作为对

社会党人、自由党人和天主教徒采取统一行动的基础,在都灵尤其如此。第一批经过维尔南特撤离法国的同志,即克洛基亚蒂和莱里斯(前者到达皮埃蒙特大区和都灵,后者抵达艾米利亚),受马索拉使用并不是没有困难和周折的。罗阿西奥和内加维莱在1942年12月第一次返国尝试失败以后,又受尽千辛万苦,翻过阿尔卑斯山,终于在1943年1月返回意大利。同一时期,在文托特内被流放的乔瓦尼·罗韦达(从1926年起被监禁和流放)得到了一次假期许可,他就利用这个机会转入地下。这样,便有了建立一个能够实行集体政治领导的国内中心的可能。马索拉以秘密工作为由,曾力图保持个人的领导,他把罗韦达和罗阿西奥分别派到比埃拉和艾米利亚,把内加维莱则留在米兰。诺韦拉本应和罗阿西奥一起离开法国,因缺少证件,于1942年11月在马赛被捕。诺韦拉被捕后,罗阿西奥和内加维莱把阿门多拉增选到国外局,委托他主持领导工作,直至诺韦拉获释,然后同诺韦拉一道尽快返回意大利。诺韦拉1月出狱,在从国内得到可以过境返回的认可之后,他们二人到4月初才返回意大利。

诺韦拉和阿门多拉的到来提出了扩大国内中心的问题。马索拉建议中心由四人组成(马索拉、罗阿西奥、罗韦达、诺韦拉),而内加维莱和阿门多拉只作为中心的工作人员。这项建议遭到罗阿西奥和诺韦拉的拒绝,他们终于把这二位同志吸收到中央领导机构,尽管从秘密工作考虑,把他们二人作为候补委员。内加维莱和阿门多拉未加抗议地接受了他们二人的新的职位,尽管内加维莱对马索拉建议的真实用意表示怀疑。

这个问题除了有勿庸置辩的秘密工作这一正当理由(避免会议过多,让一些同志处于后备地位)之外,也有政治原因。内加维莱和阿门多拉主张必须采取更加适应形势急剧发展的行动,而马索拉却不愿放弃严格秘密活动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使他得以在 518

国内长时间保持一个地下领导机构的活动，这是党的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但是，阿门多拉和内加维莱反驳说，这是一个政治问题。1931—1932年间，连劳动群众也并不认为有可能推翻法西斯主义，那些处于非法地位的共产党干部于是遭到了人民的孤立。现在，多数人都不仅愿意驱逐墨索里尼，而且认为这是可能的，甚至可以很快实现，这一事实就为党的地下活动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应当充分利用这种新的可能性。按照罗阿西奥和诺韦拉的意图，原来国内中心“从秘密工作考虑”，被分成两个部分，到7月26日夜的人事安排，就结束了这种一分为二的局面，这样，内加维莱和阿门多拉在45天的时间里，就拥有充分权利参与国内中心的领导工作了。

确切说明共产党在法西斯统治时代最后一年年初的组织力量是困难的。1942年11月出版的一期《团结报》，使用了带有预见性的题目：“10月28日是墨索里尼法西斯上台执政的最后一个周年纪念日”。从1943年1月1日起，《团结报》改为半月刊，这样一直持续到米兰4月大逮捕和在艾米利亚艰难地寻找应急印刷所。报纸的发行量有几期达到4000份，但每份报纸是人手传递的，因而至少每10个读者一份。由于组织工作的发展，国外局派出的具有“合法”地位的同志起了积极作用，他们使各地之间的宝贵接触得以恢复，如内拉·马尔切利诺在都灵与马索拉取得联系；佛拉基米尔·迪奥达蒂（保罗）在利古里亚大区；阿尔图罗·加拉沃蒂在莫德纳。

国内中心在组织方面的主要基地是：都灵和它所在的皮埃蒙特大区，米兰和它所在的伦巴底大区以及艾米利亚大区。然而，国内中心的联系范围，不论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已从利古里亚扩展到托斯坎纳以及意大利所有大区，直至西西里。今天，很难估计当时共产党员在全国的人数。以下两个事例可以说明当时国内中心对共产党员数字的统计是不完全的。当时认为，在1942年年底，都灵有大约1000名党员。米兰菲奥里汽车厂有80名党员，兰恰汽车

厂有 30 名,韦贝尔蒂汽车厂有 60 名,航空机械厂有 72 名。^①但后来这些统计数字被有关各厂的工人所否认了。例如,米拉菲奥里厂的同志们认为,当时厂内党员人数比 80 名多得多。事实是,当时调查共产党员人数所遵循的标准是不同的。上面所举的数字是以严格的标准统计的,仅计算了那些最可靠最积极的同志。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标准则放宽了,即把那些仍属于少数最可靠的积极分子范围之外的共产党员也计算进去了。

这样,在 1942—1943 年冬,中心就同由马里奥·阿利卡塔和彼特罗·英格拉奥领导的小组在罗马建立了联系。阿利卡塔通过彼特罗·蒙塔尼亚尼同米兰党的中心取得了联系。阿利卡塔被捕、英格拉奥转入地下之后,领导工作由法布里齐奥·奥诺弗里担任,他通过乔利蒂与杰莫纳特即都灵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7 月 25 日以后,事实证明,阿利卡塔—英格拉奥—乔利蒂小组(布法利尼当时已参了军)并不能代表整个罗马的共产党组织,因为 7 月 26 日以后又出现了在恩佐·泽伦吉和福斯托·马尔奇·马尔凯西周围形成的人数相当多的小组,另外也还有其他小组。后来统计,意大利有 1 万名共产党员,他们不同程度地已经同中心取得直接联系,这个数字也只能被看作不能肯定的大略情况。其实,在 1942—1943 年期间,曾出现大批小组,这些小组是在从狱中释放的或因从事秘密工作而不得不一度处于被动状态,如今则重新活跃起来的老同志周围,或是在年轻学生和知识分子周围建立起来的。这些组织后来在 45 天的时间里与党的中心接上关系,而在当时,它们已经形成一个坚实的基础,正是这个基础后来使“新党”得以发展起来,能够在短时间内,在解放斗争的过程中争取到不是数以千计、而是数以万计的党员。

^① 这些厂家均属菲亚特财团。——译者

当然，这些小组的政治方针是很不确定的。许多小组程度不同地与党的中心保持联系，或是由善于从“米兰自由电台”播送的讲话中吸取为执行全国团结改革所必需的教益的党员组成的，然而，这些小组也都存在很多不理解的情况，甚至实际上持有不同政见。1943年1月初在都灵成立了“红星派”，它企图从阶级论的观点出发，批评共产党所奉行的全国团结政策。罗马的“星火派”也主张推行旨在进行反资本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斗争路线。围绕德卢卡律师成立的小组，不接受党所推行的联盟政治路线，在9月8日以后组成了“红旗运动”。在全意大利出现了带有托洛茨基主义或波尔迪加主义倾向的小组，但是，在抵抗运动过程中，其中大部分小组都被党所吸收了。特别是不少英勇奋战的游击战士从都灵的“红星派”和罗马的“红旗派”中出来，在不同时期汇聚到党内。然而，“普罗米修斯”这个波尔迪加派却继续坚持失败主义路线，断言交战双方进行的是帝国主义战争，连游击战争也是用来驱使劳动者为英国帝国主义效劳的。阿马德奥·波尔迪加把这条路线发展到必然的结果，竟然公开宣称：他宁可让纳粹主义获胜，以摧毁苏联，因为在他看来，苏联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官僚主义国家。

四、共产党的后备力量

在遍布全国的共产党力量的后面，有一大批有高度政治文化修养的共产党后备力量，他们还被政权当局监禁着，或关在狱中，或被流放。1943年初，有2000名政治犯被关押，其中共产党员有1800名；有2000名政治犯被放逐，其中共产党员至少有1500名。警察局认为比较危险的流放犯，则被集中在文托特内，其中也有500名共产党员。

1943年初在狱中被关押的有：贾恩·卡洛·巴叶塔、温琴佐·

吉甘特、拉法埃莱·皮耶拉戈斯蒂尼、朱赛佩·罗西、埃米利奥·阿尔扎蒂、乔瓦尼·阿马杜奇、彼特罗·阿门多拉、费尔迪南多·阿米科尼、埃托雷·安扎洛尼、阿尔曼多·阿依齐亚蒂、朱赛佩·阿尔马罗利、阿马托·贝伊、塞尔焦·贝洛内、雷纳托·贝尔特拉米、加里巴尔多·贝尼菲伊、阿德里亚诺·贝尼尼、玛丽亚·贝尔纳蒂希、奥泰洛·贝尔蒂、罗伯特·比里科尔蒂、恩里科·博纳齐、埃托雷·博尔齐、朱赛佩·博斯基尼、乔瓦尼·博托内利、克劳迪奥·布拉奇、萨尔瓦托雷·卡恰波蒂、阿尔多·卡梅拉、马尔切洛·卡诺瓦、阿莱安德罗·卡萨迪奥、阿尔图罗·卡桑德里尼、安焦洛·卡斯泰拉齐、费鲁乔·卡塔内奥、费代莱·切利诺、切萨雷·切罗尼·巴萨尼、拉迪奥·恰佩蒂、切萨雷·科利尼、布鲁诺·科尔比、乌戈·科尔西、利贝罗·达拉拉、欧金尼奥·达蒂利奥、安东尼奥·迪莫杜尼奥、达尼洛·多尔菲、马里奥·法比亚尼、罗伯托·福尔蒂、加斯托内·弗里利、安杰洛·福利尼亚蒂、路易吉·加亚尼、罗马诺·加拉维尼、阿尔费奥·杰利、阿蒂利奥·贡比亚、路易吉·格拉西、阿拉米斯·圭尔菲、路易吉·圭尔曼迪、乔瓦尼·圭尔佐尼、埃马努埃莱·圭扎尔迪、加埃塔诺·因维尔尼齐、卡洛·尤尔格、奥尔费奥·兰迪尼、路易吉·莱里斯、阿尔弗雷多·列沃雷、切萨雷·马内蒂、西尔维奥·马尔科图利、路易吉·马尔泰利、伦佐·马尔泰利、塞尔焦·马尔图拉诺、阿尔贝蒂诺·马塞蒂、达尼洛·马西、瓦斯科·马蒂奥利、克劳迪奥·梅洛尼、乔瓦尼·梅洛迪亚、恩里科·米尼奥、奥斯泰利奥·莫代斯蒂、蓬皮利奥·莫利纳里、弗朗切斯科·莫拉尼诺、福斯蒂诺·穆尼亚伊尼、斯帕尔塔科·穆拉托里、阿尔多·纳托利、奥斯瓦尔多·内加维莱、瓦尔特·内罗齐、费尔南多·努奇泰利、泰奥多罗·奥斯图尼、乔·巴蒂斯塔·帕多安、瓦斯科·帕拉泽斯基、阿里斯托·帕帕奇、埃齐奥·帕伦蒂、马里奥·帕维内利、伊雷奥·佩德拉佐利、

521

罗萨利诺·佩拉加蒂、贾科莫·佩莱格里尼、托尔夸托·皮洛里、图利奥·皮洛里、欧金尼奥·皮瓦、奥斯瓦尔多·波皮、乔瓦尼·波斯托尼亚、吉诺·拉焦涅里、彼特罗·拉韦托、林多·林迪、卡洛·罗西、马里奥·罗韦里、瓦尔特·萨凯蒂、维托里奥·萨尔蒂尼、阿尔多·桑蒂、雷莫·斯卡皮尼、乔治·斯卡拉贝利、乔瓦尼·塞尔班迪尼、阿姆莱托·塞泰索尔迪、罗科·西纳、朱利奥·斯帕洛内、克雷安泰·泰罗西、阿蒂利奥·托尼尼、阿尔贝托·托里奇尼、乔瓦尼·瓦尔达基、乔瓦尼·瓦尔托利纳、切莱斯特·维西加利、菲奥拉万特·扎纳里尼。

1943年初在文托特内被流放的有：毛罗·斯科奇马罗、翁贝托·特拉齐尼、路易吉·隆哥、卡米拉·拉维拉、彼特罗·谢嘉、朱赛佩·迪·维托里奥、吉罗拉莫·利考西、阿尔图罗·科隆比、朱赛佩·阿尔贝甘蒂、伊西多罗·阿扎里奥、乔瓦尼·班基耶里、朱赛佩·班基耶里、卡洛杰罗·巴尔切洛纳、玛丽亚·巴龙奇尼、内拉·巴龙奇尼、费尔特雷·巴尔托齐、阿代莱·贝伊、德赞卡·贝拉马里希、雷纳托·比托西、阿尔弗雷多·博内利、乔瓦尼·布兰比拉、玛丽亚·布龙佐、卡尔米内·坎内龙加、吉内托·坎蒂尼、安东尼奥·卡里尼、乔瓦尼·卡尔萨诺、恩尼奥·切尔韦拉蒂、加埃塔诺·基亚里尼、乔瓦尼·恰尔帕利尼、安东尼奥·奇卡利尼、彼特罗·科科、纳塔莱·科拉里希、切萨雷·科隆博、古斯塔沃·科莫洛、阿尔费奥·科拉索里、雷莫·科斯塔、尼科拉·德法尔科、马里奥·德庞尔、路易吉·法基尼、卡洛·法里尼、阿尔曼多·费代利、路易吉·弗劳辛、切尔索·吉尼、翁贝尔托·吉尼、维托里奥·吉尼、彼特罗·格里福内、朱赛佩·伊索拉、瓦斯科·雅各布尼、卡洛·科德雷、维托里奥·马洛齐、马里奥·马穆卡里、切萨雷·马尔库齐、吉诺·门科尼、乔瓦尼·佩谢、阿尔多·佩塔基、朱赛佩·皮安卡斯泰利、朱赛佩·皮亚内扎、焦尔达诺·普拉托隆奇、巴蒂

斯塔·桑蒂亚、吉诺·斯卡拉穆齐、亚历山德罗·西尼加利亚、朱利奥·图尔基。

以上名单纯属为了说明情况，因而必然也是粗略的。名单仅仅用来表明后来共产党组织和加里波第纵队的领导班子是怎样由这些同志组成的。只要看一下加里波第纵队的指挥员和党组织的负责人以及武装起义三位一体的领导者的名单就足以看出：除少数例外，上述同志都是来自狱中或流放地的。

凡是被关在狱中或被流放在文托特内的共产党人，都基本了解党的政治路线的发展。不大了解情况的是那些被派往内地，特别是到南部市镇的人，然而，他们在那里也进行了教育工作，留下了深刻影响。在埃博利市，人们长时间怀念慷慨无私的名医法布里齐奥·马菲的高尚形象，他被誉为道德生活的典范。1943—1944年间，在这个市镇成立了一个强大的总支部，这并非偶然。组织性最强的小组是在文托特内岛上成立的那个小组，在那里，1943年初有500名共产主义者，其中仅有100人是正式参加组织的，其他人则由于从事秘密工作的原因只同党保持间接联系，这些人被看成是同情者和支持者。 522

隆哥和迪·维托里奥的到来使多年（有的从1926年起）远离党中央的文托特内的同志了解到党的领导的坎坷经历：从1938年的危机到巴黎会议，到德苏条约的签订，到国外局通过发表《斯巴达克通信》所采取的立场。以合法身份回到意大利的玛丽亚·布龙佐·内加维莱同志，在都灵被捕，几个月后她被押解到文托特内，她给同志们带来装在两只“无产者”手提箱里的文件材料（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这两只箱子有固定的双层底，而这双层底又钉死在另一种样式的双层底手提箱里面），这样警察局就没有细查出来。

刚刚被捕的同志们的到来以及通过家属用简便的方法（包裹、

书籍、杂志)传递秘密材料,这些为被流放的共产党人提供了主要信息手段。每逢有消息传到岛上,就由负有领导责任的同志们将消息精心收集起来,并认真加以研究,然后十分谨慎地口头传达给属于各级党组织的一批批同志们。许多判断是通过报刊登载进行系统的批判分析之后得出的。在流放地,当地居民的态度,警察和民兵的举止,也为采取方针提供新的、切合当时情况的根据。对于那些关在监狱中的共产党人来说,上述可能性就小些了,他们最初大部分都被监禁在奇维塔维基亚监狱里,后来由于轰炸开始,又被分散到意大利各个不同的监狱里去了。然而,他们在严密监视的牢房里也仍然注意当时情况的发展,尽管困难更大,了解消息更缓慢。由于同志们的敏感性和他们所受的政治教育,他们能收集和分析每一个消息,并通过无休止的讨论加以评议。

辩论几乎总是很热烈的,并且进行得很认真,甚至还很激烈。当时一直表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长时间维护被捕时所持立场,另一种则是主张按照久已采取的做法,把每一个策略问题都当成原则性问题。有些较老的同志依然被他们在里昂代表大会上受到的教育所主宰,因此,热心于“立宪议会”的口号。也有一些同志是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转折”路线的基础上培养起来的。但这两部分人都对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采取激烈论战的态度,把他们看成是资产阶级的后备军。对这些同志来说,确实难以理解在1934年希特勒掌权后曾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和推行民族民主团结政策作准备的这一转折的原因和特点。

然而,这种变化在被流放在蓬扎和文托特内的共产党人的教育工作中也有表现;尽管也有一些争议。在同志们学习的课程当中,也有意大利历史的课程,从统一运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了1934年,对统一运动的批评曾发展到这种地步:把加里波第和行动党视为法西斯主义的先驱,因为他们不支持在农村发动农民群众

开展夺取土地的斗争的革命政策。这是一种抽象的批评，它不去研究实际发生的事情的原因和后果，而是无中生有地对统一运动百般挑剔。1934年以后，则承认了加里波第起过民主作用，并正确地探讨加里波第派的代表人物与共和人士同工人运动先驱者之间存在的联系。

斯科奇马罗极力把党的路线变化纳入总的框框之内，尽管他也是很迟才了解到这些变化，因此，总的框框变化得很慢，不是明确纠正以前的立场，而是使党的路线适应新的形势，并且根本不具体地指出必须纠正所犯的错误和需要作真正的自我批评。

1936年以后，被特别法庭判决的人虽则刑期已满（因后来的大赦已缩减刑期），但他们并未能获得释放，哪怕是假释，而是被直接流放到蓬扎。于是，从1926或1927年入狱的党的最高领导人开始过着第二阶段的监禁生活，这一阶段当然不像在监狱中那样倍受苦难，但仍一直被迫脱离政治活动。在这之前，流放地党组织的领导一直由安东尼奥·奇卡利尼、梅尔基奥雷·瓦尼、乔瓦尼·恰尔帕利尼、吉诺·斯卡拉穆齐担任，这时就由一些更有权威的同志担任了，如毛罗·斯科奇马罗、乔瓦尼·罗韦达、彼特罗·谢嘉、吉罗拉莫·利考西，还有巴蒂斯塔·桑蒂亚、安东尼奥·奇卡利尼、焦尔达诺·普拉托隆哥；晚些时候，路易吉·隆哥来到之后也参加了领导。然而，翁贝托·特拉齐尼却未被吸收到党的领导机构中去，他比斯科奇马罗不过晚到几个星期。当时同特拉齐尼曾展开一场紧张的辩论，因为特拉齐尼像葛兰西一样都批评1930年的“转折”和放弃立宪议会口号的做法；在蓬扎结束这场辩论时，人们竟采取了一个未加说明理由的组织措施，这一措施使政治分歧固定化，并且变得更加尖锐了。这样，卡米拉·拉维拉，后来还有朱赛佩·迪·维托里奥，也被置于与人隔离的特殊地位，这已经表明，当时存在着一种政治上不信任的关系。

在德苏条约签订以后，特拉齐尼和由斯科奇马罗领导的领导机构之间的论战有了新的、更加严重的发展。其实，特拉齐尼（卡米拉·拉维拉也和他持同样看法）批评的并不是德、苏签订条约，而是共产国际把美国帝国主义和德国帝国主义看成是一丘之貉的做法，而对这种做法，领导机构是支持的，而且强调责任在英国帝国主义。特拉齐尼和拉维拉相反则申明，必须始终对二者加以区别，指出纳粹主义是头号敌人。即使纳粹向苏联发动侵略从事实上重新证明不同的帝国主义是有区别的，这时对特拉齐尼和拉维拉的批评也仍未撤销。在被流放的共产党人中间当时缺乏消除过去分歧的可能，这样，论战时各自所持立场就一直固定下来，冲突也就日趋尖锐。

1942年夏，文托特内的领导机构狭义地解释了共产党的团结政策，指责持不同意见的人对此作了机会主义的解释，因为他们把525 联盟阵线扩大到左翼、社会党人和共和党人的范围以外，甚至把资产阶级组织（自由党人、天主教徒、民主力量、保皇党人）也包括进来了。

在领导机构看来，党的团结政策应当有助于建立一个打碎大资本主义支柱的人民民主政权。因此，仅同意同那些能确保革命进程进一步向前发展的其他力量达成临时性协议。卡米拉·拉维拉拒绝这种立场，并反唇相讥，批评领导机构执行了一条与党指示的路线相违背的路线，在她看来，党的路线是主张建立一个带有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联合政府。

这场争执导致了不同主张的对抗，从而使党的领导作了决定：1942年5月，特拉齐尼和卡米拉·拉维拉被开除出党。但是，这一处分后来也并未得到上级党组织的批准；到1944年，为了解决秘密工作时期遗留下来的没有正当理由的一切争端，陶里亚蒂曾发起所谓“大赦”，在这种情况下，这一处分也便被撤销了。但是，当时

采取这一措施毕竟对以后产生了影响：在解放战争中，共产党领导就无法得到特拉齐尼和卡米拉·拉维拉的一臂之力。后来，领导机构当时采取的这种僵硬立场，在抵抗运动过程中也有表现：一方面表现为要以一种与众不同的党的行动来克服参加解放委员会所要注意的限度（这些限度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束缚）的倾向，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陶里亚蒂返回意大利后所实行的“萨莱诺转折”的抗拒。

另外一种分歧表现在党的领导机构和国内中心在对待共产国际解散的态度上（1943年5月15日）。国内中心积极评价共产国际解散的决定，认为这是正式承认了各国共产党的政治独立，鼓励它们日益以首创精神，独立地使它们的政策同本国的情况和问题相适应，这就使这一组织决定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然而与此相反，文托特内的领导机构在准备向该岛共产党人所作的关于共产国际解散的报告提纲中却强调这一决定中有关使各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不受中央约束这一组织问题方面，指出共产国际的历史作用是在整个时期以无产阶级专政来对抗反动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各国共产党应当把工人阶级的联盟扩大到中等阶层，为争取反帝国主义的人民民主而斗争，这种行动应当被看成是向无产阶级专政靠拢的一种形式。文托特内的领导机构不是把共产国际的解散看成是与过去某些思想教条决裂的政治事件，而是要求继承这种思想和保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最终目标。斯科奇马罗从根本上说是忠于里昂代表大会的纲领，把“民主中间阶段”看成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短暂的准备阶段。 526

在评价国内中心所奉行的民族阵线政策方面，文托特内领导机构也作了狭义的解释（在7月25日前夕仍然如此），机械地把那些为反对战争继续而采取行动的力量分成“非法西斯的资产阶级”、“反法西斯的资产阶级”和“反资产阶级的反法西斯分子”。这

样就强调了反资产阶级力量的团结所起的作用，并指明有这样一种危险：即那些为维护本阶级地位而脱离法西斯主义的资产阶级集团会对“反法西斯的资产阶级”产生影响。这种机械划分的做法可能会使人抱有一些预见，这些预见不论如何都会在意大利形势的发展中实现的。但是，这种对反法西斯的资产阶级集团带有成见的不信任，如果不是像在党重获自由以后所做的那样加以抛弃，就会在实际上变成一种使无产阶级力量遭受分化和孤立的政策。无产阶级一旦陷于孤立，就会给某些派别（正义与自由和共和党人、尼蒂、斯福尔扎、萨尔韦米尼）所进行的所谓阴谋活动提供方便，而这种活动的目的就是要仅仅恢复资产阶级民主制。当时不是什么疑神疑鬼的时刻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把人们武断地加以划分的时刻，而是要共产党和战斗的反法西斯组织采取更加大胆的行动，建立甚至包括保皇党人和法西斯持不同政见者在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以期依靠意大利本身的力量，在英美或德国军事占领意大利以前，尽快打倒墨索里尼，签定停战协定，实现单独媾和。

从过去沿袭下来而且在监禁和流放时期也依然存在的那种僵硬立场和教条主义表现——为环境所迫，政治上无所作为和必然只进行抽象的辩论，亦即不是结合需要通过斗争实现的具体目标，
527 来进行辩论——等情况，在人们从狱中和流放地获释以后，仍在党的政治行动过程中表现出来。这种现象后来一部分变为行动上的阻力，经过抵抗运动，已经被消除了，另一部分则成为党内辩证因素，存留的时间更长一些，这一因素一直激荡着党内生活，在把旧的干部党变为群众党的过程中以及后来在党的革新工作中显得尤为活跃。7月25日以前流放地的领导机构与国内中心之间在政治方针上存在的分歧，并未妨碍共产党人在9月8日后实现广泛政治团结，尽管这期间也不断发生争论。只要浏览一下被流放或的被监禁的同志们的名单便可以看到，其中有些同志已经在争取

意大利解放的武装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浴血战斗的腥风霎时间吹散了长期监禁的年月积下的层层蛛网。

五、政权的垂死挣扎

1942年底,墨索里尼向意大利人民发表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被政权当局的报刊立即称之为“历史性”的。这是一份悲惨的纪录:从战争开始以来前线阵亡者4万人,死于轰炸者2000人,数以万计的房屋被毁不能居住,23.2万士兵被俘,3.7万人失踪。墨索里尼不能给意大利人带来一点胜利,而只能是一连串的严重失败。他给意大利人带来的不是希望的信息,而只能讲一些痛恨敌人的话。撤离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在突尼斯被包围的残存的意大利师准备被遣返意大利。这意味着英美即将登陆,接踵而至的是对意大利城市的狂轰滥炸。其中受害最大的是那不勒斯、巴勒莫、热那亚、萨沃纳、都灵、米兰。死人和瓦砾堆到处可见,与此同时,每天都有大批人群流离失所,夜晚逃难苦不堪言。由于城市家庭与农民家庭之间、城乡之间保持了紧密关系,这就为一部分城市居民疏散到农村提供了方便。但是,这要求人们每天往返作艰苦的长途跋涉,而由于交通中断,人们只能迟到;工业也因缺乏原料和能源而528缩减生产,混乱不堪。人口外流现象在米兰和都灵很普遍,而在那不勒斯和巴勒莫则大大减少,因为那里农村条件落后,缺少接纳大批市民的物质可能。在农村,反对义务交纳公粮、反对不顾燃料、肥料、种子价格飞涨的官价制度的敌对情绪与日俱增。地主、农民和雇农的集体对抗,在意大利农村逐步组织起来了,从而打破了法西斯政权的一个群众基础。

在城市,轰炸、冬季严寒、人口疏散、黑市物价日涨(每公斤面包8里拉)和食品配给不足(每人每天配给面包减少到150克,产业

劳动者冬季期间也仅配给 200 克),这些都使反对战争继续的情绪日益强烈,震撼了1941年那种既有疑虑又麻木不仁的状态,同时还提出了要求推翻现有政权、尽快结束战争的紧迫问题。一种新的斗争精神在逐步扩散开来,警官们看到这种斗争精神,并在他们的报告中把这种精神说成是颠覆活动的蔓延。在这种情况下,深受饥寒交迫和流离失所之苦的劳动者对那些富人的阶级仇恨也加强了,因为富人即使在当时那种处境之下,在农村仍拥有舒适的住房,还能找到门路,在黑市上也可以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仇恨特别集中到法西斯头目身上,这些头目被指控为黑市的暴发户,因为他们即使在当时情况下也能从缴纳的公粮中搜刮一大部分食品,用来满足自身需要或为牟取暴利投入黑市,并能躲到党部不上前线。

在基层,为数越来越多的劳动者的斗争意志和参加组织的愿望在日益高涨,特别是他们都希望团结在共产党周围;有组织的反法西斯政党也开始成立了;在上层,一些寡头人物也在纷纷活动,设法同英美接触,进行和平谈判;所有这些在1943年初还不过是孤立现象,它们之间没有一个统一的行动和斗争领导中心来加以协调。墨索里尼觉察到这种行动的危险性,因为尽管这种行动是在不同方面展开的,并且没有必要的协调关系,然而其目的却是力争要他下台的。一些记载和见证材料都一致指出,当时墨索里尼身上存在着日益严重的颓丧情绪,但同时也有突如其来的不自量力的冲动,他时而无可奈何地准备进行活动,把政权当中最不得人心的现象清洗干净,从而可以苟延残喘,把同英美谈判掌握在自己手中,时而又顽固地、疯狂地企图不惜一切代价“硬顶下去”。警察局更加拼命地破获和打击组织较严密的反法西斯团体。在大批逮捕的打击之下,艰巨的开始重建政党的工作速度放慢了,其中最活跃的共产党尤其如此。在许多被捕者当中,损失特别严重的是:12月

至1月间，马里奥·阿利卡塔和彼特罗·蒙塔尼亚尼分别在罗马和米兰被捕。这样，罗马组织和以蒙塔尼亚尼的药店为基地的国内中心之间的联系就遭到了破坏。当时，彼特罗·英格拉奥幸免逮捕而转入地下；当时作出的这一决定已经表明：党有了一个新的斗争方针，即不再是长时间采取老的秘密活动做法，而是准备抓紧斗争，加速行动，以便早日推翻墨索里尼。

墨索里尼2月初所进行的政府改组是模棱两可的。的确，他的改组行动如要具有政治意义，就应当把那些愿意寻求条件结束战争的阁员逐出政府，而代之以愿意坚决抵抗到底的人。从政治上看，最耐人寻味的是把外交部长齐亚诺和司法部长格兰迪排出政府，他们本来就是同想要脱离德意联盟的财团有联系的。但是，进入内阁任交通部长的维托里奥·奇尼则又是这些财团的直接代表人物。齐亚诺离开了外交部，但又被任命为驻梵蒂冈大使，而这个位置使他有更多的机会进行国际联系。可见新内阁并非以抵抗到底的姿态出现，不过是更便于墨索里尼控制的暧昧内阁而已。大议会也与此同时得到加强，这就把对国家进行政治领导的中心移到议会中来。这样，墨索里尼就为以后自己被排出政府制造了工具。

面对旧的法西斯寡头政府的收敛，必须使当时仍然处于消极 530
被动状态的反对派力量有能力展开活动和采取行动。陶里亚蒂从莫斯科指出，必须使意大利全国起来同政权作最后的斗争。国内中心的全部活动都旨在加快举行起义的时间，发起成立尽可能广泛的国内阵线，并向群众发出号召，解除对一些危险抱有的正当顾虑，这些危险由于斗争的主动权完全落在经济右派和王室手中，因而是有可能产生的，使真正的反法西斯进程不致断送的保证，并不在于口头上指出存在着右派有可能采取主动驱逐墨索里尼的危险，而在于工人阶级真正行动起来。国内中心批评一些反法西

斯组织，如人民统一运动和行动党人，是因为他们只热衷于讨论纲领，用主张成立共和制的先发制人的办法来反对王室可能主动采取的行动；同时，国内中心还拒绝与天主教民主党人和自由党人一起成立被轻蔑地称为“不纯”的联盟。

所有这些阻力推迟了中央联合委员会的建立：只是到6月底才开始进行这项工作。共产党人不愿成为毫无结果地争论法西斯倒台后纲领问题的俘虏，当然也没有忘记发展意大利民主这一目标，但是他们认为，要依靠群众的行动来发展意大利民主，以达到自由与民主的目标。内加维莱和马索拉于1943年2月在国内中心政治机关刊物《劳动者手册》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明确阐述了这种立场。诚然，在与其他社会阶层进行密切合作的民族阵线中，工人阶级先锋队同这些社会阶层有一致的东西，尽管这些社会阶层出于它们的本性，不具备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但是，无论是无产阶级还是这些阶级都全心全意要推翻法西斯政权，结束战争和争取自由。决定性因素是广大人民群众采取行动和进行斗争的能力。随着3月间在都灵开展的广泛的罢工运动，广大人民群众果然行动起来了。

531 当时，国家经济陷于崩溃，法西斯政权的官僚机构和警察部门缺陷严重、效能低下，全国人民普遍不服从政权统治（这就使政权很难孤立和严厉惩治犯法的人），在此情况下，集中在都灵的15万工人（其中女工4万），形成了一支团结的力量，它能够以自己的运动震撼全国。工人当时的身体状况是普遍消瘦，由于劳累和营养不良，体重下降10—15公斤。劳动时间每天超过10—12小时，加之从疏散地点到工厂还要有很多时间消磨在交通工具上。由于扣发已经许诺的作为疏散家庭补助的第13个月工资（合192小时工资），这就激起了人们极其强烈的不满。

因此，当时存在着掀起争取经济要求的运动的条件，这些经

济要求是：发给所有工人192小时的工资，增加工资和配给，直接分配食品（“增加面包、肉类、油类”），发给生活昂贵补贴，缩短每天的劳动时间。这些经济要求甚至在法西斯工会里也可以合法地提出。但是，经济要求同政治要求即和平与自由是紧密相连的。都灵党组织的本领就在于它善于把经济目标同政治口号紧紧地结合起来。

2月2日，冯·保卢斯在斯大林格勒打起投降的旗子。劳动者的心中充满了骄傲和喜悦。形势已经明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战败了。

六、3月罢工

共产党人虽然人少，但很活跃。马索拉主要在都灵活动，同工厂保持直接联系。由克洛基亚蒂、莉娜·皮科拉托、内拉·马切尔利诺以及后来的安杰洛·莱里斯组成人数不多的党组织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与工厂党组织的负责人进行联系。在米拉菲奥里汽车厂内，共产党人莱奥·兰弗朗科在第19车间进行工作。他是罢工的组织者和发起者。在一次同马索拉和克洛基亚蒂一起开会时，他建议在上午10时厂内进行例行空袭警报演习拉汽笛时，发动停工。厂内停工有利于保护受军事纪律约束的辅助工人，并带动动摇不定的人。

在1月份就已经发动了几次持续时间长短不一的停工：11日 532
在弗列雷公司，13、14日在股份有限公司，14日在菲亚特和迪亚托钢铁公司。还是1月14日，从阿斯提市的威阿萨乌托厂发动了一次抗议示威，这次示威在法西斯工会总部门前持续了几个小时。上述停工和示威行动都提出一些经济目标：抗议迟迟不向工人发放补发面包证，反对计件工资制，拒绝每日工作12小时。在这些行

动经验的基础上, 共产党支部在工人中进行鼓动工作, 为掀起更广泛的运动作准备。后来决定3月5日(星期五)上午10时以鸣汽笛为号, 开始罢工。但是, 厂领导得知即将发生罢工的消息, 下令不发警报演习信号。在几分钟犹豫不决之后, 工人们还是停止了工作。莱奥·兰弗朗科率先放下手中的活。第19车间的工人临时组成厂内游行队伍。游行队伍走过各个车间; 人数大增; 13点, 队伍来到大餐厅, 举行第一次集会。厂领导宣布提前发放50里拉, 并允诺付齐余款。罢工首战告捷似乎使一部分罢工者感到满足, 但鼓动工作仍在继续进行。为避免冲突, 警察未进入工厂, 但在街上逮捕了一名离开车间的工人。声援成为拯救这个工人的条件。米拉菲奥里汽车厂罢工的消息不胫而走, 传遍全城。菲亚特大型发动机厂、菲亚特钢锭冶炼厂、萨维利亚诺厂、皮埃蒙特弗列雷厂、拉赛蒂厂和微型技术厂都相继爆发了罢工。

工人城市都灵像1917年一样再次发出斗争的信号。同当时盛行的自发运动的论调相反, 事实着重表明了共产党所起的作用和如下传统所具有的价值: 这个传统在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沉寂之后又再出现, 成为阶级觉悟的主要因素。在党的国内中心和米拉菲奥里厂共产党支部之间保持着直接关系, 正是翁贝托·马索拉直接同工人共产党员莱奥·兰弗朗科一致商定在菲亚特米拉菲奥里汽车厂举行首次罢工的方式; 马索拉曾是1917年8月暴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红色都灵革命斗争的青年工人战士, 是《新秩序》报的红色捍卫者, 亲身受过葛兰西的教诲, 这时则是国内中心的负责人。后来在抵抗活动中, 兰弗朗科是最早牺牲的同志之一。

533 警察局得知了共产党筹备罢工的消息。警察头子卡尔米内·塞尼塞亲自向墨索里尼报告了共产党为组织罢工而发出的指示。尽管墨索里尼、塞尼塞、警察局、法西斯党和工会都事先得知罢工消息, 但是当罢工爆发时, 谁都不知如何作出反应。抓了几个人,

但是对这一重大事件却在政治和工会方面没有作出适当反应。这种被动局面充分显示出法西斯政权在政治和组织上的危机。

从3月5日(星期五)到8日(星期一),共产党加强了宣传工作。3月6日(星期六)是工作日,人们用这一天传送消息,说服工人,让他们相信:“在初战”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斗争是可能的,把斗争继续到实现目标也是应当的。3月7日(星期日)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大事成为每个家庭、小饭馆、在工人区街道上人们纷纷议论的话题。8日(星期一),在复工之后,共产党积极分子散发了几千份传单(据1917—1922年期间斗争的主要参加者、老同志卡尔萨诺证明,约有7000份)。10时,菲亚特公司属下的几个工厂和其他工厂的工人举行了罢工。尽管有不少人被捕,但罢工于9日(星期二)扩大到其他工厂。在米什兰工厂,工人进行半小时怠工之后,厂领导同意向工人预发300里拉。在以后的日子里,斗争仍在继续。3月11日,里夫厂的厂领导通告愿意发放192小时的工资,但是只付给被疏散的工人。工人们中断了工作,在厂内大院举行抗议集会。在会上,法西斯工会代表被嘘,无法讲话。治安力量最初想冲入厂内抓人,但这一企图未能得逞。女工的斗志表现得尤为旺盛。

以后几天,斗争继续进行,人们作短时间的停工,(甚至一天停工几次),并发展到全省。在维拉尔佩罗萨的里夫厂,阿涅利允诺只要停止罢工便可向每个工人发600里拉,但斗争仍继续下去,人们高唱《红旗歌》;那些准备让步的胆小怕事者则挨了打,成为嘲弄对象,特别是挨女工的打,被女工嘲弄。在这第一次阶级搏斗中,都灵的男女工人就都表现出活动的才能、斗争的坚定和反应的迅速,这些特点都是依靠历史的记忆,通过未曾丢失的经验传给新一代的。那些曾进行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伟大斗争的主角们,一直留在厂内,默默无闻,谨慎从事,他们把自己的斗争本领传授给青年工人,而这种本领一经初战,就得到肯定。当时人们对工人

阶级的作用几乎都已经感到绝望了，而正在这时，这个作用却在必要的时刻以实际行动又重新得到肯定。

当局对此的反应已开始显示出来了，不过还是谨慎的。3月12日，警察局长通知内务部：已经逮捕了164人；省会有117人，省内其他地方有47人，72人在特别法庭遭到指控。3月12日，马索拉与安杰洛·莱里斯及厂内其他领导人开会，对第一周的斗争作了总结。这场斗争以不同形式扩大到都灵几乎所有工厂。当时在了解各厂情况的基础上，曾把各厂排了一下队：即哪些厂斗争开展得比较广泛，哪些厂则未能开展斗争，或者只是进行短暂的停工。他们为3月15日的《团结报》准备好材料。据统计，参加斗争的有10万人。菲亚特厂内各车间都投入斗争，光它们就发动了5万工人。10万人的数字看来是可靠的，因为后来的一些估计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时曾发出呼吁，要求人们继续斗争，争取实现如下目标：切实付给所有男女工人192小时的工资；支付生活昂贵补贴；增加面包、油脂、肉类基本配给量；释放被捕同志；赶走厂内市政警察；工人有权拥有和选举自己的真正代表。

3月12日的会议召开以后，马索拉动身去米兰，参加有罗韦达、罗阿西奥和内加维莱出席的国内中心集体会议。会上研究了在整个皮埃蒙特大区、在米兰和热那亚展开运动的问题。

3月15日以后，政府当局和工业家们改变了态度。他们决定接受工人们提出的部分要求，同时进行更加严厉的镇压。在都灵，从3月5日到15日，被事态发展弄得不知所措的当局头目们，实际上处于混乱和举棋不定的状态。3月15日以后，工业家们决定预付所要求的192小时工资中的300里拉，同时也加紧逮捕工人。3月15日，警察局逮捕了马索拉的几名直接合作者，其中有工人古伊多·马尔泰利、朱赛佩·阿尔恰蒂、卢恰诺·莫利亚和其他25名工人共产党员。3月11日，在米兰也有几名《团结报》推销员被捕。

3月18日，菲亚特厂领导向工人宣布周末预付给那些安分守己工作的车间的所有工人第一部分工资。与此同时，老冲锋队分子卡洛·斯科尔扎跑到都灵，为法西斯分子和菲亚特的领导人撑腰打气。斯科尔扎在瓦莱塔的陪同下，窜到米拉菲奥里汽车厂、大型发动机厂、航空机械厂、弗列雷厂、股份公司和铁路设备厂，并向冲锋队队长和车间主任训话。

都灵的罢工结束了。获得初步胜利的工人们想巩固一下新取得的成果，暂时无意进一步斗争；共产党组织也没有把运动继续推向前进。党组织的孤立对这一决定也起了影响，这种孤立状况在都灵更为明显。

在米兰，党组织（朱赛佩·加埃塔、阿蒂利奥·别托利尼、焦苏埃·卡萨蒂、乔瓦尼·布兰比拉、阿姆莱托·布兰比拉、布鲁诺·文图里尼、乔瓦尼·格里利、乔瓦尼·奇泰里奥）与大工厂保持着联系。他们决定3月23日（星期二）从皮雷利厂、法尔科厂、博尔莱蒂厂、埃尔科莱·马雷利厂开始进行斗争。斗争运动扩展到所有最大的工厂（阿尔法·罗梅欧厂、伊诺钦蒂厂、比安基厂、布雷达厂、布朗·博维里厂），斗志昂扬的事例层出不穷。博尔莱蒂厂的女工们临时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不让法西斯党省委书记马卢萨尔迪在会上讲话。在法切·博维萨厂，冲入厂内执行逮捕任务的宪兵遇到高唱“红旗歌”的工人的抵抗。参加这场斗争的工人数量并不少于参加都灵运动的人数。镇压则更加残酷，在一星期内，米兰工厂被捕者达300余人。

运动扩展到比埃拉地区，那里共产党组织尤其强大，并且可以依靠久经考验的、曾坐牢和被流放多年的同志这批中坚力量；运动还扩展到皮埃蒙特大区的各省。3月14日，在马尔盖拉港爆发了八小时的罢工，尽管厂内的共产党员并未与党的中心取得直接联系。然而，斗争并没波及热那亚（个别局部罢工除外，如在安萨

尔多厂),尽管党组织作了很大的努力,因为它与当时斗争的需要相比,力量还是薄弱的。热那亚未能掀起罢工这一事实,从反面证明了共产党的政治意志在运动的开展中有着决定性意义。哪里
536 党的组织比较坚强,哪里的党组织与党的中心保持直接联系(如都灵和米兰),有党的领导人亲自参与(如都灵的马索拉和米兰的内加维莱),那里的罢工斗争就能胜利;哪里组织比较薄弱、政治上缺乏必要的坚强的领导,那里的斗争便不能开展(如热那亚),或者斗争持续时间很短(如威尼斯)。

4月2日,一份正式公告宣布,法西斯总工会正制定措施,要向产业、信贷、商业和保险部门的劳动者包括职员和工人发放生活昂贵补贴。补贴的数额随“同作战活动有关”的部门和其他部门有所不同,并按等级划分:前一种部门,职员每天发15里拉、工人发10里拉;而其他部门,职员每天发8里拉、工人发6里拉。这是都灵和米兰先进工人们英勇奋斗取得的初步局部成果,它改善了全意大利劳动者的生活条件,向那些没有参加运动的人证明:工人斗争是可以带来好处的。

七、3月罢工的政治后果

罢工的政治后果很快便显示出来了。墨索里尼和法西斯首脑们看到了他们所遭受的失败的严重性。法西斯党和工会招架不住斗争的冲击,法西斯党的党员和法西斯工会的会员也参加了罢工,也造了政权当局的反。企图把意大利人从生到死的一生都控制起来的庞大的法西斯组织,已经表明它是软弱无力的。墨索里尼立即找到两个替罪羊。4月15日,他解除了警察头目卡尔米内·塞尼塞的职务,代之以老冲锋队分子伦佐·基耶里奇。这一举措打乱了警察机构,并使之于7月25日站到国王一边。4月17日,法

西斯党书记维杜索尼被卡洛·斯科尔扎所取代。这是短短几年中的第四次换马(从斯塔拉切换为埃托雷·穆蒂,又换为阿代尔基·塞雷纳,再换为阿尔多·维杜索尼,这时则又换为斯科尔扎)。每次换马都加深了法西斯党的危机,都使它在意大利人民中间更加丧失影响。4月17日,墨索里尼在法西斯党领导机构的一次讲话中,从批评的角度对形势作了一番描绘。他承认罢工来势突然,警察局未得知动静,工会也表现出没有深入到劳动群众中去;党 537 没有完成任务。他承认,这一事件使国家“倒退”到“20年以前”去了,并使工人们确信,俄国人的进展似乎已是不可避免,因此“大胡子”(他用了这个称呼,并指出,工人们斯大林就是这样叫的)将很快就能解放意大利。墨索里尼宣布要采取“严厉”政策,必要的话,准备采用恐怖手段。

他的粗大声音这时也丧失了任何恐吓力量。法里纳奇在4月1日所写的一封评论罢工的信中,要求召开大议会,以便竭尽全力保卫法西斯革命。法西斯政权的政治危机开始了。

曾发起并领导3月罢工的共产党国内中心,对这场运动进行了总结。斗争取得的积极成果是不可否认的。政权当局第一次未能阻止斗争的进行,并不得不无可奈何地满足工人的要求,尽管不是全部要求。工厂中涌现出许多新战士,他们是青年工人,他们表明自己有能力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卓越的游击队员和加里波第纵队的指挥员。这些在艰苦的斗争大学校里受到教育的1943年3月罢工的领导者,后来在工厂里长期成为受劳动者尊敬与爱戴的领导人。许多人在50年代曾遭到歧视和开除,而那些免遭大清洗的人则很长时间都担任厂内委员会委员职务,直到60年代情况发生变化为止。后来,正是这些英勇顽强的干部又一次领导了1960年工人运动的复苏和振兴。在最激烈的斗争时刻发出的“红旗歌”的歌声表明,长期深深地蕴藏在人们心底

的旧日信仰，重又照亮了劳动者的前进道路。

然而，国内中心也没有放松以批判的眼光注意运动存在的缺点。首先是上面已经提及的在地区方面的局限性；斗争并未能扩大到整个工业三角地带^①。但特别存在着组织工作上的缺点。墨索里尼曾说，参加斗争的有10万工人，但实际上至少也有20万人。这是一支重要的群众力量，然而当时的组织结构还与之不相适应：如538 干部、联络、报刊宣传。在4月7日以及后来几天发生的米兰大逮捕之后，报刊宣传问题就变得更为严重了，因为当时印刷最后几期《团结报》的、位于瓦普里奥达达区一所旧房子里的地下印刷厂被警察破获了。铅字盘、压力铸字机和两块已经拼好的用于印刷《团结报》特刊（未能印成）的版面都丢失了。一系列逮捕延续了几个星期，这就使那些领导过3月罢工的最英勇的共产党员也不得不停止了活动。

一连好几个宝贵的星期，国内中心不再拥有引导运动和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的必要工具。只有出版《团结报》才说明党组织的存在，使人对斗争的可能性有信心。《团结报》无法出版则使人感到担忧和灰心。直到5月1日，报纸也无法复刊。国内中心只好在艾米利亚物色新的基地，但是，接受这项任务的阿门多拉却直到5月底才在科雷焦附近、博尔恰尼家的农场组织了一个秘密印刷厂。于是，因陋就简地印出了两期报纸，人们说得很对：这是地下时期的《团结报》“印得最差”的两期。

宣传手段的缺乏表明，党所掌握的微薄的物质手段与急转直下的形势下的巨大可能性二者之间不相适应。

在考虑发动新的斗争之前，必须正视这种状况，必须重新组织力量，巩固已经取得的阵地，吸收最积极、经过考验最多的工人入

^① 指都灵、米兰、热那亚。——译者

党。首先,必须粉碎一系列的逮捕活动,因为在罢工以后,这种活动已在危险地逼近国内中心。5月14日,国内中心的直接合作者安杰洛·莱里斯被捕。莱奥·兰弗朗科和其他几十名工人也被抓起来,并被送上特别法庭。政权当局已经遭到打击,但是它还能做出危险的挣扎。几个星期后,科洛基亚蒂和帕尔玛组织的几名同志也被捕了。5月1日那天,未能以必要的力量表现出规模日益强大的工人动员,尽管在全意大利都出现了许多墙上标语,散发了传单和进行了短暂的停工。马索拉在都灵编印的“五一”宣传材料在米兰未能散发。这在当时曾引起激烈争论。马索拉曾轻易地回答那些建议采取更大胆的行动的人(即内加尔维莱和阿门多拉) 539说,连区区小事都做不来,连一份简单的宣传材料都不能及时准备好,大的举动更无从谈起了。

运动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局限性也是严重的。从社会上说,参加运动的仅仅是人数不少的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工厂里的技术人员和车间主任一般则采取消极被动的态度,尽管也没有热烈响应当局发出的镇压工人的号召,但总的说他们对斗争的态度是消极的。各个层次的中等阶层始终持观望立场,他们并不怀敌意,相反在看到政权陷入困境时还情不自禁地感到满意,但是,他们也没有对罢工者表示声援。

而尤其严重的是政治方面的局限性。运动是由党直接组织的,中央和基层之间有着直接的个人联系。工厂里的社会党工人们一般也参加了运动,但是看不到什么有意义的事例说明他们对斗争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至少,本应看到有社会党签署的呼吁书和决议)。其他政党当时还处于形成阶段,它们没有参加运动,这也是由于其阶级立场所致:天主教民主党就是这样,即使在工厂中也有一些同天主教工会老传统有联系的人参加了运动。只有行动党在1943年3月《自由意大利》第一期增刊中报道了罢工消息,发表

了马索拉在3月12日都灵会议上准备的、14日散发的呼吁书的全文，这份呼吁书是以“工人委员会”署名的。

在国内中心所作的批评性分析当中，有一点是明确的，即认为：为使群众行动具有充分的政治意义，避免使群众行动囿于经济斗争范畴，必须扩大同其他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关系，促使它们重新组织起来，发起成立团结委员会，即民族阵线委员会。但是，到1943年4月，只有那些重申意大利的共产党与社会党需要统一行动的社会党人，向其他党的领导人指出共产党参加每一个团结委员会的必要性。确实，罗米塔在与天主教民主党书记德加斯佩里初步接触时，就曾明白表示：如果共产党不被邀请参加团结委员会的话，社会党是不会参加统一行动的。

540 罢工进展的情况向社会党人突出地说明必须和共产党人团结起来，这也是为了不致失去与工厂的联系，不致仅仅让共产党人成为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必须指出，共产党人当时曾具体帮助社会党人重新取得与工厂的联系，帮助社会党人推进重建社会党的工作。这一点，正是说明共产党人没有固步自封、排斥他人的一党之私的铁证，也是说明共产党人真心实意地表示不想孤军奋战的具体表现，因为争取解放如要获胜就需要有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的共同努力。在这同一时期，即1943年4—6月，行动党反对与共产党达成协议，一方面因为它把意识形态差异作为不可逾越的障碍放在首位，另一方面又与纽约的马志尼协会联系，把共和制问题作为先决条件提出来。贝内代托·克罗切也在1943年3月20日的《评论》上非常及时地发表了一篇文章，极力主张孤立共产党人，目的在于阻止团结进程。天主教民主党正如后来德加斯佩里所承认的，也反对共产党人参加最初的团结协议，它认可共产党人参加其内是很勉强的。只有“重建”派比较注意立即采取行动的必要性，而没有为从意识形态方面排斥他人的做法所干扰，因为它主张由一切

反法西斯力量敦促国王出面干预，打破僵局，实现单独媾和。

鉴于现有力量不足、所要达到的目标非常重要，时间又很紧迫，国内中心也逐渐确信，国王出面干预是必要的，甚至必须敦促他出面干预。因此，必须鼓励国王，并向他保证，共产党人将支持他的行动。把体制问题放在一边，把这一问题推迟到战争结束时由人民表达主权意志来加以解决，这不再仅仅是扩大联盟阵线的一项条件，而且还是向国王直接施加压力尽快打破僵局的方法。

第二十章 7月25日

一、里昂协议

4月份才着手重建反法西斯政党显然是迟了，特别是对于建立一个能在军事形势发生不可避免的、当时已是近在眼前的突变之前及时采取民主倡议的联合中心来说，更是如此。

1943年3月3日，意大利的共产党（阿门多拉和多扎）、社会党（萨拉盖特）和正义与自由（卢苏）的代表在里昂通过了一项文件，阐述了三党制定的纲领和行动方案的要点，作为基础提供给全国其他政治力量。这项协议确认了“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几个政党”实现统一行动。卢苏曾提出，为了达成这项协议，条件是要把正义与自由说成是“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政党”。这是正义与自由分子的一个宿愿，因为他们一直企图打破意大利的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的特殊关系。作为里昂协议基础的是如下一点：即要把参加里昂会议的三党重建意大利的共同政治纲领同联合准备为在战争失败前实现单独媾和打倒法西斯独裁的全国其他政治力量一起所要达到的眼前目标区分开来。

意大利的共产党、社会党和正义与自由运动声明，它们愿意在重建意大利国家民主的事业中致力于摧毁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据以得逞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根源（金融资本、君主制等），并在把劳动放在首要地位的民主制范围内从事重建工作。因此，三个左翼党的纲领是要建立以劳动和摧毁法西斯主义根源为基础的共

和民主制：这是一项民主革新纲领。

与此同时，三党在申明自己更长远的目标之后，也表示要努力在应当扩大到全国一切力量的联盟的基础上立即共同采取行动来拯救意大利，通过全国起义打倒墨索里尼政府，实现单独媾和。因此，必须把联盟扩大到全国一切力量，并立即采取行动，直到发动全国起义，以实现眼前目标。

在讨论中，卢苏声明准备同意把联盟扩大到全国一切力量，取消为实现当前目标和长远目标两方面行动之间的任何区分，但条件是，三党，特别是共产党，要声明接受重建民主的意大利国家的纲领。共产党接受了这项条件，并明确表示：共产党人的目标不是在意大利照搬苏联的模式，或是试图在意大利发动一场旨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要建立一个能通过自身发展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进步民主制。但是，他们也要求卢苏声明支持成立全国联盟，以实现结束战争、单独媾和的眼前目标。对共产党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打破任何等待主义，克服任何教条式的争论，着眼于立即行动，拯救国家，因为他们相信，任何未来前景都取决于工人阶级和左翼政党是否善于立即发挥作用，而不是把他们参加斗争推迟到下一阶段。

三党达成的协议中还附有一项说明协议要点的篇幅更长一些的动议。动议中更突出地阐明了立即行动的方式：一切群众斗争，从最低级的斗争到最先进的斗争，从街头示威到罢工，到破坏希特勒—法西斯战争机器，到游击武装斗争，以便为全国起义作准备。谈到游击武装斗争和全国起义，当时在整个法国，在纳粹分子和法西斯分子军事占领的南部地区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的、有意大利移民广泛参加的武装斗争，显然对意大利是一个教益。但是，这些启示还不适合尚处在初级阶段的意大利的运动。这些启示只起了这样的作用：使意大利的政党和意大利人作好准备，接受几个月之

后、亦即在9月8日之后意大利人民所面临的任務，当时由于德国的占领，意大利又有一些军官和士兵被迫参加游击队，抵抗运动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就由此产生了。

动议还详细阐明了重建民主国家的共同纲领。三党认为，民族革新目标应当以如下双重需要为依据，即阻止任何反动派卷土重来，压迫人民；使国家能有一个新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自由和民主应当是最重要的成果，并应得到劳动人民的维护。必须把法西斯国家的军事、警察、政治和社会体制完全摧毁。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打击法西斯独裁的灵魂和支柱——金融资本的统治。此外，协议还规定，宪法和国体应通过人民自由表达意志来产生。里昂纲领还谈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无论在抵抗运动期间还是以后（包括共和国成立30年当中），长期作为激烈斗争的起因而在意大利政治斗争中重新提出并得到发展。纲领的一部分内容后来被吸收到意大利宪法中去，而意大利宪法至今远没有充分实施。

最严重的问题是，眼前行动计划本身过于激进，以致脱离国内当时存在的具体可能，因为反法西斯力量所进行的重建工作还是很落后的。当里昂动议承认群众斗争是决定性因素，而意大利的命运正取决于这一因素的发展时，3月罢工还没有开始。但是，当里昂文件在3月底传到意大利时，罢工已经结束，群众运动正经历着停滞时期。里昂会议曾断言，某些曾支持过法西斯主义（或是仍然在支持它）的政治社会力量脱离法西斯主义只能在人民行动的推动下实现。但是，人民的行动却迟迟不能以必要的磅礴气势和广泛规模得到发展。

544 三个签署协议的党和其他被敦促参加协议的党派的全国和地区领导人都收到了里昂协议的文本。这一情况在米兰、罗马、都灵、波洛尼亚和其他城市都有。当时曾敦促在这一纲领的基础上成立联合委员会。其实，团结协议已在全国与日俱增，但反对各党

主要领导人之间达成全国性协议的阻力也还继续存在。此外，里昂协议作为指示性纲领只被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所接受。再者，在共产党人当中，马索拉批评里昂文件中没有采用“民族阵线”的提法，他认为，这一提法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它是莫斯科电台所指示的提法。还有一件事情使共产党领导人感到困惑不解，即：正义与自由运动竟被承认为“以社会主义为目的的党”，而它本应是代表中等阶层的党。况且，在意大利，行动党当时也还在极力排斥共产党。

行动党，特别是该党在米兰的领导集团（拉马尔法、帕里、蒂诺）并不赞成正义与自由运动，更不同意卢苏要求使该运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主张。里卡尔多·隆巴尔迪尽管积极参与与共产党进行团结联系的活动，但就当时来说，他还没有采取具有社会主义特点的立场。总而言之，行动党的立场是混乱的，视该党由这个或那个领导人作为该党的代言人而定。由乌戈·拉马尔法、圭多·卡洛杰罗和卢多维科·拉吉安蒂在佛罗伦萨皮耶罗·卡拉曼德雷家中编辑出版的《自由意大利》第二期（1943年4月）发表了题为《澄清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就是要更明确地强调行动党与自由党和共产党在立场上的差异。克罗切曾对这种立场做出了反应，加强对行动党的论战，并写了一篇论战性声明，日期为5月9日，这篇声明曾被秘密地散发。行动党当时成为激烈论战的中心，而这些论战主要还是属于意识形态性质的。但是，这时已经到了5月份！时间紧迫，意大利反法西斯运动还沉溺在教条式的争论之中，这暴露出意大利反法西斯运动在文化修养方面的缺陷和落后。

二、前 夕

5月12日，意大利军队在突尼斯投降了。意大利军队放弃突尼 545

斯使在意大利登陆的周期迫近。但是当时登陆的地点尚未确定：在西西里呢，还是在撒丁？要么则是在意大利半岛海岸线上登陆，以切断部署在西西里的德军的去路？总之，不能再延误时间了，然而，这有限的时间却用来进行抽象的、旷日持久的意识形态争论。

5月1日过去了，这一天，国内并没有发生什么重要的斗争行动。广为散发了内容不同的传单，这些传单提出了许许多多倡议。在不少地方的墙上写了许许多多标语，多处升起了红旗。但是，停工现象很少，更没有集中行动。而国内中心没有能够印发一期《团结报》，仅此一点就足以表明党组织是软弱无力的。当局的大逮捕破坏了党的秘密联络网，造成了严重影响。从3月至6月的三个月中，以不同方式与党有联系的被捕者就达2000人，其中皮埃蒙特大区约有600人，伦巴底大区400人，艾米利亚大区200人，利古里亚100人，托斯卡纳大区100人。被捕人数多少显示共产党活动比较集中的地区。大逮捕也打击了行动党和社会党。4月，拉马尔法被迫逃往瑞士。

在上述条件下，国内中心酝酿已久的上下斗争相结合的计划，即在上层，与其他党的领导人建立团结关系，在下层则发动罢工，举行街头示威，已经无法实现。在上层，因为各自怀有成见，相互歧视，团结关系迟迟建立不成；在下层，动员工作不能达到必要的人数，甚至不能至少重新达到3月罢工时所达到的水平。

甚至试图与军队取得联系，以期使它出面支持人民示威的这一工作也由于指挥官所持态度而碰了壁（尽管他们反对法西斯政权，反对继续战争），因为这些指挥官只是愿意在国王的命令下才
546 采取具体行动。这是骑兵学校司令路易吉·卡多尔纳将军在皮内罗洛给共产党员、中尉蓬佩奥·科拉亚尼的答复，科拉亚尼将这一答复转告了国内中心。后来，卡多尔纳将军被调到菲拉拉筹建阿里埃特机械化师，在这个城市里，各党反法西斯领导人又找到他，他

对这些领导人又作了同样的答复。5月上半月在菲拉拉召开的有所有反法西斯政党领导人参加的几次会议，具有重大意义。孔切托·马尔凯西也参加了这几次会议，他是从帕多瓦被请来的，其他反法西斯人士都认为他是共产党的代表。

艾米利亚的党组织得知召开这些会议，罗阿西奥于是委派阿门多拉前往菲拉拉与那里的组织取得联系，随后又去帕多瓦与马尔凯西直接接触（这时，马尔凯西已经通过福科小组与共产党的组织取得了联系）。这样，马尔凯西就告知国内中心当时正在进行的联合行动状况，特别是有可能通过自由党人卡洛·安东尼的关系与自由党参议员党团取得联系，这些自由党参议员当时正在罗马进行活动，要使国王尽快采取措施，把墨索里尼赶下台，成立由博诺米主持的反法西斯政府，并举行谈判，以实现停战和单独媾和。关于自由党参议员的这项计划，安东尼奥·乔利蒂也向国内中心作了汇报，他在都灵同杰莫纳特和瓜伊塔有联系，因此也就同马索拉有联系。

5月15日在米兰召开的国内中心会议上，分析了上述情况的意义。6月10日这个具有三重意义的日子临近了（马泰奥蒂被杀、罗塞利兄弟被害、意大利参战），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掀起一场广泛的群众反战运动。但是，根据当时的情况，由于《团结报》仍然不能出刊（尽管5月下半月在艾米利亚一个新的秘密地点好歹总算出版了压缩版面的一期，刊登的日期是5月15日），不能过多指望实施从基层采取行动的计划的可能性，这个计划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自量力的。实际上，6月10日只散发了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党签署的、以“民族行动阵线临时委员会”的名义出现的传单。这件事有其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它证明两党达成了统一行动，但是，它也暴露了动员能力不足，因为传单散发的范围很小。为了纪念6月10日这一天而发出的指示（即：上午10时拉响汽笛，工厂、机关、学校、

军营、市场、商店、街道静默两分钟，停止工作10分钟；不购买报纸；20时30分以后不出家门）未能贯彻。其实，大多数意大利人并不知道有这项计划。按照号召，示威本应是日益大胆的行动的前奏。没有前奏，因而也就谈不上行动了。

国内中心决定抓紧工作，努力使所有反法西斯组织之间签订一项真正的团结协议，同时参与自由党参议员所采取的行动，以便向国王保证：只要他决心出面干预，共产党就支持他。这项决定作出之后，杰莫纳特于5月底被派往罗马。在乔利蒂的介绍下，他同自由党重建派的罗马小组的曼利奥·卢皮纳奇（该派无反共成见）以及参议员亚历山德罗·卡萨蒂和阿尔贝托·贝尔加米尼进行了接触。杰莫纳特转告意大利共产党的如下建议：同军队的一名高级人士接触，以便使工人阶级在3月罢工中显示出的那种力量和军队的力量联合一起采取一致行动。如果接受这项建议，共产党就会派遣一名中央领导人前往洽谈。建议受到重视，并通过乔利蒂建立了联系。

这时，马尔凯西被调到米兰，见到国内中心，并同内加维莱进行了个人接触。马尔凯西提供的情况证实了杰莫纳特带来的消息。马尔凯西通过他的同事卡洛·安东尼教授把共产党采取支持国王和军队出面干预的立场这一情况也传到罗马。5月26日，安东尼受到玛丽亚·何塞公主的接见，她设法展开活动，以加快发动政变。

6月初，杰莫纳特重返罗马，并把马尔凯西作为意大利共产党正式代表介绍给贝尔加米尼。马尔凯西重申，共产党愿与军队合作，并明确表示，共产党不提出任何反君主制的先决条件。意大利共产党要求参加一个民主政府（即使是有限度的参加），这个民主政府的任务是打破同德国的联盟和签订停战协议。

然而，马尔凯西带回的消息并不是积极的。国王在6月初分

别接见了博诺米和格兰迪。他通过王室部长阿夸罗内，了解到索莱里及其他人物的意见。国王只是听，并没有发表意见。他没有表露出愿意借助军队的支持出面干预，使墨索里尼下台，特别是没有表明对如何解决下届政府问题的态度。看来，组成以博诺米为总理的内阁的想法国王并不赞成。甚至6月30日博诺米与王储翁贝尔托的会谈也没有什么积极成果。在博诺米看来，显然王储不会做任何反对他父亲的事。况且，即使在反法西斯党派当中，德加斯佩里也认为，对反法西斯力量来说，承担起和平谈判的重任还是不适当的，在他看来，这一重任必须仍然完全落在王权的肩上，因为正是王权把国家拖进灾难性的战争。

国王以他惯有的谨慎，执意继续保持沉默。博诺米和自由党参议员党团提出了倡议。新就任参谋长的维托里奥·安布罗西奥将军经过更有成效的准备，也提出了一项倡议；安布罗西奥将军是皮埃蒙特人，对国王极其忠诚，他是在阿拉曼和顿河两次灾难性事件发生后接替卡瓦莱罗的职务的。而在国王的背后，还有巴多利奥和卡维利亚两名元帅，他们之间正在竞争。安布罗西奥可以依靠战争部副部长索里切和新任陆军参谋长罗阿塔的力量。另外一项倡议是由法西斯党的一批反对继续战争的权贵们准备的，这些人有：格兰迪、费代尔佐尼、博塔伊、齐亚诺、德博诺。而与奥兰多关系密切的阿夸罗内则在策划种种阴谋，并利用一直还对警察局进行广泛控制的前保安头目塞尼塞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连意大利资本主义的最高代表人物也开始施加压力，要把墨索里尼赶下台和签订停战协定了。

国王欢迎上述所有人士的意见，但推延采取行动的时间。这种民主解决办法使国王感到忧虑和烦恼，他担心过去那些“战争生还者”^①又一次卷土重来，他们会责怪他1922年向法西斯主义投

^①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些战争生还者谴责国王当时决策不力。——译者

降。他宁可采用军事解决办法，因为军队亦即当时剩余下来的那部分军队可以向他提供对内控制的工具。一个军人和文官合组的政府可以避免使墨索里尼下台被人民群众的示威所干扰，而且这个政府在适当的时候还可以把格兰迪、费代尔佐尼及其他温和的法西斯人物吸收进去。根据国王的估计，博诺米建议成立的反法西斯政府，是一种极端的、不可取的备用解决办法。但是，国王还是想利用一下法制支柱——由大多数参议员表明态度或者由大议会进行表决——来再次掩盖他个人的责任。

面对着有被国王的行动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的危險，各反法西斯党认识到增强对国王施加压力的能力、从而在它们之间建立团结关系的必要性。共产党通过罗马代表所采取的态度，它与社会党、人民统一运动的团结关系，自由党重建派所持的立场，所有这些都促成召开两次重要会议（分别于6月24日和7月4日在米兰的王子府出版社召开），尽管天主教民主党怀有抵触情绪，行动党也表示反对。参加会议的有：共产党代表孔切托·马尔凯西；自由党先是亚历山德罗·卡萨蒂，后是利昂纳·卡塔尼；天主教民主党先是乔瓦尼·格龙基，而后是彼特罗·门塔斯蒂；行动党是里卡尔多·隆巴尔迪；人民统一运动是莱利奥·巴索；社会党是罗伯托·韦拉蒂。经过讨论，国内中心赞同马索拉的意见，只派孔切托·马尔凯西与会，不让负责联合政策的内加维莱直接出面。这一决定是出于一种可以理解的地下工作慎重考虑，但也说明对于这两次会议的重大政治意义过分低估。这种低估团结委员会（而后则是低估民族解放委员会）作用的态度，甚至一直持续到9月8日以后，北部尤其如此，只是在萨莱诺转折^①以后，党的最高领导人才亲自过问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活动。

^① 指1944年4月在意大利南部萨莱诺成立有意大利共产党、社会党等所有反法西斯政党参加的第二届巴多利奥政府。——译者

两次会议并未取得任何积极结果。共产党的建议是：（1）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领导委员会指挥的民族行动阵线；（2）组织一次具有起义性质的群众行动和政治总罢工；（3）促成军队介入；（4）迫使国王逮捕墨索里尼；（5）要求成立包括一切反法西斯政党参加的民主政府。但是上述建议遭到拒绝，原因是：人民统一运动和行动党提出了成立共和制这一先决条件，同时自由党人和天主教民主党人也拒绝签署一项群众行动呼吁书。但是，会议最后还是成立了一个反对派委员会，其宗旨主要是保持联系和在发生新的可以预见的事件时进行磋商。与当时的迫切需要相比，成果是太小了。⁵⁵⁰

国内中心利用6月和7月最后几个星期的时间来扩大它在国内的联系，建立更为牢固的党组织，促进成立党的省委员会，更好地为党员指明政治方向。国内中心与那不勒斯的同志们取得了联系，同时委派拉维纳的大学生朱赛佩·达莱马前往诺拉同温琴佐·拉罗卡律师接触，并通过埃利奥·维托里尼和萨尔瓦托雷·迪贝内代托加强同西西里的已有联系。这几个星期活动紧张，人们当时确信，开展公开活动的条件很快就会成熟了。

在指导工作方面也并非没有鼓励发动武装斗争的内容。6月10日的《团结报》发表了题为《让我们组织爱国行动队》的文章。当时，首次出现了爱国分子行动小组的名称，它后来在抵抗运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一份由“意大利共产党书记处”署名的通知（这份通知是5月底由罗阿西奥起草的）中指示成立能够以武装斗争击败法西斯暴行的“爱国分子行动小组”。

6月10日《团结报》提到的“爱国行动队”和党的书记处的通知中所讲的“爱国分子行动小组”有着共同的性质：即它们都被看成是深入到人民群众运动中的共产党小组。要求“爱国分子行动小组”成员绝对秘密、严肃、勇敢、大胆、热忱，富于牺牲精神，严守军

事纪律。后来，在武装斗争的严酷经历中，爱国分子行动小组由在最严密的非法条件下活动的小组组成，而爱国行动队则由有合法身份的武装的劳动者参加，但他们随时准备发动群众行动和起义。

国内中心5月和6月所发出的指示并未能付诸实施。但这些指示表明，共产党员已经对武装斗争作好准备，并在训练进行这种类型的斗争。这就说明，9月8日以后，当开展广泛的人民武装斗争运动的条件成熟时，共产党员何以率先走上这条道路。只有在弗里乌利大区，这些指示才得到贯彻。马里奥·利泽罗会见了罗阿西奥，研究成立新的游击支队问题，但是，早在3月份已经成立了第一个加里波第支队，这个支队的编制和斯洛文尼亚队伍在一起，因为当时斯洛文尼亚队伍正有意扩大自己的活动地盘。

三、君主制国家的政变

尽管墨索里尼大事吹嘘，7月10日盟军在西西里登陆却没有遭到认真抵抗。英美的军事优势立即表现得非常明显：16万军队、600辆坦克、1000门大炮、4000架飞机，而意大利才有6个沿海师和4个正规师，共计7万人，更何况建制混乱，装备低劣。在西西里还有约3万德军，配备数量有限的飞机，30门88毫米口径的对空作战的火炮和65辆坦克。在对方军力的压制下，意大利的力量急剧下降，同时英美的力量在短时间内增至40万人。意军司令部知道盟军占领西西里岛已不可避免。只有德军的抵抗延缓了英美军队的进展。

7月15日，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接见了巴多利奥。国王执意排除让博诺米组织政治性政府的想法。他不懂得，这种主张对向盟军保证彻底改弦易辙是必要的。国王委任巴多利奥组织军人和技术人员政府，幻想能以此来向德国人掩盖他的真正意

图。另一方面，他也惧怕法西斯分子会做出反应。

巴多利奥在谒见国王之前曾与博诺米接触。博诺米建议组成由巴多利奥主持的内阁，由博诺米任副总理。他们可以一起就职，在随后几天则再组成政府的政治部，其中包括反法西斯运动各派力量的代表：自由党、民主人士、天主教人士、行动党人、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在博诺米1947年发表的《一年的日记》中对此做了具体的说明。不过，在7月26日以前，博诺米居然就考虑把共产党的代表也吸收到政治部里去的可能性，这是值得怀疑的。组成巴多利奥—博诺米政府也必然意味着必须同时完成两件事：推翻墨索里尼和让意大利脱离德国。但这并非国王之所愿。国王幻想蒙骗德国人，即使在搞掉墨索里尼以后，让德国人相信：意大利继续站在德国一边作战。国王拒绝了博诺米的建议，委托巴多利奥组织仅由军人和文官参加的政府。 552

7月16日，卡洛·斯科尔扎在法西斯党书记处召集了一次首脑会议。所有与会者都表现出惊恐和紧张的心情，确信必须采取一定的行动。一部分头目前往威尼斯宫要求墨索里尼召开大议会。墨索里尼确定7月24日为召开日期。因为早已确定7月19日是墨索里尼与希特勒会晤的日子。墨索里尼希望希特勒同意意大利脱离德国，或者答应给意大利以更多的增援，这样，墨索里尼就可以在出席大议会时手中有牌。国王立即获悉正在酝酿的事情，他认为可以利用大议会的表决来使他的干预合法化，但是，他当时仍犹豫不决。

7月19日，作出决策的时候到了。墨索里尼与希特勒在弗特尔会见。尽管安布罗西奥对他施加压力，墨索里尼讲话仍然是含糊不清的，他不敢向希特勒要求更多的援助以对付英美的入侵，更不敢提出求得对方同意使联盟决裂的设想。他的垂头丧气和毫无信心的态度增加了希特勒的疑心，并对他的随行人员产生消极影

响。经过这次会晤，希特勒确信墨索里尼即将垮台，于是开始采取必要措施以应付这位捉摸不定的盟友翻脸。德国人没有接受意大利要求把它部署在占领区的至少一部分军队调回国内的建议，因为这些军队应当作为抵押置于德国人的控制之下。

553 同一天，英美空军轰炸罗马城，把炸弹集中投在圣洛伦佐居民区。几千居民受害（700多人死亡，1600人受伤），大部分被埋在瓦砾之中。教皇庇护十二世首先来到居民当中，居民以满腔悲痛迎接他，并呼叫：“和平，和平”。几小时以后，国王获悉教皇受到居民们热烈而激动的欢迎，于是他也决定视察被轰炸的地点。但是，国王和王后的视察却是在十分冷落的气氛下进行的。国王从这次经历中确信，出面干预的时刻已经到来。大议会会议为他提供了久已期待的机会。

国王、军队指挥部和法西斯头目策划了政变。四分五裂、毫无准备的反法西斯力量当时无力发动人民采取行动，哪怕是在最后一刻也没有做到这一点。自由党参议员为使国王警惕，不要成立一个看守政府（这种看守政府缺乏足够的权威以对抗德国人和与盟军谈判，因为它在反动势力和第二次日益左倾的浪潮冲击下会陷于孤立），曾拟就了一份备忘录，但也付之东流。国王因为得到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奥兰多的支持，对自由党参议员的意见根本不屑一顾；奥兰多起草了宣布解除墨索里尼的职务和任命巴多利奥为总理的声明。

罗马发生的事件在米兰也引起了反响，而软弱无力的国内中心则不得不坐视形势的发展。安东尼奥·乔利蒂带到米兰的消息说，国王如今正等待大议会投票，以批准他的干预。人们竟对这个消息抱着某种不敢轻信的态度；这说明，人们对于统治阶级上层在战败时刻所发生的冲突依然估计不足。但是，由于缺少统一的反对派中心，无法发出起义号召，而这一号召至少是多少有可能得到

响应的。意大利反法西斯运动当时处于落后迟缓、四分五裂、毫无准备的境地，它只好听任主动权掌握在国王和保守派手里。后来有人对共产党在那些日子里的表现提出批评，因为共产党当时似乎是消极地接受国王出面干预，但是，这种批评是没有看到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反法西斯政党都处在无能为力的境地，它们无法以自己的行动来推翻政权，实现停战。须要补充的一点是，这种消极被动正是那些极端主义派别所希望的，这些极端主义派别（如人民统一运动）从理论上公开宣扬必须放手让资本主义和保守势力去完成推翻政权和结束战争的任务，以便全力准备发动第二次社会主义浪潮。⁵⁵⁴

事态是按照国王和阿夸罗内所策划的方案发展的。事件的主人公们留下了一些回忆录，这些回忆录都力图抬高他们个人参与的重要性和鼓吹他们所以采取这种立场的原因。本书不想细谈种种往往是相互矛盾的见证材料的错综复杂情况，还是以叙述事态发展的主线为宜。

大议会于7月24日到25日的夜里以多数通过了格兰迪提案，这项提案请国王作出解决危机的决定。墨索里尼以听天由命的颓丧情绪主持议会讨论，这使人怀疑是否他也想摆脱责任。凌晨3时，会议结束，这时墨索里尼讲了这样的话：“你们开始了政权危机”。当天夜里，格兰迪就把会议结果告诉了阿夸罗内。

墨索里尼是真的理解议会投票的意义吗？25日，决定墨索里尼命运的一天过去了，但他并没有表现出特别忧虑。他要求得到国王接见，于是国王确定17时接见他。当日上午，墨索里尼表示信任国王对他的支持，并拒绝民兵总司令加尔比亚蒂要逮捕18名曾投票赞成格兰迪提案的法西斯党头目的建议。他接见了日本大使，这件事当时看来很奇怪，如果不是以如下一点作为会晤的理由的话：当时据说是墨索里尼打算把一些材料交给日本大使，请他通过外

交信使把材料送到瑞士。加尔比亚蒂陪同墨索里尼在圣洛伦佐区进行了一次几乎是秘密的私访。

17时，墨索里尼准时来到萨沃亚别墅。同他所期望的相反，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突然宣布解除墨索里尼的职务，由巴多利奥接替，并答应对他采取保护措施。墨索里尼呆若木鸡，惊恐万状，只好束手就擒，被人用等候在萨沃亚别墅花园中心的救护车带走。接着立即按预订计划行事：委任巴多利奥组阁，塞尼塞重新担任公共安全总局局长。安布罗西奥将军和宪兵司令切里卡将军采取了预先规定的措施，防范法西斯分子可能闹事。塞尼塞给王国各省督发了电报，请他们速与有关军事当局达成协议，执行公共秩

555 序计划。政府实行戒严。电话总局和电台被占领。但没有任何人采取行动。墨索里尼被关在人民广场宪兵营里，他写信给巴多利奥，表示他保证支持新政府，并要求对他及其家属给以保护。法西斯党头目只顾各自逃生。法里纳奇立即要求德国大使馆的庇护。斯科尔扎责成法西斯党各省委书记必须服从新政府。曾投票反对格兰迪提案的加尔比亚蒂将军（他几天以前，甚至几小时以前还建议墨索里尼采取武力行动，因为可以仰仗配备有效能的德国坦克的装甲部队），不加争辩地接受了解职，并向安布罗西奥将军保证，他时刻准备好把指挥权移交指定给他的接班人奎里诺·阿尔梅利尼将军。墨索里尼的报纸《意大利人民》准备出版7月26日一期，大字标题是宣布任命巴多利奥为政府首脑。领袖的报纸要求任何人也不要持异议，要全力支持巴多利奥政府。法西斯分子像中了魔法似的销声匿迹了。在法西斯分子普遍投降的浪潮当中却有一人的举动是异乎寻常的，他就是斯太法尼通讯社社长曼利奥·莫尔加尼：他在听到宣布墨索里尼被推翻时，朝自己头部开了一枪。

四、7月26日的人民示威

22时45分，电台播送了国王和巴多利奥的声明。这时发生了一个新的情况，它打破了国王、将领和法西斯党魁所作的安排。宣布墨索里尼解职的消息，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在整个国家，从伦巴底大区到西西里，引起了普遍的欢呼。巴多利奥的声明措词隐晦，其中还有一句带有威吓性的模棱两可的话，即“战争在继续”，这些话语同墨索里尼被赶下台这一中心事实相比，几乎没有为人们所注意。就在这夏天的夜里，突然响起了昔日的解放民歌。《红旗歌》是在长期受压迫的年月里世代相传下来的歌曲，歌声开始还是含糊而微弱的，后来则变得雄壮有力。街道和广场挤满了男女老少，他们充满激情地互相拥抱着。临时组成的游行队伍通过一座座城市，一面面红旗也突然出现，同三色旗并列在一起。

人民群众的游行示威遍及整个意大利，这是当时这个运动的 556
首要特点，即具有全国性的广泛规模。这是具有广泛团结性质的游行示威。与红旗和三色旗同时出现的还有颂扬国王、巴多利奥和军队的标语牌。这些游行示威还具有公开的反法西斯性质，因为人民群众的愤慨是指向法西斯政权的象征，他们毁掉棍棒和斧头的标志，但是没有伤人。许多街道都用反法西斯烈士的名字命名。运动的这种和平和慷慨大度的特点是应当强调指出的。只是在某些情况下，示威群众冲击了法西斯党魁的住所（显然都是一些人们非常熟知的党魁），为的是要发现和没收充足食品，并立即把这些食品发放给居民。在那些与政府勾结最紧的记者自发地离去的报刊印刷厂里，编辑人员和印刷工人临时出版专刊颂扬国王的决定。在罗马，《前进报》出版了一期号外。原试图出版过去的民主报纸《世界报》，但这一尝试被警察局制止了。最后，许多城市

的示威者向监狱进发，要求释放政治犯。从都灵的诺维监狱中释放了500多名犯人，其中300名是政治犯。从罗马的雷吉纳·科埃利监狱逃出大约1400名刑事犯，但政治犯拒绝立即出狱，他们留在狱中，要求合法释放，不少人后来又等了较长一段时间才获释。

在那久已期待的兴奋时刻，人们很少去注意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和巴多利奥的声明的内容，特别是其中两句带有威吓性的话。国王声称，“不允许任何不满情绪”存在，巴多利奥则断言，“战争在继续”，意大利“说话是算数的”。他威胁要毫不留情地打击企图扰乱公共秩序的人。声明的文本出自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奥兰多之手，后来此人力图减轻自己的责任，但是枉费心机。人们起初可以认为，巴多利奥是想向法西斯分子发出警告，使他们严守纪律，接受国王的决定。但是法西斯分子没有表现出有“扰乱”公共秩序的任何打算。因此，秩序就是针对公民而言了，因为只是号召他们“紧紧团结在国王周围”。“战争在继续”这句话欺骗不了德国人，却使英、美、苏三国政府产生疑心。后来几个星期，随着军政府决心采取镇压手段，局势的严重性变得明显了。这就导致了巴多利奥政府的“45天”悲剧。

就当时来说，意大利人民表现了他们的感情，这种情绪长期受到压抑，这时才怒火般地爆发出来。在这种兴高采烈、充满信心的表现当中，有很多天真幼稚的成分，人们以为，既然墨索里尼的垮台是无痛苦地实现的，那么和平也就会轻而易举地得到。人们甚至认为，也许已经同德国人就意大利退出战争达成默契。

人们对国王十分感恩戴德，因为他竟能毫不费力地推翻了墨索里尼。当时，连巴多利奥也博得了人民的感激和信赖。国王依靠他的这一行动增强了萨沃亚王朝渡过危机的可能性，让人们忘记他对法西斯主义的上台和持续存在以及对意大利参战所负有的罪责。但是，王权通过7月25日的决定而捞取到的受人拥戴的资

本，在“45天”内就迅速丧失殆尽了；9月8日，王室逃出了罗马。

7月25日夜晚的人民群众运动，除迸发出信任和幼稚的激情之外，也表现出他们的政治觉悟。尽管寡头政治在作出决定时（无论是1940年6月意大利参战的决定，还是1943年7月在造成全面灾难之前使意大利退出战争的决定）使意大利人民处于无权过问的地位，但意大利人民仍然显示出自己的力量。以前没有进行任何民主活动的地盘，而这时，活动的地盘却突然打开了，并且在这个地盘重新关闭之前，人们已经迅速占领了它。戒严令并不能阻止民主力量扩大自己的地盘，就是在“45天”当中也是如此。这样，民主力量终于以更有组织、更加团结的姿态去迎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日子——9月8日。

五、反对派委员会的成立

7月26日晨，国内中心在米兰召开会议。所有领导人都参加了会议，他们是：马索拉、罗阿西奥、诺韦拉、罗韦达、内加维莱、阿门多拉。头一天夜里，他们在前往开会地点时曾遇到节日般的游行队伍。由于当夜所见的情景、电台广播墨索里尼下台的消息以及全国立即作出的反应，他们的心情是激动的，甚至有些慌乱。国内中心肩负的责任是重大的。尽管国内中心对召开预定好的大议会和为国王提供借口以便从法律上证明他的行动正确等消息抱有不敢轻信的态度，但它从政治上已经准备好在国王出面干预造成的局面下采取行动。但是两件新的事实改变了政治格局，首先就是“战争在继续”这个说法。这表明国王企图把推翻墨索里尼这个阶段与脱离德国盟友关系另一个阶段从时间上分开，从而开辟一个暧昧不明、模棱两可的危险阶段。此外，在声明中还提到要维护秩序，缺少反法西斯的意志，这就不能不揭露这场政变的专制和保

守性质。

当时必须对那种主张立即对巴多利奥政府发动公开进攻的意向作出反应，这种意向是要指责政府企图继续战争，扶持没有墨索里尼的旧政权。这种谴责是可能得到有效支持的。况且，这也是滞留在法国的共产党人(多扎和兰普雷迪)的立场。然而，国内中心未经讨论却决定了一条不同的路线，这一路线在一份只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起草和通过的文件中提了出来。国内中心发出“和平与自由”的口号，想以此来答复官方声明中存在的消极内容。文件指出，眼前的目标是停止敌对行动；达成停战协议；解散法西斯组织；恢复民主自由(其中根本的是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立即大赦政治犯；成立民主政府。

国内中心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注意到这一事实：推翻墨索里尼是由于国王干预才做到的。当夜，人民群众就曾欢呼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和巴多利奥的名字。这就妨碍了发出立即反对巴多利奥政府的号召，而反法西斯力量长期四分五裂也是一个原因。必须把最初的欢乐和希望情绪变为对斗争需要的更为自觉的理解，而这只有在开展新的活动的过程中才能实现，而新的活动又必须由共产党和联合起来的反法西斯力量来促进。必须利用改变所提供的机会来提出符合人民群众在游行示威中所表达的那种情绪的具体要求，即他们要“和平与自由”。至关重要的是，要使党能够在广泛的反法西斯团结的范围内开展活动。

国内中心很快结束了一般性讨论，作出了重要的行动决定。必须在当天：1)发动总罢工；2)在米兰大教堂广场举行群众集会；3)组成反对派团结委员会；4)立即出版《团结报》一期号外。

当7月26日凌晨会议结束时，总罢工已经在全面铺开了。工作尚未开始，而工人们却已经上街游行，并向市中心进发。稍晚一些，乔瓦尼·罗韦达在20年来举行的第一次群众集会上讲话，发言

的还有行动党的乔万·巴蒂斯塔·博埃里和社会民主主义者波尔多·加斯帕罗托。罗韦达向到会的劳动者阐明国内中心通过的文件中所规定的目标。内加维莱在与埃利奥·维托里尼、詹西罗·费拉塔、萨尔瓦托雷·迪贝内代托合作的条件下，保证了《团结报》号外的编辑出版工作；7月27日晨，这期号外出版了，其中还发表了一份呼吁书，动员人们为争取和平、自由和成立民主政府而努力。

26日晨，在阿道夫·蒂诺的办公室里召开了一次临时会议，与会者是曾参加6月24日和7月4日会议的反法西斯政党的代表。在前几个月曾阻止达成团结公约的一切犹豫、排斥和歧视的现象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烟消云散了。参加会议的是：行动党的帕里和隆巴尔迪，意大利共产党的阿门多拉和格里利，意大利社会党的韦拉蒂，人民统一运动的巴索和卢扎托，自由党的阿尔佩萨尼，天主教民主党的亚奇尼和加拉拉蒂·斯科蒂。会议讨论进行得很快。当时，自由党人和天主教民主党人主张采取一种能表示信任等待巴多利奥政府的立场，而共产党人则要求立即动员人民行动起来，迫使巴多利奥政府立即采取某些措施，并变该政府为全国团结政府。行动党人则在坚持把成立共和制作为先决条件与承认应当立即采取行动二者之间摇摆不定。尽管有这样一些差异，会议还是通过了共产党人提出的呼吁书文本，只略加改动。

560

反法西斯各党申明它们完全一致行动的共同愿望，争取达到以下目的：彻底肃清法西斯主义及其一切压迫工具；为签订体面的和约而实现停战；恢复一切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首先是新闻自由；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重新确立典范的司法程序，不准进行简单审讯，但对一切负有罪责的人则须无情打击；废除种族法；成立由所有代表民族共同行动愿望的政党参加的政府。

反法西斯各党呼吁所有意大利人不要仅仅表现出兴奋的心情，而是应当意识到当前时刻的严重性，要组织起来，运用坚不可

摧的意志,防止任何人利用新形势来达到反动目的,并企图维护那些曾支持过法西斯主义、同时也受到法西斯主义支持的利益。反法西斯各党呼吁劳动群众(工人、农民、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学生、士兵)始终提高警惕,以实际行动来表达坚不可摧的和平和工作的愿望。

展开热烈讨论的是关于眼前应采取哪些斗争措施。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坚持继续进行坚决的罢工,直至组成全国团结政府;而天主教民主党人和自由党人则主张对巴多利奥政府持信任等待的态度;行动党对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所提继续进行坚决总罢工的提议也犹豫不决。在一次下午召开的只有左翼政党代表(共产党、社会党和行动党)参加的会上,为不使上午取得的成果(通过一份呼吁书)前功尽弃,不得不达成一项妥协,接受帕里的建议,暂时决定仅于27日继续总罢工,以后再根据其他地区传来的消息对随后几天的斗争作出决定。在上午的会上,还决定成立反法西斯反对派协调委员会(有时也称团结委员会)。阿门多拉当时认为,不应坚持采用过于僵硬的和死板的名称,如“民族阵线”,因为这种名称可能令人以为是共产国际的宣传工具建议使用的。企图强求一致看来是不适宜的,因为当时人们确信,可以预料发生的事件将会增强而不是削弱团结进程。接受共产党人提出的目标和最后向劳动群众发出行动呼吁,这才是重要的。

中午时分,戒严令开始生效,并禁止人民群众的示威活动。在米兰处于地下状态的彼特罗·英格拉奥和曾被特别法庭判处10年监禁的法诺市的布鲁诺·文图里尼,好不容易才在下午最初几个小时在威尼斯门举行的一个群众集会上讲了话。文图里尼于1944年在完成党所交办的一项任务时被法西斯分子杀害。士兵的介入和一辆坦克的出动已经表明,文职政权转为军人统治。当时,军队受到鼓掌欢迎,妇女向士兵投掷鲜花,这些都使人避免了一场恶性

事件。

在这一天结束时，国内中心开了一个短会。这时，从都灵、热那亚、波洛尼亚和其他城市传来了举行大规模群众示威和当局开始镇压的消息。马索拉、诺韦拉和罗阿西奥已经着手进行扩展和巩固党组织的工作。但这时也从参加在蒂诺办公室召开的会议的人那里获悉，在罗马，聚集在博诺米周围的各反对党代表们正实行另一种方针。对巴多利奥“休战”的路线占了上风，而当时却应当立即对他施加压力，要求他采取刻不容缓的措施。因此，决定立即委派阿门多拉作为意大利共产党的正式代表前往罗马参加罗马反对派委员会会议，该委员会当时看来仍然把共产党人排斥在外。其他党的代表也抱着各自的目的搭乘同一班夜车出发了。这样，7月27日下午刚开始，一个携有米兰反对派委员会通过的要求的真正代表团就抵达了罗马。

米兰代表在罗马看到了另一种情况。26日，在圆柱广场举行了一次群众集会，博诺米在会上讲了话。罗马举行的罢工声势有限，这也是因为工人基础薄弱所致。实际上，在罗马委员会中主张休战的路线占了上风，有些人（例如德加斯佩里）认为，这条路线应当继续推行到签订停战协议为止。

7月27日下午，罗马反对派委员会在博诺米的住所里会见了 562 米兰代表。罗马委员会中没有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这件事立即引起人们的注意，而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在米兰却起了重要作用。总罢工取得胜利和决定继续进行总罢工的消息，打破了好心等待的空气。阿门多拉明确指出，人们并不想开始进行公开的斗争来反对巴多利奥政府；出于时机不适宜的考虑，也不该进行这样的斗争；但是应当对巴多利奥政府施加压力，推动它至少采取米兰呼吁书中所提的某几项措施。来自米兰的行动党、天主教和自由党的代表也支持共产党所提对政府施加压力的建议，以便立即取得如

下成果：

1) 保证立即举行谈判，实现停战，并采取适当措施以对付德国的危险；

2) 解散法西斯党和法西斯政权的各种机构（行会院、特别法庭、法西斯民兵）；

3) 释放政治犯和政治流放者；

4) 实现新闻自由和重建反法西斯政党的自由。

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作为北部工人运动最有权威的代表，在博诺米的建议下，当晚由鲁伊尼陪同拜访了奥兰多（他是国王的政治顾问和7月25日声明的起草者）。奥兰多声称他不能考虑第一项要求（即立即举行谈判，实现停战），因为这应由政府决定，而且涉及到军事秘密。但是，他补充说，如果王权不想实现停战的话，那么它为何还要承担驱逐墨索里尼的严重责任呢？

正式重建反法西斯政党和恢复新闻自由也都未能立即实现，因为要避免向德国人提供口实。从奥兰多的言谈当中可以看出，在进行全部活动时要注意不要为德国立即干涉制造借口。同时，各党派可以立即着手切实进行重建工作，并且不会受到干扰。确实，公共安全机构的领导部门在以后几天果然向各省督下达指令，要他们不要逮捕处于地下状态的共产党领导人。而且，奥兰多也保证
563 会接受其他要求：解散法西斯党，逮捕法西斯头目和释放政治犯及政治流放者。

其实，对上述最后几点所作的保证只是部分地兑现。内阁会议决定解散法西斯和行会院，解散国家法西斯党，废除关于大议会的法律，取消特别法庭。但是，释放政治犯却是零敲碎打地实现的，而没有采取全面的正式措施，并且还奉行政治歧视的原则。立即获释的只有社会党和行动党的政治犯和流放者，而占政治犯和流放者80%的共产党人却仍被监禁；为了争取他们获释，还必须施加

新的压力和采取其他政治行动。相反地，法西斯头目们却并未遭到干扰，并且可以毫不困难地藏匿起来。

六、巴多利奥政府的行动

巴多利奥政府上台伊始的几个行动，就证实了人们在7月25—26日夜间声明散发以后立即作出的判断。它继续进行战争，并且继续推行专制政策。墨索里尼下台这一事件带来的和平与自由的希望破灭了。但是，对法西斯政权的垮台，至少是对法西斯政权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垮台，对墨索里尼和法西斯头目无法再招摇过市，对国家法西斯党及其各种组织的解散，人们还是满意的，这种满意的心情使人产生了信心，相信会顺利地实现第二步：达成停战协议。

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奥兰多对国王出自干预的原因所提出的几点看法（《为什么国王会这样做呢？》），在广为流传着，这些看法所作的解释使许多人感到信服。意大利驻有德国军队，这一点看来是巴多利奥政府之所以迟疑不决的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

26日和27日在北部举行的步调一致的总罢工，到了28日开始出现声势减弱的初步迹象。显然，即使从劳动者的生活需要考虑，也不可能设想能把坚决的总罢工继续到签订停战协议和建立由反法西斯政党组成的新政府。在米兰，反对党委员会于7月28日号召工人只停工10分钟，用以每天表示群众的警惕性和动员。但是，⁵⁶⁴8月1日，委员会建议停止每天进行的这种短时间的停工，号召劳动者和人民在取得初步成果之后，继续为实现为期尚远的和平与自由的目标而斗争。

巴多利奥政府从自身考虑出发，肆无忌惮地采用戒严和新闻检查的手段，强硬地压制人民运动。26日上午，由于看到没有任何

理由惧怕法西斯分子作出反应，政府就使用国家机器的全部力量来镇压人民运动，这一运动在25日到26日的夜里和26日早晨都曾显示出它的威力和广泛性。政府立即给各省督发出命令，要他们同军事当局取得一致，立即执行公共秩序计划，这就意味着要实行戒严制度，把权力从文职政府转到军人政府。根据中央的旨意，必须以最大的气力阻止人民示威的继续进行，阻止这些示威活动“蜕化”为共产主义运动或颠覆运动。在经过事先曾得到意大利共产党支持的政变实行后只有几个小时，共产党人就已经被指定为头号公敌了。罗阿塔的通令指出，文职权力转到军人当局手中会带来哪些后果。在人民示威面前，军队可以开枪，包括远离开枪，就像对付敌军那样。罗阿塔的通令命令军队不要向空中开枪，而应当直接向人射击，对“坏头头和教唆者”，如据实抓获定要枪决，或解送相当于特别法庭的战争法庭。

这些命令立即造成如下后果：7月27日，11人死亡，42人受伤，388人被捕；7月28日，43人死亡，144人受伤，413人被捕；7月29日，12人死亡；38人受伤，170人被捕；7月30日，6人死亡，1人受伤，109人被捕。受害者人数随着一天天的过去和人民示威规模的缩小而下降，但并未停止。在巴多利奥的“45天”里，在人民示威的过程中遭军队杀害的劳动者达86人，另有532人受伤，2114人被捕。因违反宵禁而死亡的共10人，伤20人，被捕237人。法西斯分子被杀的有9人，伤20人，被捕114人。

565 对人民群众的镇压行动的严重性，人们在罗马和米兰并没有立即看出来，而后来一些最初的历史追忆也没有记载这次镇压的规模。最为人们所共知的镇压事件是巴里事件：在巴里，人民示威队伍直趋监狱，敦促释放政治犯，结果遭到由一名前法西斯冲锋队中尉指挥的军队密集炮火的射击。23人死亡，70人受伤。在牺牲者中有托马索·菲奥雷的儿子、年轻的格拉齐亚诺，他为了去解救

关在狱中的哥哥维托雷而丧生。这一事件和巴里反法西斯人士朱赛佩·古拉多教授的被杀害，说明这起流血事件何以很快就为罗马所了解，激起人们的愤怒和抗议。但是，其他残酷镇压的极为严重的事件却长时间不为人知：米兰工业区 20 人死亡，雷焦·艾米利亚 9 人死亡。

这些消息之所以传播缓慢，是因为当时的政治联络系统尚不完备，罗马和外省的接触不多。报刊奉命不得发表被认为是对公共秩序有“危险”的消息，报刊还处于仍然保持其结构完整无缺的人民文化部的指令和新闻检查之下。政府阻止旧的党派报纸出版，如《前进报》、《团结报》、《人民报》和《共和之声》，以及 1926 年被封闭的反法西斯报纸，如乔瓦尼·阿门多拉办的《世界报》。此外，政府还下令保持法西斯报纸的报头和保存旧的产权制度。仅允许用其他一些与法西斯主义勾结不太紧的记者换掉原来的社长，但这些记者却仍然保证贯彻“连续性”的路线。对业主的选择和人民文化部所实行的控制，使意大利新闻界继续处于服从他人的地位，以致离任 20 年之后重任《意大利日报》社长的参议员阿尔贝托·贝尔加米尼，曾多次反抗这些新的限制，然而他在自由党党团的压力下终究未能抛弃这个地位。在罗马，表现得比较先进的报纸是《罗马人民报》，科拉多·阿尔瓦罗任社长。当时曾向各报发出指示，不准刊登关于内乱的消息，并要对“德国盟友”表示最大限度的尊重。

与“德国盟友”的关系问题，在巴多利奥政府看来，是具有头等重要性的问题。巴多利奥囿于他上任伊始所发表的声明：“战争在继续”，拼命设法向德国人保证他信守诺言和消除疑团（即怀疑把墨索里尼赶下台是同英美开始接触的条件）。但是，德国人是骗不了的。他们从直接的情报中获悉，发动政变的目的在于创造推翻现有阵线的有利条件。德国人暂时佯做对巴多利奥政府忠于“诺言”的良好保证表示欢迎。但是，早在 7 月 26 日就已经把一个伞兵

师从法国南部调到拉齐奥大区。7月26日以后，德军八个师又从法国和德国调入意大利。

8月6日，在塔维西奥的会晤中，新任外交部长瓜里利亚，同安布罗西奥将军一起，会见了里宾特洛甫和凯特尔将军。这是一次蒙骗撒谎两面三刀的会晤。双方都企图欺骗对方。瓜里利亚的声明是强调意大利人继续进行战争的愿望，里宾特洛甫则针对他的声明，表示要保证再向意大利调遣德国军队，以对抗英美日益增加的压力。意大利人低声下气地建议至少把占领区（法国、巴尔干、希腊）的一部分军队调回意大利，以限制德军大量涌入意大利。里宾特洛甫和凯特尔则并未理睬把部署在边界以外的意大利军队调回的建议，而允诺继续增派援兵，即扩大纳粹主义对意大利半岛的占领。8月15日在波洛尼亚举行的意大利和德国军事首脑会议（意大利方面有罗阿塔、F·罗西、扎努西，德国方面有约德尔、罗梅尔和冯·林特伦），也取得了类似的结果。

整个8月份德军继续毫不受阻地长驱直入，进一步改变了本来就有利于德国的力量对比。今天，尽管有许多研究心得和极为丰富的回忆资料，仍然很难确定当时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到7月25日，驻意德军已达8个师，其中4个师大部分部署在西西里和意大利半岛，4个师则在撒丁和科西嘉。在国内的意大利师，除在西西里和撒丁驻防的之外，共有9个正规师和10个正在重建的师。至9月8日，力量对比变得有利于德国人，因为意大利有15个被认为是正规师，但其装备和士兵人数都不如德军，另有8个正在重建的师，而德军则有14个正规师。此外，德国人还把不少专事通讯、警戒、后勤工作的部队遍布意大利半岛，这些部队被部署在大城市，它们实际上是一些装备精良、有效的、牢牢控制在指挥官手中的名副其实的“指挥部”。

但是，以上这些估计都是纸面上的，是脱离意大利师素质的实

际状况的。意大利师(包括那些被认为是精锐师,如部署在罗马周围的机械化师)的实际状况在9月8日便暴露出来了,当时,由于通讯联络混乱和缺乏足够燃料储备,意大利师曾显出运转不灵。此外,在那整个期间,德国空军是占压倒优势的,它控制着主要机场。

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将领一直确信德国占居优势,意大利不能同德国“盟军”作战。害怕与德国人发生冲突,担心他们的行动会推翻君主制而组成一个新的法西斯政府,这种情绪在一段时期里竟表现为恐慌万状。在这种失败主义的行动中,军事情报局长、罗马兵团司令卡尔博尼将军表现得更为突出。早在7月30日,卡尔博尼就对博诺米说形势严重,纳粹可能要突袭首都。那时,保卫罗马的任务是交给了一个不像样子的师——撒丁的步兵师,一个正在组建的阿里埃特装甲师和一个战斗力很弱的皮亚维机械化师。

卡尔博尼散布这种灾难性消息的目的显然是要警告反法西斯政党必须小心从事。德国人进攻罗马的危险(这一进攻将由驻守在维太伯的装甲师发动,并得到居住在罗马的德国人和一心想复仇的法西斯小组的支持),曾多次由巴多利奥及其心腹提到过,并把它渲染得十分严重。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这样的警告又多次发出。比较严重的警告是8月20日发出的,而且仍然是卡尔博尼将军干的。说什么一批武装的和有组织的法西斯分子企图在罗马闹事,要为德国人占领首都提供借口。巴多利奥政府下令逮捕阴谋闹事者:卡瓦莱罗、布法里尼·圭迪、加尔比亚蒂、弗雷迪、格拉韦利。在搜捕过程中,法西斯党一个地方组织的前书记埃托雷·穆蒂被杀,情节始终神秘莫测。整个事件至今还不清楚。有人说是一场虚张声势的阴谋活动和特别是将军之间的火并行为。在卡尔博尼散布悲观论调的同时,巴多利奥却声言有信心,并吹嘘在罗马周围已经部署了六个师,可以防范纳粹分子或法西斯分子的

任何进犯。这是双方耍的花招，还是巴多利奥和参谋部之间的实际利害冲突？可以肯定，国王当时曾批评巴多利奥对反法西斯政党太软弱，而巴多利奥则力图扩大政治联系，以便在英美盟军面前得到一定程度的政治保护。中心问题一直是实现停战。但是任何行动都推再推，白白地指望德国人同意让意大利退出战争。只是到了塔维西奥会议以后，巴多利奥才决定迈出一大步，并派遣卡斯泰拉诺将军去马德里和里斯本，但情况既已如此，这就使英美指挥部方面进一步推迟行动，并产生许多疑虑。

当8月15日意德在波洛尼亚召开军事会议时，卡斯泰拉诺将军已经出发去马德里寻求同英美初步接触了。但是，英美由于从意大利方面没有得到任何具体建议，又看到巴多利奥政府表现出想与它的“盟友”一起把战争继续下去，甚至还允许所剩无几的意大利空军参与破坏潘特莱里亚（英美的供给基地）的战争行动，所以决定重新进行大规模的轰炸。8月4日，那不勒斯遭到狂轰滥炸。接着，其他城市也遭到轰炸。轰炸特别严重的是热那亚、都灵、米兰。8月15日左右对米兰的轰炸最为惨重。

巴多利奥“战争在继续”的政策给国家带来了恶果。一方面德国人在意大利半岛横行无忌，实行军事占领；另一方面英美从南端进攻，对大城市进行大规模轰炸，以这种可悲的手段迫使意大利尽快要求“无条件投降”。

在这种形势下，很难提出民主倡议，因为缺乏真正的干预能力。

第二十一章 9月8日

569

一、全国反对派委员会的活动

罗马反对派委员会的历次会议情况表明了意大利反法西斯运动的艰苦历程和在事态急剧发展面前的无能为力。罗马委员会曾起全国委员会的作用,并成为那些支持7月26日在米兰通过的纲领基础的反法西斯力量的统一中心。罗马委员会之所以起这种作用,不仅仅是因为它设在罗马这个王国的首都和政府的所在地,也就是作为必须与之保持日常联系的主要对话者的所在地:罗马委员会的权威性主要在于:那里有正在建立中的各个政党的最高领导人。罗马委员会的组成不是明确固定的。不同会议的参加人数和名单不断变化,而且每有新的参加者与会就要对有关应付巴多利奥政府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重新泛泛地议论一番。

委员会的固定成员固然实际上差不多每天都要聚会,即使只是简短地互通情况,但是,在行动党人斯特法诺·西利恩蒂和天主教民主党人朱赛佩·斯帕塔罗的寓所中还是举行了一些内容更广泛的会议,这些会议召开的日期是:7月28日和31日,8月2日,8月11日和12日,8月24日和25日,9月2日和4日。在前几次会议上,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只有阿门多拉,在8月11日和12日的会议上还有罗韦达和马尔凯西一起参加,在8月24日和25日的会议上则有格里利参加,后来则由斯科奇马罗接替阿门多拉任首席代表。其他党的代表团也经常变化。意大利社会党的代表

570 是罗米塔，博齐、南尼也先后一起参加。同行动党的代表西利恩蒂和费诺阿尔泰亚一起的先后有路易吉·萨尔瓦托雷利和乌戈·拉·马尔法。同自由党代表卡萨蒂一起的是利昂纳·卡塔尼。固定的核心小组由博诺米（起主席作用）、天主教民主党的德加斯佩里和鲁伊尼组成，鲁伊尼自称是一个正在建立而当时尚不存在的党的代表，这个党叫做劳工民主党。

委员会在第一个星期所执行的路线是要向政府施加压力，实施7月26日和27日要求的措施，特别是举行谈判，以便达成停战协议。这是意大利共产党代表不断力争的一个重点。一切对巴多利奥的政府内政方面的批评，在主要问题面前都退居次要位置，主要问题是尽快结束悲剧性阶段，结束“继续战争”。这一点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主要问题，因此，8月2日会议就决定在这一问题上对巴多利奥本人直接采取集体行动。这次会议一致通过的动议，要求由各反法西斯政党组成的委员会成为自由与和平愿望的代表，这种愿望在7月25日和26日的大规模人民群众示威中已经表露出来了。这项动议还要求毫不延迟地结束违反民族利益的战争。最后，委员会确信，团结一致的意大利人民必能应付这一决定可能带来的危险。

8月3日，反对派委员会代表团受到巴多利奥的接见。同博诺米一起参加接见的有：自由党的卡萨蒂，天主教民主党的德加斯佩里，劳工民主党的鲁伊尼，行动党的路易吉·萨尔瓦托雷利，社会党的布鲁诺·博齐，共产党的阿门多拉。在接见代表团时，巴多利奥表现出某种困窘的神态。这次会见确有不同寻常的特点，因为它是在正式同德国一起进行战争的政府与仍然处于地下状态的一批政党代表团之间建立联系，这些党要求打破同德国的联盟，并达成停战协定。布鲁诺·博齐代表所有在场的人阐明如下一段话的意义：“如果意大利遭到德国人的侵略，全体无产阶级将奋起保卫

它”。巴多利奥允诺把委员会的动议转告国王，并声明，如果他的行动不能奏效，他就准备引退。言外之意是：允诺在危机不可避免⁵⁷¹时将推动组成全国团结政府。

于是，委员会就朝着缔结停战协定和推翻阵线的前景作出努力。对于巴多利奥政府的批评，特别是针对它明显地迟迟不着手谈判，也不从军事上和政治上作好准备，以迎接不可避免的解放战争，这场战争的目的是要把国家从日益扩张的德国占领中解放出来。委员会知道，政府尽管处于恐惧和迟疑不决的状态之中，却在背着德国人，寻求与英美接触的途径。

意大利共产党在首都的代表从贾伊梅·平托尔（与参谋部有联系的军官）和朱利亚娜·本佐尼（同那些曾策划政变的宫廷人士很接近）那里了解到局势的发展。平托尔的作用对党掌握方向极为有益。这样，意大利共产党就获悉了政府最初采取的试探性行动以及8月14日派遣正式特使出发的情况。固然同英美谈判的决定仅是在8月15日前不久才正式作出的，但是，阿门多拉根据获悉的情报却从未怀疑巴多利奥真正打算达成停战协定，而正是根据这一信念并确信在必不可免推翻阵线之前可以利用的时间已经不多，他力求在罗马贯彻7月26日在米兰确定的意大利共产党的路线。

此外，很清楚，英美只会接受同国王和巴多利奥的正式代表谈判，因为只有他们能保证实行无条件投降。巴多利奥政府在着手进行谈判方面的行动是犹豫不决、拐弯抹角、模棱两可的。此外，也看不出究竟要以哪些运动、哪些力量来代替巴多利奥政府；看不出在没有完全控制武装力量的情况下，又如何能与英美谈判停战条件，如何能采取必不可少的军事步骤来防备和以一切方式对付德国肯定会作出的反应。

这种负责的态度得到博诺米、德加斯佩里、鲁伊尼和卡萨蒂的

赞同,当然也因为他们担心国内秩序问题,害怕这有助于推动人民运动。然而,这些担心的保守性质并不能降低上述立场的有效性。因此,正如博诺米所说的那样,共产党人表现出他们是“负责的和灵活的”,这种态度引起人们的惊讶、评论,也有批评。然而,行动党
572 和意大利社会党的代表在委员会会议上却采取出尔反尔、动摇不定的立场。参加8月11日和12日以及24日和25日会议的米兰委员会派来的各代表团也提出十分强烈的抗议。这些代表团表达了正遭受狂轰滥炸的北部人民的愤怒感情。为结束战争,政府还等待什么呢?对8月11日和12日以及24日和25日会议通过的动议,大部分接受了米兰代表团提出谴责和要求。但是,博诺米在德加斯佩里和鲁伊尼的帮助下(罗米塔在场时则也有罗米塔),却总是把动议的措词弄得含含糊糊,以致不能作出具有很大约束性的结论。

拉马尔法对政府的行动的谴责尤为强烈,8月11日,他不仅主张同巴多利奥政府断绝一切关系,而且坚持必须在全国开展一场广泛的群众运动,迫使政府接受和平,甚至改变政府。拉马尔法确信,一个民主共和政府可以从英美方面得到更优惠的投降条件。但是,在反法西斯运动始终处于软弱无力的条件之下(而且惨无人道的狂轰滥炸的结果更使这种条件进一步恶化了),又怎能达到组织政府的目的呢?狂轰滥炸已经使北方工业中心的工人群众日益厌倦,身心都受到摧残,因为有成千上万人死亡,有多少不眠之夜,有多少房屋被毁,多少家庭骨肉离散。

全国反对派委员会几次会议的进行情况也都是这样。每次都是根据代表的变化和得到的消息(反法西斯分子的被捕、军事当局采取的暴力行为、对法西斯党魁的纵容和庇护、指令报纸宣传意大利参加反对英美“侵略者”的战争),要求同政府断绝一切关系,谴责与民族利益和最初承担的义务背道而驰的行为。

据博诺米回忆，共产党人孔切托·马尔凯西在8月11日的会议上曾遵循这条路线，呼吁群众发扬英勇的起义精神。但是，他的立场是孤立的。共产党代表，阿门多拉和罗韦达先后都赞同必须批评巴多利奥政府的行为，揭露它推拖、延误和玩弄两面派手法。⁵⁷³但是，他们认为，必须把批评保持在一定范围之内，以便不失掉与政府的任何接触，不使委员会的团结破裂，不在国内散布轻易的幻想。而行动党所发动的鼓动宣传却只是大叫大嚷地、不切实际地作出口头上的强硬表现，这种表现并未化为任何具体的行动建议。事实上，所有人也都排除通过武装起义冲突来反对巴多利奥政府和建立由反法西斯政党组成的政府的可能性。当时，这样做是缺乏力量的，而且实际上只能为德国人进行干涉和让法西斯分子重返政府提供借口。

对巴多利奥政府施加批评压力和发动群众运动，特别是北部举行罢工，不应超出一个明确的限度，以便不致暴露尚处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缓慢恢复阶段的薄弱的人民力量，不致使它过早地投入战斗。但是，必须保证人民运动和反法西斯力量团结有日益壮阔的发展，并且尽管有残暴的军事镇压，也要使军官、士兵和民主力量相互接近，使军队和人民相互接近，以期把一切联合起来的力量投入一场不可避免的冲突中去，这场冲突在宣布停战和德国进行干涉时就会发生。其次，还要争取释放政治犯和政治流放者，这是政府手中的宝贵抵押品。推迟释放政治犯和政治流放者是一种令人气愤的讹诈行为，必须不失时机地（即在即将实现的停战以前）粉碎它，以便拯救大约2000名共产党人的生命，其中有党的最优秀分子。这是在短短的几天内必须立即解决的问题。

二、工会专员的任命

政府任命新的工会专员这件事，为释放政治犯和政治流放者提供了时机。这是在对政府采取接触、批评和施加压力的政策情况下发生的，委员会代表团在8月3日巴多利奥接见时采取的行动又确认了这种政策。两天以后，即8月5日，工商劳工部长莱奥波尔多·皮卡尔迪（此人在巴多利奥政府中比较接近委员会的立场）曾通知博齐：政府意欲把与委员会一致物色的人选任命为工会专员，这些人选都是从反法西斯政党的领导人中选拔出来的。皮卡尔迪早在博齐刚从流放地获释抵达罗马后不久就与他接触过。博齐当即提出一项条件，即在那些工会专员中也应任命一名共产党人，并提名乔瓦尼·罗弗达。

对政府来说，在旧的法西斯领导人被排除或逃跑以后，安插工会领导乃是当务之急。在恢复轰炸以后，工厂里掀起了新的罢工浪潮。罢工运动在米兰声势最大，从8月5日到15日整持续10天；运动在都灵也有极大发展，而且声势日益浩大，一直延续到20日。

8月15日以后，轰炸造成的惨重后果限制了运动在米兰的发展。这些罢工尽管是支持一些经济性质的要求（疏散费和轰炸救济金、发放食品、缩减工时），但却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并且日益强烈地提出和平的要求。因此，从7月26日起，成立厂内委员会的工作就加紧了，厂内委员会是作为工人意愿的民主代表和改造法西斯工会官僚机构的手段。

任命全国一级和省一级的工会专员，对巴多利奥政府来说，符合重新与工人群众建立关系的需要，这样可以不必对工人群众仅仅采取军事镇压的手段，这种镇压虽然凶狠，却已经表现出无力遏制工人运动了。共产党人当时是积极参加建立厂内委员会工作和

参与领导罢工的，他们并不打算让运动超出一定的界线，并不想使运动带有起义的色彩，尽管某些反法西斯团体如行动党在施加压力（在都灵，这种压力特别大），而这些团体对工厂的生活则又是毫无所知的。

如果说政府对委任反法西斯代表人物掌握工会的特别领导权有明显的兴趣，在共产党人看来，接受政府的建议则也是有益的。政府的这些建议事实上意味着承认反法西斯政党应起的作用，把工会组织归还给那些从工会组织诞生时起就曾领导工会的力量（只是后来，法西斯政权施用暴力，把工会组织从这些力量手中夺575了过去，并对这些力量进行迫害达20年之久）。此外，任命反法西斯领导人为工会专员，也使厂内委员会得以获得正式承认，使厂内委员会成为一种制度，并推动人们在那些尚无厂内委员会的工厂建立厂内委员会。9月2日签署的协定正式承认了厂内委员会，签署协定的一方是代表工人工会的博齐、罗韦达和夸雷洛，另一方是代表工业家联合会的马齐尼和弗里杰里。但是，必须使工会专员在接受委任时把自身的职责同政府在采取其总的政治行动方面所应负的职责明确区别开来。此外，政府作出这样的任命也是提供一个机会，使人能提出释放政治犯和政治流放者的要求，以此作为接受委任的先决条件。

关于接受皮卡尔迪建议是否适宜的讨论，在8月6日至8日这几天中进行得十分强烈。由于罗马和米兰之间通讯困难，这个问题未能及时在米兰国内中心与远在罗马的国内中心代表中间进行讨论。8月3日下午，罗韦达抵达罗马，由于到达太晚，未能代表意大利共产党参加受到巴多利奥接见的反法西斯代表团。由于地下斗争的思想习惯残余和从事秘密工作的正当顾虑，米兰和罗马之间没有利用电话进行紧急磋商。阿门多拉确信，接受任命是符合7月26日凌晨国内中心在米兰召开的会议上确定下来的，针

对巴多利奥政府采取的总路线的一种行动。罗韦达由于必须亲自承担接受任命的责任,因而起初曾有抵触情绪,他担心——这是有道理的——对他的任命可能遭到党内和工人运动某些方面的误解和批评。罗韦达首先担心得不到仍被监禁在文托特内的共产党人的理解。确实,当8月9日电台广播关于任命的消息时,文托特内一部分被流放的人果然报之以口哨和抗议。但是,必须立即决定是否开始谈判和讨论皮卡尔迪的建议。接受任命的理由是很充分的,即使从党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事实上,这样做等于承认意大利共产党有执政的作用,并消除对共产党的任何偏见和歧视。这是不言自明地承认意大利共产党可以参加全国团结政府,这个政府
576 在签订停战协定以后应当取代巴多利奥政府。特别是,通过这种任命,为建立统一工会提供了前提。实际上,1944年关于成立统一的意大利总工会的罗马公约的发起者,也正是当时负责工会的那个核心。但是,比任何理由都重要的是,这样做可以把释放政治犯和政治流放者作为先决条件提出来。

在长时间的思考之后,罗韦达同意讨论皮卡尔迪的建议,这项建议是由博齐转达给他的。但对此在委员会内部又产生了新的阻力。社会党人之间产生了分歧,罗米塔和利扎德里表示同意,而南尼则开始时是反对的。最大的阻力来自行动党,特别是来自拉马尔法,其理由是渴望同巴多利奥决裂,在反对派委员会和政府之间形成全面对立。然而,他并未能阻止两天之内就作出了决定。连行动党的权威代表(如圭多·德鲁杰罗教授和皮耶罗·卡拉曼德雷教授)也都同意任命为专员,上述二人分别被任命为自由职业者和艺术家总工会和律师与检察官全国工会的专员。8月8日正式作了任命,8月9日报纸公布了任命消息。布鲁诺·博齐被任命为工业劳动者总工会专员,乔瓦尼·罗韦达和焦阿基诺·夸雷洛为副专员;阿基莱·格兰迪和奥雷斯特·利扎德里分别为农业劳动

者总工会专员和副专员；埃齐奥·瓦诺尼为商业劳动者总工会专员。后来，从流放地获释不久的朱赛佩·迪·维托里奥被任命为农业劳动者总工会副专员。与此同时，朱赛佩·马齐尼被任命为工业总工会专员，恩佐·斯托罗尼为商业总工会专员，菲利波·玛丽亚·维斯孔蒂·迪莫德罗内为农业总工会专员。

行动党人和社会党人虽然最后还是接受了任命，并委派了有权威的代表参加工会特别领导，但他们仍然继续在他们的地下刊物上批评接受任命(北部尤其如此)。于是，在那种情况下就开始推行一种持续很长时间的策略：一方面同意参加领导岗位，但另一方面又同时批评共产党态度太温和，企图以此笼络人心，从左的方面超越共产党。看不出当时和以后这种策略为其发起人带来什么好处。 577

接受任命又拖了几天。罗韦达在8月10日接受《晚邮报》采访时声明，他的态度要根据成立自由工会的需要而定，但是，他又说，他从政治上继续采取保留态度，只有在同皮卡尔迪部长接触，不仅在工会方面，而且在总的政策问题方面了解到政府的想法以后才能解除这一保留态度。8月12日的《团结报》转载了这篇采访的全文，并明确指出，接受任命并不应当意味着支持巴多利奥政府的政策，而只是为重建自由工会而在工会方面进行简单的技术性合作。同时，被流放文托特内的共产党人组织的领导委员会于8月13日致函罗韦达，信中表示确信，接受任命是经过党同意的。这封信充满了保留，它指出，接受新职位无论如何也不应意味着同政府进行政治合作。这封信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信件寄到时接受任命已经完毕，而且其做法也符合文托特内同志们提出的意见，但是，这封信也有它的政治价值，因为它反映了党的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意向。

在8月11—12日召开的委员会全体会议上，12日通过了接受

任命的原则,但是,由工会专员们签署的共同声明明确指出,合作纯属工会方面的,不能同政府共同承担任何政治责任。专员们把这一声明交给了皮卡尔迪和巴多利奥,并提出两项要求:立即释放政治犯和政治流放者,着手进行实现停战的谈判。巴多利奥的回答模棱两可,这种态度不仅表现在对释放政治犯和政治流放者问题上,而且特别表现在停战问题上。卡斯泰拉诺将军刚出发不久,巴多利奥想对他的行动保守秘密。

皮卡尔迪在博齐、罗韦达和夸雷洛的陪同下立即前往都灵和米兰,同各工厂的厂内委员会直接接触。结果并不消极:尽管不乏对接受任命的批评,但对这一决定的有益之处还是表现出更广泛的理解。工人代表们表示反对继续进行战争,要求立即达成停战
578 协定,这种抗议特别指向皮卡尔迪,因为他是内阁成员。当时,人们也表现出爱国意志,并要求拿起武器,准备同德国人进行斗争。8月18日在米兰省督府召开了厂内委员会代表会议,在会上,共产党人布兰比拉表达了米兰工人的爱国热忱和准备以武装斗争反对德国人的决心,这时人们已经认为,这场武装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了。

三、释 放 政 治 犯

正是在那几天,巴多利奥决定履行释放政治犯和政治流放者的诺言。罗韦达曾威胁说,如果政府在这方面不迅速履行自己的义务,他就不陪同皮卡尔迪前往北部,并将辞职。8月16日,罗韦达还直接向巴多利奥发出名副其实的最后通牒。负责公共安全的头子卡尔米内·塞尼塞不得不屈服于巴多利奥的指令,尽管他在共产党领导人面前曾恶毒地提出要延迟释放共产党政治犯的说法,其目的是不让一些卓越的领导人参加重建党的工作并开展党

的活动。8月17日,内务部发出释放的命令。8月18日,被流放者开始离开文托特内,从那天起,关押共产党政治犯的监狱大门打开了。但是,在办理释放手续方面仍然有延迟和有意放慢的现象。释放工作像滴水慢流一样一直拖到9月9日,这一天,克劳迪奥·钱卡也走出了圣吉米尼亚诺监狱。

8月18日,斯科奇马罗作为文托特内被流放者中的第一名抵达罗马。根据以前的指示,被监禁和流放的共产党人在8月20日以后返回他们自己的省、市家乡(有的已阔别家乡15年以上)。他们的到来受到热情亲切的欢迎(尽管是不公开的),所到之处都带来了巨大的战斗力。当时成立了由参加反对派委员会的各党组成的救济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得到人们的广泛支持,并收集到捐款、衣物和食品。罗马的救济委员会由多里亚·潘菲利王子主持,他也被流放;1944年,他出任由民族解放委员会任命的获得解放的首都市政府第一任市长。马里奥·阿利卡塔在成立救济委员会并在使其发挥作用方面非常积极,这时他刚从监狱获释不久。 579

并不是所有的政治犯都获得了自由。那些以不同罪名受到军事法庭审判和判决的人仍然被关在监狱。这些政治犯中的许多人到9月8日还被关在军事监狱或受军事管制的普通监狱下属关押所,后来则又被转移到德国的集中营。在这些人中应当提一下的是鲁杰罗·赞格兰迪,他是最初一批法西斯持不同政见者的倡导人之一。他曾根据自身的悲惨经历,在他的著作中全面批评反法西斯力量,特别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做法(然而后来他成为意大利共产党的出色党员),因为他认为,它们在45天期间采取的态度是向政府和反对派委员会中的右翼投降。

6月17日,在意大利占领区尼斯附近的地方克罗斯卡涅,宪兵逮捕了埃米利奥·塞雷尼,这个事件是严重的,因为受害者是共产党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而且表明局势模棱两可的矛盾性。塞雷

尼曾领导意大利共产党人小组的活动，这些小组在意大利士兵中间散发地下报纸《士兵的话》，并同法国劳动群众一起成立了打击法西斯占领者的游击斗争组织。由塞雷尼领导的小组的行动目标是在意大利军队里发起成立一个反法西斯组织，把军官和应予打击的法西斯分子从士兵群众中孤立出来，因为他们是外国占领者。由于告密，塞雷尼、伊塔洛·尼科莱托（曾为西班牙加里波第纵队成员）以及34名士兵和下级军官被捕。塞雷尼本来是因从事恐怖主义活动而要不经审讯就被枪决的。7月24日他被押回意大利的桑雷莫。后来虽然法西斯主义已经垮台，但军事当局仍不肯释放他。甚至他还被递解到法国的布莱伊，让军事法庭对他进行审判。

在罗马，为营救塞雷尼开始了紧张的活动。博诺米、德加斯佩里和反对派委员会其他成员直接找巴多利奥交涉。刚刚出狱的埃多阿尔多·沃尔泰拉发起一场广泛的要求释放塞雷尼的声援运动。巴多利奥终于发电报命令中断审讯。由于工作失误（也可能是故意的），电报于8月26日审判结束后几个小时才送到布莱伊法庭。塞雷尼已经被判处18年监禁，尼科莱托则判为10年，其他人犯判刑较轻。这是政府玩弄两面派手段、分化有关各方的一大暴露，甚至巴多利奥本人也耍了两面花招。在一次越狱尝试失败后，塞雷尼和尼科莱托被转移到弗萨诺，只是到了1944年8月8日，依靠克塞尼亚·塞雷尼坚决执行一项大胆计划，他们才从都灵诺维监狱死里逃生。

塞雷尼和尼科莱托的危险经历突出说明释放政治犯和政治流放者的重要性。塞雷尼和尼科莱托之所以能够获得自由，是因为塞雷尼的妻子克塞尼亚·塞雷尼得以借助于党的巨大资源。如果没有这2000名共产党领导人对解放斗争的发展作出贡献的话，党和抵抗运动会是什么样子呢？

四、反法西斯政党

8月的几个星期在反法西斯政党热火朝天的重建工作中很快过去了。

在7月的最后几天,几乎在所有省份都出现了反对派委员会,但其组成情况则有所不同,原因是:在某些地区,参加当地委员会的是一些并没有参加罗马委员会的党,如共和党,或在另外一些地区,参加罗马委员会的党又没有参加当地委员会,如劳工民主党。委员会的组建和改组工作几乎总是按照罗马委员会的样式进行。由于有一个统一的中央组织,这就为建立反法西斯政党的工作指出了方向。

如果分析一下为建立政党而采取的数不胜数的行动和发起者凭着丰富的想象力而创造的众多的党的名称(这些发起者往往是在最后时刻才成为反法西斯分子的)的话,那就可以看出参加反对派委员会的各党所起的作用。由那些与旧的政治传统有联系的人们组成的政党占据主要地位,他们在法西斯时期就已经建立了以个人关系为基础的思想派别。那种主张成立应当代表深刻革新需 581 要的新党并取消被以论战的口气称为“老”党的党(因为这些“老”党只有老经验)的论点,在一批批意大利人争先恐后地迅速聚集在一些旧旗帜周围的现象面前,立即显得丧失吸引力,这些旧旗帜是在法西斯压迫的漫长岁月里精心保存下来的。

天主教民主党更改了旧的名称,立即取代了老人民党的地位;它虽然没有割断与天主教徒所组织的第一个党的密切的传统联系,但从一开始就成功地扩大了自己的基础,吸引了前些年天主教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的年轻力量。斯帕塔罗向新闻界和政府宣布了一条消息:1943年8月6日在米兰成立“天主教民主人士政治

研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着手在全国组织一个政党。8月17日，拉齐奥大区举行了一次会议，会上批准了在米兰提出的倡议。会上还提出一项指示：在每个省成立一个研究委员会，设立一名主席和一名书记。

由于德加斯佩里从法律上作出的慎重考虑，天主教民主党对于自己要作为一个政党公开出现犹豫不决，但它很快使自己拥有一个统一的党的结构，并在各地执行罗马所制定的路线，即积极参加反对派委员会的活动，并作为反法西斯运动的中间力量，在左翼和右翼之间起谨慎的调解作用。德加斯佩里拒绝了秘密出版《人民报》的建议，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触犯新闻法，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不致必须对巴多利奥政府的行为和体制问题作具有过多约束性的公开表态。

天主教民主党的建立以及它的基础立即达到的广泛性，使其他天主教倡议无立足之地，如杰拉尔多·布鲁尼曾发起成立天主教社会党或有人曾建立天主教青年左翼；天主教青年左翼在9月8日后变成由弗朗科·罗达诺和阿德里亚诺·奥西齐尼领导的共产主义天主教运动，后来该运动的大多数人并入共产党。

在社会党方面，社会党的传统势力使建立“新”社会党的打算落空了，例如巴索曾试图建立无产阶级团结运动。在米兰委员会的最初几次会议上，无产阶级团结运动代表（巴索）的签名是同意大利社会党代表（韦拉蒂）的签名并列一起的。在罗马委员会中，则只有意大利社会党（罗米塔）。在8月初，无产阶级团结运动的立场同意大利社会党的立场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社会党当时提出的目标是，通过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首先是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团结，建立民主共和国。社会党立即声明自己是主张团结的，并于8月4日在罗马签署了意大利社会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统一行动公约；据它说，它相信：两党的紧密统一行动是斗争胜利发展的主

要条件，斗争的眼前目标是同盟国签订和约，维护民族独立免遭希特勒威胁，争取建立充分自由的制度：和平、独立和自由。

维尔诺基和罗米塔代表意大利社会党，罗韦达和阿门多拉代表意大利共产党签署了这项协议。几个星期以后，9月28日，在已被占领的罗马，这项公约又得到意大利社会党的南尼、佩尔蒂尼和萨拉盖特以及意大利共产党的斯科奇马罗和阿门多拉的确认，并从理由上加强了说明。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团的组成表明，该党已有了一个新的和更有权威的领导班子。9月通过的文件提出了组织上的团结，以此作为有待通过加强统一行动实现的目标，同时还承认苏联是工人运动的先锋。

然而，无产阶级团结运动却把夺取政权问题放在首位，以便彻底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无产阶级团结运动第一个行动就是批评意大利共产党，指责它的联盟政策达到的是民族民主目标，而不是社会主义目标。意大利社会党和无产阶级团结运动对待共产党人的态度是区别二者的一个明显因素。在社会党人中间，至少在从事过地下斗争的党员中间，强烈希望建成一个单一的党。许多社会党人，其中有鲁道夫·莫兰迪，在离开监狱以后，曾在选择参加意大利社会党还是意大利共产党之前犹豫不决，后来决定留在意大利社会党内，以便进行旨在建立单一党的团结行动。

7月25日以后，社会党中的“老同志”立即纷纷觉醒过来，他们在各省立即成为重建“老党”的带头人，并作为得到承认的代表进入省、市反对派委员会。在45天时期，罗米塔在罗马的寓所成为社会党领导机构的临时所在地，许多老党员蜂拥而至，他们来表示支持和要求委任职务。这些老党员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倾向，有许多人还停留在法西斯前的改良主义和最高纲领主义立场之上，他们没有地下斗争的经验，也没有参加地下工作时期意大利社会党内

的讨论。许多人对共产党人仍怀有旧日的猜疑,但就当时来说,这种情绪已由于普遍承认意大利共产党在地下斗争中所作的贡献而有所缓和。

南尼和佩尔蒂尼是最早从蓬扎和文托特内获释的,而且他们立即同罗米塔、利扎德里和博齐取得一致。南尼具有长期领导意大利社会党的经验,并享有威望,是社会党国际领导机构的成员。佩尔蒂尼是唯一一个在监禁和流放年限方面可同共产党领导人相比的社会党人。他作为社会党人曾以自己的胆识得以把菲利波·屠拉梯转到科西嘉岛。正是这些人得到全国社会党人的拥护。

巴索发现自己落后于这场自发的重建工作;他认为,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反法西斯政党的重建工作普遍都是在法西斯以前时期的老领导人周围进行的。实际上,无产阶级团结运动的破产不仅是因为组织方面的因素和意大利社会党的根深蒂固,而且也有其政治原因。无产阶级团结运动提出的极端主义纲领不符合国家的需要,因为当时国家的需要是要求在为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中实现最广泛的民族团结。

巴索很快就承认无产阶级团结运动并入意大利社会党的必要性。无产阶级团结运动的组成有三个部分:社会党左翼的老战士,如维奥托和法布里;前共产党人,如科拉多·邦凡蒂尼;青年知识分子,如扎加里、科罗纳、韦基耶蒂。巴索于8月初抵达罗马;经过两天的讨论,他签署了准备合并的第一个协议。那次会晤决定召开重建党的会议。会议于8月22日在罗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意大利社会党、无产阶级团结运动和无产阶级联盟(由青年大学生组织的团体)的代表约30人。选举产生15人组成的领导机构,其中有:南尼、佩尔蒂尼、博齐、利扎德里、罗米塔、韦尔诺基、韦拉蒂、巴索、卢乔·卢扎托、欧金尼奥·科洛尔尼、马里奥·扎加里、图利奥·韦基耶蒂、卡洛·安德烈奥尼。会议没有记录,名单不确切。

南尼被选为书记和《前进报》社长，佩尔蒂尼和安德雷奥尼为副书记。根据南尼的建议，把一个空缺位置留给萨拉盖特，他从法国返回后仍在被监禁。

合并是在处于地下的《前进报》第二期特刊上刊登的纲领基础上实现的。纲领首先提出在明确认识无产阶级运动的革命宗旨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党同共产党合并为单一党的目标。在文件中，无产阶级团结运动的那种主要侧重革命的第二阶段的极端主义倾向很容易地就同南尼长期主张的最高纲领主义混合在一起了。南尼在他写的一篇评论文章中严厉地、言之成理地批评了7月25日的“宫廷革命”和巴多利奥政府的经验；文章最后提出了“从宫廷革命到人民革命”的口号，这是南尼提出的第一个富有鼓动性的口号，但他却没有说明他所指望的人民革命的方式和动力是什么。此外，文件还把为争取建立“劳动者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斗争作为“积极的具体的”解决办法。文件指出如下几点是人民革命的现实问题：1) 立即停战；2) 消灭法西斯主义和君主制；3) 由临时保国政府接管权力。在纲领中除了要求立即停战之外，对签订停战协定可能带来的问题只字未提。文件也无视为进行反对德国人的民族武装斗争的紧迫问题，无视为进行这样一场战争而实现更广泛的全国团结的必要性：这场战争必然是严峻的和残酷的，是劳动群众和士兵为反对纳粹敌人而进行的一场战争。当时距宣布停战和开始游击战争大约15天，而在社会党的决议中却丝毫没有说明开展游击战争的必要性。

这种无准备的状态正说明意大利无产阶级团结社会党之所以后来迟迟不能发动广泛的游击运动原因所在，它不仅落后于意大利共产党，而且也落后于行动党。在8月22日举行的合并会议上，具有不同政治倾向和文化素养的团体混合到一起，它们不得不共同相处，但始终未能真正克服最初的分歧。当1947年发生巴贝里

尼宫分裂^①时，萨拉盖特不仅把改良主义右翼收集到社会民主党内，而且还网罗了来自1943年无产阶级团结运动和无产阶级联盟的极端主义派别中的许多成员。那次合并会议选举卡洛·安德列奥尼为副书记更表明会议的混乱和不成熟；此人是个动摇分子，在企图变反对德国人的武装斗争为反对巴多利奥的将军们的武装斗争破产之后，他很快脱离了党。会议以后，莱利奥·巴索疏远了党的活动，对武装斗争问题采取公开的漠不关心立场，甚而同红旗派团体合作，这些团体激烈批评意大利共产党和意大利无产阶级团结社会党参加民族解放委员会，批评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使游击斗争具有全国性质。只是在一年以后，即1944年6月，佩尔蒂尼到达米兰后巴索才返回党内。

意大利无产阶级团结社会党就是这样在思想政治混乱中，通过缺乏足够的文化素养的各种派别临时拼凑在一起而产生的。党内本来就存在最高纲领派分子和改良派分子之间的旧日矛盾，这时则又加上其他一些矛盾，这些矛盾是法西斯时期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带来的，因为他们在党内找不到一个能使他们拥有文化、道德和政治素养并严守纪律的得力领导。在抵抗运动过程中，社会党人曾以鲜血作出崇高的贡献（参加8月22日会议的人当中被德国人和法西斯杀害的有：布鲁诺·博齐、欧金尼奥·科洛尔尼、罗伯托·韦拉蒂、马里奥·菲奥雷蒂），但在这期间，意大利无产阶级团结社会党一直在极端的、纯属宣传性的最高纲领主义和采取等待主义立场的改良主义之间摇来摆去，这就为后来的分裂提供了前提。

行动党的组织工作也是在政治混乱和不同路线的对立之中进行着。该党以“新党”的面貌出现，但仍然保持战斗的、不屈不挠的

^① 指1947年1月意大利无产阶级团结社会党在罗马的巴贝里尼宫正式分裂；萨拉盖特分裂出来，另组社会主义劳工党，后改称社会民主党。——译者

反法西斯传统，从乔瓦尼·阿门多拉到皮耶罗·戈贝蒂，从罗塞利兄弟到正义与自由的发起者（他们被判多年监禁），例如，埃内斯特·罗西、里卡尔多·鲍威尔和弗朗切斯科·范切洛。但是，1943年1月1日地下刊物《自由意大利》第一期刊登的七点纲领并没有像它预想的那样把党内不同的经历（从正义与自由的成员，如卢苏，到自由社会党人，如卡洛杰罗，到自由民主党人，如帕里和拉马尔法）都容纳到一个党内，容纳到一个更广泛、更激进的目标之中。⁵⁸⁶ 1943年8月中旬，埃米利奥·卢苏回到意大利，他看到的是正义与自由并入行动党已成事实。由于重新讨论合并问题已不可能，他在自由社会党人和其他派别的支持下，建议使党具有社会主义的特点，并从工人阶级和劳动者当中寻求党的基础。这种设想未能被拉马尔法、蒂诺、帕里、鲍威尔、费诺阿尔泰亚等人所接受，因为他们想使党成为一个民主党，不带阶级色彩，而且面向中等阶层。当然，主张建立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和以劳动者为基础的党（卢苏）同主张建立一个代表中等阶层的党（拉马尔法）二者之间的对抗，在吵吵嚷嚷的佛罗伦萨会议上并未得到解决，这个会议是在最后关头即9月5日和6日召开的，会上的激烈争论相反倒使矛盾的深刻性变得明朗化了。

由于如下事实使情况变得更加混乱：卢苏和拉马尔法在极力鼓动以成立共和制为先决条件方面彼此却接连起来，而反对其他行动党人（如路易吉·萨尔瓦托雷利和圭多·德鲁杰罗），这些行动党人当然同意建立共和国这个目标，但是认为，首要的问题是首先要保持各反对派的团结，而把解决体制问题推迟到战争结束后由人民作出最后决定。拉马尔法对巴多利奥政府的行径所作的强烈谴责，尽管有道理，却不能化为具体的行动建议，因而仍只不过是般的号召。这从以下一点就可以看出：帕里从7月26日起就对罢工的扩大和继续表示担心。

卢苏在罗马占领时期曾非法散发一本小册子，题为《国家的重建》，这本小册子的撰写和印刷是早在法国时就已经秘密完成了；卢苏在这本小册子里阐述了他的想法。针对七点纲领提出的目标即按照传统的分权办法建立一个代议制共和国，卢苏指出：法西斯国家不能改造，只能从政治、经济、军事结构方面摧毁它。在卢苏看来，现代国家的危机在于自由国家无力向社会主义社会演变。

佛罗伦萨会议未能积极克服如此深刻的矛盾，这些矛盾后来果然导致了1946年行动党的分裂。这次会议仅仅一致提出领导机构587 的候选名单，选出由里卡尔多·鲍威尔、弗朗切斯科·范切洛、乌戈·拉马尔法、奥龙佐·雷亚莱、曼利奥·罗西·多里亚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埃内斯托·罗西因身体不好未被选进执行委员会，他曾同阿尔蒂耶罗·斯皮内利一起在文托特内致力于制定欧洲联邦计划。几个星期后，埃米利奥·卢苏进入了执行委员会，他被迫留在罗马，而不能如原来所想的秘密地前往撒丁岛。被委任在全国解放委员会内代表行动党的拉马尔法与卢苏之间的矛盾是如此尖锐，以致连在准备秘密出版《自由意大利》几期的工作中，他们两个领导人都要一行一行地认真核对内容，卢苏的回忆录中就是这样写的。

行动党尽管在思想上分歧如此之大，但是它仍不失为坚定的反法西斯力量，它的党员有着严格的道德规范，因此，它有能力创立一个游击运动，即正义与自由纵队，这个纵队在解放战争中付出高昂的血的代价，它的贡献从党员人数比例来说是参加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所有政党中最大的。正由于行动党所作的这种慷慨牺牲（除了它在政治上不团结之外），后来使它无法拥有必要的力量来积极地解决并完成向合法地位的艰难过渡。

天主教民主党、无产阶级团结社会党和行动党，在重大考验到来之前曾以不同的方式利用45天这个时期来重整自己的力量，并

取得了不同的成果。相反，劳工民主党和自由党在组织方面作出的努力则很小。劳工民主党是梅乌乔·鲁伊尼为了能有资格参加反对派委员会而临时组成的。在法西斯以前时期的意大利，曾存在一个社会民主组织（尼蒂），它与自由党（乔利蒂）党是有区别的。但是，社会民主组织的遗产在法西斯统治20年期间已丧失殆尽，为在反对派委员会中能有一席之地，不是鲁伊尼以人力所能挽回的。

人们曾多次指出，在中央民族解放委员会中，为了对付三个左翼政党和天主教民主党，右翼不仅可以依靠自由党代表的一票，而且也可以依靠博诺米主席和梅乌乔·鲁伊尼（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党的代表）的两票。左翼曾把天主教民主党蛮横地算在右翼一边（而天主教民主党则自认为，而且实际上也是中间政党）；它在罗马，可以拥有3:4的票数，在米兰则是3:2。实际上，这种算法是一个政治错误。在民族解放委员会中，事实上实行的更多的是全体一致的原则，而不是均等原则（即分配给每个党以同样的权力），因为如果有一个党退出的话，那就会酿成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全面危机，并使其陷于瘫痪。1944年2月，在罗马就曾发生这样的事情，当时，博诺米离开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这曾使民族解放委员会恰恰在游击斗争所处非常严重的关头，一度陷于危险的停顿。

鲁伊尼在中央民族解放委员会起着有益的调和和调解作用，但是，劳工民主党则主要是为许多反法西斯分子进入民族解放委员会提供了条件。劳工民主党在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代表把一些反法西斯团体聚拢在他们周围，这些团体主要是自由职业者、国家官员、法官、军官，这些人都力图在法西斯以后的国家中得到一席之地。在纳粹占领时期，劳工民主党曾在罗马起了使工人运动和中间阶层之间实现联系的积极而有效的作用。对于社会民主主义分子来说，他们想必由于愿意始终与左翼有着更多的联系，因而才在劳工民主党和自由党之间作出选择，后来，他们当中一大部分人果

然在全国团结破裂以后合并到独立左翼运动或社会党里去了。在南部,由于劳工民主党代表在民族解放委员会里拥有位置,这就为法西斯以前时期的许多名人提供了在民族解放委员会内参与分担职责的可能性。这件事削弱了建立一个现代的、能够向中等阶层提供一个政治组织的自由党的工作,正因自由党力量薄弱,这就使中等阶层不得不从天主教民主党那里找到自己的代表。正是在那几个月里,一大部分见风使舵、投机取巧的老民主人士(但是,他们一度也曾投靠法西斯主义)就过渡到天主教民主党里去了。

自由党的重建之所以受阻,其原因除了已建立劳工民主党之外,还因为许多民主自由分子参加了行动党,而且那些自由党的“大人物”——克罗切、奥兰多、德尼科拉、索莱里、帕拉托雷,还有尼蒂——对于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党也起了消极影响,因为这些人都是不能接受起码的纪律约束的。亚历山德罗·卡萨蒂表现得最为谦虚,最不计较个人得失。主张重建自由党的青年发起者们力图掀起为政治作准备的文化运动。他们没有准备制定一个政治纲领的想法,而在7月25日以后问世的小册子《现实》当中,他们甚至声称,在国际事件结束以前,自由党不应当制定一个明确的行动纲领,因为这些国际事件结束以后,欧洲会出现新的格局,会产生各种力量必须考虑的政治社会现实。主张重建的自由党人并不是作为纲领的制定者出现的,而是要发起对有关全国重建问题展开讨论。

路易吉·埃伊纳乌迪对这场讨论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秘密出版了两本小册子,即:《自由党经济政策概论》和《争取建立欧洲经济联邦》。埃伊纳乌迪尽管维护自由市场的重要性,却指出必须进行重大改革(消灭大垄断集中组织和大庄园土地),使中央分权的国家(不设省督)成为总体经济活动的“调节者”。此外,埃伊纳乌迪还指出实现欧洲经济联邦的前景。埃伊纳乌迪和罗马的青年自

由党人的文化运动并未得到发展。

在自由党内最保守的力量占了上风，它们关心的是保证法西斯上台以前和法西斯统治时期的国家的连续性，维护旧的结构。这就不能创造一个现代化的自由党。这导致后来许多民主自由派人士相继离党，使自由党日益朝保守方面退化，最后滑向右翼，并且陷于无法制止的衰退。

事实是：通过自由党人在民族解放委员会里采取的做法，正是那些如莱奥内·卡塔尼那样的在1943—1945年期间的自由党领导人本身使路易吉·埃伊纳乌迪的著作中所指出的“全国重建”成为不可能，因为这些自由党领导人认为，国家的连续性是首要的，并反对发展以民族解放委员会为基础的中央分权式的民主制。由于自由党无力提出国家改革和社会改革的问题，这就给天主教民主党的活动提供了地盘。天主教民主党在德加斯佩里领导下提出了广泛的改革计划，从而扩大了它的群众基础，而与此同时，又保证缓慢地、拖沓地、有限制地执行这些计划，以便向特权阶层提供维护他们地位的保障。

五、共产党的跃进

7月25日以后，原来由国内中心设置的薄弱的组织结构受到590一股入党浪潮的冲击，入党者不仅是以个人名义。工厂和劳动场所的工人和劳动者在向共产党人靠拢，因为共产党人早在3月罢工中，说得更广泛些，在全国，在7月26日的罢工和示威中，已经表现出是一些共产主义战士。人们靠拢和热烈拥戴那些曾遭受迫害、多次被捕、多次受到恐吓和警告的共产党人，特别是那些遭到特别法庭审判、被监禁和被流放的共产党人。2000名在8月获释的同志形成许多吸收党员的中心。除个人参加党之外，还有一些

团体集体入党的，这些团体早在地下斗争时期就成立了，它们很久就寻求同党取得联系，但未能如愿。

如果说，在7月25日以前和党有联系的共产党人的数量以5000计，那么在计算那几个星期的人数时则要乘以10了。党并无顾虑地向新入党者开门，某些采取猜疑关门立场的例外情况则除外。党对新党员不进行挑选，不进行思想意识的考察，但要求他们为执行政治纲领而斗争，政治纲领的中心内容是必须为意大利民族的独立与自由而斗争，也包括拿起武器来进行这一斗争。人们心向共产党的基本原因，当然也有对苏联进行反对德国侵略的胜利的卫国战争和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表现的团结一致的钦佩和敬仰之情。这其中也有斯大林的威望，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斯大林格勒——的胜利更使他的名声大振。但是，这里面也有意大利共产党人所提供的明证，他们在地下斗争中所占据的地位，还有这样的事实：即在5000名受特别法庭审判的人当中，4500名就是共产党人。这其中也有党所提出的纲领的政治威力，这个纲领符合意大利人民的起码利益：把国家从纳粹的统治和法西斯卖国贼的手中拯救和解放出来。伟大的爱国热忱激励着工人阶级和意大利人民，而意大利共产党并没有厮守着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立场，它懂得把这种热忱聚集起来，并使之转化为组织力量。这并不是说，有些党员乃至有些团体和组织尚未受到与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前景相联系的原始观念的影响。相反，这些立场表现得非常广泛，并且在抵抗运动的过程中不断公开地反复出现。事实是，为克服这些立场，更多的倒不是要进行简单的教育工作（况且，这一工作也并不是没有做），而是要通过开展政治活动，要依靠共产党人和反法西斯分子在解放战争中的亲身经历，要遵循来自游击斗争需要的这一经验教训。

地下斗争时期的党的那些老战士（那时党是个人数很少的干

部党),立即成为在那几个星期出现的新党的领导。虽然在老党员之间也存在意向上的差异,然而,这并不影响他们按照基本正确的方针指导党的扩大和革新进程。他们深受青年人的尊敬,他们对青年人的这种感情报以很大的信任,确信在即将到来的不可避免的牺牲考验面前会严格地筛选出最优秀分子。

7月25日以后,国内中心忙于党的不断壮大的力量的组织工作、成立省委员会,并不误时机地建立一个可靠的联络网,这个联络网在早已预见到的游击战争开始以后表明是很宝贵的。那几个星期,国内中心的工作集中在亚平宁山北部地区,当时人们普遍预计盟军会在罗马北部登陆,其实这种预计是错误的。然而,一个强大的联络网毕竟是建立起来了,甚至延伸到托斯坎纳和马尔凯两大区。同翁布里亚、阿布鲁奇和南部的联络工作交给住在罗马的同志们负责,但是,他们不具备能进行必要工作的任何机构。

组织工作的进行,密切配合努力发动新的罢工浪潮,目的在于日益坚持要求签订停战协定,释放政治犯和政治流放者。这些任务当时被视为头等重要的任务,并且交给马索拉、罗阿西奥和诺韦拉去完成,国内中心的任何其他活动都服从这些任务。对秘密出版由内加维莱负责的《团结报》工作也很重视,曾散发7月27日、8月4日、12日和22日以及9月4日和8日几期。意大利共产党在米兰反对派委员会的代表当时由乔瓦尼·格里利担任,9月15 592日以后,由朱塞佩·多扎接替任代表;多扎只是在那时才从法国返国的。

8月14日和15日在米兰召开国内中心会议,阿门多拉应召从罗马赶来参加。那时,国内中心同阿门多拉的接触一直相当少,尽管委托他完成以下重大任务:作为全国反对派委员会代表、重建罗马党组织、同那不勒斯和南部地区联系。虽然多次强烈要求,直至8月3日,罗韦达才抵达罗马,加强国内中心的罗马代表团。但

是，罗韦达立即又忙起工会问题来了。因此，不得不研究工作进行的情况，并加强罗马代表团。米兰会议因严重轰炸而多次中断；那几夜的轰炸恰恰针对着米兰，8月15日和16日，这个城市因为多处起火而遭摧残。

对人们在罗马所执行的政治路线，米兰会议并没有提出公开批评。然而，如下指责却是不言而喻的：即指责人们在罗马过分重视全国反对派委员会的活动和同巴多利奥政府的关系问题，而损害了组织工作和发动工人群众。这特别是马索拉的立场，而罗阿西奥、诺韦拉和内加维莱并不同意这个立场。马索拉未加明确提出的这些批评，正是9月8日以后对罗马的领导集团公开提出的更加激烈的批评的先兆，这些公开提出的批评是：过分注意全国反对派委员会的活动（该委员会被指责为只高谈阔论），很少动员工人，游击活动也未得到发展。然而，就当时来说，人们在罗马所进行的工作还是被通过了。

鉴于当时法国共产党对国内中心提出了批评，而且陶里亚蒂似乎也间接地提出了批评，通过罗马的工作和共同承担责任就有了更大的政治意义。7月27日，在法国里昂，意大利人民团结行动委员会召开会议，萨拉盖特、卢苏和多扎出席。会上重新确认了3月3日协定，并签署了反对德国占领意大利的呼吁书，争取立即消灭法西斯主义，恢复政治自由，释放政治犯，对盟军表示声援。与米兰委员会签署的呼吁书相比，上述呼吁书提出的要求是一致的。只缺少成立全国团结政府一条，这是因为不仅是卢苏，而且还有萨拉盖特，都提出要以成立共和制为先决条件，以此来对抗。事后，与会者分手，设法返回意大利；他们终于返抵国内，但时间已晚：卢苏于8月中旬抵达，萨拉盖特则停留在都灵，多扎只是在9月15日才来到米兰。

在里昂采取的立场与在意大利采取的立场没有多少差距。国

外局的多扎、帕罗迪、普拉托内、兰普雷迪、马采蒂、斯科蒂、苏阿尔迪、迪娜·埃尔米尼、玛丽亚·贝尔加米尼等共产党人还留在法国。弗朗切斯科·利昂纳、亚历山德罗·瓦亚、阿里斯托代莫·马涅拉，泰雷萨·诺切和多梅尼科·丘福利则仍在法国和德国警察局手中。其中一些人，如斯基亚帕雷利、朱利亚诺·巴叶塔和马涅拉得以逃脱，他们在法国游击队中停留了一段时间以后返回意大利，并参加了游击斗争。其他人，如泰雷萨·诺切和丘福利被直接投入纳粹集中营。共产党人小组在其他国家也组织起来了，在突尼斯的有韦利奥·斯帕诺和加利科兄弟；在阿尔及尔的有毛里齐奥·瓦伦齐；在埃及亚力山大的有雷纳托·米耶利、迪娜·福尔蒂和福斯塔·恰伦特。英美军队登陆以及德国人和法西斯分子从整个非洲沿海被赶走，使意大利的共产党人和反法西斯分子得以在阿拉伯国家开展联合行动。

由于国外局核心小组的同志远离意大利，不了解7月26日国内中心制定的路线，对意大利形势的许多方面不甚了了，他们出版了一期《斯巴达克通信》，抨击巴多利奥政府继续战争和行使独裁的政策。留在法国的意大利同志们认为，国内中心对继续作为德国盟友并依然占领法国的政府未立即采取公开决裂的态度是不可理解的。除了出版一期《斯巴达克通信》外，还发表了意大利人民团结行动委员会呼吁书。这些宣传品传到都灵以后，在政治上造成一定的混乱，因为它们的路线与《团结报》确定的路线不一致。

宣布博齐和罗韦达为工会专员以后，上述分歧进一步加剧了。8月8日（实际日期要晚）出版的第47期《斯巴达克通信》猛烈攻击博齐和罗韦达同巴多利奥政府的“希特勒代理人”合作。该刊甚至写道，他们要么是两位战士，出于好心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应辞职以尽快改正错误，要么则是投向敌人的两个“叛徒”。

由于法国共产党领导机构的公开批评，这就使兰普雷迪和留 594

在法国的共产党人的态度更加强硬了。在9月6日和12日的两封信里，法国共产党批评意大利共产党没有更强有力地谴责与希特勒结盟的政府首脑巴多利奥的政策。它还批评意大利共产党听任巴多利奥政府利用共产党人罗韦达为其作宣传。8月23日《新闻报》发表毛罗·斯科奇马罗答该报记者问，这件事也受到批评，但是，这篇采访在意大利却留下良好印象，并得到很高的赞扬。国内中心在马索拉签发的电报中（电报落款日期是8月10日，但其实至少是三天以后才写成的）力求通过南斯拉夫中心向陶里亚蒂解释罗韦达接受任命的原因，其中主要是：要重建劳动者的自由组织，并且明确表示不对政府的总政策负有责任。马索拉在电报里没有提到其他两项具有更大约束力的条件：保证进行停战谈判和释放政治犯。

国内中心拒绝了法国共产党的批评，尽管这些批评似乎从莫斯科同志们亦即陶里亚蒂的消极看法中得到确认，这一事实表明国内中心的政治团结达到何等程度。当然，国内中心的每个成员的信心大小程度不同。未经多少抗拒就接受把罗韦达仅仅委任为副专员，而社会党人博齐却获得专员的职务，这件事使许多人感到不悦。文托特内领导委员会在8月13日的信中曾提醒说，这不应当意味着从一开始就承认社会党占有比共产党领先的地位，并说，这一地位是不符合实际的力量对比的。因此，阿门多拉受到了批评，因为他被认为采取了这种过于软弱屈从的态度，而且这种态度又从他曾提出如下要求得到了证实：即他曾向博诺米提出，在未来将要组成的全国团结政府中只要求有两名部长职位。但是，这不过是个人的看法，还不是什么集体的批评。阿门多拉作了自我辩护，他说，在一个尚待组成的政府中，力争得到更多的职位是不适宜的。为596 确保党的作用，重要的是对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对明天的游击斗争所作的实际贡献，而不在于取得政府职位的多少。

14—15日的米兰会议结束时决定加强罗马领导中心，并派诺韦拉参加这个中心（他将负责全党的领导工作），让阿门多拉担任反对派委员会中的代表，并为迎接不可避免的战斗，负责党在军事方面的准备。

在米兰还讨论了即将释放政治犯和政治流放者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会议决定，让所有获释者都返回各自住地，以便立即参加地方和省的领导班子。必须同文托特内党组织的代表团进行一次会晤。决定建议成立统一的领导机构，该机构应由国内中心全体同志和文托特内领导委员会指定的四名同志组成。这样，经过考验的一些杰出战士——从阿尔图罗·科隆比到贾恩卡洛·巴叶塔——就暂时没有参加领导机构，但是，领导机构保持较少人数看来是有益的，因为要在严格的非法处境下开展工作，同时也要使国内中心成员占居一定的主导地位，因为他们可以保证政治和工作方针的连续性。马索拉曾坚持主张在米兰开会，但是，在罗马召开会议的意见占了上风。

六、领导机构的成立

8月18日开始释放政治犯，但又延误了几天。一些被释放的人，如谢嘉，只回家看了一下后又重新前途未卜地离开了家。必须保证与会者有一定的安全，因此会议只能于8月29日在玛丽莎·钦恰里·罗达诺家中举行。会议的组织工作委托马里奥·阿利卡塔进行，他当时已经成为罗马一批新党员中最有才干、最有战斗力的领导人之一。在此之前的一些日子里，斯科奇罗马和隆哥已经详细了解了国内中心的活动，了解了它提出的倡议，它在反对派委员会所持的立场以及大批新党员踊跃入党的情况。

这次会议在与会者心目中，立即显得像是一个重大事件，因为

596 属于不同世代、拥有种种独特活动的战士们在会上聚集一堂。会议向大家公认的党的领导人陶里亚蒂致以敬意。大家怀着激动的心情悼念了安东尼奥·葛兰西和其他牺牲的同志。会上长时间地分析了党的状况，并讨论了对同志们的使用问题。会议向国内中心的成员们说明了把卡米拉·拉韦拉和翁贝托·特拉齐尼开除出党的原因，以及因此不能委任他们以工作任务的理由。上述通告是由斯科奇马罗做的，他的语气没有商量余地，除非想要利用这次如此不同寻常的会议单只研究这一令人痛心的问题。

会议也研究了迪·维托里奥的问题，仅仅批评他在被捕前在巴黎所犯的秘密工作中的错误，而没有批评他在德苏条约签订后所采取的立场。因此，出于秘密工作考虑，决定不吸收他参加领导机构的工作，而是委任他负责研究成立统一工会问题，并进行必要的联系。后来证明，这项决定是非常有益的。

总的说，会议通过了国内中心7月25日前后所进行的工作，包括任命专员。只就一点提出意见，即，意大利共产党虽然充分参加反对派委员会的工作并提出具体建议，但应当更突出地开展自主行动，以求自下动员群众和成立群众团结委员会。

批评国内中心在开展联合行动过程中，未能把党的自主行动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这一点后来在罗马中心和米兰中心之间发生争论时又重新提出来，并且有了更大、更严重的政治意义。在这首次会议上，提出上述批评只不过是略微触及，而且语气也是不容反驳的：党的自主行动从来就不够突出。批评的真实意图是：自主行动之所以不突出是否由于过高估计团结委员会的作用。正是在这种更加严重的意义上后来才又重新提出了这一批评。

但是，中心问题是实现停战。阿门多拉汇报了谈判的状况。他根据从贾伊梅·平托尔那里得到的情报，可以保证：这是日子多少的问题。党在7月25日后据以制定政治路线的那种设想被证明

是有根据的。停战协定将根据盟军司令部提出的极为苛刻的条件签订。但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军事形势下宣布签署停战协定呢？盟军将在罗马北部还是南部登陆呢？能否保卫罗马将取决于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事实上，虽然意大利军队的数量大大超过德国军队，但是德军的装备、运输工具、战斗素质使它占有实际的优势。意大利军事力量中存在着严重的组织混乱，内部矛盾激化，还有与德国敌人勾结的“第五纵队”。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设想意大利指挥机关能够利用现有的力量和人民的支持，至少求得争取时间，保卫罗马，直到盟军到来。因此，阿门多拉最后说，必须加强对巴多利奥政府的批评，但批评集中到决定性的一点，即对反对德国人的斗争缺乏军事和政治准备，而德国人在宣布停战时将毫不犹豫地利用他们在意大利的军队控制局势。于是，当时决定把这个问题立即提请反对派委员会注意，而且可以先提交已决定次日召开的三个左翼党（意大利共产党、意大利无产阶级团结社会党、行动党）代表的会议，以便更好地协调三党的行动和加强左翼在委员会中的地位。

597

当时成立了意大利共产党领导机构，由如下同志组成：斯科奇马罗、隆哥、谢嘉、利考西、罗阿西奥、马索拉、诺韦拉、罗韦达、内加维莱和阿门多拉。决定把领导机构分为两组：一组在罗马，有斯科奇马罗、隆哥、诺韦拉、罗韦达、阿门多拉；另一组在米兰，有谢嘉、罗阿西奥、马索拉、利考西、内加维莱。如果盟军在罗马北部登陆或长驱直入首都，罗马小组就应当同委员会的其他政党一起解决成立全国团结政府的问题，这种政府有能力促进广大的意大利人民同盟军并肩战斗，进行反对德国人的战争，动员人们采取行动，支持敌占区人民的武装斗争。米兰小组则起领导共产党人开展游击战争和群众斗争的作用。但以上设想并未实现。

在被占领10个月的罗马，罗马小组也不得不应付武装斗争问 598

题。两个小组之间的关系变得困难起来，因为在8月29日的会议上未能任命领导机构的书记，哪怕是临时性的。书记的人选本应是毛罗·斯科奇马罗，当时大家默认，他起着领导机构最高领导人和活动协调者的作用。然而，只差正式承认，而斯科奇马罗也并不希望这样，总之，他当时没有提出这个建议，据说，他这样做是为了不致在陶里亚蒂返国以前造成既成事实，但是，后来表明，其中也有其他个人的保留。

会议结束后留下许多疑问，因为关键问题都没有解决，而且缺少必要的时间来深入探讨党的政策。领导机构的两个小组（罗马小组和米兰小组）本来在罗马被占领的10个月中就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产生分歧，而在那唯一一次会议上又没有能够就有关党的路线的一些主要问题更广泛地交换意见，上述分歧也就更加严重了。然而，为了在艰巨的抵抗运动时期肩负起领导党的任务，毕竟还是不误时机地成立了一个领导机构。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陆续创立了党的三个领导中心，但仍然不可能建立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9月7日晚，欧金尼奥·雷亚莱从北部流放地来到罗马，他立即被派往那不勒斯，在那里组织一个南部领导中心。这项工作是由他同卡恰波蒂（从监狱被释放）和马尔切洛·马罗尼（从流放地来到南部）两位同志一起做的。南部中心后来又由于韦利奥斯帕诺的到来而得到加强，但其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还是很困难。在建立省组织的工作中，未能依靠少数获释同志作出的贡献，除了某些人口稀少的地区之外。意大利共产党在南部的地下活动薄弱也表现在政治方针的混乱以及广泛存在的最高纲领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唯平民主义倾向。只是到了1944年3月第一次全国谘询会议召开以后，形势才开始好转，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参加了这次会议。

在罗马有一个领导中心，在米兰又有另一个领导中心，后者因

隆哥从罗马到来而威望大增；他的这一行动并未得到领导小组的同意，而8月29日的会议上，他是被任命为小组成员的。意大利共产党1943—1945年的历史应当被看作是三个领导中心展开活动的历史；只是1944年6月随罗马解放以后，这三个领导中心才减为两个，当时由陶里亚蒂在罗马成立了全国领导机构。⁵⁹⁹

党在三个地区进行的活动不可避免地要互相联系，而在“萨勒诺转折”以及承认由陶里亚蒂领导的罗马小组在北部的领导作用之后，这种联系就变得绝对不可少了。

七、停 战

29日当晚，立即讨论了当时的中心问题。贾伊梅·平托尔带来的消息说，停战协议很可能已经达成，人们希望短暂地推迟一段时间公布这个消息，以准备保卫罗马。隆哥立即起草了“关于迫切需要组织保卫全国工作以反对德国占领和突然袭击威胁的备忘录”。本书现不再采用不转载党的文件全文以免文章松散和冗赘的做法，收进“备忘录”全文，因为这是意大利共产党发动抵抗运动的第一个行动：

1943年8月30日

继续进行战争违背意大利的利益，只迎合德国帝国主义和纳粹集团的需要。意大利人民一致的、最迫切的愿望是实现和平。

在意大利驻扎德国军队，是与实现和平背道而驰的。德国军队的继续涌入，表明纳粹政府决意干涉我们国家的内政问题，助长法西斯分子阻挠意大利人民为实现和平而采取的自由行动。

因此，必须铲除一切阻止迅速实现和平的障碍。为此目的，必须做到：

- 1) 立即坚决废除同德国的联盟与合作条约；
- 2) 同联合国家签订停战协定；
- 3) 准备以武力击退德国或法西斯旨在对抗意大利人民和平愿望的任何

行动或干涉；

4)在同德国军队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下,所有军事组织,包括处在暂时被德国占领的地区的军事力量,都应当接受命令,以全部力量同篡权者进行斗争,反对任何妥协或投降思想;

600 5)组织军队和人民之间的军事合作,建立并武装人民团体,使这些人民团体继承意大利复兴运动时期的加里波第光荣传统,赋予战争以鲜明而具体的解放和民族独立特点;

6)在各地建立军事指挥部与民族阵线代表之间的接触与合作,以适应斗争的一切需要;

7)发展军队与人民之间的亲善政策,防止武装力量对人民群众采取任何敌对行为;

8)在国家机构中、地方政府中和军队中肃清一切法西斯残余,解除全国安全自愿民兵的武装,把一切法西斯分子和法西斯同情分子从指挥岗位清除出去。与此同时,应当把具有可靠的民主信念、决心同德国占领者及其工具——意大利法西斯分子斗争到底的人们安排到责任最大的岗位。

8月30日,左翼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是:南尼、萨拉盖特和罗米塔代表意大利无产阶级团结社会党;拉马尔法、卢苏和鲍威尔代表行动党;斯科奇马罗、隆哥和阿门多拉代表意大利共产党。隆哥介绍了他的备忘录,备忘录基本上被接受了。当时决定成立三党军事委员会,由隆哥、佩尔蒂尼和鲍威尔组成。会上通过了一项动议,建议加强民族阵线的组织和行动,以反法西斯政党组成的政府代替巴多利奥政府。在释放政治犯以后,停战即将实现,这就迫使、而且也允许反法西斯政党在反对巴多利奥政府方面有了新的特点,即不再仅仅是敦促和施加压力,而是为取代巴多利奥政府而斗争。直到8月18日为止,一直控制在政府手中的抵押品(受监禁的大约2000名共产党领导人),随着他们的获释也便取消了。

斯科奇马罗和隆哥来到罗马也在反对派委员会内部创立了意大利共产党与其他党之间的新关系,使人们很快理解到共产党所

掌握的人力在文化和政治上的素养。左翼统一协调机构的成立使德加斯佩里警觉起来，并且感到恼火，他指责共产党人有意使用变化多端的策略：先是同社会党人订立统一公约，继而同意意大利无产阶级团结社会党和行动党成立左翼协调委员会，后来又成立反对派委员会，而在委员会中，左翼联合起来，把天主教民主党赶向右翼。德加斯佩里声称，天主教民主党是不会接受被说成是右翼党的。 601

三党军事委员会的建立和越来越多的关于即将签订停战协定的消息，促使反对派委员会在9月2日召开的全体会议上通过这样一项动议(斯科奇马罗代表意大利共产党参加了这次会议)：根据三党文件指出的路线，要求准备反对德国的战争。反对派委员会认为，在宣布停战的同时着手成立反法西斯团结政府的时刻已经到来，这个政府可以保证能发动意大利人民同德国占领者作战，并使人民与军队紧密地团结起来，作出共同的努力。9月4日，反对派委员会本应把会议通过的这项动议直接提交巴多利奥，但他事先得知了动议的内容，宁可只接见博诺米，回避召开一次会议的要求。巴多利奥硬不准把动议全文公布于众，因为在严重的事态发展前夕，必须避免在宣布停战以前，为德国军队的干涉提供口实。4日下午，反对派委员会被迫同意巴多利奥的要求，决定严阵以待，对付即将发生的严重事件。这是软弱无力的又一次表现。这再次证明，为切实组成全国团结政府，光是提出有关要求是不够的。

意大利共产党5日得到消息：两天前，即9月3日，已签订了停战协定。共用了15天多的时间，才使卡斯泰拉诺将军得以消除对方的一切疑虑，保证自己的身份和递交国书，国书正式介绍他是受权签署停战协定的政府代表。卡斯泰拉诺曾设法首先争得延期宣布停战和盟军先在罗马北部登陆的许诺。盟军司令部对巴多利

奥政府在7月25日以后的所作所为,很不信任,因为它仍配合德国继续进行战争,并且很晚才派出全权代表,而卡斯泰拉诺的行动也是可疑的,又没有国书,后来才委派了另一名全权代表即扎努西将军。

艾森豪威尔将军不愿提供关于宣布停战时间和选定登陆地点的情况。为了照顾卡斯泰拉诺将军,曾大加虚张声势,以便使人相信已成立了大规模的登陆部队,使盟军在意大利半岛的行动能得到决定性发展。其实,英美对意大利问题的计划规模是很小的。人们根本没有预计到,意大利战线会起重要作用。其实,盟军军事行动的目的是要把一定数量的德国师从俄国战线和法国海岸防线上撤下来,而吸引到意大利半岛上去。对罗斯福和美国司令部来说,首要目标一直是在法国开辟第二战线,而对丘吉尔和英国司令部来说,首要目标则是从欧洲大陆的“软腹部”,亦即从巴尔干半岛和多瑙河平原中心地带来打击德国,以便更直接地打击德国的核心,并在苏联军队到来之前就占好地盘。对意大利半岛的控制应当用来掌握一些基地,以便有效地进攻在南斯拉夫、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军。

在英美战略格局中,意大利占有次要地位。因此,用于登陆的力量,特别是空军力量,是有限的,这种情况就促使盟军在离西西里基地较近的南部海岸选择登陆点。这些信息对卡斯泰拉诺将军是保密的。甚至宣布停战的日期也没告诉他。只告诉他宣布停战的日期不超过9月15日。卡斯泰拉诺将军所得到的只是,盟军研究了向罗马各机场空投一个伞兵师的可能性,其目的是配合保卫罗马,等待英美军队到来。泰勒将军于9月7日被派往罗马,协商这个师的着陆事宜。但是,由于德国人对机场的控制,不宜采取这一行动。泰勒将军确认宣布停战在即,同时盟军将在罗马南部登陆;8日晨,他乘飞机离去,使意大利政府和军事指挥机关陷入惊

愕和惶恐之中。

巴多利奥政府曾把同德国人作战的准备工作限定在发表“44行动纪要”，这份纪要曾发给大部队的军事指挥官们，并命令收到后立即销毁。但并不是所有指挥官都声称收到过这份纪要。不论如何，只有在确切认可执行纪要以后才应当执行这项命令。为了保卫首都，唯一规定采取的措施是把机械化军集中到卡尔博尼将军的指挥之下，该军由四个师组成，它们是：阿列特师、皮亚维师、格拉纳蒂耶里·迪萨尔德尼亚师和琴塔乌罗师，这些师缺少装备，特别是缺乏汽油。 603

艾森豪威尔将军打破了一切拖延做法，于18时通过阿尔及尔电台宣布签订停战协定。这颗炸弹在罗马爆炸了；在那里，政府和司令部还在期待再延续几天。英美在萨莱诺登陆的消息公布以后，恐慌更加剧了。根据最佳预计，登陆军队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战胜德军的抵抗和开进罗马呢？一味等待英美军队到来，又如何才能保卫罗马呢？在争论激烈的一次王室内阁会议上，应当负责保卫首都的卡尔博尼将军竟然建议不要承认宣布停战的消息是真实的，并建议向德国人保证政府愿意继续进行战争。对签订停战协定采取这种否认态度，并没有带来任何实效，而只能增添混乱，把巴多利奥政府取得的唯一积极成果一笔勾销。

卡尔博尼的这一建议遭到拒绝；19时30分巴多利奥在电台宣布停战。人民对这一消息没有表现出任何高兴的情绪。大家都懂得，同盟军停战还不意味着和平，而只不过是一个新的战争阶段的开始，这场战争的敌人是意大利人民早已领教过的，他们领教过这个敌人的残忍和嚣张。

当停战消息传来时（18时刚过），反对派委员会正在博诺米家开会。人们对这一消息并不感到意外，尽管有的人期待或热切希望消息能推迟几天。散会时大家同意次日早晨继续开会。每个与

会者纷纷与自己的党联系，以决定采取什么必要措施。时候已经到了，但是，罗马保卫战能持续多久呢？

隆哥已经担任意大利共产党军事力量的指挥。9月7日，在圣天使古堡和圣灵医院之间的沿泰伯河路地段，隆哥检阅了爱国行动队武装战士后备人员小组。根据巴多利奥的决定（由其子马里奥通知此项决定，卡尔博尼将军实施），8日晚预计发放一批枪支。9月4日，巴多利奥曾同各反对派发生冲突，在这以后，他想表示自己有促进而不是阻挠动员人民的愿望。卡尔博尼将军通过他的副官德西开始与朱赛佩·迪·维托里奥接触。隆哥决定接受提供的武器。武器的发放是在9月8日夜进行的。共产党人安托内洛·特龙巴多里、罗伯托·福尔蒂和林多罗·博卡内拉领取了武器，确切地说是170支短枪和91支步枪。从军事角度说，武器不多，然而却有政治意义。遗憾的是，当天夜里一部分武器被警察局没收了。

在同一时刻，随后则是在9日那一天，全意大利的反对派委员会都要求军队司令提供武器以成立民族阵线小队。普遍遭到拒绝。只有少数几个军官和下级军官（如库内奥地区的蓬佩奥·科拉亚尼）采取行动，在一片混乱中获得了一些武器和战争物资，为首批游击组织的建立打下宝贵基础。早在几天以前，反对派的代表就提出为民族阵线提供武器的要求，但没有取得积极成果。司令部也以程度不同的威胁手段拒绝了这些要求。随着获释的同志们的到来，党组织在政治上得到了加强，这些获释的同志有米兰的吉罗拉莫·利考西，都灵的贾恩卡洛·巴叶塔，波洛尼亚的阿尔图罗·科隆比，佛罗伦萨的朱赛佩·罗西（仅列举几个城市的情况）；于是，党组织在宣布停战后，立即行动起来，推动人民的武装动员。9月9日和10日，共产党人战斗小组开始向山区进发，这就为那些不致被德军抓获而潜入丛林的军官和士兵提供参加这些战斗小组的

初步机会。

王室内阁会议召开之后，决定把政府和国王所在地南迁，这导致了军队的瓦解。这项决定是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在一片混乱和恐慌当中实行的。在电台宣读的通告全文，又一次是模棱两可的。在承认不可能进行一场力量悬殊的斗争之后，命令各地的意大利军队停止同英美军队的一切敌对行动。但是，命令肯定没有清楚地指明，新的敌人究竟是谁。因为它说：意大利军队应当对“来自任何方面的可能的进攻”作出反应。没有确切说明：这种进攻不是“可能的”，而是肯定的，也不是来自不可捉摸的“任何方面”，而只能是来自一方即德国军队。各级指挥部没有指令可循，各行其是，既有凯法洛尼亚岛驻军司令甘丁将军的英雄主义^①，又有阿达米·605 罗西将军的叛逆行为。

如果说国王和政府抛弃罗马的做法是可以置疑的，那么，他们离去则本来不应妨碍采取必要的行动，以便不论如何给武装力量发出一些抗击德国人的明确的具体的命令以及安排政府工作和坚决保卫罗马的明确指示。然而，他们对南迁的决定却力图守口如瓶。这毕竟不能阻止大队逃亡者在一片混乱中紧跟在国王和巴多利奥的汽车后面，他们二人是于9月9日凌晨5时出发，沿着蒂布尔蒂纳路前往佩斯卡拉的。罗阿塔将军离去时也没下令执行“44纪要”，反而命令卡尔博尼将军把装甲军撤到罗马郊外的蒂沃利，以便掩护逃亡。

王室大队人马毫不受阻地抵达亚德里亚海岸。9日夜间，国王和政府登上辅助舰，他们的行动仅受到乱哄哄逃亡人群的阻挠。因为没有德国人的干扰，这样就产生了巴多利奥和凯塞林串通一气

^① 凯法洛尼亚岛位于爱奥尼亚海，19世纪起归入希腊属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停战之后，意军有5000人驻扎该岛，1943年9月曾同德军英勇作战，最后被残酷歼灭。——译者

安排逃亡的说法。即使不同意双方直接达成协议的说法（因为缺乏证据），如下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即凯塞林是有意促使国王和巴多利奥逃走，这样就可以加速意大利军队的瓦解，并阻止保卫首都。德军司令部迫切需要把牵制在首都罗马周围的部队调动开来，用于阻击在萨莱诺登陆的英美军队。意大利军队虽然没有司令部指挥，并处于组织混乱状态，却仍能进行抵抗，保卫罗马达两天之久，从而使德国师丧失了及时赶到萨莱诺战场的宝贵时间。罗马保卫战使600人牺牲（其中240人是老百姓），起到了阻挠德军运动的作用。当然，罗马战役如能延长，即使不能长时间保障首都的自由（因为德国军队的优势超过了英美司令部所掌握的军力），也能有助于盟军的推进和缩短德国对罗马的占领时间。

八、抵抗运动的开始

606 国王和政府的匆忙逃亡使首都陷入没有军事和政治领导中心的境地。9日晨被召集一起开内阁会议的部长们，得知巴多利奥突然离去，但没有得到任何指示。受命保卫罗马的卡尔博尼将军自己浪费了9日上午的时间也未能赶上逃离者的大队人马，他给军队下达的命令前后矛盾（先是下令撤到蒂沃利，后又下令停止前进，最后则是下令守住城市的北部和南部），这些命令也没有人服从。9日下午，他潜藏到位于一家私人住宅的秘密指挥部。卡维利亚元帅（是留在首都较高级的军官）和凯塞林的参谋长韦斯特法尔将军于9月10日签署了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德国人有义务尊重罗马为“不设防的城市”，由钦塔乌罗师司令卡尔维·迪贝戈洛将军掌管。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协议立即被撕毁了，罗马于9月11日被德国兵痞所侵占。

9月9日，意大利师（还没有来得及向蒂沃利撤退）给德国师

以重创。在蒙特罗东多地区的一次战斗中，皮亚维师歼灭了德军一个伞兵营，人民群众积极参加了战斗。在蒙特罗西—布拉恰诺地区，阿列太师击败了德军第三装甲师。在马利亚纳和圣保罗门之间格拉纳蒂耶里·迪萨尔德尼亚师有力地阻止了伞兵师的推进。军事部门的行动在人民群众的参加下得到支持。10日，保卫战集中在圣保罗门进行，在那里，响应反法西斯政党的号召，集结了第一批游击战士。损失是惨重的，但是德军只是在16时德意两军司令部达成协议宣布“停火”时才得以通过。

意大利反法西斯运动在国王和巴多利奥的逃跑所造成的空隙中间积极开展活动。9月9日晨，反法西斯政党的代表们在阿达路的一所房子里召开会议，这是埃伊瑙乌迪出版社临时社址，委托共产党人安东尼奥·乔利蒂看管。在了解了国王逃亡后造成的局607
势后，各党代表（天主教民主党的德加斯佩里，劳工民主党的鲁伊尼，自由党的卡萨蒂，行动党的拉·马尔法，意大利无产阶级团结社会党的南尼，意大利共产党的斯科奇马罗），在博诺米的主持下，根据鲁伊尼的建议，仿照戴高乐将军在阿尔及尔成立的委员会的形式，把反对派委员会变成民族解放委员会。

其实，鉴于已经没有政府领导，斯科奇马罗曾建议把反对派委员会变为临时政府。9日上午快结束时，皮卡尔迪部长对这一建议表示支持，这似乎给共产党代表所提建议提供了一个论据。但是，其他部长无意组织抵抗，而且也不愿寻求在反对派委员会中的领导地位。此外，军队当时仍然归卡维利亚元帅指挥。卡尔博尼将军在当时和以后都避免与民族解放委员会发生任何关系。在既不掌握军队又不掌握国家行政机构的情况下，民族解放委员会无法变成临时政府。但是，委员会应当成为意大利人民反对德国占领者和法西斯卖国贼的抵抗斗争的领导者。于是9日下午的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在纳粹主义企图在罗马和意大利恢复其法西

斯盟友的统治地位的时刻，反法西斯政党组成了民族解放委员会，唤起意大利人民进行斗争和抵抗，以重新取得意大利在自由国家之林中所应有的地位。”

当时决定广泛动员人民群众，组织和武装爱国行动队以支持军队作战，并决定抓紧出版报纸《意大利劳工》，（该报原属法西斯工会机关报，这时由社会党人利扎德里、天主教民主党人卡纳莱蒂·高登蒂和共产党人阿利卡塔负责领导），10日下午在圆柱广场举行群众集会。但是，在短短几小时内，形势却急转直下了。

民族解放委员会曾设法同军队指挥官进行接触，但是，9日当天上午快结束时，博诺米从卡维利亚元帅本人那里获悉，意方正同德军司令部谈判，以期达成协议，承认罗马为“不设防的城市”的条件。大批罗马居民纷纷前往圣保罗门，他们只能英勇地参加最后战斗。这时，德军开始在罗马南区投下第一批炸弹。因此，原定下午在圆柱广场组织的集会未能举行。同德国人签订协定的消息已经传来。向纷纷前来的市民们发出了准备进行秘密斗争的最初指示，以便在德国占领下也继续斗争。圣保罗门战役标志着意大利抵抗运动的开始。9月10日晚，整个意大利，从马太拉到那不勒斯，从罗马到米兰，从南部到中部和北部，展开了民族解放战争。

正如大家公认的那样，意大利共产党在解放斗争中，在游击战争中和政治领导中，作出了决定性贡献，它始终保持军事行动和群众斗争之间的联系，发展和增强直接民主机构（在基层、工厂、居民区、市镇、学校都建立了民族解放委员会），扩大广泛的联合组织运动（妇女和青年），并不断努力巩固和加强民族解放委员会。

通过开展武装斗争、政治斗争和文化斗争等多种斗争形式，党的创始人同地下斗争的战士和法西斯猖獗时期成长起来的青年战士（他们经过不同的独特道路献身共产主义），相互结合，水乳交融，使新党得到迅猛发展。正是在那20个月里，产生了新的共产党

文化，产生了在全国实行改革的愿望，并对社会主义的胜利进一步抱起热切希望。在我国历史上，祖国第一次在新的政治思想形成过程中成为意大利人的共同财富。作为解放战争中坚力量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成为全国政治斗争的主角。工人阶级和劳动者勇敢地投入抵抗运动的战场，他们拒绝再受排斥，并在共和国成立的岁月里懂得如何使进步和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保持畅通无阻。

随着抵抗运动的开始，结束了共产党作为干部党的历史：这个干部党是在党的创始人，主要则是安东尼奥·葛兰西的领导下，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而形成的一人数很少并经过严格挑选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也是一个受国际主义严格纪律约束的党。这是一个艰难的历史，也是一个充满惊心动魄事件的历史，这不仅因为有多少人作出巨大牺牲，有多少人受到多年监禁，有多少人在西班牙 609 阵亡，还因为党内曾发生多少尖锐的矛盾，多少痛苦的创伤，多少无法挽回的决裂。然而，1921年一批社会党人在不能把整个意大利社会党带入一个新的国际主义组织的情况下，响应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号召，成立了共产国际支部——意大利的共产党；虽然后来形势上有了差异，动机方面也有了变化，但这些人始终保持这个共产党的从未中断的连续性。党的领导人相继更替，从波尔迪加到葛兰西，又到陶里亚蒂。建党初期的一批创始人固然在前进道路上失去了许多人，但是，他们的数量已经增多了，力量也已经加强了；他们以新生力量填补了空缺，这些新生力量是在关键时刻，在严峻的考验中和国家的变革中涌现出来的；法西斯独裁的压迫只不过延缓了，而不是遏制住国家的变革。

这不是一条平坦的前进道路；不是没有犯过错误和遭受过痛苦的失败，而且也不是没有过犹豫不决和迷失方向的时候。意大利共产党开展的活动既有助于缓和独裁的压力，也使党像人们所

看到的那样作好准备去迎接9月8日这个面临新的艰巨任务的日子。

新党的历史就这样掀开了，这个党在抵抗运动和共和国时期得到了确立，成为一支起着执政和斗争作用的民族民主力量，它以其联合倡议，致力于团结意大利人民的大多数，争取对国家实行民主革新，并推动国家在自由中走向社会主义。这将是帕尔米罗·陶里亚蒂领导的新党的历史；对这部历史尚未进行研究，这部历史将是其他著作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人名索引

(条目后是原书页码, 检索时请查本书边码)

- Abramovič
Abramovič, Rafail Abramovič
- Acciarini, Filippo
Acquarone, Pietro
Adami
Adami Rossi, Enrico
Adler Friedrich
Agnelli, Giovanni
- Agnini, Gregorio
Aimone, di Savoia
- Alberganti, Giuseppe
Albertelli, Pilo
Alberti, Berto
Albertini, Luigi
- Albini, Giulio
Albo
Alciati, Giuseppe
Aldisio, Salvatore
Alessandro I
Alfieri, Dino
Alfredo
Alicata, Mario
- 阿布拉莫维奇一家 362, 363
阿布拉莫维奇, 拉法伊尔·阿布拉莫维奇 362, 363
阿恰里尼, 菲利波 490, 513
阿夸罗内, 彼特罗 548, 554
阿达米(见Cocchi R.)
阿达米·罗西, 恩里利 605
阿德勒, 弗里德里希 224, 225
阿涅利, 乔瓦尼 29, 34, 261, 424, 505, 533
阿尼尼, 格雷戈里奥 434
阿伊莫内, 迪萨沃亚(斯波莱托大公) 504
阿尔贝甘蒂, 朱赛佩 405, 457, 521
阿尔贝泰利, 皮洛 432
阿尔贝蒂, 贝尔托 318
阿尔贝蒂尼, 路易吉 70, 92, 250, 431, 439
阿尔比尼, 朱利奥 492
阿尔博(见 Bianco, E.)
阿尔恰蒂, 朱赛佩 534
阿尔迪西奥, 萨尔瓦托雷 430
亚历山大一世 230, 240, 504
阿尔菲耶里, 迪诺 293
阿尔弗雷多(见 Togliatti P.)
阿利卡塔, 马里奥 276, 361, 367, 436, 438, 439, 519, 527, 579, 595, 607

- Allegato, Luigi
 Almirante, Giorgio
 Altavilla, Enrico
 Alvaro, Corrado
 Alzati, Emilio
 Amadesi, Luigi
 Amaducci, Giovanni
 Ambrosio, Vittorio

 Amendola, Antonio

 Amendola, Giorgio

 Amendola, Giovanni

 Amendola, Pietro
 Amiconi, Ferdinando

 Amoretti, Giuseppe

 Andreis, Mario

 Andreoni, Carlo
 Andreotti, Giulio
 Angeloni, Mario
 Annunziati, Armando
 Antolini, Franco
 Antoni, Carlo
 Antonicelli, Franco

 阿莱加托, 路易吉 102
 阿尔米兰特, 乔治 276
 阿尔塔维拉, 恩里利 436
 阿尔瓦罗, 科拉多 565
 阿尔扎蒂, 埃米利奥 520
 阿马代西, 路易吉 260, 354, 454,
 阿马杜奇, 乔瓦尼 520
 安布罗西奥, 维托里奥 548, 552,
 554—556
 阿门多拉, 安东尼奥 274—276, 361,
 438
 阿门多拉, 乔治 175, 180, 187, 198,
 274, 331, 453, 457, 482—484,
 487, 489, 517, 518, 538, 541, 546,
 557, 559—562, 569—572, 575,
 582, 592, 594—597, 600
 阿门多拉, 乔瓦尼 71, 75, 82, 86,
 89, 92, 93, 95—97, 250, 274, 565,
 585
 阿门多拉, 彼特罗 520
 阿米科尼, 费尔迪南多 398, 399,
 520
 阿莫雷蒂, 朱赛佩 141, 260, 354,
 455
 安德烈斯, 马里奥 175, 198, 325,
 432
 安德烈奥尼, 卡洛 584, 585
 安德雷奥蒂, 朱利奥 430, 509
 安杰洛尼, 马里奥 304
 阿依齐亚蒂, 阿尔曼多 520
 安托利尼, 弗朗科 175
 安东尼, 卡洛 431, 546, 544
 安东尼切利, 弗朗科 284, 432, 436,
 490

- Antonini, Angelo
 Antonini, Armando
 Antonioni, Michelangelo
 Antonov-Ovseenko, Vladimir Aleksandrovič
 Anzalone, Ettore
 Anzilotti, Dionisio
 Aragon, Louis
 Arangio Ruiz, Vincenzo
 Armaroli, Giuseppe
 Armellini, Quirino
 Arpesani, Giustino
 Aspettati, Armando
 Attolico, Bernardo
 Atzeri Vacca, Francesco
 Azaña y Díaz, Manuel
 Azzario, Isidoro
 Babel, Isaak Emmanuilovič
- Bacchelli, Riccardo
 Bacchilega, Adelmo
 Badini, Confalonieri Vittorio
 Badoglio, Mario
 Badoglio, Pietro
- Baesi, Giovanni
 Bagnolati, Luigi
 Baistrocchi, Federico
 Balbo, Italo
- Baldesi, Gino
- 安东尼尼, 安杰洛 318
 安东尼尼, 阿尔曼多 374
 安东尼奥尼, 米凯兰杰洛 276
 安东诺夫-奥夫谢延因,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374
 安扎洛尼, 埃托雷 520
 安齐洛蒂, 迪奥尼西奥 279
 阿拉贡, 路易 284
 阿兰焦·鲁伊兹, 温琴佐 431
 阿尔马罗利, 朱赛佩 520
 阿尔梅利尼, 奎里诺 555
 阿尔佩萨尼, 朱斯蒂诺 431, 559,
 阿斯佩塔蒂, 阿尔曼多 267
 阿托利科, 贝尔纳多 396
 阿采里·瓦卡, 弗朗切斯科 214
 阿萨尼亚-迪亚斯, 曼努埃尔 300
 阿扎里奥, 伊西多罗 102, 521
 巴贝尔, 伊萨克·埃马努伊洛维奇 284
 巴凯利, 里卡尔多 279
 巴基莱加, 阿代尔莫 374
 巴迪尼·孔法洛涅里, 维托里奥 431
 巴多利奥, 马里奥 603
 巴多利奥, 彼特罗 241—243, 246—248, 286, 416, 420, 421, 458, 461—463, 484, 486, 548, 551—581, 584, 586, 592—594, 597, 600—603, 605, 606
 巴埃西, 乔瓦尼 374
 巴尼奥拉蒂, 路易吉 102
 巴伊斯特罗基, 费代里科 242
 巴尔博, 伊塔洛 75, 213, 247, 394, 417, 460
 巴尔代西, 吉诺 8, 71

Baldwin, Stanley
Banchieri, Giovanni
Banchieri, Giuseppe
Bandiera, Attilio ed Emilio

Baratono, Adelchi
Barbareschi, Gaetano
Barbusse, Henri
Barcellona, Calogero
Bardini, Vittorio
Barisone, Luigi
Baroncini, Maria
Baroncini, Nella
Barontini, Ilio

Barthou, Louis
Bartocci, Feltre
Basch, Victor
Bassanesi, Giovanni
Bassani, Giorgio
Basso, Lelio

Battaglia, Achille
Battaglia, Roberto
Battistatta, Quinto
Battisti, Cesare
Battisti, Gigino
Bauer, Otto
Bauer, Riccardo

Bazzani, Cesare
Bedaux, Charles
Bei, Adele
Bei, Amato

鲍德温, 斯坦利 243
班基耶里, 乔瓦尼 521
班基耶里, 朱赛佩 521
班迪耶拉, 阿蒂利奥 (和埃米利奥)
267

巴拉托诺, 阿代尔基 8
巴尔巴雷斯基, 加埃塔诺 434
巴比塞, 亨利 200, 230
巴尔切洛纳, 卡洛杰罗 521
巴尔迪尼, 维托里奥 318, 405
巴里索内, 路易吉 374
巴龙奇尼, 玛丽亚 521
巴龙奇尼, 内拉 521
巴龙蒂尼, 伊利奥 12, 260, 308,
318, 481

巴尔图, 路易 230, 240, 504
巴尔托奇, 费尔特雷 521
巴希, 维克托 330
巴萨内西, 乔瓦尼 177, 187
巴萨尼, 乔治 276
巴索, 莱利奥 96, 200, 433, 434,
513, 549, 559, 581—585

巴塔利亚, 阿基莱 432
巴塔利亚, 罗伯托 276
巴蒂斯塔塔, 昆托 374
巴蒂斯蒂, 切萨雷 25
巴蒂斯蒂, 吉吉诺 175, 177
鲍威尔, 奥托 169, 225
鲍威尔, 里卡尔多 175, 177, 191,
324, 432, 585—587, 600

巴扎尼, 切萨雷 279
贝多, 夏尔 172
贝伊, 阿代莱 521
贝伊, 阿马托 520

- Belamarich, Desanka
 Bellone, Sergio
 Belloni, Fortunato
 Belluzzo, Giuseppe
 Beltramelli, Antonio
 Beltrami, Renato
 Belviso, Elisa
 Bencivenga, Roberto
 Bendini, Arturo
 Benedetto XV
 Beneduce, Alberto
 Benelli, Sem
 Beneš, Edvard
 Benifei, Garibaldo
 Benini, Adriano
 Benini, Rodolfo
 Benni, Stefano
 Bentivogli, Giuseppe
 Benzoni, Giuliana
 Beretta, Giuseppe
 Bergamini, Alberto

 Bergamini, Maria
 Berlinguer, Mario
 Bernari, Carlo
 Berneri, Camillo
 Bernetich, Maria
 Bertè, Mario
 Berti, Giuseppe

 Berti, Otello
- 贝拉马里希, 德赞卡 521
 贝洛内, 塞尔焦 374
 贝洛尼, 福尔图纳托 374
 贝卢佐, 朱赛佩 105, 107
 贝尔特拉梅利, 安东尼奥 279
 贝尔特拉米, 雷纳托 520
 贝尔维索, 爱丽莎 318
 本奇文加, 罗伯托 250
 本迪尼, 阿尔图罗 114
 贝内代托十五世 24
 贝内杜切, 阿尔贝托 33
 贝内利, 塞姆 250
 贝奈斯, 爱德华 341, 376
 贝尼菲伊, 加里巴尔多 520
 贝尼尼, 阿德里亚诺 520
 贝尼尼, 鲁道夫 279
 贝尼, 斯特法诺 81, 105
 本蒂沃利, 朱赛佩 513
 本佐尼, 朱利亚娜 571
 贝雷塔, 朱赛佩 374
 贝尔加米尼, 阿尔贝托 431, 547,
 565, 593
 贝尔加米尼, 玛丽亚 482
 贝林格, 马里奥 432, 511
 贝尔纳里, 卡洛 282, 436
 贝尔内里, 卡米洛 315
 贝尔纳蒂希, 玛丽亚 369, 520
 贝尔泰, 马里奥 374
 贝尔蒂, 朱赛佩 57, 76, 180, 196,
 255, 260, 267, 323, 346, 347, 349-
 351, 353—358, 360, 362, 363,
 365, 367, 368, 399, 400, 407, 442,
 450, 453, 480, 489, 515
 贝尔蒂, 奥泰洛 520

- Bertolini, Giovanni
 Bertolini, Renato
 Bertoni, Giulio
 Bessone, Anna
 Bianco, Eugenio
 Bianco, Livio
 Bianco, Vincenzo
 Bibolotti, Aladino
- Bicocchi, Roberto
 Bietolini, Attilio
 Bilenchi, Romano
 Biricolti, Roberto
 Birolli, Renato
 Bisotti, Bartolomeo
 Bissolati, Leonida
 Bitossi, Renato
 Blum, Léon
- Bo, Carlo
 Bobbio, Norberto
 Boccanera, Lindoro
 Bocchi, Giovanni
 Bocchini, Arturo
 Boeri, Giovan Battista
 Boero, Giovanni
 Bombacci, Nicola
 Bonazzi, Enrico
 Bonciani, Alighiero
 Bonelli, Alfredo
 Bonfante, Pietro
 Bonfantini, Corrado
 Bonichi, Gino
- 贝尔托利尼, 乔瓦尼 318
 贝尔托利尼, 雷纳托 318
 贝尔托尼, 朱利奥 279
 贝索内, 安娜 261
 比安科, 欧金尼奥 261, 359, 365
 比安科, 利维奥 432
 比安科, 温琴佐 196, 260, 454, 455
 比博洛蒂, 阿拉迪诺 255, 260, 347, 355, 365, 399, 405, 483
 比科基, 罗伯托 374
 别托利尼, 阿蒂利奥 535
 比伦基, 罗马诺 282, 439
 比里科尔蒂, 罗伯托 520
 比罗利, 雷纳托 284, 436
 比索蒂, 巴尔托洛梅奥 374
 比索拉蒂, 莱奥尼达 35, 37
 比托西, 雷纳托 521
 布鲁姆, 列昂 225, 297—299, 301—303, 310, 315, 316, 338, 349, 372, 373, 413
 博, 卡洛 276
 博比奥, 诺尔贝托 432, 436
 博卡内拉, 林多罗 604
 博基, 乔瓦尼 374
 博基尼, 阿尔图罗 126, 429
 博埃里, 乔万·巴蒂斯塔 559
 博埃罗, 乔瓦尼 11
 邦巴齐, 尼古拉 10
 博纳齐, 恩里科 520
 邦恰尼, 阿利吉耶罗 457, 482
 博内利, 阿尔弗雷多 521
 邦凡特, 彼特罗 279
 邦凡蒂尼, 科拉多 583
 博尼基, 吉诺 284

- Boninsegna, Lodovico
 Bonnet, Georges
 Bonomi, Ivanoè
- Bonomi, Paolo
 Bonsanti, Alessandro
 Bontempelli, Massimo
 Borciani, famiglia
 Bordiga, Amadeo
- Boretti, Giuseppe
 Borgese, Giuseppe Antonio
- Borghesi, Ettore
 Borroni, Carlo
 Borsa, Mario
 Boscarini, Luigi
 Boschini, Giuseppe
 Bottai, Giuseppe
- Bottazzi, Filippo
 Bottonelli, Giovanni
 Bouhey, Jean
 Bovone, Domenico
 Bracci, Claudio
 Bracci, Mario
 Bracco, Roberto
 Bragaglia, Anton Giulio
- 博宁塞尼亚, 卢多维科 374
 博内, 乔治 372
 博诺米, 伊万诺埃 53, 54, 63, 75,
 95, 250, 251, 271, 430, 431, 512,
 546, 548, 549, 551, 552, 561, 562,
 567, 570—572, 579, 587, 601,
 603, 607
 博诺米, 保罗 430
 邦桑蒂, 亚历亚德罗 282
 邦滕佩利, 马西莫 279
 博尔哈尼一家 538
 波尔迪加, 阿马德奥 8, 10—14, 16,
 17, 27, 43, 57, 58, 60, 61, 66—68,
 72, 76—81, 85, 88, 97, 100—102,
 111, 140, 143, 153, 154, 180, 181,
 192, 337, 356, 520, 609
 博雷蒂, 朱赛佩 175, 198, 362, 374
 博尔杰塞, 朱赛佩·安东尼奥 63,
 214
 博尔吉, 埃托雷 520
 博罗尼, 卡洛 374
 博尔萨, 马里奥 432
 博斯卡里尼, 路易吉 374
 博斯基尼, 朱赛佩 520
 博塔伊, 朱赛佩 108, 212, 213, 271,
 283, 419, 548
 博塔齐, 菲利波 279
 博托内利, 乔瓦尼 520
 布耶, 让 378
 博沃内, 多梅尼科 199
 布拉奇, 克劳迪奥 520
 布拉奇, 马里奥 432
 布拉科, 罗伯托 124
 布拉加利亚, 安东·朱利奥 284

- Brambilla, Amleto
 Brambilla, Giovanni
 Brandler, Heinrich
 Brasini, Armando
 Brau, Stefano
 Brecht, Bertolt
 Bréton, André
 Bronzo, Negarville Maria
 Bruni, Gerardo
 Brüning, Heinrich
 Brusasca, Giuseppe
 Bucharin, Nikolaj Ivanovič

 Bufalini, Paolo
 Buffarini, Guidi Guido
 Buonaiuti, Ernesto
 Buozi, Bruno

 Busetto, Franco
 Busetto, Italo
 Buzzi, Mario
 Cacciapuoti, Salvatore

 Cacciatore, Luigi
 Cadorna, Luigi
 Cagli, Corrado
 Cairoli, Enrico e Giovanni
 Calamandrei, Franco
 Calamandrei, Pietro
 Calandrone, Giacomo
 Caldara, Emilio
 Caldarelli, Vincenzo

 布兰比拉, 阿姆莱托 535
 布兰比拉, 乔瓦尼 521, 535, 588
 布兰德勒尔, 海因里希 152
 布拉西尼, 阿尔曼多 279
 布劳, 斯特法诺 457, 482
 布莱希特, 贝托尔特 284, 493
 布雷东, 安德烈 284
 布龙佐·内加维莱, 玛丽亚 521, 522
 布鲁尼, 杰拉尔多 510, 581
 布吕宁, 海因里希 216—218, 221
 布鲁萨斯卡, 朱赛佩 430
 布哈林,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111,
 116, 117, 135, 143—145, 147,
 152, 336, 340, 341, 347, 356
 布法利尼, 保罗 367, 438, 439, 519
 布法里尼·圭迪, 圭多 567
 博纳尤蒂, 埃内斯托 214
 博齐, 布鲁诺 81, 127, 128, 231, 490,
 570, 574—577, 583—585, 593,
 594
 布塞托, 佛朗科 276
 布塞托, 伊塔洛 276
 布齐, 马里奥 481
 卡恰波蒂, 萨尔瓦托雷 272, 520,
 598
 卡恰托雷, 路易吉 434
 卡多尔纳, 路易吉 23, 26, 27, 546
 卡利, 科拉多 284
 卡伊罗利, 恩里科(和乔瓦尼) 267
 卡拉曼德雷, 弗朗科 276
 卡拉曼德雷, 皮耶罗 432, 544, 576
 卡兰德罗内, 贾科莫 318
 卡尔达拉·埃米利奥 251
 卡尔达雷利, 温琴佐 282

- Calogero, Guido
 Calosso, Umberto
 Calvi di Bergolo, Carlo
 Calvo Sotelo, José
 Camen
 Camera, Aldo
 Campilli, Pietro
 Campioli, Cesare
 Campolongo, Luigi
 Canaletti Gaudenti, Alberto
 Candeloro, Giorgio
 Canepa, Giovan Battista
 Canepa, Giuseppe
 Canevari, Emilio
 Cannelonga, Carmine
 Cannonero, Luigi
 Canonica, Pietro
 Canova, Marcello
 Cantimori, Delio
 Cantini, Ginetto
 Capitini, Aldo
 Capponcelli, Ivo
 Capriolo, Luigi
 Carandini, Nicolò
 Carboni, Giacomo

 Carboni, Gilberto
 Cardarelli, Vincenzo
 Cardona, Mario
 Carini, Antonio
 Carlos
 Carmagnola, Luigi
 Carocci, Alberto
 Carrà, Carlo
- 卡洛杰罗,圭多 432,544,585
 卡洛索,翁贝托 442
 卡尔维·迪贝戈洛,卡洛 606
 卡尔沃·索特洛,何塞 300
 卡门(见 Pajetta Giuliano)
 卡梅拉,阿尔多 520
 坎皮利,彼特罗 430
 坎皮奥利,切萨雷 199
 坎波隆吉,路易吉 330,331
 卡纳莱蒂·高登蒂,阿尔贝托 607
 坎代洛罗,乔治 432
 卡内帕,乔万·巴蒂斯塔 318
 卡内帕,朱赛佩 81
 卡内瓦里,埃米利奥 513
 坎内龙加,卡尔米内 521
 坎诺内罗,路易吉 374
 卡诺尼卡,彼特罗 279
 卡诺瓦,马尔切洛 520
 坎蒂莫里,德里奥 282,434
 坎蒂尼,吉内托 521
 卡皮蒂尼,阿尔多 432,511
 卡蓬切利,伊沃 374
 卡普廖洛,路易吉 439
 卡兰迪尼,尼科洛 431,512
 卡尔博尼,贾科莫 567,568,603—
 607
 卡尔博尼,吉尔贝托 374
 卡尔达雷利,温琴佐 282
 卡尔多纳,马里奥 276
 卡里尼,安东尼奥 521
 卡洛斯(见 Vidali V.)
 卡尔马尼奥拉,路易吉 434,490
 卡罗奇,阿尔贝托 282
 卡拉,卡洛 283

- Carrara, Mario
 Carsano, Giovanni
 Casadio, Aleandro
 Casado López, Segismundo
 Casares Quiroga, Santiago
 Casati, Alessandro
 Casati, Giosuè
 Casertano, Antonio
 Casorati, Felice
 Cassandrini, Arturo
 Cassiani, Gennaro
 Cassinari, Bruno
 Castellacci, Angiolo
 Castellano, Giuseppe
 Cattaneo, Ferruccio
 Cattani, Leone
 Cavallari, Vincenzo
 Cavallera, Vindice
 Cavallero, Ugo
 Caviglia, Pietro
 Cecchi, Emilio
 Celino, Fedele
 Ceresa, Giuseppe
 Ceriana, Luigi
 Cerica, Angelo
 Cerreti, Giulio
 Cervellati, Ennio
 Ceroni Bassani, Cesare
 Ceva, Bianca
 卡拉拉, 马里奥 214
 卡尔萨诺, 乔瓦尼 521, 533
 卡萨迪奥, 阿莱安德罗 520
 卡萨多·洛佩斯, 塞希斯孟多 375,
 400
 卡萨雷斯·基罗加, 圣地亚哥 300
 卡萨蒂, 亚历山德罗 86, 430, 512,
 547, 549, 570, 571, 588, 607
 卡萨蒂, 焦苏埃 398, 399, 535
 卡塞尔塔诺, 安东尼奥 105
 卡索拉蒂, 费利切 284
 卡桑德里尼, 阿尔图罗 520
 卡夏尼, 杰纳罗 430
 卡西纳里, 布鲁诺 436
 卡斯泰拉奇, 安焦洛 520
 卡斯泰拉诺, 朱赛佩 568, 577, 600
 卡塔内奥, 费鲁乔 520
 卡塔尼, 利昂纳 175, 177, 431, 512,
 549, 570, 589
 卡瓦拉里, 温琴佐 276
 卡瓦莱拉, 温迪切 276
 卡瓦莱罗, 乌戈 286, 462, 502, 548,
 567
 卡维利亚, 彼特罗 50, 507, 548, 606,
 607
 切基, 埃米利奥 279
 切利诺, 费代莱 520
 切雷萨, 朱赛佩 261
 切里亚纳, 路易吉 102, 129, 196
 切里卡, 安杰洛 554
 切雷蒂, 朱利奥 261, 305
 切尔韦拉蒂, 恩尼奥 521
 切罗尼·巴萨尼, 切萨雷 520
 切瓦, 比安卡 432

- Ceva, Umberto
 Cevolotto, Mario
 Chabod, Federico
 Chamberlain, Arthur Neville
 Chaplin, Charles Spencer
 Chautemps, Camille
 Chiappe, Jean
 Chiaramello, Domenico
 Chiarini Gaetano
 Chierici, Renzo
 Chiesa, Oberdan
 Chilanti, Felice
 Chruščëv, Nikita Sergeevič
 Churchill, Winston
 Cialente, Fausta
 Cianca, Alberto
 Cianca, Claudio
 Cianetti, Tullio
 Ciano, Costanzo
 Ciano Galeazzo
 Ciapetti, Radio
 Ciarpaglini, Giovanni
 Cicalini, Antonio
 Cifarelli, Michele
 Cinciari Rodano, Marisa
 Cingolani, Mario
 Cini, Vittorio
 Citterio, Giovanni
 Ciufoli, Domenico
 切瓦,翁贝托 175,177
 切沃洛托,马里奥 431
 查博德,费德里科 432
 张伯伦,阿瑟·内维尔 372, 376,
 377,379,386—388,464
 卓别林,查尔斯·斯潘塞 284
 肖当,卡米耶 316
 希亚普,让 229
 基亚拉梅洛,多梅尼科 434,490
 基亚里尼,加埃塔诺 196,521
 基耶里奇,伦佐 536
 基耶萨,奥贝丹 318
 基兰蒂,费利切 276
 赫鲁晓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499
 丘吉尔,温斯顿 378,379,394,412,
 459,464,466,469,474,494,495,
 602
 恰伦特,福斯塔 593
 钱卡,阿尔贝托 332,442,487
 钱卡,克劳迪奥 578
 恰内蒂,图里奥 283
 齐亚诺,科斯坦佐 371
 齐亚诺,加莱亚佐 271, 302, 381,
 383,384,394,395,461,527,548
 恰佩蒂,拉迪奥 520
 恰尔帕利尼,乔瓦尼 521,524
 奇卡利尼,安东尼奥 192,521,524
 奇法雷利,米凯莱 276,432
 钦恰里·罗达诺,玛丽萨 595
 钦戈拉尼,马里奥 430
 奇尼,维托里奥 29,261,505,529
 奇泰里奥,乔瓦尼 535
 丘福利,多梅尼利 191, 196, 259,

- Clerici, Edoardo
 Clocchiatti, Amerigo
 Cocchi, Romano
 Cocco, Pietro
 Codignola, Tristano
 Colajanni, Pompeo
 Colarich Natale
 Colini, Cesare
 Colombi, Arturo
 Colombo, Cesare
 Colorni, Eugenio
 Colorni, Ursula
 Comandini, Federico
 Comollo, Gustavo
 Compagnone, Luigi
 Congiu, Tommaso
 Consolo, Gaetano
 Contarini, Salvatore
 Conti, Salvatore
 Coppa, Giorgio
 Coppola, Francesco
 Corassori, Alfeo
 Corbi, Bruno
 Corneli, Dante
 Corona, Achille
 Correnti, Mario
 Corsi, Ugo
 Cortese, Gino
 Cosattini, Giovanni
 Costa, Andrea
- 260, 263, 347, 354, 355, 368, 593
 克莱里奇, 埃多阿尔多 430, 510
 克洛基亚蒂, 阿梅里戈 481, 482,
 492, 517, 531, 538
 科基, 罗马诺 260, 330, 402
 科科, 彼特罗 521
 科迪尼奥拉, 特里斯塔诺 432
 科拉亚尼, 蓬佩奥 438, 546, 604
 科拉里希, 纳塔莱 521
 科利尼, 切萨雷 520
 科隆比, 阿尔图罗 43, 196, 201,
 205, 224, 320, 521, 594, 604
 科隆博, 切萨雷 318, 405, 521
 科洛尔尼, 欧金尼奥 175, 177, 253,
 333, 362, 363, 366, 433, 584, 585
 科洛尔尼, 乌尔苏拉 362, 363
 科曼迪尼, 费德里科 432, 511
 科莫洛, 古斯塔沃 521
 孔帕尼奥内, 路易吉 436
 孔朱, 托马索 374
 孔索洛, 加埃塔诺 92
 孔塔里尼, 萨尔瓦托雷 235
 孔蒂, 萨尔瓦托雷 29
 科帕, 乔治 276
 科波拉, 弗朗切斯科 279
 科拉索里, 阿尔费奥 521
 科尔比, 布鲁诺 520
 科尔内利, 丹特 343
 科罗纳, 阿基莱 276, 583
 科伦蒂, 马里奥(见陶里亚蒂, T.)
 科尔西, 乌文 520
 科尔泰塞, 吉诺 438
 科萨蒂尼, 乔瓦尼 434
 科斯塔, 安德烈亚 12

- Costa, Remo
Cot, Pierre
Craveri, Raimondo
Crespi, Silvio
Cripps, Richard Stafford
Crocco, Gaetano Arturo
Croce, Benedetto
- Curiel, Eugenio
- Curzon, George Nathaniel
- Cusumano, Giuseppe
Dagnino, Virgilio
Dainelli, Giotto
Daladier, Edouard
- D'Alema, Giuseppe
Dall'Ara, Libero
Dal Pozzo, Pietro
D'Annunzio, Gabriele
- D'Aragona, Ludovico
- Darlan François
D'Attilio, Eugenio
Dawes, Charles Gates
Déat, Marcel
Debenedetti, Giacomo
De Blasi, Dante
De Bono, Emilio
- De Bosis, Lauro
- 科斯塔, 雷莫 521
科特, 皮埃尔 301
克拉韦里, 莱蒙多 432
克雷斯皮, 西尔维奥 29
克里普斯, 理查德·斯塔福德 474
克罗科, 加埃塔诺·阿尔图罗 279
克罗切, 贝内代托 41, 95, 124, 177,
186, 250, 271, 278, 280, 281, 321,
430, 437, 436, 512, 540, 544, 588
库列尔, 欧金尼奥 275, 290, 360—
366, 438
楚尔宗, 盖奥尔盖·纳塔涅尔, 勋爵
390
库苏马诺, 朱赛佩 322
达尼诺, 维尔吉利奥 175
达伊内利, 焦托 279
达拉第, 爱德瓦 229, 298, 372, 377,
379, 394
达莱马, 朱赛佩 437, 550
达拉拉, 利贝罗 520
达尔波佐, 彼特罗 318, 405
达依丘, 加布里埃莱 24, 32, 36, 37,
47, 51, 58—60, 64, 69, 279
达拉戈纳, 卢多维科 80, 127, 128,
194, 251
达尔兰, 弗朗索瓦 497, 506
达蒂利奥, 欧金尼奥 520
道威斯, 查尔斯·盖茨 164, 235
德阿特, 马尔赛 227, 325, 373, 488
德贝内代蒂, 贾科莫 282
德布拉西, 丹特 279
德博诺, 埃米利奥 92, 93, 237, 242,
246, 548
德博西斯, 劳罗 177, 187

- De Falco, Nicola
 De Francisci, Pietro
 De Gasperi, Alcide
- De Gaulle, Charles
- De Grada, Raffaele
- Del Bo, Dino
 Della Maggiora, Michele
 Del Magro, Alessandro
 Del Secolo Floriano
 De Luca, Raffaele
 De Man, Henri
 De Martino, Ernesto
 De Martino Francesco
 De Monzie, Anatole
 De Nicola, Enrico
- Depangher, Mario
 De Rosa, Ferdinando
 De Ruggiero, Guido
 De Sanctis, Francesco
 De Sanctis, Gaetano
 De Sanctis, Giuseppe
 Dessì, Felice
 De Stefani, Alberto
- De Viti de Marco, Antonio
 Diaz, Armando
 Diaz, José
 Di Benedetto, Salvatore
- 德法尔科, 尼科拉 521
 德佛兰奇西, 彼特罗 280, 293
 德加斯佩里, 阿尔奇德 86, 89, 93,
 112, 430, 506, 508—510, 539,
 540, 548, 561, 570—572, 579,
 581, 589, 600, 601, 607
 戴高乐, 夏尔 415, 442, 464, 497,
 511, 607
 德格拉达, 拉法埃莱 276, 287, 436,
 438
 德尔博, 迪诺 436
 德拉马焦拉, 米凯莱 142
 德尔马格罗, 亚历山德罗 261
 德尔塞科洛, 弗洛里亚诺 431
 德卢卡, 拉法埃莱 519
 德曼, 亨利 227, 325, 488
 德马蒂诺, 埃内斯托 432
 德马蒂诺, 弗朗切斯科 432
 德蒙齐, 阿纳托尔 414
 德尼科拉, 恩里科 53, 63, 81, 431,
 588
 德庞盖尔, 马里奥 521
 德罗萨, 费尔迪南多 177, 187, 303
 德鲁杰罗, 圭多 432, 513, 576, 586
 德桑克蒂斯, 弗朗切斯科 277, 515
 德桑克蒂斯, 加埃塔诺 214
 德桑克蒂斯, 朱赛佩 436
 德西, 费利切 604
 德斯特法尼, 阿尔贝托 111, 247,
 279
 德维蒂·德马尔科, 安东尼奥 214
 迪亚斯, 阿尔曼多 70
 迪亚斯, 何塞 307
 迪贝内代托, 萨尔瓦托雷 438, 550,

- 559
- Di Cesarò, Giovanni Antonio Colonna
- Di Giacomo, Salvatore
- Dimitrov, Georgi
- Di Modugno, Antonio
- Diodati, Wladimiro
- Dionisi, Antonio
- Di Vittorio, Baldina
- Di Vittorio, Giuseppe
- Dolfi, Danilo
- Dollfuss, Engelbert
- Donati, Giuseppe
- Donegani, Guido
- Donini, Ambrogio
- D'Onofrio, Edoardo
- Doria, Gino
- Doria Pamphili, Andrea
- Dorso, Guido
- Dozza, Giuseppe
- Duclos Jacques
- 迪切萨罗, 乔瓦尼·安东尼奥·科洛纳 93, 112
- 迪贾科莫, 萨尔瓦托雷 279
- 季米特洛夫, 格奥尔基 220, 230, 232, 316, 353, 413, 425, 445, 447, 448, 450
- 迪莫杜尼奥, 安东尼奥 520
- 迪奥达蒂, 佛拉基米尔 518
- 迪奥尼西, 安东尼奥 279
- 迪·维托里奥, 巴尔迪纳 405
- 迪·维托里奥, 朱赛佩 129, 155, 179, 196, 255, 259, 260, 306, 318, 323, 331, 347, 355, 399, 407, 450, 453, 515, 521, 522, 524, 576, 596, 604
- 多尔菲, 达尼洛 520
- 多尔富斯, 恩格尔贝特 225, 230, 239, 240
- 多纳蒂, 朱赛佩 97
- 多内加尼, 圭多 29, 81, 261, 424, 505, 506
- 多尼尼, 安布罗焦 260, 352, 361, 442, 480
- 多诺弗里奥, 埃多阿尔多 141, 260, 318, 347
- 多里亚, 吉诺 431
- 多里亚·潘菲利, 安德雷亚 578
- 多尔索, 圭多 432
- 多扎, 朱赛佩 129, 191, 196, 259, 260, 347, 349, 350, 354, 355, 398, 450, 482, 487, 515, 541, 558, 592, 593
- 杜克洛, 雅克 297, 414

- Dumini, Amerigo
 Düsterberg, Theodor
 Eberlein, Hugo
 Eden, Anthony
- Einaudi, Luigi
 Eisenhower, Dwight David
- Elena, di Savoia
 Engels, Friedrich
 Erëmenko, Andrei Ivanovič
 Ermini, Dina
 Errera, Giorgio
 Ezio
 Ežoyv, Nicolaj Ivanovič
- Fabbri, Luigi
 Fabiani, Mario
 Facchini, Giuseppe
 Facchini, Luigi
 Facta, Luigi
- Falck, Enrico
 Faleschini, Ido
 Fancello, Francesco
- Fanfani, Amintore
 Faravelli, Giuseppe
 Farina, Giovanni
 Farinacci, Roberto
- Farinelli, Arturo
 Farini, Carlo
- 杜米尼,阿梅里戈 92
 迪斯特尔贝格,特奥多尔 217
 艾伯兰,雨果 343
 艾登,安东尼 243, 244, 247, 248,
 371, 379
 埃伊纳乌迪,路易吉 430, 436, 589
 艾森豪威尔,德怀特·戴维 497,
 601, 603
 埃莱娜,迪萨沃亚 250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 281
 叶廖缅科,安德烈·伊凡诺维奇 499
 埃尔米尼,迪娜 481, 593
 埃雷拉,乔治 214
 埃齐奥 481
 叶若夫,尼古拉·伊凡诺维奇 339,
 341, 345
 法布里,路易吉 434, 513, 583
 法比亚尼,马里奥 520
 法基尼,朱赛佩 374
 法基尼,路易吉 521
 法克塔,路易吉 53, 54, 62, 63, 65,
 69
 法尔克,恩里科 510
 法莱斯基尼,伊多 374
 范切洛,弗朗切斯科 175, 177, 191,
 432, 585, 587
 范范尼,阿明托雷 509
 法拉韦利,朱赛佩 364
 法里纳,乔瓦尼 261, 454,
 法里纳奇,罗伯托 86, 92, 105, 106,
 118, 251, 395, 396, 417, 462, 537,
 555
 法里内利,阿尔图罗 279
 法里尼,卡洛 260, 318, 405, 521

- Farini Pietro**
Favagrossa, Carlo
Fedeli, Armando

Federzoni, Luigi

Fenoaltea, Sergio

Fermi, Enrico
Ferrara, Mario
Ferrari, Erasmo
Ferrata, Giansiro
Ferrero, Guglielmo
Ferri, Claudio
Ferro, Giovanni
Ferro, Mario
Fiammenghi, Ettore
Finocchiaro Aprile, Andrea

Fiore, Graziano
Fiore, Tommaso
Fiore, Umberto
Fiore, Vittore
Fioretti, Mario
Fioritto, Domenico
Flandin, Pierre-Etienne
Flecchia, Vittorio
Flora, Francesco
Foa, Vittorio
Foco, Lorenzo
Formichi, Carlo
Fornari, Giovanni
Forti, Dina
Forti, Roberto
- 法里尼,彼特罗 260
 法瓦格罗萨,卡洛 421
 费代利,阿尔曼多 261, 318, 457,
 521
 费代尔佐尼,路易吉 86, 105, 106,
 213, 247, 394, 507, 548, 549
 费诺阿尔泰亚,塞尔焦 175, 177,
 432, 511, 512, 570, 586
 费尔米,恩里科 279
 费拉拉,马里奥 431
 费拉里,埃拉斯莫 374
 费拉塔,詹西罗 438, 599
 费雷罗,古列尔莫 95
 费里,克劳迪奥 436
 费罗,乔瓦尼 516
 费罗,马里奥 516
 菲亚门吉,埃托雷 260
 菲诺基亚罗·阿普里莱,安德烈亚
 431
 菲奥雷,格拉齐亚诺 565
 菲奥雷,托马索 175, 432, 511, 565
 菲奥雷,翁贝托 12
 菲奥雷,维托雷 565
 菲奥雷蒂,马里奥 585
 菲奥里托,多梅尼科 434
 弗朗丹,皮埃尔·艾蒂安 236, 243
 弗莱基亚,维托里奥 102, 261, 405
 弗洛拉,弗朗切斯科 432
 福阿,维托里奥 198, 304, 325, 432
 福科,洛伦佐 546
 福尔米基,卡洛 279
 福尔纳里,乔瓦尼 260
 福尔蒂,迪娜 593
 福尔蒂,罗伯托 438, 520, 604

- Fortichiari, Bruno
- Fortunato, Giustino
- Forzano, Gioacchino
- Fracchia, Angelo
- Frachon, Benoît
- Franco y Bahamonde, Francisco
- Fransoni, Francesco
- frassati, Alfredo
- Frausin, Luigi
- Freddi, Luigi
- Friggeri
- Frilli, Gastone
- Frola, Francesco
- Fulgenzi, Raimondo
- Fulgignati, Angelo
- Funi, Achille
- Gadda, Carlo Emilio
- Gaeta, Giuseppe
- Gaiani, Luigi
- Galante Garrone, Alessandro
- Galante Garrone, Carlo
- Galavotti, Arturo
- Galbiati, Enzo
- Galderisi, Renato Galdo
- Galimberti, Duccio
- Gallarati Scotti, Tommaso
- Gallico, Loris e Ruggero
- Gallimard
- Gamelin, Maurice-Gustave
- Gandin, Antonio
- Caravini, Romano
- Garibaldi, Giuseppe
- 福尔蒂基亚里, 布鲁诺 10, 11, 58, 78
- 福尔图纳托, 朱斯蒂诺 186
- 福尔扎诺, 焦阿基诺 283
- 弗拉基亚, 安杰洛 282
- 佛拉桑, 伯努瓦 298, 414
- 弗朗哥-巴蒙德, 弗朗西斯科 286, 300, 303, 309
- 弗兰索尼, 弗朗切斯科 506
- 弗拉萨蒂, 阿尔弗雷多 71, 92
- 弗劳辛, 路易吉 192, 196, 197, 521
- 弗雷迪, 路易吉 568
- 弗里杰里 575
- 弗里利, 加斯托内 520
- 佛罗拉, 弗朗切斯科 480
- 福尔詹齐, 莱蒙多 374
- 福利尼亚蒂, 安杰洛 520
- 福尼, 阿基莱 283
- 加达, 卡洛·埃米利奥 281
- 加埃塔, 朱赛佩 535
- 加亚尼, 路易吉 520
- 加兰特·加罗内, 亚历山德罗 432
- 加兰特·加罗内, 卡洛 432
- 加拉沃蒂, 阿尔图罗 518
- 加尔比亚蒂, 恩佐 554, 555, 567
- 加尔代里西, 雷纳托·加尔多 276
- 加林贝蒂, 杜奇奥 432
- 加拉拉蒂·斯科蒂, 托马索 430, 559
- 加利科, 洛里斯(和鲁杰罗) 593
- 加利马尔 284
- 加姆林, 莫里斯-古斯塔夫 410
- 甘丁, 安东尼奥 605
- 加拉维尼, 罗马诺 520
- 加里波第, 朱赛佩 267, 306, 523

- Gariboldi, Italo
 Garibotti, Giuseppe
 Garosci, Aldo
- Garzanti, Libero
 Gasparotto, Poldo
 Gatto, Alfonso
 Gayda, Vincenzo
 Gedda, Luigi
 Gelli, Alfeo
 Gennari, Egidio
- Gentile, Giovanni
- Germanetto, Giovanni
- Geymonat, Ludovico
- Ghini, Celso
 Ghini, Umberto
 Ghini, Vittorio
 Giambone, Eusebio
 Giambone, Vitale
 Gibelli, Piero
 Gibson, Violet
 Gide, André
 Gigante, Antonio Vincenzo
- Gilli, Michele
 Ginzburg, Leone
 Giolitti, Antonio
- Giolitti, Giovanni
- 加里博尔迪, 伊塔洛 499
 加里博蒂, 朱赛佩 62
 加罗西, 阿尔多 175, 304, 326, 332,
 442, 487
 加尔赞蒂, 利贝罗 374
 加斯帕罗托, 波尔多 559
 加托, 阿方索 276, 282, 436
 加伊达, 温琴佐 371
 杰达, 路易吉 509
 杰利, 阿尔费奥 520
 杰纳里, 埃吉迪奥 12, 68, 102, 114,
 196, 255, 260, 263, 331, 354, 361,
 366
 詹蒂莱, 乔瓦尼 91, 95, 106, 279—
 281, 293
 杰尔马内托, 乔瓦尼 12, 129, 196,
 260
 杰莫纳特, 卢多维科 438, 519, 546,
 547
 吉尼, 切尔索 192
 吉尼, 翁贝托 521
 吉尼, 维托里奥 318, 521
 詹博内, 欧塞比奥 405
 詹博内, 维塔莱 374
 吉贝利, 皮耶罗 374
 吉布森, 维奥莱特 113
 纪德, 安德烈 200, 230, 284
 吉甘特, 安东尼奥·温琴佐 201,
 224, 520
 吉利, 米凯莱 374
 金兹布格, 利昂纳 432, 436
 乔利蒂, 安东尼奥 438, 519, 546,
 547, 553, 607
 乔利蒂, 乔瓦尼 3—5, 22, 24, 32—

- 35, 39, 45—48, 50—54, 59, 63,
65, 69, 75, 86, 89, 90, 112, 587
- Giordani, Francesco 焦尔达尼, 弗朗切斯科 279
- Giordani, Giulio 焦尔达尼, 朱利奥 3
- Giordani, Iginò 焦尔达尼, 伊吉诺 430
- Giordano, Umberto 焦尔达诺, 翁贝托 279
- Giovannardi, Eugenio 焦瓦纳尔迪, 欧金尼奥 405
- Giral y Pereira, José 希拉尔-佩雷拉, 何塞 301
- Giraud, Henri-Honoré 吉罗, 亨利-奥诺雷 497
- Giua, Michele 朱亚, 米凯莱 304, 325
- Giua, Renzo 朱亚, 伦佐 304
- Giuriati, Giovanni 朱里亚蒂, 乔瓦尼 214, 288
- Giusti, Wolfango 朱斯蒂, 沃尔凡戈 434
- Gnudi, Ennio 纽迪, 埃尼奥 3, 12, 102, 196, 260,
480
- Go'etti, Piero 戈贝蒂, 皮耶罗 95—97, 100, 125,
175, 187, 278, 282, 321, 585
- Gobetti, Prospero Ada 戈贝蒂, 普罗斯佩罗·阿达 175, 432
- Goering, Hermann Wilhelm 戈林, 赫尔曼·威廉 219, 220, 230
- Goiak, Arrigo 戈亚克, 阿里戈 375
- Golfarelli, Gaetano 戈尔法雷利, 加埃塔诺 375
- Gombia, Attilio 贡比亚, 阿蒂利奥 520
- Gonzales, Enrico 冈萨莱斯, 恩里科 81
- Gorkij, Maksim 高尔基, 马克西姆 272
- Gramsci, Antonio 葛兰西, 安东尼奥 6, 10, 11, 13, 14,
17, 31, 46, 54, 57, 58, 60, 68, 76,
78—80, 83—85, 87, 88, 96, 97,
100—103, 106, 112, 114—119,
121, 129, 133, 135, 136, 138, 141—
143, 145, 148, 154, 156, 159, 161,
181—187, 194, 195, 203, 281,
285, 319—324, 331, 344, 348,
356, 357, 515, 524, 532, 596, 609
- Gramsci, Gennaro 葛兰西, 杰纳罗 184

- Granata, Giuseppe
 Grandi, Achille
 Grandi, Dino
- Grassi, Ettore
 Grassi, Luigi
 Gravelli, Asvero
 Grazia, Verenin
 Graziadei, Antonio
- Graziani, Rodolfo
- Greppi, Antonio
 Grieco, Ruggero
- Grifone, Pietro
 Grilli, Giovanni
 Groener, Wilhelm
 Gronchi, Giovanni
 Guaita, Giovanni
 Gualdi, Egle
 Gualino, Riccardo
 Guariglia, Raffaele
 Guelfi, Aramis
 Guermandi, Luigi
 Guerrini, Nunzio
- 格拉纳塔, 朱赛佩 276
 格兰迪, 阿基莱 430, 510, 576
 格兰迪, 迪诺 213, 236, 237, 247,
 394, 417, 507, 529, 548, 549, 554,
 555
 格拉西, 埃托雷 304
 格拉西, 路易吉 192, 196, 520
 格拉韦利, 阿斯韦罗 568
 格拉齐亚, 韦雷宁 434
 格拉齐亚代伊, 安东尼奥 12, 14, 57,
 58, 67, 76
 格拉齐亚尼, 鲁道夫 247, 248, 270,
 287, 458, 460
 格雷皮, 安东尼奥 434
 格列科, 鲁杰罗 58, 76-78, 102, 114,
 117, 121, 122, 129, 133, 134, 137,
 138, 140, 142, 145, 147, 151, 153-
 161, 179, 181, 186, 187, 188, 196,
 253, 255-257, 259, 260, 263,
 264, 322, 343, 347, 349-351,
 353-357, 359, 361-364, 398,
 399, 407, 443, 449, 450, 453, 454,
 477, 515
 格里福内, 彼特罗 175, 521
 格里利, 乔瓦尼 535, 559, 569, 592
 格仑纳, 威廉 217, 218
 格龙基, 齐瓦尼 430, 509, 510, 549
 瓜伊塔, 乔瓦尼 546
 瓜尔迪, 埃格莱 261, 481
 瓜利诺, 里卡尔多 29
 瓜里利亚, 拉法埃莱 566
 圭尔菲, 阿拉米斯 520
 圭尔曼迪, 路易吉 520
 圭里尼, 农齐奥 375

- Guerzoni, Giovanni
 Guidi, Camillo
 Guizzardi, Emanuele
 Guizzetti, Antonio
 Gullo, Fausto
 Gurrado, Giuseppe
 Guttuso, Renato
 Halifax, Edward Frederick
- Harriman, William Averell
 Heckert, Fritz
 Henlein, Konrad
 Herriot, Edouard
 Hilferding, Rudolf
 Hindenburg, Paul von Benckendorf von
 Hirschmann
 Hirschmann, Ursula
 Hitler, Adolf
- Hoare, Samuel
 Hoover, Herbert Clark
- Hopkins, Harry Lloyd
 Hugenberg, Alfred
 Humbert-Droz, Jules
- 圭尔佐尼, 乔瓦尼 520
 圭迪, 卡米洛 279
 圭扎尔迪, 埃马努埃莱 520
 圭泽蒂, 安东尼奥 375
 古洛, 福斯托 435
 古拉多, 朱赛佩 565
 古图索, 雷纳托 276, 284, 436, 438
 哈利法克斯, 爱德华·弗雷德里克 387
 哈里曼, 威廉·埃夫里尔 494
 赫凯尔特, 弗里茨 193
 海伦, 康拉德 376
 埃里奥, 爱德华 413
 希法亭, 鲁道夫 169
 兴登堡, 保罗·冯·贝纳肯多夫·冯 169, 216—219, 221, 222, 224
 希尔施曼 362, 363
 希尔施曼, 乌尔苏拉 362, 363, 366
 希特勒, 阿道夫 146, 169, 170, 195, 200, 217—221, 223—228, 232, 237—240, 246, 251, 277, 310, 325, 336, 338, 342, 348, 350, 351, 370—373, 375—378, 380, 381, 384—388, 390, 392, 394—396, 401—403, 406, 409, 415—417, 419, 428, 440, 447, 485, 486, 491, 493, 495, 496, 498, 500—502, 504, 523, 531, 552, 594
 霍尔, 萨穆埃尔 243—245, 247, 248
 胡佛, 赫伯特·克拉克 164, 207, 209, 215
 霍普金斯, 哈里·劳埃德 474
 胡根堡, 阿尔弗雷德 213
 亨伯特-德罗兹, 朱尔斯 117, 152,

- Ingangi, Vincenzo
 Ingrao, Pietro

 Intelvi, Giorgio
 Invernizzi, Gaetano
 Isgrò, Michele
 Isola, Giuseppe
 Jacini, Stefano
 Jacopo
 Jacoponi, Vasco
 Jagoda, Genrich Grigorievič

 Jannaccone, Pasquale
 Jeanneney, Jules
 Jervolino, Angelo Raffaele

 Jodl, Alfred
 Jouhaux, Léon
 Julg, Carlo
 Kabakčev, Christo
 Kamenev, Lev Borisovič

 Keitel, Wilhelm
 Kérillis, Henri de
 Kesselring, Albert
 Keynes, John Maynard
 Kirov, Sergej Mironovič

 Kléber, Emil
 Kodré, Carlo
 Kolarov, Vasil
 Labriola, Antonio
 Labriola, Arturo

 因甘吉, 温琴佐 436
 英格拉奥, 彼特罗 276, 436, 438,
 439, 517, 527, 561
 因泰尔维, 乔治(见Curiel E.)
 因韦尔尼齐, 加埃塔诺 520
 伊斯格罗, 米凯莱 142
 伊索拉, 朱赛佩 521
 亚奇尼, 斯特法诺 430, 510, 559
 雅各布(见Berti G)
 雅各布尼, 瓦斯利 521
 雅戈达, 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
 339, 341
 雅纳科内, 帕斯夸莱 279
 让纳内, 朱尔 413
 耶尔沃利诺, 安杰诺·拉法埃莱
 430
 约德尔, 阿尔弗雷德 566
 儒奥, 列昂 298
 尤尔格, 卡洛 520
 卡巴克契耶夫, 赫里斯托夫 18, 19
 加米涅夫, 列夫·波利索维奇 116,
 135, 136, 143, 307, 335
 凯特尔, 威廉 385, 566
 凯里利斯, 亨利·德 378
 凯塞林, 艾伯特 605, 606
 凯恩斯, 约翰·梅纳德 167, 207, 210
 基洛夫,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 307,
 335, 342
 克莱贝尔, 埃米尔 308
 科德雷, 卡洛 521
 科拉罗夫, 瓦西尔 58
 拉布里奥拉, 安东尼奥 277, 515
 拉布里奥拉, 阿尔图罗 250

Laconi, Renzo
La Malfa, Ugo

Lamanteo, Antonio
Lambrocchi, Aldo
Lampredi, Aldo

Landini, Orfeo
Lanfranco, Leo
La Pira, Giorgio
Largo Caballero, Francisco
Lari, Pietro
La Rocca, Vincenzo
Lattuada, Alberto
Lavagnini, Spartaco
Laval, Pierre

Lazzari, Costantino
Lazzati, Giuseppe
Lebrun, Albert
Lenin, Vladimir Ilič

Leone, XIII
Leone, Francesco

Leonetti, Alfonso

Leris, Angelo

Letis, Luigi
Levi, Carlo

拉科尼, 伦佐 437

拉马尔法, 乌戈 95, 175, 177, 430,
432, 490, 511, 512, 544, 545, 570,
572, 576, 585—587, 600, 607

拉曼泰奥, 安东尼奥 375

兰布罗基, 阿尔多 375

兰普雷迪, 阿尔多 261, 318, 453,
481, 482, 484, 558, 598, 594

兰迪尼, 奥尔费奥 520

兰弗朗科, 莱奥 531, 532, 538

拉皮拉, 乔治 509, 510

拉尔戈·卡瓦列罗, 弗兰西斯科 315

拉里, 彼特罗 318

拉罗卡, 温琴佐 436, 450, 550

拉图阿达, 阿尔贝托 436

拉瓦尼尼, 斯帕尔塔科 45

赖伐尔, 皮埃尔 236, 237, 240, 241,
243—245, 247, 248, 412

拉扎里, 科斯坦蒂诺 56, 80

拉扎蒂, 朱赛佩 509

勒布伦, 阿尔贝 413

列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6, 8, 10,
14, 16, 18, 19, 42, 100, 131, 143,
153, 170, 281, 341, 347, 350, 609

利昂纳十三世 352

利昂纳, 弗朗切斯科 260, 304, 318,
405, 483, 593

莱奥内蒂, 阿方索 102, 129, 134,
142, 159, 178—181, 515

莱里斯, 安杰洛 398, 399, 453, 481,
492, 517, 531, 534, 538

莱里斯, 路易吉 520

莱维, 卡洛 175, 198, 199, 284, 325,
432, 436

- Levi Della Vida, Giorgio
 Lex, Alma
 Libonati, Franco
 Li Causi, Girolamo
- Lievore, Alfredo
 Lisa, Athos
 Litvinov, Maksim Maksimovič
- Lizzadri, Oreste
- Lizzero, Mario
 Locatelli, Amleto
 Lombardi, Riccardo
- Lombardo, Ivan Matteo
 Lombardo Radice, Lucio
 Lomellina, Luigi
 London, Jack
 Longhena, Mario
 Longo, Luigi
- Lozovskij, Solomon Abramovič
- Lucetti, Gino
 Luigi di Savoia, Aosta(duca degli
 Abruzzi)
 Luisetti, Virgilio
- 莱维·德拉维达, 乔治 214
 莱克斯, 阿尔玛 183
 利博纳蒂, 弗朗科 431
 利考西, 吉罗拉莫 80, 129, 141,
 320, 450, 521, 524, 597, 604
 列沃雷, 阿尔弗雷多 520
 利萨, 阿托斯 184, 260
 李维诺夫,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
 奇 378, 389
 利扎德里, 奥雷斯特 434, 513, 576,
 583, 584, 607
 利泽罗, 马里奥 551
 洛卡泰利, 阿姆莱托 375
 隆巴尔迪, 里卡尔多 432, 544, 549,
 559
 隆巴尔多, 伊万·马泰奥 434
 隆巴尔多·拉迪切, 卢乔 276, 438
 洛梅利纳, 路易吉 196
 伦敦, 杰克 272
 隆盖纳, 马里奥 434
 隆哥, 路易吉 43, 76, 122, 129, 134,
 139—141, 147, 151, 153, 158,
 159, 161, 178, 179, 181, 196, 198,
 199, 201, 202, 226, 233, 255, 258—
 260, 264, 304, 305, 309, 317, 318,
 322, 347, 375, 398, 399, 402, 405,
 407, 408, 445, 483, 515, 521, 522,
 524, 595, 597—600, 603, 604
 洛佐夫斯基, 索洛蒙·阿布拉莫维
 奇 155
 卢切蒂, 吉诺 113
 路易吉·迪萨沃亚, 奥斯塔(阿布鲁
 齐公爵) 279
 卢伊塞蒂, 维尔吉利奥 434

- Lupinacci, Manlio
Lussu, Emilio
- Lussu, Joyce
Luzio, Alessandro
Luzzatto, Fabio
Luzzatto, Gino
Luzzatto, Lucio
- Macaluso, Emanuele
Maccari, Mino
MacDonald, Ramsay
Macrelli, Cino
Mafai, Mario
Maffi, Fabrizio
- Maggioni, Davide
Malagugini, Alberto
Malavasi, Gioacchino
Malinovskij, Rodion Jakovlevič
- Mallozzi, Ettore
Mallozzi, Vittorio
Maltagliati, Abdon
Malusardi, Edoardo
Malvestiti, Piero
- Mambrin, Antonio
Mameli, Goffredo
Mammuccari, Mario
Mancini, Antonio
Mancini, Pietro
- 卢皮纳奇, 曼利奥 431, 547
卢苏, 埃米利奥 97, 100, 125, 176,
199, 226, 251, 326, 332, 433, 487,
489, 541, 542, 544, 585—587,
592, 593, 600
卢苏, 乔伊斯 488
卢齐奥, 亚历山德罗 279
卢扎托, 法比奥 214
卢扎托, 吉诺 432
卢扎托, 卢乔 253, 333, 433, 513,
559, 584
马卡卢索, 埃马努埃莱 438
马卡里, 米诺 282
麦克唐纳, 兰姆塞 243
马科雷利, 奇诺 432
马法伊, 马里奥 284
马菲, 法布里齐奥 55, 66, 68, 102,
522
马焦尼, 戴维 260
马拉古吉尼, 阿尔贝托 287
马拉瓦西, 焦阿基诺 510
马利诺夫斯基, 罗季昂·雅科夫列
维奇 349
马洛齐, 埃托雷 318, 405
马洛齐, 维托里奥 521
马尔塔利亚蒂, 阿布东 260
马卢萨尔迪, 埃多阿尔多 535
马尔韦斯梯蒂, 皮耶罗 214, 430,
509, 510
曼布林, 安东尼奥 375
马梅利, 戈弗雷多 267
马穆卡里, 马里奥 521
曼奇尼, 安东尼奥 279
曼奇尼, 彼特罗 434

- Manetti, Cesare
 Maniera, Aristodemo
 Manstein, Fritz Erich von
 Manuilskij, Dmitrij Zacharovič
 Manzù Giacomo
 Marabini, Andrea
 Marabini, Anselmo
 Marazza, Achille
 Marcellino, Nella
 Marchesi, Concetto
 Marchetti, Giuseppe
 Marchini, Aldo
 Marconi, Guglielmo
 Marcotulli, Silvio
 Marcucci, Cesare
 Margherita, di Savoia
 Maria Josè di Savoia
 Marinetti, Filippo Tommaso
 Marini, Ferruccio
 Marinotti, Franco
 Marone, Gherardo
 Marquet, Adrien
 Marroni, Marcello
 Marrucci, Oreste
 Martelli, Luigi
 Martelli, Renzo
 Martinetti, Piero
 Martini, Arturo
 马内蒂,切萨雷 520
 马涅拉,阿里斯托代莫 318, 405,
 593
 曼施泰因,弗里茨·埃里希·冯
 500
 曼努伊尔斯基,德米特里·扎哈罗
 维奇 155, 156, 263, 349, 353,
 354, 356, 369
 曼祖,贾科莫 284
 马拉比尼,安德烈亚 454
 马拉比尼,安塞尔莫 12, 260
 马拉扎,阿基莱 430
 马尔切利诺,内拉 492, 518, 531
 马尔凯西,孔切托 434, 546—549,
 569, 572
 马尔凯蒂,朱赛佩 318
 马尔基尼,阿尔多 375
 马尔科尼,古列尔莫 279
 马尔科图利,西尔维奥 520
 马尔库奇,切萨雷 398, 399, 404,
 521
 玛格丽塔·迪萨沃亚 94
 玛丽亚·何塞·迪萨沃亚 547
 马里内蒂,菲利波·托马索 279
 马里尼,费鲁乔 261
 马里诺蒂,弗朗科 29, 81
 马罗内,盖拉尔多 432, 436
 马尔凯,阿德里安 373, 488
 马罗尼,马尔切洛 598
 马鲁奇,奥雷斯特 375
 马尔泰利,路易吉 521, 534
 马尔泰利,伦佐 521
 马尔蒂内蒂,皮耶罗 214
 马尔蒂尼,阿尔图罗 283

- Martini, Rigoletto 马尔蒂尼,里戈莱托 398,449,454, 455,516
- Marturano, Sergio 马尔图拉诺,塞尔焦 521
- Marx, Karl 马克思,卡尔 281
- Marzi, Marchesi Fausto 马尔齐·马尔凯西,福斯托 519
- Masarik, Tomáš Garrigue 马萨利克,托马斯·加利格 376
- Mascagni, Pietro 马斯卡尼,彼特罗 279
- Masetti, Albertino 马塞蒂,阿尔贝蒂诺 521
- Masi, Danilo 马西,达尼洛 521
- Massini, Cesare 马西尼,切萨雷 12, 260, 347, 355, 368, 399, 404, 455
- Massola, Umberto 马索拉,翁贝托 347, 368, 369, 399, 405, 407, 439, 453, 455, 456, 479, 488, 490, 492, 516—518, 530—532, 534, 536, 538, 539, 544, 546, 549, 557, 561, 591, 592, 594, 595, 597
- Matteotti, Giacomo 马泰奥蒂,贾科莫 47, 48, 66, 76, 80, 82, 85—88, 90, 92, 104, 275, 278, 546
- Mattioli, Raffaele 马蒂奥利,拉法埃莱 321, 431
- Mattioli, Vasco 马蒂奥利,瓦斯科 318, 521
- Mazzali, Guido 马扎利,圭多 96
- Mazzetti Marino 马采蒂,马里诺 318, 457, 482, 593
- Mazzini, Giuseppe 马齐尼,朱赛佩 575, 576
- Mazzoni, Nino 马佐尼,尼诺 8
- Meda, Luigi 梅达,路易吉 430
- Melloni, Claudio 梅洛尼,克劳迪奥 521
- Melodia, Giovanni 梅洛迪亚,乔瓦尼 521
- Menarini, Cesare 梅纳里尼,切萨雷 318
- Menconi, Gino 门科尼,吉诺 192, 521
- Menegazzo, Angelo 梅内加佐,安杰洛 375
- Meneghetti, Egidio 梅内盖蒂,埃吉迪奥 432
- Menotti, Clarenzo 梅诺蒂,克拉伦佐 261

- Mentasti, Pietro
 Mercandino, Adelmo
 Merlin, Umberto
 Messe, Giovanni
 Mezzomonti, Cantimori Emma
- Miceli, Giuseppe
 Michelangeli, Giovanni
 Micheli, Giuseppe
 Mieli, Renato
 Miglioli, Guido
 Migneco, Giuseppe
 Mila, Massimo
 Milano, Paolo
 Minio, Enrico
 Minzoni, Giovanni
 Mira, Giovanni
 Misiano, Francesco
 Modesti, Ostello
 Modigliani, Giuseppe Emanuele
- Modotti, Tina
 Moglia, Luciano
 Mola Vidal, Emilio
 Molè, Enrico
 Molinari, Pompilio
 Molotov, Vjačeslav Michajlovič
- Montagnana, Mario
- Montagnana, Rita
- 门塔斯蒂, 彼特罗 430, 549
 梅尔坎迪诺, 阿代尔莫 405
 梅林, 翁贝托 430
 梅塞, 乔瓦尼 499
 梅佐蒙蒂·坎蒂莫里, 埃玛 363,
 434
 米切利, 朱赛佩 331
 米凯兰杰利, 乔瓦尼 261
 米凯利, 朱赛佩 430
 米耶利, 雷纳托 593
 米廖利, 圭多 60, 62, 97, 100
 米涅科, 朱赛佩 436
 米拉, 马西莫 432
 米拉诺, 保罗 362, 434
 米尼奥, 恩里科 521
 明佐尼, 乔瓦尼 75, 275
 米腊, 乔瓦尼 432
 米夏诺, 弗朗切斯科 10
 莫代斯蒂, 奥斯泰利奥 521
 莫迪利亚尼, 朱赛佩·埃马努埃莱
 38, 66, 231, 333, 402, 443, 488
 莫多蒂, 蒂娜 318
 莫利亚, 卢恰诺 534
 莫拉, 维达尔·埃米利奥 286
 莫莱, 恩里科 431
 莫利纳里, 蓬皮利奥 438, 521
 莫洛托夫·维亚切斯拉米·米哈伊
 洛维奇 389, 391, 445, 446, 467,
 468, 494
 蒙塔尼亚纳, 马里奥 129, 196, 255,
 259, 260, 264, 331, 347, 348, 355,
 359, 399, 403—405, 407, 442,
 450, 452, 480, 483, 515
 蒙塔尼亚纳, 丽塔 160, 179, 260, 318

- Montagnani, Pietro
 Montale, Eugenio
 Montanari, Camillo
 Montgomery, Bernard Law
 Monti, Augusto
 Montini, Giovan Battista
 Morandi, Giorgio
 Morandi, Rodolfo

 Moranino, Francesco
 Moravia, Alberto
 Morgagni, Manlio
 Mori, Cesare
 Morlotti, Ennio
 Moro, Aldo
 Morpurgo, Edgardo
 Morra, Umberto
 Mosca, Giuseppe
 Moskvin
 Motta, Giacinto
 Muccini, Ugo
 Mugnaini, Faustino
 Müller, Hermann
 Muratori, Spartaco
 Muscetta, Carlo
 Mussolini, Benito

 蒙塔尼亚尼, 彼特罗 519, 529
 蒙塔莱, 欧金尼奥 282
 蒙塔纳里, 卡米洛 337
 蒙哥马利, 伯纳德·劳 497
 蒙蒂, 奥古斯托 432, 436
 蒙蒂尼, 乔万·巴蒂斯塔 508
 莫兰迪, 乔治 283
 莫兰迪, 鲁道夫 96, 175, 177, 198—
 200, 214, 253, 256, 333, 433, 438,
 513, 582
 莫拉尼诺, 弗朗切斯科 521
 莫拉维亚, 阿尔贝托 174, 282
 莫尔加尼, 曼利奥 555
 莫里, 切萨雷 62
 莫洛蒂, 恩尼奥 436
 莫罗, 阿尔多 430, 509
 普尔普尔戈, 埃德加尔多 261
 莫拉, 翁贝托 432
 莫斯卡, 朱赛佩 318
 莫斯克温(见 Trilisser M.A.)
 莫塔, 贾钦托 81, 261
 穆奇尼, 乌戈 375
 穆尼亚伊尼, 福斯蒂诺 521
 米勒, 赫尔曼 215
 穆拉托里, 斯帕尔塔科 521
 穆谢塔, 卡洛 276
 墨索里尼, 贝尼托 4, 24, 35, 45, 47,
 50—54, 59, 63, 65, 68—75, 81—
 83, 86—94, 96, 104—109, 112,
 113, 171, 212—215, 223, 235—
 248, 250, 257, 263, 269—271,
 278, 279, 282, 283, 287—289,
 351, 352, 370—372, 377, 380—
 385, 394—397, 399, 406, 416—

- 421, 426—429, 448, 451, 457—
462, 464, 465, 468, 477, 478, 484—
486, 490, 491, 496, 499, 500, 502—
504, 506—508, 526—531, 533,
536, 537, 542, 546, 548, 549, 551—
555, 557, 558, 562, 563, 566
- Mussolini, Vittorio
Muti, Ettore
Nallino, Carlo Alfonso
Nanetti, Nino
Napolitano, Giovanni
Natoli, Aldo
Natta, Alessandro
Nedo
Negarville, Celeste
- Negarville, Osvaldo
Negri, Ada
Negrín López, Juan
Negroni, Armando
Nenni, Pietro
- Nerozzi, Amadeo
Nerozzi, Walter
Neumann, Heinz
Neurath, Konstantin von
Nevicati, Pietro
Nicola, Giovanni
- 墨索里尼, 维托里奥 283, 436
穆蒂, 埃托雷 426, 536, 568
纳利诺, 卡洛·阿方索 279
纳内蒂, 尼诺 304, 375
纳波利塔诺, 乔瓦尼 436
纳托利, 阿尔多 521
纳塔, 亚历山德罗 437
内托(见Pajetta P.)
内加维莱, 切莱斯特 255, 261, 263,
347, 354, 399, 402—404, 407,
453, 481, 517, 518, 530, 534, 536,
538, 547, 549, 557, 559, 591, 592,
597
内加维莱, 奥斯瓦尔多 304, 318, 521
内格里, 阿达 249
内格林·洛佩斯, 胡安 315, 374, 375
内格罗尼, 阿尔曼多 375
南尼, 彼特罗 68, 71, 72, 80, 83, 96,
226, 231, 233, 252, 305, 332, 333,
364, 400—404, 430, 443, 440,
484, 487—489, 513, 570, 576,
582, 584, 600, 607
内罗齐, 阿梅代奥 375
内罗齐, 瓦尔特 521
诺伊曼, 海因茨 343
瑙伊拉特, 康斯坦丁·冯 302
内维卡蒂, 彼特罗 375
尼科拉, 乔瓦尼 260, 405

- Nicoletto, Italo
 Nicoletti
 Nie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Nigrisbli, Bartolo
 Nikolaev, Leonid
 Nin, Andrés
 Nischio, Tito
 Nitti, Fausto

 Nitti, Francesco Saverio

 Noce, Teresa

 Novaro, Angiolo Silvio
 Novella, Agostino

 Nuccitelli, Fernando
 Oberti, Antonio
 Ogliaro Alfonso
 Ojetti, Ugo
 Oliva, Ernesto
 Olivetti, Gino
 Omodeo, Adolfo
 Onofri, Fabrizioo
 Ordžonikidze, Grigorij Konstan-
 tinovič
 Orestano, Francesco
 Orlando, Ruggero
 Orlando, Vittorio Emanuele
- 尼科莱托, 伊塔洛 579, 580
 尼科莱蒂 (见 Di Vittorio G.)
 尼采, 弗里德里希·威廉 168
 尼格里索利, 巴尔托洛 214
 尼古拉耶夫, 列昂尼德 335
 宁, 安德烈斯 315
 尼斯基奥, 蒂托 129
 尼蒂, 福斯托 176, 443, 484, 487,
 526
 尼蒂, 弗朗切斯科·萨韦里奥 26,
 32—34, 37, 38, 50, 51, 53, 54, 59,
 65, 69, 71, 75, 97, 252, 426, 443,
 587, 588
 诺切, 泰雷萨 196, 197, 260, 318,
 405, 450, 483, 593
 诺瓦罗, 安焦洛·西尔维奥 279
 诺韦拉, 阿戈斯蒂诺 255, 259, 260,
 347, 355, 399, 407, 453, 481, 516—
 518, 557, 561, 591, 592, 595, 597
 努奇泰利, 费尔南多 521
 奥贝蒂, 安东尼奥 102
 奥利亚罗, 阿方索 490, 513
 奥耶蒂, 乌戈 279, 282
 奥利瓦, 埃内斯托 196, 197
 奥利韦蒂, 吉诺 29, 81, 105
 奥莫代奥, 阿道夫 432, 511—513
 奥诺弗里, 法布里齐奥 519
 奥尔忠尼启则, 格里戈里·康斯坦
 丁诺维奇 339
 奥雷斯塔诺, 弗朗切斯科 279
 奥兰多, 鲁杰罗 442
 奥兰多, 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
 26, 32, 33, 36, 37, 53, 63, 81, 89,
 90, 112, 214, 250, 271, 430, 507,

- Oro Nobile, Tito
- Osborne D'Arcy, Godolphin
- Ossicini, Adriano
- Ossola, Giuseppe
- Ostrovskij, Nikolaj Alekseevič
- Ostuni, Teodoro
- Pacciardi, Randolpho
- Pacelli, Eugenio
- Padoan, Giovanni Battista
- Pagano, Giuseppe
- Paggi, Mario
- Pajetta, Gian Carlo
- Pajetta, Giuliano
- Pajetta, Pietro
- Palazzeschi, Aldo
- Palazzeschi, Vasco
- Palermo, Mario
- Pallotta, Guido
- Panzini, Alfredo
- Paolo(reggente di Jugoslavia)
- Paone, Remigio
- Papafava, Novello
- Papazzi, Aristo
- Papen, Franz von
- Papini, Giovanni
- Paratore, Giuseppe
- Parenti, Ezio
- Paribeni, Roberto
- Parodi Giovanni
- 548, 553, 556, 562, 563, 588
- 奥罗·诺比莱,蒂托 434
- 奥斯博恩·达尔西,哥多尔芬 506
- 奥西齐尼,阿德里亚诺 510, 581
- 奥索拉,朱赛佩 318
- 奥斯特洛夫斯基,尼古拉·阿列克
谢耶维奇 284
- 奥斯图尼,泰奥多罗 521
- 帕恰尔迪,兰多尔福 306, 317, 330,
442, 480, 484
- 帕切利,欧金尼奥(见Pio XII.)
- 帕多安,乔瓦尼·巴蒂斯塔 521
- 帕加诺,朱赛佩 284
- 帕吉,马里奥 432
- 巴叶塔,贾恩卡洛 196, 201, 205,
224, 320, 520, 595, 604
- 巴叶塔,朱利亚诺 306, 318, 402,
405, 483, 593
- 巴叶塔,彼特罗 318, 481
- 帕拉泽斯基,阿尔多 281
- 帕拉泽斯基,瓦斯科 521
- 帕莱尔莫,马里奥 175, 436
- 帕洛塔,圭多 428
- 潘齐尼,阿尔弗雷多 279
- 保罗(南斯拉夫摄政王) 468
- 帕奥内,雷米焦 284
- 帕帕法瓦,诺韦洛 431, 509
- 帕帕齐,阿里斯托 521
- 巴本,弗朗茨·冯 218, 219
- 帕皮尼,齐瓦尼 279
- 帕拉托雷,朱赛佩 431, 588
- 帕伦蒂,埃齐奥 521
- 帕里贝尼,罗伯托 279
- 帕罗迪,乔瓦尼 11, 450, 483, 593

- Parravano, Nicola
Parri, Ferruccio
- Pascarella, Cesare
Passoni, Mario
Pastore, Giulio
Paulus, Friedrich von
- Pavelić, Ante
Pavese, Cesare
Pavinelli, Mario
Pavolini, Alessandro
Pavolini, Paolo Emilio
Pedrazzoli, Ireo
Pelagatti, Rosalino
Pellegrini, Giacomo
- Pellizzari, Ardito
Perosi Lorenzo
Perrone, Mario e Pio
Perrotti, Nicola
Persico, Edoardo
Pertini, Sandro
- Peruzzi, Francesco
Pesce, Giovanni
Pesenti, Antonio
Petacchi, ALDO
Pétain, Henri Ph-O
- Petrillo, Tommaso
Piacentini, Marcello
Piancastelli, Giuseppe
- 帕拉瓦诺, 尼科拉 279
帕里, 费鲁乔 125, 177, 432, 511,
512, 544, 559, 560, 585, 586
帕斯卡雷拉, 切萨雷 279
帕索尼, 马里奥 434
帕斯托雷, 朱利奥 430
保卢斯, 弗里德希·冯 499—501,
531
帕维利奇, 安特 240, 504
帕韦塞, 切萨雷 282, 284, 436
帕维内利, 马里奥 521
帕沃利尼, 亚历山德罗 283
帕沃利尼, 保罗·埃米利奥 279
佩德拉佐利, 伊雷奥 521
佩拉加蒂, 罗萨利诺 521
佩莱格里尼, 贾科莫 255, 260, 304,
318, 369, 521
佩利扎里, 阿尔迪托 318
佩罗西, 洛伦佐 279
佩罗内, 马里奥和皮奥 29, 33, 34
佩罗蒂, 尼科拉 513
佩尔西科, 埃多阿尔多 284
佩尔蒂尼, 山德罗 125, 513, 582—
585, 600
佩鲁齐, 弗朗切斯科 364
佩谢, 乔瓦尼 318, 481, 521
佩森蒂, 安东尼奥 253
佩塔基, 阿尔多 521
贝当, 亨利·菲利普 401, 410—412,
415, 443, 465, 482, 488, 497
彼特里诺, 托马索 366
皮亚琴蒂尼, 马尔切洛 279, 283,
284
皮安卡斯泰利, 朱赛佩 521

- Pianese, Giuseppe**
Pianezza, Giuseppe
Picasso, Pablo
Piccardi, Leopoldo
- Picinini, Antonio**
Piccioni, Attilio
Piccolato, Rina
Picelli, Guido
Pieck, Wilhelm
Pieraccini, Gaetano
Pieraccini, Giovanni
Pieragostini, Raffaele
Pierretti, Giuseppe
Pilati, Gaetano
Pillori, Torquato
Pillori, Tullio
Pilnjak, Boris Andreevič
- Pincherle, Bruno**
Pintor, Giaime
- Pio XI**
Pio XII
Pirandello, Luigi
Pirannetto, Sergio
Pirastu, Luigi
Pirelli, Alberto
- Pirotta, Pietro Romualdo**
Pisacane, Carlo
Piva, Eugenio
Pivert, Marcel
Pizzinato, Armando
- 皮亚内塞, 朱赛佩 279
 皮亚内扎, 朱赛佩 521
 毕加索, 巴勃罗 284
 皮卡尔迪, 莱奥波尔多 431, 573—
 578, 607
 皮奇尼尼, 安东尼奥 81
 皮乔尼, 阿蒂利奥 430
 皮科拉托, 莉娜 531
 皮切利, 圭多 260, 306, 375
 皮克, 威廉 447
 皮耶拉奇尼, 加埃塔诺 434
 皮耶拉奇尼, 乔瓦尼 437
 皮耶拉戈斯蒂尼, 拉法埃莱 520
 皮耶雷蒂, 朱赛佩 261
 皮拉蒂, 加埃塔诺 92
 皮洛里, 托尔夸托 521
 皮洛里, 图利奥 521
 皮利尼亚克, 鲍里斯·安德烈耶维
 奇 284
 平凯莱, 布鲁诺 432
 平托尔, 贾伊梅 276, 277, 571, 596,
 599
 庇护十一世 109, 352, 382
 庇护十二世 382, 552
 皮兰代洛, 路易吉 88, 279, 282
 皮拉内托, 塞尔焦 509
 皮拉斯图, 路易吉 276
 皮雷利, 阿尔贝托 29, 34, 261, 424,
 505, 506
 皮罗塔, 彼特罗·罗穆阿尔多 279
 皮萨卡内, 卡洛 267
 皮瓦, 欧金尼奥 521
 皮维尔特, 马塞尔 298
 皮齐纳托, 阿尔曼多 276

- Pjatakov, Grigorij Leonidovič 皮达可夫, 格里戈里·列昂尼多维奇 339, 340, 346
- Pjatnitskij, Josif Aronovič 皮亚特尼茨基, 约瑟夫·阿罗诺维奇 232
- Platone, Felice 普拉托内, 费利切 318, 405, 483, 484, 593
- Plechanov, Georgij Valentinovič 普列汉诺夫, 格奥尔基·瓦连京诺维奇 281
- Polano, Luigi 波拉诺, 路易吉 10, 261
- Politzer, George 波利瑟, 乔治 414
- Poma, Nello 波马, 内洛 318
- Pontecorvo, Gillo 彭泰科尔沃, 吉洛 490
- Popov, Blagoi 波波夫, 布拉戈伊 220
- Poppi, Osvaldo 波皮, 奥斯瓦尔多 521
- Porzio, Giovanni 波尔齐奥, 乔瓦尼 431
- Porzio, Lelio 波尔齐奥, 莱利奥 434
- Postogna, Giovanni 波斯托尼亚, 乔瓦尼 521
- Potenza, Nicola 波滕扎, 尼科拉 260
- Poveromo, Amleto 波韦罗莫, 阿姆莱托 92
- Prampolini, Camillo 普兰波利尼, 卡米洛 190
- Pratolini, Vasco 普拉托利尼, 瓦斯科 174, 276, 282, 436, 439
- Pratolongo, Giordano 普拉托隆哥, 焦尔达诺 196, 521, 524
- Prieto y Tuero, Indalecio 普列托-图埃罗, 因达莱西奥 374
- Priolo, Antonio 普廖洛, 安东尼奥 434
- Puccini, Dario e Gianni 普契尼, 达里奥(和贾尼) 436
- Purricelli, Vittorio 普里切利, 维托里奥 323
- Quarello, Gioacchino 夸雷洛, 焦阿基诺 430, 490, 575—577
- Quasimodo, Salvatore 夸西莫多, 萨尔瓦托雷 282
- Quilici, Nello 奎利奇, 内洛 212
- Rabazzana, Pietro 拉贝扎纳, 彼特罗 11, 72
- Radek, Karl Bergardovič 拉狄克, 卡尔·伯恩哈多维奇 336

- Raghianti, Carlo Ludovico 339, 346
 拉吉安蒂, 卡洛·卢多维科 432, 511, 544
 Ragionieri, Gino 拉焦涅里, 吉诺 521
 Rakovskij, Christian Georgevič 拉科夫斯基, 赫里斯季安·格奥尔格维奇 341
 Rampolla, Mariano 兰波拉, 马里亚诺 352
 Rapelli, Giuseppe 拉佩利, 朱赛佩 430
 Rathenau, Walther 拉特瑙, 瓦尔特 169
 Ravazzoli, Paolo 拉瓦佐拉, 保罗 102, 128, 129, 134, 142, 159, 178—181
 Ravera, Camilla 拉维拉, 卡米拉 43, 76, 102, 115, 117, 118, 121, 122, 127, 129, 130, 133, 134, 179, 190, 450, 515, 521, 524, 525, 596
 Ravetto, Pietro 拉韦托, 彼特罗 521
 Reale, Adriano 雷亚莱, 阿德里亚诺 436
 Reale, Eugenio 雷亚莱, 欧金尼奥 175, 405, 598
 Reale, Oronzo 雷亚莱, 奥龙佐 432, 587
 Reale, Vito 雷亚莱, 维托 431
 Recchia, Teresa 雷基亚, 泰雷萨 102, 129
 Regent, Ivan 莱根特, 伊万 260
 Reggiani, Carlo 雷贾尼, 卡洛 260
 Reggiani, Ferruccio 雷贾尼, 费鲁乔 405
 Remmele, Hermann 雷梅尔, 赫尔曼 221, 343
 Repposi, Luigi 雷波西, 路易吉 10, 11, 58
 Respighi, Ottorino 雷斯皮基, 奥托里诺 279
 Reynaud, Paul 雷诺, 保罗 394, 412
 Ribbentrop, Joachim von 里宾特洛甫, 约阿希姆·冯 384, 389—391, 395, 419, 445, 446, 467, 468, 566
 Riboldi, Ezio 里博尔迪, 埃齐奥 56, 118
 Ricci, Berto 里奇, 贝尔托 276, 428
 Ricci, Mario 里奇, 马里奥 318, 405

- Ricci, Paolo
 Riccioni, Renato
 Riccobono, Salvatore
 Rietti, Mario
 Rigola, Rinaldo
 Rimola, Giuseppe
 Rindi, Rindo
 Rintelen, Anton von
 Roasio, Antonio
- Roatta, Mario
- Robotti, Paolo
 Rocco, Alfredo
- Rodano, Franco
 Rodinò, Giulio
 Rohegger, Riccardo
 Rolland, Romain
 Romagnoli, Ettore
 Romanelli, Romano
 Romei, Mario
 Romita, Giuseppe
- Rommel, Erwin
 Roosevelt, Franklin Delano
- Rosenberg, Arthur
 Rosi, Siro
 Rosselli, Carlo
- 星奇, 保罗 436
 里乔尼, 雷纳托 375
 里科博诺, 萨尔瓦托雷 279
 列蒂, 马里奥 375
 里戈拉, 里纳尔多 80, 127, 128, 194
 里莫拉, 朱赛佩 261, 344
 林迪, 林多 521
 林特伦, 安东·冯 566
 罗阿西奥, 安东尼奥 43, 306, 318,
 355, 399, 403, 407, 453, 481, 492,
 516—518, 534, 546, 550, 551,
 557, 561, 591, 592, 597
 罗阿塔, 马里奥 286, 287, 548, 564,
 566, 605
 罗博蒂, 保罗 344
 罗科, 阿尔弗雷多 82, 91, 105, 106,
 108, 213
 罗达诺, 弗朗科 510, 581
 罗迪诺, 朱利奥 430
 罗埃杰尔, 里卡尔多 481
 罗兰, 罗曼 200, 230
 罗马尼奥利, 埃托雷 279
 罗马内利, 罗马诺 279
 罗梅伊, 马里奥 375
 罗米塔, 朱赛佩 434, 513, 539, 569,
 572, 576, 582—584, 600
 罗梅尔, 欧文 496, 502, 566
 罗斯福, 赛兰克林·德拉诺 209,
 210, 284, 470, 474, 494, 507, 602
 罗森堡, 阿瑟 337
 罗西, 西罗 405
 罗塞利, 卡洛 94, 96, 125, 176, 226,
 231, 252, 254, 263, 278, 303, 304,
 306, 310, 315, 324, 325, 331, 332,

- 487, 546, 585
- Rosselli, Nello 罗塞利, 内洛 94, 175, 124, 331, 546, 585
- Rossellini, Roberto 罗塞利尼, 罗伯特 436
- Rossetti, Raffaele 罗塞蒂, 拉法埃莱 199
- Rossi, Agostino 罗西, 阿戈斯蒂诺 214
- Rossi, Carlo 罗西, 卡洛 521
- Rossi, Cesare 罗西, 切萨雷 86
- Rossi, Ernesto 罗西, 埃内斯托 94, 175—177, 191, 324, 432, 585, 587
- Rossi, Francesco 罗西, 弗朗切斯科 566
- Rossi, Giuseppe 罗西, 朱赛佩 520, 604
- Rossi Doria, Manlio 罗西·多里亚, 曼利奥 178, 191, 360, 435, 587
- Roveda, Giovanni 罗韦达, 乔瓦尼 102, 141, 517, 524, 534, 557, 559, 569, 572, 574—578, 582, 592—594, 597
- Roveri, Mario 罗韦里, 马里奥 521
- Ruffini, Edoardo 鲁菲尼, 埃多阿尔多 214
- Ruffini, Francesco 鲁菲尼, 弗朗切斯科 214, 436
- Ruffini, Nina 鲁菲尼, 尼娜 431
- Ruini, Meuccio 鲁伊尼, 梅乌乔 95, 430, 431, 562, 570—572, 587, 588, 607
- Runciman, Walter 朗西曼, 沃尔特 376
- Rusticalli, Alvaro 鲁斯蒂卡利, 阿尔瓦罗 375
- Rykov, Aleksej Ivanovič 李可夫, 阿列克谢·伊凡诺佩奇 144, 152, 341, 347
- Saba, Umberto 萨巴, 翁贝托 282
- Saccenti, Dino 萨琴蒂, 迪诺 318, 405
- Sacchetti, Walter 萨凯蒂, 瓦尔特 521
- Salandra, Antonio 萨兰德拉, 安东尼奥 24, 52, 54, 65, 69, 70, 81, 89, 90
- Salinari, Carlo 萨利纳里, 卡洛 438
- Saltini, Vittorio 萨尔蒂尼, 维托里奥 521

- Salvatorelli, Luigi 萨尔瓦托雷利, 路易吉 49, 92, 432, 490, 511, 512, 570, 586
- Salvemini, Gaetano 萨尔韦米尼, 加埃塔诺 22, 25, 31, 34, 72, 94, 97, 278, 442, 526
- Sansone, Luigi Renato 桑松内, 路易吉·雷纳托 434
- Santhià, Battista 桑蒂亚, 巴蒂斯塔 190, 191, 196, 197, 521, 524
- Santi, Aldo 桑蒂, 阿尔多 521
- Santi, Fernando 桑蒂, 费尔南多 434
- Sapegno, Natalino 萨佩尼奥, 纳塔利诺 282, 437
- Saraceno, Pasquale 萨拉切诺, 帕斯夸莱 430, 509
- Saragat, Giuseppe 萨拉盖特, 朱赛佩 333, 443, 487, 488, 531, 541, 582, 584, 585, 592, 593, 600
- Sartori, Anacleto 萨尔托里, 阿纳克莱托 375
- Sartori, Antonio 萨尔托里, 安东尼奥 318
- Sartorio, Giulio Aristide 萨尔托里奥, 朱利奥·阿里斯蒂德 279
- Sassano, Fidia 萨萨诺, 费迪亚 369
- Sassu, Aligi 萨苏, 阿利吉 284, 287, 436
- Scaglione, Emilio 斯卡廖内, 埃米利奥 432, 511
- Scappini, Remo 斯卡皮尼, 雷莫 521
- Scarabelli, Giorgio 斯卡拉贝利, 乔治 521
- Scaramucci, Gino 斯卡拉穆齐, 吉诺 521, 524
- Scelba, Mario 谢尔巴, 马里奥 430
- Schiano, Pasquale 斯基亚诺, 帕斯夸莱 432
- Schiapparelli, Stefano 斯基亚帕雷利, 斯特法诺 457, 482, 593
- Schirru, Michele 斯基鲁, 米凯莱 187
- Schleicher, Kurt von 施莱歇, 库特·冯 217, 219
- Schopenhauer, Arthur 叔本华, 亚瑟 168
- Schucht, Tatiana 舒赫特, 塔吉亚娜 321, 322
- Schulenburg, Friedrich Werner 舒伦堡, 弗里德里希·维尔纳 389
- Schuster, Ildefonso 舒斯特尔, 伊尔德丰索 249

- Scipione
 Scocimarro, Mauro
- Scorza, Carlo
- Scotti, Francesco
- Secchia, Pietro
- Secondari, Argo
 Segalini Primo
 Segni, Antonio
 Selva, Attilio
 Senise, Carmine
- Serbandini, Giovanni
 Serebrjakov, Leonid Petrovič
- Serena, Adelchi
 Sereni, Emilio
- Sereni, Enrico
 Sereni, Enzo
 Sereni, Xenia
- Sereni, Vittorio
- 希皮奥内(见 Bonichi G.) 284
 斯科奇马罗, 毛罗 57, 68, 76, 78,
 102, 114, 121, 129, 136, 141—
 143, 181, 183, 185, 195, 205, 320,
 322, 408, 430, 450, 521, 523, 524,
 526, 569, 578, 582, 594—598,
 600, 601, 607
 斯科尔扎, 卡洛 426, 535, 536, 552,
 555
 斯科蒂, 弗朗切斯科 261, 304, 318,
 375, 453, 482, 487, 593
 谢嘉, 彼特罗 122, 123, 129, 134,
 139, 140, 147, 151, 158, 159, 161,
 179, 182, 188, 189, 191, 196, 320,
 322, 408, 450, 521, 524, 595, 597
 塞贡达里, 阿尔戈 59, 60
 塞加利尼, 普里莫 375
 塞尼, 安东尼奥 430
 塞尔瓦, 阿蒂利奥 279
 塞尼塞, 卡尔米内 533, 536, 548,
 554, 578
 塞尔班迪尼, 乔瓦尼 521
 谢列布里亚科夫, 列昂尼德·彼得
 罗维奇 339
 塞雷纳, 阿代尔基 426, 536
 塞雷尼, 埃米利奥 161, 178, 191,
 255, 260, 337, 347, 352, 356, 359—
 364, 366, 398, 402, 423—425,
 482, 484, 487, 515, 579, 580
 塞雷尼, 恩里科 175
 塞雷尼, 恩佐 362, 363
 塞雷尼, 克塞尼亚 360, 363, 423,
 580
 塞雷尼, 维托里奥 436

- Seroni, Adriano
Serrati, Giacinto Menotti
- Settesoldi, Amleto
Severi, Francesco
Sforza, Carlo
- Siglienti, Stefano
- Silberberg, Leo
Silone, Ignazio
- Simon, John Allsebrook
Simonini, Alberto
Sinà Rocco
Sinigallia, Alessandro
- Sironi, Mario
Slataper, Scipio
Soddu, Ubaldo
Soffici, Ardengo
Sokolnikov, Grigorij Jakovlevič
- Soldati, Mario
Soleri, Marcello
- Sonnino, Sidney
Sorice, Antonio
Sotgiu, Girolamo
Spallone, Giulio
Spano, Velio
- Spataro, Giuseppe
- 塞罗尼, 阿德里亚诺 276
塞拉蒂, 贾敛托·梅诺蒂 6—17,
27, 41, 62, 66—69, 72, 80, 102
塞泰索尔迪, 阿姆莱托 521
塞韦里, 弗朗切斯科 279
斯福尔扎, 卡洛 51, 71, 95, 252,
426, 442, 480, 511, 526
西利恩蒂, 斯特法诺 432, 511, 569,
570
西尔贝伯格, 莱奥 360
西洛内, 伊尼亚齐奥(见 Tranquilli
Secondino) 129, 134, 141, 179,
180, 515
西蒙, 约翰·奥尔斯布鲁克 243
西莫尼尼, 阿尔贝托 434
西纳, 罗科 521
西尼加利亚, 亚历山德罗 318, 405,
521
西罗尼, 马里奥 283
斯拉塔佩尔, 西皮奥 25
索杜, 乌巴尔多 461
索菲奇, 阿尔登戈 279
索科尔尼科夫, 格里戈里·雅科夫
列维奇 339
索尔达蒂, 马里奥 282, 284
索莱里, 马尔切洛 431, 512, 548,
588
松尼诺, 西德尼 24, 26, 32, 36
索里切, 安东尼奥 548
索朱, 吉罗拉莫 276
斯帕洛内, 朱利奥 521
斯帕诺, 韦利奥 257, 318, 331, 593,
598
斯帕塔罗, 朱赛佩 430, 509, 569,

Spinella, Mario
Spinelli, Altiero
Spirito, Ugo
Sraffa, Piero
Stalin, Iosif Vissarionovič

Starace, Achille

Storoni, Enzo
Stresemann, Gustav
Stringher, Bonaldo
Sturzo, Luigi

Suardi, Emilio
Svevo, Italo
Tanev, Vasil
Tarchiani, Alberto
Tardini Demenico
Targetti, Ferdinando
Tasca, Angelo

Taviani, Paolo Emilio
Taylor, Myron C.

581

斯皮内拉, 马里奥 437
斯皮内利, 阿尔蒂耶罗 587
斯皮里托, 乌戈 212
斯拉法, 皮耶罗 214, 319—322
斯大林,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100, 110, 111, 115—117, 135,
143—147, 150, 152, 153, 155,
160, 200, 228, 230, 232, 281, 302,
305—307, 323, 335—337, 339—
343, 346, 347, 350, 353, 376, 378,
388, 389, 391, 392, 406, 433, 449,
455, 463, 467—476, 478, 493,
494, 500, 505, 537, 590
斯塔拉切, 阿基莱 109, 214, 283,
288, 289, 395, 417, 426, 536
斯托罗尼, 恩佐 431, 512, 576
施特雷泽曼, 古斯塔夫 239
斯特林格尔, 博纳尔多 279
斯图尔佐, 路易吉 74, 75, 80, 97,
109, 252, 442
苏阿尔迪, 埃米利奥 318, 593
斯韦沃, 伊塔洛 282
塔内夫, 瓦西尔 220
塔尔基亚尼, 阿尔贝托 442, 487
塔尔迪尼, 多梅尼科 508
塔尔杰蒂, 费尔迪南多 434
塔斯卡, 安杰洛 11, 57, 67, 68, 76,
78, 102, 121, 129, 133, 134, 137,
142, 147, 151—155, 158, 159,
179, 192, 323, 332, 333, 339, 401,
402, 443, 449, 488, 515
塔维亚尼, 保罗·埃米利奥 437
泰勒, 迈伦·C 602

- Terracini, Umberto 特拉齐尼,翁贝托 8—11, 43, 57, 58, 76, 101, 102, 114, 115, 121, 129, 136, 141—143, 181, 183—185, 195, 205, 320, 322, 450, 521, 524, 525, 596
- Terrosi, Creante 泰罗西,克雷安泰 521
- Tessaro, Antonio 泰萨罗,安东尼奥 375
- Testa, Teresio 泰斯塔,泰雷西奥 375
- Thalheimer, August 塔尔海姆尔,奥古斯特 152
- Thälmann, Ernst 台尔曼,恩斯特 152, 155, 217
- Thaon di Revel, Paolo 塔翁·迪雷韦尔,保罗 70
- Thorez, Maurice 多列士,莫里斯 297—299, 401, 446
- Tino, Adolfo 蒂诺,阿道夫 432, 511, 544, 559, 561, 586
- Tito, Ettore 铁托,埃托雷 279
- Tito, Josip Broz 铁托,约瑟普·布罗兹 346
- Tittoni, Tommaso 蒂托尼,托马索 37, 279
- Toeplitz, Giuseppe 托埃普利兹,朱赛佩 29
- Togliatti, Palmiro 陶里亚蒂,帕尔米罗 11, 54, 57, 66, 70, 76, 78, 101—103, 113, 117, 118, 122, 129, 133—138, 140, 142, 145—148, 150—162, 171, 179—181, 183—185, 187, 189, 193, 196, 198—200, 222, 226, 227, 231—233, 255—257, 259—261, 263, 264, 292, 311, 312, 316—318, 321—323, 334, 336, 338, 339, 343, 344, 347, 348, 357, 375, 398—400, 403—405, 407, 408, 443—445, 448, 449, 452—456, 464, 476—478, 483, 489, 492, 512, 514—516, 525, 530, 592, 594, 596, 598, 599, 609
- Tomasi della Torretta, Pietro 托马西·德拉托雷塔,彼特罗 430

- Tomat, Domenico
 Tombetti, Giuseppe
 Tomskij, Michail Pavlovič
- Tonetti, Giovanni
 Tonini, Attilio
 Torgler, Ernst
 Torraca, Vincenzo
 Torricini, Alberto
 Tosin, Bruno
 Tozzi, Federigo
 Tranquilli, Romolo
 Tranquilli, Secondino
- Traquandi, Nello
 Tréand, Maurice
 Treccani, Ernesto
 Tremelloni, Roberto
 Trentacoste, Domenico
 Trentin, Silvio
- Tresso, Pietro
- Treves, Claudio
 Treves, Paolo
 Treves, Piero
 Trilisser, Michail A.
 Tripodi, Nino
 Trombadori, Antonello
- Trombetti, Alfredo
 Trotskij, Lev Davidovič
- 托马特,多梅尼科 318,492
 托姆贝蒂,朱赛佩 368
 托姆斯基,米海伊尔·帕甫洛维奇
 144,152,339
 托内蒂,乔瓦尼 68,434
 托尼尼,阿蒂利奥 521
 托尔格勒尔,恩斯特 219,220
 托拉卡,温琴佐 432
 托里奇尼,阿尔贝托 521
 托辛,布鲁诺 190
 托齐,费德里哥 281
 特兰奎利,罗莫洛 141
 特兰奎利,塞孔迪尼 129,134,141,
 179,180,515
 特拉宽迪,内洛 175,177,432
 特雷昂,莫里斯 414
 特雷卡尼,埃内斯托 436,438
 特雷梅洛尼,罗伯特 434
 特伦塔科斯泰,多梅尼科 279
 特伦廷,西尔维奥 330,443,483,
 487,489
 特雷索,彼特罗 102,129,134,142,
 159,178—181
 特雷维斯,克劳迪奥 66,176
 特雷维斯,保罗 442
 特雷维斯,皮耶罗 442
 特里利塞尔,米海伊尔·安
 特里波迪,尼诺 276
 特龙巴多里,安托内洛 276,438,
 604
 特龙贝蒂,阿尔弗雷多 279
 托洛茨基,列夫·达维多维奇 100,
 110,111,116,135,136,143,155,
 174,180,186,187,222,227,298,

- Tuccari, Emanuele
 Tucci, Giuseppe
 Tuchačevskij, Michail Nikolaevič

 Tupini, Umberto
 Turati, Augusto
 Turati, Filippo

 Turchi, Giulio
 Tuti
 Ulbricht, Walter
 Umberto II
 Ungaretti, Giuseppe
 Vacchieri, Ettore
 Vaja, Alessandro

 Valdarchi, Giovanni
 Valenzi, Maurizio
 Valiani, Leo

 Vallauri, Giancarlo
 Valletta, Vittorio
 Valtolina, Giovanni
 Van der Lubbe, Marinus
 Vanelli, Lorenzo
 Vanni, Melchiorre
 Vanoni, Ezio
 Varga, Evgenij Samuilovič

 Vecchi, Eros
 Vecchietti, Tullio
 Vella, Arturo
 Venegoni, Carlo
- 309, 335, 337, 340, 341
 图卡里, 埃马努埃莱 276
 图奇, 朱赛佩 279
 图哈切夫斯基,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 341, 392, 469
 图皮尼, 翁贝托 430
 屠拉梯, 奥古斯托 106, 109
 屠拉梯, 菲利波 5, 6, 35, 53, 54, 63-66, 86, 89, 95, 113, 125, 127, 583
 图尔基, 朱利奥 521
 图蒂(见Martini R.)
 乌布利希, 瓦尔特 155
 翁贝尔托二世 177, 303, 548
 翁加雷蒂, 朱赛佩 282
 瓦基耶里, 埃托雷 375
 瓦亚, 亚历山德罗 261, 318, 405, 593
 瓦尔达基, 乔瓦尼 521
 瓦伦齐, 毛里齐奥 331, 593
 瓦利亚尼, 莱奥 261, 304, 305, 406, 442
 瓦劳里, 贾恩卡洛 279
 瓦莱塔, 维托里奥 535
 瓦尔托利纳, 乔瓦尼 521
 范·德尔·吕贝, 马里努斯 219, 220
 瓦内利, 洛伦佐 318
 瓦尼, 梅尔基奥雷 261, 524
 瓦诺尼, 埃齐奥 430, 576
 瓦尔加, 叶夫根尼·萨莫伊洛维奇 171
 韦基, 埃罗斯 190
 韦基耶蒂, 图里奥 583, 584
 韦拉, 阿尔图罗 68
 韦内戈尼, 卡洛 102, 129

- Venturi, Franco
 Venturi, Lionello
 Venturini, Bruno
 Veratti, Roberto
- Verga, Giovanni
 Vernocchi, Olindo
- Viana, Luigi
 Vicentini, Giuseppe
 Vico, Giambattista
 Vidali, Vittorio
- Vidussoni, Aldo
 Viezzoli, Giordano
 Vigorelli, Ezio
 Vincenzi, Sante
 Vinciguerra, Mario
 Viola, Giuseppe
 Viotto, Domenico
 Visconti, Luchino
 Visconti di Modrone, Filippo
 Maria
 Visconti Prasca, Sebastiano
- Visconti Venosta, Giovanni
 Visentin, Luigi
 Visigalli, Celeste
 Visintin, Ferrer
 Visocchi, Achille
 Vittorini, Elio
- Vittorio Emanuele II
 Vittorio Emanuele III
- 文图里, 弗朗科 442
 文图里, 利昂内洛 214
 文图里尼, 布鲁诺 535, 561
 韦拉蒂, 罗伯托 434, 513, 549, 559,
 582, 584, 585
 韦尔加, 乔瓦尼 281
 韦尔诺基, 奥林多 434, 513, 582,
 584
 维亚纳, 路易吉 196
 维琴蒂尼, 朱赛佩 214
 维科, 詹巴蒂斯塔 277
 维达利, 维托里奥 43, 261, 303,
 318, 442, 480
 维杜索尼, 阿尔多 426, 536
 维耶佐利, 焦尔达诺 304
 维戈雷利, 埃齐奥 434
 温琴齐, 桑泰 192, 197
 温奇圭拉, 马里奥 177, 191, 431
 维奥拉, 朱赛佩 92
 维奥托, 多梅尼科 434, 583
 维斯孔蒂, 卢基诺 436
 维斯孔蒂·迪莫德罗内, 菲利波·
 玛丽亚 576
 维斯孔蒂·普拉斯卡, 塞巴斯蒂亚
 诺 461
 维斯孔蒂·韦诺斯塔, 乔瓦尼 431
 维森廷, 路易吉 260
 维西加利, 切莱斯特 521
 维辛廷, 费雷尔 318
 维索基, 阿基莱 38
 维托里尼, 埃利奥 282, 284, 438,
 439, 550, 559
 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 51
 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 93,

Vodopivec, Albino
Volpe, Gioacchino
Volpi di Misurata, Giuseppe

Volterra, Edoardo

Volterra, Vito
Vota, Giuseppe
Westphal, Siegfried
Weygand, Maxime
Wildt, Adolfo
Wilson, Thomas Woodrow
Young, Owen D.
Zagari, Mario
Zamboni, Anteo
Zamboni, Esther
Zanardi, Francesco
Zanarini, Fioravante
Zancanaro, Tono
Zanelli, Ezio
Zangrandi, Ruggero

Zaniboni, Tito
Zanotti Bianco, Umberto
Zanussi, Giacomo
Zennaro, Giovanni
Zerenghi, Ezio
Zinovjev, Grigorij Evseevič

Zocchi, Lino
Zuccarini, Oliviero
Zvonimiro(re di Croazia)

247, 384, 551, 554, 556, 558
沃多皮韦兹, 阿尔比诺 260
沃尔佩, 焦阿基诺 279
沃尔皮·迪·米苏拉塔, 朱赛佩 29,
105, 107, 111, 247, 261
沃尔泰拉, 埃多阿尔多 432, 490,
511, 579
沃尔泰拉, 维托 214
沃塔, 朱赛佩 78
韦斯特法尔, 西格弗里德 606
魏刚, 马克西姆 410—412
威尔特, 阿道夫 279
威尔逊, 托马斯·伍德罗 36
扬格, 欧文·德 164, 235
扎加里, 马里奥 583, 584
赞博尼, 安泰奥 113, 114
赞博尼, 埃斯泰尔 118
扎纳尔迪, 弗朗切斯科 434
扎纳里尼, 菲奥拉万特 521
赞卡纳罗, 托诺 276, 364, 366, 438
扎内利, 埃齐奥 196
赞格兰迪, 鲁杰罗 275, 283, 371,
579
扎尼博尼, 蒂托 94, 113
赞诺蒂·比安科, 翁贝托 431
扎努西, 贾科莫 566, 601
泽纳罗, 乔瓦尼 375
泽伦吉, 埃齐奥 519
季诺维也夫, 格里戈里·叶夫谢耶
维奇 14, 67, 100, 110, 111, 116,
135, 136, 143, 307, 335
佐基, 利诺 318
祖卡里尼, 奥利维耶罗 96
兹沃尼米罗(克罗地亚国王) 504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正文